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学术顾问委员会

名誉主任：李铁映

主任：王忍之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齐世荣 朱庭光 金冲及 阎明复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辑委员会

主任：李慎明 郭永才

副主任：何秉孟（常务） 沈志华

郑异凡 李正乐 谢寿光

执行总主编：沈志华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明*	于沛	王正	石泽
叶军	叶书宗*	刘逖	刘仲亨*
邢广程	孙凌齐*	沈志华*	吴伟*
杨存堂*	杨建国	金雁	郑异凡*
张盛发*	赵国顺*	闻一	姚海*
徐天新*	薛衔天	戴隆斌*	

秘书：方琼

编务：罗淑娴 闻静 胡甫强 宗静

注：*为分卷主编。

- 本课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
- 本《选编》为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
- 本课题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
- 本《选编》出版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本档案《选编》仅供下列读者、单位阅读和收藏：

- 省、部、军级党政领导干部，宣传理论部门及外事部门局级以上干部；
- 从事苏联东欧问题和国际关系研究或教学的具有正高以上职称的人员；
-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级以上图书馆、档案馆，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级社会科学院及党校图书馆。

编者的话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以下称《选编》)是一部从我们所搜集到的有关苏联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原始档案资料选编而成的大型文献集。

自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以来,俄国陆续解密并公布了苏联时期自1917年十月革命至1991年底70余年间大量历史档案,引起国际理论界和史学界的极大关注。我国史学界对这些档案材料也极为重视,尽其所能地展开了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成立《选编》课题组并于同年8月将《选编》作为院“九五”重点研究课题正式立项。项目开展以来,一直受到各方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为了能尽快翻译、出版,1998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进一步加强了对课题组的领导,同时加大了资助力度。几年来,课题组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收集各国有关俄国解密档案的文献专集和杂志、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苏联的历史档案,并分赴俄国、美国、德国、荷兰等有关国家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收集俄国解密的原始档案;组织大批翻译力量,将其中的万

余件档案译成中文；编委会对这些文献进行整理、校对、注释、编辑，加工成为数百项专题并分别编成34卷（包括总目录1卷），总计近2000万字。现在，这一对于研究世界近现代史、研究苏联兴亡史、研究俄罗斯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大课题终于结项。

历史档案是记录历史事实的文字材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资料。然而某一件档案材料是否真实地记录了“历史事实”，是需要研究者从多方面加以判断的。因而不可认为凡是档案记录的，都是历史事实。正如马克思早在《神圣家族》中所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记录历史档案、保管历史档案，乃至解密公布历史档案，都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也就是说，都是为一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其他目的服务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档案材料也是如此。它们形成于苏联历史中各个不同时期，出自于不同人之手，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甚至往往还出现关于同一件事而说法迥然不同的材料；再者，哪些材料应该公布，哪些材料不应该公布，也都取决于档案持有者的某种需要。俄罗斯解密并公布苏联时期部分历史档案也是如此。苏联解体后，俄国档案管理虽在法律上规定逐步向社会开放，但在实际操作上依然服从于一定政治目的。叶利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18~119页。

为对前苏联共产党官员进行审判提供证据，向宪法法院提交了大量没有达到解密期限的文件；为调整与某些国家关系开放了大量涉外事件的文件；俄国国内的大小刊物在追求一定政治经济利益的背景之下，争相刊登从多种渠道获取的档案文件。因此，我们现在所编纂的这些档案资料的价值还有待于研究者去判断。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史料进行考证、探寻、对比、分析，才有可能获得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

值此《选编》问世之际，编委会深感本书年代跨度之大，涉及方面之广，造成编译上巨大困难。工作中我们力求坚持严谨作风，译文力求严格忠实于原文，体例力求清晰，便于查阅，编者注释只在于辅助说明事件、人物等方面的背景。虽然如此，疏漏和错误之处仍然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选编》的出版，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在此，我们谨致诚挚的谢意！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辑委员会

2001年12月

体 例 说 明

一、《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以下简称《选编》)共 34 卷(包括总目录卷 1 卷),收入自 80 年代末以来前苏联和俄国解密的历史档案文献 10000 余件,文献上限为 1917 年初,下限至 90 年代初。

二、本《选编》所收入的文献主要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家经济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等,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有些选自已经出版的各种档案文献集和专业杂志(包括少量的英文刊物),还有些是国外学界同仁赠与的。

三、本《选编》大体上按时间顺序分卷,每卷分若干专题,各个专题内的档案文献按时间顺序编排。最后一卷为全书总目录卷,总目录按全部所选文献的时间顺序编排,并标注卷次和页码。为便于读者查阅,同时编有全书专题的总目录。

四、本《选编》专题名称、专题说明、文献标题、文献日期、注释均为编者所加，个别标题是原有的。档案原件中有批注或划线的地方，凡能辨识者均予以保留或加注说明。

五、文件所标的档案编号只是为便于核查原文由编者所加的收藏编号。

六、凡人名、地名、书报刊名、组织机构名称及专门用语等，均参照以下工具书翻译：《列宁著作译名汇编》、《苏联百科词典》、《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俄语姓名译名手册》（新华社编）等。必要时采取音译和或加注说明。

本卷前言

本卷收集的主要是 1953~1964 年苏联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国内多种问题的档案文献，根据文件内容编为 31 个专题。

“发展火箭武器的决定”（1946 年 5 月至 1959 年 12 月）共 2 件。内容是斯大林时期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发展火箭武器和赫鲁晓夫时期设立火箭部队总司令职务的两份决定文件。

“斯维尔德洛夫儿子的遭遇”（1952 年 3 月至 1953 年 12 月）共 3 件。内容是俄共第一代领导人斯维尔德洛夫的遗孀为儿子被捕事致斯大林的信及儿子本人致马林科夫的信件等。

“关于纪念斯大林的建议”（1953 年 3 月至 1954 年 2 月）共 2 件。内容是两件有关崇拜斯大林现象的报告。

“‘航空工业部和空军领导人案’的重新审查”（1953 年 5~6 月）共 4 件。内容是苏联内务部对上述案件复查并予以平反的文件。

“七月全会与贝利亚倒台”（1953 年 7 月）共 3 件。内容是苏共中央全会关于贝利亚反党叛国罪行的决议、报告等。

“‘解冻’与知识分子”（1953 年 7 月至 1967 年 5 月）共 9 件。内容是苏联文学家、艺术家致苏共领导人的信件及讲话记录等。

“象棋冠军与苏共中央的龃龉”（1954 年 5 月至 1984 年 6 月）共 11 件。内容是苏象棋世界冠军博特温尼克就国际政治问题和人工智能研究问题致苏共领导人的信件以及苏共对这位棋手行动加以限制的报告等。

“关于波斯特尼科夫及其国外藏书的处理”（1954年11月至1955年2月）共4件。内容是捷克解放后，住在布拉格的俄国前社会革命党人、历史档案收藏家申请把他所收藏的图书交给国家致苏共中央的信件、报告等。

“赫鲁晓夫时期的经济状况及其评论”（1955年7月至1965年7月）共5件。内容是苏联一些经济学者、官员对经济问题的讲话、报告等。

“对于利特肯斯违反法制行为的处理（1955年9月）共1件。内容是苏共中央监委对前克格勃上校的审查报告。

“苏共二十大与格鲁吉亚事件”（1956年3月）共1件。内容是苏《劳动报》关于这一哀悼斯大林的集会示威事件写给总编辑的密信。

“朱可夫关于个人崇拜未及发表的演说”（1956年5月）共1件。内容是朱可夫拟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发言的稿件，涉及对斯大林的批评。

“波罗的海沿岸的政治动荡”（1956年11~12月）共6件。内容是波罗的海三国有关领导人给苏共中央关于动荡局势的报告、信件等。

“科学家卡皮察的个人遭遇”（1956年11月至1961年12月）共4件。内容是苏共对杰出物理学家请求出国讲学及出版书籍的建议予以全部否决报告及信件。

“关于是否恢复高尔基市旧名的争论”（1957年4月）共2件。内容是苏共20大后关于该市更名问题的报告及信件。

“托姆斯基儿子的申诉”（1957年5月至1987年12月）共2件。内容是一位老布尔会维克儿子为其父平反的申诉信。

“关于朗道院士的秘密档案”（1957年12月）共1件。内容是苏国家安全委员会近十年来对该物理学家的监视资料。

“‘社会拯救委员会’案件的平反”（1958年2月）共2件。内容是苏共为该案平反所做的调查报告及决议。

“中央书记处关于《苏联》杂志的决定”（1958年7月至1964年4月）共4件。内容是有关苏共宣传工作的几份报告。

“帕斯捷尔纳克及其《日瓦戈医生》”（1958年10月至1959年3月）共9件。内容是苏共中央关于该书获诺贝尔奖后诸多事宜的处理报告。

“关于部分青年行为表现的报告”（1958年10月）共1件。内容是苏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青年生活的报告。

“关于清理积压政治印刷品的报告”（1959年1~11月）共3件。内容是苏共宣传部门有关这一问题给中央的报告。

“关于修建防空洞兼电影院两用设施的决定”（1960年1月）共2件。内容是苏共中央和苏文件部有关这一事宜的文件。

“克格勃针对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计划”（1960年11月至1961年2月）共2件。内容是苏国家安全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

“下台后的卡冈诺维奇”（1960年12月至1982年9月）共17件。内容是卡冈诺维奇给历届苏共领导人请求恢复党籍和工作的信件。

“索洛乌欣与斯维特兰娜”（1961年5月至1969年11月）共4件。内容是斯大林的女儿写信给作家索洛乌欣的两封信，作家对她《仅仅一年》一书的评论，以及国家安全部门关于该书封杀措施给苏共中央的信。

“关于卡累利阿共和国的食品储备问题”（1962年5~6月）共2件。内容是有关增加该地区食品供应的请示报告。

“新切尔卡斯克事件”（1962年6月至1988年3月）共15件。内容是苏国家安全部门有关苏联工业腹地发生动乱流血事件给中央的大量报告文件。

“赫鲁晓夫与苏联新宪法”（1962年6~1964年6月）共3件。内容是赫鲁晓夫在宪法委员会上关于修改宪法的发言记录。

“赫鲁晓夫下台”（1964年10月）共4件。内容是苏共中央关于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决议，中央全会的记录等。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的复查和平反”（1988年12月）共2件。内容是关于苏共中央关于犹委会案件的复查平反会议记录。

杨存堂

2001年4月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主要编辑出版发行人

出 版 人：谢曙光

编 审 人：刘仲亨 陆象淦

发 行 人：胡鹏光 王 菲

编辑主任：程晓燕 许春山

编 辑：章若男 陈云卿 徐文渊 周绍珩

封面设计：孙元明

内文设计：范 迎

责任印制：盖永东

编 务：宗 静

目 录

本卷前言 28-1

发展火箭武器的决定

(1946年5月至1959年12月)

专题说明 28-1

№03704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火箭武器问题的决定
(1946年5月13日) 28-2

№03705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设立苏联武装力量火箭部队
总司令职务的决定(1959年12月17日) 28-9

斯维尔德洛夫儿子的遭遇

(1952年3月至1953年12月)

专题说明 28-11

№03275 斯维尔德洛娃关于儿子被捕问题致斯大林的信
(1952年3月16日) 28-12

- №03276** 斯维尔德洛夫关于党籍和工作问题致马林科夫的信（1953年8月25日）…………… 28-14
- №03277** 科米萨罗夫和博卡列夫关于斯维尔德洛夫的问题呈苏哈诺夫的报告（1953年12月31日）…… 28-21

关于纪念斯大林的建议

（1953年3月至1954年2月）

- 专题说明** …………… 28-22
- №03230** 科罗廖夫建议为斯大林造“玻璃陵墓”（1953年3月6日）…………… 28-23
- №06182** 塔拉索夫就《不脱军大衣》长诗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4年2月8日）…………… 28-24

“航空工业部和空军领导人案”的重新审查

（1953年5~6月）

- 专题说明** …………… 28-26
- №03158** 贝利亚关于沙胡林、诺维科夫等人案件复查结果致马林科夫的报告（1953年5月26日）…………… 28-28
- №03159** 苏联内务部对沙胡林、诺维科夫等人案件进行复查的结论（1953年5月26日）…………… 28-31
- №03160**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关于沙胡林、诺维科夫等人案件的裁决（1953年5月29日）…………… 28-39

- №03161**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对沙胡林等人案件侦讯材料
复查结果的决议 (1953年6月12日) 28-42

七月全会与贝利亚倒台

(1953年7月)

- 专题说明** 28-45
- №11748** 马林科夫在七月全会上关于贝利亚问题的报告
(摘录) (1953年7月2日) 28-47
- №11749** 赫鲁晓夫在七月全会上关于贝利亚问题的发言
(摘录) (1953年7月2日) 28-57
- №03698** 苏共中央关于贝利亚反党叛国罪行的决议 (摘录)
(1953年7月7日) 28-69

“解冻”与知识分子

(1953年7月至1967年5月)

- 专题说明** 28-89
- №03680** 作家谢尔文斯基致马林科夫的信
(1953年7月25日) 28-91
- №03699** 穆欣娜给莫洛托夫信的草稿 (摘录)
(不晚于1953年7月) 28-94
- №03917** 利布松等建筑学家致赫鲁晓夫的信
(不晚于1954年12月14日) 28-97

- №03700** 普拉斯托夫在苏联艺术家协会列宁格勒分会讨论
会上的发言速记记录 (摘录)
(1956年4月19日) 28-103
- №03701** 法捷耶夫临终前给苏共中央的一封信
(1956年5月13日) 28-108
- №03702** 雷特海乌在第一次北方作家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摘录) (1961年3月21日) 28-110
- №03262** 米哈尔科夫就讽刺剧《给自己树碑》
致福尔采娃的信 (1959年12月27日) 28-115
- №11750** 卡兹明关于《给自己树碑》评价问题给
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0年1月11日) 28-117
- №03703** 索尔仁尼琴致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一封信
(1967年5月16日) 28-118

象棋冠军与苏共中央的龃龉

(1954年5月至1984年6月)

- 专题说明** 28-122
- №05853** 博特温尼克致波斯佩洛夫的信
(1954年5月29日) 28-125
- №05855** 波斯佩洛夫关于博特温尼克所犯错误给苏共中央
的报告 (1954年6月19日) 28-133
- №05856** 博特温尼克关于自己的错误致波斯佩洛夫的信
(1954年12月27日) 28-134
- №05857** 博特温尼克关于出口人工象棋计算机程序致齐米
亚宁的信 (1978年12月14日) 28-139

- №05858** 齐米亚宁关于答复博特温尼克给特拉佩兹尼科夫的信 (1978年12月15日) 28-143
- №05859** 博特温尼克关于出口“先锋”程序再次致齐米亚宁的信 (1979年1月15日) 28-144
- №05860** 博特温尼克关于就“先锋”问题举行的会议致齐米亚宁的信 (1979年2月12日) 28-145
- №05862** 谢尔巴科夫关于“先锋”程序问题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9年2月20日) 28-149
- №05863** 博布科夫关于博特温尼克与法因贝格谈话致苏共中央的通报 (1984年5月17日) 28-151
- №05864** 齐米亚宁关于警告博特温尼克给斯图卡林的指示 (1984年5月18日) 28-152
- №05865** 斯图卡林关于限制博特温尼克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4年6月13日) 28-153

关于波斯特尼科夫及其国外藏书的处理

(1954年11月至1955年2月)

- 专题说明**..... 28-155
- №03172** 邦契-布鲁耶维奇致赫鲁晓夫的信 (1954年11月16日) 28-156
- №03174** 雅科夫列夫致苏共中央的简短报告 (1954年11月26日) 28-161
- №03175** 维诺格拉多夫和斯捷潘诺夫致苏共中央的简短报告 (1955年1月20日) 28-163
- №03176** 谢年科夫致苏共中央总务部的便函 (1955年2月23日) 28-165

赫鲁晓夫时期的经济状况及其评论

(1955年7月至1965年7月)

- 专题说明..... 28 - 166
- №03641 苏共中央七月全会关于经济问题的讨论 (摘要)
(1955年7月) 28 - 167
- №03643 柯西金和加里曼关于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谈话
(1959年6月1日) 28 - 174
- №03644 集体农庄庄员退休保障统一体制委员会的报告和
记录 (1960年3月16日) 28 - 182
- №03647 莫伊谢耶夫就苏联农业状况给勃列日涅夫和柯西
金的一封信 (1965年2月1日) 28 - 187
- №03648 斯塔罗夫斯基关于经济发展统计数字给苏共中央
和苏联部长会议的报告 (摘录)
(1965年7月24日) 28 - 193

对于利特肯斯违反法制行为的处理

(1955年9月)

- 专题说明..... 28 - 196
- №03361 苏共中央行政管理部关于上校利特肯斯的简要
报告 (1955年9月1日) 28 - 197

苏共二十大与格鲁吉亚事件

(1956年3月)

- 专题说明..... 28 - 200
- №03259 斯塔特尼科夫关于格鲁吉亚事件经过致布尔科夫
密信 (1956年3月12日) 28 - 201

朱可夫关于个人崇拜未及发表的演说

(1956年5月)

- 专题说明..... 28 - 213
- №06966 朱可夫呈送赫鲁晓夫的发言稿
(1956年5月19日) 28 - 215

波罗的海沿岸的政治动荡

(1956年11~12月)

- 专题说明..... 28 - 233
- №09420 维什尼亚科夫等关于立陶宛情况致苏共中央主席
团的信 (1956年11月3日) 28 - 234

- №09419** 沙尔科夫关于立陶宛情况的报告
(1956年11月4日) 28-237
- №09421** 克里姆科夫关于立陶宛形势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
信(1956年11月4日) 28-242
- №09422** 凯宾关于爱沙尼亚情况给苏共中央的通报
(1956年11月5日) 28-246
- №09423** 斯涅奇库斯关于立陶宛政治局势致苏共中央主席
团的报告(1956年12月6日) 28-248
- №09424** 卡伦别尔津关于拉脱维亚政治情况致苏共中央的
报告(1956年12月7日) 28-258

科学家卡皮察的个人遭遇

(1956年11月至1961年12月)

- 专题说明**..... 28-263
- №04541**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就申请派遣卡皮察院士赴印事
致苏共中央的信(1956年11月20日) 28-265
- №04543** 格拉戈列夫等通知不许卡皮察出国给苏共中央的
请示报告(1956年11月24日) 28-272
- №03346** 卡皮察关于研究“基本俄语”致苏斯洛夫的信
(1961年2月27日) 28-273
- №03347** 库金等人关于“基本俄语”问题给苏共中央的报
告(1961年12月21日) 28-276

关于是否恢复高尔基市旧名的争论

(1957年4月)

- 专题说明..... 28 - 279
- №04392 苏联文艺界人士就是否恢复高尔基市旧名致苏共中央的信 (1957年4月27日) 28 - 280
- №04393 苏共中央文化部关于调查高尔基市更名问题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7年4月29日) 28 - 283

托姆斯基儿子的申诉

(1957年5月至1987年12月)

- 专题说明..... 28 - 286
- №04084 托姆斯基-叶夫列莫夫呈赫鲁晓夫的申诉书 (1957年5月13日) 28 - 287
- №04085 托姆斯基-叶夫列莫夫请求为父平反致戈尔巴乔夫的信 (1987年12月29日) 28 - 289

关于朗道院士的秘密档案

(1957年12月)

- 专题说明..... 28 - 291
- №01098 克格勃关于朗道院士的秘密档案 (摘录) (1957年12月20日) 28 - 292

“社会拯救委员会”案件的平反

(1958年2月)

- 专题说明..... 28-304
- No07000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社会拯救委员会”案件的调查报告(1958年2月3日) 28-305
- No06999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处理“社会拯救委员会”案件办案人员的决议(1958年2月14日) 28-316

中央书记处关于《苏联》杂志的决定

(1958年7月至1964年4月)

- 专题说明..... 28-318
- No03302 苏共中央加盟共和国宣传鼓动部关于《苏联》和《星火》杂志错误的报告(1958年7月15日) 28-319
- No03301 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苏联》杂志艺术装潢中错误的决议(1958年7月26日) 28-321
- No06198 福尔采娃关于建议采用声光展示克里姆林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4年4月27日) 28-322
- No06199 斯纳斯京等关于克里姆林官管理处不同意组织声光展示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4年4月27日) 28-326

帕斯捷尔纳克及其《日瓦戈医生》

(1958年10月至1959年3月)

- 专题说明**..... 28 - 328
- №03163** 苏斯洛夫关于对帕斯捷尔纳克被授予诺贝尔奖采取措施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8年10月23日) 28 - 330
- №03164**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的决定 (1958年10月23日) 28 - 332
- №03165** 帕斯捷尔纳克关于被迫离开苏联致赫鲁晓夫的信
(1958年11月1日) 28 - 334
- №03166** 帕斯捷尔纳克关于承认错误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 (1958年11月5日) 28 - 335
- №03167** 谢列平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社会关系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9年2月16日) 28 - 338
- №03168** 谢列平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调查材料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9年2月20日) 28 - 340
- №03169** 鲁坚科关于对帕斯捷尔纳克采取措施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9年2月20日) 28 - 346
- №03170**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决议
(1959年2月27日) 28 - 349
- №03171** 鲁坚科关于讯问帕斯捷尔纳克情况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9年3月14日) 28 - 350

关于部分青年行为表现的报告

(1958年10月)

- 专题说明..... 28-353
- №07002 国家安全委员会莫斯科局关于部分青年行为表现的报告(摘录)(1958年10月23日) 28-354

关于清理积压政治印刷品的报告

(1959年1~11月)

- 专题说明..... 28-362
- №03194 罗曼诺夫等人关于停止出售与马林科夫等人有关的文集和图片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9年1月24日) 28-364
- №03195 皮加列夫关于研究书刊检查问题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9年10月23日) 28-365
- №03196 罗曼诺夫等关于清理书刊销售网问题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9年11月28日) 28-367

关于修建防空洞兼电影院两用设施的决定

(1960年1月)

- 专题说明..... 28-368
- №04395 米哈伊洛夫关于兴建防空洞、电影院两用设施给苏共中央的请示报告(1960年1月9日) 28-369

- №04396**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建造兼作小型电影院
的防空掩蔽所的决定》
(不早于1960年1月9日) 28-371

克格勃针对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计划

(1960年11月至1961年2月)

- 专题说明**..... 28-373
- №07006** 谢列平关于针对中央情报局采取的措施致苏共中
央的报告(1960年11月3日) 28-374
- №07007** 谢列平关于针对中央情报局的补充措施致苏共中
央的报告(1961年2月25日) 28-377

下台后的卡冈诺维奇

(1960年12月至1986年9月)

- 专题说明**..... 28-381
- №04587** 卡冈诺维奇请求重新工作给赫鲁晓夫的信
(1960年12月7日) 28-383
- №04591** 卡冈诺维奇在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上的发言
(不晚于1962年6月) 28-384
- №11751** 卡冈诺维奇请求恢复党籍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信
(1964年12月27日) 28-388
- №11752** 卡冈诺维奇请求恢复党籍给勃列日涅夫的信
(1967年12月24日) 28-389

- №04589** 卡冈诺维奇要求澄清误解给米哈伊洛夫的信
(1969年3月24日) 28-391
- №04590** 卡冈诺维奇关于澄清误解问题同索洛维约夫的电话记录(1969年6月2日) 28-393
- №11753** 卡冈诺维奇请求恢复党籍给勃列日涅夫的信
(1971年3月25日) 28-395
- №11754** 卡冈诺维奇请求恢复党籍给勃列日涅夫的信
(1976年2月19日) 28-396
- №11755** 卡冈诺维奇请求恢复党籍给苏共二十五大主席团的信(1976年2月19日) 28-397
- №11756** 卡冈诺维奇请求恢复党籍给勃列日涅夫的信
(1981年2月11日) 28-400
- №04588** 卡冈诺维奇关于“侄子”来信给苏联葛罗米柯的信(1982年5月31日) 28-401
- №11757** 卡冈诺维奇请求恢复党籍给契尔年科的信
(1984年6月20日) 28-403
- №11758** 卡冈诺维奇请求恢复党籍给苏共中央的信
(1985年8月) 28-404
- №11759** 卡冈诺维奇请求恢复党籍给戈尔巴乔夫的信
(1986年9月28日) 28-406

索洛乌欣与斯维特兰娜

(1961年5月至1969年11月)

- 专题说明** 28-437
- №03146** 阿利卢耶娃致索洛乌欣的信
(1961年5月8日) 28-439

- №03147** 阿利卢耶娃致索洛乌欣的信
(1961年6月10日) 28-450
- №03144** 安德罗波夫关于对斯维特兰娜采取措施致苏共中
央的信(1969年11月5日) 28-454
- №03145** 索洛乌欣对《仅仅一年》的评论
(不早于1969年11月5日) 28-456

关于卡累利阿共和国的食品储备问题

(1962年5~6月)

- 专题说明** 28-458
- №03352** 先金关于增加卡累利阿州食品市场储备致苏共中
央的报告(1962年5月22日) 28-459
- №03353** 斯特鲁耶夫关于无法增加卡累利阿食品市场储备
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62年6月18日) 28-460

新切尔卡斯克事件

(1962年6月至1988年3月)

- 专题说明** 28-461
- №07037** 伊瓦舒京关于居民对提高食品价格的反应给苏共
中央的报告(1962年6月1日) 28-463
- №07038** 谢米恰斯内关于居民对提高食品价格的反应给苏
共中央的报告(1962年6月2日) 28-466
- №07039** 谢米恰斯内关于对提高价格反应的补充材料给苏
共中央的报告(1962年6月2日) 28-470

- №07040** 谢米恰斯内关于某些地区出现敌对行为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62年6月3日) 28-472
- №07041** 科兹洛夫在新切尔卡斯克地方广播电台的讲话(1962年6月3日) 28-475
- №07042** 伊万舒金关于新切尔卡斯克市群众性骚乱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2年6月7日) 28-480
- №07043** 谢米恰斯内关于新切尔卡斯克局势恢复正常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2年6月12日) 28-491
- №07044** 谢米恰斯内关于在新切尔卡斯克骚乱中死人情况给赫鲁晓夫的报告(1962年6月14日) 28-494
- №04544** 谢米恰斯内和鲁坚科关于对新切尔卡斯克案件进行诉讼提交苏共中央的备忘录(1962年7月13日) 28-499
- №04557** 加强与反苏分子做斗争提案起草委员会给苏共中央的呈文(不晚于1962年7月19日) 28-523
- №04558**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加强同反苏分子做斗争的会议纪要(摘录)(1962年7月19日) 28-525
- №05837** 谢米恰斯内关于散发反苏匿名文件的情况向苏共中央通报(1962年7月25日) 28-535
- №05838** 伊瓦舒京关于新切尔卡斯克案件审理经过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2年8月16日) 28-539
- №05839** 伊瓦舒京和鲁坚科关于新切尔卡斯克案件诉讼情况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2年8月23日) 28-541
- №05840** 斯捷帕科夫关于新切尔卡斯克案件诉讼经过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2年8月24日) 28-543
- №03285** 切尔布里科夫给戈尔巴乔夫的秘密报告(1988年3月4日) 28-545

赫鲁晓夫与苏联新宪法

(1962年6月至1964年6月)

- 专题说明**..... 28 - 551
- №08541** 赫鲁晓夫在宪法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速记记录)(1962年6月15日) 28 - 553
- №08542** 赫鲁晓夫在宪法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开幕时的
讲话(1964年6月16日) 28 - 560
- №08543** 赫鲁晓夫在宪法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总结
发言(1964年6月16日) 28 - 565

赫鲁晓夫下台

(1964年10月)

- 专题说明**..... 28 - 567
- №04361**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召开中央全会的决议
(1964年10月12日) 28 - 569
- №04362**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恢复列宁主义集体领导原则
的决议(1964年10月13日) 28 - 571
- №04363**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的开幕词
(1964年10月14日) 28 - 573
- №04364** 苏共中央十月全会速记记录
(1964年10月14日) 28 - 575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的复查和平反

(1988年12月)

专题说明	28 - 592
№05235 关于所谓“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 (不晚于1988年12月29日)	28 - 593
№05234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犹委会案件的会议记录 (1988年12月29日)	28 - 600

【专题说明】

发展火箭武器的决定

(1946年5月至1959年12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在发展火箭武器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强大的火箭首先把人造卫星和载人卫星送上太空。苏联的洲际导弹威力曾使美国惴惴不安。苏联是怎样取得这样的成就的？下面的两个文件——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发展火箭武器的决定——也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在1946年，国家还处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人民缺吃少穿，生活资料极为紧张，苏联政府就把迅速发展火箭武器作为最重要的任务提上日程。火箭武器发展得快，除了由最高领导出面动员国家的所有力量外，还特别重视利用德国的已有技术和力量。在赫鲁晓夫时期就组织了火箭部队及其司令部。

(本专题文件由杨存堂编辑和校注，
张健民、陈继刚翻译)

№03704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火箭武器问题的决定

(1946年5月13日)

苏联部长会议认为制造火箭武器以及在这方面组织科研和试验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任务，特决定如下。

—

1. 组建苏联部长会议火箭技术特别委员会，由下列同志组成：

Г.М. 马林科夫同志——主席

Д.Ф. 乌斯季诺夫同志——副主席

И.Г. 祖博维奇同志——副主席，免去其电力工业部的工作

Н.Д. 雅科夫列夫同志——委员

Н.И. 基尔皮奇尼科夫同志——委员

А.И. 贝格同志——委员

П. 戈列梅金同志——委员

И.А. 谢罗夫同志——委员

诺索夫斯基同志——委员

2. 责成火箭技术特别委员会：

1) 监督火箭武器的科研、设计和实际工作的发展，审核并直接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提请批准上述方面科研和实际工作的发展计划与规划，以及决定和批准用于制造火箭武器货币拨款及物质技术资料方面的每一季度的需求；

2) 监督各部和各主管部门完成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进行火箭武器的科研、设计、结构以及实际工作任务的情况；

3) 协同有关部长和主管部门领导共同采取业务措施保证按时完成上述任务。

3. 特别委员会拥有自己的机构；

4. 规定各部和主管部门完成制造火箭武器的工作由火箭技术特别委员会监督。未经部长会议特别许可，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干扰或者询问有关于火箭武器的制造情况。

5. 责成火箭技术特别委员会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提请批准1946~1948年度科研和试验工作计划，作为首要任务确定——采用国产材料复制V-2导弹（远程导弹）和瀑布导弹（地空导弹）。

二

6. 由研制生产火箭武器的主导部决定：

1) 装备部——负责液体发动机火箭弹；

2) 农机部——负责固体燃料发动机火箭弹；

3) 航空工业部——负责喷气式巡航导弹。

7. 确定以下各部为协作生产主要部门——委托其完成科研、设计及试验工作，同时按照委员会批准的主导部的订货进行生产：

1) 电力工业部——负责生产陆上和舰船上制导系统的无线电仪器、选择器装置和电视机件装置，建立发现和测定目标方位的雷达站；

2) 造船工业部——负责生产陀螺稳定仪、计算仪表、表现和测定目标方位及到达导弹距离的舰船雷达站、舰船发射装置稳定系统、攻击水下目标火箭弹及仪表的自动制导头；

3) 化学工业部——负责生产液态燃料、氧化剂和催化剂；

4) 航空工业部——负责生产远程导弹的液体喷气式发动机和导弹空气动力研究及试验；

5) 机器和仪器制造工业部——负责生产安装、发射装置、各种压缩机、唧筒及其仪表，以及其他配套装置；

6) 农业机器制造部——负责生产非触发信管、装具和各种火药。

三

8. 为完成委派给各部的任务决定成立：

在装备部、农业机器制造部和电力工业部设立火箭技术总管理局；

在苏联武装力量部设立军械总部火箭武器管理局和海军火箭武器管理局；

在化学工业部、造船工业部、机器和仪器制造工业部设立火箭技术管理局；

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计划委员会设立以国家计委副主任为首的火箭技术局。

9. 在各部设立下列研究所、设计局和火箭技术试验场：

1) 在装备部——在第88号工厂基地成立火箭武器研究所和设计局，撤销该厂其他所有任务，将这些任务分配给装备部的其他工厂；

2) 在农业机器制造部——在国家中央第一设计局基地设立固体燃料火箭弹研究所、在航空工业部第一研究所第二分所基地成立设计局，以及在索夫里斯基试验场基地建立火箭弹科研试验场；

3) 在化学工业部设立喷气式发动机化学试剂和燃料研究所；

4) 在电力工业部——第20研究所和1号工厂的遥控力学实验

基地成立附设制导远程及地空火箭弹无线电和电子仪器设计方案局的科研所。委托布尔加宁同志审查决定将武装力量部 1 号工厂转交给电力工业部的问题，以便委派电力工业部完成该厂的计划；

5) 在苏联武装力量部设立军械总部的火箭科研所和火箭技术国家中心试验场，供所有从事火箭武器研究的部门使用。

10. 责成装备部（乌斯季诺夫同志）、农业机器制造部（万尼科夫同志）、电力工业部（卡巴诺夫同志）、造船工业部（戈列格利亚德同志）、机器和仪器制造工业部（帕尔申同志）、航空工业部（赫鲁尼切夫同志）、化学工业部（别尔乌辛同志）、武装力量部（布尔加宁同志）批准有关部的管理局、科研所和设计局的机构及编制。

四

11. 认为掌握德国火箭技术的下列工作是首要任务：

1) 完全复原 V-2 远程导弹和地空导弹——瀑布导弹、莱茵女儿导弹、蝴蝶导弹的技术文件和模型；

2) 恢复就 V-2 导弹、瀑布导弹、莱茵女儿导弹、蝴蝶导弹及其他导弹进行研究和试验所必需的带有全部设备仪器的实验室和试验台；

3) 培训能够掌握 V-2 导弹、地空导弹及其他导弹的设计、试验方法、生产零部件的工艺和导弹装配的苏联专家队伍。

12. 任命诺索夫斯基同志为在德国的火箭技术工程领导人，常驻德国。免去诺索夫斯基同志与火箭武器无关的其他工作。任命库兹涅佐夫同志（军械部）和盖杜科夫同志为诺索夫斯基同志的助手。

13. 责成火箭技术特别委员会从有关部挑选出必要数量的各专

业专家派往德国研制火箭武器，其目的在于把苏联专家指定给每位德国专家负责并从他们那里获得经验。

14. 禁止各部和各主管部门未经特别委员会批准召回其在德国研究德国火箭武器的工作人员。

15. 装备部、农业机器制造部、航空工业部、电力工业部、化学工业部、机器及仪器制造部以及苏联武装力量部等各部，必须在一个月內准备就绪并提交火箭技术特别委员会批准在德国的火箭武器设计、科研和试验的具体计划，连同为每个设计局确定的任务和期限。

为了解在德国的火箭武器工作的进展情况，以便制定目前的工作计划，派乌斯季诺夫、雅科夫列夫和卡巴诺夫同志带领专家组前往德国进行为期十五天的考查。

16. 责成苏联武装力量部（布尔加宁同志）在德国组建掌握训练和发射 V-2 导弹的特种炮兵部队。

17. 预先决定将德国设计局和专家于 1946 年底从德国转移到苏联的问题。

责成装备部、农业机器制造部、电力工业部、航空工业部、化学工业部、机器及仪器制造部准备好安置德国设计局和专家的基地。火箭技术特别委员会必须在一个月內就此问题向苏联部长会议提出建议。

18. 批准火箭技术特别委员会给从事火箭技术工作的德国专家规定高于一般人员的报酬。

19. 责成苏联武装力量部（赫鲁廖夫同志）为提供在德国从事火箭武器工作的所有苏联和德国专家的生活保障拨出：

11 号定额的免费口粮 1000 份。

2 号定额的补充口粮 3000 份。

小轿车 100 辆

载重汽车 100 辆

并供给燃料和配给驾驶人员。

20. 责成苏联财政部和在德国的苏联军事行政机关为在德国的火箭技术特别委员会进行的全部工作拨出经费 7000 万马克。

21. 批准火箭技术特别委员会以及各部在德国为科研所的实验室和火箭武器国家中心试验场，在战争赔款项目下订购各种特殊设备和仪器。委托特别委员会会同国家计划委员会及外贸部共同确定订货清单和供货期限。

22. 委托特别委员会向苏联部长会议提交建议，派遣委员会去美国安排为火箭技术研究所实验室订购设备和仪器，在这些建议中预先规定按公开许可证委员会有权购买价值 2 百万美元的设备仪器。

23. 责成内务部副部长谢罗夫同志为设在德国的火箭技术设计局、研究所、实验室及工厂的正常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食品供应、住房、汽车运输等）。

苏联武装力量部（赫鲁廖夫同志）和战略空军集团军总指挥索科洛夫斯基同志必须给予谢罗夫同志必要的协助。

五

24. 责成火箭技术特别委员会清查由各部和各部门运出的所有设备、仪器、仪表，以及火箭技术资料 and 模型，并根据赋予各有关部和各部门的任务在它们中的重新分配。

25. 委托苏联武装力量部（布尔加宁同志）向部长会议提出的关于火箭武器国家中心试验场的地点及建设的建议。

26. 责成火箭技术特别委员会提请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批准关于奖励研究和制造火箭武器的条例，以及关于为在火箭技术方面特别

熟练的工作人员提高薪金的建议。

27. 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 1946 年 3 月 6 日第 514 号决定，批准火箭技术特别委员会把装备部、农机制造部、航空工业部、电力工业部、机器及仪器制造部、化工部和苏联武装力量部新组建的科研院所和火箭武器设计局的薪金额及工业品与食品供应的待遇提高到苏联科学院的科研机构水平。

28. 责成航空工业部（赫鲁尼切夫同志）向装备部转派发动机制造专家、空气动力学家、飞机制造工人等 20 名。

29. 责成高等教育部部长卡夫塔诺夫同志在高等院校和综合性大学组织培训火箭技术工程师和科学工作者以及重新培训其他专业的高年级大学生掌握火箭武器专业，保证于 1946 年底具有高等技术院校学历的火箭武器专家的首批毕业生不少于 200 名，具有综合性大学学历的毕业生不少于 100 名。

30. 委托火箭技术特别委员会会同高等教育部从高教科研机构以及其他部挑选 500 名专家，对他们重新培训，并派遣到从事火箭武器研究的各部工作。

31. 为保证被调到苏联的德国火箭技术专家的住房，委托沃兹涅先斯基同志于 1946 年 10 月 15 日前，根据火箭技术特别委员会的调拨单，在分配计划中预先划出 150 栋可拆卸的芬兰式房子和 40 栋 8 套间的圆木住房。

32. 必须把火箭技术的发展工作当作国家最重要的任务，并责成所有部和机构把火箭技术任务当作首要任务来完成。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约·斯大林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Я. 恰达耶夫

№03705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设立苏联武装力量 火箭部队总司令职务的决定

(1959年12月17日)

本决定严禁复制和抄录。每一份文件的阅文标记和日期由收文的同志亲自书写，并必须有本人的签字。

关于设立苏联武装力量火箭部队总司令职务

苏联部长会议决定：

1. 设立火箭部队总司令—苏联国防部副部长的职务。

授予火箭部队总司令—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全权负责火箭部队的状态：它们的作战运用，战斗和动员准备，物资和技术保障，火箭武器的发展，领导战斗总体及特种目标的建设和使用，负责火箭部队全体人员的军纪和政治道德状况，以及协调在武装力量所有兵种制造发展和使用特种武器及火箭技术方面的问题。

2. 火箭部队总司令应有总数为 896 名军人和 280 名职员的结构，由下列部门组成。

——火箭部队总司令部；

——火箭武器管理总局；

——苏联国防部第 12 总局；

——战斗训练和军事学校管理局以及领导

——一个机构不大的（具有计划督察职能）后勤部长。

为了管理火箭部队和实现其战斗运作，建立直属火箭部队总司令的指挥所（配备通讯中心）和一至二个计算中心。

应采取措施在建立火箭部队总司令机构时，不增加苏联国防部中央机构的数量。

3. 所有装备战略火箭（洲际火箭和中程火箭）的兵团和部队、军事学校科研及试验机构、军火库、特种武器与火箭武器基地及库房均为火箭部队总司令指挥。

4. 为保证领导，装备战略火箭的火箭部队组建下列编制：

——三至四个团建制的火箭旅（中程）和五至六个团的火箭师，视某一方向火箭部队的数量而定。

——六至八枚导弹组建的洲际火箭旅，尔后根据处于使用状态的导弹数量的增加，可以将上述旅合并成一个军。

5. 任命苏联国防部副部长炮兵元帅 H.M. 伊万诺维奇为火箭部队总司令。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尼·赫鲁晓夫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Г. 斯杰潘诺夫

【专题说明】

斯维尔德洛夫儿子的遭遇

(1952年3月至1953年12月)

这组文件涉及的是俄共（布）重要领导人斯维尔德洛夫儿子的事。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生于1885年，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起为党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担任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党中央书记，得到列宁高度信任和评价。1919年3月死于肺炎。他的儿子安·雅·斯维尔德洛夫当时只有8岁，是革命领导人的红后代。1935～1938年以托洛茨基活动分子的名义被逮捕。释放后，从1938年起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任苏联安全部“K”处上校副处长。1951年又被捕，1953年5月恢复名誉。这里有斯维尔德洛夫的遗孀斯维尔德洛娃给斯大林的信、安·雅·斯维尔德洛夫给马林科夫的信。这些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苏联党内斗争的情况。

(本专题文件由杨存堂编辑和校注，
陈俐佩翻译)

№03275

斯维尔德洛娃关于儿子被捕问题

致斯大林的信

(1952年3月16日)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我是在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逝世33周年的日子里给您写信。在这样的日子里，突然降临到我们家庭的痛苦令人感到特别沉重。

我已经告诉过您（1951年10月8日的信），我的儿子安德烈又一次，现在是第三次，被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逮捕。前两次，在同样的情况下，都是由您亲自出面干预，他才得以保留作为布尔什维克的权利，继续留在先进的共产主义建设者的队伍之中。安德烈从来不曾忘记过这一点。不辜负您的信任，不愧对您的信任，他认为这是他生活的主要任务。安德烈在各个方面，在任何时候都力求做一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热情地为党的事业而奋斗，坚持原则，正直诚实，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道德高尚无瑕。

在安德烈第一次和第二次获释时，您曾经指出，逮捕他并无根据。现在，从儿子第三次被捕至今已经5个月了，而我一直到现在还无法理解这个事实。即使逮捕的原因是安德烈在工作上的严重错误，即使是他在某些方面考虑不周或注意不到，难道就必须采用这样一种如此残酷，如此极端的惩处？难道为了工作中的错误就要把人逮捕起来，而这些人又是真诚忠实（指对于这个词的共产主义的理解）的人，他们无论在行动上还是在思想上从来不曾对自己的党，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民有所隐瞒？

我知道，安德烈多么热爱我们苏联的现实并为之自豪，党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指示对他是多么神圣，他对您个人又是多么崇敬；我对他的共产主义品格也毫不怀疑。因此我一瞬间也不能设想，我的儿子会做出某种反对国家、反对党、违反道义的行为。他的生活清白无瑕、完全彻底地交付给了为伟大的列宁斯大林思想的胜利而斗争的事业。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您曾经告诉我说，我任何时候，只要有需要，都可以寻求您的帮助。我求您看在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的面上再一次关心他儿子的遭遇，并在任何情况下都让我知道他的情况。

斯维尔德洛娃^①

1952年3月16日

^① K.T. 斯维尔德洛娃（1876~1960），斯维尔德洛夫的妻子。

№03276

斯维尔德洛夫关于党籍和工作问题

致马林科夫的信

(1953年8月25日)

亲爱的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①！

我不得不写信给您，给党的领导，请求解决关于我的问题，确定我在生活中的位置，因为我完全无辜地和没有根据地被从队伍中抛弃了，使我陷入一种无法忍受的境遇，而当我意识到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必将不由自主地给我父亲的名字平添上一层阴影，还将玷污我77岁的母亲，1904年的党员的无可指摘的党员荣誉时，这种情况就更加令人心痛了。我曾求助于中央监察委员会，找过沙塔林^②同志和克鲁格洛夫^③，但是，看来我的情况竟如此复杂，以至于只有党的领导才能完全彻底地解决关于我的问题。

我的全部生活是同党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作为雅科夫·

① 马林科夫，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1902～1988），苏联国家的领导人。国内战争时期参加红军，1920年加入共产党。1921～1925年在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学习。1925年进入联共中央机关工作，曾任斯大林秘书。1934～1939年任联共中央组织部长、干部部长。1939年当选中央委员。1939～1946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6～1957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席团委员。在党的十九大做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斯大林去世后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5年2月被降为部长会议副主席。1957年6月被打为“反党集团”成员。

② 沙塔林（1904～1984），1953～1955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55～1956年任苏共滨海边区第一书记，1956～1957年任苏联国家检察部副部长。

③ C.H. 克鲁格洛夫（1907～1977），1939～1941年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主管干部工作的副部长，以后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副部长、部长，从1956年起任苏联电站建设部部长，上将军衔。

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的儿子，我是在布尔什维克中间出生和成长的。这种情况决定了我的所有思想和意愿，决定了我存在的意义本身。我的全部有意识的生活都是在共青团和党的组织内，在积极工作和同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敌人作斗争中度过的。我不怕面对困难和承担责任，在工作、言行和个人生活中力求遵循原则，不愧于党员的崇高称号。我从来不曾利用我父亲的名字谋求私利，或靠父亲的名字为非作歹，力求自己站稳脚跟，用工作，用行动来报答给予我的一切。

尽管如此，现在，当如此需要每一个人，每一个愿意和能够把整个身心，把所有力量贡献出来为党的事业而积极热情地奋斗的人的时候，我却置身党外，不参与工作，实际上丧失了政治和业务上的对我的信任，而我的地位长期未能明确又使一些不了解我的人产生种种议论甚至对我的攻讦。而这一切都不是我应得的。

自1938年起，按照斯大林同志的指示我被派到契卡工作。从普通的侦缉人员，没有任何人的提携和庇荫，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大部门的副主管。除了专职工作以外，还积极承担了党的工作、理论工作和社会工作。不止一次被选入党组织的委员会，自1939年起一直是人民委员部党代表会议的代表，在战争期间担任过联共（布）党莫斯科委员会的报告员。1948年以优异成绩于中央高级函授党校毕业。自1940年起，一直在国家全部高级学校讲课，1950年编写了专业课程的教科书。我曾在全苏一些体育组织和在“狄纳莫”体育协会担任大量社会工作。

但是，1951年10月，我没有任何过错，却被逮捕，经过19个月的侦讯，毫无根据地指控我犯有各种荒诞离奇的罪行。当我的案情客观地查清以后，一切罪名都不存在了，并于今年5月18日被释放和恢复名誉。

获释以后，我当即领到了党证，就前去内务部党委。在那里人

们告诉我说，1952年2月，同其他一些被捕的契卡工作人员一起，党的监察委员会开除了我的党籍。我被告知，应当有一份关于我平反的通知送到中央监察委员会，而关于我恢复党籍的问题不必我参加就会加以讨论的，对于在我之前释放的人似乎都是这样做的。5月19日，这份通知送到中央监察委员会。由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定一直受到耽搁，在内务部党委问不到结果，我就自己去找中央监察委员会，并定期打电话询问，但我的问题一直未予研究。

工作的事也是这样。获释一个月后我一再争取开始工作的可能，6月19日得到任命，7月18日被解除职务。7月22日，应我的请求，沙塔林同志和克鲁格洛夫同志接见了，并听取了我的反映。他们答应尽快查清我的党籍问题，并给我安排一份重要的工作，帮助我，如沙塔林同志所说，在生活中获得一个应得的地位。我曾以为，这次谈话以后关于我的问题已不存在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沙塔林同志直截了当地说，我脚踏实地牢固站在布尔什维克的土地上，并要我对我母亲什么也不说，以免引起她的不安，因为我的党籍问题和工作问题最近期间即可解决。从那时至今又过了一个月。前几天我又去找了沙塔林同志，但从他的回答里我发现他在回避解决我的问题。克鲁格洛夫同志也没向我说出任何明确的回答。

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可是这里涉及的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可以而且本应紧张地担负许多工作，最卓有成效地，对党有最大益处地过完剩下的日子。在党外，在积极的政治工作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我的生活。我曾经一直是，而且也将永远是党的战士，我不能够，也没有权利过别样的生活。那么究竟是什么妨碍着解决关于我的问题呢？是什么剥夺了对于我的信任？

也许是因为我的过去？是的，过去，当我还是一个16岁的孩子时，政治上不成熟，过分自以为是，我在1927年秋天受到托洛

茨基宣传的蛊惑，在中学里曾几次维护托洛茨基分子。我和托洛茨基的地下组织从来没有联系，没有参加过他们的敌对活动，也不知道其存在。当我意识到托洛茨基主义观点的危害性并谴责了他们的观点以后，1929年，我参加了共青团，这样做的惟一目的就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从那时起，我就从来没有同情过托洛茨基分子、左派分子和其他坏蛋的观点。但是，由于个人的缺点，如政治上轻率、喜欢夸夸其谈、不怕对别人评头论足，未能很快得到克服，常常在同龄人中议论和批评党的领导人及其个人品质。结果，1930年竟粗暴地攻讦了斯大林同志。

自1930年起，我在共青团里积极工作，于1932年被接受入党。从那时起，我没有和一个托洛茨基分子或右派分子有过任何联系。

1935年，我因自己过去的错误受到严厉的惩罚。我被逮捕后，是由于斯大林同志的干预才获得释放。有人向斯大林同志呈交了早在1931年写的说明自己当时对右派-托洛茨基坏蛋们的态度的文件。以后在共青团和党内，在工厂和契卡的全部生活和工作中，我都力求用来弥补过去的过错，证明我早已认识和完全改正了自己少年时期的错误。尽管如此，1938年1月又再次逮捕了我，并在监狱里关了11个月，而我仍然并没有任何罪过。直到1938年12月6日，当斯大林同志和党的领导得知我被捕后，我才获释。斯大林同志打电话告诉我母亲说，我没有任何过错，而逮捕我的责任者将受到严厉惩处，并有人帮助我安排下一步工作和进一步成长。

我本想回到工厂，但是按照斯大林同志的指示我被派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党的领导了解了我的情况，把我派到政治斗争最激烈的领域，因而我不再怀疑我的过去是否已全部搞清，认定今后再也不会因过去而破坏我的生活和妨碍我卓有成效地进行工

作。由于意识到自己身负的重任，我把全部力量、全部生命、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投入托付给我的工作，从来不曾追求自己的私利，真诚不二地、奋不顾身地为自己的党为自己的人民服务。难道可诅咒的“过去”竟用任何方式和任何时候也无法加以弥补了，它又一次，不知第几次了，仍要毁掉我的生活？还要做什么，要怎样生活，才能洗刷这个污点呢？如果我所经受的一切还不足以做到这一点，如果还有什么不清楚和值得怀疑的地方——他们可以把喊去询问，我愿意对我自己的每一个步子，每一个行动负责。但是，并不指控我什么，也不问我什么，可我却被从生活中排挤出来了。

也许人们把我看作为“贝利亚^①的人”或“阿巴库莫夫^②的人”？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整个有自觉意识的一生都力求成为党的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父亲的光辉形象矗立在我的面前。在实际工作中我力求遵循党的原则，遵循党的决定和指示，而不是服从于某个人的意愿的和情绪。我从不任人阿谀奉承，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人的亲信仆从。确实如此，我从不接近科布洛夫^③、阿巴库莫夫、贝利亚，从不寻求也不利用某人的庇护和提

① 贝利亚，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1899～1953），格鲁吉亚人，曾在巴库机器制造学院、工艺学院学习。1921年起曾在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保安机关工作。1931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32年任南高加索第一书记。1934年进入联共中央。1938～1945年任内务人民委员。1945年被授与元帅军衔，主持原子弹制造。斯大林去世后，成为党和政府的第二号人物。

② B.C. 阿巴库莫夫，1946～1951年任苏联国家安全部长。1951年6月被开除出党并逮捕，1954年12月被判处死刑。

③ B.3. 科布洛夫（1904～1953），1939～1941年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主管经济管理，1941年任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副部长，1943～1945年任该部第一副部长，1946～1953年是负责苏联国外财产管理机构的副长官，从1950年起同时任苏联驻德国的检察委员会副主席，1953年3～6月任苏联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上将军衔。

掣，谁也没有擢升和接近我。实际上近 10 年来我是完全靠自己本人的。我提升为副处长职务是战争初期的事，是由于我的工作表现，而担任这个职务已经 10 年多了。如今，1953 年，大部分和我一起被捕的契卡工作人员都已获得释放、恢复了党籍，参加了工作（舒布尼亚科夫、乌捷欣、赖赫曼^①、艾廷贡^② 等），在监狱里又关了我 2 个月。被释放了一个月后没有给我安排工作，随后派我去一个与我的知识和经验不相符的部门。关于这一点我直截了当地向分派我工作的克鲁格洛夫同志说过。无论是科布洛夫，还是贝利亚，这段时间，根本没有和我谈过话。这样，有什么根据把我作“某某的人”？

也许不信任是由于我的个别失误或个人的缺点所造成的？这是有的。但是失误和缺点并不能决定我的本质。我始终努力去认识和克服它们。近几年来，我经过了许多痛苦的思索，希望已经摆脱了自己最大缺点。至于我个人的业务素质，那无论在工厂还是在契卡，还是在党的工作和社会工作方面，人们都评价很高。

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这里说的绝不是个人的福利，这个问题对于我从来没有意义。这里说的是回到岗位上去，在生活中占有这样一个位置，无论在契卡还是在别的工作中，使我能够奉献自己的力量、能力、知识，给党、给祖国带来更大的益处。这里说的是我使用的姓，是我亲人的命运。

恳切请求您，党的领导，接见我，听取我的反映，根据我的能

① Л.Ф. 赖赫曼 (1908~?)，1946~1951 年任苏联国家安全部第二管理总局副局长，1951~1953 年接受审查，1953 年 5~6 月任苏联内务部监督检查机关长官，中将军衔。1953 年 8 月被捕，1956 年经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宣判，取消军衔。

② Н.И. 艾廷贡 (1899~1981)，1951 年 10 月前任苏联国家安全部第一局副局长，1951 年 10 月到 1953 年 3 月被捕，1953 年 3~6 月任苏联内务部副部长。

力和价值作出决定，交付给我的一项最困难，最重要的事。事情越困难，我就越能更快地证明，我的一切力量、我的全部生命全都毫不保留地属于党。

安·维·斯维尔德洛夫

1953年8月25日

№03277

科米萨罗夫和博卡列夫关于斯维尔德洛夫的
问题呈苏哈诺夫的报告

(1953年12月31日)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办公室苏哈诺夫同志

安·雅·斯维尔德洛夫同志请求尽快研究他的党籍和工作安排问题。

斯维尔德洛夫同志的党籍问题，经苏共中央所属中央监察委员会研究已恢复其为苏共党员。目前，关于派斯维尔德洛夫同志去苏共中央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班的建议已报请苏共中央书记处研究。

苏共中央行政和财贸机关事务部处长 科米萨罗夫

苏共中央行政和财贸机关事务部副处长 博卡列夫

1953年12月31日

【专题说明】

关于纪念斯大林的建议

(1953年3月至1954年2月)

对斯大林的崇拜曾经确实是一个社会现象。斯大林去世后，成千上万的人从全国各地拥向莫斯科要求瞻仰领袖的遗容。在安葬斯大林的那一天，太多的人拥向红场，一些地方发生了踩死踩伤人的严重场面。装殓斯大林遗体的水晶棺曾安放在列宁墓中列宁遗体的旁边。不久，新的领导人开始制止对斯大林的过分颂扬，特别是苏共二十大批判了对他的个人迷信以后，对斯大林崇拜的信息就很少看到了。这里的两个文件是反映对斯大林崇拜的。联系本卷介绍的有关格鲁吉亚事件的材料，说明这一社会现象并没有完全消失。社会现象总是千姿百态。

(本专题文件由杨存堂编辑和校注，
温耀平、李传勋翻译)

№03230

科罗廖夫建议为斯大林造“玻璃陵墓”

(1953年3月6日)

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治丧政府委员会
尼·谢·赫鲁晓夫同志、拉·莫·卡冈诺维奇同志

为了表达苏联人民和我个人的愿望，长长久久保存对于我们所有人都珍贵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的容貌，我愿意效劳用不冻结玻璃建造斯大林同志的陵墓。

我有进行在零下60度时不冻结玻璃制作方法试验的证书。据我的计算，这种玻璃也能经受零下100度的低温。

建筑陵墓所需的必要数量的玻璃制品，可以由苏联建材工业的若干工厂制成小尺寸的玻璃砌块和大尺寸的双层中空玻璃砖以供使用。

供修建陵墓用的这种玻璃的生产，可以在短期内组织就绪。这种品号的玻璃可以阻止冷热的气温通过。

所在其他技术细节，我可以亲自向委员会报告。

两次斯大林奖获得者、
设计师兼发明家 科罗廖夫

№06182

塔拉索夫就《不脱军大衣》长诗 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4年2月8日)

苏共中央

致苏共中央书记 П.Н. 波斯佩洛夫同志

《十月》杂志编辑部（潘菲奥罗夫同志）给苏共中央寄来了 A. 马尔科夫的长诗《不脱军大衣》，该诗拟发表于该刊第3期（1954年3月），鉴于诗中塑造了约·维·斯大林的形象，该编辑部请求对该诗内容予以审读。

A. 马尔科夫试图在自己的长诗中展示弗·伊·列宁逝世后我们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主要事件。这部长诗没有一定的情节。历史事件在诗中被平铺直叙，写得平淡乏味，词藻过于华丽，缺乏艺术形象的体现（见第7、10、12、13、14、26、40、48页及其他页）。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民在诗中未作描写。只是在该诗的个别地方不连贯和不系统地讲述了这首长诗多情善感的主人公（作者）及其父亲对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参与。约·维·斯大林的形象在诗中占据主要地位，但他是用个人崇拜的精神来展现的，而在艺术方面是粗糙的（见第6、18、24、25、27、28、29、30、31、32页及其他页）。

关于纪念斯大林的建议

建议《十月》杂志编辑部对 A. 马尔科夫的长诗《不脱军大衣》不予发表也许是适宜的。

苏共中央科学和文化部副部长 П. 塔拉索夫
处长 B. 伊万诺夫

【专题说明】

“航空工业部和空军领导人案”的 重新审查

(1953年5~6月)

“航空工业部和空军领导人案件”是战后斯大林及其领导集团所采取的大规模镇压行动之一，其政治目的除了要部分减轻战争中惨重损失的责任外，主要还在使军队干部重新处于斯大林的绝对领导之下。案件的审判的间接结果就是把反法西斯战争中功劳最大的朱可夫元帅从军队的最高领导岗位贬为奥德萨军区司令员。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后，曾多年掌握内务部大权的贝利亚为了拉开同斯大林之间的距离，利用手中的权力，迅速重新审查与平反斯大林最后几年搞的一些案件。“航空工业部和空军领导人案件”的重新审查是贝利亚在这个领域做的最后一件事，不久他自己就被赫鲁晓夫等逮捕了。

这些档案文件揭示了斯大林时期内部镇压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手段。不过，贝利亚和所有其他领导人当时仍然企图掩耳盗铃，把制造这一案件的责任一古脑儿推到已经被斯大林逮捕了的阿巴库莫夫身上，甚至还说是阿巴库莫夫用逼供得来的假材料报送斯大林。实际上这个案件是斯大林战后镇压计划的一部分。

“航空工业部和空军领导人案”的重新审查

涉及“航空工业部和空军领导人案件”的一些领导人蒙受了冤屈，遭受了残暴的折磨，但比较起来，他们还较幸运，保住了性命，比较快地为他们平了反。而朱可夫也很快回到莫斯科，做了国防部副部长。在重新审查这一案件的文件中，特别为当年曾受到牵连的马林科夫进行了洗雪，因为马林科夫当时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这种情况部分地反映了当时苏联国内的复杂斗争形势。

（本专题文件由杨存堂编辑和校注，

王伟文翻译）

№03158

贝利亚关于沙胡林、诺维科夫等人案件 复查结果致马林科夫的报告

(1953年5月26日)

绝密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

格·米·马林科夫同志

苏联内务部获悉：因被指控策划反苏活动而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于1946年判决的阿·伊·沙胡林——原航空工业人民委员、亚·亚·诺维科夫——原苏军空军司令等人案件的侦讯过程中曾有过火行为和歪曲事实的现象。

经复查证实，对沙胡林、诺维科夫等人的指控，是以原反间谍总局（“锄奸部”）局长阿巴库莫夫^①及其所属机关侦讯工作人员假造的材料为根据的。

复查表明，沙胡林、诺维科夫等人是在没有罪证材料，而且甚至违反苏维埃法制基本要求即未经检察长批准的情况下加以逮捕的。

为了获得逮捕的根据，阿巴库莫夫竟凭空捏造材料，硬说沙胡

^① 阿巴库莫夫，维克多·谢苗诺维奇（1894~1954），斯大林时期重要的国家安全干部，曾任反间谍总局局长，1946~1951年任国家安全部长。战后斯大林搞的一些重大案件都是通过他进行的。在反犹运动中（1951年6月），他被逮捕。1954年12月被苏联最高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林、诺维科夫等人似乎蓄意损害苏军空军。

为此目的，通过恶劣的侦讯方法、长期不让睡觉、施加种种威胁，致使被捕者陷于身心极度疲惫状态，以及达到对周围发生的一切都麻木不仁的地步。

利用被捕者处于此种状态之机，侦讯机关强迫他们在由侦讯人员事先炮制的，包括“承认”似乎进行过危害国家的活动的审讯记录上签字。

用这种方法制造出来的沙胡林、诺维科夫等人的口供，然后又被侦讯人员用作基本材料向他们提出指控，说他们策划罪恶的阴谋，并有意识地把有重大瑕疵或有严重的设计及生产缺陷的飞机和发动机装备苏军空军。

在对沙胡林、诺维科夫等人案件侦讯过程中，阿巴库莫夫根据侦讯人员臆造的被捕者的“口供”，向斯大林呈送假的信息，其中歪曲地提供了生产和向空军提供飞机和发动机的情况，并把飞机和发动机生产的缺点认定为沙胡林、诺维科夫和其他因此案被捕人员的罪恶阴谋和有意识危害国家的活动的结果。

在把侦讯材料移交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以前，在阿巴库莫夫的直接参与下，侦讯人员劝诫他们说，只有在法庭上确认自己的“供词”才有可能期望得到较轻的惩处。军事审判厅基于被捕者的虚假供词对案件作出认定有罪的判决。

复查还确认，阿巴库莫夫在走上欺骗政府的犯罪道路以后，还强迫被捕的沙胡林、诺维科夫、希曼诺夫和布德尼科夫在以他们的名义起草的给斯大林的举报信上签字，信中试图诬陷格·米·马林科夫同志。

沙胡林、诺维科夫、希曼诺夫和布德尼科夫解释说，他们之所以在举报信上签字，如同在“供词”上签字一样，只是由于他们已

经被折磨到疲惫不堪而神志消沉颓丧的地步……^①

被捕的原反间谍总局（“锄奸部”）工作人员布罗韦尔曼、利哈乔夫、切尔诺夫……^②也证实了捏造上述诬陷性举报信的事实。

总之，复查证实，对原苏联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阿·伊·沙胡林、原苏军空军司令亚·亚·诺维科夫、原苏军空军总工程师亚·康·列平、原苏军空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尼·谢·希曼诺夫、原苏军空军订货总局局长尼·帕·谢列兹尼奥夫以及原联共（布）中央处长亚·维·布德尼科夫和加·姆·格里戈良的判决是错误的，是以侦讯人员捏造的虚假材料为根据的。

据此，苏联内务部决定将沙胡林、诺维科夫等人的案件呈报苏联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厅重新审议，以便撤销原判决，并终止此案件，对案件有关人员予彻底平反。

苏联内务部对案件材料复审结论附后^③。

拉·贝利亚

1953年5月26日

① 档案复印件此处有几个词字迹不清。

② 档案复印件此处有几个词字迹不清。

③ 即本专题文件№03159。

№03159

苏联内务部对沙胡林、诺维科夫等人 案件进行复查的结论

(1953年5月26日)

莫斯科市，1953年5月26日^①

我们，苏联内务部特别重大案件侦讯处主任侦查员上校谢里科夫、苏联内务部特别重大案件侦讯处处长助理上校费多托夫和苏联内务部特别重大案件侦讯处处长中将弗洛德齐米尔基，根据所得悉的关于侦讯过程中存在歪曲和过火行动的信息，审阅了以下人员第100016号案件的材料：

沙胡林，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1904年生，原苏联航空工业人民委员；

诺维科夫，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1900年生，原苏军空军司令；

列平，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1903年生，原苏军空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希曼诺夫，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1901年生，原苏军空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谢列兹尼奥夫，尼古拉·帕夫洛维奇，1906年生，原苏军空军订货总局局长；

^① 文件上有贝利亚的批示：“批准”。

布德尼科夫，亚历山大·维克多罗维奇，1907年生，原联共（布）党中央干部部部长；

格里戈良，加姆列特·姆克尔特切维奇，1909年生，原联共（布）党中央干部部部长。

以上人员于1946年经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因被指控进行有组织的反苏活动而分别判处监禁：沙胡林7年，列平6年，诺维科夫5年，希曼诺夫4年，谢列兹尼奥夫3年，布德尼科夫和格里戈良各为2年。

现发现：

上述人员之所以被判定有罪，是说他们相互之间进行罪恶性的勾结，生产出有瑕疵的或存在严重设计和生产缺陷的飞机和发动机，并装备给苏军空军，致使空军战斗部队发生大量事故，造成飞行员死亡，而机场上大批飞机积压待修，其中一部分已不能使用而势将报废。

经过复查存档侦讯案卷材料、审讯现已被捕的直接参加此案侦讯的前反间谍总局（“锄奸部”）工作人员及询问沙胡林、诺维科夫及同案被捕人员，查实前反间谍总局（“锄奸部”）对此案的侦讯是不客观的，而利用来指控被捕人员涉嫌反苏活动的材料是由反间谍总局（“锄奸部”）前局长阿巴库莫夫及其所辖机关侦讯人员人为制造的。

从案卷材料可以看出，侦讯一开始就逮捕了沙胡林、列平、希曼诺夫和谢列兹尼奥夫。逮捕是由反间谍总局（“锄奸部”）在侦讯人员并无任何足以证明被捕者有罪的材料的情况下进行的。不仅如此，还违反苏联宪法第127条（规定：不经法院判决或未经检察长批准，任何人不受逮捕），这些人员是在未经检察长批准的情况下加以逮捕的。直到逮捕后的第17天，才作出相应的决定，并取得检察长的逮捕批准令。

然后，根据侦讯人员制造的沙胡林、列平、希曼诺夫和谢列兹尼奥夫的供词，又逮捕了诺维科夫、布德尼科夫和格里戈良。

诺维科夫写给苏联内务部部长的申诉充分说明，实行逮捕和开始对案件的侦讯是在违反法制的情况下进行的。申诉中说道：

“……我于1946年4月23日夜突然被捕。尽管我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拥有不可侵犯权，可是当我从家里出来，在街上被人从后面把我捉住，粗暴地推入汽车，什么也没有说，也没有向我出示逮捕证，把我送到一间屋子里，撕掉我的肩章，脱光衣服，给了我一条破裤子和衬衣。”

在所有被捕者第一次被审讯时，就要求他们承认参与蓄意损害苏军空军的罪恶阴谋。

由于被捕者无法证实和绝对否认这个毫无根据的指控，侦讯人员不是客观地进行分析，而是采用了苏联法律严加禁止的恶劣手段。

复查证实，在侦讯过程中被捕者的身体被折磨得疲惫不堪，长时间不让睡觉，并受到各种各样的威胁，最后他们陷入精疲力竭，神志恍惚，对周围一切麻木不仁的状态。

利用被告的这种状态，侦讯人员强迫他们在由侦讯人员预先拟好的“审讯”记录上签了字，并要被捕者据此毁谤自己和诬陷别的无辜的人。

列平在写给苏联内务部部长的申诉中叙述了侦讯人员蓄意制造指控材料而使用的罪恶方法，其中说道：

“……当我被捕时，并没有向我提出任何指控，而是要求我自己讲述反革命罪行。从被捕第一天起，就一直不让我睡觉。从白天到黑夜我都在被审问，当我早晨6点回到牢房时，各个牢房都正好起床，到晚上5~6点钟吃午饭。这样过了2~3天后，我站着，坐着都会睡着，但立刻又搞醒我。由于缺乏睡眠，我几天之后已经处

于一种只要我的苦难能够结束，对什么样的供词我都愿意承认的地步。对我进行审问的主要是中校侦查员库列绍夫。我向他真心实意地讲述了自己的工作，说我没有犯下任何反革命罪行，对政府没有隐瞒过任何事情，至于航空技术器材中存在的缺点，在呈送给斯大林和马林科夫的报告中已做过说明，但不知由于什么样的一种我至今也不清楚的原因，库列绍夫要我提出口供，承认我们——沙胡林、诺维科夫、希曼诺夫、谢列兹尼奥夫、格里戈良、布德尼科夫和我——罪恶地勾结在一起，阴谋达到以不能用的、没有战斗力的航空技术器材破坏空军战斗力的目的，并且妄图向政府隐瞒真实情况……”

关于这个问题，沙胡林指出：“我被指责为有罪，而我也承认有罪，承认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生产出存在重大生产缺陷的产品，我同空军领导人勾结在一起，把这样的产品装备给空军，致使不断发生事故、灾祸，造成飞行员死亡……”

在审讯中，我毁谤自己和其他因此案被捕的空军工作人员犯有我和他们都没有犯下的罪行……

我刚一被捕，侦查人员利哈乔夫和格拉西莫夫就开始审问我。审问几乎日夜不停地进行，间隙很短，使我根本没有睡觉的时间……我畏葸无主，在侦查人员利哈乔夫和格拉西莫夫当我不在时拟就的两份审讯记录上签了字……我在审讯时承认的工作上的不足和疏忽被夸大成我蓄意犯下的罪恶行为，是在同被捕的空军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做的。”

关于侦查人员捏造审讯记录，把自己的结论以被捕者供词的形式写进去的做法，沙胡林说：

“……在我的‘供词’中说，似乎我知道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的工厂生产明显不能用的产品而不采取措施消灭废品，而长期交付给军队，从而降低了空军的战斗力，似乎我为了这个目的同空军，

具体的是同诺维科夫、列平等人罪恶地勾结在一起……

人所共知，每一个飞机工厂都有军代表，由他们监督技术检查科的工作，并检查接收产品的质量，而且每一架飞机都要在空中试飞。因此，要犯下在侦讯中指责我的罪行，我必须至少要同各个工厂的数百名军事代表和工程技术人员罪恶地勾结在一起。但这显然是十分荒唐可笑的。然而，侦查人员并不愿意考虑我这一类反对意见，而是歪曲我的供词。”

业经查实，侦讯此案时还存在其他粗暴违反苏维埃法律的做法。例如，侦查人员并不重视，也不在审讯记录中记录被捕者有助于对所调查事实作出正确判断的供词。

例如，在案卷材料中根本没有反映出沙胡林、诺维科夫等人所作的解释，其中说明：具有高度飞行战术性能的飞机的制造和装备给空军是在战争时期的复杂条件下进行的，当时航空工业的工厂不得不在制造飞机时使用各种各样的代用品来代替高质量的材料。

在侦讯案卷中也没有反映出这样的情况，即当空军部队发现飞机和发动机的个别缺陷时，无论是空军领导还是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都曾采取措施加以克服。

在将侦讯案卷移交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审核以前，阿巴库莫夫、原反间谍总局（“锄奸部”）侦讯处处长列昂诺夫、侦查员科马罗夫、库列绍夫和其他人找来被捕者，警告这些被告们说，他们必须在法庭上确认他们在侦讯过程中签过字的“供词”，并且威吓他们说，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期望得到法庭对他们的宽大处理。

在列平写给苏联内务部部长的申诉书中说道：

“……在开庭以前，阿巴库莫夫、列昂诺夫和库列绍夫把我喊去，对我说，我会得到一个小小的惩罚，以致会对惩罚之轻感到吃惊，按这一条款应当判6个月、一年或一年半。他们建议我在法庭上确认一切。库列绍夫还两次劝告我说，在让我最后陈述时我应强

调说自己的行动给国家造成损失，等等，否则侦讯要从新进行……”

就这一同一个问题，希曼诺夫在申诉书中说道：

“我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有罪，但是请考虑，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出于自私的目的。在这方面侦查员科马罗夫的指示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在开庭前警告我在法庭上应当怎样做：‘确认自己的供词，并且信赖法庭的意志，那样要判得轻一些’。此外，在法庭上出席的有侦讯处处长列昂诺夫，似乎还有阿巴库莫夫，他们不止一次审讯过我，这也对我的心理状况产生了影响。”

经过对被捕的曾经参与捏造沙胡林、诺维科夫等人案件侦讯材料的原反间谍总局（“锄奸部”）工作人员布罗韦尔曼、利哈乔夫、列昂诺夫和科马罗夫的审讯查明，阿巴库莫夫利用在他领导下捏造的侦讯材料向斯大林提供了假情况，其中即歪曲了案件侦讯结果，也歪曲了制造和向空军装备新型飞机和发动机的真实情况。

据上述原反间谍总局（“锄奸部”）工作人员供认，关于审讯被捕人员情况上的汇报每天都呈送给斯大林，而且是由与审讯事项并无任何关系的反间谍总局（“锄奸部”）秘书处副处长布罗韦尔曼编写。布罗韦尔曼完全不了解被捕者的真实口供，而只是看一下侦查人员的手稿和材料，然后根据阿巴库莫夫的要求表述出被告们的供词，把他们为自己辩护的说明完全删去，编写成送呈斯大林的汇报材料。

阿巴库莫夫则强迫被捕的沙胡林、诺维科夫、希曼诺夫和布德尼科夫在以他们的名义拟写的明显虚假的（其中试图玷污一名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声）给斯大林的举报信上签字。

关于这一点，诺维科夫写道：

“……我知道，会产生一个完全有理由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签了字，而且重新手抄了一份这种明显虚假的诬蔑性的文件。

我应当说，甚至侦讯期间我所处的不堪忍受的环境也不能为此进行辩解。我的行为只能用我极其严重的精神状况、消沉、麻木、畏葸怯懦来解释，在这种心情的影响下，我竟允许自己被别人用作攻击诬蔑的工具……”

就这个问题，沙胡林声称：

“在我处于无法清醒而有分析地判断以我的名义拟写的文件时，我于早晨6时在它上面签了字，这是在几个昼夜无法睡觉的情况下按照阿巴库莫夫的要求签字的。然后阿巴库莫夫又要我将这份材料的打印文本手抄一份，我也照办了，但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直接参与捏造上述申诉书的原苏联内务部秘书处副处长布罗韦尔曼被捕后就捏造上述希曼诺夫的申诉书的过程供认说：

“……按照阿巴库莫夫的委托，我和秘书处处长切尔诺夫以及阿巴库莫夫的秘书科马罗夫一起捏造了被捕的希曼诺夫的举报信……”

我们完成了阿巴库莫夫的委托，而他看了我们以希曼诺夫的名义拟写的举报信，又对它进行了“强化”，然后交付打印后转交给科马罗夫。科马罗夫强迫希曼诺夫将我们捏造的举报信的打印本手抄了一份，这样就形成了与打印文本完全准确一致的希曼诺夫的举报信的原件。”

被捕的原反间谍总局（“锄奸部”）工作人员利哈乔夫和切尔诺夫也证实了伪造沙胡林、诺维科夫、希曼诺夫和布德尼科夫的举报信的事实。

由此可以确认，因此案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沙胡林、诺维科夫等人，受到了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的不正确的判决，其根据是侦察机关捏造的材料。

同时也查实，某些被捕者被监禁的时间已超过了法庭规定的期

限：布德尼科夫和格里戈良 2 年零 7 个月；谢列兹尼奥夫 2 年零 2 个月；希曼诺夫 1 年零 10 个月；诺维科夫 10 个月。

考虑到上述情况，以及遵照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第 373 条第 1 款的规定，建议：

指控以下人员的侦讯案件：

沙胡林，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
诺维科夫，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
列平，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
希曼诺夫，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
谢列兹尼奥夫，尼古拉·帕夫洛维奇，
布德尼科夫，亚历山大·维克多罗维奇，
格里戈良，加姆列特·姆克尔特切维奇

经过苏军总军事检察院提请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重新审查，并建议撤销原先的判决和撤销案件，对上述人员予以彻底平反。

苏联内务部特别重大案件侦讯处主任侦查员上校 谢里科夫

苏联内务部特别重大案件侦讯处处长助理上校 费多托夫

苏联内务部特别重大案件侦讯处处长中将

弗洛德齐米尔斯基

同意

苏联内务部副部长上将 科布洛夫

№03160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
关于沙胡林、诺维科夫等人案件的裁决
(1953年5月29日)

抄件

绝密

第 СП0016 / 46 号

苏联最高法院裁决书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组成人员：

主席——军法中将切普佐夫

成员——军法少将穆塔列维奇

军法少将扎里亚诺夫

经于 1953 年 5 月 29 日开庭审理由苏联内务部对 1946 年 5 月 10~11 日军事审判厅对以下人员案件判决的复查材料，当时判决如下：

沙胡林，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根据俄联邦刑法典第 193/17 条“a”款和 128 条 - a，判决监禁 7 年，

列平，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根据俄联邦刑法典第 193/17 条“a”款，判决监禁 6 年，

诺维科夫，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根据俄联邦刑法典第

193/17条“a”款，判决监禁5年，

希曼诺夫，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根据俄联邦刑法典第193/17条“a”款，判决监禁4年，

谢列兹尼奥夫，尼古拉·帕夫洛维奇，根据俄联邦刑法典第193/17条“a”款，判决监禁3年，

布德尼科夫，亚历山大·维克多罗维奇及格里戈良，加姆列特·姆克尔特切维奇，根据俄联邦刑法典第17/128条“a”款及第17/139/17条“a”款，分别各判决监禁2年。

对于被判决人员沙胡林、列平、希曼诺夫、诺维科夫及谢列兹尼奥夫并申请取消其军衔及政府奖赏，对沙胡林还取消其“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对诺维科夫取消其两次“苏联英雄”称号，对被判决的人员布德尼科夫和格里戈良并申请取消其政府奖赏。

此外，军事审判厅还于1949年9月13日，根据苏联副总检察长的起诉将此案预审过程中查封的被判人沙胡林、诺维科夫、希曼诺夫、列平、谢列兹尼奥夫、布德尼科夫和格里戈良的财产总计520031卢布作为补偿他们对国家造成的损失转给苏联武装力量部。

并听取了副总军事检察长司法少将基塔耶夫的结论。

认定：

沙胡林、诺维科夫、希曼诺夫、列平、谢列兹尼奥夫、布德尼科夫及格里戈良被军事审判厅判决有罪，是因为他们于1942年至1946年期间相互进行罪恶性的勾结，生产出有瑕疵的或存在严重设计和生产缺陷的飞机和航空发动机并装备给苏军空军，结果导致空军作战部队中发生大量各种事故，造成飞行员死亡，而在机场上大批飞机积压待修，其中一部分不能使用而势必报废。

现经由苏联内务部补充核查证实，对此案所有被判刑人员的指控材料均系原反间谍总局（“锄奸部”）工作人员（现已被捕）对被告们采用非法侦讯手段捏造而成。

“航空工业部和空军领导人案”的重新审查

同时查明，被告沙胡林、诺维科夫、列平、希曼诺夫、谢列兹尼奥夫、布德尼科夫及格里戈良在上述反间谍总局（“锄奸部”）工作人员的逼迫下在军事审判厅开庭前在法庭上提供了虚假的似乎他们犯下罪行的供词。根据以上所述，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遵照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 373 条和第 4 条第 5 款，

裁定：

完全撤销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于 1946 年 5 月 10~11 日对沙胡林，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诺维科夫，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列平，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希曼诺夫，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谢列兹尼奥夫，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布德尼科夫，亚历山大·维克多罗维奇及格里戈良，加姆列特·姆克尔特切维奇的判决，并因无罪终止这个刑事案件。

同时撤销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 1949 年 9 月 13 日关于向沙胡林、希曼诺夫、诺维科夫、列平、谢列兹尼奥夫、布德尼科夫及格里戈良因连带责任而追缴给苏联武装力量部的罚金 520031 卢布的决定。

有相应签字的原件。

与原件一致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法庭书记员上尉 阿法纳西耶夫

№03161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对沙胡林等人 案件侦讯材料复查结果的决议

(1953年6月12日)

绝密

送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伏罗希洛夫同志、赫鲁晓夫同志、布尔加宁同志、什基里亚托夫同志、波马兹涅夫同志、克鲁格洛夫同志、鲁坚科同志

第 П9 / VI 号

1953年6月12日

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 (第9号) 摘抄

关于对阿·伊·沙胡林、亚·亚·诺维科夫、 亚·康·列平等人案件侦讯材料复查结果

(1953年6月12日)

1946年4月，现已逮捕的原反间谍总局（“锄奸部”）局长阿巴库莫夫及他所属该局侦查工作人员利哈乔夫和科马罗夫捏造材料诬陷原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阿·伊·沙胡林，原苏军空军司令亚·亚·诺维科夫、原空军总工程师亚·康·列平、原空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尼·谢·希曼诺夫、原空军订货总局局长尼·帕·谢列兹尼奥夫、原联共（布）中央干部部飞机制造处处长亚·维·布德尼科夫和发动机制造

处处长加·姆·格里戈良，说他们似乎把有严重瑕疵或存在重大设计和生产缺陷的飞机和发动机装备给苏军空军而蓄意进行破坏。

阿巴库莫夫根据伪造的材料，向斯大林报送虚假的信息，其中歪曲地介绍了生产和向苏军空军装备飞机和发动机的真实情况，诬陷上述人员，说似乎由于他们的罪恶阴谋在苏军空军部队中发生大量各种事故。

根据此类虚假材料逮捕沙胡林、诺维科夫、列平、希曼诺夫、谢列兹尼奥夫、布德尼科夫及格里戈良之后，阿巴库莫夫又会同利哈乔夫和科马罗夫对被捕者采用卑劣手段强迫他们在由侦讯人员自己拟就的包含他们承认进行了敌对活动的“审讯记录”上签了字。

在此案侦讯过程中，阿巴库莫夫为了证实他本人臆想的对上述人员的指控，向斯大林报送了虚假的信息，把新型飞机和发动机批量生产组织工作中的个别缺点描绘成是本案被捕人员进行有意识的危害国家活动的结果。

复查还证实，阿巴库莫夫还和利哈乔夫及科马罗夫一起走上欺骗党和政府的罪恶性道路，把被捕的沙胡林、诺维科夫和希曼诺夫折磨到身体和精神都疲惫不堪的消沉颓丧地步，然后利用这种情况强迫他们在由侦讯人员自己拟就的给斯大林的举报信上签字，其中对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管航空工业的格·马·马林科夫同志进行诬陷，说他似乎知道飞机和发动机生产中的缺点而不向联共（布）中央通报。

但是，众所周知，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苏联航空工业保证了我国空军拥有必要数量的具有极高飞行技术性能的作战飞机，从而使苏军的空军获得了对于希特勒德军航空兵的全面优势。

根据阿巴库莫夫捏造的假材料，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于1946年判处沙胡林、诺维科夫、列平、希曼诺夫、谢列兹尼奥夫、布德尼科夫和格里戈良不同期限的监禁。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今年5月29日开庭审议了苏联内务部就沙胡林、诺维科夫、列平、希曼诺夫、谢列兹尼奥夫、布德尼科夫及格里戈良的案件进行复查的结论和材料，确认苏联内务部的结论，通过决议：全部撤销对此案有关人员的判决，并因缺乏犯罪要素终止此刑事案件。

据此，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

1. 恢复阿·伊·沙胡林、亚·亚·诺维科夫、亚·康·列平、尼·谢·希曼诺夫、尼·帕·谢列兹尼奥夫、亚·维·布德尼科夫和加·姆·格里戈良等同志的党籍。

2. 撤销中央政治局1946年5月18日的决定（第П52/47号、第П52/48号和第П52/49号）并恢复：

（1）阿·伊·沙胡林同志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和亚·亚·诺维科夫同志的两次“苏联英雄”称号。

（2）阿·伊·沙胡林、亚·亚·诺维科夫、亚·康·列平、尼·谢·希曼诺夫和尼·帕·谢列兹尼奥夫原先的军衔。恢复本决议第一条所列人员在被捕时被剥夺的政府奖励。

3. 确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46年5月4日的第П51/V号决定和联共（布）中央全会1946年5月6日的第Пл9/1号决定（其中认定马林科夫同志“作为主管航空工业和（在接收飞机方面）主管空军的负责人在道义上应对在这些部门揭露出的胡作非为情况承担责任（生产和接受质量不好的飞机，他知道此类胡作非为而不向联共（布）中央通报）”）是根据阿巴库莫夫捏造的材料而作出的。

据此，上述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联共（布）中央全会的错误决定予以撤销。

苏共中央主席团

【专题说明】

七月全会与贝利亚倒台

(1953年7月)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还在斯大林弥留之际，斯大林的亲信和战友们就改组了党和政府的领导班子。马林科夫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被任命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贝利亚兼任内务部长、莫洛托夫兼任外交部长、布尔加宁兼任武装部队部长。伏罗希洛夫担任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由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组成苏共中央新的主席团。赫鲁晓夫没有在政府中担任职务，让他集中精力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还在斯大林晚年，苏联社会已出现了改革的历史趋势，不改革已无法前进。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在追悼斯大林会上的演说中提出了迅速提高人民福利和开展和平外交的新方针。紧接着新的领导集团就发布了大赦令，采取了降低物价和为一些重大案件平反等重要措施。不过，所有这些变革却是在领导集团内部激烈的斗争中进行的。

6月底便发生了领导集团逮捕党和政府第二号人物贝利亚的惊人事件。贝利亚被捕后，苏共中央在7月初发表了一个谴责贝利亚充

当帝国主义代理人、企图把内务部置于党和国家之上等罪名的政治决议。至于贝利亚的具体罪行、领导集团究竟是怎样把贝利亚这样一个握有重大权力的人物置于死地的？一直含糊不清。外间流传过不少惊险离奇的说法。

这里我们从苏共中央 1953 年七月全会速记记录中选编了马林科夫向中央委员作的《关于贝利亚反党叛国的罪行》的报告、赫鲁晓夫的发言，以及苏共中央关于贝利亚问题的决议。不论是马林科夫的报告还是赫鲁晓夫的发言都是贝利亚被捕以后代表“胜利者”一方所做的指控，而且全是苏联传统的政治报告的风格，所列事实简约不清，也看不到失败者的辩护。不过，仔细读来还是可以体会到问题的脉络。斯大林之后贝利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首先企图从政治方面进行改变。而领导集团中的多数则对他采取了突然的、非正常的手段，赫鲁晓夫在其中起了特殊的作用。

为了便于了解研究贝利亚倒台的事件，我们附录了俄国历史学博士斯塔尔科夫利用大量档案材料写的文章《“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

（本专题文件由杨存堂编辑和校注，
曹介民、乌传袞、姜西平、刘力翻译）

№11748

马林科夫在七月全会上 关于贝利亚问题的报告（摘录）

（1953年7月2日）

《关于贝利亚反党叛国的罪行》的报告

同志们！斯大林同志逝世已经4个月了。

……

在过去的三、四个月，党和政府无论在对外政策还是在国内生活方面都做了积极的工作，把全党和人民团结在建设共产主义和巩固祖国的经济和国防实力的任务上，在勇敢地 and 创造性地开展维护和巩固和平斗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

但是，同志们，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应向中央全会报告，在斯大林同志逝世不久，我们主席团确认，贝利亚极不老实，以后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为了罪恶的目的，他开始利用我们渴望领导集体的团结统一和友好工作的愿望。

首先，贝利亚灵活和巧妙地利用自己在内务部的地位，沿着犯罪的方向大肆活动，以便把内务部置于党和政府之上。

中央主席团掌握了这方面的许多事实。

几天以前，利沃夫州内务部领导人斯特罗卡奇同志向苏共中央报告了以下的问题。

“今年4月乌克兰内务部长梅什克给我，内务部利沃夫州主任下达了一个指示，让我搜集并向乌克兰内务部报告党组织领导干部的民族成分，从集体农庄、企业的党组织到党的州委会成员。同时，梅什克提出让我报告集体农庄、企业、学校中党的机关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工作中的缺点。

我认为这个指示是不对的，因为内务部机关不应当也无权检查党的机关的工作，我使用‘高频’给梅什克本人打电话核对，问他是否作过这样的指示。梅什克确认这是他的指示，并要求尽快执行。我想，也许是梅什克弄错或者由于没有经验而作了这样的指示。我试图说服他，通过内务部机关搜集党的机关工作的情报是不允许的。梅什克责怪我而出言不逊，愤愤地说：‘一般说来，不能把我们契卡的机密任务委托给你，你现在就到州委会去把这些任务报告给州委书记，但你要知道，这是贝利亚给的任务，不容拖延，务必今天完成’。我没有向梅什克核对，这是否是贝利亚布置的任务，因为我认为，贝利亚同志，作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任何时候都可以在苏共中央或乌共中央得到这种资料。

根据党员义务，我向州委书记谢尔久克同志报告了我从梅什克同志处得到的这个显然是错误的指示。

就在当天晚上，贝利亚同志往利沃夫给我打电话，一字一句地说：‘您在那里干什么，您什么也不明白，您干嘛到州委会去，把您得到的任务告诉谢尔久克。您不是去帮忙，而是给梅什克同志使绊子。我们要把你从机关赶出去，逮捕法办，在集中营里折磨致死，我们要把你化为齑粉，变为集中营的灰土’。后来贝利亚同志极其愤怒，数次重复说：‘你明不明白这一点，放明白点，放明白点。你要注意这一点。’我试图对这个问题做些解释，贝利亚同志不愿听，便放下听筒。

今年6月12日苏联内务部撤消了我乌克兰内务部长的职位，

把我召到莫斯科。我请求把我留在乌克兰工作，但遭到断然拒绝。

梅什克同志知道我和贝利亚同志的谈话情况，便两次提醒我说：‘喂，你怎样遭受贝利亚同志责骂？以后要放聪明点’。接着梅什克同志以挖苦的口气一字不差地说：‘中央书记梅尔尼科夫^①同志是个很坏的肃反人员，他马上把你当作中央委员会的间谍出卖了，打电话给我，直截了当地说，斯特罗卡奇向州委书记谢尔久克报告说，我，梅什克，在搜集党的机关的情报。难道可以搞自己人的间谍活动。’

指出乌克兰内务部副部长米里施坦同志的这种谈话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例如，今年3月他对我和乌克兰内务部前副部长伊瓦舒京说过，现在一切都要按新的办法，党的机关将不会像从前一样，干预肃反机关的工作。乌克兰各州内务部领导人应当独立于州党委书记。

A.3. 科布洛夫中将^②（副部长 B.3. 科布洛夫^③ 同志的兄弟）也告诉我：‘您没有考虑到贝利亚同志已走上苏联内务部的领导岗位，现在内务部机关已不像过去那样仰仗党的机关。您想像不来贝利亚同志拥有多么大的权力。他坚决打烂一切旧的制度，不仅仅在我们国内，而且在一些民主国家’。”

现在已经知道，贝利亚给其他一些共和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白俄罗斯等——也布置了这样的任务。

……

难道还不明显，贝利亚进行反对中央的活动。

① 梅尔尼科夫，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

② A.3. 科布洛夫，1951~1953年劳动集中营管理局副局长，4~6月任内部监督检查局副局长。

③ B.3. 科布洛夫，苏共中央后补委员，1953年6月被捕，七月全会上被开除出党，12月同贝利亚一起被枪决。

我应当把贝利亚利用中央主席团的警卫队来监视主席团委员的罪行活动报告给中央全会。

现在我们知道，主席团委员的每次活动，主席团委员的会见，贝利亚都能通过警卫队立即了解到。

大家也知道，和中央主席团委员的电话谈话都受到窃听，并报告贝利亚。我们有这方面的证明材料。

贝利亚的这些活动对党充满了敌意，这一点无需证明。显然，贝利亚企图把内务部凌驾于党之上，企图把党中央和政府置于内务部的监督之下，简直令人不能容忍。

……

这就是中央委员会应当了解的事实。

上一周，我们决定在中央主席团里研究贝利亚案件的前夕，他来找我，建议通过内务部采取步骤和南斯拉夫的关系正常化。我对他说，这个问题应在中央委员会讨论。这算个什么建议呢？贝利亚手中有下面这样一个文件。

“我借机向您，兰科维奇^①同志，转致贝利亚同志的衷心问候。他牢记着您。

贝利亚同志委托我以绝密的方式告知您本人，他和他的同志们赞成必须彻底重新考虑和改善两国关系。

因此贝利亚同志请您亲自将此事报告铁托同志，如果您和铁托同志赞同这个观点，那么安排一次权威人士的秘密会见以商讨此事是很恰当的。会见可以在莫斯科举行，但假若因某种原因您不能接受，那就放在贝尔格莱德。

贝利亚同志对这次除您和铁托之外无人知晓的会谈充满信心。”

贝利亚尚未来得及采取这一措施，因为我们使涉及他本人的事

^① 兰科维奇，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件朝另一个方向发展。

还有另外一个事实。政府里正在讨论德国问题。谈到民主德国地位极不顺利的情况。我们大家都得出一个结论，由于民主德国政策的失误而犯了许多错误，德国居民的不满情绪很大，这一点特别清楚地反映在东德居民开始逃往西德。最近一个时期，大约两年内，逃往西德的约有 50 万人。

我们向我们的德国朋友作了解释，他们对这一点也很同意，在当前国际条件下在民主德国实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是行不通的。

为什么我们会得出这种结论，认为目前不应当在民主德国实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对民主德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这个事实十分清楚地表明，我们有内部发生灾难的危险。我们应当清醒地面对现实，并承认，如果没有苏联军队的存在，民主德国的现存制度是不牢靠的。民主德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目前是很不如意的。

我们认为最迫切的任务是要我们的德国朋友立即采取坚决措施以改善民主德国的政治经济环境。民主德国发生的事件证明，这些措施是正确的。我们采取这些措施，正如你们所知，迟了一步，这一点被敌人利用了。

.....

应当指出，贝利亚在讨论德国问题时曾提出不应纠正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在民主德国放弃一切社会主义的方针并保持一个资产阶级德国的方针。从我们现在对贝利亚所了解的一切来看，我们应当重新评定他的这一观点。显然，这个事实可以把他定性为资产阶级蜕化变质分子。

其次，同志们，是与大赦问题有关的事实。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大赦这个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但揭穿了贝利亚的真正嘴脸

以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他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对待这个措施，对此他有自己的打算。事实证明，他匆匆忙忙采取这个措施是有害的。比方说，根本就不应当释放惯偷。贝利亚事件以后，我们曾对此事作过纠正，今后还要纠正。但是贝利亚围绕大赦问题的所作所为，毫无疑问是值得怀疑的。我们也应当在这方面吸取教训。

再次，同志们，大家知道，贝利亚主管从事原子能问题研究的专门委员会。我们应向全会报告，在专门委员会工作的一些重大问题上他不理党中央和政府，在那里独立行动。比方说，他不通报党中央和政府做出爆炸原子弹的决定。应当看到这个事件的意义。当专门委员会的领导人（万尼科夫同志和扎韦尼亚金同志^①）把提交政府的决议草案交给贝利亚时，他把文件划掉了，背着党中央和政府，一个人作了决定。

我应当报告中央全会，还在斯大林同志生前，有时就可以看到，贝利亚如何巧妙而又狡猾地散布对许多领导同志的不满情绪。

有鉴于此，应当遗憾地承认，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钻进内务部机关的敌人不止一次地企图削弱党的领导，诬告一些正直的、无限忠于党的人，党的著名活动家，编造一些诽谤性的“材料”。

我应当说，而且也是我们的一致意见，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之后的中央全会上，约·维·斯大林的讲话中，由于受内务部敌对分子诽谤的影响，对维·米·莫洛托夫同志作了不正确的评定，党和国家几十年来都认为他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极其著名的活动家。

就在那次全会上指控米高扬同志对党不老实，我们认为这种批

^① 万尼科夫和扎韦尼亚金分别为苏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945~1953年分别担任苏联政府第一管理局局长和副局长。1953年以后即为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和副部长。

评也是错误的。

斯大林同志逝世后，贝利亚便肆无忌惮，说句不客气的话，竭尽全力开展旨在疏远领导集体，压制工作中集体性原则的“活动”，其所作所为就是使领导同志在工作中互相看对方眼色行事，我们有这方面的许多事实。

……

我不打算详谈贝利亚的道德面貌，虽然这还是应当谈一谈的。全会同志应当知道，我们有贝利亚腐败的犯罪材料。

大家会问，中央主席团为什么过去对贝利亚没有采取措施，对他姑息放纵，处处让步，采纳他不正确的意见，容忍把他的某些便函，比如关于乌克兰、关于立陶宛的便函跟党中央的决议一样下发这种错误行径？

关于这一点应谈谈下面的事。

斯大林同志逝世已有三、四个月了。大家本应识破和看清贝利亚所有丑态，本应看出他是我们党中央团结的破坏者，本应团结起来，齐心协力，我要强调的是完全彻底地齐心协力，解决贝利亚问题。

当我们在中央主席团里，大家都确信，我们在跟什么人打交道后，便召开了一个有贝利亚参加的中央主席团会议，并向他出示了我们的指控。他表现得极不老实。事实他无法否认，但他开始胆战心惊地卑劣地毁灭罪证，说他要改正错误。

考虑到我们是在跟一个冒险家打交道，他手中有很大潜力，中央主席团一致认为立即采取行动是必要的，以便一举消灭毒化团结一致、坚如磐石的列宁—斯大林集体健康空气的祸害和败类。

主席团决定撤消贝利亚盘据的一切职位，把他开除出党。^①

主席团得出结论，同这种冒险家的斗争不可半途而废，决定逮捕贝利亚这个党和人民的敌人。

揭露和驱逐贝利亚这类蜕化变质分子以后，我们的党将更加团结和坚强。

中央主席团采取这些断然措施是遵循一个坚定的信念，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这些措施是惟一正确的。中央主席团还遵循一个坚定的看法，就是无论列宁，还是斯大林都会这样做的。

我们相信，我们的行动会得到中央全会的一致支持。至于说我们在斯大林同志逝世后这三、四个月来在揭发贝利亚时期所犯的某些错误和不正确的地方，我们会齐心协力加以改进。

我说——好在我们只用了3个月时间就看清了这个冒险家的真面目，不管他的地位多么显赫，权力多么重要，我们齐心协力一举把这个恶棍，我们健康机体上的病瘤铲除掉了。

同志们！如果我们把整个事件只归结为贝利亚的个人问题，这
对吗？

当然不对！

我们应当了解这一切怎样发生，并做出应有的结论，让党吸取教训。这是一些什么结论和教训呢？

1. 第一个结论和教训涉及到巩固我们党的领导作用，提高我们党对各级国家机关工作的领导。

党的敌人混入领导岗位，在工作中乔妆打扮，给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带来损害，腐蚀它们削弱它们的领导活动。这一切都不是偶然

① 1953年6月26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会议上逮捕了贝利亚。没有看到这次会议的记录。在6月29日的主席团会议上通过了《组织侦查贝利亚反党反国家的罪行活动事实》的决议。

的。

同志们，我们在遵守伟大的列宁制定的领导准则和布尔什维克原则方面一切都令人满意吗？不，不是一切。不仅如此，我们多年来积累了许多不正常现象。举例说吧，我们的中央全会多年没有召开。作为两次全会之间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政治局不再正常发挥职能。我还不说第十九次党的代表大会是在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之后经过 13 年才召开的。

在中央委员会及其领导机关的工作制度中这种不正常情况下，何谈领导的集体性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保证党的领导作用和正确实施党的领导。

.....

贝利亚在党的最高领导层工作了 15 年，在贝利亚案件中我们大家，既有年长的（从斯大林同志开始），又有年轻的，都应当表现出更大的警惕性，不允许这个冒险家大胆妄为，以至直接威胁到我们党领导的团结，难道这不是事实。

应当坚决消除任何人的工作不受监督的现象。任何一个中央委员，不管他职位多高，都应当处于相应的党组织的监督之下。任何一个领导人的活动都应当在党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

.....

2. 另一个结论和教训涉及在党和内务部关系中粗暴地破坏党的准则。多少年来内务部获得了过大的影响力，实际上已脱离了党的监督，这难道不是事实。事实上多少年来党对内务部机关失去了有效的监督。

党刻不容缓的任务就是使党的敌人利用内务部机关的企图不能实现。为此必须使内务部在实际上服从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

.....

3. 接着应当谈谈千方百计提高我们队伍的革命警惕性的任务。

我们常常在口头上承认，实际上却忘记，由于共产党是国内唯一的政党，由于它是执政党，因此敌人便乔装改扮，曾经试图并继续试图钻入我们党内。

.....

4. 从我们审查的案件中得出如下一个结论和教训就是我们必须大力和全面地加强党的思想工作。

.....

5. 最后，还应得出极其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应当严格遵守我们领导的最高原则——集体性，团结一致和坚如磐石。

.....

No 11749

赫鲁晓夫在七月全会上 关于贝利亚问题的发言（摘录）

（1953年7月2日）

.....

我们对贝利亚已有多年的了解。我认识他已有20年左右，是在中央全会开会时认识的。工作中有过直接的接触。我想谈谈自己的意见，我对这个人的看法。还在我们对贝利亚行为取得确定的意见之前，在采取行动之前，还在斯大林同志在世时，我们已看到贝利亚是个大阴谋家，是个奸诈之徒，一心想往上爬。他用自己肮脏的爪子抓住斯大林灵魂不放。他善于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斯大林同志。在研究这个或那个问题时，他总能找到疑点，找到办法描绘这个或那个同志的不好方面。贝利亚在一段时间里能够使斯大林同志对某个同志反感。厚颜无耻和放肆无礼——这就是贝利亚的基本品质。

斯大林同志患病期间，当医生说他的病已经无望时，中央主席团某些成员交换过对贝利亚的意见。显然，主席团所有成员在当时是不能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的。在斯大林同志患病的日子，中央主席团每次有两个政治局委员在他那里寸步不离地值班。我和布尔加宁同志有机会一起值班。有一回值班时，大约在斯大林同志逝世前一天，我对布尔加宁同志说：“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斯大林同志已病入膏肓，他死后怎样组建领导班子？我担心斯大林同志逝世后贝利亚会千方计抢夺内务部的领导岗位。他干嘛需要这个岗

位？这是为了攫取国家机关这个位置，有机会安插间谍以监督政治局委员，窃听、监视、制造事端，进行阴谋活动，而这对党来说会导致极坏的后果。”

我说，不允许这样做，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被葬送。也可能有人会对我说，虽然你们之间谈论过此事，而贝利亚仍然当上了内务部长。也许，你们考虑过，也谈论过，但是无论是你，还是布尔加宁同志没有在组建政府时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

我告诉你们，同志们，为什么结果会是这样。这次谈话是在斯大林同志患病期间进行的，斯大林同志逝世后，大家认为，我们需要更加团结。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讨论政府组成人员时发表自己对贝利亚的意见是不合时宜的。这种发言可能明明白白是错误的。应当指出，还在斯大林同志生前，贝利亚就使中央主席团委员之间互不往来。

那时斯大林同志尸骨未寒，不能提出这个问题。同志们会说：利用斯大林同志之死，在党的领导中制造分裂和慌乱。贝利亚可能狡猾地利用这一点，而你可能是个傻瓜，还能怎样傻呢！这可能吗？

贝利亚一味追求内务部长这个位子。同志们，你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角色”在党内的分量相当大。似乎，应当把斗争最激烈的工作部门交给这种人。当前内务部是不是最激烈的部门？根据我自己的结论，我可能遭到某些批评，但我认为内务部现在不是这种部门。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为什么我这样考虑？让我们回头看一看，拿最近10年来说。国内哪些阴谋是内务部、国家全部揭露出来的？有过许多伪造的假案，而任何阴谋案件也没有。

让我们看看1937年和1937年后的一些案件，其中也有许多假案。如果说起内务部和国家全部搞的一些案件，无论是集团性的，还是个人的，我们看一看，就会发现那里有不少假案。“医生

谋杀案”^①对我们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格鲁吉亚的明格列尔案件^②也是“假的”。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类似的“假案”。

……

贝利亚对此非常清楚。试问，他为什么追求内务部长这个位子？他需要这个位子，我敢说，他是为了把这个很难监督的位子抓到手，并利用它达到自己卑鄙的目的。我们可以通过检查其业务计划完成情况来监督任何一个部长，任何一个干部。而内务部一切都秘密地掩盖着。内务部一位工作人员说：“我到秘密联络点去”。他在那里干什么，接待何人——谁也不知道。这只能看这位工作人员老实与否。内务部是同我们敌人斗争的机关。而贝利亚却想利用这个机关反对党，反对政府。这就是他的目的。请注意这个细节。在可耻的“医生谋杀案”，可耻的格鲁吉亚案的消息报道以后，我收到一封被判刑 25 年的上将克留科夫^③写给中央的信。朱可夫元帅也收到这样的信。我将此信送给中央主席团成员。包括贝利亚。还有一些受审判的将军。贝利亚没有审理这些案件。

我想，贝利亚不审理这些案件是想给被审判的将军们“做些工作”，然后把他们释放。要知道他不单纯是释放，他向受审判者暗示，这是贝利亚使他们恢复自由。不是党，不是政府，而是贝利亚。

① “医生谋杀案”，1953年1月根据斯大林的要求，把15名医生，包括给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看病的医生在内作为“外国间谍和杀人犯”逮捕。1953年4月4日宣布对这个案件平反。

② “明格列尔案件”，明格列尔是格鲁吉亚的一个地方，是贝利亚的故乡。贝利亚利用自己的权力把明格列尔一批人安插到格鲁吉亚领导机关。1951年斯大林派伊格纳捷夫到格鲁吉亚把这批干部赶下台并逮捕。

③ B. B. 克留科夫，中将，1948年9月被捕，1951年判刑，1953年7月获释。

几个月前库兹米切夫将军^①获释。也许释放他是正确的。但是否需要把他从监狱里一释放就马上给他穿上将军服，任命为政府警卫队队长。未必需要这样做，而贝利亚却让库兹米切夫担任这个重要的职务。为什么？因为库兹米切夫是贝利亚的影子，他需要这样的人。

贝利亚试图利用内务部达到他的罪恶目标。他企图通过内务部建立自己的专政，把内务部置于党之上。我认为有必要向全会报告，需要邀请内务部的干部到中央委员会来，贝利亚拒不执行。他给我打电话说：“你们那里行政处一位工作人员给科布洛夫打电话，把他叫出来问内务部的工作是怎么搞的。这是不可能的。我是主席团成员，对我产生某种怀疑，有人把我的第一副部长叫出来”。他提出的问题就是这样，不能把内务部的人召到党中央去，也不能召到州委会去。实际上这就是说，内务部机关应不受党的任何监督，以便贝利亚及其助手可以为所欲为。

这就是贝利亚想干的。我还想说，同志们，在这方面他已得到了许多。你们拿出有关乌克兰、拉脱维亚和白俄罗斯的一些报告看看。现在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些报告的材料，所有事实都没有通过州委会，没有通过这几个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会，而是通过内务部的工作人员搜集的，虽然比较准确和比较正确的这种材料在党的机关中也有。还有其他一些事实，也可以说明贝利亚企图凌驾于党之上。让党服从内务部。

同志们，我深信贝利亚现在不是，过去也不是共产党员。贝利亚是个追名逐利之徒和混入党内的奸细。这个结论我不仅是根据今

^① С.Ф. 库兹米切夫，少将。1932~1950年在斯大林的个人卫队，随后在苏联安全部和内务部工作，1953年1月被捕。1953年3~6月任苏联内务部警卫队队长。1953年7月被捕，1954年2月获释。

天的事实。同志们，你们还记得 1937 年的中央全会吧。那时也在这个讲台上宣布，贝利亚曾在巴库的反间谍机关工作过。这是卡明斯基^①说的。当时有一种说法，贝利亚根据党的安排在反间谍机关干过，虽然这件事没有任何证明。贝利亚也提供不出证明，而时间又过了很久。

……

同志们，我不止一次听到贝利亚关于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谈论。他最后一次发表意见是在我们讨论民主德国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问题的时候。当时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不能兼任党中央和部长会议的领导。在讨论时拉科西^②同志问：“我想请教，哪些问题应在部长会议解决，哪些问题由党中央解决，应当有什么界限。如果党中央和部长会议的领导不能由一个人兼任，那就应比较明确地把在党中央和部长会议研究的问题区别开来”。当时贝利亚轻蔑地说：“什么党中央？让部长会议决定一切，党中央只管干部和宣传”。

他为什么这样说？这出自于他认为党的作用应退居次要地位的思想。贝利亚想在他站稳脚跟之后再彻底消灭党。当然，不是肉体上消灭，但他可能带来许多危害。贝利亚不是党员，而是追名逐利之徒，也可能是个特务，这方面还应当深挖。

我和贝利亚过去常常在一起，因此从他那里听到过许多东西。他本人有时也因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发生的事件而气愤。但这只是口头上的，实际上他干了不少违法的事。不久前他来到中央主席团，建议召开特别会议。我们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没来得及。

① T.H. 卡明斯基，1920~1921 年曾任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书记。1936~1937 年任苏联卫生人民委员。1937 年 7 月被开除出党，1938 年 2 月被判处死刑。1956 年恢复名誉和恢复党籍。卡明斯基参加了 1937 年七月会议。

② 拉科西·马加什，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党和国家领导人。

决定先把贝利亚稳住，然后再讨论。贝利亚提出了内务部所设的特别会议^①的权力的建议。什么是特别会议？这就是说贝利亚可以逮捕人，贝利亚可以问讯，贝利亚可以审判。

试问，难道我国反革命暴乱多得我们的法院都无法审理这些案件？难道特别会议不须侦查就可以把案子审清问明？贝利亚没有提出撤消特别会议，而要保留它。他为啥需要特别会议？把特别会议掌握在手中，可以审判任何一个人。他自己说过：“我可以迫使任何人在承认同英国国王或者女王有直接联系的供词上签名”。他也这样做了。贝利亚有按他的指示审讯的侦查员，他可以得到他所需要的供词，便通过特别会议审判任何人。难道这可能吗？他到底向我们提出过什么建议？他说，也许应当“整理好”这个案子，提出特别会议有权把人关押10年。这就是说——他判决10年，10年以后可以重新开始，再判同样的期限。这对你们是最真实的恐怖。用这种办法他可以把任何人变成集中营里的灰土。我得到这个建议后，给米高扬、布尔加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诸同志打了电话，问他们是否看了贝利亚的建议。难道还需要这样做，什么目的？我们有军事法庭，可以对这些案件进行判决。我想，看来今后我们不能承认不公开的审判，但要使这成为例外，以便这种案件的审理程序由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决议来确定。不允许内务部具有这种权利和权力。因为这些权利可能被贝利亚这样的冒险家所利用，对党和政府采用恐怖手段。

不久前贝利亚又提出一个建议，要服满刑期和侦查或者法庭证明无罪的所有人只有在公诉人向内务部机关报告以后才能释放。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贝利亚试图取消法律制度。如果公诉人

^① 内务部特别会议是1934年11月5日人民委员会决定建立的，1953年9月撤销。

由内务部任意摆布，那法律制度会成为什么样子？

贝利亚抓住这个不放，因为他想掌握的不仅是被监禁的人的灵魂，而且还有被侦查的人、已经出狱的人的灵魂，只要贝利亚还在掌权，他们就会心惊胆战。

这就是这个恶棍所需要的。贝利亚、亚戈达^①、叶若夫^②、阿巴库莫夫——他们都是一丘之貉。

……

同志们，我是一些人常说的“遗老”。我大概在24岁时，第一次见到宪兵。在矿井上没有宪兵。我们那里只有一个哥萨克警察，整天醉醺醺地走来走去。在乡内除了一个警察什么也没有。现在我们每个区都有内务部一个首长，他有一个很大的机构，几名侦缉人员。内务部首长领最高工资，比党的区委书记还高。

但是，如果他有这样大的网，那就应当让人家看看，他在干些什么事。如果现在整理一下内务部的档案，我相信，那里有大量的公民调查表，由于许多案件已被翻烂了。

当然，如果花了钱，就要做事。而如果没有犯罪活动，首长会说：“你真没出息，不好好工作，让我看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于是一些工作人员便开始伪造案件，去干下流勾当。去年莫斯科发生了这样一档事，把一个人判了25年刑，后来才发现，这是间谍臆造的案件，白白地定了罪。

同志们，你们会说，你干什么去了，过去为什么不揭发贝利亚。对此我可以回答说，贝利亚不是一个可以轻易了解清楚和揭穿的人。我个人和贝利亚有不同的关系。特别在斯大林同志逝世以

① Г.Г. 亚戈达，1934~1936年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1937年4月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开除出党并逮捕。1938年3月被判处死刑。

② Н.Н. 叶若夫，1936~1938年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1939年6月被逮捕，1940年2月被判处死刑。

后，贝利亚对我的态度变化特别大。如果我一天不给他打电话，他便打电话问我：“为什么不打电话？”“没有时间，”我回答说，“有事”。“你要常打电话给我，”他说。同志们，我想，他为什么对我如此厚爱，怎么回事？似乎什么变化也没有，我过去是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过去他常给我打电话谈马林科夫同志，莫洛托夫同志。他可以散布流言蜚语，反对每个人。这时似乎在指出，在强调，你也许比他们强。后来我把此事告诉了马林科夫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

我对马林科夫同志说：你听，他说你也许反对我，又对我说反对你。这是一个阴谋家，他认为大家都是傻瓜，而他，也只有他才是个伟大的情报工作者，什么都懂。但我们并不像他所想的那样傻。他为了达到挑拨的目的，作了许多坏事。

……

我想就他为什么这样，谈谈我的看法。这是一个混入党内的奸细，他认为越糟越好。你们知道，马林科夫同志受委托兼管农业。贝利亚表面上与马林科夫同志非常友好，实际上却阻挠把农业问题提交讨论，以破坏集体农庄。结果使农业许多部门处于无人问津状态，牛奶少，肉类也少。如果没有面包和黄油，那是什么共产主义？

……

冒险家贝利亚阻挠关于农业的一切建议。例如，关于土豆增产的问题讨论了3个月，3个月也不能作出决定。刚一提交讨论，贝利亚就提议再作些加工。这个奸细就是这样行事。他阻挠对许多问题作决议。我想，他认为如果某个地方由于居民不满而出现麻烦，这对他来说是好事。唉，多么坏的家伙！

同志们，我完全同意马林科夫同志就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所通过的决议的讲话。我们应当撤销贝利亚的报告。

应当翻翻这些决议，也许应当对它作些修改。

贝利亚极力破坏各民族的友谊，试图煽动和激发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使他们活跃起来。最近几天中央收到几封信，信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歪曲。我收到一位妇女的信，她是斯坦尼斯拉夫州一个区委的工作人员。她对我说：“您说现在没有两个乌克兰——西乌克兰和东乌克兰，只有一个苏维埃乌克兰。我在斯坦尼斯拉夫州工作了13年，现在我作为一个乌克兰人被赶出乌克兰”。这是根据我们的决议而做的。这种信也有从立陶宛寄来的。一位共产党员在信中说，最近一些民族主义分子变得厚颜无耻，开始反对俄罗斯工作人员。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商店里会说俄语的售货员，如果对他说俄语就不给你货。这些事实说明什么？说明贝利亚的建议就是离间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的关系。激起我国各族人民之间的仇恨。

……

在讨论德国问题时，贝利亚这个钻进党内的奸细和帝国主义代理人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时他提出一个问题，让民主德国放弃社会主义建设，向西方让步。这就意味着把1800万德国人置于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他说：“应当建立中立的民主的德国”。

难道民主的资产阶级的德国可能中立吗？这可能吗？贝利亚说：“我们要签订一个条约”。而这个条约价值几何？我们知道条约不值钱。

同志们，这个人的卑鄙无耻简直令人不能容忍。不久前我们听了几个德国人的谈话。民主德国的领导人犯了错误，应当改正错误，但不应瞧不起他们。当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贝利亚大声斥责乌布利希^①同志和德国其他同志，以至于我们都感到不好意思。与会的有几位部长，他们知道遭到贝利亚的何等羞辱，但还不

^① 乌布利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党和国家领导人。

得强颜欢笑，心想，这是一剂苦口的良药。现在我认为你们对这个无耻之徒的态度会有所不同。

贝利亚认为，内务部掌握在他手中，即使有人想逮捕他，那谁来执行呢？让科布洛夫逮捕贝利亚，那他会同科布洛夫一起提前逮捕随便什么人。他坚信这一点。但当我们看到我们在跟一个混入党内的奸细打交道，我们之间就不会有任何分歧。我们经常互相交换意见，我问：你喜欢这个人吗？起初一些人惊奇地看着，大概在想：“他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目的何在？”于是我继续说：你干嘛这样看我，要知道这是一个奸细，你考虑考虑，自己就会相信这是个坏蛋。便回答说：“是的，这样提出问题是正确的，有原则的”。我们互相交谈之后，发现原来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在这之后，我们召开了部长会议例会，没有进入部长会议主席团的党中央主席团成员，都被邀参加这次例会，然后党中央主席团召开了会议，会上大家都把问题和盘托出，直截了当地对贝利亚说：“你是混入党内的奸细，不是共产党员，过去也不是共产党员，我们再也不能容忍了。”现在你们再看看这位英雄，他一下子浑身发软。

同志们，通过这个决议后，我们深信，中央委员会会理解我们并批准我们的决议。

中央主席团关于贝利亚应当得到一致的决议。关于这个问题应当各抒己见，免得以后私下议论。有的同志说：怎么会这样，马林科夫不是常常跟贝利亚挽手而行，他们俩也许在议论我。也许会对另一些同志说，赫鲁晓夫也跟他这样。这完全正确。散过步，我也散过步。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有一次甚至说：你们一起走来走去，在讨论什么问题。我回答说：都是扯闲淡，他说各种下流话，听得叫人讨厌。

我认为，到适当时候，这种散步会对我们带来好处，也是需要的。星期四我们三人——马林科夫、我和贝利亚——同乘一辆车，

虽然我们知道他是个阴谋家，他对我进行阴谋活动，反对马林科夫和其他同志，而主要是马林科夫。分手时他握了我的手，我也以“热情的”握手作答。我想，你这个下流家伙，这是最后一次握手，明天两点钟，我们就要挤兑你。我们不是握你的手，而是要你夹起尾巴。

同志们，对这种奸诈之徒只能这样做。如果我们对他早一点说他是坏蛋，我相信，他会收拾我们。

他会这样做的。我给某些同志说过这一点。有人说我夸大其词，我回答说：注意，你不要当傻瓜，他会把你埋葬，立上一个碑：“这里长眠着一位党和政府的活动家”，然后说：“傻瓜，在那里安息吧”。他会这样做，他善于浇灌毒草，善于干各种下流勾当。跟我们打交道的不是共产党员，而是个阴谋家，奸细，因此不能吐露真情。我们认为，如果他知道会议将讨论有关他的问题，那结果会是这样：我们去参加会议，他会唆使他的那伙亡命之徒，鬼知道会干什么。因此，对这些问题都要好好加以考虑。现在的形势只能这样做。事情已发展到这种地步，如果内务部领导人给党中央通报内务部机关的混乱状况，那他就被认为是党中的“走狗”。

现在你们可以看到，这是什么“友谊”，最后以什么告终。我想，党员会正确地理解我们。现在应当把工作好好安排一下，免得以后再发生类似现象。第一，应把一些正直的人安排到内务部。第二，加强党组织对内务部工作的监督。

需要指出，在解决贝利亚问题时，我们——马林科夫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布尔加宁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是完全一致的。我认为，这次战役（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不会削弱，只会加强党中央的领导。

在这个问题上不应有任何担心。有些人怀疑：党内如何评价这件事，会不会理解为软弱？

我认为，关于贝利亚问题的决议会加强我们的领导，加强我们的党。可能有人会问，其他国家会怎样评价我们的决议。当然，国外会知道，甚至即使我们不公布，国外反正会知道。我坚信，到处对此都会作出正确的评价。

因此，同志们，我们相信这个决议是正确的。

马林科夫同志正确论述了斯大林同志在十九大之后的中央全会上针对莫洛托夫同志和米高扬同志的讲话。我们都很清楚，生活中本来就没有他所谈的这回事。说这话与有人诽谤以及斯大林同志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有关。

……

同志们，驱逐了贝利亚之后，我们变得更加强大。

我想引用这样一个细节。在开会前马林科夫同志把这件事告诉了伏罗希洛夫同志，作为一个年高德劭的党员，伏罗希洛夫同志扑上去拥抱了马林科夫同志。这时伏罗希洛夫同志警告马林科夫同志：“小声点，他在偷听”。于是对克利门特·叶夫烈莫维奇说：即使在偷听，也来不及揭穿。你看，他在主席团内部制造了什么样的环境！有时有人会说：“对的，拉夫连季·帕甫洛维奇。”而自己却偷偷地唾弃他。难道可以把这种环境带入党内？现在，这种情况不会有了。只有集体领导，真正的党的领导。不仅需要中央，而且要在地方上，包括党的基层组织中，都形成集体领导的环境。中央全会、党委会，劳动者代表的例会都应当定期召开，召开这些会议不要搞得太隆重，不要说一些严肃而又毫无内容的空话。这一切都要改造。我们的力量已很强大。我们越是更好地和更深入地开展党内民主、批评，越能更好地组织和吸引群众来积极讨论我们的政策和我们整个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我们将越强大。人民会万众一心拥护我们党，充满信心地跟着党走。

……

No 03698

苏共中央关于贝利亚反党叛国罪行的决议（摘录）

（1953年7月7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听取并讨论了马林科夫同志作的关于贝利亚反党、叛国罪行的报告以后，一致认为：

1. 斯大林逝世后，整个资产阶级世界都希望看到苏维埃国家的削弱，希望看到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层的分裂和内乱，希望看到党与人民密切联系的削弱。但是，敌人的这些图谋都被粉碎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在斯大林逝世后的4个月中确保了对国家生活井然有序的和正确的领导，为了将党和人民团结起来完成共产主义的建设任务，为了加强我们祖国的经济和国防力量，为了进一步改善工人、集体农庄庄员、知识分子及全体苏联人民的生活，它做了大量的工作。

.....

4. 我党是苏联社会的组织和鼓动力量。由于党的正确领导，苏联人民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事业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

但是，我党的工作，无论是在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领域，还是在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教育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缺点。

应当承认，我们在遵守伟大列宁制订的党的准则和遵守党的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原则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多年来，我们在这些方面累积了许多极其不正常的现象。战后已经过去7年，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也过去了13年，才召开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这

无论如何也讲不过去。一连几年也不召开党的中央全会，政治局也长时间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国家和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的决定往往也没有按党章规定的那样事先在党的领导机关集体研究讨论。由于这些不正常现象的存在，工作中的集体领导原则以及应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未能得到保证。这些不正常现象往往导致错误的决策，降低了作为党的集体领导的机关——中央委员会的作用。

同时，也还应当承认另一种不正常现象，那就是：我党在近年来的宣传工作中，违背了马克思、列宁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理论。这表现在：党的宣传不是正确地去解释党作为我国共产主义建设中真正的领导力量的作用，而往往滑到了宣扬个人迷信的邪道上，从而贬低了党的领导核心和整个党的作用，也挫伤了党员群众和广大苏联人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

5. 必须重视共产党在苏维埃国家体制中的特殊地位。我党是我国惟一的政党，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领导的角色只能由共产党担任。党的领导是苏维埃制度坚实而不可动摇的决定条件。

同时，必须懂得，在我们的队伍中，一旦对阶级敌人放松革命警惕，党的垄断地位就会产生阴暗面。我们往往忘记敌人会乔装打扮成共产党人，曾多次企图，今后还将企图钻进我们的队伍，谋取功名利禄，进行破坏活动，充当帝国主义列强及其情报机关的间谍。

6. 因此，中央全会认为，已被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揭露出来的国际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贝利亚的案件应当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现在已清楚地看到，贝利亚十分狡猾地施展各种诡计，投机钻营，骗取了斯大林的信任。斯大林在世时，贝利亚罪恶的反党、叛国活动被深深地隐藏和伪装起来。斯大林逝世后，苏维埃国家的敌人开始变本加厉地活跃起来，进行破坏活动。于是，他们的破坏活

动逐步暴露出来。最后，贝利亚脱去了伪装，赤裸裸地暴露了他反对苏联党和人民的真实面目。

贝利亚的罪恶活动和叛国阴谋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斯大林逝世后，中央委员会以及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要关心的任务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维护党和政府领导内部的团结，以便顺利解决共产主义建设的基本任务。而贝利亚却以十分狡猾的阴谋活动，企图挑拨离间并分裂瓦解我党的列宁—斯大林领导核心，逐个损害党和政府领导人的威信以抬高自己的“威信”并实现其反苏维埃的罪恶阴谋。

贝利亚窃取了苏联内务部长职位后，企图利用内务部机关大肆开展夺取权力的罪恶阴谋活动。贝利亚这个无耻的奸细和党的敌人企图把内务部凌驾在党和政府之上，以此开始利用中央和地方上的内务部机关进行反对党和党的领导人、反对苏联政府的勾当。贝利亚打着保卫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的幌子，对党、政领导人进行间谍活动。他给自己的奸细们制定了汇报制度，要求他们报告党和政府领导人经常在什么地方活动、会见哪些人，并安装了窃听器，偷录领导人的电话交谈，等等。

现已查明，贝利亚曾多次唆使内务部一些干部去反对党，并要求他们把自己看成不受党所领导的独立干部。

……

此外，贝利亚还背着党中央和苏联政府，给内务部地方机关布置任务，让他们监视党的组织，给党的干部、甚至党组织和苏维埃机关炮制黑材料。贝利亚对那些敢于抵制其反党指令的诚实的共产党员和内务部工作人员，则横加迫害镇压。

……

贝利亚严重违背党章中有关选拔干部必须按德才兼备标准的要求，在内务部根据对他个人的忠诚提拔那些与党格格不入和可疑的

分子，同时，他还从内务部机关系统中清除从前中央和地方党组织派去的工作人员。

事实证明，早在斯大林在世时，特别是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在各种臆造的借口下，千方百计阻挠解决一些有关加强和发展农业的刻不容缓的重大问题。现在已确切无疑地查明，这个卑鄙的人民公敌蓄意要破坏集体农庄制度并给国家粮食供给制造困难。

贝利亚妄图用各种阴险手段破坏苏联各族人民之间的友谊，而这种友谊恰是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基础的基础，也是各兄弟社会主义共和国取得所有成绩的重要条件。他在自己已编造的与破坏党的民族政策的行为进行斗争的借口下，企图在苏联各民族间制造纠纷与不和，并暗中支持一些加盟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恣意妄为。

……

7.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

1) 完全拥护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为肃清贝利亚反党、叛国罪恶活动所采取的及时的、果断的、也是惟一正确的措施。

2) 根据贝利亚所犯颠覆苏维埃国家的叛国罪行，将党和苏联人民公敌贝利亚清除出苏联共产党，交送法庭审判。

我党应从贝利亚事件中吸取政治教训并为自己今后的活动作出必要的总结。

第一，必须加强党在党和国家各级机关的领导。必须肃清近些年来党内生活与党的领导方法中形成的严重的不正常现象……

第二，必须纠正多年来形成的内务部实际上摆脱了党的监督的错误局面……

第三，必须竭力在党和苏维埃机关工作中提高共产党人和全体劳动群众的革命警惕性。

苏共中央通报

附 录

“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

继承人的斗争

1953年3月5日21时50分，20世纪最伟大的独裁者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去世。他的弥留时刻是令人可怕的。濒死者床铺旁挤着一群医生，试图减轻病人的痛苦。沙发上坐着尼·谢·赫鲁晓夫、格·马·马林科夫、拉·帕·贝利亚、维·米·莫洛托夫、拉·莫·卡冈诺维奇。醉醺醺的瓦西里出现了几次，每次都叫喊着同一句话：“坏蛋们，他们杀害了父亲！”女儿斯维特兰娜泥塑木雕般地站在濒死者的床头。他的几名忠实的继承人似乎被眼前发生的事吓得不知所措。拉·帕·贝利亚不时走到斯大林床边，说：“斯大林同志，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在这里，给我们说点什么吧。”

但是，濒死者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在最后一刻他睁开眼睛，用不知是失常的，还是愤怒的眼光环视了所有的人，然后抬起了左手。这是大独裁者最后一个手势。据斯·约·阿利卢耶娃证实：“当一切刚刚结束，他^①就第一个跳到走廊上，在大厅内所有人都默默地围着站在一起的寂静之中，响起了他那毫不掩饰胜利喜悦的高喊声：‘赫鲁斯塔廖夫！叫车！’”^②他急速驱车去克里姆林宫。在场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有一人说，贝利亚前去“夺权”。

显然，这句话就成了祖国历史上又一个神话传闻产生的起点，说斯大林死后，拉·帕·贝利亚谋求夺取党和国家的大权。

① 指贝利亚。

② 斯维特兰娜《给友人的20封信》。

那又怎么样呢，一个巨大帝国的缔造者死后随之而进行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这在世界历史上也不是什么新鲜的现象。不过，必须声明，有分量的文献资料并没有证实这种说法。

也许贝利亚比政治领导层中的任何人都更实际地认识到自己在党和国家权利金字塔中的真实地位，而且深知国内多数居民对他的态度。对人民来说，他是斯大林的丑陋弄臣、刽子手。

战后时期，拉·帕·贝利亚固定不变地处于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自1944年起，他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45年8月20日，在国防委员会隶属之下成立了一个由他主持的专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除其他事项外，负责“领导有关铀的原子内核能源使用的一切工作”（后来改组为隶属于苏联部长会议的专门委员会）。在贝利亚被捕那一天，即6月26日，委员会被解散，其机构移交给了刚刚成立的苏联中型机器制造工业部。

在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和最接近斯大林的那些同事们之间形成了极不单纯的关系。他们都清楚，这个戴夹鼻眼镜的谢了顶的人对于他们的情况知道得很多，比应当知道的还多许多，而且任何时候都能够“把他们变成集中营里的灰土”，加以消灭。人们都怕他。在战争期间，他同格·马·马林科夫特别接近起来。同尼·谢·赫鲁晓夫的关系更复杂一些——对赫鲁晓夫天生的机灵精明贝利亚还是估计不足。

当你翻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回忆录时，你不禁会想，在描述斯大林死后政治领导层中的关系时他毕竟还是要了滑头。夺取政权的主要斗争是在尼·谢·赫鲁晓夫和格·马·马林科夫之间展开的。拉·帕·贝利亚介于两人之间，而手中握有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分支庞大的机关这样的强大力量（内务部机关与国家安全部合并前就有编制人员374800人^①）。贝利亚在这两个机构中的威信相当高。在

^① 根据1952年10月1日的统计数字。

内务部经济部门工作过的圣彼得堡财经大学教授纳林斯基回忆说，贝利亚于1953年回到合并后的内务部一事，被该部许多工作人员看作为“重大的节日”。

在斯大林去世的前1小时又10分钟，举行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会议，会上预先议定了一切组织问题，并且认为：“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应当像党章规定的那样，只有一个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而不是两个中央机关——主席团和主席团常委会。”在会议之前，尼·谢·赫鲁晓夫曾向格·马·马林科夫提出“谈一谈，我们今后如何生活……”。但他受到冷淡的拒绝：“现在有什么好谈的？人来到以后，再一起谈。开会就是为了这个。”尼·谢·赫鲁晓夫承认，他感到被排除在“局外”。

果然，在3月5日的苏共中央全会、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上，最重要的组织问题已经作出决定。贝利亚提议由格·马·马林科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并免去其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格·马·马林科夫建议将国家安全部与内务部合并为一个部——苏联内务部，并任命拉·帕·贝利亚为内务部长和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拉·莫·卡冈诺维奇为部长会议副主席，而克·叶·伏罗希洛夫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确定尼·谢·赫鲁晓夫为斯大林治丧委员会主席，并建议他集中精力从事苏共中央的工作。

这样，拉·帕·贝利亚的“一百天”就从1953年3月5日开始了。

“应当恢复法制……”

担任合并后的苏联内务部部长后，拉·帕·贝利亚在手中集中了很大的权力。他直接控制以下几个部：第3部（苏军和海军的情报与反间谍工作）、第8部（密码）、第9部（政府保卫）、第10部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警备处)、干部部，以及侦查部门、检查部门、内务部秘书处和特别法庭。

那么贝利亚又准备怎样使用自己的权力呢？他是否准备改变国内的情况，把国家引上欧洲发达国家的道路呢？文献没有这样的记录。不过他在同米高扬的一次谈话中对自己的信条作了如下的陈述：“应当恢复法制，不能容忍国内目前这种状况。我们逮捕了許多人，应当把他们放掉，也不能随便把人送到劳改营去。内务部应当缩减，我们所拥有的不是保卫机关，而是对我们进行监视的机关。”^① 于是，1953年3月9日，在斯大林的葬礼上讲话时，他在陵墓的观礼台上声称应保证每一个苏联公民享受宪法赋予的人身权利。这种宣告从刽子手口中说出，听起来令人感到虚伪。但是，人们感到，这确实是在认真宣告一个国家实现健康化的纲领，而且开始付诸实现。为了执行贝利亚的要求，内务部秘书处于1953年3月草拟了一系列足以证实“卢比扬卡元帅”重要意向的建议，并送交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首先，这涉及停止侦讯中的一些案件。“医生案件”的案犯早在1953年3月已被释放。在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会议上，拉·帕·贝利亚得以争取到在《真理报》上发布关于为因这个案件而被捕的人员彻底平反的专门公报。这种做法在“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的实践中是第一次。因此，这件新举措受到党官僚们的极端仇恨。苏共中央书记沙塔林宣称：“应当说，所有这一切对我国公众产生了非常痛心的印象。纠正错误的这种方法给我们国家的利益带来极大的损害。”

还对所谓的“明格列尔案件”进行了复查。联共（布）中央曾在1951年11月8日和1952年3月17日通过决议，认定在格鲁吉亚似乎揭发出一个由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书记巴拉米亚领导

^① 米高扬在1953年七月全会上的发言。

的明格列尔民族主义组织。1953年4月10日，根据苏联内务部的呈报，苏共中央主席团研究了关于为这个案件被判决人员进行平反的问题，并通过了“关于苏联和格鲁吉亚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原国家安全部破坏苏维埃法律”的决议。党的官僚们从这里又一次看到了旨在败坏斯大林名声的企图。

苏联内务部草拟了一个建议对由非司法机关，首先是“三人小组”判决的所有人进行大赦的呈文，送给格·马·马林科夫和尼·谢·赫鲁晓夫。另一个呈文是设想限制部属特别法庭（也是非司法机关）在劳改营关押人犯10年的权限。但是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时，尼·谢·赫鲁晓夫在维·米·莫洛托夫和拉·莫·卡冈诺维奇的支持下表示反对。他的理由是：“我坚决反对这样做，因为这样就要修改整个逮捕、审判和侦查体系。它是随意性的。而关于判决20年或者10年的问题，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可以先判10年，以后再判上10年，然后再判10年。已经有过这样的事。我们收到一些文件说，实际上有这种方法存在。因此，我坚决反对。”

于是，贝利亚收回了自己的建议。……

1953年3月2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关于大赦”问题。根据1953年3月28日《真理报》刊登的命令可以知道，从关押地点共释放了100多万人。按照命令只释放刑期在5年以内的人犯。大赦也涉及根据1947年6月4日“关于保护国家和个人财产”的命令而被判刑的人。内务部关于对30~40年代受迫害者实行大赦的所有过激的建议均被否决。人们还向贝利亚指出，他实行这些措施“过于匆忙”^①。

只有先解决核心问题，即干部问题，才能恢复社会主义法制。

^① 国家档案馆苏联内务部文件集。

内务部—国家全部向全体人员发布的命令，以及党中央组织的文件和资料，揭开了从党员、共青团员中不断向惩戒管理机关输送干部的机制。在苏维埃国家建立的最初几年，这样做是由于专业干部缺乏，不得不容忍新吸收人员训练水平低下状况。后来，又有大批党和苏维埃负责工作人员的子女进入“机关”工作。

尽管贝利亚具有种种不好的品质，但他无疑是高度熟练的情报人员和反间谍人员。他清楚地知道，这样的干部会给事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但他也知道，正面进攻的结果必将使他十分悲惨。所以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把一种组织结构改组成另一种组织结构，然后有机会时再摆脱内务部的体系。这并不是新的办法。但是，贝利亚第一次提出了取消和从内务部系统中调出整批整批的结构性部门。仅1953年3月，从内务部组成内就调出并转拨给其他主管部门18个苏联内务部组成的结构性部门，其中有：国家建议局远东边疆区分局、建筑工程总局专业工程拖拉斯、特种石油工业建设总局、国家水利工程建筑设计院等。1953年3月28日，根据苏联部长会议的决定（第934—400CC号），古拉格（劳动改造营总管理局）也从苏联内务部转给了苏联司法部。

贝利亚怎样变成了国际帝国主义的间谍？

50年代初期最尖锐的外交问题之一，是德国的战后安排。人为地肢解一个原先一度统一而强盛的国家，建立一个宣告将迅速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一切都造成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困难。东德的广大居民阶层不满足于自己的地位，这表现为人们大量逃往西德。自1951年1月至1953年4月，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逃到西德的人数计有45万人，其中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和自由德国青年同盟盟员数以千计。苏联内务部和外交部的驻外机构

在专项报告中通报了这一情况^①。

斯大林死后，由维·米·莫洛托夫再次担任外交部长。作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他直接处理民主德国问题。1953年5月27日，他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提出关于德国形势的问题。对于当前德国内部局势和经济形势的冷静判断说明，如果没有苏联军队的存在，民主德国现政权是不巩固的。

外交部提出的方案包括这样一项提案：“不在民主德国实施强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议的政策。”在讨论这一方案时，贝利亚提出只须从中删除一个字——“强力”。当问他为什么这样认为时，贝利亚回答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和平的德国，至于那里是不是社会主义，对于我们并无区别。”

这时，苏联内务部负责德国问题的全权代表及其副手已在莫斯科，正在研究内务部驻德全权代表处的编制缩减问题。对于许多原先的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来说，这项工作简直是一个个悠闲的肥缺。贝利亚果断地决定把这个部削减到原先的七分之一。根据他的建议，内务部部务委员会也撤销了驻德国的督导机构^②。

在5月27日的会议上，贝利亚建议认定在民主德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他声称，如果德国统一起来，即使在资本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统一也罢，对于苏联也足够了。他还为自己的建议提出根据说，统一的德国可以同美国在西欧的影响相抗衡。

莫洛托夫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处于欧洲中心位置的国家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尽管这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德国，但它却能决定许多问题。因此，应当坚定地执行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不过不能心急。莫洛托夫坚信，放弃在德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想

^① 国家档案馆苏联内务部秘密文件。

^② 国家档案馆：苏联内务部关于德国问题的文件。

法，就意味着不仅使东德，而且将使整个东欧的党的力量迷失方向。而这反过来又将导致东欧国家向美国人屈膝投降的前景。

支持莫洛托夫的有赫鲁晓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卡冈诺维奇和布尔加宁。贝利亚、马林科夫的建议遭到否决。会议记录并未写明投票的结果。所有的回忆录都提到，会后赫鲁晓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在克里姆林宫里散步了很长时间。据赫鲁晓夫后来证实，正是在这次散步过程中，他说服了贝利亚“彻底放弃自己的建议”。

不管怎么说，1953年6月2日发布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实现民主德国政治形势健康化的措施”指令。但是，时间证明，正确的毕竟还是“卢比扬卡元帅”。还在1953年7月^①，民主德国爆发了工人、大学生、知识界的骚乱，但为武力所镇压。又过了30多年，德国才得以统一。

贝利亚的另一个，同样“可怕的罪行”，是试图同南斯拉夫实现关系正常化。1953年6月25日，他来找赫鲁晓夫讨论这个问题。

这里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如此重要的外交行动竟通过内务部系统进行，而不是由外交部负责实施？利用情报机关达成协议的做法，是从30年代起在苏联就存在的。还在1936~1937年间，斯大林个人外交活动的代表就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外机构的掩护下同希特勒进行谈判，并最后制定了斯大林-希特勒（1937年2月）初步协定的草案。在1942春夏之交的艰苦考验期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二部第一处的工作人员同希特勒德国相应的情报部门商谈过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会面以签订“第二个布列斯特条约”（即同德国的和平协议）的可能性问题。

如今则又设想利用苏联情报机关的同一些秘密渠道实现苏南关

^① 应该是6月，作者笔误。

系的正常化。搜查时，在贝利亚的办公室里，在后来归入侦讯案卷的其他材料中，发现以下一张便函：“利用这一机会，向您，兰科维奇同志，转达贝利亚同志的崇高敬意。他清楚地记得您。贝利亚同志委托我极端机密地告诉您，他和他的朋友们认为必须根本改变和改善两国之间的相互关系。据此，贝利亚同志请您亲自将这一点通告铁托同志，而如果您和铁托同志同意这种观点，那么可以安排为此而指定的全权代表进行秘密会晤。会晤可以在莫斯科举行，而如果您认为因某种原因这样做不妥，那么也可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贝利亚同志表示坚信，除您和铁托同志以外，关于这次谈话谁也不会知道。”

阿·兰科维奇此时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联邦执行会议副主席。

但是，中央主席团和以莫洛托夫为代表的外交部在同南斯拉夫的关系上继续坚持旧的路线。根据他的建议“决定同南斯拉夫建立如同和其他同北大西洋侵略集团有勾结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关系，如互派大使、建立官方电讯关系、举行事务性会晤，等等。”拉·帕·贝利亚显然操之过急了，他1953年6月6日就坚持向南斯拉夫政府提出互换大使的建议。

当时另一个同样尖锐激烈的工作领域，是苏联国外机构的活动。1953年4、5月间，贝利亚把内务部国外秘密机构几乎一半的领导工作人员召唤到莫斯科。约2000人在莫斯科停留了2~3个月时间。50年代初苏联情报机关的工作效率大大下降。其原因在于情报人员的专业训练水平太低。外交人员需要认真加以更新。在4、5月份同苏联情报机关领导人谈话时，贝利亚一再强调说，“不存在情报机关，因为没有任何谍报，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没有任何干部，因而一切都要从空地上开始。”

不久之后，正是这些事实构成了指控贝利亚犯有破坏活动的基

本材料。例如，卡冈诺维奇 1953 年 7 月 3 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发言时声称：“贝利亚毫无疑问是同国际帝国主义情报机关相勾结的大代理人和大间谍。这里援引过的他的信件提到的种种事实，以及同兰科维奇和铁托的密切交往说明，在铁托从英国回来和在美国逗留之后，他建议放弃在民主德国建设社会主义并蓄意实际取消民主德国绝非偶然。这是帝国主义间谍的路线，目的在于完成国际列强的指令——把我们祖国出卖给帝国主义者”。

民族政策的“难解之结”

这里涉及的是在伟大卫国战争前夕并入苏联的那些地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乌克兰西部地区。战争结束后，这些地区的局势仍很紧张。试图按照苏联的榜样和模式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做法，遇到了来自居民方面的强有力的反抗。根据民族恐怖行动牺牲者的姓名卡片资料，1944～1945 年间在立陶宛境内就有 25108 人遭杀害，2965 人受伤^①。

为了消灭支持民族主义运动的地下势力，政府又采取了另一项暴行——迁出积极的民族主义者的亲属。据苏联内务部的资料，1948 年 5 月 22、23 两天被驱逐出境的有 11345 个民族主义地下组织参加者的家庭，以及 39766 名富农。所有这一切都是根据 1948 年 2 月 21 日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而实施的^②。

虽然到 1953 年有组织的抵抗已经基本上被消灭，但是贝利亚知道，这些人的痛苦和屈辱迟早要爆发出来。再加上中央不断执行明白无误的实行俄罗斯化的政策，形势又激化起来。这些地区的党

① 国家档案馆：苏联内务部—安全部文件。

② 国家档案馆：苏联内务部给苏联部长会议准备的文件。

和苏维埃的领导职务均由俄罗斯人担任。按照当时的规定，不能提拔有亲属在国外和战争期间在暂时被占领土上居住过的人担任负责工作。在立陶宛实际上所有居民都生活在德国人占领的领土上。有80万立陶宛人住在国外。许多家庭都有人遭到镇压。在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西乌克兰，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因此，尽管内务部采取了种种有力的措施，民族主义的地下组织在这些地区继续进行活动。

为了解开这个“难解之结”，贝利亚作出断然的决定。第一，他要求更大胆地提拔民族干部担任领导工作。他自己就先从加盟共和国的内务部机关做起。他的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以谍报材料为根据，草拟了关于乌克兰西部地区、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局势的汇报材料。其中特别注意吸引知识界到苏维埃政权一边来。贝利亚甚至设想颁行一种专门的加盟共和国勋章来奖励优秀的文化工作者。此外，他还试图同侨居国外的西乌克兰知识分子代表建立接触。

1953年5月26日，苏共中央通过“拉·帕·贝利亚同志在呈交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书面报告中的乌克兰共和国西部地区的问题”的决议。而1953年6月2~4日召开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全会的议题就是“关于苏共中央1953年5月26日‘拉·帕·贝利亚同志在呈文交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书面报告中的乌克兰共和国西部地区的问题’的决议”。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乌克兰内务部部长梅什克也参加了。他的发言的主要基调在于，党的机关不应介入契卡的实际工作，而应处理自己的纯粹的政治问题。他提请注意党和苏维埃机关在安排乌克兰西部地区迁出居民的问题上的严重缺点。

在关于立陶宛加盟共和国书面报告中，指出了天主教会的特殊地位和侨民影响的生长。

其中提到被镇压的人数——27万人，指出了立陶宛的集体化是用强制方法进行的，良好的农业经济遭到破坏。书面报告的基本

内容是由第4部（秘密政治问题部）部长萨济金中将撰写的。为此，他曾两次前往立陶宛。他还吸收立陶宛内务部的领导工作人员参与编写书面报告。后来，在贝利亚被捕后，他们写道：“我们（孔达科夫、马尔达维丘斯、盖伊里亚维丘斯）撰写的书面报告是一份着重于自我批评的书面报告，但贝利亚并不满意。他指责我们隐瞒立陶宛的真实情况。贝利亚用最下流的话辱骂我们，威胁我们，强迫我们按照他的想法进行修改，也就是说，要夸大现有的民族主义地下组织及领导中心的状况、天主教会的状况，把它们说成是在我们监控之外的群众性的、组织严密的、统一集中的势力。至于说到民族主义地下组织，在我们共和国里没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不得不描述这样一个为贝利亚所需要的地下组织。因我们反对贝利亚对情况作这种估计，他大声漫骂并进行威胁”^①。

时间证明了，拉·帕·贝利亚对局势的判断有多么正确。要知道，最后一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分子直到1962年才被消灭。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民族主义运动一直在秘密活动着。

后来，在贝利亚被捕以后，在苏共中央七月全会上，贝利亚提出的涉及民族问题的一切建议都被说成是破坏性的。立陶宛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斯涅奇库斯在自己的发言中把提拔民族干部问题的功劳算到了格·马·马林科夫头上，而一年以后又算到了尼·谢·赫鲁晓夫头上。在全会的决议和起诉书性质的结论中则指控贝利亚“煽起民族纷争和破坏民族友谊。”

反对党的领导的实践

对拉·帕·贝利亚提出的最为严厉的指责之一，是“贬低斯大林

^① 国家档案馆：苏联内务部秘密文件。

的威信和试图把内务部机关凌驾于党之上”。这些责难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符合真实情况的呢？

诚然，贝利亚是最早提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人之一。长期以来，正是贝利亚起着斯大林私人情报员的作用。毫无疑问，没有别的什么人会比他更了解斯大林的性格。“卢比扬卡元帅”意识到，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到病态的形式和规模，工作中集体领导的原则被抛弃，在最高领导层中批评和自我批评根本不存在。中央全会多年不开，而党的代表大会则13年未曾召开。作为集体领导机构的政治局也不存在了。政治局由按照斯大林的委托解决个别问题的三人小组、五人小组所取代。

拉·帕·贝利亚对于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讲过什么样的想法呢？据赫鲁晓夫证实，1953年在同马·拉科西的一次谈话中，曾提及党中央和部长会议的权限分工问题。拉科西问贝利亚：“哪些问题应当在中央讨论，哪些问题应当在部长会议上讨论？”他以蔑视的态度回答说：“中央有什么。该让部长会议决定一切，而中央就让它负责干部和宣传就是了”。在同卡冈诺维奇的谈话中，他也多次讲过类似的思想（党只应管干部）。

地方上的党的机关不仅管苏维埃工作，而且还管经济机关的工作。大家知道，党的委员会发布关于播种和收割季节开始的决议，规定工业企业和集体农庄的工作。这种干预只会带来害处。根据贝利亚的指示，内务部的地方机关曾着手搜集材料，以证实党的机关不懂经济问题。这一做法被认为内务部凌驾于党之上。

乌克兰内务部部长梅什克曾命令内务部负责利沃夫州的局长斯特罗卡奇“详细了解”两个落后的集体农庄。此前曾任乌克兰内务部长的斯特罗卡奇把这一点向利沃夫州委书记谢尔久克作了通报，使后者大为恼火。他说：“……可我们这里不是有好的集体农庄吗？用它们为例可以显示农民的生活”。

更加引起党机关工作人员警觉的是，贝利亚曾指示收集有关党的州委、市委、区委工作人员的民族成分和文化程度的材料。

1953年5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根据拉·帕·贝利亚的倡议而通过的“关于国家节日期间游行者的纵队和企业、机关、团体建筑物装饰”的决议特别令人愤懑。其中竟建议“在国家节日期间不再用画像装饰游行者的纵队和企业、机关和团体建筑物”。在贝利亚被捕后，1953年7月2日，仍由苏共中央主席团重新作出决定，把这项决议作为错误的决议而予以废除。

根据贝利亚1953年4月的指示，报刊停止了对斯大林歌功颂德。在对“各个时期和各族人民的领袖和导师”进行评价时，批评的声调在同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谈话中越来越经常地流露出来。可以想象，贝利亚计划开展一场谴责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大规模运动。后来，这种想法部分地由尼·谢·赫鲁晓夫加以实现。但是，1953年时，这被认定为贝利亚企图借此建立起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贝利亚的所有建议都被认为企图把内务部机关置于党的监督之外，并摆脱党的领导。关于这个问题，说得最好的是卡冈诺维奇。在苏共中央（1953年）七月全会上发言时，他说：“我们应当提高对工人和共产党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应当巩固党的机关。党对于我们高于一切的。坏蛋贝利亚不止一次说：中央应当只管宣传和一部分干部工作，他就是想把党中央的作用归结到这一点上。对于我们——老布尔什维克——而言，中央，这就是党对全党、全国整个生活的党务，政治和经济领导。组织问题服从于政治。组织问题和政治是相互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必需保留中央的力量，保护它，巩固它，要使中央不真正变成这个坏蛋所想的那样，而让它像原先那样坚强的、我们党的中央机关，由它领导我们党的一切生活，……我们应当说，1937年所说的许多话今天仍应记取”。

最后二十天

命运赋予“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行将结束。政治阴谋的大师们已经在极力编织阴谋的网。而他还在继续度着一个个充满日常工作的平常日子：参加各种会议、为苏联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准备新的建议。有一份注明日期为6月16日的建议设想安排古拉格群岛的命运。贝利亚建议“鉴于缺乏经济效益和发展前景而废除现有的强制劳动制度”。我们知道，这时古拉格（劳动改造营总管理局）已经从内务部转划给苏联司法部管理。

此外，贝利亚还建议着手从根本上重新审查涉及所谓反革命罪的所有案件，并且提出不是实行大赦而是为被判决者宣布平反的问题。当时曾建议苏联检察院、苏联最高法院、内务部、苏联司法部重新界定“反革命罪”的概念，而苏联检察院则应复查30~40年代被判决人员（首先是被非司法机关判决人员）的案件。对于所有宣布平反的人，设想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补偿。

另一项建议涉及特殊移民。贝利亚认为，必须建立由党、苏维埃和行政管理机关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研究他们的劳动、生活和休息条件。

在“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社会上持久不懈地流传过一种新闻，似乎在“大恐怖”时期国家安全机关置身于党之上，而贝利亚在斯大林死后似乎也力图这样做。然而文件却证明了相反的情况。关于实施大规模行动的作战命令、国家安全机关的一切组织变动，都处于党中央的关注之下，均系经由中央组织局或政治局批准。拉·帕·贝利亚并没有违反规定的程序。

客观上贝利亚是以格·马·马林科夫为代表的苏维埃国家机关和以尼·谢·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党机关之间的缓冲器。从自己的改革活

动一开始，他的命运就已注定——他的所有建议和创举都被看作旨在夺权。

档案中还保存着一份由贝利亚秘书处草拟的文件。这是一张表格，其中列举了因过时或错误而必须废除或修改的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或部长会议的决定。因此，可以认为，“卢比扬卡元帅”的改革意图是相当认真的。不过这一切是由别人加以实施的。

因而说，贝利亚的命运是早已注定的。

鲍里斯·斯塔尔科夫（历史科学博士）

原载苏联《文献资料》1993年第4期第82~90页。

【专题说明】

“解冻”与知识分子

(1953年7月至1967年5月)

知识分子，尤其是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知识分子，向来是社会神经中最敏感的部分。斯大林逝世后，随着苏联新领导人响亮地提出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口号，以及采取诸如大赦普通罪犯、平反某些错假案件，文艺界的一些人首先感到了政治气氛的某种变化。1954年，著名作家爱伦堡写了一部题名《解冻》的中篇小说，“反对以冷酷态度对待同志的斗争”和文艺作品的“粉饰现实”与“粗制滥造”。“解冻”成为描绘斯大林死后知识分子追求思想解放的流行名词。不过，当时还只是“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文艺界得到的自由空间仍很狭窄。不仅爱伦堡的小说以及同年发表《不单是为了面包》的杜金采夫立即受到指责和批判，而且围绕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理论、如何贯彻党的政治路线还在进行着不断的争论，经常有一些作家和艺术家受到来自政治方面的打击与压制。不少文学艺术家仍然处于苦闷之中。有关50年代以后苏联文艺界的斗争状况过去报刊上有过不少介绍，本卷也收录了有关帕斯捷尔纳克遭遇的文件，本专题从苏联解密档案中收集了部分作家和艺术家的书信和讲话，还有其他方面的知识分子各种建议和书信。这些文件出自不同类型的人，反映的也属不同的问题，但有一点是共

同的：都有种种苦恼。其中法捷耶夫的遗书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法捷耶夫 1901 年生于特维尔省，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东部度过少年时代，1918 年加入共产党，参加了在西伯利亚对白军和日本人的作战。根据这段经历，他写下了第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毁灭》。法捷耶夫成为苏联著名的作家，无产阶级文学的主要倡导者和理论家，曾长期在苏联作家协会担任领导工作。1939~1956 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作家协会书记和理事会主席，积极贯彻斯大林的文艺路线，对文艺界的清洗和历次批判运动，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曾深入前线，1945 年发表了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歌颂在德国占领下的乌克兰一个地方的青年们英勇反抗法西斯的斗争。但这部受到文艺界赞扬的著作却受到政治方面的严厉指责，批评他没有体现地下党的组织和领导作用。法捷耶夫不得不根据领导的意志用了 4 年时间进行修改。后来我国翻译的是经过修改的本子。1956 年苏共二十大谴责斯大林后，法捷耶夫降为中央候补委员，他的良心受到自责，悔恨交加，留下一份遗书而忧愤自杀。正如他自己说的，他本来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作家“却被变成拉重车的马”，他受到的种种训斥和责难难以忍受。当他发现不学无术的新领导将继续断送文学事业时，感到“生命失去任何意义”。

在 50 年代不只发生过法捷耶夫现象，还有像帕斯捷尔纳克、涅伊兹维斯内等许多作家和艺术家受压制和批判的事实存在。

（本专题文件由杨存堂编辑和校注，
李建良、陈纪刚、姜西平、刘力翻译）

№03680

作家谢尔文斯基致马林科夫的信

(1953年7月25日)

尊敬的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

一位非党诗人谢赫捷尔给我这位党员作家写了一封信。他打算在“苏联作家”出版社出一本薄薄的诗集。作为此事已苦苦奔波两年了，但仍被出版社拒之门外。我阅读了他这本诗集。除三四篇作品外，该诗集总体上是好的。就其思想性、艺术性来看已达到了出版水平。如果“苏联作家”出版社觉得有必要，我完全可以用详尽的分析来证实我上述看法。鉴于我不是任何编委会或书记处的成员，我给谢赫捷尔帮不上任何忙。

我给您写信倒不完全是由于谢赫捷尔的诗集，而多半是由于他的信引发的一些思考。作为一位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会员的专业作家不去找作家协会帮忙，而来找自己的文友，抱希望于文友纯洁的党性，看来他对作协已不寄希望。这件事情（顺便说一句，这不是惟一的）本身说明，现在该谈论的不是该作家协会的“缺点”，而是笼罩在该协会内部的恶劣气氛。这种气氛距社会主义艺术家自由创作、自由争鸣的纯洁的气氛太远了：那里明显表现的是资产阶级式的竞争。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书记处的核心在多数情况下是扼杀未加入该核心的文学竞争者的文学康采恩式的东西。在诗歌领域中，这一点表现特别明显。特别是农民流派诗人，由于他们参加了康采恩，便扼杀现代苏联诗歌创作的其他诸多流派。然而，这一流派是无法独自完成党为文学界提出的严肃任务的，因为读者阅读

这一流派的作品，容易产生一种印象，似乎世界上只有俄罗斯存在，在俄罗斯也只有农民，农民中又只有个体户农民。其实，问题并不在于这个流派。我党政治上所反对的个人迷信同样也存在于文学领域。诗歌创作领域中对特瓦尔多夫斯基个人的过分吹捧便是例子——他被置于文艺批评之外，他的每一首小小诗作，都要被我们的报刊和广播大吹特吹。虽然诗人的创作从总体来说很富天赋，但从艺术方面看是保守的，从思想方面看是反动的。如果允许对他的创作自由评论的话，这一点是不难得到证实的。只要一个例子就足以证明上述结论。瓦西里·焦尔金简直被我们的报刊吹捧成了一位当代英雄，在这篇长达五千行的诗作中全然没有提到革命、党、集体农庄制度的内容，他甚至把同德国法西斯的这场大决战说成是同德国人的战争。

在整个文化事业飞速向共产主义的顶峰前进的国度里，怎么能够在文学领域产生一种羞于在公开讲台上启齿的气氛呢？这种情况的产生是我们党中央群众宣传鼓动和党的教育部对作家协会领导不力而造成的后果。早在战争时期，它为了将整个作家协会控制在自己的视野中，曾在作家中选拔了几十名“有关系”的文学工作者，把他们安插到文学界各个部门，正是这些人占据了领导岗位，进而成为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和各杂志、丛刊、出版社编委会、甚至斯大林文学奖金评选委员会的头目。很自然地，这些拥有无限权力的人官官相护，相互纵容，充分肯定自己，只肯定自己，同时又用最坚决的手段清除竞争对手。群众宣传鼓动和党的教育部使之凌驾于作家们之上的那班人，最终脱离了广大作家，成了广大作家所深恶痛绝的帮派。

基于这种原因，文艺界这些领导人纵然想去贯彻执行党的路线，也再没有可能的，因为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的：“客观规律胜于主观意识”。

于是，今天作家协会的状况如同当年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所面临的状况：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已从一个能够推动苏维埃文学事业向前发展的动力变成妨碍其发展的阻力。而且，近年来作家们创作的一切优秀作品，都并非是受益于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结果，而是得益于不顾它的阻碍，甚至是根本不按其意志行事的结果。

致以同志般的问候！

伊利亚·谢尔文斯基

1953年7月25日

No 03699

穆欣娜给莫洛托夫信的草稿（摘录）

（不早于1953年7月）

巴尔维哈

尊敬的维·米·：

我快要死了，所以我要给您写这最后一封信。这封信几乎全部都是关于我们的艺术问题，它落后的根源及艺术家生活的某些问题。我收集资料已久，但仍很零散。由于病我自己不能整理这些材料。我让自己的儿子把材料作系统整理，编成一部类似《艺术的遗嘱》的东西，这些他已经完成。我请求您读完后告知我，您认为哪些内容对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有用。也许，这一点很有必要，因为所有问题都具有普遍性。我也只能求您，因为您多次以您对我和我的创作关心的态度帮助了我，因此我希望您不会拒绝读这最后的虽然是很长的一封信。……

阻碍我们艺术发展的基本原因之一，就是经常遇见的对其特殊性的不理解。我认为，艺术就是作者对主题情感的表现。它的巨大的动力就在于作品能够赢得观众，激发他们的情感，使他们不由自主的流泪或者对作品付之一笑，使他们充满柔情或者愤慨……

然而对艺术作品我们经常提出仅适合于科学研究的那种有凭有据的要求。艺术家在创造心理冲突时的各种自由可能性较小，但情感上是有积极作用的，而这种自由被指责，作品被删节，并在保护现实主义的借口下产生了无冲突论及其所有后果。最近一年所发现

的在创作“冲突性”艺术作品中失败的原因是冲突在作品中具有外部的、逻辑的、而不是情感的特征。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像生活中的任何冲突一样，利益上的矛盾所引起的冲突也没有通过心理和情感的冲突在艺术作品中揭示出来，不能赢得观众，使观众对所塑造形象极为冷淡。造型艺术，特别是雕塑艺术的情况尤为困难。雕塑艺术的惟一主题是人，通常是没有背景和陪衬的，通过本身“身体的动作”体现内容——通过他身体的姿势和面部表情。由于在面部表情中表现最完整的不是思想，而是情感，而我们这里裸体不受人尊敬，我们艺术家中的雕塑家处于一种最为艰难的状况。考虑到最近艺术中的“心理描写”被认为是一种罪过，而现代的服装可以完全遮盖身体和使其变形，雕塑家只好用各种陪衬来充实自己的作品，这些烘托在自己的形式方面常常是违反雕刻艺术的，却必须给观众解释作品的内容。

因此，我们在展览中看到许多平淡的、无聊的、反艺术的作品，虽然它们在技术上是很内行的，但由于数量过多观众很快就会厌倦，并带着合理的“厌恶”情绪而去。我们忘记了艺术家的权利是创造现实，忘记了艺术作品的主要内容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他的情感表现，也可以说是艺术家的好恶。……

艺术作品的内容决定形式已经成为我们艺术学中的老生常谈，甚至重复它会感到难为情。同时由此经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作品的主题选择正确，艺术家具有基本修养，那么艺术作品的表现形式就会随着响应党的号召，正确的主题及善良的愿望自然而然地诞生。然而如果创作任何伟大艺术品的作者没有掌握完好的形式，不会运用自己的技术和素养，去创造不仅主题正确，而且和谐、美好的作品，那么都是不能成功的。然而我们的画家、艺术理论家对形式的问题学习研究很不够。除此之外对它们的学习研究简直是不无危险。某个不共戴天的朋友会给您贴上“形式主义者”的

标签，经常您自己还不知道就上了艺术委员会和艺术研究院的黑名单。这种荒唐而有损我们形象的状况导致了，甚至在最严肃的评论文章中除了对绘画或雕塑作品的内容进行或多或少的完全转述外，什么也找不到。

不仅如此，我们的评论书刊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是对作者做什么、怎么做不作详细分析，而责备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没有反映什么”。这样进行评论甚至对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作品也会全盘否定。为了使艺术批评占据一个作者的恰如其分的助手和领导者的地位，占据俄罗斯别林斯基和斯塔索夫赋予评论文学的地位，就必须围绕艺术批评提出并解决一系列问题：作者想在自己的作品中说什么？他能做到这一点吗？最后，为什么他在这一点上取得了成功或遭到了失败？后一个问题对观众来说意思不大，但对艺术家来说却是首要的。它揭示了作者创作的秘密，并成为其他所有人的榜样。

……

No03917

利布松等建筑学家致赫鲁晓夫的信

(不晚于 1954 年 12 月 14 日)

致苏共中央书记

给您写信，是因为我们在下面所叙述的事情中力求整顿秩序的一切尝试都未能取得积极的结果。

自 16 世纪起，就在我们首都保存下来的极其丰富的建筑遗产是社会主义莫斯科的骄傲。在建筑文物国家保护处登记的就有约 1000 座由俄国建筑师几百年来创作的建筑群和建筑文物，但是这些建筑物的保护和修复事务却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况之中。

仅仅在克里姆林宫内和对某些个别建筑物进行过认真的修复工作，而构成 16~19 世纪莫斯科建筑风貌的大多数建筑物，由于使用这些建筑物的承担人恣意妄为地改建和维修不当，已经被丑化得面目全非，无法辨认。

其中有许多已经破败不堪，使人们看到这些原先真正的艺术作品时，会以为所有这些建筑物是一些即将清除的垃圾。看来，莫斯科市执委会的许多领导工作人员所具有的就是这样一种平庸之极的眼光，不然很难解释：他们不但对于首都的文化遗产如此漠不关心，而且还容许莫斯科市执委会机关长期地粗暴违反苏联部长会议 1948 年 10 月 14 日“关于保护文物”的 3898 号决议。

不用说数以百计的单个建筑物了，甚至连占据城市整片街区的

庞大建筑群，也不仅没有丧失^①自己最初的建筑风貌，而且它们的个别部分就在我们眼前被人肆意毁坏。作为例证，我们可以指出巴夫洛夫医院（市立第四医院）^②、陀思妥耶夫斯基医院^③、亚乌扎“医疗卫生工会”医院^④，以及原“高山”医院（契卡洛夫街）^⑤的园林设施。

极其稀有的“莫斯科巴洛克式”文物之一的“费里村的圣母节”教堂^⑥的建筑物已经到倒塌过半，而这是17世纪末俄罗斯建筑艺术的不可逾越的典范。

瓦·伊·巴热诺夫^⑦在宫苑建筑群^⑧中建造的精美建筑物已经陷于不堪入目的境况，以致在其附近竖立起一个个警告牌，写着“正在倒塌，有生命危险！”而与此同时苏联科学院和莫斯科市执委会花费了整整10年时间竟未能解决这样一个争论：究竟应该责成哪一个部门来负责保护和修复这一座美妙无比的建筑群。

① 原文如此，显系“丧失了”之误。

② 巴夫洛夫医院，19世纪初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遗迹。1802~1807年按照M.Φ.卡扎科夫建筑师的设计建成。当时是市立第四医院。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医院是1803~1805年根据A.米哈依洛夫（大剧院建筑的作者之一）的设计建筑的，建筑上配合相称的古典主义风格。1821年Φ.M.陀思妥耶夫斯基诞生在西侧的厢房中。

④ 亚乌扎医院，医疗卫生工会市第23门诊医院，是建筑上配合相称的古典主义风格。19世纪的交接期由要塞建筑师M.基谢里尼科夫按照P.P.卡扎科夫建筑师的设计为钢铁工厂主维克斯·巴塔绍夫所建。在1812年的大火中，由于法军统帅缪拉特的司令部设在其中，它的建筑上的配合相称风格完整无损。

⑤ 契卡洛夫街的原“高山”医院的综合建筑是位于亚乌兹河岸上乌萨切夫-奈焦诺夫庄园的建筑，1829~1831年建成，是Д.И.瑞梁尔基建筑师优秀创作之一。

⑥ 费里村的圣母节教堂，1690~1693年为Л.К.那雷什金建成。“莫斯科的巴洛克”风格。

⑦ 巴热诺夫，建筑师，俄国古典主义的奠基人之一。

⑧ 1776~1785年巴热诺夫在此建筑了古典式的贵族公园。1786年，卡察科夫拆除主宫重建。现在是历史建筑博物馆所在。

莫斯科郊外几十处建筑文物或者处于半倒塌状态，或者完全损毁殆尽，其中包括马·费·卡扎科夫的一系列建筑物（如彼得罗夫斯科耶—阿拉比诺）。

可以绝不夸张地说，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整顿莫斯科市保护和修复建筑文物的事务，那么我们不久就要失去许多在数百年中经受过时间考验的杰出建筑作品。

必须着重指出，研究俄罗斯建筑文物是对当代的实习建筑师进行经典教育的课堂，因为前世的大师们善于运用普通的材料、严格选定细节，并采用有限的装饰成分，创造出精美绝伦的建筑作品。

应当承认，现行的建筑文物维护体制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许多建筑物被承租人使用得极不恰当。住宅往往用隔墙分成很小的居室，把内部装饰弄得不堪入目，而且挤进了过多的住户。带有用雕塑和绘画装饰的巨大大厅室的纪念馆，被用作为初级医务人员的集体宿舍（“沙霍夫斯科耶之家”^①——医院广场2号），或者干脆改成住宅（“斯特罗加诺夫别墅”^②——沃洛恰耶夫街38号），而上述建筑物所在的五一区的少先队之家则挤在不适用的房屋内。

苏联部长会议在1948年10月14日发布的第3898号决议中规定，必须在苏联的一系列城市建立专门的修复建筑文物的科研生产工场。在列宁格勒、基辅、塔什干、普斯科夫、诺夫哥罗德、弗拉基米尔以及其他一系列城市，这种工场都已建立起来。而在莫斯科，只是在莫斯科市建筑设计局的研究所之下成立了一个不大的设

① 沙霍夫斯科耶之家——古典主义风格的宫廷式古建筑。1798~1802年由建筑师И.叶戈托夫所建。

② 斯特罗加诺夫别墅，斯特罗加诺夫的住所。19世纪初由建筑师P.P.卡扎科夫建筑，古典主义风格。

计工场，而且没有生产基地。这使工场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实质上也就取消了在莫斯科恢复建筑文物的条件。

只须举出两个数据，便可以说明我们这个工场开展活动的成绩：工场成立4年来，完成了修复50多个建筑文物的设计资料，总施工费用约合200万卢布，但只对其中5个建筑文物真正进行了修复工作，总计修复工作施工费为130万卢布。

工场的所有其他成果动也不动地一直躺在莫斯科市建筑设计局的档案库中，没有在近期内加以落实的任何可能。

莫斯科大部分建筑文物的修复工作是由顺便碰上的一般建筑队进行的，它们没有必要的材料（白石、异型砖等），也缺乏熟练的工匠，而更主要的是不理解科学地修复建筑文物的目的和任务，因此往往只是使文物遭受损伤。

兹举出“国家财政部建筑公司”为例。这家公司对待托付给它的修复卡扎科夫^①的优秀建筑物之一（市民二街51号）的任务极不认真，历经3年时间也没有完成修复工作。

在所有其他场合，每当真正要实现工场的设计时，修复工作总是不能令人满意。

由宗教团体经管的建筑文物，无论在保护还是在修复方面，都比由国家机关负责维修的建筑物要好。这一事实岂不令人感到羞愧。

由于完全缺乏对于修复事务的组织，莫斯科的建筑文物正在遭到破坏。我们这个集体本有责任保证为修复工作提供有价值的技术资料，但我们的工作却徒劳无益地空转着。在修复工作的拨款方面也是一片混乱。根据现行法令，租用建筑文物的收入应列入专项基

^① М.Ф. 卡扎科夫 (1738~1812)，建筑师，俄国古典主义奠基人之一。他的代表作是非力浦总主教教堂。

金，并返还用于修复工作。这笔收入的使用在全国各地都用于规定的专项使用目的，只有莫斯科除外。

首都的建筑业人士在苏联建筑师协会召开的众多会议上，不止一次地指出莫斯科建筑文物修复事务中极端不良状况。但是，要求从根本上改组建筑文物保护和修复事务的内容广泛的决议仍然一直是纸上谈兵。

我们认为，这种状况无法再容忍下去了，因此请求您采取坚决措施对整个建筑文物的保护和修复工作进行整顿。为此，必须首先采取以下具体措施：

1. 责成相应的机关，而首先是大多数建筑文物均在其经管之下的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有计划地对建筑文物进行修复工作。

2. 为保证高度熟练地进行修复工作，组建莫斯科市专门从事建筑文物修复的科研生产工场。

3. 提出将若干建筑文物用于公共社会机构的问题，规定占用的机关和住户有计划地迁出使用不当的建筑文物。

“莫斯科市建筑设计局”研究所
建筑文物修复建筑工场领导人建筑学副博士 В.Я. 利布松

总建筑设计师 А.А. 阿法纳西耶夫、А.В. 奥赫、

Р.П. 波多利斯科耶

副总建筑师 С.Н. 泽菲罗夫

主任建筑师 Д.Н. 库利钦斯基、Л.Б. 齐利、

Н.М. 博加乔娃、Е.А. 杰伊斯特、

菲尔特、Г.К. 伊格纳季耶夫

建筑师 В.А. 日林娜、Н. 华西列夫斯卡娅、

А.В. 伊利英科娃、Е. 扎沃龙科娃、
Л. 涅纳格列亚德金、И.И. 卡扎克维奇、
И.П. 鲁宾、Г.И. 索洛德卡娅
技术员 О.Д. 库兹涅佐娃、И.Ф. 扎伊科夫^①

^① 文件上有批注：“已向尼·谢·赫鲁晓夫同志报告。С. 加夫里洛夫”。

No 03700

普拉斯托夫在苏联艺术家协会列宁格勒分会 讨论会上的发言速记记录（摘录）

（1956年4月19日）

由于经常要坐在各种各样的委员会、展览会里，思想和心灵的情况、美术家奔向最主要目标的高度热情以及摆在我们面前是什么，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对我来说是很清楚的。你们想，在苏联美术家协会代表大会之前我要说什么吗？不，最主要的是首先我们要解决在1957年庆祝展览会之前能够做什么？现在我们事业处于何种状况？

根据自己的经验，一般我多少知道一些，事情很困难、很艰难。怎么给你们说呢？有些心理上的慌乱，有点麻木的情绪，有点原地踏步……

有些人讲：“需要设法搞好物质方面”。现在在进行关于工作室、住房等方面的大辩论，怎样调整画家的工资，使他们在自己的观点、事业方面能成为独立自主的人。

遗憾的是，实践和事实不利于这一理论。我们当中的多数人，非常多的人拥有工作室、一定的生活保障——进行独立自主和新颖思维的必要前提条件。

但是看不到这一点，他们坐着两手一摊——怎么想得出来？这听起来不很好——怎么“想得出来”？谁也不会想出吃饭、睡觉、呼吸空气，这一切都是自然进行的。也不能想出图画，这应该是不由自主地出现、不由自主地产生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都处于某种惊慌失措的状况下。……

这里主要是有什么影响的呢？

我们美术生活发展道路上的一切琐事很难数得清，它们太多。这里有“等级”，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原则的，“隔靴搔痒的”、轻率的批评、“毛毛糙糙”。这也很不好，无冲突论和虚荣起了极为有害的作用。我们放弃研究生活，停止因生活而“发疯”，我们只出产“畅销商品”，“商品”一付款就万事大吉。而且如果有人感到问心有愧（他们说——须知我们这些画家是诚实的人），如果有时我们良心发现——画家想：“今天我要做了这件不好的事，可是我能保证明天画家具有最真实、最美好的事业！……”。而明天来临——仍然是那些需要，意志动摇了。我们就这样落到了今天的地步……

还有一个无情的原因，许多创作力量、许多不稳定的思想家和许多尚未定型的心灵离开了我们的队伍——这就是倒霉的个人崇拜！这一切都过去了，这倒霉的个人崇拜残余，这个虚假的神的残余——它们还会长时间起不利于我们的作用。有人会谈论它们，就像我们说“资本主义万恶的污点”一样，也会长时期说“个人崇拜万恶的污点”。

这一切创造了一种气氛，我们仿佛突然脱离了人民。我们在人民面前的职责一天天增大，人民不再理解我们。我们这样安排自己的“研究”工作，自己的批评，使得人民很难明白：什么好、什么不好，对什么应感到高兴，应为什么流泪。于是人民更多的为现在回想起来都感到惭愧的胡说八道而高兴。而且人民高兴并不是因为他们变得愚笨，而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它们糊里糊涂地、昏头昏脑地接受我们设法使它们高兴，使其生活变得更轻松、温和，帮助他们理清日常生活中忙乱的一切努力。

于是一切积重难返。我们现在带着巨大的负荷完成着巨大的任

务，这些任务我们很久以前就应该承担，而不是在我们开展系列辩论后，讲够应该承担什么、做什么、怎么去做等等之后。

于是，1957年这将是一次考试，将是对人民的态度和人民对我们、党及政府在全新的态度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要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件事，或许要请这些工作人员日夜谈论这件事。

类似1957年展览会这样的事我们该怎么办？需要签订协议吗？这不是简单的、普通的展览会，而是庆典性的。它应当不仅面向我们苏联人民、也要面向全世界那些不能来我们这里的人民。要知道，亿万人在看着我们，在看着1957年俄罗斯人怎样摆脱困境。一些人满怀信心和希望看到，我们有人类期待了几个世纪的无穷尽的力量和希望。而另一部分人在看，共产党人会不会失败，会不会断送自己的事业。你们知道，我们面临的什么样的考试。一方面，关注我们的是希望的目光，向我们伸出的是世界上一切真诚的人援助之手；而另一方面，是反对我们的乌合之众，他们一点也不会同情我们，哪怕我们只犯半点错误。

因此，应当提高我们做什么，感觉什么的责任。我们应当这样对待自己的工作，不仅因为在这一关键时刻，乃至我们经常都应该发狂地、满腔热情地对待艺术问题，而且还因为伟大的事业才能产生伟大的力量，难道我们的事业不伟大吗？要知道我们的语言全人类都能理解。因为用这种语言可以对所有的人讲述我们生活中美好的东西，讲述席卷全世界的运动。

你以为这种责任感是大家固有的，但遗憾的是：并不是一切都是每个人应当理解的按应该做的那样去做的。

这样，我们得到的最初是草稿，然后是原稿。画家想取得预订工作，预订画，他提供草稿。那么是什么样图画的草图？他很喜欢风景，或者说“我想画肖像”。谁的？譬如，挤奶员的。而另一些人描绘的是站着一群姑娘，走着一个带手风琴的剽悍小伙子；第三

部分人画的是《玩雪球》的图画（笑声）。于是大家都这样仿佛是某种业余爱好的、善意的、略识门径的，好像这不是苏联画家的声音，而是决定开心逗乐和顺便获取暴利的市侩的声音（掌声）。结果会怎样呢？我们经常被指责的并不是残酷性，而是我们不提供可能性去展现画家对生活的个人观点。但是思想的独立性和画家的个性，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譬如画家不想描绘这个东西，试问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我个人的事”。但是，要知道这一展览是庆典性的！应该展现政权及人民在我们土地上经营的光荣的第四十年。要展示，这是什么样的人民；展示，他们是怎样向前迈进的，为什么，向什么目标前进。某些人被这些豪言壮语所吓倒，甚至双手在颤抖，怎样用简朴的方法去解决这一点。但是也有我们人民对这一美好将来的许多反应，而且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这些真正的画家仔细地环顾四周，深入生活的话。但这一点还看不出。这样你看到画家提供的草稿上面会有点东西，会有什么呢？我们要问，接下去会怎样？他讲：“我想，将会是这样”。我们说：“谁会给你们钱去支持你们的想法，你们提供的一切本来就很明显。可以理解，因为卢布——这是一定量的数值。这些钱有人赚到，说实话，我们无权付给。”有人说：

——你们不相信我们，请相信画家们吧！

——我们相信，但这需要国家大量的资金。

有才智的人的状况是这样的，它可以和春天来临相比较，它是晚春，我们的艺术也是晚春，但是它一定会到来的。我们是否为迎接它作好了准备？结果是这样的，我们当年要人家个人崇拜，我们现在就应该屏除自己身上所有这些奴颜婢膝（掌声）。

接近人民，走向他们的劳动，与他们同甘共苦，急他们之所需——这要比接近一个个人困难得多。个人无论是什么样的，他身上应积累了荣誉和一切东西、金钱、殷勤批评家体面的文章。他们之

所以这样写，原因是他们需要“给孩子吃奶的钱。”

我们的任务不同——是进行忘我的劳动。我们经常读到“集体农庄庄员的忘我劳动”，“炼钢工人的忘我劳动”以及“艺术家的忘我劳动”。我们真是这样忘我的工作吗？如果我们经过2~3天仍没有增加一点创作才能，心里真的痛苦吗？

我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在我的眼前走过了许多人。我发现，对待职业的、思想的及其他的积累漠不关心的态度导致一个人年老双手颤抖，而他再也不能等待生活给予什么恩赐。而年轻人却还会有许多精力，他们能酷爱一些东西，说“我还来得及，岁月还在前面！”而把时间花在某些粉饰太平的东西或个人崇拜上的中年人应该快马加鞭。……

№03701

法捷耶夫临终前给苏共中央的一封信

(1956年5月13日)

我看不出继续活下去的可能性，因为我为之献身的艺术已被党的自负而无知的领导所断送，现在已无法挽救。优秀的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优秀文学人才英年早逝，余下的多少能创作具有真正价值作品的人，活不到四五十岁。

文学——这最神圣的事业——遭到官僚主义分子和人民当中最落后分子的蹂躏，并从“崇高”的讲坛上，如莫斯科党代表大会或党的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讲坛上，响起了“捉住它”的新口号。那条准备“改变”文学现状的路线令人愤慨：拼凑一帮不学无术的人，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因遭受迫害而无法讲真话的人外，做出完全违背列宁主义的结论，因为这些结论来自伴随同样“棍子”威胁下的官僚主义积习。

我们这一代人在列宁在世时是怀着怎样自由和开拓世界的感情步入文学的，心里充满多少用之不竭的力量，我们创作出并仍能创作出多少美好的作品啊！

列宁死后我们被贬低到了小孩子的地位，被消灭，被意识形态恫吓，这一切还被称之为“党性”。而现在，当一切本可改正时，肩负改正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却是粗浅、无知和无以复加的自负。文学落入平庸、卑劣和爱记仇的人手中。那些精神上仍有激情的人，却处于无权的地位，况且年事已高，不久于人世，心中已无任何创

作欲望……

我为共产主义的伟大创作而生，16岁便同党、工人和农民结合在一起，上帝赋予我以非凡的才华，并充满了只有人民生活才能产生的崇高情怀，人民生活又同共产主义美好理想联系在一起。

但我却被变成一匹拉重车的马，一生都吃力地拉着不计其数的平庸的、不合理的、任何人都能胜任的官僚主义的事务。甚至现在当我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回忆落到我头上的多少吆喝、训斥、教训，还加上众多的纯粹思想意识罪过，简直难以忍受。而我本应是我国优秀人民引以为荣的人，因为我具有真正的、渗透共产主义的天才。文学——这一新制度最大的成果——已被贬低、被戕害、被断送。那些伟大的列宁主义的暴发户的洋洋得意，甚至在他们对伟大的学说发誓的时候，他们的自负就已背离了伟大的列宁学说。这导致了我对他们的不信任，因为他们将比暴君斯大林更恶劣。斯大林还算有知识，而这些人则不学无术。

作为作家，我的生命失去任何意义。于是我很愉快地摆脱这个丑恶的社会，有如离开向我泼卑鄙、谎言和诽谤脏水的世间。我就要离开这一世界了。

最后希望告诉那些管理国家权力的人，已经等了3年，无论我怎样请求，他们甚至不接见我。

请将我安葬于母亲墓旁。

亚·法捷耶夫

1956年5月13日

No03702

雷特海乌在第一次北方作家 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摘录）

（1961年3月21日）

……同大多数同志一样，我也是通过在国家教育出版社发表的一些译作步入文学领域的；在翻译俄罗斯和苏维埃诗歌的同时，我也试着写了几首小诗。我自己无法评价这些诗的优劣，但实际情况是，它们都被发表了，其中一些甚至还被收入楚科奇语的中小学阅读文选。

就这样，我的创作道路一下子就从文选开始了。一般讲，其他许多民族的文选中收录的都是全民族公认的功勋作家的作品，而北方各民族在这一方面却有一个特点：我们中间大多数人都是在不同语言的文选上开始发表作品的。

发表了几首诗以后，我写了两三篇短篇小说。但很长一段时间不敢投向任何一家出版社。我自己明白，这些小说还不完善，还不是我所希望的样子。我很想找位俄罗斯作家请教，并给他一份自己逐字逐行加了译注的文稿请他译成俄语。

我至今一直怀着真挚的感谢与尊敬回忆那些与 A.C. 斯莫良合作的岁月。我是偶然在《接班人》杂志编辑部遇到他的。他接过小说并说，他试着翻译。过了几天他就把小说寄给我，上面满是涂改之处，还附上了一份让人不怎么愉快的评论和小说尚需要加工的结论。

我埋头苦干了相当长的时间，满心希望这下会得到他的夸奖。

谁知道，他又把稿子退了回来，而且这一次的批评比第一次还多。这样反复了五六次。在我进行了多次改动之后，他着手将小说译成俄语。

应该说，与翻译编辑之间的这种工作方式就是我希望我们许多北方作家应经受的锻炼。但遗憾的是，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斯莫良这样的人。这次合作与学习使我在几年后就能够独立把自己的作品翻成俄语了。

的确，当我的头几篇小说发表在《新世界》杂志上时，一些搞文学的同志怀疑是我的作品。当时甚至很受尊重的作家机关报仿佛也进行了侦查。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不断地盘问我，有多少是我写的，又有多少是斯莫良写的。甚至一位记者到我那里，故作聪明地对我的手稿乱翻一气，当然，他是一窍不通。

（主席：这真是乱弹琴！）（礼堂中笑声）

幸运的是，当时的编辑西蒙诺夫制止了这种迫害。但是，事后我还是不能不怀着一种不愉快的心情回忆在《文学报》密切注意下度过的那些日子。……

我们楚科奇人以及其他北方各民族没有自己的经典文学，我们不得不在一片空白上创建文学。毋庸置疑，我们拥有丰富的、让人感兴趣的民间文学，许多人也建议我走这条路子，在创作中运用几百年积累起来的这一经验。而我觉得，当代不能走这条狭窄的道路，应当学习民间文学中的民间艺术创作成就。但是，由于我们的民间文学起源于原始公社制度，所以我感到，用几百年前形成的世界观来看待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生活是根本不行的。这必然会导致作品如同幼儿痴语和五岁稚童对宇宙构造的议论。

这些想法促使我求助那些只要识文断字就能获取的巨大文学财富：我们的苏维埃文学和丰富多彩的俄罗斯文学以及世界文学中的精品。

盲目摹仿这些文学和这些作品也是不行的。

这里要解决语言问题、风格问题，特别是人物语言问题。

谁读过描写楚科奇人的作品，谁就会发现，其中人物讲的既不是俄语，也不是楚科奇语，而是某种特别的、臆想出来的语言。

这个秘密我是在有一天读完一本描写石器时代人的生活的书后发现的。我一开始读这本书就发现：石器时代人物的语言和楚科奇人物语言是一样的。

（主席：正确）

我一开始写作就下定决心绝不臆造一种介乎楚科奇语和俄语之间的语言，如果我的译作中的人物开始说俄语，那么就要让他讲正确的俄语，不能为了迎合某些人不怎么高的口味而使语言走样。

《楚科奇民间史诗》一书创作了3年。它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被译成世界上多种语言，特别是在英国出版的行情很好。英国一家很有影响的报纸发表了长篇评论，对此书大加赞扬，但在最后作者却批评说：各方面都很好，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天才作品；但不好好的是，史诗作者运用了有缺陷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

（礼堂中笑声）

这样我明白，自己站在了正确的立场上。

写完《楚科奇民间史诗》之后，我就开始实现自己的夙愿：写一个描写自己同时代人的书——即生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楚科奇人，对他而言全部生活是认识世界。这本书起名为《融雪时节》。创作进行得很艰难，以至于我经常怀疑自己的能力。当时我和斯莫良的创作合作已经结束。我们决定，此后我将单枪匹马的干。这本书我写了又写，反复修改了好几次。

当时我曾答应把这本书交给《十月》杂志。他们不断催我交稿，使我不得安宁。1958年4月的一天，当我顺路走进《十月》

编辑部时，手稿简直就是被从手中夺走。它甚至没有校对，还缺最后两章。我想，稿子在他们那儿，在他们找到人来审阅以前，我还来得及再另写一遍。第二天我要飞到马加丹，编辑部里的人告诉我，稿子已交给抱病卧床的费·伊·潘菲洛夫去审阅了。我心里很不安，告诉他们，手稿还没写完，它对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康复起不了任何作用。但我别无选择，只好怀着一颗不安的心去出差。

一到马加丹，我就收到了潘菲洛夫的电报。他在电报中写道，怀着极大的兴致读完了全书，感谢对本民族的热爱，我们将在6月号上发表……

写完《融雪时节》一书后，我在马加丹州的报社工作了两年。虽然没有人告诉过我，但看得出来，我在报社不是个很好的工作者。但在那儿的种种经历对我而言是一笔极大的财富。在那两年中我走遍了楚科奇，很少呆在马加丹。我到过弗兰格尔岛、杰日尼奥夫角、施密特角，去过鹿苑集体农庄，到过最近几年才发现的部落。这些部落避开苏维埃政权，悄无声息地在雅库特和马加丹之间过着游牧生活。当政府开始注意到他们时，他们就离开这个地区；而当政府在那里找他们时，他们又迁往另一个地方。

（礼堂里笑声）

在这两年中，我亲眼看到整个楚科奇简直是面目一新了。那里新建了一大批大的现代工业企业，在极圈以北建了一个大型的联合企业，它的车间有创作之家那么大！这是一些用现代技术装备起来的企业。

现在，那里的农庄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农庄了。事情是这样的：当年那里只是形式主义地推行了集体化。当我还在上中学时，分配猎物仍然沿用千百年来原则：即一切都是平均分配，不能分割的那部分则按顺序分配。在分配之前，先将15%上缴农庄财政出纳处，然后将猎物自行分配。现在农庄里已经不存在这种无人负

贵的现象了。各农庄在确实提高生产效率，出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新事物。其中就包括，改用从反坦克武器装备上拆卸下来的枪代替步枪射鲸。如果过去杀死一头鲸需要300发子弹，那么现在一两发就足够了……

为了展示北方的工业化开展……我开始写一部新的长篇，并预计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来完成。这部小说写得从容不迫，而它也不好写，因为在今天看来是成就的东西，明天就会过时。然而我还是不得不很费力地去创作它……

今天开幕的这个代表会议对北方作家的创作将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因素。根据个人经验，我想对作家们说，我号召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不要沉溺于过去，尽管它曾经很有特色。应该更多的朝前看，在今天的生活中寻找那种现在还是幼芽，但将来终会开花结果的新事物。

№03262

米哈尔科夫就讽刺剧《给自己树碑》

致福尔采娃的信

(1959年12月27日)

致苏共中央

苏共中央书记叶·阿·福尔采娃同志

尊敬的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

麻烦您是为一个对我极为重要的具有原则意义的问题。

莫斯科讽刺剧院今年上演了我的讽刺喜剧《给自己树碑》。莫斯科的戏剧界和作家们，以及《真理报》、《共青团真理报》、《文学报》、《文学和生活》、《莫斯科晚报》、《苏维埃文学》等报纸和《星火》杂志都发表文章给予我的喜剧以肯定评价。撰写此类文章的有苏联人民演员伊·伊林斯基、评论家 Б. 埃尔斯贝格、Ю. 博列夫、В. 加拉诺夫、В. 弗罗洛夫等。

许多党和社会活动家，其中包括 С.Д. 波利扬斯基、А.И. 阿朱别伊、А.Н. 库兹涅佐夫（苏联文化部副部长），都亲自向我说了对我的作品的肯定的意见。这一切使我有根据认为，我从事讽刺剧工作是为社会作需要和有益的事。

今年3月22日《真理报》评论我的喜剧时写道：“新的喜剧有力地揭示出，现代条件下小市民习气的实质是什么。它揭露了这样一个小市民，他在我们今天的共同社会生活中千方百计地苟且偷安，而这在我们这充满英雄业绩的时代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不能容忍。”

在所有这一切之后，怎样让我来认识苏共新西伯利亚州委书记利加乔夫同志的公开言论呢？他在市的创作工作会议上称我的喜剧是“别有用心的，给我们的生活抹黑”的剧本，并且赞许州剧院集体似乎“自行”从保留节目中删去了这一个错误而有害的剧目！

利加乔夫同志的观点在新西伯利亚两家报纸：《苏维埃西伯利亚》和《新西伯利亚晚报》上公诸于众。我的剧本就这样被当众毁掉了，我想，州剧院很长时间不会对讽刺剧表现兴趣了。

我以为，党的领导干部的这类言论不会促进我国喜剧艺术的发展。奇怪的是，在《真理报》等苏维埃和党的报纸对我的作品作出完全另一种评价之后，苏共州委书记竟会有这样的言论。而这种做法同赫鲁晓夫同志关于讽刺剧在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作用问题的发言又是多么不协调。

如果利加乔夫同志不是像新西伯利亚这样大城市的苏共州委书记，我肯定不会对他个人的观点如此重视。

致以敬意

谢·米哈尔科夫^①

向您祝贺正在来到的新年！

1959年12月27日

^① 米哈尔科夫，苏联作家和社会活动家，苏联科学院院士，生于1913年。创作有许多诗歌、寓言、讽刺喜剧和儿童少年剧。从1962年起，主要编辑讽刺电影杂志《灯芯》。

№11750

卡兹明关于《给自己树碑》评价问题 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0年1月11日)

苏共中央

作家谢·米哈尔科夫抱怨说，苏共新西伯利亚州委书记利加乔夫同志在1959年11月新西伯利亚创作人员会议上讲话中，说喜剧《给自己树碑》是给我们生活抹黑的逗笑取乐的剧本。

利加乔夫同志就这一问题的发言，由《苏维埃西伯利亚》和《新西伯利亚晚报》在报道会议的消息中加以披露。

苏共中央俄联邦科学、学校和文化部认为，讽刺喜剧《给自己树碑》存在一些个别的缺点，特别是正面人物塑造得相当薄弱，但是如果把谢·米哈尔科夫的这部戏划入给我们的现实抹黑的作品之列则是不正确的。

戏剧界和报刊给了谢·米哈尔科夫的喜剧《给自己树碑》以肯定的评价。

就这个问题已对利加乔夫同志进行了相应的解释。

回复也告知了谢·米哈尔科夫。

苏共中央俄联邦科学、
学校和文化部部长 卡兹明

1960年1月11日

№03703

索尔仁尼琴致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一封信

(1967年5月16日)

鉴于不能在大会上发言，我请大会讨论如下问题：

1. 我国文学几十年来所遭受的令人再也无法忍受的、同时作协今后也不能容忍的来自书报检查机关方面的政治压迫。

宪法中没有规定的、因而也是非法的、任何场合未公开提及的书报检查，正在“报刊保密检查总局”这一模糊不清的名称下统治着我们的文学，使不懂文学的人对作家横行霸道。书报检查制度作为中世纪的残余几乎在苟延残喘、举步艰难地跨入21世。它虽然腐朽，却想把不朽的时间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把有价值的书从不成体统的书中剔出来。

我们的作家实际上没有，同时也不被承认有权对人和社会的精神生活发表超前见解、对我国许多社会问题或饱经忧患的历史经历阐述个人观点。

那些原本可以表达出成熟的民族思想，能够及时、有益地影响民族意识的发展或人类精神生活的作品，被书报检查机关用一些吹毛求疵、自私自利、对人民生活而言目光短浅的意见宣布为禁书。

今天，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作家的优秀稿件被编辑部拒绝采用，只是因为它们“不被通过”。作协的许多成员都知道，他们自己是怎样经不住书报检查的压力，而在自己作品的结构、主题上做了让步；对其中的一些章节、段落、语句作了改动，增添了一些毫无特色的标题。仅仅为了使作品能够问世，从而无可挽回地歪曲了

作品。根据可以理解的文学特性，所有这些歪曲对天才作品是有害的，而那些没有天分的人是完全感受不到的。以失真的面孔问世的正是我国这一部分优秀的文学作品。

然而，书报检查机关的帽子（“意识形态上有害的”，“有缺陷的”等等）本身也是寿命不长久的、多变的，在我们眼前不断地变化。甚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世界文学的骄傲，一段时间内在我国也被停止出版（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出版），从中小学教学大纲中被删掉，成为很难一读的书籍。遭到辱骂多少年的叶塞宁被视为“反革命作家”，甚至有人因为读他的书而遭监禁。马雅科夫斯基不也曾一度是“无政府主义的政治流氓”吗？几十年来艾赫玛托娃的不朽诗篇也一直被归入“反苏维埃的”一类。10年前，光彩照人的茨韦塔耶娃给人羞怯的第一个印象被宣布为“一个不可饶恕的政治错误”。只是在晚了二三十年之后，才把布宁、布尔加科夫、普拉托诺夫还给了我们，现在轮到曼德尔施塔姆、瓦洛申、古米廖夫和克柳耶夫了。总有一天，也不得不“承认”扎米亚京和列米佐夫。这里关键是不受欢迎的作家的死亡，在其死后不久，或是隔一段时间，对其“错误作些解释”，他们的作品就会回到我们中间。曾几何时人们还不能提到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但现在他去世了，他的书就得以出版，他的诗也在各种仪式上多次被引用。

这真应验了普希金那句话：“他们只懂得爱死人！”。

但是，稍后出版其作品也好，对其名字的“解禁”也好，都无法补偿我国人民因为这荒谬的拖延、对文学意识的压制所蒙受的社会和艺术损失（包括一批20年代的作家，如皮里尼亚克、普拉托诺夫、曼德尔施塔姆等人，他们很早就指出了个人崇拜的苗头以及斯大林的一些与众不同的气质。但是，他们遭到了镇压，其意见不仅不被听取，反而遭到了压制。）

在“准许——不准许”，“这个可以写——那个不可以写”的条

框之中文学是无法发展的。那种没有表达其所处时代的社会情绪、不敢向社会转达自己的痛苦与忧患，不敢在需要的时候对将要发生的社会、道德危机发出警告的文学不会取得本国人民的信任。印有这种文学作品的纸张人们不是用来阅读，而是当作废物。

我国文学失掉了它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所拥有的世界主导地位，也失去了那种它在20年代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试验光彩。今天，全世界都把我国文学想象得无比苍白。他们把它想象得要比其实际情况，比假如不受限制和折磨本可以展示出来的状况更简单、更贫乏。我国文学因而在全球舆论中声誉扫地，世界文学也因之受到了影响。即使世界文学因为有了我国文学这颗酸果，并因为我们的精神阅历而变得更加深刻，那么整个世界文艺发展的走向也就可能不同，可能会获得又一个新的稳定，甚至可能会达到一个新的艺术水平。

我建议代表大会接受我的要求，取消对文学作品的一切检查：公开的和隐蔽的，把出版者从为每一个印张而负责中解放出来。

2.……作协对其会员应尽的义务。这些义务在作协的章程中没有清晰、明确的表述：有“保护著作权”，“保护作家其他权利”的一些的措词。然而，三分之一世纪令人失望地表明，作协既没有保护其会员的“其他”权利，更没有保护受压制作家的著作权。

许多作者生前在报刊上、讲台上受到了侮辱和诽谤，对此他们没有得到辩护的可能，不仅如此，还受到了排挤和迫害（布尔加科夫、艾赫玛托娃、茨韦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佐申科、普拉托诺夫、A. 格林、B. 格罗斯曼）。而作协不仅没有为他们在自己的出版物上提供篇幅进行答辩，不仅没有为他们辩护，相反，其领导人甚至始终是迫害他们的头号人物。成为我国二十世纪诗坛骄傲的名字从作协的名单中被删除，或者根本就没有被接收。更有甚者，作协领导还胆怯地把许多遭到流放、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甚至被迫害

致死的作家弃于患难之中而不顾（И. 瓦西里耶夫、曼德尔施塔姆、А. 韦肖夫、皮里尼亚克、巴别尔、塔比泽、扎布洛茨基等等）。这一名单我们不得不以“等等”二字而中断，因为党的二十大之后我们得知，被作协顺从地关进监狱、集中营的无辜作家有600多人。但这一名单还要更长，长得我们现在读不完、将来也难以读完，因为有许多我们偶而从私人访谈中才能够获知的年轻诗人、小说家的名字也在其中。他们的天分尚未充分展示就凋败在了集中营里，他们的作品也未出过亚戈达—叶若夫—贝利亚—阿巴库莫夫时代国家安全部门办公室的大门。

新选出的作协领导人完全没有历史的必要性与前任领导一起为过去承担责任。

我建议在作协章程的第22款中明确表述，作协将保证为自己遭受诽谤和不公正迫害的会员提供所有的保护，保证杜绝违法现象的再度发生。……

当然，我感到心安理得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完成自己的写作任务，在坟墓里会比活着更成功，更不容置疑。谁也阻挡不了真理的道路，为了真理的实现我也准备接受死亡。但是，或许许多教训会教会我们，只要活着就不会放下作家的笔。

这还从未给我们的历史增添光彩。

【专题说明】

象棋冠军与苏共中央的齟齬

(1954年5月至1984年6月)

米哈伊尔·莫伊谢维奇·博特温尼克是苏联著名的象棋手，曾5次获世界冠军。1954年5月，他把一封信和自己的一篇文章《如果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在西方是否可能？》寄给当时的苏共中央书记彼·尼·波斯佩洛夫。博特温尼克在信中申明自己“是一个不怎样的政治家”，“自己的理论”是“不像样子”的。文章的主要观点是对斯大林关于新的世界大战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的论断表示怀疑。他认为，新的世界核战争将给人类带来严重灾难。应该寻求在不爆发世界大战的条件下的西方社会主义革命。他建议，西方共产党在其纲领中要保证给小资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保留一部分收入，以便挖掉垄断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造成西方革命的条件。博特温尼克的想法是在斯大林去世后苏共新领导提出新的和平方针的背景下产生的。从文章的内容看，并没有完全脱离斯大林理论的框架，算不上什么异端邪说。可是，在当时只有党的最高领导才能提出和发展理论的定规下，一位象棋冠军竟探讨起国际共产主义发展道路的大问题，显然被认为不守本分。

6月19日，波斯佩洛夫把他收到的信及文章连同他就此问题向中央的一份报告转给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和中央书记苏斯

洛夫。波斯佩洛夫在报告中批评博特温尼克“实质上发展了自由派和平主义为了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与帝国主义妥协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提出把作者叫到中央宣传部去向其说明意见书的反马克思主义性质。而且还说，如果博特温尼克坚持自己的观点，就不能留在党内。从博特温尼克同年12月27日致波斯佩洛夫的第二封信可知，波斯佩洛夫曾亲自向博特温尼克转达了“中央的意见”，而且涉及的内容要比上述报告中提到的还多。博特温尼克在第二封信中虽然表示感谢对他“所犯错误进行耐心解释”，但实际上继续为自己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辩护。

大概由于当时已处于“解冻”的环境下，博特温尼克又有着世界冠军的头衔，本人似乎并未遭到严重的政治打击。后来他仍参加了象棋人工智能的研究和设计，国家还为此成立了一个研究机构。1978~1979年博特温尼克同苏共中央的信件交往主要是围绕该研究机构设计的“先锋”程序应不应该拿到国外先进计算机上去存储和调试。博特温尼克给这时的苏共中央书记米·瓦·齐米亚宁致信，提出自己的要求，并申述了把“先锋”设计拿到国外去的理由。党的最高层以这样做会使苏联在国防上受到损失而否定了他的建议。苏共中央科教部还为此召开了一次专家会议。

到了1984年，国家安全委员会向苏共中央通报，在举行世界电子计算机象棋冠军赛时，博特温尼克同从苏联迁居到以色列的原苏联公民法因贝格的谈话中“表述了一系列诽谤苏联象棋流派的观点”。齐米亚宁便向中央宣传部长斯图卡林下达指示，要使博特温尼克“遵守规矩”。斯图卡林向中央报告说：考虑到博特温尼克的行为和我们思想上的敌人对此表现出来的不正常的兴趣，我们认为今后应该限制他出国。

博特温尼克无疑是一个想有所作为的人。他不仅成为著名的世界象棋冠军，在人工智能象棋竞技的研究上也有自己的建树，而且对外交和科技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样的人才应该说是可贵的。可是，他和苏共中央之间却经历了长达30年的龃龉。这一组文

件所反映的并非重大历史事件，但仍然可以作为理解某些实质性问题的参考。

(本专题文件由杨存堂编辑和校注，
邓莹翻译)

No 05853

博特温尼克致波斯佩洛夫的信

(1954年5月29日)

致彼·尼·波斯佩洛夫同志^①

尊敬的彼得·尼古拉耶维奇！

有时一些很差的象棋手带着自己的理论“研究”去求教于象棋大师。这些研究即便是用最宽容的态度来看待，通常也是不像样子的。

我自知我完全是一个不怎么样的政治家。鉴于您宽容大度，如果您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有时间的话，请您看一看下面这些文字。

致以真诚的问候

M. 博特温尼克

《如果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 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方是否可能？》

迄今为止每次世界大战都以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而告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在俄罗斯爆发了1917年十月革命。同样，这种情况也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1949年间的中国、波

^①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波斯佩洛夫（1898~1979），院士，1953~1960年苏共中央书记。

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和东德。

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能不以帝国主义的彻底垮台，即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告终。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大战紧密相连是因为“战争以其悲惨性引发无产阶级起义”（列宁）。在这一方面，即悲惨性这一方面，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的话）将是无与伦比的。物理学最伟大的发明核子反应秘密的揭示，目前正被应用于军事。在这里应当指出：物理学取得了飞速的发展，正如杜勒斯^① 1953年秋天在联合国全体大会上的声明中所说，物理学家们发明的手段，在进一步发展中就足以能够使人类从这个星球上被消灭。此话无人反对，看来，它接近真理。

正因为如此，各国人民对战争的仇恨就是可以理解的了。格·马·马林科夫同志说：“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不让千百万人流血的愿望是神圣的。”他的话表达了全体苏联人，也不仅仅是苏联人的心声。

当然，我们共产党人，所有苏联人都坚信，如果帝国主义一旦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必将以帝国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阵营的胜利而告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考虑到，正如斯大林指出的那样，这场战争会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爆发，而不是在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但社会主义阵营（如1941年的苏联）仍然会被卷入战争，尽管它的政策是爱好和平的，战争将席卷全球。到那时战争显然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

所以，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方能否发生（而是要知道只有发生这场革命，才能消除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是

^① 杜勒斯（1888～1959），1953～1959年任美国国务卿。

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弄清楚，资本家们是采用什么途径来阻碍革命在西方发展的则是不无益处的。

1. 垄断资本家们的反革命计划。

帝国主义都具有双重面目。帝国主义的野兽嘴脸是面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将在那里掠夺的资源用于本国人民，从而给自己保证一个后方社会基地，这就是帝国主义面向宗主国人民的“文明”面目。所有这些在列宁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问世后已成为最起码的常识。

为了佐证，可以列举不久前《真理报》上公布的一些数字（扎·奥尔洛夫《在追求最高额的资本利润中》，《真理报》1953年10月1日）。“杰涅拉尔·莫托尔斯”公司1952年在美国国内投资的利润率是19%，而在国外投资的利润则达94%；“斯坦达尔德·奥伊尔”托拉斯1952年从每一个美国工人身上取得3036美元的利润，而从每一个委内瑞拉的工人那儿却取得了13950美元的利润。这是多么有说服力的数字！

目前垄断资本家是怎样准备维护自己的帝国主义家园，防范可怕的敌人——革命的呢？看来，是利用核战争或者受环境的制约利用核战争的威胁。他们用军事基地圈来包围社会主义阵营：他们妄图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封锁我们的阵营。这些，以及其他一些基地是用来（或者是应该用来）牢牢控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还控制宗主国（例如，法国和意大利）那些从革命的角度看不可靠的人们。为了所有这些目的建立一些军事联盟——“大西洋同盟”、“太平洋同盟”、“统一的欧洲”——这些联盟的实质是超民族的警察部队。

这是小型计划，而大计划，显然是在有利时机（政治和军事方面）进攻社会主义阵营，不惜代价摧毁这个阵营，以确保帝国主义的长期存在。

的确，在大型计划方面在西方资产阶级中也有很多的反对者，——一般的核战争，哪怕是局部的与社会主义阵营的核战争终究是一件危险的事。需要说明的是，小型计划实施也远不是那么顺利，因为资本主义阵营因内部矛盾四分五裂。尽管如此这些计划看来是存在的，并且垄断资本家们正致力于使之付诸实施。

2. 如何孤立垄断资本家？

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方要取得成功，就非要孤立垄断资本家不可，非要使他们脱离其宗主国的社会基础，必须要使小资产阶级和受小资产阶级影响的无产阶级摆脱垄断资本家的控制，这也是最基本的道理。弗·伊·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把被资产阶级愚弄的小业主和多少处于小资产阶级生活条件下的千百万劳动人民从资产阶级那儿争取过来。”要在宗主国里实现这一点是尤为困难的，但看来又应该朝此努力。

怎样使小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摆脱垄断资本家？怎样能够让小资产阶级关注社会主义变革的前景呢？

当说到任何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时，如果对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的阶层感兴趣的话，那么要解决无产阶级的同盟军的问题，就必须用将土地分给农民的办法来解决——在这些国家里农民阶级占人口的多数，绝大多数。

显然，在那些宗主国里应该使占人口极大多数的中间阶层在物质利益上对社会主义革命产生兴趣，似乎别无它途。不妨让我们看一看英国的共产主义者是打算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

英国共产党的纲领《不列颠通向社会主义之路》中载明：

“小商人和小企业家跟农村地区的小土地所有者一样，将从垄断资本的限制中解脱出来，这一新的条件将使商品流通得以增长，他们将从中获取经济利益。”

仅此而已，英国共产党没有再给小私有者允诺什么别的。如果

有人提醒说这个纲领中也宣告股票作废，而在英国股票的少量持有者也不少（弗·伊·列宁曾援引西门子在 1900 年德国国会上所说的，“1 英镑股票是不列颠帝国主义的基础”）。这样，总的说来，这个纲领没有明确区分小私有者和大资本所有者，那么是否应该对英国中间阶层对共产党一直持怀疑态度，而把他们的选票投给保守党人和工党感到奇怪呢？

这样一来，1) 明确什么是“小私有者”是有好处的，而 2) 在小私有者间的按照财产（股票、房产、企业等等）的形式来进行区分未必是合适的，如果我们想吸引中间阶层站到工人阶级这面来的话。

当然可以从各种角度给“小私有者”这个概念下定义；现在我们只从孤立垄断资本家和革命的胜利这个角度关心这个问题，那么“小私有者”的含义是：“小私有者”应该占到完全或部分靠别人劳动生存的人们，也就是那些财产将被没收的人的十分之九。那么如果这类的“小私有者”，十分之九的资产阶级能被吸引到革命方面来或是使他们保持中立，那么，帝国主义者的事情，显然，就将糟糕了！

这样一来，划分小私有者和大资本所有者的最高资本界线已大体确定。怎样在经济上使“小私有者”对革命感兴趣呢？

看来，只有通过一条途径才能做到这一点。即在革命胜利之时保障他们的非劳动收入。正是收入，而不是利润也不是股息。卡·马克思将剩余价值分为两部分：1) 满足所有者个人需要的那部分收入，2) 剩余价值中转为资本而进入社会经济的那部分收入。这样一来是不是应该将“小私有者”收入的第一部分，也就是他们日常消费所用的那部分保障给他们呢？

特别是，随着军事支出的减少和国民收入的增长（比如，军事支出每减少 10% 就增加 1%；人均国民收入每增长 1 倍就增加

5%) 逐渐保证增加这部分收入的数目是有好处的。这样一来, 这些中间阶层就会站到工人阶级这方面来, 支持共产党, 那么垄断资本家就会被孤立起来。

必须指出的是, 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革命方面的转变就使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情绪问题, 也就是说, 从无产阶级的落后方面转向革命方面的问题迎刃而解。

大概, 在这里回顾一下弗·恩格斯的一段精彩论述是适宜的:

“我们没有使之成为无产阶级的农民以及被吸引到我们方面来而仍保持原身分的农民数目越多, 社会变革就越迅速越容易地实现……——在这一意义上为了农民的利益而不得不以社会资产中付出的那些物质损失, 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角度被认为是扔掉的钱财, 而同时, 这又是资本的巧妙利用, 因为他们可能保存着用于社会变革要付出的十倍的钱数。在这一意义上, 可以说我们对待农民是非常慷慨的。”

这些话写于 1894 年。如果这是将农民换作是小资产阶级, 那么难道不适用于当前的英国 (也包括整个西方) 吗?

3. 革命在西方不通过战争是否可能实现?

现在可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应该考虑到, 即使是能够使大资产阶级失去其社会基础, 这还并不意味着使人类避免了核战争的威胁。大资产阶级当然不会同时在所有的宗主国都失去他们的社会基础。当形势变得对垄断资本家具有威胁, 在一二个大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将被推翻时, 毋庸置疑, 垄断资本家就试图采用原子弹, 他们只是不得不这样做。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弗·伊·列宁的话来解释一下:

“……被打倒的剥削者……投入战争为的是夺回失去的‘天堂’, 为了他们曾经甜蜜生活的家, 而现在‘平民恶棍’却要使这

个家破产和贫困（或是导致‘普通劳动’）……”。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帝国主义者在职务关头会使用原子弹，虽然核战争在资产阶级内部也存在着反对者。

这里好像没有走出僵局的出路。是的，如果不妥协，是没有出路的。这里提出一个问题：一般说是否容许和帝国主义者这样臭名昭著的强盗妥协呢？

关于这个道理，弗·伊·列宁是这样说的：

“妥协折中是存在的。该善于分析情况以应付每一个妥协或是每一个变相妥协的具体条件。应该学会区分不同的人，有的人给强盗们金钱和武器，为的是减少强盗们的罪恶和减少强盗们捕获和射杀的行为，有的人给强盗们金钱和武器，为的是参加瓜分强盗们的赃物”。

的确，弗·伊·列宁补充道，“在政治中远远不总是像小孩子算算术那样简单。”但是很显然，妥协是容许的，问题只是这种妥协结果是什么？

如果妥协能够使人类避免核战争并且走向革命的胜利（不通过战争），那么，这种妥协不会遭到反对。

我们已经清楚，为什么垄断资本家们会发动核战争——这场战争对他们似乎是必需的。那么能不能将垄断资本家们置于他们没有必要进行核战争的条件之中呢？

如此看来，不应从资本家们手中夺出他们的全部“天堂”，使他们的家庭失去甜蜜的生活，等等。如果现在垄断资本家将侵占的剩余价值（收入——马克思语）中的一部分用于自己的生活必需，那么是否应该给他们保留收入的一小部分（比方说，25%），使他们不再认为必须进行核战争呢？

不无有趣地注意到，英国共产党的纲领中也预先提出支付部分补偿费给“那些对人民政府奉公守法”的私有者。资本家们是精明

人，他们会把这种没边没沿的允诺看作是要滑头或是一种宣传手段。所以如果给他们保障保留其收入的25%（换句话说，是用25戈比顶十卢布“买”他们的行将垮台的产业），并将这些写入党的纲领的话——那么他们会接受这一务实的建议，并且在出现革命形势的情况下，垄断资本家看来是不会使用原子弹的了。

我认为，如果在革命后给小资产阶级保证（在西方国家）保留其百分之百收入，而给大资产阶级保留其收入的一小部分的话，那么就能够在人民中孤立垄断资本家，使人类避免核战争的灾难，为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方的尽快实现而创造条件。

M. 博特温尼克

1954年5月

No 05855

波斯佩洛夫关于博特温尼克所犯错误 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4年6月19日)

苏共中央：

世界象棋冠军共产党员 M. 博特温尼克同志给我写了信并寄了题为《如果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方是否可能？》的“意见书”。M. 博特温尼克本人承认自己“是一个不怎么样的政治家”，并且看来他对于自己看法的正确与否不很确信，实质上他发展了自由派和平主义为了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与帝国主义“妥协”的这一反马克思主义观点。M. 博特温尼克并不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即帝国主义者追求最高的利润和对全世界的统治，他表达了幼稚荒唐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能不能将垄断资本家置于他们没有必要再进行核战争的条件之中呢？”为了不使资产阶级被社会主义革命吓倒，M. 博特温尼克建议在共产党的纲领中写上保证在革命之后不仅保留资本家从已国有化的企业中所获得的利润，甚至还要保证压缩军事开支来增加这些利润。

M. 博特温尼克的这些“意见”是英国工党类型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映和恐惧资本主义包围的表现。我认为，应该让 M. 博特温尼克到中央宣传部去，并向他说明他的意见书的反马克思主义性质。如果他坚持自己的反党观点的话，那么我认为，他不能留在党内。

彼·波斯佩洛夫

№05856

博特温尼克关于自己的错误致波斯佩洛夫的信

(1954年12月27日)

致彼·尼·波斯佩洛夫同志

尊敬的彼得·尼古拉耶维奇！

首先，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感谢，感谢您的关心，感谢您对我所犯的错误进行耐心的解释。您建议我更深刻地思考整个问题。遗憾的是，我很难在最近几个月内完成您的指示，目前我不得不准备和参加眼下的全苏象棋冠军赛。但是我也不想把这个问题拖得太久，造成我在耍滑头和以沉默回避作答的印象。

所以我决定写这封信，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告诉您我的想法，我坚信，就算我再次犯错，也总比我不真诚要强得多。

在研究可能导致核战争的原因时，我仅仅指出帝国主义者竭力阻挠革命的发展。您指出了我忽略了促使帝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的经济原因（害怕经济滑坡，追求最高利润等等）。这当然是我最大的理论错误。由此您指出，只有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才能阻止侵略者，要进行禁止核武器的斗争并对原子能生产进行监督。

我认为，核战争的可能与否不仅仅决定于垄断资本家的侵略本性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它还取决于垄断资本家在本国所能支配的群众社会基础是否牢固。这一基础越不牢靠，核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小。垄断资本家们一旦失去了这一基础（也就是说，将发生社会

主义变革)，那么战争将不可能发生。

当垄断资本家将失去其脚下的根基，当他们今天感到，明天革命就要发生，在绝望之中，他们将进行冒险。如果要排除这种可能发生的核冒险，看来，正应该采取这种方式。

我想，在 20 世纪 50 年代（区别于其他的时代）应该致力于加快革命的进程，不仅是为了加速实现不可避免的将人类从资本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而且也为了使核战争不可能发生以拯救人类中最积极、先进的一部分免于死亡。

为什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呢？这是由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阶级利益所决定的。否则无法生存——吃不饱，穿不暖，日晒雨淋，无处安身，养不活孩子，疾病缠身，找不到工作，无法受教育，饱受战争之苦；当人民清楚了这一切时，革命就发生了。这不仅发生在俄国，中国革命也是这样产生的。

在西方各国大多数人吃得好，穿得好，受到良好的教育，生活条件有保障，这一切都使得社会主义革命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极其必要的，所以在那里或者是没有发生革命或者说革命没有取得胜利。

采取什么途径西方各国人民可以走向革命？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失去附属国和殖民地，垄断资本家将失去自己的经济实力，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竞赛中也就没有可能取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能保障本国人民多少还不错的生存条件（可能，甚至就在第一次经济危机的时候），他们的社会基础将不牢靠，那时革命就会去敲垄断资本家的堡垒——西方各国的门。

目前这条道路是否会有失去人类最美好的一部分的风险呢？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您在作家代表大会上所宣读的苏共中央的贺词中说，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反动集团“……准备用暴力手段阻碍社会力量的增长，以阻挡人民从资本压迫和殖民压迫中解放出来的渴望……”。既然在革命发展的这条道路上帝国主义者们的长期维持着的

社会基础只在最后时期失去它——这条道路就将冒核战争的危险，以及失去人类最美好的一部分风险。

是否可能有革命发展的另一道路？我觉得，不仅仅是可能的，而且大概是必定要走的道路。无产阶级革命是必要的，因为人类没有别的摆脱资本主义的出路——否则人类无法生存。但是如果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和核战争紧密相连，那么人类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付出代价太大了，在这里，随着物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是否冒着把孩子（指人类）连同洗澡水（指摧毁资本主义）一起泼掉的危险呢？

人类不希望自己的毁灭，不希望核战争的发生，就像他们不希望挨饿、死于疾病等一样。所以，如果工人阶级、劳动人民能够更早地、没有任何条件地对无产阶级革命感兴趣的话，那我觉得，现在人民群众和工人阶级的真正利益就在这样的不通过核战争的灾难而实现的社会主义革命之中。所以，除了使附属国从资本主义体系中分离出去外，同样极其重要的是使垄断资本家从本国人民中孤立出来，这样就能使垄断资本家失去发动战争的可能。

怎样才能使宗主国里生来就有自私本性的人们脱离大资本家呢？仅仅通过宣传机构是否能够做到这一切呢？未必。西方的各国人民毫不迟疑地寻找摆脱“核战争绝境”的出路。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一出路在革命之中，因为资产阶级的宣传机构每时每刻都在向他们反复说，革命是和所有私有者，其中包括小私有者的破产分不开的。我觉得，这些国家的人民群众只有在他们看到革命能避免核战争灾难，而且在必要的条件下又满足了他们私有者的本性的情况下，才能被吸引到革命方面来。

所以我也建议在西方各国在革命胜利时保障小私有者的非劳动收入。我认为，这些保障是必要的，这不仅是为了把那些小私有者和不完全的无产者吸引到革命方面来，使他们的物质利益得到保障，也是为了让那些浸染上私有制精神、受资产阶级宣传机构支配

的工人和劳动人们看到革命的真实目的。

自由是自觉的必然性；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一原理，我认为让大资本所有者保留其收入（收入——按马克思语）的 25%，为的是革命前夕他们在绝望中不至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进行核冒险（是冒险——因为垄断资本家的社会基础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得不牢靠和极为有限了）。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垄断资本家会意识到拒绝战争的必要性。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您委婉地使我明白（如果我正确地理解了您的意思的话）这是工党原则，我对您这个意见感到惶恐不安。我是为了革命，为了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工党党员则是为了改良，我是为了从垄断资本家手中夺取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而工党党员则是为垄断资本家保全住政权和资本，是的，我认为应当保障给他们，大体上说其利润的 1/8，但是要知道这是在革命胜利之后，这是极其重要的情况！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您提醒我注意约·维·斯大林所说的有关不要求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那些遥远而可能的条件，您大概发现了，约·维·斯大林的这个见解我是清楚的。但是，我不依据他的这一见解正是因为我将自己的建议（关于保障收入的 25%）是和革命，是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联系在了一起……

为什么我的建议就类似于工党原则呢？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您同时也指出，我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前帝国主义时期的论述应用于帝国主义时期。我认真仔细地看了我的短文，只找到了一处引文是属于关于前帝国主义时期的，就是弗·恩格斯关于农民的论述。我认为这一引述是适用的，因为在当代对人类而言，供养（在某种过渡时期）不劳而食或半不劳而食阶层，即原来的私有者（如果这能阻止战争的话）要比通过核战争的浩劫和耻辱实现社会变革付出的代价要小。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您问我，我是否坚持自己的结论，因为最近几个月国际局势朝坏的方面转化了。这一恶化，当然，非常使人痛心，而且大概越来越多的人，那些善于思考的人，都在想怎样避免核战争？出路在哪里？大概，这一切会使在西方营造革命形势变得容易些，因为仅只核战争灾祸这一威胁已经足以制造全民族的（如果不是全人类的）危机了。

但是，革命形势的可能性是一回事，而利用这些可能性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这个不断加剧的全民族危机不被西方的共产党员利用的话，那么战争就要爆发了……

我觉得，苏联的政策，即主张和平共处，禁止核武器，拒绝输出革命，增强苏联国防等无疑是正确的，但看来并不能防止战争，因为战争对垄断资本家是必需的。看来只有一种手段能防止战争，即动摇垄断资本家的社会基础。这一问题暂时好像还没解决。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您指出，我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是幼稚的。我不能不按您的指示遵照执行。但是，如果这些建议不合适，那么依我看，一定要找到其他的建议。马克思列宁主义给各国人民指明了通向光明未来的道路，它也应该向人类指出避免核灾难的道路，我觉得，今天还可以做到这一切的话，那明天恐怕就迟了。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在今年12月初我把自己的简论寄给了格·马·马林科夫同志。但是，我决定没有您的允许不把这封信的复印件寄给他的，——也许信中讲述您的见解有不准确或是不正确的地方。如果我这一切都做得相当准确的话，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恳请您把这封信的复印件寄交格·马·马林科夫同志。

如果这一次我的结论又错了，我希望，您能再次给我指出。

致以真诚的问候

M. 博特温尼克

№05857

博特温尼克关于出口人工象棋计算机程序

致齐米亚宁的信

(1978年12月14日)

致苏共中央书记米·瓦·齐米亚宁同志

尊敬的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

20年来我从事制造人工象棋手的工作。从1972年起按照苏联科学院的倡议，在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苏联动力和电气化部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支援下，开始进行电子计算机程序的工作。现在“先锋”程序已经制好并且在电子计算机中被采用。为了存储和调试程序，必须要有运算能力为1秒钟1000万~1500万次，存储量为数千千比特的电子计算机。这样的电子计算机在苏联没有。

有别于其他类似的建立在依次快速走棋的整个过程基础的程序，“先锋”程序可以模仿象棋手思维的方法。

世界冠军美国“切斯”程序在走一着棋时徒劳无益地要搜索200万个布局，而“先锋”则用200个左右……

尚未完成的“先锋”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国外正获得认可。

“这种思维程序的形式是对科学的三种水平的贡献”，翻译我著作的美国翻译家A.布朗早在1969年就这样写道，“在初级水平阶段它为能够成功地下象棋的电子计算机编制的程序提供了基础；在

中级水平阶段下象棋的程序能帮助我们研究并使计划和采纳方案的过程合理化；而在高级水平阶段对典型的象棋实践中大脑活动的研究使我们了解人的思维和心理状态”。

而1978年汉堡大学教授Φ.施文格尔是这样说的：“……应当认为，这是惟一可能使计算机贴近象棋大师的道路”。他认为“‘切斯’程序系列的成功……实际上是向正确方向进步的障碍”。

1978年3月西德各大学（在多特蒙德和曼海姆），还有美国的“孔特罗尔·杰伊塔”学会，各自分头向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提出进行合作，在现代化高成效的电子计算机上联合完成“先锋”程序工作。“孔特罗尔·杰伊塔”学会建议无偿地使用他们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计算中心6个月（费用将近100万美元），并接待苏联程序设计小组，为的是双方都有权使用研究成果。类似的建议也来自西德。

在4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组成了专家组，以便确定向国外出口“先锋”的合理性。专家们一致表示赞同，委员会那时就批准了他们的结论。但是几个月过去了，事情没有进展。8月30日我给阿·尼·柯西金同志写了封信，他在9月12日作了批示：“转基里林，请阅并采取措施尽快解决”。

11月28日，弗·阿·基里林同志关切地接见了，我，这时弄清楚了，专家鉴定的结果受到了怀疑，理由是：既然“先锋”程序的成功将和采纳方案的理论发展密不可分，那么“孔特罗尔·杰伊塔”（联邦德国的各大学同样）可能会把所有的信息都转给五角大楼，而这将给苏联带来损失。

为此不能不表示困惑，因为象棋程序“卡伊萨”（没有经过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鉴定）在1977年曾出口到国外（而且至今还在那里），在这件事上没有一个人表示出担心会给苏联带来损失（“卡伊萨”曾是1974年的世界冠军。正如这一次的冠军“切斯”

一样，它也是建立在依次快速出棋的全过程的基础之上的。) 这作何解释呢？看来是因为“卡伊萨”是隶属于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一个研究所，而“先锋”——仅属于动力和电气化部的全苏电子科学研究所而已。

其实，让我们认真地分析一下，如果“先锋”将在国外成功地完成，信息又转到了五角大楼，那又会怎样呢？

首先，这完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在“先锋”的基础上只能是使所采取方案的理论定型，而此理论又必须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为此必须制作一系列具有实践意义的补充程序，在这些电脑中检验理论，在这之后才可以解决有关这理论的意义，其可靠性，它的运用，其中也包括用于军事等等问题……道路是漫长的！

对于美国研究人员是漫长的；对于苏联研究者——要短一些，因为我们培养了一批专家队伍。所以，当“先锋”的第一个方案的工作完成之后，在苏联就能够比在美国更快地将“先锋”的方法转向相邻的领域。弗·阿·基里林认为，国产的有高效计算能力的电子计算机在1980年即将制成出现。一旦类似“先锋”这样的有实践意义的程序出现，那么电子计算机就会投入使用这一程序了。这样，苏联在采纳方案方面要走在美国的前面。

如果“先锋”的工作暂时停止下来，那么将怎样呢？目前西方已经开始仿造“先锋”。1978年8月16日来自多特蒙德的信中写道：“……我们有14名高年级学生参加的设计组已经工作了4个月”。而1978年10月5日的信中说：“我们设计组的工作进展的很顺利，而且我希望，在最终和计算结果中我们能够宣布说我们正确地领悟了‘博特温尼克计算方法’。”即使不是在多特蒙德，在别的地方类似于“先锋”的程序也将被制作出来并受到检验。而苏联的“先锋”却将被冻结！

为什么资本家先生们会走向合作呢？有两个原因：1) 那里私

有利益占统治地位，2) 且美国人确信，在计算技术方面苏联将会落后。有漫画为证：美国的程序设计者用的是大容量的计算机，而苏联人则用的是小学生的算盘……

综上所述，出口“先锋”对苏联方面更有利，尤其是如果考虑到采取方案的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比对资本主义经济更重要，在那里寻找最优抉择方案更容易些，因为可能提供的方案数量被所有制形式所限制。

而拒绝出口“先锋”将使苏联的科学在电子计算机的数学保障方面更加困难，也就是说，将导致在计算技术的应用领域中更加落后。

恳请苏共中央成立一个委员会，能够对向国外出口“先锋”的合理性作一个权威性的结论。组成成员有：

维·米·格卢什科夫（弗·阿·基里林同志说，他的鉴定结论是毋庸置疑的）；

格·阿·阿尔巴托夫（美国问题专家）；

弗·谢·布尔采夫（他是制造高效计算能力的电子计算机的领导人，经济学专家和党中央代表）。

在委员会工作。

结束之际，我请求中央采纳最后的决定。

M. 博特温尼克

№05858

齐米亚宁关于答复博特温尼克
给特拉佩兹尼科夫的信

(1978年12月15日)

中央科教部特拉佩兹尼科夫同志：

请您看一看 M. 博特温尼克同志的简要报告，并结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苏联科学院的意见通知对它的看法。

米·齐米亚宁

№05859

博特温尼克关于出口“先锋”程序再次 致齐米亚宁的信

(1979年1月15日)

致苏共中央书记米·瓦·齐米亚宁同志

尊敬的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

一个月前您曾接见了，当时我曾留下一份关于完成“先锋”象棋程序工作的呈文。在呈文中我请求中央组织一个权威的专家委员会，对向国外出口“先锋”的合理性问题作一个书面鉴定。

但是至今没有任何有关成立委员会的答复。

我是一个小人物，但是作为一个1940年入党的苏共党员，一个毕生为苏联人民的幸福而工作的党员，一个现在还知道完成程序的工作会给苏联带来不少利益的党员，我有权利受到尊重。很遗憾，那些握有决策大权的同志们却并不是这一问题的专家。所以成立一个集体讨论问题的委员会是必要的（有科学院院士维·格卢什科夫的书面赞同结论看来是不够的）。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我附送上《走向目的地》这本书。我希望，在您抽空读完这本书之后，能消除不理解的阻碍和对“先锋”的低估。

您忠实的 M. 博特温尼克

№05860

博特温尼克关于就“先锋”问题举行的会议
致齐米亚宁的信

(1979年2月12日)

致苏共中央书记米·瓦·齐米亚宁同志

尊敬的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

首先请允许我感谢就“先锋”问题举行会议，这一项极大的荣誉，特别是弗·阿·基里林来参加这次会议。

很遗憾，他现在正在生我的气，但我希望能重新取得他的信任。

附上简短的会议纪要，也许，您会抽空看一看。

您忠实的 M. 博特温尼克

苏共中央科教部会议记录

苏共中央科教部 1979年2月9日会议记录

记录人——M.M. 博特温尼克

出席者：弗·基里林、德·日梅林、B. 米亚斯尼科夫、古·马尔丘克、弗·谢梅尼欣、弗·布尔采夫、M. 博特温尼克，中央科学和

机器制造部工作人员多人，主持人：C. 谢尔巴科夫。

C. 谢尔巴科夫宣读 M. 博特温尼克 1978 年 12 月 14 日写给中央书记米·瓦·齐亚宁的信，并宣布说就向国外出口“先锋”程序问题已经否决。本次会议是应 M. 博特温尼克的请求而召开的。

弗·基里林认为信中有闹纠纷的意思，因为它指出，“卡伊萨”隶属于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体系。

M. 博特温尼克不同意弗·基里林的意见，他叙述了工作的进展过程以及“先锋”对于采纳方案理论的意义。

弗·谢梅尼欣说，在苏联正在采用强有力的采纳战略决策的计算方法；同时，他反对出口“先锋”，因为美国人确信苏联计算技术的落后。这将挑起美国方面对苏联进行预防性的热核攻击。

M. 博特温尼克问为什么在 1977 年，当“卡伊萨”出口到加拿大，在大能量的电子计算机 И6М370/168 中用于储存时，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弗·谢梅尼欣答道，关于输出“卡伊萨”的事他一无所知。

M. 博特温尼克问，为什么水文气象部门努力购买有高效计算能力的“萨伊波 - 176”就不表明苏联的落后，也没有引起先发制人的攻击呢？

弗·谢梅尼欣答道，他认为，水文气象部门不需要电子计算机，它只需要按照民间的征兆预报天气就行了。

弗·布尔采夫同意谢梅尼欣的意见。他指出，下象棋的方法早就在棋谱书籍中都有阐明，而且博特温尼克什么实质性的工作都没有做，这项工作是苏联在人工智能方面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古·马尔丘克建议集中力量并在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继续“先锋”的研究工作；他说，那里将有每秒钟运算 3000 万次的电子计算机。

C. 谢尔巴科夫说，维·格卢什科夫不能来参加这个会议，但是

他请求转达，他反对输出“先锋”并建议在基辅的控制论研究所完成“先锋”的工作。

德·日梅林认为在苏联没有必要完成电子计算机的“先锋”程序。他提醒说，1977年“卡伊萨”曾出口，是因为为了下象棋而用，而当时“先锋”还不能下棋。

M. 博特温尼克指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一年多来一直都在徒劳地寻找着有高效计算能力的电子计算机，他请求，确定完成这项找寻工作的期限。

(这项建议被否决)

弗·基里林指出，美国方面禁止向苏联转让象棋程序；我们只能在平等条件下合作，所以出口“先锋”是不允许的。

M. 博特温尼克说，去年8月美国人的立场已经是明确的，但是“卡伊萨”正是那时出口到了荷兰。

德·日梅林推测说，“卡伊萨”的制作者们的行程预先办妥的时间可能是早于8月。

M. 博特温尼克问，目前禁止向国外出口的禁令是否也适用于“卡伊萨”呢？

(没有回答)

M. 博特温尼克说，他仍然认为，在国外完成“先锋”的工作无论从科学的角度，还是从政治的角度看对苏维埃国家都是有利的。这将会促进缓和并将有助于得到允许向莫斯科提供有高效计算能力的电子计算机，以便于进行采纳方案方面的研究。

他提及了希帕诺夫教授的不幸遭遇。希帕诺夫教授公开发表了不变式调节方面的研究。科学院院士委员会批判了这项研究，并禁止继续发表。在美国希帕诺夫的构想和技术界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过了几年，新的科学院院士委员会为希帕诺夫恢复了名誉（死后），但是苏联已经落后了……

谢尔巴科夫作总结发言，指出并不是 M. 博特温尼克一个人关心科学事业的发展，许多科学家都考虑着这个事情。

M. 博特温尼克回忆整理

1979年2月9日

№05862

谢尔巴科夫关于“先锋”程序问题 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9年2月20日)

苏共中央

关于 M.M. 博特温尼克同志的请求问题

M.M. 博特温尼克同志在自己的信中通报了他完成利用电子计算机下象棋的程序“先锋”研究工作的情况，并请求允许将这一程序输出到美国以用于将其储存在存储容量大的快速运算的电子计算机中，这封信的作者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对在国外存储程序“先锋”的合理性作出鉴定结论。

按照上级下达的指示，苏共中央科教部仔细地研究讨论了这一建议。参与的人员有：苏共中央科教部的国家工作人员，科学院院士弗·阿·基里林、古·伊·马尔丘克、弗·谢·谢梅尼欣、维·米·格卢什科夫等同志，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弗·谢·布尔采夫、德·格·日梅林等同志，其他学者和专家，还有博特温尼克同志。

绝大多数的人都表示反对在国外存储程序“先锋”。尽管作为编制象棋程序“先锋”的基础的各项原则已由博特温尼克同志公开发表了，但是，按科学家们的观点看，这有可能泄露一些用来编制用于其他目的的程序资料，考虑到政治局势和权威的意见，并且有消息说目前美国将所有的电子计算机上的象棋程序都保密起来，

在苏联存储程序“先锋”是合理的，按照古·伊·马尔丘克同志的建议，可以在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计算中心进行这项工作。

博特温尼克同志同意上述意见。

对博特温尼克同志的请求的审核可以到此结束了。

苏共中央科教部副部长 C. 谢尔巴科夫

№05863

**博布科夫关于博特温尼克与法因贝格谈话
致苏共中央的通报**

(1984年5月17日)

机密

苏共中央鲍·伊·斯图卡林同志

在此我们以通报方式发去前世界象棋冠军 M. 博特温尼克和 1979 年从苏联迁居以色列的原苏联公民 M. A. 法因贝格的谈话记录的复印件。目前法因贝格居住在美国，在反苏出版社《新俄罗斯之声》中做一名记者。经常在侨民刊物上发表敌对苏联的言论。

附：M. 博特温尼克和法因贝格的谈话记录的复印件，共 3 页。^①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 Ф. 博布科夫

① 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记录。

№05864

齐米亚宁关于警告博特温尼克
给斯图卡林的指示

(1984年5月18日)

中央宣传部鲍·伊·斯图卡林^①同志

请考虑一下，怎样使 M.M. 博特温尼克同志遵守规矩。他的行为是可耻的，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米·齐米亚宁

^① 斯图卡林，时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05865

斯图卡林关于限制博特温尼克 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4年6月13日)

机密

苏共中央

关于前世界象棋冠军 M. 博特温尼克的言论

苏联国家安委员会（Ф.Д. 博布科夫同志）通报说，前世界象棋冠军 M. 博特温尼克 1983 年 10 月在美国逗留期间，在世界电子计算机象棋冠军赛上与原苏联公民法因贝格的谈话中表述了一系列诽谤苏联象棋流派代表的观点。M. 博特温尼克的这些诽谤言论登载在侨民刊物上。

鉴于此，M.M. 博特温尼克同志被请到苏联体委。在与苏联体委副主席 B.A. 伊沃宁的谈话中，他确认在美国逗留期间曾与法因贝格进行过谈话，但是他的部分言论的意思被作者歪曲了。同时他也指出，这次采访谈话的某些观点早些时候已在苏联刊物和公众讨论中出现过。

向博特温尼克同志指出了他的言论是不可容许的，这些言论会给我们国家带来损害，或是对待苏联棋手具有侮辱性质。

考虑到 M. 博特温尼克的行为和我们的思想上的敌人对此表现

出来的不正常的兴趣，我们认为今后应该限制他出国。

我们根据情报报告。

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鲍·斯图卡林

【专题说明】

关于波斯特尼科夫及其 国外藏书的处理

(1954年11月至1955年2月)

前社会革命党的政治评论家谢尔盖·波尔费里耶维奇·波斯特尼科夫是一位文学家和图书馆学家，十月革命后移居布拉格。布拉格是俄国侨民聚居的地方。1923年由侨民建立了俄罗斯国外历史档案馆，收集了文件和回忆录手稿、日记、信件、相片、宣传画以及俄国革命运动的书籍和期刊。波斯特尼科夫在俄罗斯历史档案馆建立了有10万册俄国图书的藏书室，还收集了俄罗斯侨民的全部书刊并编有目录索引（未完成）。布拉格被苏联红军解放以后，波斯特尼科夫被捕并遣送回国，在劳动集中营关了五年。1953年被释放，1954年取得苏联国籍。波斯特尼科夫在1954年11月向苏联内务部写了一封信请求去布拉格并提出把他的图书交给国家。这封信由老共产党员邦契-布鲁耶维奇转寄赫鲁晓夫。这组档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被改造的社会革命党人的遭遇，以及50年代苏联领导人对这类问题的态度。波斯特尼科夫后来去了布拉格，并于1965年在那里去世。

（本专题文件由杨存堂编辑和校注，

吴能翻译）

№03172

邦契—布鲁耶维奇致赫鲁晓夫的信

(1954年11月16日)

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尼·谢·赫鲁晓夫

最尊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不久以前，当您不在家的时候，我收到附来的谢·波·波斯特尼科夫的申请书。他目前已取得苏联国籍，住在尼科波尔市。

很早以前，还是在革命前，我对他有了一些了解：他是《箴言》^①杂志的编辑，那份刊物常常刊登很有价值的东西。他本人，和他的撰稿人一样，具有民粹派的倾向：是《俄罗斯财富》^②的左派。他的职业是文学家，优秀的图书馆学家。在国外侨居期间，他住在捷克斯洛伐克，在布拉格俄罗斯历史档案馆创办了一个极好的图书部，搜集了自1914年起的俄罗斯革命运动和社会运动的优秀书刊，而且包括1905年日俄战争开始以前所有俄文和外文涉及俄国的书籍，但在这个图书部中大部分是直到现在为止的关于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书籍。在这个藏书室中，他也收存了俄罗斯侨民绝对完整的全部书刊。藏书室，正如他自己在申请书中所说，拥

① 《箴言》左派民粹党人、社会革命党人的文学政治刊物，1912～1914年在彼得堡出版。

② 《俄罗斯财富》自由民粹派的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1876～1918年出刊。1906年成为人民社会党的机关刊物。1914～1917年曾以《俄国纪事》刊名出版。1918年被布尔什维克查封。

有约 10 万册书刊。这样一批丰富的藏书和他撰写的介绍书籍情况的手稿自然十分值得注意。这批藏书不能向广大读者开放，但是对于研究俄罗斯革命的专家们，它们具有极其巨大的价值。

谢·波·波斯特尼科夫目前已是 70 开外的老人。他写道，如果不准许他前去布拉格结束这项工作，那么他请求允许他的妻子（住在布拉格，也是垂暮的老人）来俄国，以便一起度过最后的岁月。

我以为，满足他的这项请求是完全必要的，何况他已表现出自己的全部忠诚，并且取得了苏联国籍。

无论如何不能放弃他所建立的藏书室，以及在他妻子那里到处散放着的那些材料。他想把这一切，正如您在他的申请书中看到的那样，全部转交给我们党中央，我以为得到这批藏书对我们是十分合适的，不仅可供查阅之需，而且也可以从反面来研究我们的俄国革命。

我没有把他的这份申请书寄给内务部长^①，而偏偏寄给您，正是因为我十分关注于这批藏书和他还没有加工的材料能够得到抢救，而我以为，同他联系以后责成驻布拉格使馆的苏联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接收所有这些珍贵的东西，寄发到您指定的地址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我设想，如果您认为需要和内务部长联系，请以您本人的名义出面。

我在这种情况下只是起一个为人代传申请书的作用，因为对那人在 45 年以前我曾经有些认识，但至今一次也未见过面。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弗·邦契-布鲁耶维奇^②

① 1954 年内务部长是 C.H. 克鲁格洛夫。

② 邦契-布鲁耶维奇，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1873~1955），1895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从事党的出版和杂志编辑工作，参加十月革命，曾任列宁的人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1933 年以后任博物馆馆长。

附 件

谢·波·斯特尼科夫的申请书

致苏联内务部长

抄送：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波斯特尼科夫，谢尔盖·波尔费里耶维奇，1883年生，常住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尼科波尔市，安季波夫街，18号。

申 请 书

我是原先居住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侨民，1945年被捕后转到莫斯科，因曾参加原社会革命党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法庭判处劳动改造营监禁5年。

1950年我被释放，作为无劳动能力的残疾人，被送往第聂伯罗夫斯克州尼科波尔市，由我妹妹波基季娜·利季娅·波尔费里耶夫娜照看。

1953年，根据苏联总检察长按照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3月27日“关于大赦”的命令而作出的决定，我获彻底赦免，获权可取得没有任何限制的身分证明。这是通过尼科波尔市民警局向我宣告的。

1954年6月18日，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按照我的申请赋予我苏联国籍。

我是一个71岁的老人，患有肺气肿和心肌炎。我的妻子，波斯特尼科娃·伊丽莎白·维克托罗夫娜仍留在布拉格。她年已70岁，

也有病在身，因血管硬化而一目失明。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近 50 年，最近 9 年分居两地。我们已没有子女，他们均已早夭。我们两人都已经活不了很长时间，很想能在一起活完剩下的不长时间。

苏维埃政权宽恕了我，给了我工作和维持生活的条件（我在尼科波尔市综合贸易公司第 1 号茶室做看门人三年）。我希望政府也不会拒绝我同妻子团聚的请求。

我曾于 1952 年向苏联内务部提出申请，希望让我去捷克斯洛伐克。当时给我的答复是，只有当我获得国籍身分证明之后，才可能研究我的出国问题。现在我已经有了这种身份证。

我请求您，部长同志，让我有可能去捷克斯洛伐克 2~3 个月，以便我能在那里料理完自己所有的事。我在俄罗斯历史档案馆担任了 25 年图书馆部主任，并获得了养老金。我不在的几年里存下了一些钱，我去了以后可以领到这笔钱（是这样写信告诉我的）。我不想留居异乡。我已重新感受到住在祖国的极大欢乐。

社会革命党人曾经和共产党人在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观点上产生分歧。现在我亲眼看到，共产党在安排人民生活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而社会革命党人的策略是多么不正确。

除了以上这一切之外，我还想补充以下情况：从职业说 I 是一名图书馆学家和文学家。在布拉格经过我的劳动在俄罗斯历史档案馆内建立了一个学术藏书室，其收藏涉及以下各类问题：俄国革命运动和社会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 年的革命和国内战争；苏维埃政权；侨民的习俗、政治状况和意识形态。共计收藏书刊 10 万种，既有俄文的，也有外文的。

我为编写一部庞大的著作《侨民意识形态和政治状况书目索引》（篇幅约 600 页）作了准备。在这方面我是惟一的专家，因为 25 年来一直在搜集侨民的全部生活和政治书刊。由于我的工作的结果，形成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有关侨民政治状况的七彩光谱。这批

藏书包括：20年代从保皇派合法主义者到无政府主义者；30年代从青年罗斯派、法西斯派和民族青年联盟到托洛茨基派和叛国投敌分子。而各种分立主义者的书刊则又是专列的一个类别。

只要再稍稍加工就可完成了。我只有在布拉格才能完成这项工作。一旦我死去（而我的日子已不多了），我的全部辛劳都会付诸东流，因为我怀疑不会有人再来做这件事。然而对于苏维埃政权来说，这项工作对于同各种反苏派别作斗争自然是有意义的。如果我能完成自己的这项工作，我将把工作成果全部交给苏联共产党中央。

如果，部长同志，您认为不能允许我临时前去捷克斯洛伐克，那么我请求您准许我的妻子前来苏联。她叫伊·维·波斯特尼科娃，住布拉格（布拉格，第18博热夫诺夫街，什捷夫科伐，6号）。

她曾私人找过苏联驻布拉格领事馆，但毫无结果，因为她没有任何国籍。如果让她为取得苏联国籍而奔忙，那所要花费的时间，在我们现在的年龄和病弱的情况下，无论是我还是她，在死之前是不会再见面了。

如果内务部向布拉格给我妻子发出签证，请费神通知我。

谢·波·波斯特尼科夫

№03174

雅科夫列夫致苏共中央的简短报告

(1954年11月26日)

秘密

致苏共中央

维诺格拉多夫^① 同志

根据您（通过乌达利佐夫^② 同志）的请求，说明如下：1946年，档案总局接收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赠送给苏联科学院的所谓俄罗斯国外档案，由国家保管。除档案材料外，还接收了约4000种书籍、杂志、报纸，其中大部分是各种白俄侨民组织出版的。没有任何关于谢·波·波斯特尼科夫私人藏书的材料和提示。档案材料中有谢·波·波斯特尼科夫的私人材料计127个卷宗，内容是他的回忆录、文章和札记，其中谈到社会革命党的活动和报刊，以及关于白俄侨民的书籍。也有阿姆菲捷阿特罗夫^③、安·别雷^④、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⑤、布尔加柯夫^⑥、弗·

① И.Т. 维诺格拉多夫，苏共中央同外国党中央联络管理局副主任。

② И.И. 乌达利佐夫，苏共中央秘书局局长。

③ В.А. 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库达舍夫），作家 А.В. 阿姆菲捷阿特罗夫的儿子，侨居国外。

④ 安德烈·别雷（布加耶夫·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作家，侨居国外。

⑤ 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社会革命党的组织者之一和领导，被克伦斯基称为“俄国革命的老太太”，1919年侨居国外。

⑥ В.Ф. 布尔加柯夫，文学家，列·托尔斯泰的秘书，居住在布拉格，建立了文化历史博物馆。

米·晋季诺夫^①、叶·德·库斯科娃^② 等人致波斯特尼科夫的信。部分材料说明，波斯特尼科夫参加了白俄侨民组织。此外，还有国外社会革命党的通报、传单和号召书（1922～1929年），以及在南斯拉夫的白俄侨民城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和信件（1927～1931年）。

1953年4月，波斯特尼科夫向中央国家文学和艺术档案馆寄来了自己的回忆录，其中关于自己写到以下情况：1883年出生于阿尔汉格尔斯克市，曾是一系列报刊的撰稿人和社会革命党的积极活动家。1921年移居捷克斯洛伐克，一直住到1945年。1945年捷克斯洛伐克为苏军解放后，在布拉格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逮捕并送往莫斯科，关在劳改营中。1950年从劳改营获释，现在和自己的妹妹一起住在尼科波尔市。在侨居国外期间，曾是俄罗斯国外档案馆的创始人之一，任该档案馆学术委员会成员和图书馆部主任。

苏联内务部档案管理总局副局长 И. 雅科夫列夫^③

① 晋季诺夫，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之一，侨民。

② 库斯科娃（普拉科巴维奇），政论家，“经济主义”思想家之一，1922年出国。

③ 文件上有批注：“转乌达利佐夫同志。维诺格拉多夫”。

№03175

维诺格拉多夫和斯捷潘诺夫 致苏共中央的简短报告

(1955年1月20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同志把他收到的谢·波·波斯特尼科夫的信转给了苏共中央。谢·波·波斯特尼科夫 1921~1945 年侨居捷克斯洛伐克，1945~1950 年在苏联因以前参加过社会革命党而在劳改营服刑。目前，谢·波·波斯特尼科夫是苏联公民，住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尼科波尔市。

谢·波·波斯特尼科夫请求准许他出国去捷克斯洛伐克料理自己的事务，同妻子会面，并完成他在布拉格俄罗斯历史档案馆工作期间开始的学术著作《侨民意识形态和政治状况书目索引》。在这个档案馆里还有他关于俄国革命运动和社会运动问题的藏书室，计有书刊 10 万种。谢·波·波斯特尼科夫写道：如果不准许他出境去捷克斯洛伐克，那么他请求让他的妻子伊·维·波斯特尼科娃入境来苏联。她现年 70 岁，住在布拉格。

邦契-布鲁耶维奇在致苏共中央的信中写道，他早在革命以前就认识谢·波·波斯特尼科夫，认为应当满足他的请求。与此同时，邦契-布鲁耶维奇还强调说，最好是获得谢·波·波斯特尼科夫搜集的藏书。

俄罗斯历史档案馆的手稿库藏已于 1946 年由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作为赠送给苏联科学院的礼品移交我国，现在由苏联内务部档案

局保管。据从苏联驻布拉格大使馆得知，俄罗斯历史档案馆内存有的藏书已转交给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

据乌克兰共产党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州委书记瓦琴科同志告知，谢·波·波斯特尼科夫目前没有工作，物质生活上得不到保障。

据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告知，伊·维·波斯特尼科娃在布拉格担任俄语教师，此外还由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发给她谢·波·波斯特尼科夫的一半退休金。如果波斯特尼科夫回到捷克斯洛伐克，他可以得到全部退休金（每月600克朗）。

苏联大使馆（费留宾^①同志）认为，允许谢·波·波斯特尼科夫回到布拉格是恰当的，他和他的妻子将得到足够的物质保障。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诺沃提尼同志）不反对谢·波·波斯特尼科夫去捷克斯洛伐克。我们认为可以同意苏联驻布拉格大使馆的意见。

B. 斯捷潘诺夫

И. 维诺格拉多夫^②

① 费留宾，时任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

② 在文件上有批注：“同意。米·苏斯洛夫。同意。彼·波斯佩洛夫。1955年2月4日。沙塔林。”

№03176

谢年科夫致苏共中央总务部的便函

(1955年2月23日)

绝密

致苏共中央总务部

苏共中央出入境管理委员会于1955年2月18日通过决议同意谢·波·波斯特尼科夫出境去捷克斯洛伐克，期限为6个月，并有权返回苏联。

委员会副主席 A. 谢年科夫^①

① 文件上有苏共中央总务部工作人员的批注：“归档。戈尔布诺夫。1955年2月24日。”

【专题说明】

赫鲁晓夫时期的经济状况及其评论

(1955年7月至1965年7月)

有关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经济情况，公开出版的文件和统计资料已经很多。本专题收集了最新解密档案中一些文件。

斯大林去世后，马林科夫、赫鲁晓夫曾对斯大林的经济体制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都没有完全摆脱这种体制。尽管赫鲁晓夫制定了一个又一个宏伟的计划，不仅这些计划大都没有完成，而且还给经济生活造成了许多新的问题。下面的一些报告和讲话与过去公开发表的文件的不同处，就在于涉及了某些差距和不足。当然，文件的数量有限，每一文件反映的又是一个方面，要全面研究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需要更多的资料，这些文件中提到的数据，也还要进一步考订。

从50年代开始，人们对苏联经济体制的研究逐步深入。而且，赫鲁晓夫的改革也越来越遇到很大的障碍和阻力。这里收录的几个经济学家的评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专题文件由杨存堂编辑和校注，
邹红、沈友泰、孟霞、祝尧仁翻译)

№03641

苏共中央七月全会关于经济问题的 讨论（摘要）

（1955年7月）

米·格·别尔乌辛^①的讲话

在能源方面主要特点是我们的电力工业正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随着古比雪夫水电站和斯大林格勒水电站的投入运营，以及从这些电站输往莫斯科、乌拉尔、顿巴斯的超高压输变电线路的建成，将为苏联的欧洲部分建立统一的能源体系奠定基础。这将是一个最大的能源系统，其总功率为2500万千瓦。

现在我们所建的新电站造价较高，而且在技术水平上比美国也稍逊一筹。

例如国内一些热电厂的主体厂房的比容（单位容积）为每千瓦1.14~1.15立方米，而美国是0.14~0.73立方米/千瓦。相对而言，我们建造热电厂每千瓦需投资1125~1850卢布，美国为460~590卢布/千瓦。

以上数据不难看出热电厂建筑比容和电厂建造成本费用我们比美国高出1~2倍。

我国现在生产的蒸汽涡轮机的统一功率为15万千瓦，美国则

^① 米·格·别尔乌辛，时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达到26万千瓦。

苏联的化学工业成绩斐然，1954年生产量比1940年提高了3倍，就其工业生产总量现在居世界第2位。

然而，美国在1953~1954农业年中化肥生产达到2350万吨（标准单位），我国1955年将生产约1020万吨。

1954年苏联每公顷耕地面积施肥9.5公斤，而美国为24.8公斤。

伊·费·捷沃相^①的讲话

报告^②中所列数据及由工时测定的数字说明前景不容乐观。黑色冶金系统内至今尚未消除一些主要炼钢设备，如平炉、轧钢机的停运现象。1954年一些炼钢厂的平炉停运时间占工作日程时间的3.6%，其中库兹涅夫联合企业中停运时间占到7.7%，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厂为9%，扎波罗热钢厂为13.7%，马克耶夫卡厂为17%。轧钢机的停运，包括由于转换钢型而更换轧辊机和改造机器所花时间占计划工作时间从6%到23%，各厂不等。

石油工业中也存在很多钻机非生产性停运现象。1954年用于辅助和维修工作的时间占计划时间49%。由于组织工作造成的故障和事故所花费的时间占40%，而直接用于钻井的时间仅为11%。工人每次换班耗时也不少于2小时。

阿·尼·柯西金^③的讲话

人造纤维不应被视为是替代品，它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材料，

① 伊·费·捷沃相，时任苏共中央委员、曾任黑色冶金部长。

② 指布尔加宁在七月全会上的报告。

③ 阿·尼·柯西金，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没有它现代许多生产技术无法前进。譬如，用人造纤维帘子制成的汽车外胎，比棉制帘子更加坚固耐用。今年这种帘子产品的生产将达到 3400 万平方米，也就是说，约有四分之一的汽车外胎将用人造纤维帘子制成。

战前我国所有人造纤维的生产量为每年 12500 吨。1955 年将会达到 109000 吨，这样，战后人造纤维的生产能力提高了 7 倍，这就有可能使人造丝的产量比 1940 年提高近 11 倍。

国外许多国家人造纤维的生产已有了较大的规模。比如，1954 年意大利生产 127000 吨，西德 195000 吨，英国 212000 吨，美国 628000 吨。根据 1954 年 3 月的统计资料表明，美国已有 57 家工厂生产人造纤维，总生产能力为 100 万吨左右。

拉·莫·卡冈诺维奇^① 的讲话

由于工业产品的快速增长，我国一些最重要的产品的生产水平，1955 年接近甚至有些品种超过了 1953 年一些主要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存在的不足和困难。比如，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有关铁、铜、镍、大型金属切割机床以及烧碱、合成橡胶的生产指示未能完全完成。木材的供应不尽人意。煤炭、电能、钢材、化肥、建材的产需关系仍很紧张。

众所周知，我们的一些企业设备不足，现有的部分机械明显老化甚至破损。这样的生产工具就同劳动力的保证产生了矛盾。预计未来五年中所更换的部分现有老化机器可能会每年节省 15 多万人

^① 拉·莫·卡冈诺维奇，时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苏联部长会议劳动与工资委员会主席。

的劳动量。

尽管有数字表明，在铁路运输方面我们的运输设备比美国好，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表现，但铁路工作的生产效率却低于美国。而效率的高低又依赖于技术水平及工作技能的高低，也受主观因素的影响。

美国铁路共有 3000 名扳道工，而我们的铁路（长度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却有 105000 名扳道工。美国铁路扳道工数量不多的原因是：第一，道岔的信号电力控制系统十分发达（美国约有 60000 个装备此系统的道岔，而我国只有 12700 个）；第二，扳道工、检票员及站长兼职的现象在我国铁路业中发展缓慢，甚至在实行道岔和信号控制系统后，扳道工精简不下来，现在仍占到 60%。

逆向运输，重复运输，超远程运输以及其他一些不经济的铁路货运，一年就达 1 亿吨左右，占运输总量的 10% 左右，1954 年仅国民经济用于公共运输支出的总金额就达到 630 亿卢布，加上政府机关部门运输支出则近 800 亿卢布。我们这里有如此之大的数字。如果能消除这些不合理的运输，我们就能节省多少人力物力呀，若削减这笔开支的 10%，一年就能节省 60 亿卢布，而仅铁路一项就能节省 15 亿卢布和 5 万名铁路在编人员。

在这方面远东的例子最说明问题。比如，向远东输送 750 万吨以上的货物，平均运送距离为 6800 公里，铁路运费就达 22 亿卢布左右。

再如，从中央地区向远东地运送一吨的衣物需花费 1470 卢布，运输这一吨衣物的人力消耗为 8 人/天。要知道，我们向远东运输的衣物每年可不止一吨，而是二万多吨。这样就清楚了，向远东运送货物要花费多么巨大的人力物力啊。

尽管我国铁路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已超过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但每个工人的生产定额的劳动生产水平却低

于美国。

现在国民经济中从事铁路装卸工作的人数已达 200 万左右，其中装卸工、搬运工和其他从事手工操作的辅助工人为 160 万人。

如果能提高装卸工作的机械化水平，那么到 1960 年装卸货物量可增加 1 倍，还可使 220 万人摆脱装卸工作。

1953 年国内工人实际工资比革命前增加了约 5 倍。战后工业企业工人和职员的实际工资持续增长，1955 年工资收入比 1940 年高出 90%。

国民经济各部门工人和职员每月平均工资从 1940 年的 339 卢布增加到 1954 年的 699 卢布，即 1954 年的工资水平是 1940 年的 206%。其中工业部门是由 353 卢布增长到 794 卢布，为 1940 年的 225%，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却低于实际工资的增长。

实际上在（1951~1954 年）的 4 年中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只增长了 33%，而工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却增长了 37%。工资定额基本上是 20 多年前制定的，在此期间平均工资提高了近 2 倍……这就导致了这种情况：如果说在战前时期工资定额份额占工人平均工资的 75~80%，那么现在在较好的情况下此份额也只占 50~60%。

我认为还有必要提出低收入工人工资问题。在 4700 万苏联工人和职员中月收入仅有 300 卢布的人就有 500 万左右。所以必须认真考虑这些人的情况。

格·马·马林科夫^① 的讲话

由于国民经济对电力的需求飞速增长，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

^① 格·马·马林科夫，时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电站部部长。

建立起储备电力。这些年来发电量与所建电站的功率相当，略有增加。例如，从1940年至1954年电站功率提高了1.9倍，发电量则增加了2.1倍。可见，在我们的电站中能源设备使用率是很高的。电力部所属所有电站规定平均一年发电6000多小时，而个别电力系统和电站一年能发电7000~8000小时。

没有一个国家的电站设备使用率有如此之高。1953年英国电站发电3350小时，美国5100小时。

但仍有必要在未来5年内保证建立一个储备量不低于所建电站功率10%的能源储备系统。应当指出的是，现在美国能源的储备量占电站功率的20%。

有充分的数字表明，苏联农业每年对电力的需求为30亿千瓦时，美国则为100亿千瓦时。在公用和日常生活耗电量方面我们更为落后……美国居民人均用电3353千瓦时，而我国仅为768千瓦时。应当看到，我国人均用电量还明显低于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我国战后能源发展的速度，无论是在电力的生产方面，还是在提高功率方面都比美国快。例如，从1948年到1954年我国发电量平均每年增长14.9%，而美国是8.5%。

至于发电量的绝对增长量，美国则多得多。比方说从1948~1954年，我国发电量增长了925亿千瓦时，而美国是2372亿千瓦时，平均每年增长，我国为132亿千瓦时，美国为339亿千瓦时。

现在在西欧建立了一些几乎覆盖所有电站的大型联合电力系统。英国组成的一个电站和电力系统其功率为1800万千瓦，法国1300万千瓦，瑞典550万千瓦。法国、西德、比利时、荷兰和瑞士的电力系统之间的输电线路业已建成。

西伯利亚电力系统总功率到1965年将达到1800万~2000万千瓦。

阿·伊·米高扬^① 的讲话

美国从 1929 年到 1937 年实际上在原有水平上徘徊，其经济停滞不前。

美国方面的研究表明，美国在（1925～1950 年）25 年发展中，尤其是二战期间形成的繁荣，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到两个百分点。美国政府已定出目标，要在今后 25 年中保证每年按这个比例增长。

你们知道，我们每年的发展速度，不仅过去而且现在也高出美国年平均发展的四五倍。

经济学家感兴趣和需要的所有数据都集中存放在中央统计局内，斯塔罗夫斯基同志处。根据现行条例规定，谁也不能查看。这种莫名其妙的规定到了我们该重新研究的时候了。除了那些涉及国防利益的真正绝密的材料外，其他的所有资料都可像战前一样交给经济学家去研究。

^① 阿·伊·米高扬，时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No03643

柯西金和加里曼关于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谈话

(1959年6月1日)

在谈话开始时，加里曼回忆说，他最后一次和柯西金会面是在16年前。那时，苏联和美国正同仇敌忾对付同一个敌人。柯西金同志说，那时合作得很好。

加里曼继而说道，他很满意此次苏联之行。并强调说，他所到之处，受到了苏联官方代表和普通百姓的衷心欢迎。

接下来加里曼针对苏联经济规划和组织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以下记录了这些问题和柯西金的回答。

加：在地方上我同企业领导和官方代表谈话时，我注意到，他们对不久前工业领导安排上进行的变动都感到满意。

柯：是的，我们大家都对这次改革结果感到满意。

加：您是指最近进行的工业权力下放吗？

柯：我们将加强发展国民经济委员会体系，这个体系使工业管理权力下放同国民经济中央计划相协调。这能保证各个区更好地发掘经济潜力。由于向新体制的转变使以前未能充分利用的潜在效率有可能变为现实，生产能力和劳动力的使用会趋向合理。那些以前没有满负荷运转的工厂，现在充分的运作起来。

加：你们的企业迅速地把一周46小时工作时变为一周41小时工作时，这一点让我感到非常惊讶。尤其是，你们是在实施宏大的七年计划的时候开始这种转换工作的。您不认为，这会造成劳动力短缺吗？

柯：不，在制订七年计划时，我们已核算过劳动力资源情况。此外，我们进行了人口普查，结果已经清楚。因此，对未来几年工业劳动力供给前景我们是做了清醒的估计的。

加：但是您要知道，在战争时期出生率会有一些幅度下降，而那时出生的一代，很快就要加入劳动者的队伍。这就意味着，劳动力的增长在近年将不会比正常情况下高。

柯：您的判断是正确的。的确，1941~1945年间出生率有所下降，而那时出生的人，近年内就成为新一代劳动者。但应当指出，我们的劳动生产率会比预算有所增长，因为生产的机械化起了作用。

加：也许，等到1941~1945年间出生的人参加到建设行列之后再缩短周劳动时间会更好一些？

柯：没有必要拖延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党代会作出缩短劳动日的决议，是考虑了各方面利弊的。党答应人民要实现这个转变，对自己的承诺是永远都要实现的。……

加：……我期望您能到美国来，到时我会向您引荐一些经济学家，他们中一部分代表共和党观点，另一部分则站在民主党的立场上。您将会发现，他们的观点是多么迥异。……

加：……您是指大力加强化工发展，其中包括合成材料和塑料制品的生产。大概这个问题会成为经济科学委员会的一个研究课题吧？我指的是化工发展对其他工业等等部门可能带来的影响。

柯：毫无疑问，一定会是这样。

加：听说，你们和英国人谈成了一笔生意，购买他们的一批工厂用来加工合成材料？

柯：我们将和英国举行供货谈判。英国提供我们化工设备，其中包括我方已建的合成材料加工厂所需设备。这是指我们从英国购买这些企业所需的半成品。现在谈判进行得很顺利。我估计供货量

会很大。看来，我们还需要就贷款问题进行协商。我们已从英国购买到一部分化工厂。比如，现在正运往苏联的用于大型轮胎厂的设备，这个厂将年均生产300万件汽车外胎。

加：你们和美国人洽谈的生意，能否完全满足你方化工设备的需求，或者仍然存在一定进口需求？

柯：您大概是指，我们在制定七年计划的时候，是以本国企业生产所有必需设备的生产能力为出发点的。但是，如果有从国外购进设备的机会，我们也很愿意去做。因为它可以加快我们建设事业的步伐。在英国的这次购货，就是这样一次机会。如果将来有可能从国外购进更多的设备，我们一定会利用这样的机会。至于厂房建设，这是不成问题的。我们具备加快基本建设速度所必要的条件。

加：看起来，化学工业的发展会对七年计划的完成发挥重要作用。

柯：是的，我们将在这七年内投资一亿零四百万卢布来发展化学工业。

加：这可是巨额投资！

柯：可同时我们又向化学工业提出了艰巨任务。对此，我们应当向您开诚布公地谈谈下列情况。实践证明，当西方国家限制我国购进设备，用禁止向我国运入各种货物的名单来限制我们时，这当然多少对我们完成计划有所影响，但同时西方国家这样做却不由自主地给了我们一定帮助：我们得以调动国内所有设计师的创造力，发展生产，从而走出困境，归根结底因此我们反而更强大了。

加：我参观了你们的企业，对你所说的一切深信不疑。

柯：请您不要误解我们。我们赞成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展开最广泛的贸易活动，包括同美国。但是，假如政府对我们提出任务——用自己的力量组织生产各种设备，我们会去执行的。这不是毫无根据的断言，这是被经验证明了的。我们有能力组织生产任何一种设

备，因为我具备足够的生产基础和所需的人才。

加：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因为我已亲眼看到你们的企业。

柯：我想，迟早我们会和你们就美苏间发展贸易的重大问题进行商谈的，因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将对双方都是互利的。某些人依靠人为设置的障碍，企图妨碍美苏贸易的发展，他们是注定要失败的。……

加：如果我不使您太疲乏的话，请允许我再提一个问题。在制订全国各区的经济发展计划时党组织起到了什么作用？在决定这些问题的会议上谁当主席——是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吗？

柯：这些问题是经一系列组织共同研究的。当然，领导权属于党组织。最终计划由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递交加盟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然后由加盟共和国的部长会议把统一汇总的国民经济计划递交苏联部长会议。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受苏联部长会议委托对加盟共和国的计划进行综合并把经过统一汇总后的计划递交苏联部长会议最后审定。

加：党组织是否参加每一阶段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制订工作呢？

柯：当然。

加：这就是说，党的领导机关拥有自己的由专家和计划编制人员组成的专门机构，他们是为参加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技术审定而设置的吧？

柯：他们没有必要设置这样的机构——他们完全信任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在解决问题时领导机构遵循的总目的是——制定出最合理的和最成功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您同样应当注意到，制定计划草案的工作甚至吸引了工会组织。工人们在自己的会议上积极讨论计划草案。在我们的很多企业里，您可能会信服：工人、工程师、车间主任和工会组织的工作人

员人人都了解自己国家的七年计划，而这对于完成计划是至关重要的。

加：是的，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柯：当5000万人都在为完成计划而奋斗时，结果必会不差。

加：这在农业部门也是一样的。你们的集体农庄都干得很好……据我所知，你们很重视这七年中大力提高农业化肥的生产。

柯：我们将增加磷肥和氮肥的生产。此为，我们打算，像美国那样，发展合成氨产品的生产，用以代替畜牧业所需的天然蛋白质……

加：去年您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与消费品生产有关。不知您此次被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是否意味着苏联对广泛需求的消费品生产将被赋予更大意义呢？

柯：我国对此类问题的解决并不与个人的情况有何联系。我们有二十一大会议决议，我们会遵循它并按它执行。至于说到我个人，我的工作是要我与许多工业部门打交道。

加：我还想问一个涉及纯粹实践的问题。现在的国民经济委员会体系比初期做得更好些，不知我理解的是否正确？

柯：自然，现在的体系已经成熟了。

加：你们各加盟共和国之间有关生产方面的纠纷是怎样解决的呢？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各国相互抱怨，供货质量不高，不满意他们在其他加盟共和国的订货。这些纠纷谁来调解？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吗？

柯：在组织生产的事情上，没有纠纷是不可能的。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我们就是忙这些事。

加：我之所以提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国在战争时期曾有过全国范围内组织生产的经验，所以我能够理解类似问题的出现。尤其是我国当时经常出现产品质量纠纷问题。而数量又总是和质量相联

系的。我觉得，你们国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看见许多新盖的楼房，照我看，它们的质量本可以更好一些，如果建筑师们能花更多的时间在楼房建筑上的话。看起来，对国家计划委员会来说还有一个大任务——如何在生产大量产品的同时保证高质量。

柯：在达到生产增加而产品完工时间缩短的同时，我们却没有考虑到这些产品的质量。这个是我们计划的方针。质量问题在当今往往具有比数量更大的意义。看来您已经发现了我们产品质量的某些不足？

加：我只是指居民楼的建筑。照我看，如果你们能在建筑上花更多时间的话，居民楼的质量会更好些。

柯：我们是重视建筑质量的。如果您把我们现在建造的楼房与五六年前的相比，您就会发现质量有所改善。

加：是的，有明显改善是显而易见的。我记得，这些问题不止一次在苏联公开讨论过。特别是，赫鲁晓夫先生在自己的谈话中批评了建造者。我还记得，例如，他当时批评了你们的装水管的工人，卫生设备的接口装配得不好。

柯：赫鲁晓夫同志对低劣质量表现出绝不容忍的态度，他要求各个生产部门都要提高质量。

加：2月份我曾到过印度，我看到，你们的专家在布里哈依建造冶金工厂。使我信服的是，从苏联运去的原料质量，苏联工程师的技艺，以及他们一丝不苟地监督建设进程，这一切都是高水平的。如果把你们的冶金设备和美国相比，可以说，除了某些种类差些，大多数和美国相当，还有一部分好于美国。

柯：很高兴听您这么说。

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苏联工程师和技术员用他们的技术、速度、耐心和知识帮助那些印度人。

我希望有机会能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此想向您提一个问题。

我知道，中国现在正进行大工业建设。苏联帮助中国，给中国提供很多设备，对你们来说，这些供应是否负担太重了？

柯：我们和中国之间的一切活动都是遵循我们的计划进行的。我们在计划中考虑了双方的需求。……

加：你们是否打算扩大公布统计资料？在美国我们公布很多信息，每月甚至每周都有信息公布。如：产品生产指数，物价指数等等。如果你们也能放宽这类信息的公布，会有助于经济发展方面的和平竞争。

柯：我不知道，您是否熟悉我们已公布的统计信息。我们出版了许多关于我国国民经济状况的手册，现在已广为流传。在那里，我们定期公布计划完成情况和国民经济状况的消息，这中间刊登的不仅有指数，还有绝对数据。当然，可能我们对资料进行分析注解的文章是少了一些，看来大概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学家太忙于当前工作吧……

加：我想，等多纳尔特·戴维带团到贵国的时候，可以和您适当讨论一个统计资料问题。我们的经济的学家很不满足现在拥有的关于苏联经济的信息量。没有准确的信息是难予评价我们两国之间经济竞赛的进程的。我十分坦诚地对您说——我深信，加强信息交流将会有助于两国消除疑虑，增加相互信任。

我承认，近些年，有关苏联的信息量已大大拓宽了。不久前我和美国赴苏访问的动力工程学代表团谈了一次话。在赴苏临行前他们认为，此次之行大概不会有多少收获。他们觉得，一定会碰到许多困难。但是这里的安排却是：他们想要什么信息，就提供什么信息。而且给他们看了许多他们想要看的东西。这使他们非常惊讶。因此，既然，你们无意掩饰自己的成就，那么何不更多更广地把你们的统计资料公诸于众呢？

我明白，你们的人民是多么富于创造性，他们不以自己的成就

展示于众而感到炫耀。但是我想，公布这些消息对于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信息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柯：我想，代表团感兴趣的東西，其中許多實際上在我國已經公布過的，只是他們不知道而已。

加：在這裡我耽誤了您的寶貴時間，打擾了您重要的工作。非常感謝同您的談話。尤其您如今身居要職，和您的再次會面對我來說真是莫大的榮幸。

衷心希望您能來我國訪問，我焦急地等待著我們在紐約重逢的那一天。

№03644

集体农庄庄员退休保障统一体制委员会的 报告和记录

(1960年3月16日)

根据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委托，我们对农业和渔业生产合作社成员们的社会保障问题进行了研究。

现在，根据农业和渔业生产合作社的规定，集体农庄根据农庄经济水平及一系列其他条件自行决定年老、残疾庄员的退休保障体制和发放金额，大约有一半农庄无法对农业合作社里年老、残疾的庄员施行任何保障。1959年1月1日，农业和渔业生产合作社共有1210万老年及丧失劳动能力的庄员。这个数字中有260万人靠国家各种抚恤金生活，130万人获得少量退休金或集体农庄发给的一次性津贴。而820万却毫无退休保障。

现在，集体农庄的经济实力加强了，他们为发展社会生产创造了必要条件，有能力改善集体农庄庄员的社会保障和给集体农庄和渔业生产合作社的老年人和丧失劳动能力者发放退休金。

确立退休保障体制的必要性主要是从以下两点考虑的：首先，劳动中最积极肯干的一部分庄员，他们是集体农庄的骨干，是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的年龄已达老年；同样，随着农业技术员的更新换代，大批机械师升职为专家，这些人在农机站工作，他们有权享受国家退休保障金。

应当指出，在许多人民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已经实施农业合作社成员退休保障体制。

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所发的指令性方案中，指出要建立统一的农业和渔业生产合作社老年及残疾成员退休金保障体制，它的基础是创建全苏中央基金会，由集体农庄货币收入和按劳动日分配所得的实物部分中抽款集资。建立全苏中央基金会可使集体农庄庄员退休保障在全国范围内更公正、合理化地实现。

向集体农庄庄员发放养老金的数额是依据这样的原则，即参照向工人和公务员发放国家养老金的法规，也就是说，依据工龄及庄员从社会生产中获得的工资多少来确定。

庄员退休年龄规定为——男子 60 岁，工龄 20 年以上；妇女 55 岁，工龄 20 年以上。也就是说，与工人、公务员退休年龄的规定相同。

考虑到集体农庄现有能力和资源情况，指令性方案中提出在 4 年内逐步实施庄员退休体制。1961~1963 年规定退休的有：一级、二级残疾，失去供养者的家庭和集体农庄老年人——男子年满 65 岁和妇女年满 60 岁者。其余已到退休年龄的庄员再过 3 年转退。以这样的顺序在退休体制实施初期退休人员占应退老年人及残疾人总数的 65~70%。

退休金是依照庄员在集体农庄的社会生产中所得月工资确定的。退休金额以现金和实物（按零售价折算）形式发给：其数额大小如下：

年老者——300 卢布工资以下者发工资的 80%，300 卢布工资以上者另加超出 300 卢布部分的 25%。

一级残疾——300 卢布工资以下者发工资的 85%，300 卢布工资以上者另加超出 300 卢布部分的 20%。

二级残疾——300 卢布工资以下者发给工资的 65%，300 卢布工资以上者另加超出 300 卢布部分的 10%。

失去供养者的家庭——明确规定：

丧失一个劳动能力者的家庭——发 75 卢布；

丧失两个劳动能力者的家庭——发 100 卢布；

丧失两个以上劳动能力者的家庭——按每人 50 卢布发放。

对于三级残疾者方案中未定退休保障，而是建议集体农庄为其提供与其劳动能力相适应的工作。

考虑到集体农庄庄员在社会生产中的所得收入水平以及存在个体副业的情况，最高退休金额规定每月为 500 卢布（农村的工人和公务员最高退休金每月为 1020 卢布），最低退休金每月为 100 卢布（农村的工人和公务员最低退休金每月限定为 225 卢布）。相比较，集体农庄庄员平均退休金每月为 180 卢布，而工人和公务员每月为 310 卢布。

根据各集体农庄的呈报，由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区执行委员会下属的主管退休金的委员会对集体农庄庄员退休金额进行审定，社会保障部门负责支付退休金。

在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决议方案中提到，对集体农庄庄员及其家庭成员退休金额的审定和支付工作，由工会执行社会监督，并监督对退休人员的各项服务工作，看其是否公正，是否符合国家发放退休金的规定。工会管理着国家社会保险事业，积累了许多经验，因此能够向农庄和社会保障机构提供巨大帮助。同时，应当指出的是，集体农庄的许多成员，如机械师，专家等，农庄主席和副主席，他们本人就是工会成员。今后，随着社会主义所有制两种形式的不断靠拢，工会将会在农业生产、农村文化生活及劳动者的社会服务等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应尽快合理地把集体农庄中的工会小组转变为第一批工会组织。

核算表明，为了保障给农、渔业生产合作社到退休年龄的所有成员发放退休金，按照退休金发放标准的规定，1961 年大约需 200 亿卢布，占各集体农庄按劳动日分给庄员实物部分（按国家零售价

计算)的9%。

照这个数目向退休保障基金会拨款,在近2~3年内,对集体农庄来说,困难将很大,会导致集体农庄劳动者的工作报酬降低。因此应当在引入退休保障体制之前一年建立基金会,而发放庄员退休金,如前所说,应逐步进行。

如果从1960年开始建立退休保障基金会,而集体农庄庄员退休金制度从1961年开始实行,确定最初3年退休金发给男65岁以上,女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及一、二级残疾者和丧失供养人的家庭,而其余退休者则从1964年开始发放退休金,那么从集体农庄现金收入中和按劳动日分配的实物部分中扣除的款项,全国大体为:1960年4%,1961年5%,之后几年为6~8%,这样的拨款程度大部分集体农庄都能承受。

在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制定的指令性方案中暂时规定了1961~1962年的拨款项目。在这两年内将明确退休庄员的数额,以便更加精确地确定1962年和之后几年的所需拨款率,并作些储备,以防个别地区收成欠佳。

用以建立退休基金会应由农庄所拨款项,建议在征收他们个人所得税时从其收入中扣除。

在确定退休保障体制的同时指出,各集体农庄应确立休假制度并规定休假期限。给集体农庄成员因患病、怀孕、生育而支付的补助金不得少于本年内平均月工资的50%。

指令性方案指出,对于机械师,渔业船舰人员,以及派往各生产合作社的专家,按照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指令,只要他们在渔船和机器站或在国家机关和组织工作的工龄不少于退休工龄的一半,就可按照国家退休法确立的程序和标准领取退休金。退休金由社会保障机构从国家财政支付。在这种情况下,在集体农庄的工龄应算作统一的劳动工龄。

同时指出，由国家财政负担的每月 150 卢布的退休金发给由原集体农庄和渔业合作社后转为国营农场或国企、机关中的老人和无劳动能力的人。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指令性方案和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的指令附后。^①

^①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这些附件。

№03647

莫伊谢耶夫就苏联农业状况 给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一封信

(1965年2月1日)

列昂尼德·伊里奇！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

知道你们工作繁忙，但我还是决定亲自给你们写这封信，因为信中要谈的问题，毫无疑问，对我们国家，以至对世界革命运动在今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央统计局刚刚公布的1964年经济状况统计结果，迫使我不得不亲自给你们写这封信。公布的这个统计结果敲了定音鼓。我们的工业生产增长率从没有低于70%，农业统计的结果就更难说了。特别让人担忧的是，那不明智的自吹自擂。吹嘘在过去的一年内已经过分膨胀了，在非生产性范围又大大地扩大了，虽然，这是在背后说的，我们早已“入不敷出”。实际用于管理、文化和其他服务方面的经济开支已大大超过了经济承受能力。

我是一个土地问题专家，想就农业情况谈一谈。农业方面目前形成的这种状况，如果不及时纠正，那将产生无法补救的后果。作出甚微的决议、措施，是改变不了农业这种状况的，我们必须用一年、二年时间，一而再、再而三地采取刺激农业发展的措施，否则农业就可能陷入困境。现在，对农业、农村、农民必须采取重大的政治、经济政策的调整，已迫在眉睫。

那么，迫切要求改变农业政策的必要性从何而来？

这当然是由国内外突出的政治、经济原因所决定。

1. 由于斯大林的错误（它们是确实存在的），国内农业产品长期短缺。战后到现在，许多年过去了，我们老老少少对战争仍保持警惕。此前，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也曾经饱受战争之苦，如法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但战后至今，他们不仅恢复了农业生产，并且很快发展到能向我们出售余粮的地步，真使我们汗颜。而我们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具有比他们的小农经济更加优越的潜力，然而却没有得到发展。

2. 这种经济状况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人民的政治情绪。工业工人的情绪不仅表现在天天的抱怨和对产品的低速增长，而且可能引发可怕的病兆。捷米尔套、新切尔卡斯克等等事件就是因为当地领导目光短浅、办事马虎所引起的。在农村，不健康的政治情绪的增长表现在，大批劳动者离开农业生产。算一算，如果说国营农场工人的平均工资只达到工业工人平均工资的三分之二，那么，集体农庄庄员的工资则更少了。当然，这也没什么可让人惊讶的。

3. 我国农业长期的不景气冲击着世界工人运动。要知道，社会主义国家对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和世界工人运动的影响作用首先是通过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来实现的。众所周知，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供养了西欧，而现在自己却从西欧进口粮食。由于我们在农业上有困难，所以就不能阻止国外对我们的思想侵蚀。

敌人幸灾乐祸，朋友和盟友中间产生怀疑和动摇，只要回想一下И.托尔雅季的笔记就够了。我们农业的混乱妨碍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我国农业不成功的原因在哪儿？当然，原因很多。但较大原因是，由于赫鲁晓夫的癫狂行为、他的粗暴的行政命令、操之过急的无根据的计划和建议，造成了农业的困境。

还可以不夸张地说，造成农业艰难状况四分之三的原因在于，

我们对商品经济的要求和原则给以粗暴的压制和破坏。党的纲领、教科书和许多文章中讲到，社会主义阶段就存在商品生产、城乡商品交换。这就必须考虑和遵守商品经济的原则和规律。而实际呢，实际上商品生产的基本原则和要求被破坏了。

实际上：

1. 商品经济要求，经济要实现商品的销售。也就是说出售对个人继续扩大再生时所不需要的产品（如种子、饲料、粮食等），也就是在扩大再生产方面没有很大价值的产品。实际上我们不仅收购真正的商品部分，而且还把用于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产品也收归国有了。尤其是党中央和政府用不理智的报告和贺词把这种行为看作是一种英勇精神，在报刊上大肆宣扬，这就是把我们赶入了死胡同。

2. 商品经济意味着产品的交换必须遵守最基本的等价交换的原则。在1953~1958年期间，我们一边肃清斯大林的错误，一边就恢复这个等价交换原则做了很多工作，终于取得最良好的结果——农业开始走上坡路。很可惜，到了1958年底，却又实行了一系列缺乏根据的措施（如降低某些农产品价格、提高燃料、配件和其他工业产品的价格），使农产品的交换比例下降。这些和赫鲁晓夫的其他一系列做法，导致近年农业上升势头的下降，而决不是气候的原因。赫鲁晓夫的做法某些已得到纠正。但是不应该认为，工业品和农业产品之间应有的等价交换已经恢复。我不能举这方面的实例，但可以说，如果在1928年（当时还没有完全的等价。斯大林对那时的价格这样正确表述“我们从农村得到的东西，就像是贡品”），买1公斤糖，农民就得出售7公斤麦子。而在1962年，买1公斤糖，需要向国家出售14公斤小麦。到现在，买1公斤糖，需要出售15~16公斤小麦。这只是一个例子。你们可以向中央统计局咨询，他们会给你们提供有关农业和工业品价格变化情况的资

料，能提供我们整个革命历史和进程中的资料，也能提供与国外对比的资料。统计资料会向你们表明，与其他商品交换的比例使农业损失更大。

我早已想到，工农业产品应该完全等价交换，我也明白，我们现在不应拒绝用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和流通中收税的办法来吸收农业的部分纯收入用于全民需要。但是在这方面要有分寸，现在的情况是为了有利于农村和农业发展必须改变已形成的不合理比例。

3. 等价交换不仅取决于农产品实际价格的水平，而且取决于工业产品价格的水平。这在前面已叙述过。可是为了弄清历史和问题的根源还应该再补充说一下。战前战后我们的农产品销售价从来没有下跌过，相反，还不断地上涨，1953~1958年价格大幅度地上涨。然而，由于大幅度地提高了工业品的价格，所以农产品所占交换比例则越来越小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要使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换走上正轨，我们不仅要调整农产品的买卖价格，尤其是许多粮食制品的零售价，而且要降低工业制品的价格。

为了使城乡经济关系和商品交换走入正轨，在当今条件下急需做什么呢？我认为，必须做到：

1. 考虑到国家的粮食储备对国家的供应和预算的意义，在征购储备粮时必须杜绝专横，并力争给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以稳定的环境，使经济活动走上最必需的有效、合理的轨道。

1) 坚定不移地实行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至少在五年内，按每个区每公顷不同的定额向国家出售粮食、肉、牛奶。绝对禁止任何以刑事责任和党纪处分相威胁，禁止在采购产品中超出此定额而给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下达交售任务。

2) 确定这些产品的出售定额和范围，必须让国营农场和集体

农庄有足以扩大再生产的种子、饲料和粮食。非商品生产区则无需上交粮食。……

3) 允许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把超出定额的多余的产品按集体农庄市场价格，出售给国家合作社组织。

2. 由于国家缩减粮食供应品，所有的农村居民点，包括区中心，都靠集体农庄市场供应。

3. 取消国家现在从大城市郊区和工业中心近郊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采购土豆和蔬菜（也许还有牛奶）的不正确做法。

允许这些地区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通过自己在集体农庄里的商店、货摊、农庄集市，以及合作社、代销点，把这些农产品按商品市场价格出售。……

我们不顾经济需求与可能来过分扩大我国的教育事业。当然，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教育规模应该扩大，指标应大大高于资本主义国家。只是我们做得太过火了、太心急了，显然我们在这个方面是人不敷出。无疑，现在的条件变了，但怎么不想想列宁说的话，“要发展经济，必须在所有部门，甚至在学校，节省开支。”

难道在我们国家生活的这一时期需要如此夸大中等教育的作用吗？好像没有受过中等教育，就不能让挤奶工、饲养员、纺织工人和类似的其他工作人员走上工作岗位似的。他们受过七年教育，难道他们的职业知识还不够吗？

相反，由于心理和道德方面的原因，现在很难把正受中等教育的青少年列入生产队伍中。成千上万的人由于没有拿中等文凭而离开生产劳动，我们为赶上达到这些教育指标而花费了数十亿资金啊？！

高等教育也是如此。不顾经济的能力和社会需求，一味夸大高等教育的作用，让成百上千的朝气蓬勃的居民为此而离开生产劳动岗位，而国家白白地耗费几十亿卢布。

我不是蒙昧主义者，不反对教育，我本人也在高等学校为教学付出了不少力量。但是我是个经济学家，我也清楚，我们抢先走在前面，但步伐却与我们的经济发展不协调，那么后果就等于是伤害了经济。

我对农村经济的所有建议，总结为一条——必须客观地恢复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所有的议论都认为，这是后退。但这些议论都是死守教条者的不能深思熟虑的结果。迈向共产主义的真正步伐是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遵守它的客观规律和要求，从而加快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经济基础。

当我们拥有了稳固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可是又害怕扩大城乡之间的市场关系。这是很奇怪的。让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发展起来、富裕起来，这才是真正地向共产主义发展。这不但不会妨碍工业的发展，相反，它还会给工业提供原料，给工人提供粮食和其他必需品，就等于推动工业加速发展。

№03648

斯塔罗夫斯基关于经济发展统计数字 给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报告（摘录）

（1965年7月24日）

英国杂志《新闻评论》刊登了一篇文章，其内容是摘自据说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阿甘别吉扬的演讲和报告的片段。文中对苏联经济进行了不正确的评论，在许多地方则是直接的诽谤。

以下举文章中一些基本的论点和实际的资料。

文中论述：

1. 中央统计局核定，1963年苏联粮食收成约80亿普特

实际情况：

1. 中央统计局公布资料显示（见《苏联1964年数据》文集），1963年粮食总收入为一亿零七百万吨（这约等于60.6亿普特）

文中论述：

3. 由于粮食价格的提高，实际收入减少了。

实际情况：

3. 实际上劳动者的收入并没有减少，而且增加了。至于零售价，不论是国家还是合作贸易，近几年内都很平稳。以下是相应的资料（对去年的百分比）

	1962年	1963年	1964年
苏动人民的实际收入			
按一个劳动者计算	104	102	104
国家贸易和合作贸易			

的价格指数	101.7	100.9	99.6
大城市集体农庄 市场的物价指数	108.8	100.2	105.5

文中论述：

……

6. 苏联人不想浪费钱，他们宁愿把自己的钱压到木板下藏起来，也不愿买质量低的商品。

实际情况：

6. 在苏联，商品周转率逐年增长，这从以下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出：

	1962年	1963年	1964年
商品周转率			
比上一年的百分比	106	105	105

居民并不是把钱压到木板下藏起来，而是把它们储蓄到银行。这从以下数据可以看出：

	1962年	1963年	1964年
储蓄数量			
以百万卢布为单位	52.4	53.5	53.6
储蓄数额			
以十亿卢布为单位	11.7	12.7	14.0

文中论述：

……

9. 苏联用于国防的费用与美国的相等，但是苏联的经济潜力却比美国小一半。

实际情况：

9. 苏联的军事费用1964年为133亿卢布，而美国则超过550亿美元。在苏联，这仅占国民收入的7.3%，而美国却占15%，苏

联的国民收入为美国国民收入的 62%，而工业品——65% 以上。

文章中还引用了其他的说法，显然是阿甘别吉扬编造的，他说苏联经济“混乱”，说斯塔罗夫斯基^① 批驳美国对苏联经济的评价而西方报刊的争论是不正确，说修理汽车用的工人比使用汽车的还要多，说出售给国外的商品是低成本的，说苏联的商品积压已达到西方经济萧条时期的水平，他还说中央统计局把统计材料小心地藏起来，他说从美国杂志上得到的消息要比从中央统计局得到的可靠得多……

中央统计局认为以上做法肯定是有目的的。如果英国杂志上刊登的这篇文章纯粹是作者杜撰出来的，那么英国杂志上的这些谣言则由阿甘别吉扬本人承担全部责任。如果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别的目的，那么，应该由其他与此相关的作者承担责任。

^① 斯塔罗夫斯基，时任苏联中央统计局局长。

【专题说明】

对于利特肯斯违反法制行为的处理

(1955年9月)

在清除了贝利亚及其亲信以后，苏共新领导人对克格勃某些下级干部也进行了审查和清理。利特肯斯上校就是其中之一。在长达多年涉及千百万人的大清洗中，参与者决不是一个小数。应该说他们中大多数人的所作所为主要是受上面路线的指挥和制约。看来利特肯斯已由克格勃调到中央机关工作，他是由苏共中央行政管理部清查出来的。为什么清查他，而且还直接向苏共中央报告，其具体原因不得而知。不过从这一案件的材料中可以了解战后苏联政治清洗的某些具体真相。

(本专题文件由杨存堂编辑和校注，
温耀平翻译)

№03361

苏共中央行政管理部关于上校利特肯斯的 简要报告

(1955年9月1日)

责成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研究有关利特肯斯违犯苏维埃法制的材料。

中央书记

致苏共中央

苏共中央行政管理处从掌握的材料获悉，上校利特肯斯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期间曾破坏苏维埃法制。

利特肯斯同志在1949~1953年期间任国家全部沃罗涅什州分局副局长，其间曾无根据地逮捕和拘留苏联公民，并利用专业技术设备窃听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电话谈话。

1950年，利特肯斯同志在未搞清案情的情况下，无根据地以背叛祖国罪逮捕了公民博伊科。在侦讯过程中，因公民博伊科被指控的罪行未曾取得证据，于被捕2个月后获释。同年，利特肯斯又根据未经查实的材料把农庄庄员沃罗比约夫作为通缉的祖国叛徒加以逮捕。直至审讯时才得知：逮捕的是与通缉中的祖国叛徒案件无任何关系的完全另一个人。对沃罗比约夫的无根据的逮捕和释放均对检察机关进行了隐瞒。

1949~1950年间，国家全部沃罗涅什分局曾逮捕一批年轻

人，即所谓“青年共产党”的成员。在这个案件侦讯过程中，利特肯斯同志严重破坏苏维埃法律。因“青共”案件被拘押的人员巴图耶夫、卢特科夫、日古林、鲁德尼茨基、波德莫洛金、拉德克维奇和基谢廖夫，因利特肯斯的过失未经检察长批准被拘禁了8天。在一系列被捕人员的审讯记录中作了不确实的、损害党的沃罗涅什州委领导干部威信记载。其中一份记录竟是在利特肯斯同志参加下做出的。

在“青共”案调查和侦讯期间，曾对前沃罗涅什州党委书记巴图耶夫同志、州党委行政管理部部长马卡列维奇同志、州委粮食工业部部长库拉克同志、州法院院长鲁德涅夫同志、州计委主任济明同志（他们的子女在一定程度上涉嫌“青共”一案）进行了电话窃听。此外，还在并无任何专业行动必要的情况下对原沃罗涅什市市中区党委书记、现任州委行政管理部部长的加里宁同志，以及其他一些州的领导干部进行了电话窃听。

电话窃听是根据前国家全部沃罗什州分局局长苏霍多利斯基的口头指示进行的，对此，利特肯斯同志是知道的，因为他了解了上述人员大部分的电话谈话内容。不仅如此，1950年，根据他的口头指示，还对苏共沃罗涅什市委指导员卡莫利科夫同志的电话通话进行了两个月的监控，而国家全部州分局并不掌握任何损害其威信的材料。这样，利特肯斯同志就把契卡的重要工作措施不用于原定目的，而用于搜集材料损害党的干部的威信的目的。

在契卡专业工作中使用错误的方法，以及破坏苏维埃法制的做法，早就发生过。1941年，还在利特肯斯同志担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三处科长时，他就和他下属的工作人员别洛夫同志给予间谍“米哈伊洛夫”（西伯利亚总督的儿子，国内战争期间曾在高尔察克军队任中尉）一个诬陷任务，要他写一份“俄罗斯纳粹党”的纲领提要，交给准备加以诬陷的当时任“国家稀有金属设计院”主

任工程师的费奥克蒂斯托夫修改。除了间谍“米哈伊洛夫”的捏造报告外，没有任何指控费奥克蒂斯托夫的材料。尽管如此，费奥克蒂斯托夫还是被逮捕，并处10年劳动改造。1954年8月，费奥克蒂斯托夫得以彻底平反，获释。由于长期在劳动营中度日，他患有结核病，并被认定为二级残疾。

利特肯斯所犯的粗暴破坏苏维埃法制和在谍报专业工作中运用错误做法的事实，是他对于国家安全机关揭露苏维埃国家真正敌人的任务认识有错误。这从他1952年11月写给贝利亚的信中所陈述的工作方针可以看出。利特肯斯在信中断言，国家安全机关在揭露敌人方面工作不力的原因之一，在于“检察部门的过分监督，他们甚至认为我们对推断有罪的人进行审问就是破坏苏维埃法制。”利特肯斯建议对苏联公民采用“在秘密场所或国家安全部驻地持续地不公开审问；如有需要，则长期监禁或释放，而不必按规定经司法和检察机关审批。”利特肯斯还为国家安全机关以前使用的、被苏共中央谴责过的那种审问被捕者而不作记录的有害做法进行辩解。

由于粗暴破坏苏维埃法制和在谍报业务工作中的错误行为，利特肯斯同志已于今年7月从国家安全机关被清退。

我们认为，利特肯斯同志因破坏苏维埃法制应承担党内责任。据此，建议将有关上校利特肯斯破坏苏维埃法制的必要材料移交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

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附后。

苏共中央行政管理部副部长 佐洛图欣
苏共中央行政管理部处长 季库诺夫

【专题说明】

苏共二十大与格鲁吉亚事件

(1956年3月)

1956年3月5日，也就是斯大林去世三周年纪念日，格鲁吉亚共和国首都第比利斯和其他一些城市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和集会。这是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会议上作了《关于个人迷信》报告后，在斯大林的故乡引起的激烈反响。示威和集会是在哀悼斯大林和保卫斯大林的口号下进行的。开始，格鲁吉亚党和政府采取观望的态度，大规模的示威和集会持续到3月9日，局势越来越激烈。为了驱散示威的群众，当局动员了军队并使用了武器。苏联当局一直封锁这方面的消息。《劳动报》记者斯塔特尼科夫是这一事件的目击者，他当时给自己报纸的主编写了秘密信件记述了事件的过程，可以从中了解某些真相。可惜的是，至今没有发现这次事件中死伤人数的确切记录。格鲁吉亚事件反映了苏共二十大前后苏联国内复杂的政治形势。

(本专题文件由杨存堂编辑和校注，
温耀平翻译)

№03259

斯塔特尼科夫关于格鲁吉亚事件经过

致布尔科夫密信

(1956年3月12日)

抄本

致《劳动报》主编布尔科夫同志

给您寄去两份文件的复制件：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格鲁吉亚共青团中央的告居民书和第比利斯卫戍司令的命令。

告居民书和命令从3月9日至3月10日24时用无线电每隔15~20分钟（昼夜不停）用格鲁吉亚语和俄语反复播放。3月10日一早，全城就贴满了这个命令。

这两个文件的内容本身就促使人们认真思考！

那么，格鲁吉亚首府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为什么要用大功率的扩音器用两天时间向第比利斯居民播放告居民书？

为什么需要发布命令通告实施军队巡逻制度？

我将力求较详细地回答这些问题，也就是说，通过不公开的报道来叙述我本人亲眼目睹的或从可靠消息来源（在场的共产党员、新闻工作人员）得知的事件经过。

为了使事态的脉络更加清楚，我将按照时间的顺序叙述事件的发展过程。

3月5日上午10时左右，我正在劳动宫大厦附近（回记者站

途中)。突然，传来尖锐的持续不断的汽车鸣笛声（按汽车检查监督机构的规定这是不允许的），随即从街角转出来一群人。是一批不戴帽子的大学生（约120~150人）。队伍沿街道中央行进。最前面的一排人举着斯大林的画像和几个花圈。队伍的组织者不断向驻足在人行道上的人群讲话，号召他们脱下帽子向斯大林表示哀悼。也有人不时从队伍中跑出来，走近停下的汽车，要求司机持续鸣笛。这一天，出现了几支这样的队伍。这些队伍都是去广场给斯大林纪念碑献花圈的。

第二天，这样的情景又再次重现，但更加有组织。人数在增加，特别是在中午几个学院下课以后。除斯大林的画像外又增加了列宁的画像，出现了挂有服丧绸带的红旗。

这天下午4时，党中央召开了一次会议，我也参加了。请来了各部和报刊的领导工作人员与会（有70~80人）。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扎瓦纳泽同志宣布开会后，在简要的讲话中号召与会人员开展实际工作贯彻执行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然后，他宣告将传达苏共中央“关于个人崇拜”的信件。致歉后他随之离开，让中央书记姆切德利什维利同志代替他传达文件。

读毕文件，通报我们说，信件内容将传达到所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没有任何人提出问题，会议就此结束。

3月7日，国立斯大林大学的学生们一早就停止上课，前往市区街道。支持他们的有农学院、工学院和其他一些学校（在第比利斯共有19所高等学校）的学生。格鲁吉亚的中学生也参加了大学生的行动。这里应当指出，有几批大学生强迫中学生上街，打断了课业，并威胁校长们说，否则要打碎玻璃，殴打他们。所有这些人群的行动没有受到任何人制止，他们在该市主要大道——鲁斯塔韦利大道——向列宁广场行进。大约在上午11时左右，在政府大厦附近，在汽车持续鸣笛声中，这些人群齐声大叫：“光荣属于伟大

的斯大林”、“光荣属于领袖斯大林”。然后，他们继续向列宁广场移动，又在市苏维埃大楼附近停留。一些人朗诵关于斯大林的诗，合唱颂扬斯大林的歌曲。

3月8日，游行队伍的数量增加了。出现载满人的卡车。人们在车上举着红旗和列宁、斯大林的画像在市内各处行驶、高喊“列宁—斯大林”、“光荣属于斯大林”等口号。当然，谁也没有分拨汽车给他们，但做法很简单：人群挡住空车，爬上车厢，用殴打相威胁（如果司机不是格鲁吉亚人）或者用格鲁吉亚的民族感情来打动，迫使司机开车载他们在市内周游。也发生这样的事件，当一名司机拒绝开车时，这是在斯大林大桥上，流氓们把他从驾驶室拉出来，从桥上投入库拉河。发生过几位司机不听从而被打的事件。

这一天气氛已经十分紧张。大约下午3时左右，我在列宁广场上的人群之中。某些策动者和挑唆者登上检阅台，向汇集的人群提出种种建议。例如，当有一个人喊道：为什么市里没有服丧的旗帜？市苏维埃门前原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像的覆墙画为什么不挂出来？然后，有人就问：谁同意挂像，请举手！人群中发出一阵喝采声，并且大喊：我们要求立即把画像挂上去。一批约几十个人便奔向第比利斯市苏维埃。他们找到管理员，找到那块立即把画像挂上去。一批约几十个人便奔向第比利斯市苏维埃。他们找到管理员，找到那块覆墙画，并从屋顶上，在人群嘈杂的赞扬声中，把画像挂到了大楼上。民警局工作人员有什么反应呢？什么反应也没有。这些日子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和格鲁吉亚人民的儿子——斯大林—朱加什维里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名字一再被提到，以强调突出自己的感情。

然后，检阅台上的人又指着外高加索军区司令部的大楼叫喊道：“格鲁吉亚人！如果你们想挂列宁、斯大林的画像，就去提出要求吧！”这就足够了，人群当即涌向司令部。卫兵及时关上了铁

门。于是，人群开始砸门，大喊大叫，有几个人在好事分子的赞许声中从水管爬上阳台，挂起了两幅服丧旗帜。人群在司令部门口喊叫了约一个小时。随后，可能得到指示，士兵们从大楼顶上放下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大幅画像。

而这时，从检阅台上不断传下新的“要求”：全市服丧、装上麦克风和扩音器、建议诗人和作家们对格鲁吉亚人民讲话。不仅如此，还建议要把当天来作客的朱德元帅请到这里来（而且当即拼凑了一个代表团）。以后，台上又宣布，他们同他谈过了，但他因病不能来。

傍晚，列宁广场和纪念碑前都已安装好了麦克风。成千人的群众可以清楚地听到发言。挑唆者们控制了讲台，更加不遗余力地用民族主义和反苏的演讲煽动人们。事态遂按照敌对分子所设想的那样发展起来。

发言者的姓名照例都不宣布，或者宣布一个假名字。这些“演说家”毫无顾忌地发表挑动性的演说，内容基本上都是沙文主义和反苏性质的。兹举出我所听到的几例如下。

一名发言者（在列宁广场）用长篇演说历数了斯大林的功绩，最后总结说，自斯大林去世以后，原先取得的成就都在消失，国家，首先是格鲁吉亚必将死亡。然后，从口袋中掏出党证，号召为斯大林的事业而奋斗，如果有需要也将献出自己的生命。接着他在空中摇动着党证，喊道：“谁愿意宣誓，请举起来”。空中闪烁着若干张党证和几十张团证。他们高喊着：“我们宣誓，我们宣誓！”

站在我身旁的民警局工作人员，有的表示愤慨，而有的则微笑而已。谁也不曾向讲台移动半步去检查这名挑唆者（也许他手中的党证是偷来的）。但是，播下的挑拨的种子发出了反革命的芽。紧接着下一个发言者就表达得更加粗暴和更加直截了当。一个梳着塔尔齐发型的壮汉，自称是大学生，开始挥舞拳头，漫骂了一通党和

政府领导之后，回顾了格鲁吉亚反对外来敌人的斗争历史，最后说：“有谁胆敢玷污对斯大林的光辉记忆，格鲁吉亚人是不会原谅的。不准批评斯大林——我们的领袖。修正斯大林的观点就是修正马克思主义。他们将因攻击斯大林而付出血的代价。”

这名“演说家”赢得长时间的鼓掌。而这竟发生在格鲁吉亚首都的中心广场上！

谁也不曾试图去制止这种胡闹。突然，不远处发生一起殴斗，有人大声求救。原来是一群流氓殴打一个对此种情景出声表示愤慨的人。警察好不容易才把被害人抢了出来。

麦克风旁的发言继续进行着。突然传出用俄语讲话的声音。因为这时我站得较远，没有看清讲话人的面孔。但是，格鲁吉亚的口音告诉人们，讲话的并不是俄罗斯人。这里要声明一句，为了小心起见，我没有做记录，只是努力记住讲话内容。这一天，有一个带照相机的人把相机对准讲台，当即挨了一顿打，相机也被砸坏了。下面我根据记忆转述这位老兄的发言（他是宣读的）：

“我是莫斯科一个学院（什么学院，他没有说）的大学生，代表莫斯科所有大学生向你们致以衷心的敬意，并告诉你们，他们紧紧地握住你们的手，并请求你们把开了头的事情继续进行下去。我们保证（这里他特别提高了声调）予以支援。和格鲁吉亚人民一样，我们也对中央那封矛头指向领袖斯大林的信十分愤慨。写这封信的目的是破坏各族人民的友谊，制造不和，把历史拉向后退。谁也不会容许贬低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伟大的斯大林的功绩。只有人民的敌人才会修正马克思主义。”

这时有一个女人，为了进一步渲染气氛，在台上喊道：

“请听吧，格鲁吉亚人！莫斯科有人支持我们。现在，不仅仅在格鲁吉亚，而且在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和其他城市也在举行群众大会。我们宣誓，将为斯大林的事业而奋斗！”

当人们把青年诗人诺涅伊什维利抬上检阅台时，响起了一片赞扬声，掌声四起。他朗诵了颂扬斯大林的诗。然后，他高声喊道：“我也和你们在一起。”

这一天发言的还有格鲁吉亚知识分子的其他代表人物：阿巴希泽、卡拉泽、博博希泽等诗人和作家。他们朗读了在斯大林逝世之日写的诗。

但这还不能使人群满意。麦克风传出这样的声音：“我们要求有关于斯大林的新的诗作，你们要表达这些历史性日子的情绪。”

“我们等待院士诗人、斯大林奖获得者约瑟夫·格里沙什维利的表演已经两天了。为什么他不来表演？当斯大林在世时，格里沙什维利拿到许多钱，而现在却不想说一声感谢吗？这样的诗人格鲁吉亚人是不会原谅的。”

任何人上台发言都行，只要他表达出挑唆者们制造的情绪就行。甚至有这样一个神父，他为格鲁吉亚人的神圣事业——捍卫斯大林的名字——而祝福。

据说，在纪念碑（摆满了花圈）附近，“演说”更加令人气愤。

3月9日，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狂热情绪发展到了极限。在街上游荡的已不仅是青年，而且也有成年人。大多数劳动组合都停了工。小机关的职员都丢掉工作，走上街头。某些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企业出现不上工的现象。简单地说，城市的正常生活遭到明显破坏。这就是为什么党中央（固然，已经很迟了）发出告市民书的原因。

从早晨起，公共交通的运行——电车、公共汽车、无轨电车——就受到干扰。数以十计的卡车装满了人，举着旗帜和画像在市内行驶。他们唱歌，高喊“列宁、斯大林”、“光荣属于斯大林！”在市内的街道上出现了降半旗的做法，大楼的门前都挂上了列宁、斯大林像。前一天晚上，共和国报纸《共产党人》和《东方曙光》

的编辑部闯进一批不明身份的人，威胁说，如果不出版悼念专号就要把编辑部和印刷厂炸毁（此后两个编辑都布置了警卫）。

3月9日，两家报纸发表了社论《纪念约·维·斯大林逝世三周年》，刊登了“列宁和斯大林在戈尔基（1922年）”的照片。报纸在第一版上登载消息说：“今天，3月9日，共和国各企业、机关、学校于中午1时召开纪念斯大林逝世三周年的群众大会。”

我去参加了斯大林机车车辆修造厂的群众大会。这是格鲁吉亚最老的一家企业（原先是一些大的铁路工场）。在工厂的院子里搭起了主席台，挂上了斯大林像。

厂工会主席达什涅利同志宣布开会。第一个发言的是厂长马察别里泽同志。他的发言是按照《东方曙光》的社论起草的。接着他通报说，工厂全体人员正在胜利地为实现党的第20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奋斗。两个月的计划超额完成了。讲话结束时，马察别里泽同志号召更加效地进行工作。

革新者、二十大代表、车工春布里泽同志、工厂最老的工人安塔泽同志、组长秋林同志、钳工别捷纳什维利同志和其他几个人发了言，宣称将要更加高效率地劳动，以斯大林命名的工厂集体将站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战士的最前列。

但是，无论是报告人，还是发言者，都只字不提城里发生的事，也不指责那些不光彩的挑唆者。我还漏了一点，市委和党中央并没有任何人参加会。其实，应当在会上发言，并向工人们说清，城里的事纯系一种挑衅。

然而，在共和国其他城市里哀悼日一切正常。在哥里和库塔伊西，全市的各处群众大会是在党组织领导下召开的，会后人群都散去了。

但是，在第比利斯，从一早起就到处在开大会。中午1时，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扎瓦纳泽同志在列宁广场作了简短的

讲话。最后他宣布，人们的“请愿”会进行研究并得到回答。人们开始散去。但是姆扎瓦纳泽走后，一名女的挑唆者向人群喊道：“停下来！今天内务部传唤我去，叫我签字保证不再发言。我问你们，这是为什么？”人群于是又停留了下来。

晚上在斯大林纪念碑附近又挤满了人。又讲了许多奇谈怪论。据说，有一个叫做别索·日根季评论家发表了一篇民族主义的反苏演说。宣读了一份“请愿书”。这份挑衅性的文件中有的条款说：不要阅读“关于个人崇拜”的信，更换政府，等等。

乘卡车的人们表现得更加令人气愤（事先把卡车号码去掉了）。他们在街上行驶，并大叫：“光荣属于斯大林，用鲜血捍卫斯大林！”

而且有的人在乘坐卡车和私人汽车行驶中，一面呼喊口号，一面做出各种激烈的姿势——挥舞短刀和匕首，同时侮辱性地漫骂党和苏维埃领导人。

结果，到夜晚近11时（第比利斯时间），在邮电大楼（距党中央200米处）附近发生了最可怕的事，而按照事态发展也是可以想见的。

这时许多机关已经布置了警卫。而党中央大楼、政府大厦、司令部、报社和电报局则更是戒备森严。

23时45分，一大群人（原先在纪念碑附近的）涌向邮电大楼（其间距离不大、共约400米），并且高喊：“占领无线电台”、“占领电报局”。原来在此之前曾派出一批约10个人去发一个什么样的电报。放他们进大楼以后，把他们拘留了（为了查明身份），这事被纪念碑旁的人群获悉。在挑唆者的号召下，一群人被派到那里去解救被拘留者。通往大楼的道路自然被封锁了。有人从后面向自动枪手射击，一名士兵还被人捅了一刀。人群不断进逼，不得不用枪托来摆脱人群。流氓们则动用了一切：拳头、刀子、石块、皮带。向空中发出了警告性齐射，人群中则再次有人进行抵近射击，破坏

者继续进逼不停。战士们没有别的办法，他们的生命面临威胁。于是不得不采取防卫措施。这之后人群才退散开来。

之后，动用坦克驱散了列宁广场上的人群。鲁斯塔维利大道和广场上清除了闲人。许多人散去。人群仍然聚集在纪念碑附近。这里不能采用同样的紧急措施。挑唆者利用了纪念碑位于公园内而周围有大量树木这一条件。

敌对分子开始利用人们的民族感情进行挑唆。

他们喊道：“格鲁吉亚人，有人已经为斯大林流了血。我们要继续斗争，任何一个格鲁吉亚人都不应离去。”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开来的部队包围了公园，呼吁人们散去。得到的回答是一片嘲笑和侮辱的言词。对一次再次的警告人群中有人扬起拳头和小刀。结果到夜间3时左右推压人群时，流氓们和挑唆者进行了反抗，向士兵发动攻击，抢夺冲锋枪，军人中有人负伤。不得不再次动用武器。

这就是未及时加以取缔的挑衅（看来是外国间谍和破坏分子策划的）造成的后果。关于这一点即使用以下一件事也足以说明：一名受伤士兵的土耳其马刀也被抢走。

在哥里也发生了挑衅事件。这天夜间（4时），哥里棉纺织联合企业门口开来了几辆卡车，载着从第比利斯来的“示威者”（从第比利斯到哥里乘车约需2小时）。这伙人闯入企业内部。挑唆者们开始喊叫：“你们还干什么活？第比利斯正在打内战，俄罗斯人在杀人。”一部分工人跟随挑唆者走了。他们在联合企业的工人宿舍里把人们喊醒，强行拉上卡车。几辆汽车载着联合企业的工人开往第比利斯。早晨，企业领导不得不把不同班次的工人集中起来，才能使联合企业的生产不致中断。

3月10日早晨，第比利斯市贴出了命令（在某几处被人撕去）。人们悄悄地相互走告夜间的事态，责怪政府和俄罗斯士兵。

尽管在纪念碑附近成排站着冲锋枪手，制止人群靠近，要求迅即离开，有些人不肯听从。中午12时左右，桥上聚集起一大批人，并随即冲向纪念碑。向空中发出的警告性齐射使人群冷静了下来。这一天挑唆者还曾试图夺占军用仓库。3月10日和11日，军人在市内加强了巡逻。各级党组织召开大会。各企业安排了夜间值班。

现在市内秩序已经恢复。部分破坏者和挑唆者已抓获。各机关都工作如常。

自苏联维埃政权建立以来，在第比利斯这是第一次反苏发动。1924年在格鲁吉亚的某几个区发生过孟什维克的冒险行动，但是那时在第比利斯则是平静的。

这几天的事件说明，我们，首先是情报部门，在这里有所疏忽。敌人正是利用了最软弱的地方——民族感情。沙文主义者浮到面上，开始猖狂行动。不排除有可能存在间谍指挥中心。因为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有人在组织策划，有人曾仔细地制订了行动计划。

依我看来，这几天应当暂停传达“关于个人崇拜”的信件（党中央约有150人在3月4日和6日得知了这封信）。因为5日和6日已经有了迹象——送花圈的游行队伍。允许装麦克风已经是错误了，既然装了，那党的领导干部（中央、市委、区委、）和所有党的积极分子就绝对一步也不能离开麦克风，而且要自己安排发言，领导……正是利用缺乏领导之机，不光彩的人们就把事情推到反苏行动的地步。

在第比利斯滋生泛滥着不少不工作而靠父母的钱过活的无业之徒。据说，这里有好几千名大学生毕业后不愿去区里工作，他们终日无所事事、只知酗酒和滋事。实际上，挑唆者正是从这批人中搜罗追随者来执行自己的冒险计划。看来，现在不得不将对城市认真进行清查。

我早就在格鲁吉亚居住，能说格鲁吉亚语，熟悉格鲁吉亚人民

的风俗习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正直的，忠诚的苏维埃人。不管怎么说，我很熟悉的人们都深感气愤。他们说，“格鲁吉亚在整个苏联丢了自己的脸。”年轻人中出现了一批没有原则的流氓，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朋友”和“伙伴”不惜去犯罪。在格鲁吉亚，以前参加“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组织一度十分时髦。从最近的事态看，我怕挑唆者们可能会拼凑起类似的组织。

我相信，苏共中央会查清一切情况，并做出相应的结论。

《劳动报》驻格鲁吉亚共和国记者 C. 斯塔特尼科夫

1956年3月12日

第比利斯市

附 件

告第比利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 工人、职员、全体劳动人民书

3月5~9日这几天是第比利斯劳动人民的哀悼日，是人们缅怀约·维·斯大林逝世和治丧的吊唁之日。这几天，第比利斯的劳动者们前往广场斯大林纪念碑前寄托哀思。这种感情是完全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

但是，在这几天哀悼的日子里，竟出现了一些不光彩的人——破坏分子和挑唆者，他们企图利用格鲁吉亚人民的儿女的哀伤之情，破坏约·约·斯大林为之献出自己一生的列宁的伟大事业。他们走上了胡作非为、破坏社会秩序的道路，妄图破坏机关、企业、学校的正常工作和城市生活。

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号召所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全体苏联爱国主义者、一切珍惜社会主义事业、人民事业的人，立即全面恢复市内秩序，制止破坏分子和挑唆者的活动，保证所有机关、学校的正常工作。

共产党中央和共青团中央也呼吁那些受挑唆分子欺骗的第比利斯公民，立即回到自己正常的事务中去。

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和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坚信，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定能坚定地带领所有劳动人民前进，并保证市内的正常生活。

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
格鲁吉亚列宁共青团中央
1956年3月9日

第比利斯市卫戍司令第14号命令

近日来第比利斯市内有人破坏公共秩序，破坏企业、学校的正常工作和第比利斯市的城市生活。

为制止破坏城市秩序的行为，

特命令：

第比利斯市警备长马库舍夫中校自1956年3月9日24时起实施军队巡逻。

凡破坏公共秩序和妨碍市内正常生活者，一律扣留，并送民警局追究责任。

第比利斯卫戍司令少将 格拉德科夫

【专题说明】

朱可夫关于个人崇拜 未及发表的演说

(1956年5月)

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1896～1974），苏联时期最著名的军事将领，1943年晋升为苏联元帅。在苏德战争初期曾任红军总参谋长，后来担任方面军司令员、副最高统帅，组织和指挥了莫斯科、斯大林格勒、攻克柏林等重大战役，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立下了卓绝功勋。1945年曾在红场检阅苏联军队。由于声誉过高，1946年以后被斯大林贬到较小的军区任职。斯大林去世后被调回莫斯科，担任国防部副部长、部长职务，苏共二十大以后被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朱可夫积极支持赫鲁晓夫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篇演说稿是朱可夫试图在中央会议上批评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错误，纠正斯大林的军事思想。但是，根据文件上的注明，这篇已经送给赫鲁晓夫的演说稿并未在中央会上发表，其具体原因不得而知。可能与二十大以后国内外形势有关。不过，在1957年10月，赫鲁晓夫就解除了朱可夫党和政府内的职务。作为一份历史档案，从这篇演说稿中可以看到，苏德战争中苏联方面的一

些鲜为人知的负面情况，尽管朱可夫在这里所说的有一定的主观性和局限性。

(本专题文件由杨存堂编辑和校注，
杨克胜、高增训翻译)

№06966

朱可夫呈送赫鲁晓夫的发言稿

(1956年5月19日)

秘密

尼·谢·赫鲁晓夫同志：^①

现向您呈送我在即将举行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稿，请审阅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格·康·朱可夫

1956年5月19日

军事—思想工作的形势和任务

同志们：

现在我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作关于军事—思想工作特点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

近年来，我们国家所有军事—思想工作的主要缺点是个人崇拜盛行。

应当指出，在某些同志中有关于不宜继续和深入重提与个人崇

^① 文件上有批注：“分别送到尼·亚·布尔加宁同志和 Д.Т. 谢皮洛夫同志处”；“保存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档案馆”。

拜有关问题的意见，因为按照他们的意见，深入批评与个人崇拜有联系的问题会给党的事业，给我们的武装力量带来危害，会降低苏联人民的威望，等等。

我认为，类似的情绪是不同意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议完全赞同中央委员会为消除个人崇拜后果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如果不在继续沿着消除个人崇拜影响的工作道路走下去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完成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那些决议。我们不能忘记，个人崇拜以及与之有联系的一切给我们国家的国防事业带来的许多危害。我们有责任从中吸取一切必要的教训，在克服惧怕揭露妨碍消除个人崇拜的事实同时，继续坚定地阐明个人崇拜之反列宁主义的实质。

大家都知道，特别广泛的个人崇拜的蔓延是在与伟大的卫国战争有联系的许多问题上开始的。

在对斯大林的功绩、毅力和组织工作给予应有的评价的同时，我应该说，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解释战争方面导致的结果是：我们人民的作用、党和政府的作用、我们武装力量的作用都被降低了，而斯大林的作用被过分地夸大了。为了赞扬斯大林，我们的军事—思想工作曾容忍粗暴地歪曲一系列历史事实，隐瞒不说失败、错误、缺点及其原因，而把取得的成绩完全归功于斯大林的领导。所有这一切都对历史事实及其评价形成了颠倒黑白的概念。同时，也破坏了我们思想工作的党性基础——历史客观性。

在卫国战争前的几年里，苏联人民相信，我们的国家始终不渝地准备给任何侵略者以毁灭性的回击。要用一切方式颂扬我们军事威力。要使人民懂得在未来战争中轻易取胜是很危险的情绪，并郑重地声明，我们随时准备以三倍的打击回击敌人的攻击。毫无疑问，稍微放松苏联人民的警惕性和不去动员人民积极准备国家的防御也是很危险的情绪。

我国当时的防御准备实际状况距离这些夸耀的声明相差甚远，这也是战争初期我们国家遭受重大军事失败和巨大损失的原因之一。

战争前夕，我们部队的组织和装备都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至于军队和国家的对空防御，那是处在极低的水平上。

1941年之前，我们才有了很少的机械化兵团，只是到了1941年冬天才通过了关于依靠被撤销的骑兵卫队组建15个机械化军的决定，但这个决定已为时太晚。

在战争即将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机械化军和师的大部分还处在组建和训练阶段，因而他们只能以无组织的和薄弱的装备进入战斗。

我们空军的质量比德国人的要低得多，而且由于缺乏机场，飞机只能极其密集地停放在容易遭受敌机攻击的边界地区。

炮兵牵引车，特别是高射炮牵引车的保障非常不好，因此，炮兵没有能力向前移动，也就一点也不能保障我们部队在战场上的机动。有很多火炮由于缺乏炮兵牵引车在我军退却时被抛弃。

总参谋部没有最终的和经政府批准的作战及动员计划。

没有向工业部门提出有关筹备动员的生产设备和建立相应物资后备的具体动员任务。

特别是军事领导干部的情况不好，这些干部在1937年至1939年期间，包括从军区司令员到师、团长多次因滥捕而调换。作战开始前被重新任命的干部对担任的职务训练很差。特别是方面军司令员和集团军司令员训练更差。

斯大林同志对待军事干部的怀疑态度给武装力量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仅在1937~1941年的4年时间里，我们的武装力量两次取消一长制和采用军事政委制，这就播下了对指挥干部不信任的种子，破坏了军队的纪律，造成指挥人员丧失信心。

在苏芬战争和远东事件进程中暴露出来的我国和我军的战备薄弱方面，不仅没有克服，而且更为严重的是，甚至既不经中央委员会，也不经过苏联人民委员会讨论，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都掌握在斯大林手里，没有他的指示任何人不能作出任何决定。

由于斯大林轻视法西斯德国对苏联进攻的明显威胁，我们的武装力量没有及时进入战斗准备，在敌人攻击之前没有展开，也没有向它们提出作好准备还击敌人正在准备的打击，正像斯大林说的那样：“不要挑起德国人发动战争”。

斯大林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维·米·莫洛托夫是否知道希特勒军队在我们边界集结？是的，他们知道。除了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通报的资料外，总参谋部曾系统地向政府报告了关于德国军队在我们边界附近集结的情况，关于他们沿我国边境以及腹地 200 公里的许多地段上加强空军侦察的情况。1941 年 1~5 月期间，记录了德国飞机 157 架次侦察飞行。

为了不空口无凭，我宣读总参谋长给政府首脑维·米·莫洛托夫同志的一份报告：

“兹报告关于德国飞机在 1941 年 4 月 1 日到 10 日期间内大量侵犯边界的情况，在这一时期内，侵犯边界共 47 次。

从附图可以看出，侵犯的大多数地方是：

- 1) 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的边界，特别是在利耶帕亚、梅梅尔、科夫诺地区。
- 2) 利沃夫方向的索卡利市、佩利梅什利市国罗地段。

侵犯国界的个别情况发生在格罗德诺、别洛斯托克、科韦利和卢茨克市方向，以及与罗马尼亚交界的国界上。

德国人的飞机，无论是歼击机和还是轰炸机的飞行都在距国界纵深 90~200 公里地段进行。这说明，德国人既在进行目视侦察，又在进行照相侦察。

我请求向斯大林同志报告这个问题，并采取可能的措施。

红军总参谋长朱可夫大将
1941年4月11日第503727号”。

既没有对这份报告，也没有对其他一系列报告采取任何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做出应有的结论。

斯大林完全轻视业已形成的军事—政治形势和史无前例的把我国人民和军队引入迷途的例子是1941年6月14日，也就是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前一周报刊上发表的塔斯社公报。公报指出：“根据苏联的资料，德国如同苏联一样始终不渝地遵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条款。所以，根据苏联人士的看法，关于德国企图撕毁条约和准备进攻苏联的传闻纯属无稽之谈。应该指出，近期撤出巴尔干战役的德国军队调遣到德国东部和东北部地区系出于其他动机，与苏德关系无关”。

这个声明把苏联人民、党和军队引入了迷途，并使他们丧失了警惕性。

斯大林以德国法西斯侵犯苏联是突然袭击的方式来解释战争第一阶段的失败，这是历史的谬误。希特勒军队的侵犯没有任何突然性，而有准备的侵犯是人所共知的。斯大林臆想的突然性是为他自己在防御中的失算辩护。

6月22日3点15分，在以歼灭我们空军为目的而对机场实施的空中突击、对边界地带的海军基地和许多大城市进行袭击的同时，德国人在全线开始了军事行动。3点25分，我把斯大林叫醒并向他报告说，德国人开始了战争，正在轰炸我们的机场、城市，并向我们的军队开火。我和谢·康·铁木辛哥同志请求批准向军队发出关于实施相应抵抗行动的命令。斯大林沉重地对着电话听筒叹

气，几分钟之内一声不吭，而对问题的重复回答是：“这是德国军人的挑衅，不许开火，不扩大事态。请转告波斯克列贝舍夫，让他在5分钟之后召集贝利亚、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您和铁木辛哥也应参加会议”。

当斯大林同志来到中央委员会的时候，他再次重申了自己关于德国人挑衅的见解。关于德国军队在很多地段上已入侵我们领土的情报并没有使他相信敌人开始了真正的和事先有准备的战争。到6点30分，他还不允许采取反击行动和开火，而当法西斯军队在歼灭英勇厮杀的边防警卫部队的同时，已插入我们的领土，开进了自己的坦克部队并急速地展开自己集群的突击。

由此可见，除了对形势估计错误，对战争没有准备之外，从战争发生的第一分钟起，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表现了对国土防御指挥的完全张惶失措。敌人利用这种情绪，把主动权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并在所有的战略方面强迫服从他们的意志。

我相信，如果我们的部队在西部边界地带进入充分的战斗准备，从敌人进攻开始就有正确的部署和立刻击退他们的明确任务，那么，——战争的前几小时和最初几天的斗争性质就是另样的了，而且会影响以后的全部战争进程。战区的力量对比，妥善的组织我们部队的行动，至少能够可靠地扼制敌人的进攻。

在识破德国法西斯指挥部的计划之后，斯大林决定以积极的防御使敌人精疲力竭并一蹶不振，为集中预备队而赢得时间，而后转入反攻，给敌人以毁灭性打击，并粉碎敌人，这样的论点是不正确的。实际上，这样的决定是没有的，而“积极防御的理论”是为掩盖战争开始阶段我们失败的真实原因的需要。

实际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为什么我们的部队在所有战略方向上遭到了失败、退却和在许多地区被包围？

除了没做好国土防御准备和组织武装力量击退敌人进攻的准备

不充分外，我们没有一个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部。斯大林是最高统帅部的一员，但是按照当时的惯例，没有他在场，任何人也不能做出独立的决定。说实在的，在战争开始时，斯大林对战役战术问题研究得很不好。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组建得太晚，也没有做好实际上牢牢掌握和实施对武装力量高超的指挥的准备。

总参谋部和国防人民委员部从一开始就被斯大林搞得混乱不堪并失去了他的信任。

斯大林不是马上组织最高统帅部领导小组指挥部队，而是命令：在战争的第二天就把总参谋长派到乌克兰的塔尔诺波尔地区帮助西南方面军司令员指挥索卡利、布罗德地区部队会战；将鲍·米·沙波什尼科夫派到明斯克地区帮助西方方面军司令员，而稍晚些又派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尼·费·瓦图京将军到西北方向。

曾向斯大林报告说，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样的实践会导致对部队指挥的混乱。但从他那里得到回答是：“你们懂得什么是指挥部队，没有你们我们照样行”。斯大林这种决定的结果是使他不了解前线详细态势，对作战问题又不十分内行的情况下发出了许多不成熟的指示，更谈不上根据形势的变化拟定和实施大型对抗措施。

我们的军队，由于没有展开正确的战役布势，实际上是独立兵团、独立军团孤军作战，但也表现出不屈不挠的精神，给敌人以深重的打击。他们在没有及时接到上级指挥部门命令的情况下不得不孤军行动，常常处在严重的处境之中，有时还被包围。

局势变得困难还在于，从战争初期起，我们的空军由于技术落后受到敌机的压制，无法有效地同陆军协同作战。各方面军由于没有好的侦察机队，不了解敌军和我军的真实情况，而这对指挥部队具有决定意义。

部队由于没有火炮牵引车和汽车运输，立刻陷入了没有燃料和弹药的储备，没有应有火炮支援的状况。接下来，由于装备非常薄

弱，没有空军支援，没有坦克和大炮，常常处于严重的处境之中。

所有这些因素致使我军在战争第一阶段遭受严重损失和挫折，使敌人占领了我们国家大片领土。

凭着苏联人民及其武装力量对自己祖国的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感，对他们的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忠诚，才有可能在党的领导下克服由于战争第一阶段斯大林的错误和斯大林领导失策而形成的严重局势，尔后从敌人手中夺取主动权，促进战争进程向有利于我们方面转变，并取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辉煌胜利。

斯大林对待我们武装力量人员的态度

我已说过，斯大林战前年代就表现出对军事干部的怀疑和不信任态度。他竭力把战争初期我们失利的所有罪过记在武装力量人员身上。

曾组织过对西方方面军指挥部的审判，结果是被枪毙的有方面军司令员帕夫洛夫，参谋长克利莫夫斯基，通信兵主任格里戈里耶夫和其他一些将军。集团军司令员卡恰洛夫被指控为叛变和向敌人投诚，事实上，他是在突围时牺牲在战场上。没有任何根据地被指控为叛变的还有由于形势所迫而当了俘虏的其他将军们，他们从俘虏营回来以后至今仍然是我们祖国的最忠实的爱国主义者。

在颁布的一系列命令中，我们部队的人员，特别是指挥员和政工人员，不分青红皂白地被责难为畏缩和胆怯。

就在我们部队显示出自己不仅能够防御，而且能够沉重打击敌人之后，斯大林从自己的命令中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一份，其中写道：“以爱戴和崇敬的态度对待红军的我们国家的居民开始对此失望，丧失信任。他们许多人咒骂红军将我国人民拱手置于德国压迫者的桎梏之下，而自己则向东方逃跑”。

斯大林以这份命令不公道地丑化我们士兵、军官和将军们的战斗和精神品质。

正如实际情况表明的那样，我们的士兵和军官，部队和兵团，总的说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非常顽强地战斗，使敌人遭受很大伤亡。

甚至连我们的敌人也都被迫承认苏联军人战斗初期表现出来的英勇战斗精神。

下面就是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上将在自己的工作日记中所写的内容：

6月24日——“敌人在边境地带几乎到处抵抗。

应当指出俄罗斯某些兵团的顽强战斗的精神。有这种情况，永备发射点的驻军为了不当俘虏，将自己连同永备发射点一起炸毁。”

6月27日——“从前线发来的情报证实，俄罗斯军队战斗到只剩下一个人的情况到处可见。俄罗斯军队的顽强抵抗迫使我们按照我们战斗条例的所有规定进行战斗。在波兰和西方，我们能够允许自己有相当的自主和不按条令的原则打仗，而现在已不允许了”。

7月6日——“在某些地段，敌人坦克乘员丢下自己的战车，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把坦克上了锁，并把自己连同机器一块烧掉”。

7月11日——“敌人正在激烈而又狂热地战斗。”

“甚至在我们的部队将他们包围之后，他们仍继续和我们搏斗。”

7月20日，哈尔德在日记中写道：“继续留在我们后方的某些小股敌人对我们来说是真正灾祸”。

就在那本日记中，哈尔德记载了从战争开始至1941年12月10日，也就是到莫斯科会战和我们冬季攻势战役展开结束前的伤亡数字，德国人被打死、打伤和失踪的有775078人，占东线作战部队总人数320万人的24.22%。

这些事实和数字尽管被缩小了而不是夸大了，但仍然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我们的军人在战争初期极其艰苦条件下，为了捍卫自己社会主义祖国，忠诚、勇敢地履行了自己的战斗职责。

为什么斯大林需要发出侮辱我们军队的一份命令呢？我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洗刷自己的罪过和转移人民对没有做好国土防御准备，对他在领导军队中个人所犯的错误及其由此而产生的失败后果的不满情绪。

关于所谓“斯大林战役”、“斯大林的军事科学”及肃清个人崇拜影响的任务

许多与会者都知道，各方面军的一些战役是怎样进行的，后来被命名为“斯大林战役”的我军进攻的战役是如何计划、准备和实施的。

只有不懂军事的人才相信一个人能够考虑、盘算、计划和准备由各军兵种参加的在辽阔的国土上举行的现代化方面军战役或方面军群战役。

斯大林是否曾担任过某个战役的总设计师？

很遗憾，是的，他担任过。这样的战役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报告过。那是按照斯大林的意图拟定和实施了的一次毫无效果反复多次的，除了严重的损失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的波罗的海沿岸利耶帕亚地区的战役。由于这次战役的失败，斯大林撤换了3个方面军的司令员。

非常盲目地进行华沙北部战役，结果使我军成千上万人员死亡。我们不止一次地向斯大林报告说，根据地形条件，那里不能进行作战，然而这种理由以“不成熟”而被否认，战役仍以同样的结果多次反复进行。

关于斯大林不了解指挥军队的基本原则可以从莫斯科保卫战的历史中讲述很多，但仅以很小的事实就足以阐明斯大林不了解指挥军队的方法。

在敌人残酷地向莫斯科扑来的艰苦斗争的严重时刻，贝利亚向斯大林报告说，德国人侵占了杰多沃村庄和红波利亚纳。斯大林把我和尼·亚·布尔加宁叫到电话机前，严厉责骂了一通之后，就命令我立即去杰多沃，而命令尼·亚·布尔加宁去红波利亚纳并夺回这些村庄。我们企图证实有这样严重时刻不能离开指挥所和对前线部队的指挥时，遭到了枪毙的威吓。就在我和布尔加宁夺回这些没有任何意义的村庄的时候，敌人在另外地方——纳罗福明斯克地区正面突破，向莫斯科猛攻，多亏方面军预备队在场才使这个地区脱离险境。

我不能对斯大林强迫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和方面军司令员在没有足够物资和技术保障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必要实施仓促组织的战役，从而造成巨大损失一事而保持沉默。

在许多情况下，仓促地和不好地组织战役就不能取得良好的结果。

这样的例子在西北方面军、西方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和其他方面军有过。

从斯大林的作战创造中还可以找到不少反面的事实，借以评价斯大林的品质和“军事天才”有什么实际价值。

个人崇拜的影响迄今在军事工作的许多方面，特别是在军事理论和军事历史问题上都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为了迎合个人崇拜，我们这里根深蒂固地风行一种不正确的认识，认为苏联的军事科学似乎是斯大林重新制定的。斯大林在偶然情况下的某些言论被编入了《军事科学百科全书》。原有的早已人所共知的论点，类似著名的苏沃洛夫的格言——“养兵千日，用兵

一时”——评价为新的天才的发现。那些形式是新的而不是实质问题的经常起作用因素的言论成了所有苏联军事科学基础的基础，而这一重要的并且早已人所共知的因素，例如突然性仅仅被视为冒险战略。

实际上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在卫国战争初期采用的反攻被捧为神明而被我们的军事干部错误地确立为在未来进行战争的可能方法。

为了迎合个人崇拜的需要，隐瞒了那种事实，即苏联军事科学是由党、国家领导人和军事活动家的集体劳动成果，是由许多军事科学工作者和党培养的我们学者们的劳动而创建起来的。

军事科学中的个人崇拜束缚了我们军事干部创造性的思维，并使他们养成一种习惯，认为他们的作用不在于独立深入研究军事理论，而在于善于评论和推广斯大林的论点。

我们应当消除这些严重的缺点并唤起我们科技干部不是建立在盲目地引经据典，而是建立在对活生生的现实和技术发展远景上的科学的、客观的和全面分析的创造性思维，有益于今后更加巩固苏维埃国家国防威力。

应当使我们的军事科学首先面向现代化的和远景发展的任务。目前，科学和技术提出了许许多多的新问题，军事理论应该对此给予及时正确的回答。尤其是大规模杀伤武器问题，因为人民和武装力量的人员在这个问题上的无知可能会在战时产生负面影响。

客观地阐明军事事件和科学地总结战争经验，不仅对武装力量，而且对全体苏联人民进行正确的教育都有巨大的意义。

尽管从战争结束至今已过去 11 年，然而我们还没有一部能历史地、真实地总结卫国战争事件，正确地揭示苏联人民和他的武装力量所起的作用，以及共产党在取得历史性胜利中所做的组织工作的著作。

在军事事件的研究性著作中，没有对现象的深入分析，对事实和行动做出科学的评价。

我们的不成功的战役，一般地说，没有研究，如果说有，那也没有遵循历史实情。

在军事事件的记述中，几乎没有直接制定战役计划和领导部队作战的那些军事首长的名字。个人崇拜毫不客气地将真正英雄的名字从历史上一笔勾销，而他们的集体功勋恬不知耻地赋予了斯大林。

在确定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划分上，第一阶段的名称，即——“苏联武装力量的积极防御时期——不能给苏联军队在1941年作战行动的实际性质以正确的概念并和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积极防御相矛盾。从实际情况出发，在允许历史学家们科学地查明这个时期的大事记之后得出，战争第一阶段比较正确的叫法是“退却和破坏法西斯德国对苏‘闪击战’计划的时期”。

在编写伟大卫国战争历史和苏联军事艺术历史的时候，应该阐明我们同各人民民主国家武装力量的战斗友谊，那些国家的建设是在苏联帮助之下，在与共同敌人——德国法西斯进行斗争的战场上开始的。

军事—思想工作的严重缺点之一就是轻视资产阶级军事科学，表现出自高自大的否定。我们对资产阶级国家军事—思想工作的形式和方法，以及帝国主义军事系统的强与弱的研究明显缺乏。

由于歪曲理解反对不适当的崇拜外国的斗争任务，使外国军事思想、军事技术的任何价值都被否定了，它的成果被忽视了，而在军事—思想工作方面的任务简化为不分青红皂白的辱骂国外的一切。

应该改善对国外军事著作和军事技术的科学情报事业，研究帝国主义军事系统强与弱的方面和他们军队中军事—思想工作的基本

方针，揭示与他们准备未来战争有联系的新过程，揭露资产阶级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科学的反动实质。

谈到我们陆军和海军军事—思想工作的实践时，必须注意到她的低质量，而有时和部队的教育任务相脱离，目前，必须引起武装力量各级指挥员、政治机关和党组织的严重注意。在我们军事干部思想教育系统中，应当开展深入研究马克思、列宁关于战争与军队的学说，同时要把研究理论同军队训练的具体任务紧密地结合起来，同军队的质变和组织变动紧密结合起来。从这个目的出发，应当准备和出版马克思、列宁关于战争与军队学说原理的著作，在该著作中，将正确地反映弗·伊·列宁在发展这个学说中的作用并总结现代战争的经验。

要揭露关于弗·伊·列宁不是“军事行家”论点的错误和危害，因为这种论点不符合实际，并贬低了弗·伊·列宁作为把许多新的原则性的思想载入苏联军事科学的武装力量组织者的作用。

当前，必须重新出版米·瓦·伏龙芝和其他苏联军事理论家的军事理论著作。

必须同时注意到在苏联广大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青年中开展旨在培养苏联的爱国主义、民族军事自豪感、对自己武装力量的热爱和对坚决粉碎任何侵略者发动战争的准备的军事—思想工作是明显不够的。

为了克服这个缺点，我们应该大力改进对苏联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年的爱国主义精神、热爱自己武装力量和长期准备光荣而自豪地捍卫自己祖国的军事思想教育。应当组织出版发行关于苏联民众对保卫自己祖国的爱国主义天职，在保卫国家中的经常的警惕性和积极性的真实电影和文学作品。这在我们国家大大裁减武装力量员额的今天就显得特别重要。消极的对待军事思想工作会产生和平主义的安乐情绪和无所顾虑的情绪。

我们很少注意那些培养苏联人民爱国主义和军人自豪感的铭记我们祖国的军人光荣的历史纪念碑。我们在那些曾经发生过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重大事件的地方几乎没有纪念碑。在莫斯科和其他英雄城市至今还没有对在卫国战争中苏联人民丰功伟绩树立纪念碑。在这方面我们严重地落后于其他国家。这种明显不正常的状况必须在近期内消除。

关于消除对从法西斯俘虏中返回 祖国的前战俘的不正确的态度

在思想工作中，由于贝利亚一伙以专横方式对待那些在卫国战争时期被我们敌人俘虏的苏联军人，给我们带来了精神和政治上的巨大危害。

战争初期，许多战线为形势所迫，有相当数量的苏联军人千方百计抵抗之后，时常是整个分队和整个部队陷入包围之中，而违心地当了俘虏。许多人在受伤和受震伤后被俘的。

被俘的苏联军人，通常都保持着对自己祖国的忠诚，举止勇敢，坚强地忍受对俘虏的虐待，忍受希特勒法西斯分子的侮辱，常常表现出真正的英雄气概。许多苏联人冒着生命的危险从希特勒法西斯分子的俘虏营中逃出来并在敌人后方，在游击队中继续同敌人厮杀，或冲破前线去找自己的部队。

然而，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战后时期，在对待前被俘军人态度上粗暴地颠倒了苏联法制，与列宁的原则和苏联社会制度的自身本质相抵触。在对待前被俘军人的态度上，这些颠倒黑白的做法造成了一种不信任和怀疑，以及以莫须有的罪名指责他们严重犯罪和采用大规模镇压的局势。

在决定关于前被俘军人命运的问题时，既不考虑到被俘时的情

况和当俘虏时的表现，也不考虑到从俘虏中逃出来的事实，参加游击队战斗和其他情况。因受伤而被俘，在当俘虏时，表现出英勇不屈的我们军官们，分不清红皂白地被取消了军官的称号和未经法庭审判就同罪犯一样地被送往惩戒营。

有些苏维埃的和党的机关至今还继续表现出对前清清白白的被俘军人的不正确态度，对他们不信任，在侵犯他们的苏联公民权利和尊严的同时，在提升职务，重要工作的任用，当选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代表，进入高等院校学习，以及其他方面都规定出非法的限制。

破坏被俘军人法制权利的最最粗暴的颠倒是没有根据地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返回祖国的极大多数被俘军人遭受到从流放至特居地到处以极刑的各种刑罚。

苏联的法律对蓄意降敌当俘虏，同敌人合作和以反对苏维埃国家为目的其他犯罪定有很严厉的制裁。然而苏联法律对于受伤、震伤、及其他不以军人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情况突然被抓获而俘虏的军人应负的刑事责任没有作出规定。

遭到非法惩治的还有那些不由自主地当了俘虏的军人，他们为军人职责感所驱使，常常表现出个人英勇精神，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从俘虏中逃出并返回祖国。

我仅举两个例子：

——Д.Т. 富尔索夫大尉，苏联共产党员，1929年起在苏联军队中服役。1946年8月被判处剥夺自由8年，剥夺公民权3年，没收财产和取消“近卫军大尉”的军衔。控告他的罪行是：1941年底当了俘虏，1943年2月自愿到由德国人主办的“哥萨克军官学校”就职。

目前查明的真相又是什么呢？富尔索夫大尉被德军包围之后，打算突围，但因受伤被德国人俘虏。在有可能从俘虏中逃出之

时，他决定进入“哥萨克军官学校”，以便跑到游击队员那里去。在学校弄到武器后，富尔索夫于1943年6月17日同该校学员班的69人在抓住处在酒醉状态之中的校长和骑兵连长后携带武器一起投奔游击队。

在游击队里，富尔索夫先是担任班长，后任破坏组长，由于受伤而离开队伍。在医院治好伤之后，富尔索夫又继续在苏联军队中服役并积极参加战斗，曾3次负伤，获二枚勋章和一枚奖章。

就是这样一名打败敌人胜利返回祖国的勇敢的苏联爱国主义者，于1945年被判罪并关进了监狱。

——上尉 E.C. 阿努欣，苏联共产党员，1950年3月31日被判处剥夺自由25年。据说好像是1944年8月9日在执行战斗任务时，阿努欣驾驶的伊尔-2飞机被敌人击落，而阿努欣当了俘虏，他在罗马尼亚人司令部审讯中，在向敌人通报了关于飞机飞行技术性能之后，出卖了构成军事秘密的情报。

现已查明，阿努欣在罗马尼亚被俘总共11天，而后，他和其他的我们的军人一起从俘虏中逃出并返回自己的部队。战争结束前，他以一名强击机飞行员的身份积极参加战斗，完成了160次作战飞行，其中120次是从俘虏中逃出之后完成的。由缴获的文件查明，阿努欣在罗马尼亚人审讯时曾自豪地声明，战争将以苏联的胜利而结束，而罗马尼亚将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家。

就在阿努欣积极参加战争5年之后，他被判罪并送进了监狱。

没有必要证明，从真正的苏联法制的观点上看，把这种情况下被敌人俘虏的苏联军人作为祖国的叛徒看待是绝对没有任何的根据，也没有根据对他们采取任何的镇压措施。

此外，对于在不由自主的情况下被俘，而后从俘虏中逃跑回到祖国的苏联军人——应受到奖励和政府的奖赏。这样的方式甚至在沙皇制度时就有，这对教育人民、士兵和军官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一部分当了俘虏的军人，当知道在祖国对他们的惩罚是不可避免时，自然不表现出对从俘虏中逃出来的企求。而战争结束之后，受惩罚的威胁可能迫使某些军人拒绝遣送回国。

地方政权机关的不正确的行为，对待前被俘军人态度上的不信任气氛会在他们中，在他们家庭成员中产生了委曲的情绪，前途无望及权利不平等感觉，在他们的生产、社会生活中消极地表现出来。

培养军人高尚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对敌人的仇恨和对俘虏的鄙视态度时，我们很少宣传苏联军人当俘虏时光荣行为的事例，从俘虏中英勇逃出来的我方人员的事例。

应该解除对前被俘军人不信任的精神压迫，恢复被非法判刑者的名誉，取消对前被俘军人的各方面的限制。

※ ※ ※

同志们！个人崇拜使我们的军事—思想工作遭受了很大的损失。我们的任务是：在教育苏联人民和武装力量人员方面的全部工作，在军事科学、宣传、军事文艺作品，以及与军事选题有联系的艺术和电影方面的军事思想工作的一切类似形式中坚决地清除个人崇拜的影响，并牢固地把它们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之上。

在所有我们的军事—思想工作中，我们应该从坚定不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出发，即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苏维埃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先进的经济、苏联人民精神上政治上的统一，武装力量的强大和我们光荣的共产党的领导是苏维埃国家军事强盛的基础。

【专题说明】

波罗的海沿岸的政治动荡

(1956年11~12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经得到独立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又被苏联兼并，而且急剧地进行了阶级镇压和农业集体化运动。在随后的德国法西斯军队进入这些地方时，当地有些居民对德军表示了某种合作态度。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苏联政府对这三个共和国的所谓反苏投敌分子进行了镇压，不少人流放到西伯利亚或关入集中营，而且强行恢复集体农庄。这一切就种下了民族矛盾的种子。苏共二十大以后，特别是波、匈事件发生后，波罗的海三国出现了政治动荡。从这些共和国党的领导人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可以看到，这三个共和国内都出现了对苏共政策的不满情绪，不少人要求脱离苏联。可见，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独立要求源远流长，并非80年代末才有。同时从这些档案中也可以看到，在苏联时期，苏共在民族政策上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其结果之一就是这些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有所降低。

(本专题文件由杨存堂编辑和校注，

赵英杰翻译)

№09420

维什尼亚科夫等关于立陶宛情况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信

(1956年11月3日)

副本

我们是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考纳斯市的俄罗斯族居民，兹通报，1956年11月2日到3日的夜间，在无名士兵烈士墓地发生了大规模的城市居民反对苏维埃的活动。

参加这些活动的有老年人，年青人，特别是这个城市高等学校的一些学生。

这是一场打架斗殴事件。他们唱着斯梅托纳^①执政时期的国歌，把他的旗子插满了全城，并高喊着口号：“打倒苏维埃政权”。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当局对此毫无办法。

这些可怕的行动首先是针对俄罗斯人民的（俄罗斯族人），他们受尽了百般的侮辱和伤害。

难道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不知道，在考纳斯市，在每年所谓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斯梅托纳》日子里，都要举行这样大规模的反苏维埃活动。事情很快会发展到城市里的俄罗斯族人将遭到杀害的地步。立陶宛人很善于进行这一点，立陶宛人是爱报复的人。

我们是1941年，当我们的军队从考斯纳市撤出时，立陶宛人

^① 斯维托纳·安塔纳斯（1874~1944），立陶宛政治活动家，1926~1940年立陶宛政府领导人。

所进行的野蛮行为的见证人。

德国法西斯分子就其残忍程度仍比立陶宛人人道一些，他们残杀没有任何过错的苏联人，即不懂立陶宛语言的男人、女人和儿童。残杀发生在大街上、房屋里，在车站等待起程的人也遭杀害，任何地方都不准出现俄罗斯人。

这就是俄罗斯人民为之斗争并为之献出了几百万条生命的伟大的十月革命事业在考纳斯市是怎样存在和获得胜利的，而它的领导作用已经化为乌有。今后还会怎样呢？

中央主席团是否知道，在考纳斯市有百分之五十的具有劳动能力的居民，他们不工作，而专门从事投机倒把和组织进行反对苏维埃的活动。

说来惭愧，众所周知，考纳斯市水电站正在建设，他们暗中窃喜，没有参加建设，同时还声称：“俄罗斯人去建设，我们来享受果实”。

在一些高等学府里也出现了严重的民族主义，这些学校用鲜明的民族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因此，在各地都有学生成为所有反对苏维埃活动的先锋，这不是偶然的。

通常，该市的高等学校以培养民族干部为借口，不录取俄罗斯族青年入学，俄罗斯族的青年只能在城市的中学里毕业，而加盟共和国的其他高等学校接受的也是立陶宛人。其结果是俄罗斯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

而进入城市的机关里工作根本不可能，因为必须通晓立陶宛语，他们不承认俄语。

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例子和事实来说明，在考纳斯市，居民中的一大部分人对苏维埃政权抱有敌意的态度，并公开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

我们觉得，立陶宛共产党市委（第一书记卡斯纳乌斯卡伊杰同

志，市执行委员会主席皮利格里马斯同志，以及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斯涅奇库斯^①同志）没有采取坚决的措施来正确执行列宁的民族政策。

如果苏共中央主席团不采取根本措施（目前，在我们这里存在着这样的观点：不干涉加盟共和国的事务），这将会扩大为整个国家的危机。

维什尼亚科夫

霍洛季洛夫

苏希赫

及其他一些人

1956年11月3日

地址：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考纳斯市，吉波德罗姆大街，12栋

И.М. 维什尼亚科夫

^① 斯涅奇库斯·安塔纳斯·尤奥佐维奇（1902～1974），1940～1974年担任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52年起为苏共中央委员。

№09419

沙尔科夫关于立陶宛情况的报告

(1956年11月4日^①)

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劳动者之中的基本群众的政治情绪是健康的。

与此同时，在共和国中还存在着具有不健康政治情绪的个人和居民团体。这样的情绪和针对在波兰、匈牙利以及近东发生的政治事件的充满敌意的言论，在一部分老知识分子和学生之中表现尤为激烈。

敌对分子对于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事件给予肯定的评价，并对匈牙利的反革命分子抱有好感。最近一些天以来，在维尔纽斯国立大学里发现了带有以下内容的标语和传单：“匈牙利革命万岁”，“我们要以匈牙利革命为榜样”，“立陶宛人！立陶宛是属于立陶宛人的，俄罗斯侵略者，赶快滚出去”以及其他一些类似性质的标语和传单。

还有一些敌对分子试图煽起俄罗斯人和立陶宛人之间的不和。

考纳斯市的一名公民伊万瑙斯卡斯声称：“匈牙利发生的事件，这是垮台的开始。很快，所有的民主国家都会通过推翻使他们憎恨的制度的途径脱离苏联。然后，风潮会迅速波及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最终结果同样是他们将摆脱俄罗斯人”。

考纳斯市的一名女教师巴尔图什凯娜说，如果其他的所有民主

^① 原件无日期。所标示的日期是根据文件内容判断的。

国家都像我们这里一样饱受苦难，那么，举行武装起义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学生影响之下，甚至在共青团员之中也存在着落后的思想。

在10月25日的历史语文系学生共青团积极分子会议上以及10月28日的维尔纽斯国立大学共青团代表大会上，又重新提出了将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大街改名为格迪米纳大街，给维尔纽斯市的创始者格迪米纳树立纪念碑，理由是，在莫斯科已经为尤里·多尔戈鲁基建立了纪念碑。

大会还支持女大学生阿布赖季捷的发言，并将要求开设学校，为居住在西伯利亚的受过镇压者的子女们，以及生活在相邻的白俄罗斯莫洛杰奇诺州的立陶宛人用立陶宛语授课的条款写入了决议中。

对于维尔纽斯市及其附近地区，以及考纳斯市产生巨大影响的是波兰事件。这些事件加强了居民的某些阶层中的私有制倾向。

集体农庄庄员库拉科夫斯基（来自维尔纽斯地区，波兰族），以前曾由于从事反对苏维埃的活动而受到镇压，他宣称说：“此前在波兰的政府是共产党的政府，而现在是遭受过布尔什维克灾难的哥穆尔卡掌握了政权，他将不会再按他们的指令进行工作，而是会领导国家走条新的道路，正如铁托在南斯拉夫所作的那样。当然，哥穆尔卡不会马上同苏联断绝来往，而是要积蓄力量，然后再结束与莫斯科的联系。波兰将不会再有集体农庄，而是恢复1939年以前存在的那种体制。因此，我们不应该再在集体农庄工作下去，反正春天我们就要前往波兰”。

鉴于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八次全体会议作出的关于解散亏本的合作社的决议，个别居民表示希望解散立陶宛的集体农庄。这同样加强了波兰族的公民离开苏联的愿望。仅在维尔纽斯一个城市

里，10月26日就办理了333份出卖个人房产的文件。如果说自今年的2月份截止到10月份，共签发了259份前往波兰的签证，那么仅在10月份的20天内，就签发了198份。

与此同时还存在着其他一些论调。来自维尔纽斯区日利亚涅兹村的个体农民马图谢维奇（波兰人）在有其他公民在场的情况下，宣称说：“现在没有必要前往波兰，因为那里正在进行着政权的交替，在不久的将来，波兰政府将要求归还以前曾属于它的地区，即原维尔纽斯省^①，而我们只需要帮助波兰政府将立陶宛人和俄罗斯人从这些地区中驱赶出去”。

这些反苏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情绪的出现还由于《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自由欧洲》以及其他一些广播电台所进行的具有挑衅性质的无线电广播，而最近一段时间，这些广播的收听率又提高了。我们的宣传机关却没有坚决有效地揭露这些攻击，并给予反击。除此而外，还有来自被迁移的、以前曾遭到过镇压的人的对苏联制度的怀有敌意的宣传。最近一段时间，返回立陶宛的这种人有18000多。

立陶宛的波兰居民还常常从来到立陶宛的波兰共和国的某些公民那里获得关于波兰形势的一些不正确的信息。

波兰军队的少校亚济科夫斯基在与维尔纽斯区博亚拉村的村民们交谈时说：“在波兰的生活要比在苏联好得多。那里给予农民很多优惠政策。再也没有集体农庄了，合作社也被取消了，发展私营贸易。从波兰非常容易就可以到美国以及其他的国家去，而你们这里的农民还生活在贫困之中。因此，波兰族的农民应该到波兰去”。

^① 维尔纽斯是立陶宛的首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立陶宛和波兰曾激烈的争夺维尔纽斯，这个城市及其周围地区的归属几经变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维尔纽斯才收归立陶宛。

滋生这些不健康情绪的除了这些反动的影响之外，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原因。在一些经济薄弱的集体农庄里，物质上的困难产生了对集体农庄制度的不满。集体农庄的庄员说，生活开始变得困难了，不得不到城里去购买粮食，房屋倒塌了，可是没有钱去修善它们。

最近一段时期，共和国的居民对于国际国内的政治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他们要求具体回答和解释产生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原因，在那里执行的政策有哪些错误。

以下是一些极具代表性的问题。

为什么在匈牙利会形成这样的局面，领导党为什么不管？

使用武器反对匈牙利人民是不是斯大林政策的继续？

为什么在共和国担任各种职务的俄罗斯人不懂立陶宛语，并对于学习这种语言常常抱有轻视的态度？

11月1日和2日在共和国实行所谓的宗教节日《苦难日》。在维尔纽斯市，特别是在考纳斯市，自11月2日一直到3日，从早6点开始一直到夜里12点，宗教信仰徒们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参加集会的其中还包括很多大学生，有维尔纽斯国立大学的，维尔纽斯师范学院和工学院的，以及考纳斯市其他高等学府的一些学生也参加了宗教集会。在一些墓地旁唱资产阶级赞歌，立陶宛的民族主义歌曲，以及高喊反苏的口号：“匈牙利共和国万岁，我们应该以匈牙利为榜样”，“即使牺牲一半，剩下一半，我们也要争取自由的立陶宛”，“给立陶宛自由”。

在考纳斯，有一小批人，大约25~30人，在晚上11点时，闯入党的市委会并高喊：“匈牙利革命万岁。给我们自由”，后来，采取了措施才被驱散。

关于最近发生的事件，今天晚些时候，我们将提交更为详细的情报。

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采取措施，在共和国居民中间加强群众性政治解释工作。党中央委员们已经前往各个企业，机关和学校，进行关于十月革命节以及讲解共和国政治形势和任务的谈话。

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沙尔科夫

№09421

克里姆科夫关于立陶宛形势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信

(1956年11月4日)

副本

1956年11月2日，立陶宛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在考纳斯市举行了庆祝宗教节日的活动。庆祝活动是在列宁大街的墓地进行的，同时还伴随着反对立陶宛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在该墓地聚集了3万5千名民族主义分子，主要是工学院的大学生，立陶宛中学的学生以及1953年以后从监狱和西伯利亚流放地释放的原法西斯立陶宛的反动贵族们。墓地上插着法西斯—斯梅托纳的旗帜，唱着斯梅托纳的歌曲，并高喊着口号：“打倒立陶宛的苏维埃政权”，“独立的匈牙利、波兰和立陶宛万岁”，“俄罗斯人从立陶宛滚出去”，“打倒共产主义”。

我作为这次活动、实质上是一次示威活动的见证人，给你们写这封信。而令我感到震惊的是：第二天，当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利亚乌季斯同志以及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纽尼卡同志召集我们开会时，同时出席会议的还有立陶宛共产党城市委员会书记卡斯纳乌斯卡伊杰同志和斯米尔诺夫同志，他们竟然宣布说这只是一些流氓（个别的）起哄闹事，因此，也不需要特别的重视。我担心，他们是不是很准确地向苏共中央通报情况，或者是根本没有进行汇报。应该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在立陶宛绝大多数人实际上并

不热爱苏维埃政权，这一点从以下方面就可以看出，他们，即立陶宛人，非常憎恨集体农庄，这些集体农庄大部分都被荒芜了，而斯涅奇库斯同志和舒马乌斯卡斯同志却欺骗苏共中央，没有说出集体农庄的真实状况。

这不，我不得不同立陶宛的一些工作人员进行谈话，其中的一名工作人员，姓毛克亚韦特丘斯，声称：1937年，我父亲在邮局工作，是一名邮递员，每月收入170卢布，要供养家庭，4个孩子，母亲，他养活他们，有吃有穿。这里可以进行比较，现在我有一个姐姐也是邮递员，每月收入270~320卢布，如果这笔钱供1个人好好地吃喝，那么只够5天花的，而如果供养一个6口之家，那么最多够2天的，而在领取下月工资前的这段时间怎么过呢，还有穿衣服，穿鞋子，等等。

这样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情况既是这样，那么，无论什么样的宣传也说服不了他。这不，他说，如果我挨饿，如果这些钱在商店里什么也买不来：既买不来糖、肉，也买不来黄油和香肠，甚至连面包都买不来，那还有什么能使我信服的呢，我努力地说服他，给他讲述国内的大型建设，并给他举例子，比如，在考纳斯市的涅曼河建设的水电站；但他却说——是这样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不应该存在着挨饿的现象的，如果我不去工作，那是另外一回事，而现在我是在工作，并且是在勤奋地工作，却连家人的吃喝都不能保证，更别说穿戴了。他很公正地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在商店里工作的人，也许是仓库主管，也许是售货员，他生活得很富裕，买汽车，“胜利”或者是“莫斯科人”牌子的，给自己盖房子，等等，而他每个月的工资只有600卢布，而他却什么都有，他从哪里得到的这些钱呢？也许是偷来的，这样就可以看出，谁能活着，而谁无法生活。对于持有这样说法的人们，你是不能使他们信服的，但是，如果分析一下，他是对的。

现在，当反动势力在布达佩斯发动暴乱时，考纳斯的所有反动人士也开始暗自思量起来了。工作变得困难了。为什么要把这些亲斯梅托纳分子从狱监和流放地释放出来，要知道，对于他们目前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带领立陶宛人民进行武装起义。即使释放他们，也应该给他们提出条件，以使他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中证明自己。这句“谁工作，谁就吃饭”，我们现在还不能这么说，因为我们这里工资很低，食品很贵，而商店里也没有食品。对于这个问题应该进行思考，或者是确认1953年以前存在的制度，或者是给予生活条件。人们不明白，工地上正在进行的建设，他们只知道一点：“当斯梅托纳在立陶宛的时候，我们这里最贫穷的人，生活得也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当官的人要好”。

应该认真分析一下在立陶宛，特别是在考纳斯市开始形成的局势，而不是像利亚乌季斯、纽尼卡、斯涅奇库斯、舒马乌斯卡斯等同志所说的那样。应该向苏联政府，苏共中央通报正确的情报，否则，就会迟了。俄罗斯的“伊万诺夫”的鲜血将会再一次在立陶宛的土地上流淌。这就是在考纳斯市的情况：如果在排队购买食品的立陶宛妇女之中，站着俄罗斯妇女，那么，他们立即会被从队列中赶出去，还朝她们脸上吐痰。在大街上，俄罗斯人遭到公开的侮辱。仿佛，这些都是小事，但他们却助长了民族主义和对俄罗斯人的敌意。而从自己这方面，俄罗斯人会认为，这些不需要写给你们，你们是知道的。只要到立陶宛的墓地去一次，就可以看到，有多少俄罗斯人为了使立陶宛摆脱法西斯的统治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现在仍在与立陶宛的民族主义武装匪徒进行着斗争。而现在，这个英雄的人民甚至不能自由地在考纳斯市的大街上通过。

我只是想让你们了解，必须采取紧急措施。自然，思维正常的人是会理解，我们现在还不能满足关于工资和供给方面的所有要求，因为，我们作为共产党员，是明白，国家目前正处于什么时

期，我们可以给所有的反动分子造就“条件”，我们有很多熟荒地，有西伯利亚广阔的地域，还有很多未开垦的处女地，等等。

我们的政府和苏共中央应该采取刻不容缓的措施，制止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无情攻击。我，作为所有这些事件的见证人，向你们通报这一点，并想说明，任何姑息的作法只能造成不好的后果，或者是在立陶宛建立最起码的生活条件。

关于约·维·斯大林的信函^①，使反革命分子充分放开了手脚，现在他们称共产党员是残酷无情的剥削者，并到处列举关于斯大林的例子。这封信不是出自某个人的，而是代表人民群众的，应该理解这一点。

恳请收到这封信的苏共中央工作人员，将这封信转呈苏共中央主席团。信里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情况。

有如下建议：将工学院迁到另外一座城市去，应该从忠诚于苏维埃政权的贫穷阶层之中招收学生，也就是像 1917 年革命以后，我们这里所进行的那样，把所有坏蛋都开除出学院，并让他们到矿井去工作。卡斯纳乌斯卡伊杰同志，作为立陶宛共产党考纳斯市委员会的书记是非常不称职的。

克里姆科夫

1956 年 11 月 4 日

^① 可能指苏共二十大以后苏共中央就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问题给各级党委的信。

№09422

凯宾关于爱沙尼亚情况给苏共中央的通报

(1956年11月5日)

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报，最近一段时期，1956年11月3、4日，在共和国内出现了一系列反对苏维埃的现象。

今年的11月3日，在塔林市的拉图什内广场逮捕了女公民斯季尔维尔克·安娜·亚诺夫娜，她1885年生，是瓦利夫残疾人集体农庄的看门人，在公众聚集的地方她大喊着：“打倒共产党员。俄罗斯人，赶快滚蛋”。

1956年11月3日大约晚上9点钟，在塔林市的一家名叫《科普利》的餐厅里，公民克里尔特·汉斯·萨姆伊洛维奇，1928年生，《佳赫特》集体农庄的钟表工人，高喊：“俄罗斯人从爱沙尼亚滚出去”。

侦查机构对以上人员进行了侦讯。

今年10月末获得的情报说，塔林市第一中学的学生，通过有组织的方式，非法地制作带有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①姓名首字母的纪念指环，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以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名字命名的中学的学生都配带这种指环。已采取措施调查上述物品的组织和生产者。

自1956年10月28日到11月3日期间，在塔尔图市发现并没收了散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反苏维埃传单19份。已经查明，传单

^① 阿道夫·古斯塔夫(1594~1632)，自1611年起为瑞典国王。

的制造和散发者是塔尔图市第一中学六年级的学生派克列·安茨、克莱斯·尤里和维尔巴·瓦尔杜尔，他们都是 1944 年出生的，他们自称是《斯巴达克同盟》成员。正如已经确认的那样，传单的制造和散发的倡议者是克莱斯·尤里。正如他所交待的那样，他之所以进行这样的活动，是由于听了《美国之音》无线电台对匈牙利事件所进行的转播。

遵照党的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的方针，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以便弄清可能隐藏在这些少年背后的组织者。

1956 年 11 月 4 日，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讨论了联共（布）中央关于匈牙利的状况以及为准备庆祝十月革命节各级党组织的任务的电报，并通过决议，派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各部长以及有关负责人前往加盟共和国各地区和城市，以帮助地方进行这项工作。11 月 5 日上午，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这些工作人员作了指示，全体人员已经动身前往各地区。

11 月 4 日《真理报》的报道以及其他有关资料都已经译成了爱沙尼亚文字并随同这些同志带到各地区。

有关对于匈牙利事件的反应的资料正在进行收集和整理，将在 11 月 6 日上午呈上。

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凯宾

1956 年 11 月 5 日

转交人：切尔尼科夫

接收人：格里戈里耶娃

No 09423

斯涅奇库斯关于立陶宛政治局势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

(1956年12月6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

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认为，必须向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通报，关于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在立陶宛引出了一些具有政治性质的某些现象。应该指出，这些事件使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和其他的敌对分子活跃。近一段时间，各种各样的反对苏维埃的言论增加了，例如：“摆脱苏维埃压迫的时刻来到了”，“应该像匈牙利那样行动起来”，等等。某些地方还出现了带有反苏性质的传单和口号。在村庄里频繁地发生纵火事件。在11月份还发生了两起恐怖事件，其结果是打死了一名集体农庄的主席和两名集体农庄庄员。11月2日，即宗教节日那天，考纳斯市的民族主义分子，为了实现反苏的目的，企图利用信徒们在墓地举行的集会。民族主义分子还试图在青年学生中间积极进行自己的活动。

《美国之音》广播电台采用立陶宛语进行广播，以此来加强自己的教唆工作。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之音》广播电台公开宣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所进行的旨在立陶宛复辟资本主义的敌对活动将会得到美国执政当局的支持。例如：在今年10月18日的无线电转播中报道：“副总统尼克松，已经开始了今年的预选活动，他在加利福尼亚州接见了立陶宛代表团，并答应全力支持解放立陶宛的斗争”。也是在这次无线电转播中还报道说，副总统尼克松代表

华盛顿总统接受了立陶宛大学生代表团的请愿书，请愿书中提出了恢复立陶宛“独立性”的问题，并重申“美国坚信立陶宛对于自己的被奴役地位是不会心悦诚服的”。

获悉的情报说，1956年10月25日，艾森豪威尔接见了美国各侨民反苏组织的代表。在回答立陶宛侨民代表提出的问题时，艾森豪威尔宣称说，如果在立陶宛出现类似于匈牙利一样的事件，美国将给予立陶宛民族主义者以帮助。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特赦以及在服刑期间未经我们同意，一大批从前曾进行过严重的反革命犯罪活动的人返回了立陶宛，这一点对于共和国的政治状况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过去曾经是资产阶级政党的首领，反革命武装匪帮集团的头目。

不能不考虑天主教会所起的作用，它是共和国国内民族主义敌对分子的合法外衣。诚然，由于天主教会组成成分的一系列情况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天主教教士在苏维埃立法的范围内从事自己的宗教活动。但是僧侣中的大部分人仍然继续坚持反对苏维埃的敌对立场。天主教会的活动完全有助于引起不仅是宗教的，而且是民族主义的偏见。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人试图将天主教会描绘成立陶宛人民的“保护者”，使其文化摆脱“强制推行俄罗斯化”的救世主。在公开进行的政治斗争遭到失败以后，宗教界中的反苏分子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思想领域斗争的问题上，竭力利用教会的影响——尽管不是总能获得成功——培植民族主义的偏见思想，特别是在青年中间。

应该指出，这一次，有更多的居民体现出民族主义情绪。在某些共产党员身上也出现了不正确的行为。

我们认为，以上阐述的情况给共和国的党组织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动员全部力量给予敌人的进攻以有力的回击。针对这个任务我们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把对敌人的任何一种攻击的打击

与在群众中加强政治工作结合起来。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考虑到，现存的一系列使劳动者焦急不安并引起他们不满的问题也对共和国的政治局势产生了不良的影响。这些问题是：第一、与目前实际中执行的民族政策有关系的问题；第二、涉及到集体农庄建设的问题；第三、改善收入低的工人和职员物质生活条件的问题。

(一)

与在加盟共和国实践中实行的民族政策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在今年6月6日致苏共中央的《关于学习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所产生的后果的报告》的信息材料之中已经作了阐述。在报告中，我们阐述了共和国的劳动人民非常愉快地接受了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就在实践之中贯彻民族政策问题所作的规定。我们还指明了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一系列不足。

我们还请求苏共中央，在妥善调整报告之中所提出的问题方面给予帮助，但是，时至今日，对于所提出的问题我们没有得到答复。

与此同时，在最近一段时期里，与实际在加盟共和国实行的民族政策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变得比以前更加尖锐了。在劳动者中间出现了一系列怨言，他们抱怨在很多机关组织中立陶宛人不能讲国语。立陶宛人还向党中央提交了一系列声明，其中还有代表共产党员的声明，在声明中，对于共和国许多机关组织不重视立陶宛语表示了不满。这些问题还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例如：在苏维埃作家协会理事会党组织的选举报告会议上，作家约尼纳斯同志以及其他一些同志，在自己的发言中对于维尔纽斯市的许多机关组织中不允许

使用立陶宛语进行谈判表示不满。同时指出，某些工作人员甚至侮辱讲立陶宛语的公民。这些批评意见得到了出席会议的全体作家的支持。这些问题在工学院、医学院以及其他一些基层党组织的选举报告会议上被提出。

刊登在第9期《共产党员》杂志上的列宁晚期的著作，在劳动者之中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同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将在什么程度上执行这些文件之中所阐述的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指示。

最有代表性的是，在知识分子之中，对于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继续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谊及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展开了广泛地评论。在一系列场合下，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加盟共和国也采用在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原则。

一些劳动者，特别是一些青年大学生，广泛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将带有约·维·斯大林名字的街道改名；还提出了恢复一些战后被更改了名字的街道原来的名字。

应该说，在一系列场合下，这些问题的提出具有民族主义色彩。这是在进行反对俄罗斯的攻击。

应该指出的是，在实行民族政策的实践中，不仅仅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而且还有某些共产党员，试图利用我们的缺点来达到蛊惑人心的目的。例如，工会党委成员库普钦斯卡斯，为了在大学生中间获取廉价的声誉，在医学院团组织代表会议上发言时，指责大学生们没有为采用立陶宛语言进行公文处理而斗争，以及指责他们没有为恢复一些街道的旧名称而进行斗争，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库普钦斯卡斯同志以前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提出过类似这样的问题。立陶宛党中央委员普希尼斯同志提出建议，在共和国的报刊上重新刊登摘自《真理报》（1956年11月13日）的亚诺什·卡达尔的发言，并作为对于共和国来说具有现实意义的发言，这明显地

暗示，卡达尔对于阿谀奉承行为所提出的指责同样可以适用于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在我们共和国实践中实行的民族政策受到了批评，而这些批评中许多是没有根据的，有时甚至是打着批评的幌子而表示的直接敌意，对于任何一种试图打着批评的幌子，根据某些不足之处来怀疑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性的批评，我们都给予坚决的回击。我们对劳动者进行了广泛的解释工作，讲述根据列宁主义原则制定的民族政策贯彻在实际生活之中，可以保障立陶宛人民的真正自由，使它的经济和文化得到繁荣。

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必须彻底消除现存的不足之处，因为延误这些问题的解决会使共和国内和政治局势复杂化。

我们已经采取了实际措施，以便近期内在使用立陶宛语言方面进行应有的整顿。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一些联盟组织必须帮助我们，因为这些组织驻共和国的代表对于立陶宛语常常是持鄙视的态度，甚至对于加盟共和国机关关于该问题的指示也不加理睬。

考虑在干部分配问题上的合伙现象以及坚决杜绝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沙文主义现象，我们仍然认为必须在近期对于干部的分布进行更广泛的调整，因为这方面的严重缺点会引起劳动者理所当然的不满，并且有助于加强民族主义和反对俄罗斯的情绪。

毫无疑问，在完成这项任务时，必须使加盟共和国的所有党组织更加提高政治警惕性，以便排除政治上可疑的人出现在国家机关中的丝毫可能性，完全保证遵循列宁主义的选拔干部的原则，即：提拔政治上坚定的、忠于党的、有专业才能的、并能保证胜任受委托的工作的人们。

显然，我们必须广泛地提拔地方的民族干部，不仅仅是在各区内，而且在加盟共和国的各级组织里，也包括在中央和部长会议里。当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部长会议）的组成

之中，地方的同志不超过百分之五十时，应该认为这是不正常的。

对于立陶宛铁路局以及其他一些联合组织中的干部状况，居民之中产生了很多怨言。在立陶宛铁路局的 48 名干部人员中，只有 5 名立陶宛人，并且，他们之中的某些人还不懂立陶宛语。局里的 298 名负责人员和技术人员之中，只有 16 名立陶宛人。

最近，在党的机关中提拔民族干部的工作变得缓慢了，以下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自 1954 年 1 月 1 日截止到 1956 年 7 月 1 日，乡村地区党的委员会中，立陶宛人的数量仅仅增加了 155 人，目前占区委员会负责人总数的 58.6%，这样一来，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平均每个地区提拔到党的领导岗位上工作的立陶宛民族的同志只有 2~3 名。将懂立陶宛语言的同志提拔到乡村地区党委员会第二书记的职位上的工作进行得很差（83 名第二书记，只有 28 名立陶宛人），这给搞好地区的党务和政治工作造成了困难。在上述所说的期限之内，城市委员会和城市区党委员会中，立陶宛人的数量从 102 名减少到 77 名，即从 43% 降至 37%。在城市各基层党组织中，担任书记职务的立陶宛人很少。甚至在考纳斯市，这个市工人和知识分子的主要部分都是立陶宛人，截止到 1956 年 12 月 1 日止，各基层党组织书记之中立陶宛人只占 45%。

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与群众联系的加强，这也是党组织中立陶宛族的工人和知识分子人数增长缓慢的原因之一。对此应该补充说明的是：考纳斯市的绝大部分工业企业的经理，以及各级干部部的负责人，都是由不懂立陶宛语的同志担任的，其中有很多人甚至连中等学历都没有。这引起了工人，以及具有高等学历，却在次工岗位上工作的青年专业人员的抱怨。

我们完全承认，对于这些严重的缺点，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是有责任的，同时我们认为必须指出，存在一些原因，提拔民族干部的障碍并不全在于我们。

提拔民族干部工作有时会遇到来视察的同志的强烈反对，他们视这一点为沙文主义，或者类似的表现。某些联盟部有时对此也表示反对。

我们恳请苏共中央主席团支持更广泛地提拔民族干部的措施，当共和国没有可能提供给一些同志以适合他们学识水平的工作时，协助将他们从共和国中召回，而他们空缺出来的职位可由民族干部代替。

(二)

最近，与民族政策问题同时广泛提出的，还有涉及集体农庄建设的一些问题。政府在共和国农业方面给予的帮助，党和苏维埃机关为发展农业所采取的措施，已经出现了良好的结果。尽管近些年，条件极端不利，加盟共和国的集体农庄在提高农业生产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本年度内共和国集体农庄农作物的产量提高了，非常顺利地进行了冬种，扩大了牲畜的存栏头数，产乳量提高了，并提前完成了给国家的供奶任务。所有这一切对于集体农庄庄员的政治情绪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同时必须指出，由于受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影响，最近出现了一系列反对集体农庄情绪的事情。对于哥穆尔卡报告中所说的有可能解散经济效益差的集体农庄出现了很多议论，特别是在波兰族居民中。在集体农庄庄员之间流传着这样的谣言，仿佛在立陶宛将解散集体农庄，而集体农庄的土地将分配给庄员们，等等。我们已经采取措施加强乡村里的政治工作，以杜绝反对集体农庄的鼓动宣传。我们认为，这些措施必须由其他一系列措施来加强，首先是要改善党和苏维埃机关中农业的领导工作，以及在巩固集体农庄和扩大农产量的同时提高庄员的物质利益，因为在共和国还存在着很多农庄庄员的收入非常低的集体农

庄。在这方面我们正在研究制定相应的措施。可能在某些问题上，还必须上报苏共中央。

(三)

由于农业方面取得的某些成绩，以及消除了在分配由苏联贸易部和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批准的基金方面的错误，共和国城市居民的食品供应状况好转。在过去的五年里，工人和职员的工资也有一些提高。但是，工人和职员的日常物质生活条件仍然很困难。立陶宛工人的月平均工资是 706 卢布，也就是低于苏联工人月平均工资的 10%。

特别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在立陶宛的许多工业部门中，工人的月平均工资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工人的月平均工资相比就更低了。例如：在 1955 年，城市公用事业工人的月平均工资是：在立陶宛——506 卢布，在拉脱维亚——611 卢布，在爱沙尼亚——710 卢布；地方工业部门中，工人的月平均工资是：在立陶宛——560 卢布，在拉脱维亚——725 卢布。是的，这可能与劳动生产率水平较高有关。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工资水平的差别过于大了。

立陶宛居民的人均商品周转额大约低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居民的人均商品周转额两倍，这个事实最能说明共和国劳动者的物质生活水平。

应该关注这个事实，即绝大多数工人和职员的月工资都处于相当低的水平。根据统计局今年 3 月份的资料表明：在共和国国民经济部门的 441500 名工人和职员中，有 62% 的人月工资低于 600 卢布，其中 107700 人的月工资低于 350 卢布。

目前，还存在着大量需要安置工作的人，这一点对于劳动者的政治情绪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例如：根据考纳斯城市委员会的资

料显示，在考纳斯市有大约 4000 人需要安置工作，同时，城市各企业中超计划的人数是大约 2000 人。在共和国的各个城市里，住房问题也是非常困难的问题。在共和国的五个城市中，需要住房的家庭仅在今年的 10 月份就扩大了 2000 户，目前已经是 10067 户。

我们认为，近期必须采取一系列补充措施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劳动者的日常物质生活条件以及扩大共和国住宅建设项目。

在解决所提出的问题时，联盟政府必须给予我们以帮助。

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提高警惕性、加强同敌对分子的斗争是巩固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现象活跃的斗争的最重要的条件。与此同时，必须加强思想领域的工作。

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实施必要的措施，加强以我国各族人民友好和兄弟情谊的思想，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教育劳动者的斗争，揭露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流毒，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劳动者。

在居民中加强群众性政治工作，对于敌对分子企图捧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活跃私有制残余以及民族主义偏见，给予更加坚决的回击。普遍开展关于国际形势的讲座以及谈话。组织共和国的骨干分子前往农村各地区作关于时局和我们的任务的政治报告。

采取措施以提高科学无神论的宣传工作，更有效地研究有关文化遗产的继承以及公布反映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和反动的天主教僧侣所进行的反人民活动的文件。制定措施加强同来自境外的反动宣传活动的斗争。加强知识分子的某些阶层中的政治工作。

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通过决议，加强在高等学校中的思想工作。近期将召开作家协会理事会全体会议。关于进行共和国知识分子协商会议的问题已经成熟。

最近几天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通过的关于青年专业人员方面工作的决议，提出了广泛提拔青年专家到工业部门的领导

岗位上的任务。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正在审议关于调整劳动定额和工资的问题。这些问题拟定在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进行讨论。在前不久召开的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对于有关扩大生产畜牧业产品的任务完成的结果进行了讨论，审议了1956~1957年牲畜过冬的问题。在11月29日至12月1日召开的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第4次会议上，讨论了在共和国发展国家和集体贸易问题，以及执行退休金法的进程等问题。采取措施，依靠工业企业的力量来扩大工人住房的建设。

我们已经制定一系列加强同敌对分子作斗争的措施并提呈苏共中央审批。

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请苏共中央委员会相信，共和国党组织将竭尽全力地做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思想以及苏维埃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的工作，使全体劳动者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苏联共产党的周围。

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A. 斯涅奇库斯

1956年12月6日

№09424

卡伦别尔津关于拉脱维亚政治情况 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6年12月7日)

发自里加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近两年来，从各监禁地区返回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定居的大约有20000多人，这些人员都是由于从事反对苏维埃的活动、帮助德国侵略者以及进行土匪活动而被判刑并被流放到苏联边远地区的人员，过去的富农以及其他人员，其中有13000多人是积极帮助德国侵略者，组织和参加武装土匪活动的，有6000多人是作为富农和社会危险分子而被流放到共和国边区的。返回的人员还有原社会民主党的首领、法西斯党的首领、天主教教会的活动分子以及其他一些立陶宛资产阶级的积极的政治活动分子。

返回的人员绝大部分居住在乡村地区，同时，他们也逐渐集中在城市附近地区。在里加市内和郊区居住着5000多人。目前，每个乡村地区平均都有300~500从监禁地区返回的人员。

返回人员中的基本群众都给安置了工作，他们在农业和工业部门从事对社会有益的劳动。很多人都放弃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工作，在工业企业和运输部门从事季节性的工作。

从监禁地返回的大部分人员之中，没有发现有什么反对苏维埃

的表现。但是，资产阶级和法西斯组织的首领、反苏集团和民族主义武装匪帮的领导和组织者们，仍然没有改变对苏维埃国家制度的敌视态度，他们试图重新进行积极的反对苏维埃的活动，以便在共和国内恢复与外国反苏民族主义中心所失去的联系，他们对共和国的政治和经济状况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心，并收集有关方面的资料；他们诽谤苏维埃政府和党的措施，散布谣言说战争不可避免地很快会来临，而这场战争会拯救他们。为了趁他们所期待的国际状况复杂化的时机进行积极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他们恢复了与自己同谋者的联系。发生了以下事件：从监禁地返回的人员竭力购买武器，煽动对共产党员和俄罗斯人的仇恨，硬把自己能从监禁地获得释放说成是美国对苏联施加压力的结果。

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已掌握了准确的资料，证明有 160 名从监禁地返回的人员从事反苏活动以及怀有这种企图。他们之中最典型的人物是原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Ф.Я. 门杰尔斯，他把该党的活跃分子——К. 洛伦茨、布梅斯杰尔斯、А. 格列维尼什集结在自己周围，并与原资产阶级拉脱维亚外交部长蒙德尔斯建立了个人联系，与他们讨论了对于苏联对内对外政策问题所持的反动观点，并表示只有新的战争才能拯救拉脱维亚的愿望。

瑞典军舰在里加市逗留期间，门杰尔斯与瑞典社会民主主义报刊的记者伦德贝尔格建立了联系，与他进行了三次长时间的谈话，在交谈之中，以诽谤的方式向他讲述了劳改营中囚犯的状况，以及苏联在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所实行的民族政策，并向他提供了有关共和国政治经济状况的详细情报。

门杰尔斯还与在瑞典的拉脱维亚社会民主主义分子的首要人物，以及原资产阶级拉脱维亚著名政治活动家布鲁诺·卡尔宁什建立了联系，并在瑞典政府的帮助下，企图前往瑞典。

Э.Ю. 布拉基斯——法西斯党的组织者和著名活动家之一，表示计划进行组织民族主义的秘密活动。他与这个党的原成员们建立了联系，并试图以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教育青年人。

普林杰——是1949年被取缔的民族主义起义组织的积极参加者；他同与其思想一致者建立了一系列的联系，并宣称，当出现某种复杂局势时，他可以组织40~50人来进行反对苏维埃拉脱维亚的斗争。

在这方面从事反对苏维埃工作的人还有H.И. 科兹洛夫——宣称说：“原资产阶级立陶宛的部长瓦尔德马尼斯目前正在西德，在那里有很多被武装起来的阿伊兹萨尔格人，他已经与拉脱维亚建立了联系，一旦出现复杂的局势，他将在这里立即成立军事集团，阿伊兹萨尔格人以及在劳动改造营呆过的人将首先加入这个集团”。科兹洛夫正在寻找能够搞到武器的地方。

还有来自充满仇恨的原讨伐队员方面的更尖锐的反苏维埃的表现和言论。从监禁地返回的K.A. 扬松斯（斯克伦达地区）攻击公民埃贝尔斯，试图扼死他，并叫嚣，他将这样对待所有的将拉脱维亚出卖给俄罗斯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从监禁地返回的人员、在卢扎区集体农庄工作的利普科，在十月革命节与青年会面时，公开号召他们：“打击共产党员并把他们梆在柱子上，就像匈牙利那样”。

来自从监禁地返回的其他一些人员的类似的攻击苏维埃骨干分子的言论也被记录下来。

对于天主教徒的思想给予了特别有害影响的是从监禁地返回的天主教教士Я.П. 亚什凯维奇，天主教教会的主教K.C. 杜利宾斯基，天主教教士П.П. 什塔戈尔斯，他们从事反对苏维埃的活动，使教徒，特别是青年人脱离苏维埃的影响。

1956年1月份，亚什凯维奇在科斯捷尔（维利扬斯基地区）

进行反对无神论者的演讲时，宣称说：“他们将不会长久地存在”。3月12日，他还去了共青团员 T.A. 布连齐斯和 M.Я. 舍克斯杰尔斯的住所，号召他们放弃自己所选择的虚伪的道路，回到教会来，同时，还以鄙视的态度评价了苏共党员和集体农庄的骨干分子们。

主教杜利宾斯基，来往于各个教区，要求家长们禁止孩子们参加集会，晚会，看电影和戏剧，以便“保持灵魂和肉体的纯洁”。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匈牙利事件，加剧了反苏和民族主义现象。在里加市和共和国其他一些地区（利耶帕亚斯基区、图库姆斯基区、阿尔松加区、叶尔加瓦区、瓦尔米耶拉区、塔尔辛斯基区、萨尔杜斯区、坎达瓦区、加乌耶恩斯区）的信箱里，以及房屋的墙上，发现了一些声援匈牙利暴乱分子的传单，还有一些传单的内容是号召为建立“独立的拉脱维亚”与共产党员和俄罗斯人进行斗争。在10月至12月期间，总共发生了34起散发传单事件，其中里加市发生了24起这样的事件。总共发现传单228份。

反苏言论还出现在队列里，火车上，公共汽车上和无轨电车上。

一些不健康的言论还出现在知识界的某些代表人物中——艺术家、作家、科学工作者以及报刊工作者。例如：《斗争》日报的工作人员赞多夫斯基·里哈德说：“在莫斯科的党的领导人们必须对匈牙利事件作出重要结论。应该在莫斯科寻找匈牙利问题的罪人。在我们拉脱维亚民族主义利益也受到了压制”。

考虑以上所述，拉脱维亚中央委员会采取了措施，以提高政治警惕性并加强在居民中的大规模的政治工作。

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卡伦别尔津

1956年12月7日

转交人 德罗兹多夫

接收人 切连科娃

【专题说明】

科学家卡皮察的个人遭遇

(1956年11月至1961年12月)

彼得·列昂尼多维奇·卡皮察是苏联杰出的物理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因对磁学和低温物理学的研究，197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卡皮察生于1894年，1921年赴英国留学。1924~1934年在剑桥大学任卢瑟福领导下的卡尔文迪什实验室以及蒙德实验室领导。1929年被选入英国皇家学会，是两百年来这个学会吸收的第一个外国人。1934年回苏联参加一次专家会议，护照被扣。后来在苏联国内领导物理研究所。二战中为苏联研究制造了大量液氧。1946年因拒绝参与核武器研制工作而遭软禁。1955年再次出任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

著名的英国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伯兰特·罗素在50年代发起并领导了国际学者反对核武器的运动，谴责氢弹实验，还发表了《罗素-爱因斯坦声明》。罗素等科学家建议建立一个科学家国际委员会，讨论进一步发展大规模杀伤武器带来的安全问题。罗素及其同事深知吸收苏联科学家参加这一组织及其讨论的重要性。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经苏共中央批准推荐的参加会议的人员中却没有卡皮察院士。1956年10月18日，罗素以他和另外7位著名科学家的名义向卡皮察院士发了一封补充邀请函。苏联科学院就此事向苏共中央写

了请示报告。11月24日，苏共中央科学、大中学部向苏共中央送了关于苏共中央书记处对卡皮察不宜出国的批复的呈文。卡皮察赴印开会终遭否决。

苏联领导为什么不允许卡皮察出国？赫鲁晓夫后来在其回忆录中解释说，他问了拉夫连季耶夫，卡皮察虽然没有参与苏联原子武器的研制工作，但他还是了解苏联的研制情况，因此，让他出国会“有讲话太多的危险”。

此后，卡皮察于1961年2月向苏共中央提交的《着手研究基本俄语》建议，也遭到否定。像卡皮察这样国际著名的大科学家在苏联实际上得不到信任，也没有个人自由。这一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态度。

(本专题文件由杨存堂编辑和校注，
李娅尼、王伟文翻译)

№04541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就申请派遣卡皮察院士赴印事
致苏共中央的信

(1956年11月20日)

秘密

致苏共中央

关于派遣彼·列·卡皮察院士赴印事宜

据1956年11月15日上级机关的指示(№25/4-C),苏联科学院派往印度(1957年1月)参加进一步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带来的安全问题委员会会议的该委员会苏方成员是:A.H.涅斯梅亚诺夫^①院士、A.И.奥帕林^②院士、Д.В.斯科别利岑^③院士和科学院通讯院士H.M.西萨基扬^④。

现卡皮察院士也收到本次大会组织者的补充邀请。

请指示。

附件于后。

① 涅斯梅亚诺夫(1899~1980),化学家,院士,1951~1960年任苏联科学院院长。

② 奥帕林(1894~1990),物理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院士。

③ 斯科别利岑(1892~1990)——物理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院士。

④ 西萨基扬(1907~1966),生物化学家,院士。

苏联科学院院长、院士 A.H. 涅斯梅亚诺夫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学术秘书长
A.B. 托普奇耶夫^① 院士

附 件

罗素邀请卡皮察参加就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进一步发展所带来的安全问题委员会的信函

(1956年10月18日)

亲爱的卡皮察教授：

我以去年7月发表声明人的名义和以本信各署名人的名义，在此给您写信，想推心置腹地倾谈。我们想邀请您参加约20位学者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应于明年1月在印度就大规模杀伤武器发展后果的危险性做出评估。您也许还记得在我们的声明中曾建议召开类似会议的吧。

尽管大国间的紧张局势去年有所缓和，但我们认为，至今仍有必要召开类似的会议。因为继续进行大规模氢弹试验引起了各方面的深切不安，并要求大量报道此类试验所引起的生物及其他方面的影响。

结果，一些国家成立了委员会以研究放射物质对生物引起的后果，联合国也为此设立由15国代表组成的委员会。不久前，部分国家的委员会公布了研究结果。研究报道表明，试验爆炸引起了放射性尘埃沉降在整个地球上，增加这种试验的次数就会导致许多人

^① 托普奇耶夫(1907~1962)，有机化学家，1949~1958年任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秘书长。

患癌症或其他疾病。尽管它目前在遗传方面危害还不明显，但还没有组织全球性的观察，也就不可能全面分析这种危险性。毫无疑问，联合国成立的委员会要是能考虑到从各国委员会代表处收集各国有关技术资料的话，就可获得最有价值的结论。然而我们认为，仍应进行独立的调查研究以弥补联合国和个别国家的组织之不足。想法如下：

1. 官方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的工作有时会受到政治看法的限制。有关活动的广泛开展和发表结论的自由可能也因此受制。特别当代表们想亲自进行更全面地调查研究，更广泛地公布所得结果，更是困难重重。

2. 若社会舆论不能督促调查研究的展开，那么这类委员会的复杂机构就只能延误工作。

3. 不代表政府，只按照自己良知说话的独立学者们所发表的声明可能比官方宣言更能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

此外，就试验爆炸引起的对生物造成的危险问题，大会还要讨论如下几个问题：

- 一、在战争中一旦使用核武器，放射性尘埃辐射所造成的当时影响与日后危害的差异。

- 二、核武器试验在加速军备竞赛中所起的作用及可能的无限制的“核战争”引起的危害。

- 三、需要进行国家性探索来制定在许多领域广泛采用放射性同位素的规则及因使用不慎所引起的危险。

我们的设想是，委员会以个人名义聚集在一起开会，并在会面后再决定是否要发布一个什么公告宣布它的成立和所通过的决议。

发出参加会议的邀请函时，我们尽力做到，大会的最终组成，既要包括各种不同的政治及其他观点的代表，又要包括所设研究课题的不同学术派别的代表。我们之所以要在所有这些问题保持相应

的平衡，为的是确保任何一项决议都能取得一致通过。随信附上被邀请人名单，带星号的是已接受邀请者。

我们建议，1957年1月印度科技大会召开前不久，委员会在印度组成。如果您能尽快告知我们愿意参加该委员会，我们将不胜感激。我们将针对不同人的财政状况给予财政支持，我们将确保补足所需的费用。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指出，在您做决定时，无需考虑来访的费用问题。

您忠诚的 伯特兰·罗素

马克斯·玻恩^①（德国）

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②（法国）

I. 英费尔德^③（波兰）

林纳斯·鲍林^④（美国）

C.F. 鲍威尔^⑤（英国）

罗特布拉特^⑥（英国）

汤川秀树^⑦（日本）

1956年10月18日

-
- ① 玻恩（1882~1970），德国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
- ② 居里（1900~1958），法国物理学家，巴黎科学院成员，从1950年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
- ③ 英费尔德（1898~1968），波兰理论物理学家，波兰科学院成员。
- ④ 鲍林（1901~1994），美国物理和化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成员，诺贝尔奖获得者。
- ⑤ 鲍威尔（1903~1978），英国物理学家，伦敦皇家学会成员，诺贝尔奖获得者。
- ⑥ 罗特布拉特（1908~?），英国物理学家。
- ⑦ 汤川秀树（1907~1981），日本理论物理学家。

被邀请者名单

- * 马库斯·奥利凡特^① 教授 (澳大利亚)
季林^② 教授 (奥地利)
- * 若素耶·德·卡斯特罗^③ 教授 (巴西)
李四光教授 (中国)
尼尔司·玻尔^④ 教授 (丹麦)
路易·德·布罗利^⑤ 教授 (法国)
- * A.M. 拉卡萨涅^⑥ 教授
施韦泽^⑦ 博士 (德国)
奥托·哈恩^⑧ 教授
维内尔·海森堡^⑨ 教授
古斯塔夫·赫兹^⑩ 教授
布·拉耶夫斯基^⑪ 教授

-
- ① 奥利凡特 (1908 年生), 澳大利亚物理学家, 曾任澳大利亚科学院院长。
 - ② 季林 (1927 年生), 奥地利物理学家, 奥地利科学院成员。
 - ③ 卡斯特罗 (1908~1973), 巴西物理学家、人类学家、卫生学家。
 - ④ 玻尔 (1885~1962), 丹麦物理学家, 发明原子结构量子理论, 1922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
 - ⑤ 布罗利 (1892~1987), 法国理论物理学家, 诺贝尔奖获得者。
 - ⑥ 拉卡萨涅 (1884~1971), 法国放射学家。
 - ⑦ 施韦泽 (1875~1965), 德国思想家、神学家、传教士、医生、音乐家、风琴演奏家, 诺贝尔奖获得者。
 - ⑧ 哈恩 (1879~1968), 德国放射化学家, 诺贝尔奖获得者。
 - ⑨ 海森堡 (1901~1976), 德国理论物理学家, 提出量子力学的不确定原理, 诺贝尔奖获得者。
 - ⑩ 赫兹 (1887~1975), 德国物理学家, 德意志共和国科学院成员, 诺贝尔奖获得者。
 - ⑪ 拉耶夫斯基 (1893~1974), 德国放射学家、生物物理学家。

劳德·艾德里安^① (英国)

* 亚历山大·赫多乌^② 教授

基利尔·欣谢尔伍德^③ 先生

比尤尔格尔斯^④教授 (荷兰)

* 科塔里博士^⑤ (印度)

克里什南^⑥ 先生

阿马尔迪^⑦ 教授 (意大利)

朝永振一郎^⑧ 教授 (日本)

M. 铃木^⑨ 教授

* 格奥尔奇·德·海韦西^⑩ 教授 (瑞典)

格奥尔奇·比德尔^⑪ 博士

杰特列夫·布朗克^⑫ 博士

康普顿^⑬ 教授 (美国)

① 艾德里安 (1889~1977), 英国生物学家曾任伦敦皇家学会院长, 诺贝尔奖获得者。

② 赫多乌 (1907年生), 英国病理学家, 皇家学会成员。

③ 欣谢尔伍德 (1897~1967), 英国物理化学家, 曾任皇家学会院长, 诺贝尔奖获得者。

④ 比尤尔格尔斯 (1897~1967), 加拿大学者皇家科学院成员

⑤ 科塔里 (1906年生), 印度物理和天体物理学家, 德里科学院院士。

⑥ 克里什南 (1897~1961), 印度物理学家, 院士。

⑦ 阿马尔迪 (1908年生), 意大利物理学家。

⑧ 朝永振一郎 (1906~1979), 日本理论物理学家, 科学院成员, 诺贝尔奖获得者。

⑨ 铃木 (1892年生), 日本医生, 最早研究原子武器对人体健康的后果。

⑩ 海韦西 (1885~1966), 瑞典化学家、物理学家、放射生物学家, 诺贝尔奖获得者。

⑪ 比德尔 (1903年生), 美国生物遗传学家, 诺贝尔奖获得者。

⑫ 布朗克 (1897~1975), 美国生物学家。

⑬ 康普顿, 美国物理学家, 诺贝尔奖获得者。

奥本海默^① 博士

艾根·拉比诺维奇^② 教授

维克多·韦斯科夫^③ 教授

彼得·卡皮察教授 (苏联)

A. H. 涅斯梅亚诺夫院士

H. И. 努日金^④ 博士

Д. В. 斯科别利岑院士

* A. B. 托普奇耶夫院士

① 奥本海默 (1904~1967), 美国物理学家, 主张和平利用原子能。

② 拉比诺维奇 (1901年生), 美国生物学家。

③ 韦斯科夫 (1908年生), 美国理论物理学家。

④ 努日金 (1904~1972), 苏联遗传学家, 院士。

№04543

格拉戈列夫等通知不许卡皮察出国
给苏共中央的请示报告

(1956年11月24日)

苏共中央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涅斯梅亚诺夫、托普奇耶夫同志）向中央请示，彼·列·卡皮察院士能否应大会组织者邀请去印度参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一步发展所带来的安全问题委员会。

1956年苏共中央就此事进行了研究。鉴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反对，对此做出了否决。

认为卡皮察不宜赴印度。

请允许向苏联科学院主席团通知此事。

苏共中央科技和大、中学部副部长

H. 格拉戈列夫

A. 莫宁

No03346

卡皮察关于研究“基本俄语”致苏斯洛夫的信

(1961年2月27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米·安·苏斯洛夫同志

最尊敬的米哈伊尔·安德列耶维奇：

我想，中央对于以下这个涉及在国外，特别是在不发达国家，扩大我们的文化和思想影响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是会感兴趣的。这个问题关系到克服民族之间因语言不同和学习任何一种完备的外语都十分困难而造成的障碍。

英国人研究出所谓“基本英语”之后，正在以新的方式顺利地解决这项任务。事情的起因是，剑桥大学两位有深厚根底的英国著名学者奥格登和理查兹通过自1929年即开始的以科学分析为基础的研究工作表明：只要有800个英语词和9条语法规则，就能够创造出一种简化的语言，而使用这样的语言仍然可以表达出任何一种复杂的科学、政治或商业信息。这样创造出来的“基本英语”有一本只占4页纸的词汇表和语法，一个具备中等才干的人用50个小时就能把这一切都记住。任何一个懂英语的人毫不费力就能听（看）懂“基本英语”，尽管这种语言的简单化令人惊奇，而且这种语言当然也没有艺术价值。实践表明，学会“基本英语”的人，要学会标准英语也容易得多。

值得指出的是，创造这种简化语言的想法是生活本身提示的，是从一些殖民地国家出现所谓“皮钦语”（或译为“洋泾浜语”）而

使人们受到启发的。这类语言由带一种语言，例如英语的词根的词汇组成，但使用当地居民所用语言的语法。“皮钦语”传播之广，仅从以下情况便可以知道：在太平洋国家中仅使用同一种“皮钦语”的就有数千万人，圣经翻译成“皮钦语”，还有用“皮钦语”印行的报纸、杂志。各种“皮钦语”的词汇均仅在几百之数，语法也极简单。

1947年，丘吉尔和罗斯福承认“基本英语”对于国家实现殖民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于是“基本英语”在不发达国家的传播获得政府的支持，两位发明者也获得92000美元的酬金。如今，“基本英语”获得广泛传播，这是因为它不仅有传达信息的价值，而且可以为今后决心学习标准英语的人打下很好的基础（我国的马·马·李维诺夫^①就曾承认“基本英语”的作用）。

在2月24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会议上，当讨论到我国如何发展语言学问题时，我提出建议在我国着手对于使用少量词汇和简化语法规则的“基本俄语”进行科学探讨，以便让一个具有中等才能的外国人可以在几十个小时时间内将其掌握。

无论是语言学家，还是主席团委员，没有人支持我的建议。虽然我自身对于这种专门的语言并无需要，因为不算它我已经掌握了几种语言，但我认为，如果忽视这种语言的创立，我们可能要犯大错误。

谁都知道，我们对于不发达国家的思想和文化影响，既是我国对外政策和为和平而斗争的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为了扩大这种影响，必须完善克服言语障碍的方法。资本主义国家经验说明，“基本英语”是在

^① 马克辛·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1876～1951），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革命前曾担任党内各种职务，革命后主要从事外交活动，1921～1930年任外交副人民委员，1930～1939年任外交人民委员。

不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广泛传播英国文化而克服障碍的有效方法。现在已由实践证明，作为对“皮钦语”加以科学改造的基本语言，是克服国家之间的语言障碍的强大技术手段。

如果我们之所以拒绝创立自己的基本语言，只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使用了这种方法，这是愚蠢的，正如同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使用无线电进行宣传于是我们就拒绝使用无线电一样。忽视在我们这里发展这类语言，只会给我们自己造成损害。发展我国基本俄语的任务，对于科学院是一项值得下功夫的科学研究任务。我相信，我国年青的学者们，若不是害怕我们的“祖师爷”们会把这项工作看成是对俄语的美的亵渎和玷污的话，一定会乐意从事这样的事业。我想，如果能够通过应征选拔的办法来编制基本俄语，那么必能迅速发现和吸引最合适的学者来解决这项任务。

我以为，这是一个相当重要和具有原则意义的问题，必将引起中央委员会的关注，因此才写信给您。

尊敬您的 彼·列·卡皮察

又及：如果这个问题使您感到兴趣，那么更详细的材料可以在2月24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会议上我发言的记录中找到，那里也有我们的语言家和主席团委员的发言。《真理报》编辑部的И.К.阿扎江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对我说，常常有人去编辑部向他们谈到克服语言障碍的问题。这也证实了所提问题的迫切性。我个人关心这个问题，是基于现在提高国际科技信息的交流十分重要。这方面基本语言也能带来巨大的好处。而且不难看出，基本语言更便于适应机器翻译，比标准语言要容易许多倍。

彼·卡

№03347

库金等人关于“基本俄语”问题 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1年12月21日)

苏共中央

彼·列·卡皮察院士在给苏共中央的信中提出必须在我国着手研究使用少量词汇和简化语法的“基本俄语”的问题。

卡皮察同志指出，任何一个具有中等才能的外国人都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这种“基本俄语”。同时，他还在“基本俄语”和所谓“皮钦语”及“基本英语”之间进行了对比。

按照卡皮察院士的意见，利用“基本俄语”可以通过报纸、杂志、书籍、无线电等等在全世界各国人民中广泛宣传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

在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会议上，卡皮察院士曾发言提出这项建议。但是，他的建议既没有得到语言学家们（在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的这次会议上有苏联最著名的语言学家参加）的支持，也没有得到其他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委员的支持。

苏共中央科学和学校部在专家的参加下研究了卡皮察院士关于创立类似“基本英语”那样的“基本俄语”的建议，认为这个建议是不能接受的。

所谓“基本英语”是1929年由哲学家奥格登和语言学家理查兹创造的，大约包括800个词，利用这些词可以就最普通的题目进行简单的交谈。“基本英语”甚至还大大不如“世界语”、“伊多语”

这样一些人造语言。它从来没有在交流中起到过重大作用，无论英国人还是美国人都没有对它作过宣传，因为知道这种语言是不会有效果的。“皮钦英语”之类的同行语的作用也大致如此。这类同行语是在民族边界交往或外国人大举渗透的特殊情况下出现的，注定是迟早要消亡的。从语言学的观点看，“皮钦语”只是一种没有任何严格语法规则的各种语言词汇的堆积。例如，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中国沿海城市使用的“皮钦英语”（即“洋泾浜”英语）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了。

创立一种由800~1000个词组成的“基本俄语”并进行宣传，无论从实用的观点还是从政治的角度看都是不可行的。

俄语是世界性语言之一，其世界地位正在不断提高。目前，它正在成为美国、英国、法国、日本、人民民主国家和其他国家人们学习的外语中的第一位外语。此外，俄语，作为苏联许多民族的第二种母语，正在促使苏联数十种语言的词汇日益丰富起来。

但是应当指出，在国外推广和学习俄语的重大困难是缺少供外国人使用的优秀的俄语教科书和教学参考材料。1960年3月，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帮助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学习俄语的措施》的决议。苏共中央的这个决议责成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和俄联邦教育部在一年时间内编写出一批供外国人用的俄语教科书，并制订俄语教学计划、大纲，以及撰写教学材料和语言学科研资料。

苏共中央科学和学校部会同苏共中央俄联邦科学和学校部检查了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和俄联邦教育部执行苏共中央《关于帮助资本主义国家中俄语学习的措施》的决议的状况。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内，已经出版了一系列供外国人学习俄语的形象化教具和教学—教学法书籍，但所做的工作还不够。

已责成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和俄联邦教育部采取措施，从根本上改善外国学习俄语方面的工作，编制教学计划和大纲，出

版供自学用的，以及供中小学、中等专业学校 and 高等学校、俄语训练班和学习小组使用的俄语教科书。为了帮助学习俄语，还要出版形象化教具和教学—教学法资料，制作灵格风教材。

关于对卡皮察同志建议的研究结果已告知他本人。

苏共中央科学和学校部副部长 库金

科学和学校部处长 库兹涅佐夫

1961年12月21日

【专题说明】

关于是否恢复高尔基市旧名的争论

(1957年4月)

高尔基是俄国的大作家，曾积极支持和歌颂革命，革命后被树立为一面旗帜。1932年，为表彰他，把他的出生地下诺夫哥罗德市改名为高尔基市。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为了消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苏联国内掀起了更改以斯大林命名的地方、城市、街道名称的风气。下诺夫戈罗德州的一些人提出恢复高尔基市旧名的建议，这就引起了苏联文艺界的争论。这两份文件表达的是部分文艺界人士的看法。这一争论的侧面反映了苏共二十大在苏联国内引起的思想动荡。

高尔基市现在已恢复了下诺夫哥罗德的旧名。

(本专题文件由杨存堂编辑和校注，
高增训翻译)

№04392

苏联文艺界人士就是否恢复高尔基市旧名
致苏共中央的信
(1957年4月27日)

苏共中央：

据我们获悉，高尔基州的一些同志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将高尔基市恢复过去的名称下诺夫哥罗德。

由于马克西姆·高尔基不仅是世界闻名的伟大作家，而且也是多民族的苏维埃文学的奠基人和导师，所以我们认为就高尔基州一些同志的建议谈谈我们的想法是自己公民的职责。

高尔基州的作家们列举的证据作为更改高尔基市名称的理由，我们认为这些证据是十分牵强附会的，是对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声望的侮辱。

下诺夫哥罗德的历史传统已永远载入我们祖国的史册。这种历

关于是否恢复高尔基市旧名的争论

对我们祖国的任何一个城市，无论是老城市或是新兴的城市，都不是什么凌侮，而是一种荣誉，因为高尔基是使我国人民的创作天才驰名于世的祖国最杰出的儿子之一。

我们还认为，在处理高尔基市更名，恢复为下诺夫哥罗德这一问题时，还应考虑到：怎样将这一举动向我国人民解释，尤其是对国外。在最近一年至一年半时间内，高尔基在国外成了所有最狂暴的仇视者攻击苏维埃文学和苏维埃制度的靶子。如果城市更名，这未必不会被看作是反对纪念伟大作家而施行的一种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迫害。而作这种解释是完全可能的。

我们强烈请求中央委员会考虑我们的意见，并保留高尔基市的现名称，它无论在美学上（以其发音）还是在政治上都不会使俄罗斯人听起来感到不舒服。

A. 苏尔科夫

B. 卡达耶夫

A. 扎罗夫

A. 特瓦尔多夫斯基

康斯坦丁·费定

B. 斯米尔诺夫

H. 吉洪诺夫

鲍里斯·拉夫列尼奥夫

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

B. 阿扎耶夫

B. 科热夫尼科夫

弗拉基米尔·卢戈夫斯科伊

尤里·利别金斯基

薇拉·因贝尔

A. 施泰因
H. 阿塔罗夫
Г. 马尔科夫
B. 科切托夫
(签名)^①

^① 此处签名字迹不清，难以辨认。

№04393

苏共中央文化部关于调查高尔基市更名问题 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7年4月29日)

致苏共中央

苏共中央文化部认为有必要向你们报告：相当广泛地传播的关于高尔基州一些工作人员建议将高尔基市更名为下诺夫哥罗德的消息，这正在引起文艺界许多著名活动家的困惑和反对。

例如，现在正在将高尔基的小说《母亲》的主要内容改编为歌剧的作曲家 T. 赫连尼科夫说：“我刚从高尔基市回来，那里一切简直都充满着高尔基的名字，一切都与他的生活和创作联系在一起。关于该市更名的话题，在高尔基市也听到过，使人极为痛心。对马·高尔基的态度来说，这是很不公正的。更名一事无疑将煽起不健康的和反抗情绪。”

由于即将召开作家协会理事会全会，在苏共中央文化部邀请参加座谈时，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们认为，有必要谈出自己的看法：这种更名恐怕是一种错误和有害的举动。

A. 苏尔科夫强调指出，25年以前将下诺夫哥罗德改称为高尔基市与“个人崇拜”丝毫没有共同之处，而是表达了全民对俄罗斯伟大作家的热爱。高尔基的生活与创作如此紧密地与这个城市联系在一起。决不能同意采取种种措施，使高尔基的名字，人民对自己作家伟大的爱受到怀疑。

H. 吉洪诺夫、B. 斯米尔诺夫、Г. 马尔科夫都曾指出：为更

名而提出的那些论据是牵强的，是没有说服力的。25年前以高尔基的名字给下诺夫哥罗德命名不是偶然的。这一名称已成为固有的、约定俗成的东西，它已在语言中成活下来，已成为一种历史事实。国外各界人士都知道伟大作家的故乡以其名字命名。既然高尔基市、高尔基市人已成为亿万人民所习惯的称呼，那么现在就没有理由去否认它。

熟悉高尔基的 A. 苏尔科夫曾多次强调说，由于众所周知的作家的谦逊，作家曾为以其名字命名自己的故乡而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以此作为更名的借口，可见根据不足到了何等程度。高尔基曾以极为严厉的批判态度对待自己的某些作品。比如，他认为自己的所有剧本都是不成功的、不值一提的作品。难道现在我们可以赞同这一自我评价吗？

H. 吉洪诺夫说：“我相信，不会有任何一个严肃的作家会支持这一非常奇怪而又不理智的建议。”

H. 吉洪诺夫、Г. 马尔科夫、K. 西蒙诺夫、B. 波列伏依都指出过：恢复旧称会被理解为是一种表示——重新评价党一直给予高尔基的那种崇高评价。

这在现在尤其不能容许，因为国外报刊各种反动批评和修正主义批评正在反对党的政策，反对苏维埃艺术的基本原则，讨伐高尔基，攻击他靠近党、坚持和发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

应当指出，资产阶级唯美主义观点的拥护者们竭力破坏高尔基的威信，企图将他的活动与个人崇拜的影响联系在一起。例如，文学领域修正主义倾向的积极代表捷普列茨于1956年秋在波兰报刊“大骂”高尔基在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并企图否定他在发展苏维埃文学中的作用。捷普列茨认为，高尔基在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目的在于将艺术服从于斯大林的新方针，全面敌视列宁主义”。波兰作家希潘斯基甚至胡说到了这种地步，他指

责高尔基推行宪兵制度，推行“制动系统和行政调节系统”。苏联和国外先进批评界正在揭发并将揭发类似的观点，但高尔基市更名一事对批判我们的思想敌人将会造成有利形势。

苏尔科夫、吉洪诺夫、波列伏依、阿扎耶夫同志和其他作家都说：“将高尔基市更名为下诺夫哥罗德会在外国报刊中掀起一次修正主义和复仇主义的新浪潮，将有助于引发有名的文艺界知识分子不健康的情绪。”

苏联人民演员 М. 察廖夫、А. 塔塔索娃、Л. 奥尔洛娃、导演 Г. 亚历山德罗夫、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 И. 阿尼西莫夫及其他人同样谈到反对高尔基市更名，认为高尔基州的某些同志的建议考虑不周不能采纳。

苏共中央文化部副部长 Б. 留里科夫
部指导员 И. 切尔诺乌察恩

【专题说明】

托姆斯基儿子的申诉

(1957年5月至1987年12月)

米·巴·托姆斯基是列宁时期的老布尔什维克，在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政治压力下自杀身亡。本专题收入的档案是其子为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在1957年给当时的领导人赫鲁晓夫的申诉信，以及1987年为其父请求平反给戈尔巴乔夫的信。类似党内斗争后遗症的问题在苏联的政治生活中不胜枚举，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苏联党内斗争的残酷性及其政治体制的弊病。

(本专题文件由赵国顺编辑和校注，
温耀平翻译)

№04084

托姆斯基 - 叶夫列莫夫呈赫鲁晓夫的申诉书

(1957年5月13日)

申 诉 书

1936年8月，当我15岁的时候，我父亲米·巴·托姆斯基自杀身亡，而1年以后，1937年12月，我被逮捕，并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庭（按第58条第8~17款和第11条）判处10年监禁。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劳改营系统的新切尔卡斯克和奥廖尔的政治隔离囚房服刑。1947年刑满后，我迁居坎斯克市，在坎斯克棉纺织联合企业工作。1950年，再次遭逮捕，随后被流放到苏霍布济姆区。

1954年，流放被撤销，我回到坎斯克市。目前在坎斯克棉纺织联合企业任工长。

把我在这短暂一生中所经历的艰难和遭到的痛苦全部写出来是不可能的，而这一切又只不过是出于我是前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米·巴·托姆斯基的儿子，因为我没有任何其他过错。

在35年的全部生活中竟有苦难备尝的20年。

1954年我曾向总检察长呈交过一份申诉书，请求为我平反，得到的回答是正在研究。

1955年，我母亲M.И.托姆斯卡娅两次来到莫斯科向总军事检察院递交了为我和为她自己平反的申诉，两次都回答她说（1955年1月，和最后一次是1955年10月，由捷列霍夫同志接待），关

于为我和为她平反的问题在1个半月到2个月内即可得到解决，用不着再向任何部门写申诉了。

1956年2月，我母亲去世，一直也没有等到平反。

来到莫斯科后，我于5月11日找到总军事检察院。我得到的答复是：关于为我平反的问题过1个半月到2个月可以解决。我无法相信在我离开莫斯科以后会在所说的期限内为我平反，而我又不可能长时期在莫斯科停留，因为既没有钱，也没有固定的住处^①，而且由于我的健康受到严重伤害并日益恶化，因此完全可以理解，我恳切请求帮助加速为我平反的进程。

托姆斯基—叶夫列莫夫

又及：由于没有固定的住址，请允许我直接找苏共中央了解我的申诉的结果。

^① 尤·米·托姆斯基在莫斯科期间住在斯大林的女儿阿利卢耶娃家里。

№04085

托姆斯基 - 叶夫列莫夫请求为父平反

致戈尔巴乔夫的信

(1987年12月29日)

1966年加入苏共的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托姆斯基 - 叶夫列莫夫致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同志

亲爱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人子，我有责任写信给您，并提出为我父亲、一名老布尔什维克、一位英勇的革命者、为我国工会运动的发展贡献了许多力量的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托姆斯基（叶夫列莫夫）宣布死后党内平反的问题。在1936年被迫离开人世的时候，他对年仅15岁的我说：“我一点也没有过错，没有党我无法生活。”

我知道，我父亲在党内同志中拥有多么高的威望，受到多么大的尊重。谢·米·基洛夫、格·康·奥尔忠尼启则、扬·埃·鲁祖塔克、尼·伊·布哈林不止一次向我重复说：“你的父亲是好样的！真正的男子汉，正直的人。”

简单说说我自己：我是一家人中惟一的幸存者。自16岁起即遭受迫害（10年监禁，9年流放）。2个哥哥于1938年被枪决。母亲也被判监禁10年，1956年没有等到平反而死在西伯利亚。母亲和2个哥哥死后获平反。

回来和获得平反以后，我在苏联动力和电力化部系统（动力学和电气化科学技术情报中心）工作了20年。自1981年起因重病卧

床至今，但仍然盼望活到对我父亲的党务活动恢复公正评价的日子。

托姆斯基-叶夫列莫夫

【专题说明】

关于朗道院士的秘密档案

(1957年12月)

列夫·达维多维奇·朗道（1908～1968）是举世闻名的苏联学者，人们高度评价他在理论物理学方面的功绩：他被选为苏联科学院和其他许多外国科学院，如美国、丹麦、英国、法国、荷兰科学院正式院士，并荣获诺贝尔奖和许多其他大奖。苏联当局则长时间因朗道个人见解犀利而对他存有戒心，视其为反苏分子。1938年4月，有人告密他是德国间谍，朗道被捕入狱，在监狱里一直囚禁到1939年4月。战争期间和战后继续对他进行监视，并详细地收集整理了他在这个时期的言论。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仍然不信任他。1957年12月2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给苏共中央呈送的有关朗道院士的档案资料大事年表（时间从1947年到1957年）披露了这些情况。

（本专题文件由杨存堂编辑和校注，
刘尔勋翻译）

№01098

克格勃关于朗道院士的秘密档案（摘录）

（1957年12月20日）

副本
绝密

苏共中央

B. A. 基里林同志亲启

遵嘱现呈上有关朗道院士档案资料的备要报告。

附件共16页。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

朗道院士档案资料备要报告

朗道，1908年出生于巴库市，犹太人，无党派人士，苏联科学院物理所理论部主任。

朗道出生于一个工程师家庭，其父1930年曾因从事破坏活动被捕，但朗道隐瞒了这一事实。

1939年，朗道因参加反苏团体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但作为理论物理学领域的著名学者被释放。

朗道是理论物理学领域的举世闻名的泰斗，在许多专家看来，

他可以在科学上有许多新的建树。但是，他的科研工作，尤其是实际业务主要是完成各项具体任务。他完成这些具体任务时倒是挺认真的。

许多年间，从他的政治观点看，他是个有明显反苏情绪的人，他敌视苏联的一切，按照他的说法，他处于“有学问的奴隶”的地位。

在这方面，国家安全委员会掌握着来自朗道周围的侦探们所作的密报和侦察技术手段提供的大量情报。

譬如，在朗道看来，1947年苏联科研工作的状况是下面这个样子：

“在我们国家，科学界已彻底地卖身投靠了，而且比国外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国外的学者毕竟还拥有某种自由。

“卑鄙无耻！不仅科学家是这个样子，评论家、文学家、报刊杂志记者也是这个样子。这真是寡廉鲜耻，不值得一提。他们有人给钱，所以上边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

在另外一次谈话时他说：

“……在我国，人们既不懂得科学又不热爱科学，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领导科研的是一些钳工、木匠、细木工。科学家没有自由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工作方针是由上边规定的……

“……爱国主义路线妨碍了我国的科研工作，使我们同西方国家的科学家更加隔绝，与领先的科技人员更加疏远。”

1948年一个侦探就一次同朗道的谈话报告如下：

“朗道认为，美国是最慈善的国家。朗道说，有一次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上面说某位美国科学家，好像是捷克籍的，表示想到苏联来，于是，他说，这个蠢货！要是我能同这个人换换位置就好了。”

朗道否认俄罗斯和苏联的科学研究工作在许多领域的领先地位，他不只一次地对其周围小圈子里的人提到这个看法。他对俄国科研的这种态度可由下面的声明加以佐证：

“我是个国际主义者，可他们却称我为世界主义者，我不会把科学分为苏联的科学和外国科学。谁发明了什么，这对我来说完全是无所谓的事。因此，我不能参加目前流行的、强调苏联和俄罗斯科研工作领先的鼓噪。”

朗道从犹太族中具有反苏情绪和民族主义情绪的科学家里面聚集了好几位理论物理学家在自己周围。属于这个团体有所谓“朗道新学派”的信徒 E.M. 利夫希茨，H.C. 梅曼等。朗道在物理所组织和领导了一个由理论物理学家组成的研究班，到这个班听课的主要是同朗道关系密切的犹太族人士。有段时间（1951～1952年），不是他圈子里的科技人员是不允许到这个研修班听课的。

1953年7～9月间，根据密报得知，朗道就揭露贝利亚的敌对活动一事，对党和政府领导人发表了诽谤性言论。后来，在和另一位侦探谈话时，他又说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从1953年10月起，间谍机关才注意到朗道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开始给予正面评价。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仍坚持认为：苏联政府执行这种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否则西方国家就不会相信我国的和平诚意。

在对当时发生的事件作评价时，朗道严厉地谴责了英法对埃及的侵略行径和以色列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

他说：

“埃及人令人佩服之至，以色列人却是无耻之极的走狗。我完全同情埃及人民……”

“……以色列人令我愤慨。我作为忘了本的世界主义者，对以色列人感到十足的恶心。”

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对我国的对外政策作出评价。

不过，在他的圈子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持这种观点。朗道知道向他倾诉民族主义情绪的不仅是个别人，而显然有一批人。他1956年11月3日同梅曼教授的谈话就足以说明了这个问题。当回答后者民族主义的见解时，他说：

“……你在为帝国主义辩护。……你已落入一个可怕的团伙，一个极其可怕的团伙……民族主义情绪使你失去了理智，以致不能理解当前发生的事情。……你正在跟不正派的人为伍，可怕的是你对此浑然不觉……”。

尽管如此，朗道本人仍继续经常同梅曼见面，向他诉说自己的反苏情绪。

朗道对匈牙利事件的看法却完全与众不同。他把叛乱分子同匈牙利工人阶级混为一谈，认为发生在匈牙利的事件是“匈牙利革命”，是“可喜可贺的事件”，是“英雄的人民”为自由而战。

“……匈牙利革命——这实实在在是全体匈牙利人反抗奴役者，即反抗匈牙利一小撮人，主要是我国一小撮人的革命。

“……各个时代大革命家的真正后代们……他们目前表现出来的精神很值得借鉴。我要对匈牙利顶礼膜拜。”

1956年11月1日，朗道在自己家里同一位不知姓名的人谈话，当这位不知姓名的人谈到考捷斯基曾喋喋不休地说类似麻烦即将出现在捷克斯洛伐克时，朗道回答说：“……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我就是这么看的。”

在议论到苏联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时，他说：

“……我们这儿的人决心用匈牙利人民的鲜血沾满自身……他们管理着国家，他们是我们这里的罪人……卡达尔何许人也，他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总之，他现在是个傀儡。我们这儿的人把政权交给了他，而他却坐享其成。”

1956年11月12日，朗道在自己寓所里同人谈话时，当议论到我们在匈牙利采取的行动时，对话人提出：“假使列宁在世的话他肯定会怒发冲冠。”朗道对此的答复是：

“但从另一方面看，列宁也做过不可告人的事。请想一想喀琅施塔得起义。这是一出丑剧。那次也是彼得堡的工人阶级和来自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发动了起义。他们提出了最为民主的要求，可他们得到的却是子弹……这是法西斯采用的手法。

“……第一件事，早在1917年10月就作到了，几个月之后发生了政权的转移，政权完全转到共产党人手里，共产党立即发出指令：抢夺被掠夺的归自己所有，他们认为在做这一切时是按科学办事的。

“……这不是什么错误，这里面包含着某种思想，革命就是这样实现的。”

“那能不能说这种思想是不道德的？”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朗道说，“那当然。”

早先朗道醉心于完成中型机器制造部下达的几项任务。与此同时，他还在1952年就有了干工作干得越少越好的想法。谈到这个问题时他曾说：

“明智的人应该是离实际工作越远越好。为了不深入到原子事业里去，须使出浑身解数。同时，在你每次拒绝和自行摆脱这类工作时，要做得十分小心谨慎。

“……朗道认为，如有可能的话，一个想一生过得幸福的聪明人，应尽量摆脱国家，尤其是像苏联这样建立在压迫之上的国家给你下达的任务。”

类似的议论好几个侦探都不只一次的收集到过。1953年1月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当时朗道对自己的一位知己同时也是学者说：

“如果不是有第5项（民族项），我也就不干保密工作了，而是

从事我至今仍然落伍的科研工作。我从事的保密工作给了我某种力量……

“……可我至今仍与你在给我的信里提到的诸如“为了祖国的利益而劳动”的目标相距甚远。这种信你该写给中央，对我则高抬贵手。你知道，苏联物理学处在什么位置，是处在第一位还是处在第十位，这不关我的事。我已经被贬到“奴隶学者”的地位，这一点恰恰是决定一切的……”

“……你要求把苏联的物理学推向世界一流的水平，我可以告诉你，在这方面我帮不了你什么忙。”

在这以后的几年里，他仍然抱着这种观点不放。1955年4月9日，一位侦探就这个问题报告说：

“3月底，因谈保密工作朗道同金兹堡被请到扎韦尼亚金处。在同提供密报的人交谈时，朗道对泽利多维奇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说‘泽利多维奇坏事做尽’。朗道对提供密报的人讲，他无论如何不会同意再从事保密事业，他也不愿意谈这种问题。在去部里的路上，朗道提醒金兹堡，要他不要再提他要朗道干的工作。”

“朗道后来对提供密报的人讲述了部长接见他的情况，说部长对他十分客气，态度很好。朗道很快使在场的人相信他不适合做保密工作，但正如他本人表示的，如果间或建议就这类问题进行探讨，他是不会拒绝的。朗道说，‘当然，今后实际上什么探讨都不会有的’。”

朗道产生脱离研究保密专题的想法，也有他想得到出国机会这个原因，最近以来这点尤为明显。

譬如今年（1955年5月份），为出席高能粒子物理学学术会议，美国物理学家韦斯科夫来到了莫斯科，为了朗道能出国，他同朗道圈子里的人专门讨论了国外最好采取什么措施的问题。

在第一次同韦斯科夫私人会见时，在没有任何人授权的情况

下，朗道把苏联学者的名单交给了韦斯科夫。名单上的学者，依朗道的意见，都是应该邀请到美国去的。这个名单上有他自己，还有依·米·利夫希茨、伊·叶·塔姆、维·拉·金兹堡等人，这些人都是直接参加中型机器制造部系统特别秘密工作的人。

朗道提交名单时对名单上的人进行了评价并讲述了谁是干什么的。他对韦斯科夫说，塔姆是搞原子弹和氢弹的计算的，他也参加了这些工作，但程度上不及塔姆。

朗道的行为为美国人在选择苏联学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苏联科学院提供了可能性。日前，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各种研究机关向朗道和其他人（主要是朗道圈子里的人）发来了大量个人邀请。

据侦探和技术侦察装置提供的情报，朗道要出国的想法已被他圈子里的人，包括利夫希茨教授在内，搞得沸沸扬扬。

朗道：当然，我会找到工作的……

利希夫茨：我坚信你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能找到工作。

朗道：在许多国家能找到工作，但不是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能找到工作……当然，你说这场鼓噪影响了我出去，因为这等于为我进行了大力宣传，也更增加了我留在国外的危险性，你这个说法是对的。

今年（1957年）3月13日，利夫希茨同朗道就这个题目交谈时又说：

“……当然，对你，不只是因为你想留下，也因为他们谁也不会想，你会留下。你心里想的事，甚至就不在他们的头脑中。”

1957年，朗道一位极亲近的人士就朗道出国一事报告说：

“……既然不能相信朗道会回来，所以允许朗道出国，就是不慎重。

“他肯定不会眷恋自己的家，他对儿子的依恋亦不会产生依依不舍的印象。他很少同儿子往来，他考虑最多的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自己的情妇们。

“……最近20年来他生活的那种环境，他认为自己搞起来的小圈子里的人，使一直存在于他身上的个人主义性格和自以为一贯正确的看法更加根深蒂固。

“因此，一旦出国，他只会从个人利益、个人口味、个人感受的角度去考虑自己的一言一行。”

1957年2月4日在利夫希茨和朗道谈到，大概他们不能去英国参加学术会议，而是由另外一个人去的时候，利夫希茨劝朗道将这个情况通知英国人，并询问英国人对此事的想法。

同年2月12日，朗道给英国发了封信，信上讲，“我怀疑你们提到的人士里边的许多人，尤其是物理学家能否到会……我想你或者蒙德教授应直接和科学院联系。”

朗道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家里，定时收听外国电台广播，接待众多来访的客人并向他们传播反苏的广播内容。他说话的大部分内容是重复反苏广播和厚颜无耻地议论同各种妇女的暧昧关系。

例如，1956年11月11日，一位不知姓名的女人拜访了朗道，就叛乱者在匈牙利的暴行问题朗道对她讲：

“……革命中还从未出现过革命者搞暴行的情形。被杀的是些什么人，还不是一些国家保安队队员。为了保住性命，他们甚至投降当了俘虏。我们这里却有些报道说，有一个受伤的军官被从房子拖出来杀掉了。原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一所房子里埋伏着4名国家保安队队员，用自动枪朝演说人射击，打死了60个人。人们好不容易才收拾他们……后来在一处广场上我国的坦克朝人群扫射，打死了600人。

“……革命是崇高的事业，许多13至16岁的孩子战斗在街垒上，大学生发表演讲。

“匈牙利式的英雄主义精神值得敬仰。”

通过谍报机关和侦察技术装置得知，朗道认为自己是“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对我国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有其自己的看法。

例如，1956年12月1日，朗道在把自己同其他学者进行比较后说，“我是个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而他们是可怜的走狗……因此我有种优越感。”

在对苏维埃国家的行为作出反苏评价时，朗道对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大肆诽谤。

1956年11月30日，朗道在谈到对政府成员的看法时说，“嘿，怎么能让人相信呢？能让人相信刽子手吗？这种行为本来就是一种可耻的……这些人是刽子手，卑鄙下流的刽子手！”

在另一次谈话中他说，“我们已经沾满了匈牙利的鲜血。我认为匈牙利人做的事是了不起的：是匈牙利人第一个驳倒了当今耶稣

会式的思想，并给这种思想以实实在在的、刻骨铭心的打击。这次打击确实刻骨铭心！”

朗道认为，从十月革命那天开始苏联逐渐演变成法西斯国家。例如，1956年11月20日朗道在同来自哈尔科夫的学者利夫希茨交谈时说，“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布尔什维克党发生了演变……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种思想，一种建立法西斯国家的思想，即对搞过革命的人，作为回报，让他们管理国家。这是一个口号，这个口号已变成现实并且大受欢迎。再说，这个口号里有社会主义的成分——推翻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但是，这个口号里也有法西斯的成分——把国家掌握在自己手里。”

在稍后的1956年11月30日，朗道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通见解：“作为党的基础的思想是耶稣会式的。这种思想要求对上司要绝对服从。这是典型的耶稣会式的思想，耶稣会的整个历史即是如此。”

今年（1957年）1月12日，在同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沙利尼科夫谈话时朗道说：

“我应该告诉你，我认为我们的制度，正如我从1937年就开始对之所了解的那样，完全是法西斯式的，现在依然如此，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因此，这个问题会有两种情形：第一、要看这个法西斯制度的内部在多大程度上会有所改善……第二、依我看，这个制度将来总会发生动摇。我认为，只要这个制度依然存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它的改观上，这是不可能的，一般来说也是可笑的。我对此不抱任何希望。”

在同梅曼教授谈论同一话题时，朗道说，“这是明摆着的事，列宁就是头号法西斯分子。”朗道否定我国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今年（1957年）5月，他曾说：

“我们的制度是官吏阶层的达官显贵们专政的制度。我否认我

们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理由是生产资料绝对不属于人民，而是属于达官显贵。”

据一位十分接近朗道的侦探报告，朗道认为，只有德罗兹多夫^①这样的达官显贵被推翻之后，实行民主才有可能。在谈论这个问题时，他拿出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在讨论杜金采夫小说的作家会议上的发言稿，并装模作样地用颤音读了起来。

朗道佩服发言稿的气势和勇气，他说：

“我们都是些胆小鬼，没的勇气揍‘德罗兹多夫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1957年1月26日，朗道同这位侦探交谈时说：

“……好好想一想吧！现在可以说有了某种可能，即在国内进行革命的可能，对这种可能我原来是不可想象的。这仅仅还是一种可能。退回到一年前，考虑在我们这里进行革命还是荒唐可笑的，可现在不荒唐可笑了。革命总会发生的，这已不是天方夜谭。”

朗道认为，苏联的“现状”不会长久地继续下去，并就此谈了他的几个推测，即通过什么途径消灭苏维埃制度。这包括他1956年12月1日的谈话内容在内，那天他说，“目前已很清楚，可能会发生军事政变。现时政府不怎么受欢迎，加上人民仇恨当权者，军事政变这件事完全是可以实现的。”

当时他还说，“如果我们的制度不能用和平方式推翻的话，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并且伴随着大战也会出现各种惨祸。因此，用和平方式消灭苏维埃制度的问题，从实质上讲，也是事关人类命运的问题。”

正如技术侦察手段所提供的情况那样，在同每天来访的客人谈话时，朗道多次就苏维埃制度将不可避免地要消灭的问题陈述了自

^① 杜金采夫小说《不只是为了面包》中的人物，是个官僚主义者。

己的各种设想。

例如，1956年12月4日，同苏联科学院通信院士沙利尼科夫座谈时朗道曾说过：“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如果不通过战争就能消灭我们这里的制度——是用革命的方法还是改良的方法，这并不重要，反正都一样——那就不会有战争了。没有法西斯，也没有战争。”

今年（1957年）1月23日，朗道在同一位接近他的妇女谈话时说：

“我们这里的人是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分子，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有时可能会多些，有时可能会少些，但他们都有法西斯思想。然而，什么是我认为的奇迹，奇迹就是耶稣会式的神话，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消失。”

紧接着有这样一段对话：

妇女：“我看不出推翻政权的途径。”

朗道：“很难举出这方面的例子。我认为，我们现在显然还没有发动军事政变的合适将领。这是一件很容易办到的事，绝对比较容易办到的事。”

妇女：“可是这么做好吗？”

朗道：“我认为是的……”

在私生活上，朗道也是一塌糊涂，其所作所为有悖于苏联的道德和苏联人家庭生活的道德标准。他有家庭，却同时同好几位妇女同居，并定期更换她们。同时他对自己妻子的类似行为持鼓励的态度；他给妻子念情妇们写给他的信，议论妻子的暧昧关系，遇有可以作妻子情人的人，就主动把这些新人物介绍给妻子。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保密局

局长（伊万诺夫）

1957年12月19日

【专题说明】

“社会拯救委员会”案件的平反

(1958年2月)

1941年11月至1942年3月，也就是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全面进攻之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列宁格勒州内务局的工作人员把列宁格勒高等学校的32名学者，其中包括苏联科学院B.C.伊格纳托夫斯基等三名通讯院士，以组织“社会拯救委员会”反苏维埃组织的罪名，判处极刑。经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1958年的调查，该案件为错假案件。这里收录了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两份有关对这一案件进行平反的文献。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揭露了当年制造这一错假案件的非法手段：不仅残暴地使用肉刑，而且肆无忌惮地逼供、诱供，置一批好人于死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所谓清除“第五纵队”的某些具体情况。

这两份文件还记载了对当年参与制造错假案件的人员的审查与处理情况。这对于了解赫鲁晓夫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的具体做法有所帮助。

(本专题文件由杨存堂编辑和校注，
李酉生、高增训翻译)

№07000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社会拯救委员会”案件的调查报告

(1958年2月3日)

1941年11月至1942年3月间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州局追究刑事责任，随后列宁格勒方面军和列宁格勒地区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的军事法庭对32名列宁格勒科学工作者判处极刑，其中包括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B.C. 伊格纳托夫斯基、H.C. 科什利亚科夫、A.M. 茹拉夫斯基教授和其他人。关于伊格纳托夫斯基、伊格纳托夫斯卡娅、阿尔乔莫夫^①、恰内舍夫和柳鲍夫的枪决判决书被执行，其余人员的死刑被改为长期监禁。

被逮捕的人员被指控建立名为“社会拯救委员会”的反苏维埃组织，企图在德国占领者的帮助下达到改变现有的政治制度，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

现在查明，由于使用非法手段进行调查，采用肉体 and 道德措施，并利用侦探机构的特务，学者们被迫承认虚构的证词。

据这一批人中活下来的教授K.И. 斯特拉霍维奇向党组织讲，侦查人员克鲁日科夫和阿尔乔莫夫通过长时间的夜审，以牵连其亲属的办法相威胁来迫使他承认参加反革命组织。

关于如何从被捕的学者口中得到证词一事，科什利亚科夫教授在1954年向列宁格勒军区检察机关讲：

^① 原文如此，此处应为阿尔捷米耶夫。

“在调查之初，克鲁日科夫和其他人就警告我，如果我不承认在提出的指控中有罪，那么他们也会迫使我承认自己犯罪，因为对此他们有很多办法。而当我试图拒绝在克鲁日科夫捏造的记录上签字时，他就暴打了我一顿，这之后我已经没有反抗的力量……完全虚脱，已经没有任何毅力了。”（第10卷，250页）

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尤什科夫教授告诉检察机关，他“被传唤到一位长官那儿，长官的名字已不记得，他给了我一杯水果茶喝，对我很客气，并向我保证，如果放明白点的话，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那就不会把我交给前面的那位调查人员。他说，不过现在不会叫你受皮肉之苦，但是如果发现你愚弄调查人员并要和你对质的话，那么我们会打断你的所有肋骨。”

波斯托耶娃副教授1954年6月17日写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科弗里基娜的申诉书中写道：

“在侦查中……使用了各种非法调查方法，由于这样，再加上营养不良症，便被迫违心地谎称自己犯有严重的罪行……”

侦查人员在军事法庭开庭前以武力相威胁，并声称：“你敢在法庭上乱说试试”。我在法庭上被迫承认了预审时提供的证词。”（第10卷，273页）

维诺格拉多夫教授和季莫费耶夫教授向党组织诉说了类似的情况。

1941年11月列宁格勒的一些学者中第一个被捕的是B.C. 伊格纳托夫斯基，根据是未经审查的侦查报告，他被指控好像是在列宁格勒科学工作者中存在的一个反革命组织的成员。

1945年被审讯的特务—奸细麦尔库洛夫声称，在1941年底他提供了诬告列宁格勒一些教授的材料，凭这些材料那些教授随后便被逮捕，以下是他的供词：

“当我虚构了一个旧知识分子联盟时，我的诽谤在1944~1945

年达到了最大的规模。在虚构俄罗斯知识分子联盟时，我想……引起机关对存在一个分支机构庞大的组织的兴趣，以便成为机关一名需要而又重要的工作人员，能够更好地‘捞取机关’好处，不经学位论文答辩就使机关批准我的科学技术博士学位”（第八卷，194～195页）。

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州局反间谍处一科前科长伊·阿·科热米亚金及其副手苏斯洛夫（死于1944年）没有对特务的可疑报告进行审查，而是以此把伊格纳托夫斯基想象成已经确定的与德国有关系的列宁格勒法西斯组织的一员。

在苏斯洛夫同志、科热米亚金同志和前反间谍处前处长扎宁同志签字并由奥戈利佐夫批准逮捕伊格纳托夫斯基的命令中毫无根据地讲，伊格纳托夫斯基参加了法西斯组织，该组织知道德国指挥部占领列宁格勒的计划。

由于采用法律所不允许的体罚的方法，伊格纳托夫斯基才承认自己是法西斯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似乎存在于国立列宁格勒大学的教授和老师队伍中间。

在1941年11月24日的审讯中，伊格纳托夫斯基向反间谍处前副处长阿里特舒列尔和该处的资深侦查员克鲁日科夫（随后因伪造调查材料罪被判处20年监禁）承认自己从事间谍活动有罪，并证明在1925年为反对苏联的间谍组织招募了光学机械学院教授季托夫。

根据伊格纳托夫斯基及其妻子的证词，恰内舍夫教授、米林斯基教授、斯特拉霍维奇教授、阿尔捷米耶夫教授和精密机械学院高级工程师柳鲍夫均被逮捕。

逮捕上述教授的命令由苏斯洛夫、科热米亚金、扎宁、波德恰索夫和阿尔乔莫夫拟定，经奥戈利佐夫批准执行。

像伊格纳托夫斯基这样的学者，由于对他们采用非法的审讯手

段而相继诬称自己和其他人犯了严重的国事罪。

按照伪造的材料，伊格纳托夫斯基和其他5名教授于1942年1月13日被捕，被判处极刑，除斯特拉霍维奇外，均被枪决。斯特拉霍维奇作为被毫无根据地指控为列宁格勒知识界反革命法西斯组织的“见证人”，该组织称为“社会拯救委员会。”

现在已证实，列宁格勒学者中根本不存在那种组织，它是由列宁格勒州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人为地捏造的，并且是由负责研究工学院教授克罗托夫的间谍活动的阿利特舒列尔所设计的。阿利特舒列尔从特务“维克托罗夫”和“加罗利德”手里获取了几份有关反映克罗托夫教授反苏和失败主义情绪的报告。

在一份报告里“维克托罗夫”指出，克罗托夫“在街上专门同军人拉话并探听暴动的可能性。他和停在加列尔湾的空军部队的一名红军战士好像要进行下一次接头。一名红军战士向克罗托夫抱怨说：他们对居民不发动暴动感到委屈，一旦有暴动红军就加入。克罗托夫……竭力劝说红军战士，暴动应由红军发动。”

这份报告是这样的虚构和不足信，以致于奥戈利佐夫不得不在报告上写到：“克罗托夫作为一名教授，在自己的反革命活动中走这条道路，是很可疑的。奥戈利佐夫。11月23日。”但是阿利特舒列尔没采取措施检查“维克托罗夫”的报告，甚至在特务工作措施计划中援引特务“维克托罗夫”和“加罗利德”的报告，把克罗托夫及妻子、图尔教授和恰鲁申教授都说成是反革命法西斯小组的成员。

在“维克托罗夫”另一份报告中，讲了自己好像在1942年1月6日与克罗托夫教授会过面，证实克罗托夫向他讲述自己的反苏观点。尽管这个特务同克罗托夫教授会面的报告显然是虚构的，而且这次会面不可能发生在1942年1月6日，因为克罗托夫于1942年1月3日就去世了。然而阿利特舒列尔仍继续使用克罗托夫的特务材料对他进行调查。此外，阿利特舒列尔开始歪曲已有的特务材

料的实质，以便论证起诉克罗托夫教授是寻找通过前线非法派遣自己的通信员与德国指挥部建立情报联系的方法的法西斯小组的头目。阿利特舒列尔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和本局其他工作人员在编写综合文件时默认了所调查的犯罪活动特点不准确的问题。（第1卷，第194页）

1942年1月间，阿利特舒列尔从“维克托罗夫”特务手中获取了几份有关制冷学院苏佩兰斯基副教授及其妻子反苏和失败主义情绪的报告，以及有关苏佩兰斯基同克罗托夫教授联系的报告。但是因为在这些报告中没有被调查者的反苏行动的证据，便决定把从已判处极刑、但还未枪决的斯特拉霍维奇教授那儿获取的损坏名誉的材料加上去。

利用斯特拉霍维奇走投无路的境地，审讯他的阿利特舒列尔、波德恰索夫和克鲁日科夫以答应重新考虑极刑判决为条件从斯特拉霍维奇手里获取了好像进行有组织的反苏活动的一大批列宁格勒学者的证词。被斯特拉霍维奇称为反苏学者中就有苏佩兰斯基。

在1956年6月11日同阿利特舒列尔的对质中，斯特拉霍维奇教授称：

“阿利特舒列尔向我声称，如果我同意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合作，并由我提供列宁格勒学者反革命活动的证词，那么我就能免遭枪毙甚至获得释放。当我声明我对此事一无所知时，阿利特舒列尔给我说了几个学者的名字，其中就有克罗托夫、苏佩兰斯基和我的兄弟С.И.斯特拉霍维奇，在场的波德恰索夫或克鲁日科夫又加上了Н.П.维诺格拉多夫的姓名，阿利特舒列尔也确认‘还有维诺格拉多夫’。

“有人向我着重指出，我的命运，也就是说我是能活命还是被枪决，将取决于我是否写出点了名的那些人从事反苏活动。

按照阿利特舒列尔和在场的克鲁日科夫及波德恰索夫的要求，

我在明显虚假的证词上签了字，从而陷害了清白无辜的学者约20名左右。”（第1卷，第297~298页）

被阿尔乔莫夫置于困境的苏佩兰斯基在三个晚上的审讯中，承认了加入制冷学院的反革命小组，并担任领导人。在反革命小组成员中苏佩兰斯基依次又供出了另外7人，随后他们遭到逮捕，其中包括制冷学院的斯米尔诺夫副教授和总会计师Ф.А.泽伊捷茨。1942年2月9日的审讯中苏佩兰斯基供认，以他为首的反革命小组准备武装暴动，这次暴动的领导者将是“社会拯救委员会”。苏佩兰斯基两次受到奥戈里佐夫和扎宁的共同审讯。1942年3月13日的审讯中，他们从苏佩兰斯基那儿获得的证词是，该小组与德国指挥部进行反革命联络，主要是通过苏佩兰斯基的妻子进行的。奥戈利佐夫被迫承认“严重的调查疏漏”的事实。（第10卷，第27页）

伪造列宁格勒学者案件，从维诺格拉多夫教授的侦查材料中就能明显看出。侦查员阿尔乔莫夫从维诺格拉多夫那儿获取了列宁格勒存在“社会拯救委员会”的虚构证词。

1942年2月27日，维诺格拉多夫再一次受到奥戈利佐夫和阿尔乔莫夫的审问，他们做成了65页速记记录的证词。尽管维诺格拉多夫关于影响波及2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的“社会拯救委员会”的活动、该“委员会”定时同德国指挥部保持联络、准备对列宁格勒苏维埃和党的领导人采取恐怖行动的证词明显可疑，但奥戈利佐夫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进行检查，相反却以这些证词为根据于1942年3月10~11日逮捕了H.П.博金斯基副教授、季莫费耶夫教授和T.T.特列季亚克教授。这些人被捕后过了几天，在3月17和23日的审讯中维诺格拉多夫拒绝提供关于季莫费耶夫、特列季亚克，波普科夫和其他科学工作者的证词。同时声明，他供出这些人参加反革命组织是错误的。尽管维诺格拉多夫自己声明他诬陷了11人，即早先点名的一半列宁格勒的学者，但奥戈利佐夫和扎宁

两次（1942年3月29日和4月2日）审讯维诺格拉多夫，根本不想搞清陷害其他人的原因，在对待被捕的季莫费耶夫和特列季亚克也没有采取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第10卷，第28~30页）

根据斯特拉霍维奇教授的证词，H.B. 罗泽教授被逮捕。在逮捕罗泽的命令中，苏斯洛夫、科热米亚金和阿利特舒列尔指出，罗泽是B.C. 伊格纳托夫斯基法西斯暴动组织的成员，被捕的斯特拉霍维奇的证词揭发他参加了犯罪活动。

进行本案调查的克鲁日科夫从罗泽那儿得到了虚构的证词：他是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反革命组织的领导人。按照从罗泽口供中得到的证词又逮捕了7人，逮捕他们的命令是阿利特舒列尔签发的。在对所有被捕人员的审讯中由于采用侦查中禁止使用的方法而获得了供词。

1942年2月3日，根据苏斯洛夫、科热米亚金和扎宁伪造的命令，逮捕了似乎由伊格纳托夫斯基创立的法西斯特务组织的成员：精密机械和光学院教授B.H. 丘里洛夫斯基。逮捕令指出，丘里洛夫斯基是已被捕的克罗托夫、恰内舍夫和伊格纳托夫斯基的供词所揭发出来的。然而，上述被捕的那些人直至1942年2月20日也没有说出初步调查中得到的这些供词。丘里洛夫斯基被指控犯有严重的反国家罪行，这个命令由波德恰索夫批准。但是尽管频繁的审讯和敲诈，丘里洛夫斯基也没有提供自己反苏活动的供词。

他们不仅没有立即停止调查并解除对以莫须有罪名逮捕的丘里洛夫斯基的关押，反而采取各种方法收集他的黑材料并定罪。为此，从1942年2月26日至3月31日审讯了丘里洛夫斯基的4位同事，但他们没有提供有关丘里洛夫斯基反苏活动的供词。当时也审讯了作为“证人”的、判处极刑的M.И. 伊格纳托夫斯卡娅。伊格纳托夫斯卡娅讲了丘里洛夫斯基在谈话中流露出的失败主义情绪，这些话好像是他在街上同她的一次偶遇时说出来的。无论在审

讯时，还是在1942年3月6日由侦查员苏斯洛夫安排的同伊格纳托夫斯卡娅的对质中，丘里洛夫斯基对这些供词都予以否认。

没有从丘里洛夫斯基那儿得到供词，也没有罗泽、科什利亚科夫和其他人参与反苏组织的其他证据，阿利特舒列尔于1942年3月31日被迫批准了苏斯洛夫起草的将丘里洛夫斯基的材料分出，进行单独审理的决定，而于1942年4月6日奥戈利佐夫批准了停止刑事追究的命令。

因伪造此案被传讯的Ф.И. 奥戈利佐夫宣称，从他这方面来说，没有指示伪造审件，他受了苏斯洛夫、科热米亚金和扎宁的欺骗，是他们在逮捕丘里洛夫斯基的命令中援引了并不存的供词。（第10卷，第32页）。

本次检查证实，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州局反间谍处在犯人被判处极刑后广泛使用了罪恶的审讯作法。在这些审讯中通过答应给犯人留条性命直至免遭枪决的方法敲诈调查所需的损害其他人名誉的供词。在被判处极刑的人当中，被审讯的有斯特拉霍维奇、伊格纳托夫斯卡娅、伊格纳托夫斯基和季莫费耶夫。并且他们中除了斯特拉霍维奇外，其余的均在审讯后被枪决。

在列宁格勒学者案件侦查中从某些被捕的人中获取了诬告塔列列、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巴伊科夫三位院士，克拉维茨通讯院士、卡恰洛夫通讯院士和苏联科学院的其他许多通讯院士的材料。（涉及128名学者）

1954年和1955年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和列宁格勒军区军事法庭的决定，取消对被判刑人员的判决，因犯罪事实不足，撤消他们的案件。

由于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我认为必须严肃追究С.И. 奥戈利佐夫、С.Ф. 扎宁、И.К. 阿利特舒列尔、И.В. 波德恰索夫和И.А. 科热米亚金的党内责任。

奥戈利佐夫是 1918 年苏共党员，作为内务人员列宁格勒州局副局长，在对列宁格勒学者案件的侦查实施监督时，采用违法行为处理交给他的案件：人为地制造列宁格勒学者案和苏维埃社会活动家案，私自审问被捕人员并从他们那里索取虚构的供词。

扎宁签署了无根无据地逮捕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伊格纳托夫斯基的命令，私自参加对被捕人员的审讯并获取虚假的供词；利用被逮捕的斯特拉霍维奇的虚假供词逮捕了列宁格勒其他学者，签署了逮捕丘里洛夫斯基教授的伪造命令。

阿利特舒列尔作为反间谍处副处长，1942 年积极参加自 1941 年 11 月至 1942 年 3 月期间无辜遭逮捕的列宁格勒学者案件的逮捕和侦查工作，私自进行特务调查，参加审讯并从被判处极刑的斯特拉霍维奇教授那儿诈取虚假的供词，随后这些供词被用以逮捕其他一些科学工作者，逮捕令由阿利特舒列尔签署。除此之外，1937～1938 年阿利特舒列尔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州局工作期间以及随后担任八科副科长、科长和三处处长助理时，是大规模镇压反对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一批著名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的积极分子之一。

1937 年 6～11 月期间，阿利特舒列尔伙同该局的其他工作人员人为地制造了所谓的“爱沙尼亚特务暴动和破坏活动组织”案件，根据对这一组织的起诉逮捕并枪决了 20 人，其中共产国际爱沙尼亚外国局书记 И.Ю. 凯斯佩尔特，前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Р.И. 瓦克曼和其他一些人员。（现在他们全都被恢复名誉）。

1937 年 11～12 月，阿利特舒列尔已是三处处长助理，参加了那个所谓的列宁格勒拉脱维亚民族组织平行中心的侦查案件的伪造工作。按照这一案件遭逮捕并按特殊程序被判处枪决的有 15 人，其中有前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 Р.П. 包泽，职业革命家 Я.И. 柳捷尔，1905 年的党员 Я.Э. 盖利斯，党的地下工作者 Я.Ф. 文托利。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因犯罪事实不足，撤消包泽、柳捷尔和其他人的案件，核查表明，所有这些被捕人员被判刑是根据他的遭受毒打和其他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之后所提供的供词。

И.В. 波德恰索夫直接领导列宁格勒学者案的侦查工作，他不要求侦查人员收集被捕人员违法的客观证据，还在斯特拉霍维奇教授被判处极刑后参与对他的审讯，并伙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从他那里诈取虚构的供词，这些供词随后被用作“证据”去逮捕其他学者。他没有足够的证据就签署了一系列逮捕学者的命令，批准了毫无根据地指控丘里洛夫斯基犯有严重的反国家罪行的命令。

科热米亚金参加了对伊格纳托夫斯基的连续审讯并首先从他那里获取有关反苏活动的虚构供词；签署命令逮捕了大量的科学工作者，不问青红皂白地指控他们犯有严重的反国家罪行，其中根据被判处极刑的人所提供的虚假供词加以指控的。

奥戈利佐夫、扎宁、阿利特舒列尔、波德恰索夫、科热米亚金因在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表现而获得了勋章和奖章。现已查清，他们在机关里的活动是不道德的，而且是反党的。

苏共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指导员 扎宁

1958年2月3日

死亡人员名单

1. B.C. 伊格纳托夫斯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教授，被枪决。
2. C.M. 恰内舍夫——教授，被枪决。
3. E.M. 苏佩兰斯卡娅——教授，死于劳改营。

4. Л.В. 克里缅科——教授，死于劳改营。
5. Ф.И. 马雷舍夫教授，死于劳改营。
6. Н.В. 罗泽——教授，死于监狱。
7. Л.Г. 季托夫——教授，死于监狱。
8. Г.Т. 特列季亚克——教授，死于劳改营。
9. В.И. 米林斯基——科学副博士，在初步侦查中死于监狱。
10. К.А. 柳鲍夫——副教授，被枪决。
11. Н.А. 阿尔捷米耶夫——科学副博士，被枪决。
12. М.И. 伊格纳托夫斯卡娅——教授的妻子，被枪决。
13. И.М. 苏佩兰斯基——科学副博士，死于劳改营。
14. В.И. 克罗托娃——科学副博士，死于劳改营。
15. Б.Д. 维尔日比茨基——科学副博士，死于监狱。

№06999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处理“社会拯救委员会”案件办案人员的决议

(1958年2月14日)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第1039号记录

参加会议的有：什维尔尼克同志，科玛罗夫同志，博伊佐夫同志，阿尔费罗夫同志，安德列耶娃同志，朱拉巴耶夫同志，科姆帕涅茨同志，卢基扬诺夫同志，皮基娜同志，萨莫林同志，富尔索夫同志，沙图诺夫斯卡娅同志。

1. 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州局前工作人员——С.И. 奥戈利佐夫、С.Ф. 扎宁、И.К. 阿利特舒列尔、И.В. 波德恰索夫、И.А. 科热米亚金破坏社会主义法律的问题。

(加宁同志做报告，参加会议的有奥戈利佐夫，扎宁，阿利特舒列尔，波德恰索夫，科热米亚金，苏共中央行政部部长季库诺夫同志，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格里戈利耶夫同志，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检查局局长博罗夫列夫同志，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检查处副处长谢罗夫同志，军事检查总院军事检察长彼得罗夫同志，爱沙尼亚共和国部长会议克格勃特别检查局局长布拉钦科同志。发言的有：奥戈里佐夫同志，阿利特舒列尔同志，扎宁同志，波德恰索夫同志，科热米亚金同志，科姆帕涅茨同志，博伊佐夫同志，阿尔费洛夫同志，皮基娜同志，彼得罗夫同志，安德列耶娃同志，科马罗夫同志，沙图诺夫斯卡娅同志，卢基扬诺夫同志，普奇

科夫同志，季库诺夫同志，什维尔尼克同志)。

从1941年11月至1942年3月间，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州局的工作人员对在列宁格勒高等院校工作的32名学者追究刑事责任并判处极刑。他们被指控成立名为“社会拯救委员会”的反苏维埃组织。

经检察机关检查证实，“社会拯救委员会”实际上不存在，它是在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州局前工作人员——奥戈里佐夫、扎宁、阿利特舒列尔、波德恰索夫和科热米亚金捏造出来的。

检查还证实，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州局广泛采用对囚犯判处极刑后采用非法审问的犯罪行为。审问中通过许诺给判刑的人留条活命的方法勒索对其他人调查所需的证词。

2. 党的监察委员会决定：

由于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律，造成列宁格勒高等院校的工作人员被判处极刑并长期监禁，决定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奥戈利佐夫（1918年加入俄共（布），党证号码00106666）；谢缅·费多罗维奇·扎宁（1924年起为联共（布）党员，党证号码04332151）；伊萨克·康斯坦丁诺维奇·阿利特舒列尔（1927年起为联共（布）党员，党证号码04615903）；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波德恰索夫（自1920年起为俄共（布）党员，党证号码01063594）；伊万·阿列克桑德罗维奇·科热米亚金（自1941年起为联共（布）党员，党证号码00952212）开除出苏联共产党。

委托苏联共产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古比雪夫区委会收回扎宁的党证。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尼·什维尔尼克

【专题说明】

中央书记处关于《苏联》杂志的决定

(1958年7月至1964年4月)

苏联是由党统一掌握舆论工具，一直重视宣传鼓动工作。下面的几个文件集中反映在这方面的华而不实。媒体的生命力就在于其真实性。赫鲁晓夫最热衷于自我吹嘘，夸夸其谈，主持中央宣传鼓动工作的领导人便紧追其后。《苏联》画报在1958年刊登了作家萧洛霍夫一组生活照片，苏共中央宣传部、苏共中央书记处都认为这些照片只注意生活小事，没有展现社会主义大作家的形象，违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犯了错误。同时还批评了《星火》杂志在刊登一幅炼钢工人的照片时也犯了同样错误，把炼钢工人表现成灼热的面孔，“像是一个从事繁重体力劳动不堪忍受的人”。这无形中就暴露出，苏联领导者所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实是粉饰现实。另一组材料则是利用声光电技术在克里姆林宫进行大型宣传展示的计划。这些材料多少说明赫鲁晓夫时代的浮夸和虚假。

(本专题文件由杨存堂编辑和校注，
王伟文、李传勋翻译)

№03302

苏共中央加盟共和国宣传鼓动部 关于《苏联》和《星火》杂志错误的报告

(1958年7月15日)

苏共中央

苏共中央加盟共和国宣传鼓动部认为，有必要报告《苏联》杂志和《星火》杂志艺术装帧上的错误。

《苏联》杂志 1958 年第 7 期上刊登了 B. 鲁伊科维奇的题名《在〈静静的顿河〉作者家里》的摄影报道。

这一组报道的照片是按照自然主义的风格制作的。它们没有把米·肖洛霍夫作为一个杰出的文学大师和人民作家加以表现，而是展现了作家生活中的偶然小事，而不是他的活动的典型场合，从而歪曲了苏联作家的形象。

在一幅占杂志版面三分之二的大彩色照片上，展示的米·肖洛霍夫衣衫不整，没有刮胡子，头发也没有梳，眼睛眯成一条细缝，两鬓静脉隆起。这幅照片是自然主义的典型实例，证明它的作者鲁伊科维奇不是力求展现米·肖洛霍夫的形象，而是模仿某些西方杂志，粗暴地歪曲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原则。

这组摄影报道的其他照片，有的用特写镜头拍摄了扑在睡眼惺忪的作家肩头的两只狗，而作家嘴上勉强叼着一支香烟；有的照了喝茶时的米·肖洛霍夫，而在前景上却看到一只酒瓶；有的照出米·肖洛霍夫背对读者，拎着打猎的捕获品。

《苏联》杂志摄影记者鲁伊科维奇在被召唤到苏共中央宣传鼓

动部后，声称，按照他的意见，他的做法没有错，他把作家生活的本来面目，不加修饰地显现了出来。

《星火》杂志1958年第29期的封面也是按照自然主义的风尚制作的。封面上下塔吉尔冶金工厂辅助炼钢工A.B.潘科夫的肖象是由《星火》杂志摄影记者巴尔特曼茨拍摄的。

这张照片的主题是：先进工人肖像，创造性劳动的欢乐，而这个主题却被歪曲了。照片上是一张皮肤灼热的面孔，完全像是一个从事繁重体力劳动不堪忍受的人。摄影记者巴尔特曼茨为了标新立异却放弃了主要的方面——表现人，表现先进工人。

《苏联》杂志和《星火》杂志上出现有错误的照片，说明两个编辑委员会放松了对选用照片的质量和思想内容的监督。这也证明，某些摄影记者（鲁伊科维奇、巴尔特曼茨）丧失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感觉，常常仿效西方国家颓废没落的艺术。

《苏联》杂志副主编博恰罗夫同志和《星火》杂志副主编库德列瓦特赫（格里巴乔夫同志和索夫罗诺夫同志此时均在外地）对于刊用照片的质量未曾表现出应有的严格要求。

我们认为有必要提醒《苏联》杂志和《星火》杂志的编辑委员会重视这些错误，并且责成他们在编辑委员会的会议上讨论采取措施改善杂志艺术装帧的问题。建议向《苏联》杂志副主编博恰罗夫同志和《星火》杂志副主编库德列瓦特赫同志指出他们在刊物的上述期号的装帧上表现出的不负责态度。

决议草案附后。^①

苏共中央加盟共和国宣传鼓动部部长 伊利乔夫
苏共中央加盟共和国宣传鼓动部处长 博戈柳博夫

^① 参见本专题文件№03301。

№03301

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苏联》杂志 艺术装潢中错误的决议

(1958年7月26日)

1. 指出在《苏联》杂志1958年第7期的艺术装帧上存在严重错误。这期杂志发表的统一冠以《在〈静静的顿河〉作者家里》标题的鲁伊科维奇的一组照片，制作粗劣，表现出自然主义的倾向。摄影报道表现的不是米·肖洛霍夫活动的典型场合，而是他生活中的偶然小事，从而歪曲了杰出文学大师和著名社会活动家的形象。

2. 向《苏联》杂志副主编 A.Γ. 博恰罗夫同志指出这一期杂志装帧上出现无人负责现象。

№06198

福尔采娃关于建议采用声光展示克里姆林宫 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4年4月27日)

苏共中央

近年来，在世界一些国家首都出现了新形式的大规模景观——历史文物的声光展示。

例如在巴黎、凡尔赛和其他地方每天都进行带布景灯光的音响展示。在开罗的古老金字塔上，在希腊的卫城遗址上，在英国、比利时、奥地利的有历史意义的地点也制作了类似的景观。

苏联文化部拟出了对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进行彩色音乐展示，以便利用克里姆林宫的历史文物宣传我们国家和苏维埃政权形成历史的建议。

克里姆林宫的声光展示通过用艺术灯光照耀克里姆林宫的宫殿，教堂和塔楼，用立体声音乐，各种音响和言语再现苏联首都古代和现代的历史事件。

这样的展示对大批参观克里姆林宫的我国人民以及来访的外国人可能具有很大的政治和宣传等作用。

克里姆林宫是这种景观的当然中心。它布满了国家的历史文物，洋溢着革命精神，它的场地在组织和技术方面也是便利的。

对人民英雄业绩的展示遵循两个基本原理：俄罗斯国家在其争取独立和繁荣的长期斗争中的历史形成；人民的反抗精神的革命性增长，十月革命与列宁的建成共产主义的道路。

中央书记处关于《苏联》杂志的决定

为此目的已制定了展示方案并拟定了有关展示的技术设备、自动化控制以及利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经验的初步建议。需要给克里姆林宫装上最新的大功率声光技术设备和放映设备，这些设备能够通过空间传送动态中的音乐声、话语声和嘈杂声，提供布景照明并使历史建筑物上灯光闪耀。电影技术设备保证在宽银幕上高质量地放映取材于克里姆林宫历史、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生活和活动的彩色短纪录片和短故事片。这全套设备与建筑物的总体格局十分协调，不破坏克里姆林宫的建筑风格，也不妨碍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大楼。设备将由我们的研究所和工业部门研制和制造。有可能在1964年11月7日前筹备好展示。

景观的展示对大量观众而言不仅从宣传角度，而且从经济上看都是值得的。计算结果表明，所有设备价值50万卢布左右。在展示隔一天举行一次或每天都举行并收取少量入场费的情况下，这些资金在不超过一年的期限内就能回收。这一措施以后还能带来收入。

在克里姆林宫取得展示经验以后可以成功地向列宁格勒、基辅、伏尔加格勒及其他历史名城推广。

请你们对这一措施的实施予以同意。

附：1.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①；

2. 方案内容提要和经济技术建议。

苏联文化部部长 E. 福尔采娃

^①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决议草案。

附 件

《在克里姆林宫星光下》展示方案内容简介

展示实际上是一部壮阔的人民英雄史诗，包括我国人民生活的两个阶段：

——从莫斯科形成之日起到伟大十月革命前的历史时期；

——从1917年攻打克里姆林宫时起直到当代这一时期和奔向共产主义明天。

在讲述从遥远的过去到不久以前的最光辉事件时，展示把形象描述与对克里姆林宫建筑和广场——在不同年代决定祖国命运的地方——的展现有机结合起来。为此要连续利用3个展示场地，博罗维茨基教堂，大教堂广场和伊万诺夫广场。

播音员的旁白、革命领袖说话的原声、多频道音乐、合唱、立体效果的嘈杂声与配以宽银幕上放映的纪录影片和故事影片镜头的照明效果鲜明地结合起来——这一切有可能对观众产生极强烈的作用。

——这是用彩色音乐描绘的莫斯科河上的黎明；著名交响乐的音响与克里姆林宫的塔楼、宫殿上和教堂的圆屋顶上的颜色美丽无比的闪耀结合起来。

——这是古老的莫斯科国家在博罗维茨基教堂坡上产生的故事，这时现代的首都用无与伦比的配景缩小法在观众眼前展现。

——这是从库利科沃会战战场胜利归来的德米特里·顿斯科伊的战士们在庆祝会上的嘈杂声，仿佛穿过数百年的时空传过来，越来越响亮。在这片嘈杂声中还交织着莫斯科众多教堂宏伟的大钟报警的钟声。

——这是从一个古老教堂的楼梯上响起的穆索尔斯基创作的乐

剧《鲍利斯·戈乐诺夫》的一场戏，剧中主角由夏里亚宾扮演，而乐队演奏的立体声乐曲响彻整个克里姆林宫。

——这是莫斯科历史上那场大火，这时远处火焰的暗红色反光在克里姆林宫建筑物的大墙上映现，透过嘈杂声和火烧东西的噼啪声传来著名的《1812年》交响曲的乐曲声。

——这是借助立体声效果再现的革命者攻打克里姆林宫的场面，充分表现了1917年那些英雄的日子历史事件。

——最后是赤卫军的第一次阅兵式和1918年在红场上演出的第一个人民的神秘剧——借助音响、嘈杂声和电影银幕再现。

——这是描写列宁生平的文艺作品——描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中篇小说。他说话的原声、记录影片镜头、列宁的办公室、克里姆林宫的星期六义务劳动、“热情的乐曲”。——这是伟大卫国战争的英雄年代。反击对首都的空袭。悼念牺牲者的安魂曲的忧伤音响和盛大的庆祝胜利游行。

№06199

斯纳斯京等关于克里姆林宫管理处不同意 组织声光展示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4年4月27日)

苏共中央

苏联文化部（福尔采娃同志）建议在克里姆林宫组织声光展示。

这指的是每天或每隔一天在克里姆林宫场地上组织表现莫斯科古代历史和当代历史事件的大规模演出。为此目的打算利用艺术灯光照射克里姆林宫建筑物，再现各种嘈杂声，音乐和话语，放映宽银幕影片。初步拟定以后这个演出还要包括演员表演、火炬游行、芭蕾舞、施放烟火等。

为此目的苏联文化部拟在克里姆林宫大楼安装大功率声光技术设备和电影放映设备，这些设备价值约为50万卢布左右。初步拟定在演出的日子对参观克里姆林宫实行收费。

克里姆林宫管理处（韦杰宁同志）反对利用克里姆林宫场地进行声光展示，理由是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活动将妨碍设在克里姆林宫内的各机构的工作。

我们认为韦杰宁同志的反对意见理由是充分的。似应建议苏联

中央书记处关于《苏联》杂志的决定

文化部在其他的任何一个历史—建筑艺术综合体进行声光展示试验。

请审议。

B. 斯纳斯京

B. 库哈尔斯基

1964年4月27日

【专题说明】

帕斯捷尔纳克及其《日瓦戈医生》

(1958年10月至1959年3月)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是苏联一位享有很高声誉又曾引起巨大风波的作家。他1890年出生在莫斯科一个很有教养的家庭，父亲是一位曾为托尔斯泰的《复活》作过插图的著名肖像画家，母亲是一位很有才华的著名钢琴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青年帕斯捷尔纳克就开始文学创作，出版过许多诗集。由于他的未来派倾向，30年代以后就很少能发表诗作，他转而翻译外国诗歌。1948年以后，他用了八年时间写了一部史诗式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主要是叙述一个真诚的、专心于自己业务的知识分子在苏维埃年代的坎坷经历。开始，他把小说寄给《新世界》杂志编辑部。《新世界》杂志把手稿退回并附了一封严厉谴责他的信件。1956年6月，他把手稿寄给意大利共产党员、出版商费尔特里内利。这年11月小说用意大利文在米兰出版，接着又出版了法文本、英文本。这本书立即在西方引起了积极的评论。1958年10月23日，瑞典科学院宣布把195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这件事很快激起了苏联国内对帕斯捷尔纳克及其《日瓦戈医生》的讨伐和批判，共青团第一书记谢米恰斯内和《真理报》公然要求把帕斯捷尔纳克驱逐出国。在这种形势下，帕斯捷尔纳克于12月29日宣布拒绝接

受诺贝尔文学奖金，并且给《真理报》写信表示了对俄罗斯祖国的深厚感情，要求不要驱逐他。

1987年《日瓦戈医生》中文译本出版时，译者在其后记中介绍了苏联报刊上批判帕斯捷尔纳克的情况。实际上，那场运动完全是由苏共最高当局亲自发动和掀起的，这里收录的文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传出诺贝尔文学奖要授予帕斯捷尔纳克消息的当天，苏斯洛夫就提出了要采取措施的报告，苏共中央主席团也作出了相应的决定。报刊上的一片喧嚷都是按照上面的布置进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帕斯捷尔纳克进行了侦查和监控。不仅如此，苏联最高检察长鲁坚科对帕斯捷尔纳克进行了十分严厉的询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已经提出了褫夺帕斯捷尔纳克苏联国籍、驱逐帕斯捷尔纳克的命令草案，只是这个命令最后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没有通过。

帕斯捷尔纳克没有被驱逐，却仍被置于严密的监控之下，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小村庄孤独地活了两年，于1960年5月30日病逝。

当年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其下台后写的回忆录中说，他从来没有看过那部小说，而且对当年没有在苏联出版《日瓦戈医生》很后悔。这真有一定的讽刺意味！

（本专题文件由杨存堂编辑和校注，

陈俐佩翻译）

№03163

苏斯洛夫关于对帕斯捷尔纳克被授予诺贝尔奖 采取措施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8年10月23日)

关于因鲍·帕斯捷尔纳克被授予 诺贝尔奖而应采取的措施

1956年初，作家鲍·帕斯捷尔纳克将所著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的手稿转寄给了一家意大利出版社。1957年，这部长篇小说在意大利出版（已印行8版），之后又在法国、英国和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出版。

现在得悉，瑞典科学院决定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奖，世界各国报刊已就此掀起一场嘈杂的喧闹。^①

有鉴于此，我们似应：

1. 认为：将诺贝尔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这样一部诽谤性地描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实现这场革命的苏联人民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是针对我国的敌对行动，是国际反动势力旨在煽动冷战的手段。

2. 应当尝试通过作家康·费定向帕斯捷尔纳克说明因授予他诺贝尔奖而出现的局面，并劝告他拒绝受奖并在报刊上发表相应的声

^① 1958年10月26日《真理报》发表了扎斯拉夫斯基的文章“围绕文学莠草嘈杂的反动宣传”。

明。

3. 在《新世界》杂志和《文学报》上发表《新世界》杂志编辑部 1956 年 9 月致帕斯捷尔纳克的信。这封信对这部长篇小说作了详尽的批判，并且说明为什么该杂志不采用这部诽谤性的著作。

4. 准备一篇文艺短评在《真理报》上发表，对帕斯捷尔纳克长篇小说本身进行尖锐的批评，同时揭露资产阶级报刊就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奖一事掀起的敌对性宣传运动的实质。

5. 组织并公布一批最著名的苏联作家的联合表态，其中要把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奖认作为煽动冷战的企图。

米·苏斯洛夫

№03164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 长篇小说的决定

(1958年10月23日)

绝密

关于帕斯捷尔纳克诽谤性长篇小说的决定

1. 认为：将诺贝尔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这样一部诽谤性地描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实现这场革命的苏联人民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是针对我国的敌对行动，是国际反动势力旨在煽动冷战的手段。

2. 在《新世界》杂志和《文学报》上发表《新世纪》杂志编辑部1956年9月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信^①。

3. 准备一篇文艺短评在《真理报》上发表^②，对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本身进行尖锐的批评，同时揭露资产阶级报刊上就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奖一事掀起的敌对性宣传运动的实质。

① 《新世纪》杂志编辑部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信刊登在1958年10月25日的《文学报》。

② 1958年10月29日《真理报》发表了苏联作家联盟理事会主席团、俄罗斯联邦作家联盟组织委员会执行部、俄罗斯作家联盟莫斯科分部理事会主席团《关于苏联作家联盟成员帕斯捷尔纳克的行动不符合苏联作家的职责》的决议。

4. 组织并公布一批最著名的苏联作家的表态文章，其中要把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奖看作是煽动冷战的企图。

中央书记

№03165

帕斯捷尔纳克关于被迫离开苏联 致赫鲁晓夫的信

(1958年11月1日)

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
尊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我求助于您本人、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

从谢米恰斯内同志的报告，我得悉：政府“将不会对于我离开苏联制造任何障碍”。

对于我来说，这是不可能的。我出生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工作在这里，我同俄罗斯是不可分的。

我无法想象，我的命运会与俄罗斯分开，会在俄罗斯境外。无论我的过失与迷误有多么巨大，我不可能设想到，我竟会处于西方一些人围绕我的名字而掀起的这样一场政治运动的中心。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通知了瑞典科学院自愿放弃诺贝尔奖。

离开我的祖国对我而言无异于死亡，因此我请求不要对我采用这种极刑。

扪心自问，我对苏联文学尽过绵薄之力，也仍然会对它略有益处。

鲍·帕斯捷尔纳克

1958年11月1日

№03166

帕斯捷尔纳克关于承认错误

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

(1958年11月5日)

致《真理报》编辑部

我请求《真理报》编辑部发表我的声明。^①

是我对真理的尊重迫使我这样做的。

正如同围绕我所发生的一切是我的所作所为的自然的结果一样，我就授予我诺贝尔奖一事的所有表现也是自由和自愿的。

授予我诺贝尔奖，我是作为取得文学优异成绩来接受的，为此兴高采烈，并在致瑞典科学院秘书安德斯·艾斯特林的电报中表示了这一切。

但是我错了。我之所以犯了这样的错误，是有原因的，因为在此之前，例如5年以前，我就曾被推荐为这个奖项的候选人，而当时我的长篇小说还不存在。

一周以来，我看到了围绕着我的长篇小说的政治运动达到了何等规模，从而深信这种授奖的做法是一种政治行为，并且已经造成骇人听闻的后果，于是我自己作出决定，并无任何人强迫我，寄出了表示自愿放弃的通知。

在写给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信中，我声明，我的出生，生活和工作都是与俄罗斯密不可分的，被驱逐而离开它出走

^① 这封信公布在1958年11月6日的《真理报》。

异乡对于我是无法想象的。谈到这一点时，我指的不仅仅是我同它的土地和大自然的亲密无间之情，而且也自然是指同它的人民、它的过去、它的光荣的现在和它的未来的亲密无间之情。

但是，在我和这种亲密不可分之情之间却出现了如同一面大墙一样的障碍，而这些障碍则又是因我的过错、而由长篇小说造成的。

我从来不曾有过损害自己国家和自己人民的想法。

《新世界》杂志编辑部曾警告我说：这部长篇小说可能被读者们理解为是一部矛头指向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制度基础的作品。我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现在为此后悔不已。

确实，如果注意到批判地分析长篇小说得出的结论，那么，就是说，似乎我在长篇小说中支持的是下面一些错误的观点。我似乎在断言，任何革命都是历史上非法的现象，这种非法现象之一便是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给俄罗斯带来不幸，并造成俄国正统知识分子的死亡。

我清楚，这样的断言，而且竟把它们解释到荒谬的地步，我不能承认是我自己的意思。而且，我的受到诺贝尔奖的劳动竟授人以柄作出如此令人伤心的解释，这才是我最终拒绝受奖的原因。

如果当时像我向意大利我的出版商请求的那样停止了书的出版（其他国家出版此书未经我同意），我看本来可以部分地加以纠正。但是，书已印行，谈这一点已经晚了。

在这个暴风骤雨的一星期中，我没有受到迫害，我的生命和自由均无危险，绝对没有。我想再一次强调说明，我的一切行动都是自愿的。熟悉我的人们都清楚地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存心不善或昧着良知做违心的事。这一次也是这样。用不着保证说，谁也没有强迫我，我写这份声明时心灵自由、坚信我们共同的和我个人的未来是光明的，并且为我所处的时代和我周围的人们而

自豪。

我相信，我能从自己身上找到力量来恢复我自己的声名和让同志们再次对我们信任。

鲍·帕斯捷尔纳克

№03167

谢列平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社会关系 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9年2月16日)

关于鲍·帕斯捷尔纳克的社会关系

苏共中央^①

兹报告：国家安全机关查明帕斯捷尔纳克同以下苏联公民保持联系：作家尼·科·楚科夫斯基、作家弗·维·伊万诺夫、音乐家亨·古·涅高兹、苏联人民演员鲍·尼·利瓦诺夫、诗人安·沃兹涅先斯基、国家文艺出版社编辑 H.B. 班尼科夫（原在苏联外交部新闻司工作）、女翻译伊温斯卡娅（根据合同工作，与帕斯捷尔纳克同居）。2月8日是帕斯捷尔纳克的生日，前去探望他的有作曲家斯克里亚宾的女儿、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的遗孀、钢琴家里希特偕妻子，以及苏联人民演员利瓦诺夫的妻子。

此外，去造访帕斯捷尔纳克的还有英国《每日快报》记者道布森和贝尔切特，西德“西德意志广播电台”记者鲁格。

今年2月，到过帕斯捷尔纳克家的有以旅游者身份在莫斯科停留的美国公民泰勒和英国《每日邮报》常驻巴黎记者布劳恩。据现有材料，在同布劳恩谈话时，帕斯捷尔纳克交给他一首按反苏精神

^① 文件上有苏斯洛夫的批注“委员会成员以及坡里卡尔波夫已知道”，以及福尔采娃、波斯佩洛夫、伊格纳托夫的签字。

写成的诗《诺贝尔奖》。这首诗后来于2月11日在英国刊物上发表。

伊温斯卡娅有反苏情绪，几次表示愿意和帕斯捷尔纳克一起去国外，常常对他产生消极影响。

国家安全委员会获悉，伊温斯卡娅曾反对把帕斯捷尔纳克的反苏诗《诺贝尔奖》交给外国记者，为此对帕斯捷尔纳克不满，并说过怕自己会被逮捕。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谢列平

№03168

谢列平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调查材料 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9年2月20日)

特别案卷

绝密

苏共中央^①

关于鲍·帕斯捷尔纳克

苏联部长会议所属国家安全委员会向苏共中央报告国家安全机关现在掌握的有关作家鲍·列·帕斯捷尔纳克的材料如下。

帕斯捷尔纳克出身于一个艺术家的家庭，其父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去了英国，于1939年在那里去世。目前，鲍·列·帕斯捷尔纳克的姐姐利季娅·斯列特仍在英国居住。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最初几年，曾接近称作阿克梅派（即高峰派）的文学流派。

其创作的总的特点是歌颂个人主义和脱离苏维埃现实。按照其哲学观点，他是一名虔诚的唯心主义者。

根据情报材料，帕斯捷尔纳克在自己的亲属中不止一次表露过反苏情绪，特别是对党和苏联政府的文艺政策问题上更是如此，因

^① 文件上有苏斯洛夫的批注“委员会已知道”，以及福尔采娃、波斯佩洛夫、伊格纳托夫签字。

为他认为：艺术自由在我国是不可能的。

1938年，帕斯捷尔纳克曾声称：“要保卫自己不受现有的压迫和暴力的伤害，只有隐蔽自身，保持内心的诚实。而这样做现在需要英雄主义，至少要能对占统治地位的粗暴和残忍进行消极的抵抗。”

在卫国战争期间，帕斯捷尔纳克曾表露出失败主义情绪，在战胜法西斯德国后，他又表现出失望，因为战争没有带来他所期望的苏联社会和国家制度的变化。他说：“和以前一样，统治我们生活的仍将是横施暴虐和为所欲为，统治我们心灵与思想的，仍将是暴政和专制。”

对于苏联公众在战后时期对他的创作的批评，帕斯捷尔纳克不屑一顾，他声称，对他来说，在英国受到的欢迎比在苏联报刊上批判地分析他的作品要珍贵得多。“我在苏联生活是难以忍受的，我看到的摆脱当前境遇的出路只有两条：自杀，或者到英国去，在那里我将自由地生活，而且会有人给我以应有的重视和关心。”

1947年，帕斯捷尔纳克结识了英国大使馆的女工作人员霍尔德克罗夫特，向她问起英、美报刊对他的作品有何反应。他答应把自己最近的文章、书和正在写作中的长篇小说交给她转寄出国。其间，关于这部长篇小说，帕斯捷尔纳克说，他是为自己的志同道合者们写这部书的，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据他的看法，都在国外居住，因此，他感到一种满足，力求忘记这里存在的事物。当时，他已在写《日瓦戈医生》。帕斯捷尔纳克曾向他周围的人们示威性地声称，一旦情况复杂化起来，他期望得到英国人的支持。必须指出，在1947~1948年期间帕斯捷尔纳克曾与一系列从英国来的人会见。

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完成后（大约在1949年初）未获准出版，帕斯捷尔纳克把小说手稿在他周围的人们中传播。1956年5

月，众所周知，他把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通过忠诚的意大利共产党员广播电台播音员德安捷洛转交给出版商费尔特里内利，并表示同意在意大利出版这部书。

帕斯捷尔纳克之所以把手稿送到国外，正如他在同1956年来的牛津大学教授白俄侨民卡特科夫谈话时表示的那样，是由于这部长篇小说在苏联不能被接受。在采取这一步骤时，帕斯捷尔纳克，用他的话说，考虑的并不是事情的物质方面，因此，他向出版商提出的主要条件是在意大利语出版后再把《日瓦戈医生》翻译成欧洲国家的语言：法语、德语和英语。

1957年8月，在写给姐姐斯列特的信中，帕斯捷尔纳克告诉她说：“我不知道这一切（指国外对于这部长篇小说出版的反应）会达到什么样子和怎样结束，但不管造成什么结果，甚至最坏的后果，这也只是很小的代价，因为东西已经写出来了，什么也无法妨碍它在亘古长存的生活中占领一席之地。”

当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在西方受到反动分子的过分赞扬时，帕斯捷尔纳克曾试图传出一种说法，即人们对这部长篇小说的理解不正确，这部小说中并没有任何反革命的和反苏的内容，其中惟一检讨的是“我们国家对待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而这些错误没有我人们也是承认的。——帕斯捷尔纳克说——问题只在于时间，如果我说到这一点为时过早，那么这还不算大罪，而我的《日瓦戈医生》中使我喜欢的主要的东西，也是我不愿放弃的原因，在于恢复艺术，恢复对艺术的态度本身这样一个主题”。他的这种对艺术的态度在西方被“理解”，这一点从精神上支持了帕斯捷尔纳克，而且似乎也打破了在他周围形成的孤立状态。

1958年夏天，国外开展了一场大肆喧嚣的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奖的宣传运动。在美国人的策动下，许多反动的和反苏的团体、组织都参与其事，其中包括“人民劳动联盟”的首领们企图把

帕斯捷尔纳克变成为似乎在苏联存在着的文学反对派的象征，并把他推崇为“新的民主俄罗斯”的化身。某一个名叫苏夫钦斯基的，在法国从事帕斯捷尔纳克创作研究和传播其作品的人，1958年7月写信给他说，在很短时间内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在法国已经被提到他理应得到的被公认的高度，从而似乎纠正了俄国历史上最大的不公正现象之一。在答复这封信时，帕斯捷尔纳克写道：“您徒劳地想知道在这部小说前我做了些什么，我只是从这本书开始，所有过去的事都不值一提。”

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被授予诺贝尔奖以前，并未采取任何积极措施，以求制止利用这部长篇小说进行反苏宣传的做法。他一直按照臆想的观点坚持认为《日瓦戈医生》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作品，但是在苏联由于现有的社会政治条件而不可能被承认。

1958年10月23日，当得知授予他诺贝尔奖时，帕斯捷尔纳克对一名外国记者说，他得悉这个消息十分高兴，并且认为苏联也会欢迎这件事，因为正是苏联社会的一员获得了这项荣誉。他期望苏联当局和社会人士会给以积极反应，但也不排除他有可能会遇到不愉快的事。

不顾苏联社会公众的愤慨，帕斯捷尔纳克不愿意放弃诺贝尔奖，而他在报刊上发表的声明可作双重解释。实际上，据对帕斯捷尔纳克信件实行的监控得知，他曾试图向国外寄出若干信件，其中重申对授予他诺贝尔奖的欣喜，并全权委托他所认识的住在法国的德普鲁埃尔伯爵夫人为他代领。

在写给许多外国记者的信中，帕斯捷尔纳克一直强调说，对他采取“相对和缓的措施”似乎是由于西方掀起宣传运动的结果，声称使他同社会隔离的困难条件似乎是专门安排的，似乎有人想用各种方法，直至物质侵害，将他彻底消灭。

例如，在1959年1月3日给某个马可·格列戈尔的信中，帕斯捷尔纳克写道：“我徒劳地期待着我的两封公开发表的信件给予宽容和体谅的回答。宽厚和容忍不是我的收信人的性格，侮辱和欺凌仍将继续下去。在我脖子上拉得越来越紧的那个无法弄清的套索，其目的在于用强制方法从物质上使我屈膝臣服，但这永远做不到。我是带着面临自杀的心情和愤怒情绪跨越这个新年的。”

近来，帕斯捷尔纳克的恼怒情绪有所加剧。例如，从他写给苏共中央的信中就可以看出。帕斯捷尔纳克的情妇伊温斯卡娅记住了信稿，从而为我们所知：“……我知道，我是成年人，我什么也不能要求，我没有这个权利。与最高当局的眉毛一动相比，我只是一只小瓢虫，把它捻死，谁也不会吱一声。但这也不是那么简单。在这之前，在有的地方有人会为我惋惜……总之我由于太愚蠢而期待对我的信（指在报刊上发表的信）会作出宽大与体谅的表示。”信中接着是恼怒的攻讦。

从对帕斯捷尔纳克实施的监控查明，接近帕斯捷尔纳克的人中有不少人也不赞同苏联社会公众的观点，并以自己的同情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恼怒情绪。其中之一便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情妇伊温斯卡娅。她出身贵族，是一个颇为聪明，但道德上堕落了的女人。1949年因表现为反苏情绪以及同一伙诈骗犯相勾结曾被拘捕，后因“证据不足”而获释。

从现有材料可以看出，伊温斯卡娅不反对同帕斯捷尔纳克一起迁居国外，为此试图说服后者同现在的妻子办理离婚手续，并同伊温斯卡娅正式登记结婚。目前，她常表露出反苏情绪。帕斯捷尔纳克受到她很大影响。

H.B.班尼科夫，苏共党员，国家文艺出版社主任编辑，长期担任帕斯捷尔纳克文学作品的编辑，表现有反苏情绪，同情帕斯捷尔纳克的立场。

帕斯捷尔纳克及其《日瓦戈医生》

对于帕斯捷尔纳克产生负面影响的还有作家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及其妻子，以及女诗人玛·茨韦塔耶娃的女儿埃夫朗。

据最新消息，帕斯捷尔纳克因英国议会代表团即将到来而表示不安，怕引起英国记者对他的过分关注。为此，表示希望前去梯比利斯小住。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谢列平

№03169

鲁坚科关于对帕斯捷尔纳克采取措施 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9年2月20日)

秘密

苏共中央

关于针对鲍·帕斯捷尔纳克的措施

阅读了塔斯社和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关于鲍·列·帕斯捷尔纳克将其反苏诗《诺贝尔奖》交给《每日邮报》记者布劳恩的材料后，我认为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1. 召唤帕斯捷尔纳克前来苏联检察院进行正式询问；
2. 在询问开始前，向帕斯捷尔纳克宣布，他的行动——表现为撰写和在国外传播反苏文学作品：包含有玷污苏联国家和社会制度的反苏臆造，成为国际反动势力进行反苏敌对活动手段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和诗《诺贝尔奖》——是同苏联公民的行为准则不相符合的，构成特别危险的国事犯罪要素，根据法律应承担刑事责任；
3. 同时向帕斯捷尔纳克宣布，据联盟检察院掌握的材料证明，他辜负了苏联政府对他的人道态度，而且尽管公开保证恪守爱国主义和谴责自己的“过失和迷误”，他（帕斯捷尔纳克）走上了进行

欺骗和玩弄两面派手法的道路，秘密地继续进行自觉地和蓄意危害苏联社会的反人民活动；

4. 在询问过程中向帕斯捷尔纳克出示刊载他的诗的那一份《每日邮报》的传真复制件；

5. 将帕斯捷尔纳克的口供全部记入询问记录，交他签字；

6. 询问结束后向帕斯捷尔纳克宣布，联盟检察院将对他的行动进行相应的侦查；

7. 建议不追究帕斯捷尔纳克的刑事责任，也不对他的案件进行审判。安排这样审判从各方面看都是不适宜的。苏联社会公众谴责帕斯捷尔纳克的叛国行为，要求褫夺他的国籍和驱逐出苏联。按照现行法律，法院无法做到其中任何一条；

8. 鉴于帕斯捷尔纳克作出了背叛苏联人民的行为，而且由于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堕落使自己背离了苏联社会，因此，更合适的做法是作出决定褫夺他的苏联国籍，并驱逐出苏联。这个决定可以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根据 1938 年 8 月 19 日颁行的苏联国籍法第 7 条“B”款的规定作出；

9.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可以以苏联总检察长的呈报作为研究这个问题的根据。

相应的命令草案附后。

请予审核。

苏联总检察长 罗·鲁坚科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令^①

关于褫夺鲍·列·帕斯捷尔纳克苏联国籍和驱逐出境

草案

苏联总检察长经过侦查判明，鲍·列·帕斯捷尔纳克撰写并在国外传播包含诬蔑苏联国家和社会制度的反苏作品，而且这些作品已被国际反动势力利用来进行反对苏联的敌对活动。

尽管帕斯捷尔纳克公开保证恪守爱国主义和谴责自己的“过失和迷误”，但他却辜负了苏联政府对他的人道态度，走上了进行欺骗和玩弄两面手法的道路，秘密地继续进行自己的反人民活动直到最后时刻。

帕斯捷尔纳克的上述行为是同苏联公民的行为准则不相符合的，从而使自己背离了苏联社会。

根据以上所述，并考虑到苏联公众的要求，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褫夺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的苏联国籍，并将其驱逐出苏联国境。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

^① 该法令在1959年2月2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经讨论没有通过。

№03170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决议

(1959年2月27日)

绝密

“关于鲍·列·帕斯捷尔纳克”

责成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同志根据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交换意见的情况采取措施。

中央书记

№03171

鲁坚科关于讯问帕斯捷尔纳克情况 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9年3月14日)

报告和讯问记录副本送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苏共中央

送上讯问鲍·列·帕斯捷尔纳克的记录。

在讯问时，帕斯捷尔纳克表现胆小畏缩。我觉得，他会从关于刑事责任的警告中得出必要的结论。

苏联总检察长 罗·鲁坚科

副本

讯问记录

1959年3月14日，苏联总检察长一级检查官罗·安·鲁坚科讯问了下面列名的公民，他关于自己提供了以下情况：

帕斯捷尔纳克，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1890年生，犹太人，已婚，非党员。

向公民帕斯捷尔纳克说明，召唤他来接受讯问是因为他的行为

违反了苏维埃国家法律。

问：众所周知，您的作品《日瓦戈医生》包含有诬蔑苏联社会和国家制度的诽谤性臆想的内容，被国际反动势力利用于进行针对苏联的敌对活动。您的行为构成了特别危险的国事犯罪要素，按照法律（国事犯罪法第1条）应追究刑事责任。同样也是众所周知的，苏联社会公众同声谴责您的与苏联公民的行为准则不相符的行为。我首先要问的是，您于1958年11月公开发表的关于恪守爱国主义和谴责自己的过失和迷误的声明确实是真诚的吗？

回答：是的，这项声明就我方面而言是完全真诚的。

问：苏联检察院掌握的材料说明，您辜负了苏联政府的人道态度，而且尽管公开声明要恪守爱国主义和谴责自己的过失和迷误（如您现在重申那样，是真诚的），却走上了进行欺骗和玩弄两面派手法的道路，秘密地继续进行有意识和蓄意危害苏联社会的活动。请回答，您在发出上述公开保证之后是否又把自己的反苏作品给了某一个外国记者？

回答：确是这样，今年2月初有一次不慎重地把几首诗作，其中包括《诺贝尔奖》一诗，交给了到我别墅访问的英国《每日邮报》记者。在把这些诗交给布劳恩时，我说，我不是为了发表它们，而是作为您要求的亲笔手稿给您。我把《诺贝尔奖》这首内容很容易被解释成中伤对我表示真正人道主义做法的诗交了出去，是极端不慎重的，被认定为两面派手法也是公正的。

问：现在给您看今年2月11日的《每日邮报》，其中刊载有您的诗作《诺贝尔奖》，和您的传真电报的复制件，而且记者布劳恩断言，您交给他这首诗是为了发表。

您对他的讲法能说些什么呢？

回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把诗给他不是让他发表。看了您向我展示的报纸后，我确实相信了，我的话和作品被利用来作为

对苏联社会的诽谤性攻击和臆造。这一新的情况使人感到特别痛心，因为它使我为自己祖国服务的决心被置于令人怀疑的境地。我谴责自己的行为，并且清楚地理解到，这些行动使我作为苏联公民按照法律必须承担责任。

在讯问结束时，苏联总检察长解释说：

在侦查的目前阶段，我必须预先警告您，如果这些行为，即如上所说成了犯罪要素的行为，不停止下来，那么根据法律您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我还要警告您，根据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刑法典第96条，泄露侦查材料要承担责任。您理解了吗？

回答：完全理解，而且我将无条件地执行。

讯问在苏联检察院进行，于12时开始，14时结束。

我审阅了记录，对我问话的回答记录正确。

签字（鲍·帕斯捷尔纳克）

讯问人：苏联总检察长罗·鲁坚科。

讯问记录人：苏联总检察长直属特别重要案件检察员普里奥布拉任斯基。

【专题说明】

关于部分青年行为表现的报告

(1958年10月)

本专题所收入的档案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莫斯科局关于该市部分所谓“阿飞”青年的思想、感情和行为表现的报告。从这个报告中介绍的情况可以看出，经过几十年比较严厉的政治化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几年的残酷的战争以及战后的艰苦环境，在社会上较普遍地存在着某种希望过上宽松生活的情绪。青年是社会最敏感的人群，部分青年表现出的这种放荡不羁、追求低级趣味的生活方式，反映了社会变化的一个侧面。写这份报告的当局自然主要从稳定社会秩序上看问题，所采取的种种侦查和制止的措施，似乎也没有收到强大的效果。作为研究社会历史的复杂现象的资料，这份文件还是有其作用的。

(本专题文件由杨存堂编辑和校注，
高增训翻译)

№07002

国家安全委员会莫斯科局关于部分青年 行为表现的报告（摘录）

（1958年10月23日）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莫斯科局所掌握的材料，在战后年代部分莫斯科青年的品行开始表现出与共产主义道德原则不相容的行为和倾向。

这些行为主要明显表现出轻视劳动、追求空虚的“美好”生活、低级趣味、道德败坏、丧失原则、逃避社会生活、不问政治、对自己个人评价过高、希望与众不同（着装、行为、语言），按他们的说法，他们是“灰色的”苏联人。

这部分青年已成为众所周知的被称为“阿飞”的人，严重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腐蚀性影响，因而他们不仅思想上经常产生动摇，而且对苏联的一切采取否定态度，赞美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和生活方式，而有时还直接有反苏表现。

据侦察机构通告，所有“阿飞”尽管外表上都差不多——步态、服装样式、举止，但仍然有差别，他们不是一样的同类人的群体。

通常在相互之间，甚至在不熟悉的人中间，“阿飞”进行交谈都用特别的黑话。但最近以来，这种黑话早已超出了“阿飞”圈，许多青年和人文学学院的绝大部分大学生都熟知这种黑话。

在1952年“阿飞们”编出了并高唱“阿飞”之歌，这歌曲的特点是极为藐视苏联的现实。歌曲中唱的是在苏联不让轻音乐和

“自由”生活爱好者活下去。“歌曲”以副歌结尾：“再也听不到爵士音乐，到处全是胡扯”。至今，在现在积习很深的“阿飞”中间仍继续保持着这种情绪。但是他们公开地很少把它说出来。

根据侦探机构的材料得知，“阿飞”中间有各种各样的类型。

例如：“阿飞—音乐家”。这样的“阿飞”与真正的艺术是很少有共同点的。有时他们甚至没有音乐听觉。但他们混入音乐家行列是为了追求容易挣到钱。才上几堂音乐课，甚至完全丧失了音乐听觉的人竟开始敲起鼓来。这些“阿飞”组织一些“无伴奏合唱团”，每个合唱团4~5个人，其中拉入一个较好的音乐家，这个主要的音乐家给合唱团定调，所有其他参加者则为他做音响伴唱。通常这些“无伴奏合唱团”聚集在涅格宁纳亚街的莫斯科市露天舞台那儿。傍晚约5点钟，这里可以见到“无伴奏合唱团”的几百名“阿飞”。一般他们在哪儿也不工作，只是每逢晚上就在中学、学院、中等技术学校、机关里游来荡去。在这些晚上同他们一起跳舞的还有他们“周围的人们”——一些俗气地浓涂艳抹的“阿飞”——女郎和小伙子。他们在其朋友“阿飞——音乐家”音乐的伴奏下跳着摇摆舞和其他类似这样的舞蹈。

由于中学生、大学生和青年工人观看这些“阿飞”，他们就开始模仿那些“阿飞”，起初是闹着玩，后来逐渐地其中一些人也感染上跳庸俗舞的愿望，于是加入到这些“无伴奏合唱团”里去，并一到晚上就同他们一起去游荡。要是—个非常年轻的、相貌漂亮的姑娘落入这些新手中间，那末她很快就被引诱到这种生活中去，拖她下饭馆、让她和他们打成一片，并在某个“阿飞”家里组织的狂饮中诱其成为淫荡的人。这些“阿飞”认为他们特殊的功劳是使无辜的姑娘堕落。从此以后，许多姑娘就开始了轻浮的生活方式。

通常这些“阿飞”聚集在革命广场、地铁附近，除此而外，在高尔基中央文化休息公园舞会上，在普希金广场的啤酒酒巴间，在

中央文化休息公园和“皮尔津斯基”饭馆。但是他们最多的人经常在高尔基街出没。行为轻浮的妇女（不是妓女）常常到这里来，而“阿飞们”则在此寻找她们同她们会面。有自己的低座小摩托车和汽车的“阿飞们”把那些妇女带到城外的别墅去。随着夏季来临，当许多“阿飞”的父母外出休息时，他们就在莫斯科的住所里安排酒宴。

如果以前“阿飞”的特点是穿得花里胡哨的，那么现在这样穿着不仅会引起社会舆论的注意，而且还会引起共青团巡逻队和民警的注意，所以“阿飞”开始穿得不那么花花绿绿的了，不过分时髦了，但只穿着外国的服装。

现在在街上难以将真正的“阿飞”与外国人区分开。这可以帮助他们冒充外国人，直接进入旅馆里外国人的房间中去，而不引起注意。在外国人房间里，他们和前来的外国旅游者做生意。然后“阿飞”将用四分之一的价格或较少的物品买到的东西出售给寄卖商店或沿街兜卖给熟人。某些人还和寄卖商店与收购店的估价员有直接联系。

外国旅游者为了把买卖做得更兴隆一些，他们乐意出卖自己的物品，有时“阿飞”添油加醋地说他们受到苏维埃政权的委屈，还对外国人述说，他们的父母遭到迫害，等等。

在莫斯科有好几个“阿飞”团伙与外国人存在这样的关系。C. 1935年生，加入了其中一个团伙，曾是一个大学的学生。现在他没有在任何地方工作，只在外国人中间从事投机买卖。通常，C. 和同伙常常去市里最大的饭店——“京城”、“苏维埃”、“大饭店”，这些饭店也就是外国人最经常光顾的地方。C. 曾对侦探说过，市中心所有民警机关的侦探员都认识他，但他们丝毫也不能或不想对他干什么。

从事投机买卖、拉皮条、行窃等的许多“阿飞”都有代号。

特别应该谈到的是那些归附于“阿飞”的青年，大体上这些小伙子才16~17岁，他们就模仿“阿飞”，他们中间有工人、学生和其他青年。他们受到有经验的“阿飞”的影响，穿得花花绿绿的，热衷于做广告，充当较为有经验的“阿飞”的挡箭牌。当共青团巡逻队在抓穿得花花绿绿的、引起民警注意的招眼的和吵吵嚷嚷的小伙子的时候，而着欧洲时装的真正的“阿飞”都巧妙地办妥了自己的勾当……。

国家安全委员会莫斯科局已掌握以下说明某些“阿飞”和生活方式、行为和情绪的材料。

例如，在莫斯科测绘工程、航空摄影与制图学院学习的学生K.，1937年生，侦探“施手术者”认为他具有“阿飞”特征，懒于学习，做事马马虎虎，眼界相当狭窄。在空余时间使他感幸趣的只有爵士乐、女人和酒。他以轻藐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人。学院的晚会他没有不去观看的，并随时带着“阿飞”同去，常常参加形形色色的狂饮和娱乐晚会。

同一大学的学生H.，1937年生，共青团员，为人谦逊、学习认真、与同学接触的范围有限，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成熟的、博学多识的青年。但其在校外的表现则完全是另外一个样。根据侦探机构的材料，H.和自己的朋友经常在一起组织有行为轻浮的姑娘参加的酗酒，还收听美国广播。

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的女大学生K.，1938年生，共青团员，以热衷于游手好闲的生活方式和经常光顾饭店而出名。据“科罗博夫”侦探通告，K.对生活失望，认为自己已堕落，所以对未来的生活看不到任何前途……。

1958年3月5日“博布罗夫”侦探通知说，他认识的一个女人Ж，1937年生，共青团员，诊疗所护士，根据“儿童书

籍”……^① 工厂诊疗所女护士对他的口述说，存在某个“地下社会”，以前中央无线电艺术俱乐部爵士乐队参加者组织的。据说这个“社会”约有60人，有一个“总统”。被引诱加入“社会”的妇女和姑娘要委身于提出发生性关系这一要求的任何一个参加者。“社会”的集会主要是在一些住所和别墅。往往伴随着酗酒，其经费来源于“社会”成员的工资，或来自某些其他“秘密”的来源。这些材料正在复查中……。

关于“阿飞”进行的酗酒，类似的聚会的一个参加者向我们的侦探说，这帮人使她感到恐惧，她害怕与不认识的男人搞“普遍的性淫荡”，但停止与“阿飞”的交往她还下不了决心，因为她怕报复。

除了上述证明“阿飞”道德败坏的品行而外，他们边酗酒，边搞淫荡，还掌握了他们对中学高年级学生有害的腐蚀影响的资料。

例如希姆金第三中学十年级学生B.说，青年应该力图只使自己过好生活，他们不需要共产主义思想，因为生活所要求的，也就是人想要的，而不是有人向我们许诺的东西。在外界的影响下，B.机械地退了团。

仍是这个学校的一个女学生P.（她的兄弟在和外国人搞关系方面干得起劲）在学校一次共青团会议上宣称说，在革命以前人们不承认布尔什维克，但他们却胜利了。现在“阿飞”没有得到承认，但他们占上风的时代将会到来，那将是“阿飞”的时代。

由于对经常与外国人（资本主义国家派驻莫斯科的外国代办处职员和旅游者）会面的人员采取反侦察措施，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莫斯科局最近获得的间谍和侦查材料证实，所谓“阿飞”，因为精神和思想上动摇不定，其多数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

^① 档案此处有几个词字迹不清。

影响，有反苏情绪，乐意与外国人勾搭并成为其获取苏联现实的侦察情报和诽谤性情报的一些渠道。其中一些人正在酝酿着背叛的意图。

关于外国人利用“阿飞”以便从其获取所感兴趣的情报，美国女新闻记者什瓦尔岭巴赫曾说，现在所有驻莫斯科的外国记者为了这一目的都喜爱与“阿飞”拉关系……。

在侦探机构的帮助下，我们发现了 30 多个从事投机买卖外国物品和美元的“阿飞”。通常，他们所有人都有反苏情绪。他们在街上、旅馆和饭店与外国人见面时，往往发出形形色色的、反苏的、诽谤性的议论，向外国人预报一些他们知道的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方法，还为外国人拉皮条，把行为轻浮的年轻姑娘介绍给他们，并完成某些私人委托，以获得他们对自己的好感和获取一些物品……。

由于对与外国人保持可疑关系的“阿飞”所进行的详细侦探分析，1957 年有 7 人被莫斯科局逮捕，按刑法典 58 - 11 - A 条款和 58 - 10 - I 条款，他们所有人都被判了罪。

对于与外国人从事外汇交易的 10 个人，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莫斯科局将掌握的材料转到了反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行为局，与该局协同并在本局侦探机构援助下，在他们进行外汇交易时全部被当场捕获并被逮捕。

国家安全委员会莫斯科局在逮捕“阿飞”以取缔一些“阿飞”的犯罪活动的同时，还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把“阿飞”中的一些人叫来，警告他们必须停止与外国人的勾当，还邀请他们的父母来，将子女的行为通报给他们。对一些“阿飞”，不仅通报他们的父母，而且还向其学习或工作的企业或机关通报。

由于实施了所有这些措施，毫无疑问，这促使一部分青年与所谓的“阿飞”脱离了，他们还改变了自己的行为。可以说，现在在

外国人周围与其交往的“阿飞”比以前少了，表面上其行为也比从前有所收敛。

但是所谓的“阿飞”还是有相当的数量，他们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继续对苏维埃国家的利益带来危害。

在“阿飞”中间活动着许多住在莫斯科而无登记户口和固定职业的形形色色有嫌疑的人，各种小偷，投机者和其他骗子。但警察机关与这种人斗争不力。

为了更有效地与“阿飞”展开斗争，同时加强对他们的侦探业务工作和杜绝一些人的反苏活动，国家安全委员会莫斯科局认为有必要实行以下措施：

1. 动用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的侦探机构，除了对“阿飞”中的反苏分子进行详细分析而外，还要发现违犯刑法的人。它要将已查明的事实通告警察机关以对罪犯严厉追究责任。

2. 对故意将自己的住所和别墅提供作为狂欢暴饮和各种聚会场所，有时提供作为种种犯罪巢穴的人，要追究其行政责任。

3. 为了预防活动不够受到刑法惩罚的“阿飞”，要广泛采取这样一个措施：将他们及其父母的情况通报给党、团组织和社会组织，要利用报刊杂志，尤其是学报、厂报及地区的《讽刺之窗》，以及广播和电视。

4. 在大学学习成绩差的“阿飞”大学生从学校除名后，只有经过两年劳动或在苏军服役后方能有权再入学。

5. 鉴于相当部分青年没有安置就业，应向莫斯科市苏维埃提出尽快将其安置的问题。

6. 对逃避劳动和过寄生生活的“阿飞”，以行政方式撵出莫斯科市。

7. 经文化部和莫斯科市执委会所属文化局出面宣布停止批准演奏艺术品味不高、思想上格格不入和粗制滥造的作品的“左的”。

小型文艺节目乐队（有一些“阿飞”参加了这些乐队）的演出。

8. 加强旅馆登记制度，对那些在旅馆房间搞狂欢暴饮的人，经行政机关将其撵出旅馆并经警察机关追究其行政责任。

9. 应准备专门的关于“阿飞”对青年的有害影响的讲座，要在大企业和学院中举办。

10. 提请莫斯科市国民教育局注意加强在中学高年级学生中的教育工作。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莫斯科局局长 B. 别洛科涅夫

1958年10月23日

【专题说明】

关于清理积压政治印刷品的报告

(1959年1~11月)

清理和销毁敌对党派、党内反对派以及持不同意见者的公开出版物，在苏联从二三十年代就存在了。人们在查阅过去的《真理报》时，常常发现某篇文章被挖掉了。1957年6月，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党中央主席团内的多数派被打成“反党集团”。同年10月，原来积极支持赫鲁晓夫的国防部长朱可夫以“在军队中搞个人迷信”等罪名被解除了党内和国防部长的职务。1958年2月，原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的职务由赫鲁晓夫取而代之。布尔加宁降职做了一家银行的行长。人们才知道，布尔加宁也属“反党集团”成员。1959年1月，书刊保密检查总局根据苏共中央的指示，要求图书馆封存、书店停止出售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和谢皮洛夫等“反党集团”成员过去公开出版的书籍、小册子和肖像等。朱可夫也被列入。有意思的是，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的文章、照片常常同赫鲁晓夫的连在一起、印在同一本书里，清理起来经常要因噎废食，因此，书记处才认为清理这类书刊不适宜。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的清理文件中把斯大林或者与斯大林有关的几本书特别列了进去，可能这就是把这次清理的书籍称为“过时的”的原因吧。其实，这也说明赫鲁晓夫把反

关于清理积压政治印刷品的报告

对“反党集团”作为进一步批判斯大林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选录的文件说明了这次清理的过程。

(本专题文件由杨存堂编辑和校注，
吴能翻译)

№03194

罗曼诺夫等人关于停止出售与马林科夫等人 有关的文集和图片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9年1月24日)

苏共中央

根据苏共中央的指示，书刊保密检查总局曾发布命令，要求图书馆封存和书市停止出售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和谢皮洛夫反党集团成员的书籍、小册子和肖像。

目前，在书刊销售网上有大量这样一类文集和图片集，其中和其他材料一起印有反党集团个别参加者的讲话和照片。例如，在《友谊的使命》文集中，除了尼·谢·赫鲁晓夫同志访问印度的演说外，也有布尔加宁的讲话。在庆祝列宁格勒建城250周年的文集《关于节日的故事》中，印有布尔加宁的照片和他在五金工厂讲话的报道。“艺术”出版社发行的画册中，印有大量布尔加宁和尼·谢·赫鲁晓夫同志一起前往印度、缅甸和阿富汗访问时的照片。

设想应当通过书刊保密检查总局（罗曼诺夫同志）指示书刊销售部门停止出售这类文集和图片集。

请予同意。

苏共中央加盟共和国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罗曼诺夫
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科苏利尼科夫^①

^① 档案原件边页上有批注：“中央书记处认为不适宜。M. 苏斯洛夫”。

№03195

皮加列夫关于研究书刊检查问题 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9年10月23日)

苏共中央

苏共中央加盟共和国党务机关管理部得悉，莫斯科市商业部门出售过时的，政治上有害的书籍，并存有大量宣传反党集团参加者——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谢皮洛夫、布尔加宁的出版物。在书刊库存和销售市场上还有各种登载反党集团参加者照片、讲话摘引、转引内容的书籍、图片集、小册子。例如，1955年出版的供政治学校使用的直观教具图集，就印有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的肖像；1957年出版的小册子《庆祝社会主义农业的新胜利》登有他们的讲话；1957年以前出版的苏联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例会的速记记录稿；以及政治词典和百科词典等等。至今，销售网还没有停止出售萨布罗夫的肖像、带有朱可夫言论的宣传画。

就上述问题我们同索莫夫同志——苏联文化部书刊出版、印刷、销售总局副局长，巴拉什科夫同志——全苏书刊销售联合公司经理，波利瓦诺夫斯基同志——莫斯科州图书发行处处长，列兹尼科夫同志——军事书籍发行处处长等人谈论过。他们提供的材料说明，目前确实没有对于书刊销售进行检查的必要程序。文化部机关和贸易部门自身不能决定政治上过时的书刊的停售问题，而书刊保密检查总局也不认真从事这件事。书刊保密检查总局局长罗曼诺夫

同志和副局长阿韦季相同志则说，书刊保密检查总局只检查新发行的出版物和通过旧书店销售的书籍。

鉴于对原先出版的目前仍在销售中的书籍的政治内容并无认真的检查，我们认为有必要责成苏共中央的几个宣传鼓动部就此问题提出建议送中央研究。

苏共中央加盟共和国党务机关管理部副部长 皮加列夫

1959年10月23日^①

^① 档案原件边页上有批注：“同意。E. 福尔采娃”。

№03196

罗曼诺夫等关于清理书刊销售网问题 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9年11月28日)

苏共中央

苏共中央加盟共和国党务机关管理部副部长皮加列夫同志请求责成苏共中央加盟共和国宣传鼓动部草拟关于书刊销售网停售政治上过时的书籍的建议。

苏共中央加盟共和国宣传鼓动部报告如下：苏共中央1959年10月21日作出决议，准许苏联文化部作为政治上过时的出版物在书刊销售网上停售和注销以下出版物：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一和第二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约·维·斯大林略传》、约·维·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至于清除原先出版的，和其他材料一起刊印有反党集团个别参加者讲话和照片的书籍、文集和图片集的问题，经苏共中央今年2月10日讨论，认为从书刊销售网剔除这类出版物是不合适的。

这一点已通知皮加列夫同志。

苏共中央加盟共和国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罗曼诺夫
处长 博戈柳博夫

【专题说明】

关于修建防空洞兼电影院 两用设施的决定

(1960年1月)

60年代初，为了增加放映科普片等短影片，苏联文化部建议大量修建两用防空洞，即健身房或电影院兼防空掩蔽所。这当然是一举两得的计划。不过，这种情况也反映了苏联领导人在冷战的背景下，时刻不忘战备的思想状态。同时，从这些文件中还可以了解到苏联计划经济的具体操作程序的一个侧面。

(本专题文件由杨存堂编辑和校注，

徐锦栋翻译)

№04395

米哈伊洛夫关于兴建防空洞、电影院 两用设施给苏共中央的请示报告

(1960年1月9日)

绝密

苏共中央：

近几年苏联观众对短片（科技片、科普片、文献纪录片、教学片等）的兴趣大大增加。短片具有巨大的传播知识和教育功能，使科技成就、工农业生产中的先进经验得到推广和普及。及时反映国内外社会政治事件的影片受到居民的极大欢迎，科技影片深受在学青年的喜爱，对他们的学习很有帮助。

目前我国短片的储备量很大（有2000多部）。按照七年计划，短片（不算新闻简报）的储存量将成倍增加。

但是，放映这些短片的能力极其有限，因为全国只有170座专门放映短片的电影院，完全满足不了观众的需要。

为了增加放映短片的电影院的数量，苏联文化部请求苏共中央研究下列建议。

根据苏联内务部制定的专项活动七年计划草案，准备在特别类、1类、2类、3类和4类城市修建几千座独立的两用防空掩蔽所（健身房兼防空掩蔽所，电影院兼防空掩蔽所，等等），供这些城市的居民在特别时期躲避使用。有鉴于此，建议在和平时期将部分计划建造的防空掩蔽所作为小型电影院使用。每个小型电影院有

120~150个座位，供放映科普片、文献纪录片、教学片和其他短片使用。

建议在1961~1964年期间，在这些城市中建造并投入使用790座兼作电影院的防空掩蔽所，观众座位总数为11万~12万个，其中，1961年建造210座，1962年建造240座，1963年建造200座，1964年建造140座。

这些小型电影院投入使用后，按最低放映场次计算（每天3~4场），每年可为1.1亿~1.2亿观众提供补充服务，可大大解决增加为苏联观众放映短片数量的任务。

苏联文化部请苏共中央审议就这个问题所作的决定草案。这个问题已经同苏联内务部进行过协调。

苏联文化部部长 H. 米哈伊洛夫

1960年1月9日

№04396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建造兼作 小型电影院的防空掩蔽所的决定》

(不早于1960年1月9日)

第2号

绝密

《关于建造兼作小型电影院的防空掩蔽所的决定》

为了在特殊时期及时向居民提供防空掩蔽保障，和平时利用这些场所大量放映短片，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定：

一、责成苏联内务部于1960年第一季度制定出独立防空掩蔽所（内有可容纳140~150个观众座位的小型电影院，带无保护的地面前厅，供放映短片使用）的标准设计方案。

二、责成苏联国家建设委员会：

(1) 于1960年第一季度制定出建在住房和文化娱乐和日常生活建筑物（按标准设计方案建造的建筑物）内的兼作电影院的防空掩蔽所的标准设计方案。

(2) 在设计方案制定后一个月之内批准兼作电影院的防空掩蔽所的标准设计方案。

三、责成苏联文化部在1960年第一季度制定出用电影放映机、电线、木器家具装备小型电影院及其类似普通电影院内装修的标准

设计方案。

四、责成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

(1) 1960年第三季度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小区内划出地段，供建造带有小型电影院的独立防空掩蔽所使用，并在这些地段内按照附件进行勘查工作和测量；

(2) 确定可以用来建造兼作电影院的防空掩蔽所的居住建筑物和文娱娱乐日常生活建筑物；

(3) 按照附件实施小型电影院的建造和安装工程及其电影技术设备和木器家具的配套工作，并在1961~1964年投入使用。

五、责成苏联文化部考虑及时拨出电影放映机，保证小型电影院如期按照附件投入使用。

六、兹规定：

(1) 依靠建造防空掩蔽所七年计划规定的总拨款建造小型电影院；

(2) 依靠各加盟共和国计划中规定的拨款添置小型电影院的设备（电影放映设备，屏幕，电线，木器家具，内装修）。

七、在小型电影院内放映短片的税收和租金规定如下：

税金——10%

租金——5%。

【专题说明】

克格勃针对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计划

(1960年11月至1961年2月)

1960年，美国U-2型侦察飞机在苏联被击落以后，美苏关系紧张起来。苏联除了发布抗议照会、在报刊上发表揭露文章外，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拟定了一系列破坏美国政府及其中央情报局威信的措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亚·谢列平几次向苏共中央写信，详细阐述这些计划。

利用秘密战线的情报活动进行相互攻奸和破坏是苏美冷战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克格勃的这一计划可以看到苏美双方在这方面的斗争策略。

(本专题文件由杨存堂编辑和校注，
高增训翻译)

№07006

谢列平关于针对中央情报局采取的措施

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0年11月3日)

苏共中央：

在执行经苏共中央批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1960年6月7日在第1501-41号信件中所阐述的有关破坏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活动威信、让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阿·杜勒斯威信扫地的一系列措施过程中所做工作如下：

为了谴责美国情报部门的挑衅性间谍活动，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广泛的社会舆论界在英国、希腊、利比亚等国的议会中煽动议员就政府对美国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的敌对行动，就在上述国家的从洛克希德式U-2型间谍飞机的数量和为消除美国人可能从他们国家的领土上向苏联挑衅而采取的措施等问题提出质询。

与此同时，将由48名议员签署的《美国应对世界紧张局势负责》的决议案提交英国议会。在美国驻伦敦大使馆大楼前组织要求停止利用英国领土进行间谍飞行的抗议示威。

芬兰政府通过挪威驻赫尔辛基大使向挪威政府发去要求美国停止利用机场作为U-2型飞机基地的建议。

在缅甸，由《人民统一阵线》主席团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指出美国军国主义者应对加剧国际紧张局势承担责任。

为了强化世界各国人民的反美情绪和使社会人士产生对美国人的不信任出版并散发了小册子、抨击性的文章、传单，以及在资产

阶级的报刊上发表文章。

比如在日本出版了 5 种抨击性文章的小册子，严厉批判日本政府的政策、美国的对外政策及情报机构的挑衅性行动。

在印度，发行了三本小册子，揭露美国对待东南亚各国的政策的侵略实质。

在英国，广泛散发了小册子，严厉批判美国执政集团推行的《战争边缘》政策。

准备并公布了美国侦察员埃姆斯向美国驻日本大使麦克阿瑟所作的关于临时将 U-2 型飞机从日本基地机场转出去和美国情报机构打算再将这些飞机在不通知日本政府的情况下返回原基地的报告。

在印度、英国、印度尼西亚、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报刊上发表了 200 多篇揭露美国政府的侵略方针和中央情报局的破坏活动的文章。特别是在意大利发表了关于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和中央情报局局长达列斯同美国“洛克希德”航空公司的联系及他们利用这家公司的侦察飞机的订货发财的纪实性文章。为了使这篇文章的内容能让美国的社会人士都知道，已将文章送到美国各报社。

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安排向地方报界发去以读者的名义含有反美情绪内容的信，以及向联合国和美国大使馆发去了这些国家公民的信件，谴责美国军事集团的挑衅性活动。

为了加剧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情报部门之间的对立情绪以及强化中央情报局机构内彼此不信任和相互怀疑的气氛，实行一系列措施展示中央情报局工作中的严重缺点。尤其是美国间谍斯拉夫诺夫在苏联的失败更令人感到神奇。有关克格勃机构今年 8 月份逮捕他的报道已在中央级报纸上公布。

在西德散发一些按照从美国侦察员梅尔巴吉斯那里获得的文件装备的材料，文件揭露了美国情报机构为反苏组织 СВОHP 融资及

该组织的领导的情况。

上述措施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所采取的其他措施已在报界和社会人士中间产生广泛的反应，对上层人士的政策也施加了一定的影响。

由于中央情报局工作中的许多重大失败和社会人士对美国情报机构挑衅性活动的谴责，参议院调查反美活动委员会通过了检查中央情报局和军事情报机构的决议。

鉴于此情，国家安全委员会已采取措施，进一步使中央情报局及其局长阿·杜勒斯威信扫地。已准备了在国外散发的讽刺和抨击阿·杜勒斯的文章，揭露他反对和平的活动。

根据同德国、捷克和波兰的朋友们达成的协议，他们在最近将对被逮捕的美国特务进行公开的起诉，并让某些间谍人员在新闻发布会上、报刊上和电台上发表讲话。

由苏联情报局编辑并准备了用俄文、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出版美国的间谍破坏活动事实手册。

还准备通过公布美国情报机构前工作人员米切尔和马丁揭露性的讲话和文章更广泛地利用这些人。

此外，在使美国情报机构威信扫地的措施中还打算公布现有的原始文件和专门准备的文件，揭露美国情报机构唆使苏联公民背叛祖国的挑衅性活动，公开那些反苏的侨民组织失败的情况。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亚·谢列平

№07007

谢列平关于针对中央情报局的补充措施

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1年2月25日)

绝密

苏共中央：

国家安全委员会 1960 年 11 月 3 日第 2870 - 41 号信函报告了执行苏共中央 1960 年 6 月 14 日第 153/30 - C 号关于破坏美国中央情报局活动的威信和使该局局长阿伦·杜勒斯威信扫地的决议的情况。

过去的的时间里，在这方面实施了一系列补充措施，如公布了一些有关美国情报机构反对自己盟国的间谍活动的新材料，让在美国驻德里大使馆的掩护下工作的美国情报人员在印度当局面前威信扫地，美国驻墨西哥、巴西、柬埔寨和刚果大使充当间谍和深入干涉上述几个国家的内部事务的活动被揭露，有关美国情报机构利用反苏的侨民组织和通过非法途径向苏联秘派特务的新的事实当着社会舆论被揭露出来，以及公布了美国情报机构有关唆使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公民背叛祖国的工作的文件原件和专门准备的文件，并就这一问题在苏联的和资产阶级的报刊上发表了相应文章。

据国家安全委员会获得的资料，美国情报机构最近正积极开展针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破坏活动，为此也在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情报机构的能力。美国情报机构的代表同土耳其情报机关的

领导人讨论了关于加强针对苏联的破坏活动措施。在土耳其的一些报纸上出现了一些反苏文章和有关苏联间谍的谎言。在瑞士，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机构工作人员的挑衅活动连续不断。在美国，最大的广播电视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今年2月15日通过电视播放了《间谍在您身旁》这一粗暴反苏的电视片。这个节目以参议院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成员，共和党参议员赫鲁什克的讲话作为结尾，此人号召美国人避免同苏联在美国的代表人士交往。

为此，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继续进行工作揭露美国情报机构的破坏活动，强化世界社会各界首先是中立国家的社会各界对中央情报局的挑衅行动的不满，使肯尼迪政府和盟国的情报部门对美国情报机构领导产生不信任情绪，以及在美国情报部门和反情报部门的机关内产生失望和互相怀疑的气氛。为此目的打算：

1. 向国外公布美国情报机构5份文件的原件，以及使人更能相信情报机构的机关内就有人反对杜勒斯及美国情报机构的其他领导人所推行的挑衅政策。这样做也是想以文件来证实美国情报机构正在从事反对英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土耳其、瑞典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间谍活动。

上述文件的内容是美国情报机构搞到的关于英国军队在中东地区的战略预备队，西德军队的人数、武器装备和驻地，土耳其古尔塞勒体制和民族团结委员会的不稳固，瑞典在研制化学武器，叙利亚—约旦边界地区的局势及阿拉伯联合国家在这一地区所要采取的军事措施等方面的情报。

2. 在美国人中形成一种看法，即文件是直接从中情局机关泄漏出去的。为此，通过接近敌人的渠道策划将国家安全委员会现有的由杜勒斯签字的真正秘密指示原件从华盛顿送去的。

3. 筹划一些措施揭露美国情报机构旨在使一些国家的，特别

是印度和土耳其的一些不合美国心意的政治活动家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活动，具体措施有：

——通过非官方渠道将那些证明美国人正在采取措施制造一种迫使尼赫鲁及国家的其他活动家退休的局势的材料送到尼赫鲁手中；

——策划如下一则消息登在资产阶级的报刊上，即美国情报机构正在策划一些措施，把另一批赞成土耳其不依赖美国的政治方针的政治家从民族团结委员会中清除出去。

4. 搜集并公布美国情报机构广泛利用美国援助欠发达国家计划，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招募和训练特务搞间谍破坏活动的事实。

5. 将一封专门准备的以美国情报机构工作人员的名义揭露美国情报部门领导，为了不让埃伦德知道间谍工作真实开支情况而通过的措施的信件，寄给美国上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埃伦德。

6. 将美国情报机构出版的秘密的《鼓动员手册》的内容公布于世。这本书实质上是美国间谍对苏联公民进行思想灌输和收集情报的手册。有关这一问题的消息要从《鼓动员手册》中摘录的照片说明并附上对美国情报机构利用为美国情报目的服务的宣传机关的评论。

7.^①

8. 与波兰朋友们协商，公布被波兰揭露出来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信使列维茨基和加尼亚克以及我们在同敌人的侦察游戏中使用的慕尼黑侦察中心的报务员“拉夫林”和“莫德斯特”及信使“兹鲁布”和“利帕”的声明，败坏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头目的

^① 该项建议被苏共中央否决，其内容是，打算在民主德国、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对被捕的美国情报机构特务案件进行公开起诉。

声誉，视他们为美国情报部门的特务。

9. 在揭露美国情报机构的间谍破坏活动的同时还要采取一些措施加剧北约成员国各国情报机关之间的矛盾，为此，

——造成一种假像：西德的情报机构正积极开展针对法国和英国的情报工作。为此目的，把似乎由西德情报机构的间谍搞到的法国国防部总参谋部的2~3份文件原件和专门准备的、从中能明显看出联邦德国的情报机构，为了开展针对自己的盟国的工作正向北约司令部及驻在外国的其他机关派遣侦察员的内容并由盖伦签字的备忘录，提交法国政府人士；

——通过侦察渠道将下列情报送到法国情报机构：1959年在联邦德国被判刑的法国间谍卡普林斯基、克劳泽尔和奥托由于西德反情报机构从美国情报机构获得一份情报后而被揭露；

——向朋友们建议研究关于逮捕我们在德国发现的一些德国人充当英国情报机构的间谍8~10人的问题和采取措施当英国情报机构正式工作人员在民主德国同自己的间谍接头时将其抓获的问题。要让英国人相信，造成这些间谍失败的罪魁祸首是美国情报机构的同行。根据被逮捕的间谍的供词在报刊上揭露英国情报机构针对民主德国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的间谍活动。

请审查。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亚·谢列平

【专题说明】

下台后的卡冈诺维奇

(1960年12月至1986年9月)

拉扎尔·莫依谢维奇·卡冈诺维奇，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人。乌克兰的犹太人，1893年生于基辅州的卡巴尼村。早年当鞋匠，191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14年开始从事党的工作。十月革命期间任戈麦尔党委会主席，在那里领导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1918年任全俄筹建工农红军委员会组织宣传部政治委员，6月以后被派到下诺夫哥罗德、沃罗涅日、塔什干做地方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工作。由于在地方工作中表现突出，受到斯大林的垂青，1922年起调到俄共中央工作，担任组织指导部长、组织分配部长。1924年成为中央委员，接着又任中央委员会书记。1925~1928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28~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30~1935年兼任莫斯科委员会第一书记。1926年起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成为政治局委员。在修建莫斯科地铁和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等方面得到斯大林的赏识，成为斯大林领导核心成员之一。斯大林曾委派他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包括联共（布）中央农业工作部长，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以及政府的交通、重工业、石油等人民委员，1938年担任了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反法西斯战争期间任国防委员会委员，高加索战线军

事委员会委员。战后，1946～1947年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47年曾被派到乌克兰做党的一把手，此后又任部长会议副主席。斯大林逝世后任党中央主席团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7年6月，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等试图解除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开除出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后来曾被任命为乌拉尔制钾联合企业的经理。1962年被开除党籍，晚年在莫斯科赋闲。1991年7月去世。

本专题选编的档案是卡冈诺维奇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并离开领导岗位之后的一些信件，主要内容是要求继续工作和恢复党籍。但这一要求直到去世没有得到满足。

我们在附录中收入了卡冈诺维奇回忆录中的部分内容。卡冈诺维奇晚年一直在整理自己的回忆录，直到他去世前尚未最后完成。卡冈诺维奇去世后，其家属发表了他的回忆录。在这断断续续的回忆中，卡冈诺维奇表达了他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看法，以及他所了解的当时的历史情况。这些材料无疑反映了他们这一代领导人中亲斯大林一派的政治立场和观点，因此是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

(本专题文件由杨存堂编辑和校注，
徐锦栋、高增训、秦岳翻译)

№04587

卡冈诺维奇请求重新工作给赫鲁晓夫的信

(1960年12月7日)

苏共中央：请将此文交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

尊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我身患重病，经过治疗，现已康复。我相信自己能工作，希望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重新投入具体实现党的政策和顺利完成宏伟的七年计划的工作中去。我想通过这封信请求中央委员会给我分配相当的工作。至于工作的性质，我想，中央委员会和你本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是了解我过去的工作经验的。给我在莫斯科的国家机关或生产部门安排一份工作想必不会特别困难。

我自己现在难以开口说出本人的愿望。当然，最好能按照惯例亲自同您谈一谈。

请你，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接见我。如果你有什么难处，请委托一名中央书记接见我。

致以共产主义敬礼

拉·莫·卡冈诺维奇

1960年12月7日

我的地址：莫斯科伏龙芝沿岸街50号，384号单元。

电话：Г-7-10-68

№04591

卡冈诺维奇在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上的发言

(不晚于1962年6月)

1. 同志们，你们已经知道问题的全过程，所以我简单谈一谈。由于“派别斗争”，决定把我，还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谢皮洛夫同志从中央委员会除名以后，我和上述同志一样，作为一名党员，仍然像共产党员应该做的那样，在准确和严格执行党中央的所有决议的基础上为共产主义的利益而工作。

2. 此后5年中，我作为一名普通党员，忠实地完成交给我的经济管理工作，积极履行党和社会工作职责，于1962年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谢皮洛夫一样被开除出党。

3. 由于根据我们的工作和党内表现不能对我们提出任何超过1957年中央全会决议中载明的新的罪名，因此指控我们参与了与在斯大林领导时期违反法律有关的活动。

4. 但是，同志们，二十大通过了关于违反法律的决议，仍然选举我、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谢皮洛夫为中央委员。此后，中央全会把我们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尽管当时就已经知道，在违反法律方面有罪的不只是斯大林一人，还有他的追随者——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们，其中包括同赫鲁晓夫、米高扬、什维尔尼克等人一样的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及马林科夫。

二十大以后，1957年6月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反党集团的决定”，把我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但是保留党籍，尽管当时也提到了我们为斯大林辩护。

5. 所以，重复过去的指控，今天又指控我们参与了导致把我和其他人开除出党的与所谓的“个人迷信”有关的活动，这些都是人为的，甚至是同把我们选进中央委员会的党的二十大相矛盾的。这还同把我们留在党内的 1957 年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相矛盾。没有什么新东西能够提供党以合法的理由将我、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开除出党。现在对我——卡冈诺维奇提起公诉的一切事实都是在我还没有被开除出党时已经知道的。如同在诉讼程序中所证实的那样，我在铁路运输部门工作时，条件十分艰难。列车颠覆和事故时有发生，其中大部分是破坏分子、间谍和托洛茨基分子制造的。同在其他部门和领域工作的其他人一样，我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揭露肇事者，追究其责任，惩办他们的帮凶。十分遗憾的是，一部分无辜的人受到了伤害。

请相信，我为此而感到十分难过，愿意为此承担罪责。但是必须回忆和了解当时的政治形势。那个时候，法西斯主义已作好对我们祖国发动战争的准备，它的第五纵队活动十分猖獗，尤其是在像铁路这种有决定性意义的领域里。所以我们不得不进行果断坚决和毫不留情的斗争。只要有关部门向我们出示了可信的证据，我们就同意逮捕犯罪分子。也有过诬告无辜者的现象，但是其中部分材料使我们相信他们有犯法行为，何况他们自己使我们有这样做的理由，特别是在后来他们自己承认有罪的情况下。

6. 当时的政治形势十分紧张。帝国主义国家，首先当然是希特勒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间谍活动尤为猖狂（例如，大量的日本间谍和其他间谍混在被解放了的诚实的中东铁路的劳动者中潜入我国）。这些情况要求我们特别提高警惕，思想敏锐，对破坏铁路发展和正常工作的活动作出迅速反应，以实际行动完成五年计划……并使国家作出反侵略的准备。

我应该告诉你们，尽管如此，交通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和作为

人民委员的我在表现出必要警惕性的同时，对仅根据抓到的敌人的诬告就向运输工作者提起公诉的作法没有予以同意。我对上级机关的许多材料和逮捕要求提出了异议，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在许多情况下同意我们的意见。我可以列出大量当时和后来在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担任领导职务的人的名字，由于我们的坚持，他们的领导位置原封不动，尽管有关部门上报了材料。

我说这些事不是为了表白自己有“功劳”，而是为了说明，除了有正确惩治犯罪分子和无辜者受害的事实以外，也有许多被防止了的惩治，或者如同他们自己后来对我说的那样，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所有这一切表明，当时的情况是复杂和困难的，并不是在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及其“第五队纵队”在苏联被粉碎和消灭的今天许多人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和轻松。所以今天我在对无辜受害者的家属表达自己的沉痛和同情的同时还要说：不要受个人感情的支配，而应该像政治上成熟的人那样看待问题。我们要查明所犯的严重错误和违反法律的问题，批评和揭露它们，采取措施不让今后重犯错误。同时不要让自己和其他人消沉下去，并且要求永远记住，今天我们面对的是同我们社会主义胜利毫不妥协的帝国主义者。他们磨刀霍霍，这是一把更加锐利的刀——对准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核武器。反动的美帝国主义及其盟国力图取代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主导力量的地位。它们不会放弃同我们的斗争，其中包括间谍活动和颠覆破坏活动。所以，我们在揭发和承认错误和缺点、承认自己有罪过并为之感到懊悔的同时，无论如何不能盲目乐观，不能采取超阶级和超政治的态度，丧失警惕。而应该随时准备同社会主义的敌人、同我们祖国的敌人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无论他们来自什么地方。我们应该永远牢记，我们面临着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完全彻底胜利而同敌人进行

的更巨大尖锐的斗争。

7. 同志们，请不要把我最近表达出来的这些思想视为我企图以此来偷换具体的个人错误。这里我补充说明，赫鲁晓夫也犯过类似错误。因为在卡冈诺维奇领导时期（当时我是莫斯科州委书记），担任莫斯科州党委、各区委和莫斯科市劳动者苏维埃领导职务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和党委成员还都健在，仍然工作，而在赫鲁晓夫担任州委领导人的时候却被逮捕。再比如说米高扬和什维尔尼克，要知道正是他们给莫斯科市委写信同意逮捕。被逮捕的人中不仅有担任领导职务的工作人员，还有部分委员会成员和自己的副职。有时不仅同意逮捕，而且根据莫斯科市委的指控材料请求逮捕。

不要以为我说这些事是要求把赫鲁晓夫、米高扬、什维尔尼克等人开除出党，甚至是为了在享受中央委员和主席团成员权利方面使我和他们平起平坐。我希望恢复我的党籍，我把自己献给党 50 多年，为了党的胜利我进行过坚持不懈的英勇斗争。我不想在这里介绍我的生平，你们都很了解，也知道我担任过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我只说，由于我顽强劳动、忘我地忠于和相信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和我们的党，使我从工人阶级的一员成长为党的担任领导职务的活动家。为了列宁主义的总路线，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为了各国人民的和平，为了社会主义和革命在世界所有国家取得胜利，我过去和现在始终同所有敌人进行斗争。

我还具备生活能力和工作能力，我希望以我的亲爱的列宁党党员的身份为共产主义事业做点工作和奋斗。因此我请求你们，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恢复我苏联共产党的党籍。

№11751

卡冈诺维奇请求恢复党籍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信

(1964年12月27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

1962年6月1日，我向党中央委员会请求重新审议苏共莫斯科市委关于把我开除出党的决定。

谨以这封信再次请求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恢复我在党的队伍中的资格。我在党内工作了将近50年，其中30年担任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我相信，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让我留在党内，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在我们的苏维埃国家实现建设共产主义的宏伟纲领而奋斗。

致以共产主义敬礼

拉·莫·卡冈诺维奇

1964年12月27日

№ 11752

卡冈诺维奇请求恢复党籍给勃列日涅夫的信

(1967年12月24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

我被开除出党已5年有余。在此期间我多次向党中央提出恢复我在党的队伍中资格请求：第一次是在1962年6月1日，第二次是1964年12月27日，第三次于1966年3月29日向第二十三次党的代表大会提出。

现在我再次向党的中央委员会提出迫切请求——恢复我在党的队伍中的资格。从1911年到1962年，我一直在党的队伍中为党的事业奋斗。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苏维埃国家成立50周年的大庆的日子即将到来。我曾经是一名为十月革命、苏维埃制度和社会主义胜利而奋斗的积极战士。

我知道，在我多年活动中除了有值得肯定之处以外也有错误。但是我要说，在党指派我工作和奋斗的所有地方，无论是在革命前的地下工作期间或是在1917年，无论是在准备和实现十月革命期间或是在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的前线，无论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和斗争中或是在30年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党和国家的工作中，我都为保证列宁的事业——我亲爱的党的事业取胜利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和全部生命，献出了自己的心血和革命热情。今天，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你们一道，同全体人民和我所出身的工人阶级一道，为50年来在党及其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取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

主义的伟大胜利而欢欣鼓舞和自豪。

我请求您并希望您给我提供机会，让我以苏联共产党党员的身分迎接十月革命50周年的喜庆节日。

致以共产主义敬礼

拉·莫·卡冈诺维奇

1967年12月24日

№04589

卡冈诺维奇要求澄清误解给米哈伊洛夫^①的信

(1969年3月24日)

我之所以给您写这封信是因为政治书籍出版社1969年出版的尤里·伊万诺夫所著的《小心：犹太复国主义》一书的第3部分第76页上写道：

“1914年6月16日，给戈麦尔市住在格涅拉利斯基街11号的拉·卡冈诺维奇寄去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1913年德国马克收入清单”。因为这跟我——拉扎尔·莫伊谢耶夫·卡冈诺维奇绝对没有任何干系，所以我自己并没有感到不安，更不用请求您了。

但遗憾的是，一些读者，特别是不了解我生平的年轻读者被这种姓和名的第一个字母巧合的现象搞得困惑不解。

如果他们了解我的历史，那么他们就可能知道，拉扎尔·莫伊谢耶夫·卡冈诺维奇在1914年没有住在戈麦尔。从少年时代到1915年，我一直在基辅市居住，没有出过远门。我在那里工作，并在基辅市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内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16年，我在叶卡捷琳堡工作，使用的姓是斯托马欣。之后在顿巴斯工作，使用的姓是科舍里维奇。当然，我积极反对过犹太复国主义，如同反对共产主义的一切敌人一样。

1917年8月，拉·莫·卡冈诺维奇第一次来到戈麦尔市，当时他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下属全俄军事组织部的成

^① 米哈伊洛夫，时任苏联国家出版委员会主席。

员。当年他还被选为波列斯克布尔什维克党委员会主席。

这些事实当然不能因为姓和名的第一个字偶然巧合而被抹杀。但是，为了不使某些读者因为姓名的这种巧合而迷惑不解，而主要是为了不给我们的敌人——犹太复国主义者用一个人的姓名进行投机的可能（这个人在30年中担任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主席团成员和苏联政府成员），必须予以必要的澄清。

请您，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能以出版社名义用这种澄清的方式，在一种刊物上和该书出版时进行。

致以共产主义敬礼

社会主义劳动英雄 拉扎尔·莫伊谢耶夫·卡冈诺维奇

1969年3月24日

№04590

卡冈诺维奇关于澄清误解问题 同索洛维约夫的通话记录

(1969年6月2日)

1969年6月2日，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索洛维约夫同志受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出版委员会主席米哈伊洛夫同志的委托给我打电话。

索洛维约夫同志说：“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我们就您给米哈伊洛夫同志来信中提出的问题同政治书籍出版社进行了研究后得出结论，不应当作任何解释，因为谁也没有因为姓名巧合问题来找过我们，任何解释只会引起对这个问题的注意。”

我回答说，事情可能会是这样的。我感谢您和米哈伊洛夫同志对我去信的回复，但是您电话中所说的话不能使我感到满意，尽管这确实同我没有关系。之所以不能仅限于简单的口头解释是因为，第一，年轻的读者可能有怀疑。第二，此书可能会再版。索洛维约夫说，预料不会再版。我于是说，再版可能是以后的事，甚至可能在我不在人世以后再版（要知道我年纪比你大）。

索洛维约夫说，但是我们该怎样进行解释呢？我回答说，你们的专业出版工作人员，应该比我更清楚。政治出版社和作者应该就他们引用事实不谨慎一事向米哈伊洛夫同志作出解释。卡冈诺维奇这个姓本身毕竟是很响亮的，他们为什么不写上这个人的父称？这段话可能摘自某一机构的档案资料，这个机构中可能就有过叫这个父称的人。索洛维约夫说，不会有这样的事。我回答他说，在这一

段话的同一页上，在这一段话之前一定会出现这个“活动家”的父称，甚至指出他的职业。

索洛维约夫说：“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写这本书的，因此无法对您讲。”谈话结束时我再次指出，感谢他和米哈伊洛夫同志给我电话答复。但是我请求寄来政治书籍出版社的书面解释。

№11753

卡冈诺维奇请求恢复党籍给勃列日涅夫的信

(1971年3月25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

现将我写给苏共二十四大主席团的一封信寄去并请您转交大会主席团。您知道，我给二十二大主席团寄去过这样的信（如果寄到了的话），但是我没有收到回复。

我恳请您，列昂尼德·伊里奇，多加帮助，这一次使我能收到对恢复我党员权利的请求的肯定答复。

致以共产主义敬礼

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

1971年3月25日

№11754

卡冈诺维奇请求恢复党籍给勃列日涅夫的信

(1976年2月19日)

尊敬的列昂尼德·伊里奇：

我不得不再一次因为一件难办的事——关于恢复我党员权利而打扰您。我给苏共二十五大主席团写了份请求报告并寄给了您。希望您不仅将信转交主席团，而且帮助我使这个问题得到明确解决。您，列昂尼德·伊里奇，是了解我的。多年来，我作为党和国家的一名担任领导职务的活动家，为党和国家的巩固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做过不少工作。

您是十分了解我的。因为我们是北高加索方面军和外高加索方面军的所谓的“同团战友”。在那里我们一道打过仗，在那里我为祖国、为党流过鲜血。在图阿普谢城下我负了伤，面对敌人进攻英勇固守。

我满意地回想起我们共同组织过小地登陆战役和您从小地写给我的一封信。说真的，我现在想起这些不是为了回忆而回忆，而是为了使您有可能回想起并提醒您注意我的活动中的又一个好的方面，并因此能尽快满足我的请求。

上了年纪的我在党外生活颇感苦闷，因为我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党。请您多加帮忙。

我相信，恢复我的党籍会给党和党的中央委员会带来好处。

致以同志式的敬礼

拉·莫·卡冈诺维奇

1976年2月19日

№11755

卡冈诺维奇请求恢复党籍 给苏共二十五大主席团的信

(1976年2月19日)

苏共二十五大主席团：

谨向你们提出极其恳切的请求——恢复我作为一名苏联共产党员的权利。我在党内工作过50年，其中35年担任中央委员，30年担任政治局委员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从少年时候起我就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生命交给了我的祖国、交给了亲爱的列宁的党。在多年的工作中我犯过错误，有过小错误和大错误。但是我请求在全面评价和解决问题时考虑到我曾经为党、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的利益做过大量有益的工作。我的多年的富有成果的党务和国务活动受到过党和国家最高机关的正式承认和高度评价。谨举出两个足以证明这一点的例子。

1943年1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我如下证书：

“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同志：

鉴于您在保证前线 and 国民经济运输事业中对国家的特殊功勋，以及在战时困难条件下恢复铁路运营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根据其1943年11月5日命令授予您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米·加里宁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书记 亚·戈尔金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943年11月20日”

当然，这一命令得到了中央政治局的同意。可以说这是发生在斯大林时期。但是，第二件事事实则是发生在1953年11月，当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是赫鲁晓夫。除了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萨布罗夫、别尔乌辛是老政治局委员以外，中央领导人中还有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柯西金、什维尔尼克等同志。

1953年11月22日，《真理报》发表了如下致敬电：

“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同志：

在您60岁生日之际，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对您，列宁的忠实学生和斯大林的战友，表示热烈祝贺。

苏联人民高度评价作为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杰出组织者和建设者之一的您所建立的功勋。

在党和国家的各个工作岗位上，您都以您特有的充沛精力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知识献给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事业。衷心祝愿您，我们的朋友和同志，我们亲爱的拉扎里·莫伊谢耶维奇，健康长寿。祝愿您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各族人民的幸福、为共产主义利益继续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苏联部长会议”

在同一天还发表了由伏罗希洛夫同志签名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由于对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杰出功勋”给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拉·莫·卡冈诺维奇同志授予列宁勋章的命令。

我列举这些事实绝对不是为了掩盖我的错误，而是为了强调我对你们的请求——考虑到得到党和政府领导机关正式承认的我的富有成效的工作。

我希望你们能考虑到这一点，并作出满足我坚决要求的决定。

我是全心全意的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为了实现这一思想政治信念，我应该像列宁要求的那样在党组织内工作。

恳请你们给我这种可能。不要在我晚年的时候把我排斥在党外，我把一生献给了我的亲爱的列宁党，并准备贡献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天。

致以共产主义敬礼

拉·莫·卡冈诺维奇

1976年2月19日

№11756

卡冈诺维奇请求恢复党籍给勃列日涅夫的信

(1981年2月11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收

尊敬的列昂尼德·伊里奇：

现寄去我写给苏共二十六大主席团的信。信中我再次请求恢复我在亲爱的党的党员队伍中的资格。我仍然等待您在这方面对我的帮助。

致以共产主义敬礼

拉·莫·卡冈诺维奇

1981年2月11日

No04588

卡冈诺维奇关于“侄子”来信 给苏联葛罗米柯的信

(1982年5月31日)

亲爱的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

为了件小事写信打搅您，此事属于您的管辖范围。

事情是这样的。纽约一位名叫卡冈—卡冈诺维奇的先生给我寄来了一封信。信中说，他去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申请发给他前往莫斯科的签证，大使馆“打算给予照顾……解决这个问题”。他说他之所以要来莫斯科是因为他是我的侄儿，想同我见面。

为了使大使馆的同志不致于产生错觉，我声明，我在美国没有什么名叫卡冈—卡冈诺维奇的侄儿。这个卡冈说什么他到过莫斯科，曾经来我这里，还同我商谈过他要出版一本关于我的书的事。他以这种愚蠢的谎言来“加固”自己的这种杜撰。据此可以判断，他至少是一个不值得任何信任的人物。所以，即便给他发了到莫斯科的签证，我也会像从来没有接待过他和至今没有见过他那样理所当然地不接待他。^①

① 一个叫做斯图亚特·卡冈的人在美国写了一本传记体的小说，中译本书名《克里姆林宫的狼》。作者称自己是卡冈诺维奇居住在美国的侄子，1981年曾到过苏联，在莫斯科见到了卡冈诺维奇。此书大部分材料是卡冈诺维奇提供的。卡冈诺维奇给葛罗米柯的这封信就是为否定这件事而写的。不过，在苏联时期这类否定往往真假难辨，读者只能认真考订上面提到的书，才好判断。

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教导我们要提高警惕性。

此致

共产主义敬礼

拉·莫·卡冈诺维奇敬礼

1982年5月31日

№11757

卡冈诺维奇请求恢复党籍给契尔年科的信

(1984年6月20日)

尊敬的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

现将我向中央委员会请求恢复我在党内资格的信寄出。

恳请您加多帮助，使这一决定我一生的问题得到认真解决。

拉·卡冈诺维奇

1984年6月20日

№ 11758

卡冈诺维奇请求恢复党籍给苏共中央的信

(1985年8月)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谨向你们提出请求——恢复我在党员队伍中的资格。我从1911年起就在苏联共产党内工作。

在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期间完成党的任务中，革命胜利后在领导党政工作中，我为了我所出身的无产阶级的胜利，为了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胜利，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忘我地进行革命斗争，献出了自己的所有的生命力和精力。

我认识到并且承认，在我多年的工作中有严重的错误和缺点。但是，这些错误不能也不应该使那些主要的东西黯然失色。在我的工作中，其中包括我进入中央政治局后的30年工作中，成绩是主要的。我希望委员会及其政治局在审查我的请求时考虑到这一点。并且考虑到，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和民族主义作斗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奋斗的忠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相信，中央委员会在恢复我在党内资格后会给我以机会，使我不仅成为一名具有先进思想的共产党员，而且成为在党的某一组织中积极工作的党员。我一定遵守党的纪律，认真履行列宁主义的党章规定的党员义务，为了党的团结而积极斗争，为了实现党及其中央委员会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问题，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思想进行斗争问题，根据党的总任务的

制定的内外政策问题，完善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准备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逐渐过渡问题的纲领和决议而努力奋斗。

再一次请求中央委员会给我在我亲爱的共产党的队伍中走完我的革命历程的机会。

致以共产主义敬礼

拉·莫·卡冈诺维奇

又及：前几天发表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关于庆祝苏联人民1941~1945伟大卫国战争胜利40周年的决定》。我作为1941年到1945年的国家国防委员会的成员，作为前线的直接参战者，加上我还在外高加索方面军的图阿普谢方向上受过伤，我自然而然地希望以一名享有充分权利的党员的身分庆祝这一战胜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节日，正是苏联共产党组织和保证了苏联人民及其光荣英雄的军队取得的这一伟大历史性胜利。

No 11759

卡冈诺维奇请求恢复党籍给戈尔巴乔夫的信

(1986年9月28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1985年8月，我给中央委员会寄去一封信，请求恢复我在苏联共产党队伍中的党员资格。我从1911年起就在党内工作，其中30年担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处在列宁党的队伍之外，我深感苦闷。我仍然完全保持着真正共产党员固有的科学乐观主义精神和最主要的东西——对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的忠诚。

尽管不在党的队伍之列，但是我从内心里在思想和政治上和党同呼吸共命运，为党所取得的成就而欢欣鼓舞，为党受到挫折和出现缺点而感到痛心。最近，我和全党一样对准备和召开具有高度思想理论水平的党的二十七大深感满意。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历史性和纲领性的重要政治决议。

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的决定对于执行代表大会的这些决议具有巨大意义。这些决定具体实际，充满革新和自我批评精神，提出党和无产阶级的要求，动员千百万劳动群众实现我们党的二十七大决议。我和全党同志一样相信，这必将使我们祖国的国力迅速强大，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取得新的伟大胜利。

亲爱的同志们，请给我机会，让我以我的亲爱的列宁党党员的

身份渡过余生，并为党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致以共产主义敬礼

拉·莫·卡冈诺维奇

1986年9月28日

附 录 卡冈诺维奇回忆录（部分内容）

卡冈诺维奇评赫鲁晓夫同外国外交官的谈话

在赫鲁晓夫同外国代表，其中包括同美国代表的谈话中说到了1957年6月发生的党内事件。^①他说：

——反党集团反对我和其他同志；

——反党集团反对我们的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

——这个集团由一些高傲自大的人组成；

——他们相信他们的名字不可能被勾销；

——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认为他们有无限的权力；

——是的，马林科夫已经不是“也做过不少好事的三个一把手”那样的人物；

——但是，他们落后于时代，不能正确认识形势，不能正确估计未来。

如果认真地分析一下赫鲁晓夫的这些断言，就可以清楚看出，

^① 根据南斯拉夫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一书说：赫鲁晓夫于1957年7月3日接见各国使节时，向他们介绍了苏共1957年六月会议的情况。

它们是多么地不真实和不正确。第一，反对的是赫鲁晓夫，而不是反对其他同志；不是一个集团反对，而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它的大多数人反对。第二，赫鲁晓夫说什么反对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这是谎言。恰恰相反，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大多数人正是为了实现列宁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才反对赫鲁晓夫对这一路线的歪曲。

赫鲁晓夫为了掩盖自己的歪曲，他把自己同中央委员会、同党混为一谈，把反对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大多数同小集团混为一谈，这是用小集团直接偷换主席团。

为了证实所采取的反对被称为反党集团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大多数成员的措施是正确的，赫鲁晓夫需要这种伪造。众所周知，列宁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团结》的决议中指出，反党派别活动的主要特征是有带有反党观点的特别纲领，形成有组织的、独立于党的机关之外的派别集团。这个集团有自己的反对中央委员会的纪律、自己的有组织的会议和宣传，等等。

不用说，在组成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大多数的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萨布罗夫、布尔加宁、别尔乌辛、谢皮洛夫这些人那里，没有任何与此相似的东西。过去和现在不仅没有任何纲领，也没有同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的观点相对立的任何观点。在会议上只是有过党规定的正常的争论。

列宁历来要求用文件和事实来证明所有口头上说的东西。但是，过去和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过什么文件和事实，能够用来证明赫鲁晓夫所说的上述同志中的什么人有过反党路线。与此相反，所有谈话、报告、记录，所有党交待他们完成的各项实际工作，都充满了列宁主义的内容，都是为了同他们有联系的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一道完成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赫鲁晓夫人为地“设计”了一个由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组成的

反党集团（他很少把也反对过赫鲁晓夫的伏罗希洛夫列入这一集团，这显然是出于战术上的考虑）。但是他无论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引用过一段引文和一份文件来证明这个集团有反党路线，这并非偶然。全党和苏联人民读过这些同志的报告和讲话，从他们的实际活动中了解到他们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所做的大量工作——执行历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包括二十大的决议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改进党政工作；提高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全体劳动者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消除违反革命法律的现象；实行列宁主义的党和苏维埃生活准则；缓和国际紧张气氛和为实现和平而斗争；加强我们祖国的防御能力。

这是一条团结的路线，这些工作是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是多年中由上述同志组成的中央主席团的工作。所以，赫鲁晓夫关于分裂和对抗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杜撰是荒谬绝伦的。不言而喻，这些同志有过错误，因此赫鲁晓夫在同外国人的谈话中不得不承认，这些同志也做过不少好事。

赫鲁晓夫说，这个“集团”是由一些高傲自大的人组成的，这是拙劣的花招，想嫁祸于人，把他自己受到指责的东西转嫁到别人身上（正是他，赫鲁晓夫，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中被指责骄傲自大）。赫鲁晓夫还说，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马林科夫认为他们有无限的权力，相信他们名字不可能被勾销。但是，正是他，赫鲁晓夫，自命为有无限权力的人，并开始蔑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包括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和其他人，终于使自己的进攻一直进行到取得最后的“胜利”。他说反党集团有无限的权力正是为了替自己的侵犯性辩护。

赫鲁晓夫在毫无根据地说存在集团的时候，无耻地故意回避一个事实：在主席团的一次会议上（在中央全会之前），马林科夫、

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对他进行批评以后，赫鲁晓夫对主席团成员，包括上述同志的批评表示感谢，并且答应改正自己的错误和缺点。

十分清楚，赫鲁晓夫编造“反党集团”的神话是为了替他的非列宁主义领导方法、拼凑派别集团和滑向机会主义辩解。

赫鲁晓夫以替“反党集团”编造“纲领”的手法企图使他对同志们的指控具有普遍原则的政治性质。说完了“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做过不少好事”这句话以后，他当即以一段冗长的话进行违背历史事实的总结。赫鲁晓夫无视历史事实就宣布了自己的“判决”。

历史使我们知道，上述同志之所以与众不同，首先是因为他们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不认为革命的辩证法是要滑头，不是社会上说的那种见风使舵。他们未从列宁主义滑向托洛茨基主义，而赫鲁晓夫在20年代上半期就曾经滑向托洛茨基主义。

我不想说赫鲁晓夫向来和在各方面对抗列宁主义的路线。但是他很像一名滑稽演员（尽管不是在准确含义上讲的真正的滑稽演员），很像一个不老练的共产党员，极力想让大家承认他是个“革新家”，虽说这种革新往往只不过是倒进蜂蜜桶里的一勺煤焦油。他把自己的赫鲁晓夫式的一勺煤焦油倒进了他认准的蜂蜜桶里，坏掉了一桶蜜，何况他经常倒进一大勺。他历来喜欢“咕嘟”点什么，以示与众不同。

斯大林并没有察觉，他身边的“尼基塔”也要“咕嘟”他。斯大林一死，“尼基塔”就开始“咕嘟”他，其程度远远超过那个用斧头凿冰窟窿的奥帕纳斯。

在乌克兰流传着一则故事，说的是有一个“极其聪明的人”，名叫奥纳帕斯，此人专玩新花招。这一天夜里，他唤醒妻子说：“坦卡，快起床，我又想出一个新花招了。要是去镇上买把斧头，

到河面上凿个冰窟窿，把斧子打进去，咕嘟一声响，那准会使全村的人大吃一惊。”顺便说一下，赫鲁晓夫自己曾经把这个故事讲给斯大林听。这以后斯大林经常在见到赫鲁晓夫走进来时说：“喂，尼基塔，你说，你今天要‘咕嘟’点什么。”赫鲁晓夫经常用他的“咕嘟点新花招”来“款待”中央委员会，有时甚至得逞。但是大部分没有成功，讨人嫌。可以举出不少事实说明，主席团的成员，其中包括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等等，经常同值得怀疑的建议——“新发明”进行争论。但是，遗憾的是，有一部分“新发明”被通过了。例如，赫鲁晓夫关于“轮作”的新发明，它取代了威廉斯关于轮作会使我国的农业付出高昂代价的著名理论。

就是赫鲁晓夫赞成的那些好事，也常常由于他的过火行动导致产生不良后果（例如玉米）。在这方面，他当然不是什么革新家。赫鲁晓夫的功劳在于，他正确地着重强调了这一重要任务。但是，他要求什么地方都种玉米，达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破坏了在有利和可能地的地方推广播种玉米的工作。遗憾的是，现在玉米不是无人照管，就是生长在不应该生长的土壤中，白白忙乎一阵。

在同外国人的那些谈话中，赫鲁晓夫接着谈到了斯大林和与此有关的他所设计的“反党集团”的指控。

赫鲁晓夫说：“我们说，斯大林时期有的，不能够也不应该继续有。他们（指集团）回答说，过去有的，将来也会有。我们说，过去有的，将来不会再有，这时他们就说，我们要收拾你们。而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逮捕了并收拾了他们自己。”

赫鲁晓夫就是这样，自以为具备牲口贩子说俏皮话的本领，实际上却对事情进行了外行、肤浅、可鄙的描述，使用了庸俗粗野的、充满小市民低级趣味的资产阶级讽刺小品的文体和口吻和盘托出。当然，最主要的是，这是谎言。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首先是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布尔加宁，他们说，应该清除管理方法和管理体制中的弊病，首先是清除无法无天的行为和对无辜的人的镇压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取消斯大林时期一切值得肯定的好的东西。因为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完成了许多伟大的、革命的创造性事业：同革命的、苏维埃政权国内外敌人进行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完成了几个伟大的五年计划，它们被人民称作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文化科学巨大发展和人民物质福利得到提高的“斯大林式的五年计划”。亿万人民遵照列宁的遗训，在党的领导下英勇劳动，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所有这些成绩和成就，在斯大林的直接领导下保证并取得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战胜希特勒法西斯帝国主义的卫国战争的胜利。战后，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的领导下立下了仅次于军功的另一功勋——恢复被极度破坏的经济、城市和村庄；战后的五年计划为我们祖国在新技术基础上使经济得到新的巨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要知道原子弹（它过去和现在都是对美帝国主义原子——核威胁的最好回答）也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之下由我国的工人、科学家和工程师研制成功的。但是，在取得伟大的值得肯定的成绩的同时，也有违法和应该否定的东西——错误、缺点和缺乏法制，党已经对这些进行了谴责。但是，并非斯大林时期的一切、包括伟大的值得肯定的成绩都要否定。这样做只会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敌人，使资产阶级可以轻易地对我们党、对苏联、对社会主义发动新的进攻。

赫鲁晓夫抛弃了斯大林时期的一切东西，无意中帮助敌人对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通过努力取得的一切珍贵的东西发动进攻。

是的，人民、工人、党和担任领导职务的工作人员看到了并勇敢地批评错误、缺点和违法行为。但是，他们不允许对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时期创造的一切伟大的东西进行偷换和破坏。不要忘记，人民、党、老战士和老职工们，他们不是数典忘祖的人。他们清楚

地记得，我们英雄的战士们高呼着“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的雄壮口号、冒着生命危险冲向希特勒分子。

斯大林有严重的错误和缺点，为此党和人民群众批评他，批评斯大林时期的其他领导人。但是他们在批评的同时不允许任何人侮辱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的其他领导人，不允许抛弃苏联人如此珍惜的一切——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成就。斯大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利益、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而进行斗争。

许多过火行为，镇压和违法行为是苏联人民的国内外敌人进行的尖锐斗争引起的。在同他们的斗争中犯过严重的错误，使一些无辜者受到迫害。但是，在这方面有罪过的并非斯大一个人。今天的斯大林的揭发者们不要那么轻率肤浅，那么理直气壮，那么自吹自擂，去讨好赫鲁晓夫和米高扬。他们听到赞扬声当然会沾沾自喜，同时闭口不谈自己对此所应负的罪责。就是这个今天扮演大恩人的赫鲁晓夫在党的十七大上说：“阶级斗争并没有停止，所以我们应该……动员全党的力量、工人阶级的力量、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彻底消灭想阻止我们继续胜利前进的阶级敌人、所有右的和“左”的残余和各种各样的其他机会主义者。”

赫鲁晓夫和我们大家一样，也支持过对“人民的敌人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进行镇压的措施。可以允许在新的条件下按照新的方式发表讲话，但是，第一，讲话要有分寸。不能抛弃和偷换斯大林为党和我们伟大祖国做出的一切伟大的值得肯定的成绩。第二，不能拿错误作投机，吹嘘自己的“勇敢精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自己排除在斯大林周围的人（他们当然要负应有的责任）之外。

应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科学历史的观点和态度对待党和苏联人民同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国内外敌人进行的斗争，揭发错

误和违法行为，汲取教训。在同真正的敌人斗争的同时，确实有一些无辜的人受到伤害。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正是这样做的。根据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建议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对所有被镇压的人的案件进行研究和调查，以便实行大赦并做出普遍的结论，并向主席团和专门召集的中央全会报告。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认为，不仅要深刻地、有政治原则性地揭发事实，而且要把过去的所有不良行为向党和人民作出解释，并且不容许今后再发生。在二十大以后，1956年6月26日通过了中央委员会《关于克服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详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报告。这一报告得到了一致的通过，其中包括得到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米高扬、别尔乌辛、萨布罗夫等人的通过。这一决定把整个问题提到了思想政治的高度上，给解释过去的错误、消除这些错误、防止今后重犯这些错误、加强苏维埃国家的国力和党的团结的工作注入了活力。

斯大林天才地、忘我地把马克思和列宁的事业继续进行下去。正是由于他忠诚于马克思和列宁的天才学说和战略，斯大林才成为苏联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阶级敌人及其走狗攻击我们的党，攻击伟大的苏联人民，说什么千百万人民由于害怕才赞颂斯大林。无限忠于祖国及其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工人阶级、集体农庄农民、苏联知识分子，其中包括苏联科学家，感觉到并且深信，由于党、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的领导和坚持列宁主义路线，苏维埃制度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才得以保持和巩固，社会主义才能向着共产主义的胜利继续推进。

即使是没有读过多卷本历史书籍的人也十分了解并且记得，我国人民在列宁领导下为了创造新生活而进行艰难浴血斗争的主要阶段，以及斯大林在这一斗争中的作用。

在党的全部历史中，斯大林不愧是列宁的忠实学生和战友，无论是在沙皇时期的艰苦地下工作年代，在工人同资本家、农民同地主斗争年代，或是在同沙皇当局、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民族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形形色色破坏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力量的机会主义者进行奋不顾身的革命斗争年代。

在沙皇政府被推翻后同把列宁赶入地下的资产阶级政府进行斗争中，斯大林代替列宁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并同斯维尔德洛夫及其他人一道领导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工作的。十月革命在列宁的天才领导下依靠工人和士兵取得了胜利。

在国内战争艰难年代，斯大林作为许多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多次被中央委员会派到所有的主要方面军。党和人民了解他在战胜邓尼金、尤登尼奇和高尔察克中的重要作用。

国内战争在我们天才的列宁领导下最终取得胜利以后，斯大林作为劳动和国防委员会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人民委员、民族事务委员会人民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帮助列宁制定和实施新经济政策，完成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的新的艰难任务，领导党同重新抬头的托洛茨基主义和其他反对派进行斗争。这些反对派是有组织的力量，他们有反对中央、反对列宁的政治纲领，使党面临分裂。列宁在斯大林的帮助下防止了党的解体。

在我们的领袖、党的缔造者列宁去世的最严重的时刻，斯大林成为一名把党、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的大多数团结在他的周围、继续执行列宁的政策并完成列宁遗训的政治局委员。人民和党难道会忘记由斯大林在我们爱戴的、死去的导师、党的父亲——列宁的灵柩旁亲口宣读的伟大的誓词？这一誓词在许多年中成为千百万人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列宁缔造的苏维埃多民族国家——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进行的英勇劳动和斗争的神圣义务。

列宁去世以后，党面临新的巨大危险——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对派分子，同他们联合起来的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加米涅夫分子，之后是怂恿党放弃社会主义建设的右倾分子——李可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他们对新经济政策的本质进行种种右的和“左”的解释，实际上鼓吹扩大新经济政策的范围——发展资产阶级关系并将其扩大到外国资产阶级。这意味着葬送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所有成果。

列宁由于有巨大的威望，因此他能够轻松地对付敌视社会主义的所有“左”、右倾分子。失去了列宁，党、社会主义和苏维埃政权本身的存在的安全加深。在此关键时刻，政治局委员中斯大林脱颖而出，对于党来讲这是巨大的福运。尽管斯大林有缺点，但是他的优秀品质是主要的。他的理论、思想原则的坚定性，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对列宁的战略战术的深刻认识和理解，组织天才，善于在思想和行动的基础上团结人，这些优秀品质受到党、人民、中央委员会的承认，使他成为同党的核心一道领导列宁的事业、实现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遗训的领导人。

但是，列宁不在世推行列宁的政策遇到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对派分子的抵抗要比列宁在世时多得多。列宁的政策遭到敌人激烈反对，他们首先攻击中央委员会，攻击斯大林和团结在他的周围的列宁主义核心——老布尔什维克。从党的历史可以知道托洛茨基分子之流在这场斗争中施展的派别活动与阴谋诡计。但是，他们遭到了列宁事业当之无愧的继承者斯大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列宁主义领导的坚决抵制。党终于胜利了。

敌人和造谣中伤者把这场斗争描绘成简单庸俗的个人权力之争，这是赤裸裸的谎言。实际上，这场斗争是为了捍卫社会主义，捍卫国际主义，反对国家和党本身资产阶级化，为了捍卫无产阶级和列宁的老近卫军的主导作用，为了加强党及其社会成分，确保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资本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和富农分子的斗争

取得胜利，为了社会主义在各条战线取得胜利，为了巩固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的国际地位，为了巩固我们列宁党在世界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国际主义地位。斗争是复杂和尖锐的。斯大林沉着坚定地反击托洛茨基分子的进攻。有人造谣诬蔑说，斯大林只是由于采用了行政措施和“速成的办法”才“镇压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对派分子”。恰恰相反，斯大林，整个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思想原则斗争，希望他们即使不是大部分也有一部分退却。要知道，党和中央委员会在对反对派采取国家措施、镇压行动、直至司法程序和枪决之前，同反对派耐心地斗争了15年，这是事实。只是在反对派开始从事破坏活动、恐怖活动，甚至间谍活动之后才不得不采取行动。在他们被完全揭发之前，他们甚至在会议上公开发表讲演（我至今还记得索科利尼科夫等人在1934年莫斯科党的会议上发表讲话的情景）。进行反对派活动的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在好几年中依然担任政治局委员，直到1927年他们在庆祝十月革命10周年时公开组织反政府示威游行为止。这也是事实。我还记得，当我们这些比较年轻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例如卡冈诺维奇、基洛夫、米高扬，问斯大林说，为什么他能容忍把他们留在政治局里时，斯大林回答我们说：“这种事不能着急。首先，他们还老成稳重，还不至于让我们非得采取极端措施开除他们。其次，应该让全党理解开除的必要性。”

经受了失去列宁的悲痛，并在消除经济崩溃条件下克服生活困难的党、工人阶级、革命人民群众亲眼看到，以斯大林为首的党当之无愧、始终如一地继续列宁的事业，率领他们奋不顾身地进行恢复被破坏的经济的英雄主义劳动，实现列宁的国家电气化、工业化、集体化的宏伟计划，以便在受资本主义包围的我们苏维埃国家顺利建设社会主义。

工人阶级、革命农民、苏联知识分子看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这

些伟大任务是在同国外的帝国主义敌对势力、同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滋生的资产阶级的国内势力进行艰苦斗争中实现的。资产阶级依然寄希望于在俄罗斯、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他们采取了孤注一掷的措施，恢复强盗行径，进行间谍活动，组织破坏活动，进行恐怖活动和其他类似的反对苏联的反革命活动。

在这一同苏维埃国家和党进行的斗争中，他们得到了部分对抗社会主义建设的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力量的帮助。

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到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认识到，所有这一切不仅在反革命的孟什维主义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政治里有所反映，而且在以孟什维克式的托洛茨基主义为代表的我们党的内部也有所反映。同他们相勾结的有季诺维也夫分子、加米涅夫分子以及其他反对派小集团。这些反对派小集团打着假的旗帜，但是有响亮的名称，例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主义”，后来干脆不用任何伪装的名称（例如事实上右倾的富农的布哈林—李可夫反对派）。同这些小集团和反对派作斗争比同直接的孟什维主义和社会革命党人作斗争要更加困难。因为，第一，他们在党内。第二，他们中有诚实的、只不过偏离了列宁主义的人。但是，无论同列宁主义的故意的、积极的敌人作斗争，或者同他们的无意的帮凶作斗争，都是历史的必要。工人和革命人民懂得这一点，因此他们在这—斗争中支持党，支持党中央委员会，支持斯大林。

这是同准备对苏维埃国家发动战争的在德国上台的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第五纵队”的斗争。今天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理直气壮地说，这场政治斗争和“第五纵队”在苏联被消灭对卫国战争中战胜人类的敌人——德国法西斯主义有着最巨大的历史作用。

党和苏联各族人民以其革命的阶级本能和祖国爱国者及革命国际主义者的觉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这—艰难的斗争中支持中央委员会和以斯大林为首的政府。

阶级敌人，特别是卖身投靠帝国主义的走狗诬蔑说，所有这些敌视社会主义的匪帮、间谍和破坏分子都是斯大林为了歼灭他的私敌而凭空想象出来的。这是帝国主义者的意识形态颠覆。

遗憾的是，那些“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揭发者们”尽管不是故意的，但实际上帮帝国主义的忙。他们不是对存在的错误进行诚恳的党的批评，而是按照小资产阶级的一贯作法，投机取巧，大造声势，在我们党和群众中掀起蛊惑人心的宣传运动。他们无视当时的历史条件——同苏联的敌人进行斗争的尖锐性。他们把这场斗争中出现反常和错误的所有原因都推到斯大林身上，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品质不好。他们忽视了主要的东西——这场斗争的客观历史必要性（遗憾的是，也有主观性的原因）。这不仅是斯大林，而且也指斯大林时期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其他领导人，其中包括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等，还有今天以“无辜”的揭发英雄角色自居的那些人——赫鲁晓夫、米高扬、什维尔尼克等。

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等人大概也不否定斯大林的错误。但是，他们有别于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米高扬、什维尔尼克。他们认为，在斯大林一生的革命历史和党的活动中，伟大的、正面的东西居主流地位。他们认为，天才的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在长达30年中领导党和苏联各族人民的伟大的、真实的而不是人为鼓吹的历史活动的经验和教训，这是党的巨大资本。它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全部经验一样，不仅是历史的巨大资本，而且是现实的巨大资本。不能放肆地、以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对待这一巨大资本——斯大林的经验。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老布尔什维克们说，我们应该批评，并且不允许今后再出现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的领导人由于客观和主观原因发生的所有不良的现象。这些现象对于我们在通向共产主义的道

路上继续前进是有害的。但是我们不应该抛弃斯大林的伟大经验和我们大家的经验，不应该舍弃同国内外敌人（他们还可能出现）进行斗争的经验教训，不应该重复已经被粉碎的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及其“第五纵队”（他们还可能复活）的教训。斯大林及其伟大的经验属于党，属于苏维埃国家，属于苏联人民及其先锋队——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在我们苏维埃国家的现代条件下保持着并应该保持其领导作用。

谁也无法从我们这里夺走斯大林。我们深深地爱戴他、尊敬他，我们曾经以致敬信向他表示自己的忠诚和爱心（其中包括发自乌克兰的那封赫鲁晓夫参加起草的题为《我的父亲斯大林》的致敬信）。

谁也不能把伟大的斯大林从苏联各族人民和党的伟大斗争历史中抹掉。斯大林是列宁的天才战友，党和苏联各族人民公认的伟大领袖，苏联军队的统帅，世界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理论家和实践家。我们在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和不让这些错误重演的同时，要用他为共产主义胜利进行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来武装我们的祖国和我们的党。

卡冈诺维奇论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决定

现已查明，苏共二十大的决议受到了党、苏联人民以及兄弟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热烈支持。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强调指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敌人把火力集中在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讲过的缺点上，中央委员会首先对党的敌人实施了意识形态打击。资本主义的思想家们为了削弱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伟大爱国主义力量，采用了形形色色的阴谋诡计来转移劳动者对社会主义世界向人类提出的先进的、有鼓舞感召力的思想。

中央委员会指出，最近在资产阶级的报刊上掀起了一场广泛的诽谤性的反苏运动。反动派集团企图利用与苏联共产党谴责斯大林个人迷信有关的某些事实作为掀起这场运动的口实。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在展开诽谤运动时，试图再度徒劳地怀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思想，破坏劳动者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信任，在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队伍中制造恐慌。中央委员会指出，历史经验教导我们，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总是企图利用有利于他们的事实和时机来破坏国际主义团结和分裂国际工人运动。中央委员会查明，兄弟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及时认清了社会主义的敌人的这一手腕，并给予了应有的回击。

中央委员会同时强调指出，我们的某些国外朋友最终没有搞清个人迷信问题及其后果，有时对与个人迷信有关的某些问题进行了不正确的解释。无视这一情况是不对的。应该说，我们的不少党员，其中包括部分中央委员，也有这种不正确解释的行为。

中央委员会在其决定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的作用、党和某些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关于政治领导人不管其功劳多大也不许搞个人迷信的原则，对个人迷信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解释。

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按照中央委员会的倡议，认为有必要勇敢和公开地讲述个人迷信的严重后果，讲述斯大林在后期所犯的严重错误，号召全党共同努力消除个人迷信引起的一切后果，表现出我们党具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所没有的力量和坚固性。

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说：“党……的出发点，如果说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讲话会引起某些暂时的困难，那么在将来，从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最终目标的观点看，这将收到巨大的良好结果。从而为今后在我们党和国家不可能产生类似个人迷信的现象，为今后在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策的基础上、在开展党内民主的条件下、

在千百万劳动者积极的创造性参与下，在苏联民主全面发展的条件下对党和国家实行集体领导提供可靠的保障。”

作为对二十大上所讲的内容的补充，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中强调指出了斯大林在党的斗争中、在取得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在苏联人民建立的世界历史性功勋中的功劳。“在头几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党和人民的紧张工作和英勇奋斗，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实现巨大飞跃。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永远消灭了失业。国家发生了最深刻的文化革命。长期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约·维·斯大林同其他担任领导职务的活动家一道为贯彻列宁的遗训进行了积极斗争。他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个理论家和卓越的组织者，他率领党进行了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和反对资本主义包围阴谋的斗争。在这场政治和思想斗争中，斯大林赢得了巨大威望和声誉。但是，把我们的所有胜利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是不正确的。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取得的胜利、对斯大林的赞颂使她头脑发昏。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形成的。”

6月30日的中央委员会决定的最重要之处在于，中央委员会把斯大林的活动同进行对敌斗争和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紧密联系起来考虑。这一点所有的人都应该知道和永远牢记，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中央委员会在其决定中指出，苏维埃国家是为人类开辟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惟一国家，她好比一座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要塞。

1918~1920年14个国家武装干涉失败以后，苏维埃国家的西方和东方敌人继续准备反对苏联的新的“十字军远征”。敌人向苏联派遣了大量间谍分子和破坏分子，千方百计破坏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33年法西斯主义在德国上台，宣布其目标是消灭

共产主义，消灭苏联——世界上第一个劳动人民的国家。苏联面临帝国主义侵略的新的威胁。

对于受到国际反动势力积极支持的所谓的《反共产国际协定》和“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大家都记忆犹新。在新的战争威胁日益迫近、苏联不止一次提出的关于抑制法西斯主义并组织集体安全的建议遭到拒绝的情况下，苏维埃国家被迫竭尽全力巩固国防，同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阴谋展开斗争。面对国外的敌人，党应当以时刻警惕和动员准备的精神教育全体人民。

国际反动势力的阴谋之所以危险，还因为国内长期存在激烈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列宁去世以后，敌对派别——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活动猖獗，他们坚持放弃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列宁主义理论的立场，实际上要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党同这些列宁主义的敌人展开了无情斗争。共产党为了完成列宁的遗训，选择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进行文化革命的方针。中央委员会强调指出，为了在一个国家，也就是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我们的苏维埃祖国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最艰难、最伟大的任务，我们的共产党不得不克服许多难以置信的特殊困难。我们必须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在最短的时间（10年）内消灭长期的落后，并在新的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国民经济。这种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要求我们要有铁的纪律，不断提高警惕性，要严格的集中领导，这一切不可能不对某些民主形式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在同整个帝国主义世界进行残酷的斗争中，我们的国家不得不对民主实行某些限制。这一点已经被我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逻辑所证实。中央委员会在其决定中解释说，党和人民把当时的这些限制看作是临时性的，随着苏维埃国家的巩固，民主力量的壮大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这些限制必将予以取

消。“人民自觉地作出这种临时牺牲，因为他们看到苏维埃社会制度的新成就与日俱增”。中央委员会强调指出，苏联人民克服了摆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在自己的共产党领导下勇往直前，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列宁主义的总路线。中央委员会说：“苏联人民了解斯大林，知道他是一个一贯捍卫苏联免遭敌人暗算，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人。在这场斗争中，他有时使用了不恰当的方法，违反了列宁主义的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这就是斯大林悲剧之所在。这一切也给反对违法行为的斗争造成了困难，因为在个人迷信的环境下，社会主义建设和巩固苏联所取得的胜利被认为是斯大林一人的功劳。”

为什么集中在中央委员会的列宁主义的领导核心没有公开反对斯大林呢？对于这个问题中央委员会回答说：“在当时的那些条件下，任何反对他的话都不会被人民所理解，事情完全不在于缺乏个人勇气。显而易见，谁要是在这种环境下反对斯大林，他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何况在当时的条件下反对他就会被认为是反对社会主义事业，被认为是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下对党和国家的团结极其危险的破坏行为。再说，苏联劳动人民在自己的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胜利使每一个苏联人从内心里感到理所当然的自豪，并造成了某些错误和缺点与巨大胜利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气氛，认为这些错误的不良后果可以用党和苏联社会不断增长的巨大生命力得到迅速弥补”。

错误和违法行为确实存在，但是并非只是斯大林一人有过错。我们每个人，每个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其中包括赫鲁晓夫，都各有各的过错。但是赫鲁晓夫非但不承认自己有过错，反而对斯大林的过错进行津津有味的夸大，以文学的形式进行编造臆想，用斯大林的错误和专横事实进行投机，有意无意地为敌人提供了败坏对苏联人民和国际无产阶级有伟大功劳的斯大林的名声，使

我们的党和整个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蒙受耻辱。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你们在二十大上没有对此进行干预？”可以对上面说过的话作出主要补充：我们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要的布尔什维克和列宁主义的核心，关心的是主要任务——保持党和中央委员会的团结。这决定了我们必须持谨慎态度。要我说是过于软弱，这表现在对中央委员会报告的某些论点的批评上，找不出应有的、更为正确的措词，尤其是在第6部分。这决定了我们在代表大会上没有就追加的、突如其来的《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发表我们的看法。我们每个人都担心这样作会破坏党和中央委员会的团结。当然可以批评我们的这种行为，但这是迫不得已的行为，因为我们关心的主要东西是保持党和中央委员会的团结。还有，许多年中我们一直是反对进行派别活动的列宁主义战士。作为领导集体——政治局的成员，除了官方联系以外我们从来没有在个别或私下谈论过政治局的问题。无论是在二十大上或是在后来的年代里，我们都忠诚于十大关于保持党的团结和不许搞派别活动的列宁主义决议。赫鲁晓夫利用了我们不搞派别活动这一点，而自己却实际上建立了自己的一派，成为背着正式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一个有组织的中心。这表现在，例如，不经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集体讨论，或者在二十大后甚至不给任何主席团成员打招呼，就采取了“推倒”死去的斯大林、毁灭斯大林的所有雕像和纪念像（其中一些是有很高价值的艺术品）的“英雄”壮举。命令是在对一些主席团成员（包括对我）保密的情况下发出的。大概，那些毁灭行动的拥护者不在此列。还有，把图书馆里的斯大林的书没收，把其中大部分销毁，其中包括《论列宁主义基础》这样的奠基性经典著作。

最后，把斯大林的灵柩“夜间”从陵墓中移出——也没有经过讨论，甚至没有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大部分成员打招呼。

敌对分子和持不同政见分子可能会对赫鲁晓夫的“灵活性”大

加赞扬。但是，这不是他灵活和我们不灵活的问题。这只不过是在20年代就是个托洛茨基分子的赫鲁晓夫托洛茨基主义的故态复萌。

如果说以前我们觉得没有必要提起赫鲁晓夫过去所造下的托洛茨基主义罪孽和斯大林原谅过他，那么今天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从他对死去的斯大林的过火行为和作法中，可以看出和说明他过去的托洛茨基主义罪孽和托洛茨基式复仇心理的残余。

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有必要克服所谓的“个人迷信”，克服过去有过的错误及其后果。但不需要像赫鲁晓夫那样，在自己的“特别”报告中耸人听闻地进行小市民式的资产阶级的大喊大叫，声嘶力竭地强调自己在这方面的臭名昭著的作用。在列宁主义党性和列宁主义的党的生活范围内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用不着小市民式的大声渲染，不给党和国家造成损害。

中央委员会关于个人迷信的决定并非尽善尽美，对此不能估价过高。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它在对个人迷信进行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阶级的解释方面，在帮助党员、工人阶级和劳动者更深刻、更正确地理解个人迷信问题及其造成危害的本质方面，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这必然对其他国家的兄弟党有良好的影响。这一点在今天尤为重要，因为如同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中所正确指出的那样：“最近，资产阶级的报刊掀起一场广泛的、极尽诬蔑之能事的反苏运动。反动集团企图利用与苏联共产党谴责斯大林个人迷信有关的某些事实作为反苏运动的借口”。

直到现在（70~80年代），反苏分子、反共分子、帝国主义的走狗继续利用“约·维·斯大林个人迷信”问题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威望和国力，讨好帝国主义和战争贩子。敌人将其“火力”集中在攻击基础的基础——为社会主义胜利而斗争和整个无产阶级政权制度上。

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辩护士们把自己装扮成“人道主义者”，而他们自己则同时支持资产阶级剥削者对工人的野蛮专横和对各国人民的血腥镇压。他们利用批评我们的错误作为破坏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捍卫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作为破坏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借口。

无产阶级革命者应该永远懂得，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武装干涉、阴谋和颠覆破坏活动才迫使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党采取必要的极端的斗争措施。也就是在这场斗争中犯下了错误和过失。不认识、理解、考虑和接受那场十分激烈，难以置信的艰难斗争的历史事实，就不能正确理解所犯的 error。俄罗斯千百万工人、农民、劳动者在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同不仅得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帮助、而且得到了我们队伍中蜕化变质的狂妄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帮助的国内的外国帝国主义分子、武装干涉者、白匪、反革命分子、阴谋家、间谍、破坏分子进行艰难的斗争。不能以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曾经是党员为借口来袒护他们。要知道连孟什维克也曾经是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可是经过 10~12 年、40 年后变成了反革命分子。

这是一场拯救革命、拯救社会主义和苏维埃国家的斗争。在这场同真正敌人的斗争中，有过过火行为、错误和滥用权力。党谴责了这些行为并采取措施防止今后重演。

斯大林是反对沙皇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及其走狗、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捍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了十月革命、苏维埃国家的胜利，为了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为了在卫国战争中粉碎法西斯侵略者的战士。在总结斯大林的生活和活动时，首先必须不重复帝国主义的中伤和谣言，以革命的、科学的、党的、列宁主义的态度对正反两方面都作出应有的评价。

不要用资产阶级的大喊大叫，不要耸人听闻，不要过分夸张，不能用错误和缺点来偷换斯大林为党、人民和国家所立下的所有历史丰功伟绩。

卡冈诺维奇谈赫鲁晓夫的个人品质

我认为有必要回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有些同志经常向我提起，有的甚至为此而批评我，说我多年来一直是提拔赫鲁晓夫的主要人物之一。

我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一名书记，分管干部工作，也提拔了许多能干的人，特别是从工人中间。赫鲁晓夫的问题是这样：1925年，我以重新当选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身份，从哈尔科夫来到我们的工业中心顿巴斯，首先来到尤佐夫卡，革命前我在那儿的地下组织工作过。我参观了许多矿井、工厂、农村和地区之后，参加了州党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大会代表赫鲁晓夫同志来找我。他对我说：“您不认识我，可我认识您。1917年，您化名科舍罗维奇同志……到我们这里来过。我有一个个人问题想找您谈谈。我在这里工作很困难。原因是1923~1924年期间，我支持过托洛茨基分子的发言，但到1924年年底，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承认了，我甚至被选为区委书记。但他们对我总是揪住不放，特别是州委的莫依谢延科同志。我们代表团推举我参加大会主席团，让他们给顶了回去。看来，他们不会在这里给我分配工作了。我请求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帮个忙，把我调到别的地方。”

赫鲁晓夫给我留下了好印象。我喜欢他能坦率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清醒地估计到自己面临的处境。我答应回到哈尔科夫之后考虑他的工作调动问题。此后不久，我的助手向我报告说，从顿巴斯来的赫鲁晓夫同志直接从火车站打来电话，要求您接见他。我说，

那就让他来吧，我马上接见。我还记得他非常感谢我立即接见了。他说：“我还以为得等很长时间呢。”

我发现他脸色苍白，就问：“您大概直接从火车站来。还饿着肚子吧？”他笑着告诉我：“看来您猜对了，我真的好久没有吃东西了。”“哪您就先吃饭吧。随后我们再谈。”

给他送来了火腿面包，他吃得真香。我问他：“如果我们把您安排到中央委员会，担任中央委员会组织指导部的指导员，然后根据情况再派您去搞地方工作，您看怎么样？”他说：“这对我已经够好的了，一到哈尔科夫我就进了中央机关。既然您已经发表了这样的意见，那我将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当然同意。”

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他很能干。当我知道基辅州需要新干部时，就把他派到基辅担任中央委员会指导员。他在那里被选为州委组织部部长，并一直工作到1929年。

此时，我又在莫斯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工作。1929年，又有人向我报告说赫鲁晓夫同志已经从基辅来了，要求您接见。我马上接见了，他的要求是支持他上斯大林工业学院。他说：“我只是在工厂里学了一点文化，而且没有毕业，就被派去干党务工作。现在我想在工业学院学到毕业。我可能过不了入学考试这一关，我恳请您帮个忙，给我一点照顾，学习我一定能赶上。”在工业学院学习的大部分是经济工作者，他们在入学考试时也得到一定的照顾。我与古比雪夫和莫洛托夫商量了一下，就打了一个电话，要求工业学院接收赫鲁晓夫入学。

1930年，当我被选为莫斯科州委书记并兼任中央委员会书记时，我不得不处理工业学院党支部的问题——那里的工作搞得不好。参加支部积极分子会议时，我听到了对支委会及其书记工作不满的许多意见。赫鲁晓夫也发了言。我们同区委商量以后，决定提拔赫鲁晓夫同志担任支部书记。此时与右倾主义的斗争尖锐化，赫

鲁晓夫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很好。鲍曼区党代表大会重新选举了区委委员会，赫鲁晓夫同志被选为区委第一书记。过了一段时间，另一个比较大的区——红色普列斯尼亚区需要一名新书记，我们决定提拔赫鲁晓夫同志担任该区区委书记。又过了一段时间，莫斯科州委缺一名第二书记，我作为第一书记就提拔了赫鲁晓夫同志，后来，赫鲁晓夫又被提拔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莫斯科市委当时属州委领导，因此赫鲁晓夫保留了莫斯科州委书记的职务）。

我还记得我就这个问题与斯大林同志商量时的情景。我告诉他，赫鲁晓夫是一位好干部，同时也提到赫鲁晓夫在1923~1924年期间历史上与托洛茨基份子的一些纠葛。斯大林同志问：“他改正错误了没有？”我回答说：“不仅改正了，而且还积极同他们进行了斗争。”斯大林说：“那就提拔吧，何况他是一位好同志。”我还记得随后我在斯大林家里吃午饭时，他问妻子（她当时也在工业学院学习）：“娜佳，工业学院的赫鲁晓夫，就是你经常对我说起的那个好干部？”她回答说：“是的，他是一名好干部。”后来赫鲁晓夫同志被召到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开会，斯大林同志说：“至于您过去所犯的错误，您在大会选举时要讲清楚。卡冈诺维奇同志会说，中央委员会知道这个问题，信任赫鲁晓夫同志。”后来也是这么办的。

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干得很好，没有辜负党的信任。在莫斯科工作了一个时期后，中央委员会派他到乌克兰担任联共（布）乌克兰中央第一书记兼人民委员会主席。他对乌克兰的发展，在工业化、集体化以及对敌斗争中，包括与托洛茨基分子，右倾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的斗争中都做了不少工作。同其他人一样，他当然也有一些缺点和错误。卫国战争期间，赫鲁晓夫在几个方面都担任过军事委员，表现不错。

1947年，联共（布）党中央考虑到乌克兰的复杂形势，认为有必要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

主席的职务分开。党中央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政治局委员拉·莫·卡冈诺维奇同志派到乌克兰，担任乌克兰联共（布）党中央第一书记。我记得赫鲁晓夫对联共（布）党中央的这一决定感到不快，也许是感到伤心。尽管如此，他还是非常高兴地迎接了我本人。他对我说：“我非常高兴派您担任第一书记。”我当然向他保证，说我的任务是帮助他和联共（布）乌克兰党中央。事情也确实是这样，我们配合得很好。

我从乌克兰返回莫斯科后，向斯大林同志报告说乌克兰的形势已经好转，但仍有一定的困难。我请求给乌克兰一些补充援助。斯大林对此非常重视，并且提供了援助。此后斯大林同志向我询问赫鲁晓夫的情况，我给他做了客观的、正面的评价，并指出，他同大家一样，当然有一些缺点。我特别指出他的过分自信、自以为是的缺点已经露头。但他已经成长为高级领导干部，还能继续发展。

应当说，斯大林此时正在紧张地物色和发现能干的人。例如，他十分注意和重视别尔乌辛、柯西金和马林科夫。当我们把担任莫斯科州委组织部部长的马林科夫调来之前，斯大林已经注意到他。斯大林先让他担任中央委员会组织指导部副部长，后又担任部长。斯大林此时确实也注意到了赫鲁晓夫。

不久，中央委员会把赫鲁晓夫从乌克兰调到莫斯科担任莫斯科州委书记，后来又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

此外，斯大林从 50 年代初期开始接近赫鲁晓夫。从 1951～1952 年到斯大林逝世之前，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一直是斯大林近郊别墅的常客。

现在还有人问我，你举荐赫鲁晓夫后悔不后悔？我回答说，不，我不后悔。他是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从 1925 年开始成长为边疆区和州一级重要领导人的。尽管他也有缺点和错误，但仍然为我们的国家和党做了许多好事，况且谁能无过呢？但是，联共

(布)党中央第一书记这座“高塔”对他来说是太高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是提拔他的倡议人，尽管我也投了“赞成”票。)有些人一旦身居高位就头脑发昏，赫鲁晓夫就是这样的人。他开始颐指气使。这不仅对他，而是对党和国家特别危险。况且他的坚定性、文化理论修养明显欠缺。他先前具有的谦虚谨慎、自我修养都丢到一边，主观主义，自以为是、自恃高明支配了他的行动，这样做不会有好下场。这些还有其他种种因素使赫鲁晓夫从高塔上摔了下来。

上述关于赫鲁晓夫的几段文字是我在不知道已经发表了赫鲁晓夫《回忆录》之前写的，当莫斯科已经出现在美国出版的《回忆录》时，我没有读它，因为我在莫斯科搞不到。

当我问莫洛托夫同志，他是否读过这些回忆录时，他告诉我说他读过。他在回答我的问题——评价如何时，对我说：“这是一个反党文件。”于是我又问：“难道赫鲁晓夫会堕落到如此地步？”莫洛托夫回答说：“是的，是的。他出于仇恨，由于国家领导人……职务的结束，他在政治上，对党的态度上都堕落到深渊。”当时我以遗憾、愤怒之情说：“是呀，这非常痛心。”莫洛托夫对我说：“……特别是您，是您提拔他的。”我说：“是呀，是我提拔的，但我把他提拔到一定级别，这也是真的，我当时已经预见到……他胜任不了这种工作，他肯定得倒台，是你们大家，其中包括你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接受了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的这一建议。”

读了公开发表在《星火》上的所谓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之后，我深信莫洛托夫的评价是正确的。为了不使自己堕落到哭喊“我是贱货”的娼妇的地步，我已经不能对莫洛托夫做出回答。我个人对赫鲁晓夫还存在一丝好感，看来我错了。原来他不是一条普通的变色龙，而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惯犯”，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卡冈诺维奇谈苏联的经济和政治改革

现在，当我们的苏维埃社会主义祖国正处于艰难的经济和政治状态之中时，对早年的事件进行回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每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每个劳动公民，内心真是感慨万千，甚至是忧心忡忡。国内的经济、政治危机不断发展，劳动者的物质和文化状况不断恶化。

我原打算在自己的《前事不忘》这本书里单独就此写一章，但当我写到 1985~1991 年时，担心我天生的宽宏大量最终会丧失殆尽。我决定打破时间的顺序，哪怕简单地就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发表一些意见。

自从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宣布旨在改善国内形势的“改革”以来，已经过去了六年多的时间。在此期间通过了许多重要的、正确的或不正确的决定和法令。坦诚地说，形势一年比一年坏。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集团对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做了五花八门的解释，也相应地开出了各自的灵丹妙药。

我不想分析这些灵丹妙药，何况我已经失去视力，在失明状态下写作，我只打算就一些主要观点进行剖析。

第一类人将一切都怪罪于改革思想和改革意图本身。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这些人中间既有不愿改革，害怕失去既得利益的官僚，也有惧怕一切新生事物、思想保守的人，还有对新生事物不理解，不愿意再学习或继续学习，不愿意把自己的专业知识提高到改革要求的人。

对这些人应当按照不同的方法加以对待：对前者应当揭露，对后者应当提高他们学习专业知识的自觉性。不能不加区分地把由于知识缺乏，不会改革的正直的工作人员当成官僚主义者、保守分子

加以侮辱。

大家都应当明白，改革不是主观臆想，党总是处在一定的改革阶段。

生活不能止步不前，它总是在前进。谁落后于要求，就会被生活所淘汰，因此应当更多地学习，学习理论和实践。

工人、老人和青年、农民、职员、大小领导干部甚至是科学家，大家都应该学习实践和学会传授知识，将大学生、工程师、农艺师的专业知识提高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根据干部的知识，在实践中应用知识的能力和政绩挑选干部，提高他们，从物质上和思想上关心他们。可以说，这是重中之重的任务，此事不能拖延。少说一些关于人的因素重要的漂亮话，雷厉风行地多干一些发挥这一重要因素的实事。

第二类寻找原因和开灵丹妙药的人正确地提出，错误并不在于改革思想本身，而在于改革过程中犯了错误，不能令人满意。

这句话是正确的。但在这类人中间也有不少预言家，他们对错误原因做出不同的解释。

一部分人将错误归结于过去旧的管理和经营机制已经破坏，而新的机制尚未建立，（或者已经选定），但尚不协调。这种观点是对的，但是，第一，为什么在没有准备好新机制的情况下把旧机制给破坏了；第二，建立新机制的系统和计划甚至尚未深思熟虑；第三，原则路线本身出现了大的矛盾和摇摆，用一个决议代替另一个决议，使改革的执行者无所适从。

另一部分人错误地认为，政府的行动不彻底、迟缓、不果断。这是确定危机原因和根源的第三类人的观点，他们是一帮伪装的政治家。

这帮人我们并不陌生，他们今天却把自己装扮成革新者。实际上，这帮人是要消灭苏联，消灭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复辟旧

的革命前的秩序和制度，恢复对工人、农民、劳动人民的奴役。不能低估这帮人的危险性，他们是多元化的暴风雨之后滋生的毒蘑菇、蛤蟆菌。

共产党和政府宣布扩大民主，公开性，多元化乃至多党制，其目的是提高诚实的苏联人的积极性，发展国家的经济和文化，改善人民的状况。但这帮人利用这一口号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他们要改朝换代，甚至建立君主制。他们高喊：我们没有社会主义的敌人，这些都是斯大林的领导臆造的。现在很清楚，他们伪装得很巧妙，原来以为他们已经死亡，实际上仍然存在，有的竟披着专家教授的外衣。我们当然不能对多党制生长的毒蘑菇良莠不分。我们还能就克服国内危机开展创造性的工作，与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找到共同立场。

共产党并不拒绝这样做。但对那些卑鄙、阴险地利用国内的严重形势，企图破坏苏维埃国家和社会主义，帮助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辩护士的人，就得进行斗争，严肃尖锐地予以揭露，从思想上、政治上揭露这些复活的或滋生的所谓的白匪的“死魂灵”。全部危险在于他们并不同我们进行公开的斗争，而是伪装起来，假装同情真正受苦的人们并以此欺骗容易轻信的人，唆使他们反对党。他们现在反对的已经不是斯大林及其战友，而是列宁和十月革命。毋庸讳言，劳动人民中间也有不少人，特别是缺乏经验的青年，事实上已经有不少人在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我们英雄的列宁主义的党。而党为了改变旧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的面貌，做了大量工作。

党和党中央的错误在于宣布政治改革之后，没有估计到在正面力量上升的同时，敌对社会主义的消极力量也沉渣泛起。党的领导并没有动员共产党员积极支持正面力量，也没有与消极和敌对力量做斗争，而是放任自流，听之任之，从而导致了共产党员解除武装和消极被动。

这并不是一个实践性错误，而是一个原则性错误，在事关党的路线问题上还犯了其他原则性错误。诚然，最近一次中央全会之后党员开始积极行动起来，天知道事情今后将如何继续发展，因为进一步，退一步的现象屡见不鲜。

为了比较清楚地搞清过去六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有必要将它们按阶段划分。

过去的六年按其内容，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或者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5～1987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和党的第二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二阶段：1987～1988年——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

第三阶段：党的第二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四阶段：1990～1991年。

每个阶段的特点是原则性政治决定的内容相互矛盾。

分析这些阶段，对查明衰退的原因，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原因作用巨大。

这是一项工作量很大的科研工作，一个人（何况是失去视力的人）是难以胜任的。因此我只做一个相对的分析 and 评价、尝试着画一个简单的示意图……

【专题说明】

索洛乌欣与斯维特兰娜

(1961年5月至1969年11月)

斯维特兰娜·约瑟夫娜·阿利卢耶娃，是斯大林第二个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1926年所生。母亲1932年去世时她才六岁，基本上是在保姆照顾下长大。1949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现代史专业，曾从事历史、俄罗斯语言及儿童文学研究。斯维特兰娜曾同犹太人经济学家莫罗佐夫结婚，生有一个儿子，在反犹浪潮中离婚。后来又同日丹诺夫的儿子结婚，生了一个女儿，也因感情不和而离异。斯维特兰娜经历了斯大林去世的悲痛和非斯大林化的感情冲击，思想情绪有了较大的变化。1961年她给作家索洛乌欣写的两封信反映了那个时期她对生活及苏联文学的看法，反映了她从斯大林的女儿回归到同情普通人民的感情变化。1966年10月底，她的第三个丈夫印度记者辛格去世后护送遗体到印度，1967年到了西方。斯维特兰娜在国外出版了《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和《仅仅一年》等著作，对自己的生活及斯大林晚年的政治状况做了一些回忆。这件事引起了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的注意和评论。苏联当局也有激烈的反应。

本专题收集的1961年斯维特兰娜给作家索洛乌欣的两封信反映了她当时的心情，而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给苏共中央写的专门报告，则是在斯维特兰娜发表了《仅仅一年》等著作后，建议利用克

格勃和舆论工具对其在国外的影响加以制止。索洛乌欣有自己对斯维特兰娜著作的评论，并表示拒绝参与对斯维特兰娜的谴责和批判。

(本专题文件由杨存堂编辑和校注，
温耀平翻译)

№03146

阿利卢耶娃致索洛乌欣的信

(1961年5月8日)

亲爱的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

请原谅我如此随便地称呼您，但是，说实话，读了您的美妙绝伦的中篇抒情小说以后，很想尽可能亲昵地称呼您，只要不超越作为一个读者给作者的正式信件能够允许的界限。

请允许我首先作一番自我介绍：我叫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诗人达维德·萨莫伊洛夫曾在1960年12月末在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举行的一次晚会上介绍我们认识。您和萨莫伊洛夫当时朗诵了自己的诗，后来举行了不大的新年宴会、跳舞，等等。很可能，您没有记住我，正如我其实也没有记住您一样（不过由您自己朗诵的您的诗我很喜欢）；问题在于，那天晚上我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被我亲爱的朋友杰济克·萨莫伊洛夫吸引住了，其他的一切我根本都记不清楚。我那时只暗暗注意，当您在他之后随即朗读诗时，我才突然感到一种心灵上的健康和清爽的气息扑面而来。

不久前我读了《一滴露水》，您和大自然的谈话使我喜欢得不得了，不过之后又留下一点懊丧的感觉：这个年轻人正当风华正茂之年是否观察得太多了呢？他是否躲进了他那铺满鲜花的森林和草地，从而同生活在今天焦躁不安的节奏中的现代城市人的心烦意乱的一切隔绝开来？可是后来——就在前几天——我也读了《弗拉基米尔乡间小路》，这才完全放下了心！不，他是个可爱的聪明人，他并不想避开纷乱而躲入自己的草地，而是以那些无法呼吸故乡的

大自然气息的人们所有悲伤和痛苦作为自己的生活，而且总的说来，多么好呀，有多少美丽、智慧、思想，我的上帝！出于激动我几乎喘不过气来，于是，还没有读完《多刺李》，就坐下来给您写信。

请原谅，亲爱的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读者的来信肯定使您厌烦，不过还是要请您把我这封信读完。这封信会很长，想说的话很多。几天以来，我一直在不停地想您的中篇小说，想作者本人，而更多的是想我自己。您使我心灵中某些方面翻腾不已，亲爱的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我试图向您说明的正是这一点。诚然，并非您一个人，也并非只有您的中篇小说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您要知道，我是属于这样一类人，对他们来说艺术想象（无论是文字作品，还是好的影片，诸如《卡皮里亚之夜》或《二分钱希望》这样的一流电影）有时比现实中的事件和人物能产生更大的作用。我记得，还在我16岁时，罗曼·罗兰对我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欣悦的灵魂》使我的生活和思想在几年之内处于我在书中发现的一切的强烈影响之下。

而突然，在我们当代精神紊乱，探寻求索、憧憬某种光明、清晰的事物的日子里，在我们当代追求理想、仰慕英雄、向往旗帜，即想望能出现领导我们前进和照亮我们的事物（我仅仅指我自己和从我自己出发而谈）的日子里，突然在文艺中出现了您所探寻和渴求于艺术的东西：对我来说，这就是奥丽加·别尔戈利茨的《白天的星星》、弗·田德里亚科夫的中篇和短篇小说（和他的未受到评论界应有重视的优美无比的抒情长篇小说《追随匆匆飞逝的日子》），然后，就是您的绝妙的抒情中篇小说，其中又特别是《弗拉基米尔的乡间小路》。

天啊！这是多么清新的气息！我们多么需要它！我不再说“我们”，而应当说“我”——这样更真诚，更确切些；我不是也正在

向您写自己的抒情独白。这段独白充满了对艺术以及对您的最诚挚的感激之情。

只是请您，亲爱的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忘掉我是个文学工作者、语言学者和别的诸如此类的什么。这现在并不重要。我想向您说的事情，距离科学、距离评论，甚至距离读者的“反响”都很远。我一生中只有2~3次（今年我35岁），就像现在这样坐下来写信，写关于自己的最为重要，最为严肃而自己又最想说出来的话。一次是像这样我写了一封长信给我的所爱的人；一次也是这样写信给伊利亚·爱伦堡。

那是1957年的夏天，在他的那篇充满睿智的文章《斯汤达的教训》问世后不久。我写信给他谈到这篇文章，也谈到我自己，什么都说，这篇文章把我的什么都掏了出来，让我想到许多事情。这是我一生中写给作家的仅有的一封信……有什么可说呢，我到现在也还喜欢意大利的电影和勒纳·克莱尔的影片，更甚于我们自己的、国产的影片；我喜欢雷马克的极其深沉的人道主义，而且也没有看到过比《三个伙伴》描写爱情更好的书。但是，也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我身上迸发出某种与此不同的东西：我会愤怒的扔掉尤·斯穆尔那本好书《冰书》，是因为其中有两页大肆赞扬美国影片《战争与和平》，包括其中不可思议的彼埃尔、卡拉塔耶夫、安得烈·保尔康斯基……突然我听到电影之家传来自己的贵族绅士们的声音，听到了托尔斯泰的作品，好久没有读了的，或者淡忘了的，或者根本没有读过的……我顿时感觉到我在俄罗斯文化中，在俄罗斯文学中，有我自己的圣殿，我不允许任何人侮辱托尔斯泰（甚至即使这个人在几页之前曾优美地描述过南极洲和澳大利亚）。我同伊·佩里耶夫争辩关于把《白夜》搬上银幕的事，——尽管其中不完全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那样，但有一位极其优秀的年轻女演员，很能扮演那个时代的俄罗斯姑娘。她非常美丽，表演毫不做

作，无论外形、动作、语言，一切绝对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描述，才能全面，处处都显示出俄罗斯文化的印记。我们怎么竟会忘记了自己本国的文学和文化，特别在电影事业中！

现代聪明的西方进步艺术活动家中有某一个人（也许是路易·阿拉贡或者别的什么人）说过一句极端精辟的话——我是在我们的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听讲的，但谁也没有对他的深意做出反应：他说，当代先进的，进步的艺术（这涉及文学，但不仅是文学），现在不可能不是深刻的民族的艺术。优秀的意大利和法国的影片正是这样的，萨里扬的绘画和其他许多人的作品也是这样的。这正是别林斯基曾经渴望见到的。

是您打开了我的眼睛让我看到祖国，亲爱而尊敬的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而恰恰又是在我的心灵如此需要，如此必不可少地需要与儿时的甜蜜回忆，与某种无条件的、永恒的和不可动摇的，从摇篮起就亲切的东西溶合在一起的时候。并不是说我没有看到过祖国，没有您的帮助我就认不出它，不是的。我是在莫斯科郊区，在佩尔胡什科维伊、奥琴佐维伊和乌索夫之间的地带长大的。我知道这里的每一个小沟、每一株以前没有的小松树、每一条新的小路。总的说来，抚养我长大的是我的保姆，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夫娜·贝奇科娃，一个经历和天生的才干都非同一般的人，十分喜爱和熟悉大自然和农民的劳动，虽然我自然不需要从事这类劳动，但我从保姆那里听说了许多。她（在我们家生活了30年，于1956年71岁时去世）是一个异常愉快、和善、乐观和肯干的人；从她身上散发出一种平静、善良和卡拉塔耶夫式的“稳健”的光彩；她在她所见到的世界、大自然和人物范围内真是一名天生的诗人。对俄罗斯文学她知道的也不少（革命前她住在彼得堡，在剧作家兼戏剧学家尼·尼·叶夫列伊诺夫家里，她受到城市生活的“教育”，也感染了对俄罗斯文学的热爱），虽然在13岁以前生活在农

村，在梁赞附近，而且只读过四年级。但她能文理通顺地写信，主要是写得生动形象而且幽默（我保存着她的信），又读了许多书。她能背诵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的许多诗，而且颇为伤感地说：“现在人们不这么写了。”在饥荒的20年代失去了11岁的爱子以后，她不再信上帝了，——她曾拼命祈祷，但上帝并未帮助她，于是成了一名最真实的无神论者，而且此后就不留情面地嘲笑信徒、教会和“所有这一切谎言”。由于生性快乐，她成了一个伟大的无神论者，异教徒，贪食者，如她自己所说，是个“有罪的人”。从13岁起她当了保姆，后来又当旅馆使女，当厨娘，当女管家，后来再当保姆，这一切都是在彼得格勒，她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城市的美丽和整洁。后来她来到莫斯科，惊异地说：“真是农村！”后来，她一生都讨厌农村的保守、残忍和呆板，以及野蛮，虽然她曾不得不在这种条件下生活。但她身上对于大自然和农民劳动的热爱却保存了下来，而且还笼罩上了一层不平常的诗意。她还会奇妙地进行描述，如说人们怎么用镰刀收割，怎么用草腰子捆扎，又怎么把一捆捆庄稼放好，让你听了好像亲眼见到一样。她有一双巧手，什么都会做：会缝衣服，会绣花，会做好吃的（不是一般的烤饼，而是“法国菜”），会翻土，会割草，会织布，会纺线，会编织。而做所有这一切时，她完全心满意足，兴高采烈，还愿意把这种愉快传染给别人。所有的人都喜欢她。当1955年我们为她庆祝70岁生日时，来了一大帮人，每一个人都向她敬酒，但都说不出话而吞声哽咽起来。在她身旁生活了几乎30年，在她慈爱的双手照看下长大，向她学习读、写、算，这是命运安排给我的极大幸福。看来在某种程度上她也传染给了我喜爱大自然、喜爱蓝色的天空、喜爱阳光和花草的本能，喜爱生命的力量、喜爱清洁和健康的本能。如果不是从她身上吸取了这些品质，那么我早就会在我不幸经历的半途之中被摧垮了。

关于她（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夫娜）应当单独来写，因为一谈到她，我的语言和时间总显得不够用了。

我谈到她，是为了向您说明，是您突然使我心灵中重新产生了我在她身边时体验到的那种纯净的感情。从来也不能把她称作为老太婆。当她70岁时，尽管患有气喘，肥胖症、心绞痛，但她能从花园的长凳上一下子蹿起来去想法捕捉一只美丽的蝴蝶。她简直像一个孩子一样精神愉快和心地善良。当我阅读《弗拉基米尔乡间小路》和《一滴露水》时，在我自己身上的某一种，不能说是被忘却了的，而可以说是被送进心灵某一深处的那种在我自己身上不再闪耀发光、不再令人愉快的东西，又重新显现了出来。这正是对于存在在身边、附近、我周围的东西的热爱，——不必到其他地方去寻找，不必四处奔波，只需要更大地睁开自己的眼睛，只需要贪婪地一口一口吞咽故土的空气。

您啊，我亲爱的！

现在我知道了，我一定要实现自己早先就有的，秘藏在心中的愿望——带着儿子（他已经16岁了）沿着伏尔加河走上一遍，看一看那里古老的俄罗斯城市。很早以前就有这样的想法，但却缺乏某一种内在的动力，而现在这种动力有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在乌拉尔，在加里宁格勒，我都有许多好朋友，——他们召唤着，说来吧，来看一看，而我却一直提不起精神。可现在我多么想看看自己的整个国家，到处漫游。如此兴趣盎然，而又因为一丁点也没有去看而深感羞愧。

坐在公共汽车上走马观花式的旅游我早就厌倦已极。我想愉快地在法国、美国、意大利住上一个月，在街上随意漫步——而我们苏联旅游者挤在公共汽车里观察“西方”的样子让我反感。而对于莫斯科的冒牌绅士们用这种方法游历了不止一个国家，甚至发表一些干巴巴，诸如关于“瑞典生活”、关于“巴黎生活”的议论，我

真无法忍受。乃至叶夫图申科关于巴黎、关于巴黎市场等等的诗，我也认为是诗人的耻辱。这样的东西，就是坐在莫斯科，只要预先看一看关于巴黎的新闻记录片，读读左拉的书就能够编出来。这种徒有其表、矫揉造作的西欧派比任何一种斯拉夫派都更坏，在任何一个巴黎的理发师面前都会散发出一种土里土气的味道和过时的屈膝礼的气息，而且在一俄里以外都能闻到。

我希望，您能理解我，亲爱的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不反对旅游、交往、接触，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但是我主张不要给自己丢脸，也不要忘记自己故土田野上的风的味道和气息。我主张作家们不要成为我国人居住的村庄里的别墅住户。我主张在遍游欧洲、美国和东方各地之后诗人在谈到自己的俄罗斯时说：“……对我来说，你的灰色的房子，你对我唱的风中之歌，恰如爱情的最初的眼泪……”我主张诗人能讲三四种欧洲语言（像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那样），但对自己心爱的女人称作“我的可爱的小鸽子”，而不是称作“大猫”。

请看在上帝分上原谅我的这一整篇杂乱无章的叙述，但我现在已经难以停笔，也难以遵循某种逻辑。

再说几句，如果您不为此而生气的話，关于您的才华，以及关于还想从您那里看到什么，不愿意看到什么。您已经变得对我十分亲切了，亲爱的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伊奇，和您讲话不知为什么很轻松。

我对您的诗理解得很差，所以不准备谈到它们。但您的散文作品我要喜欢得多，我还认为，这些散文作品对您自己也贴近得多。您是一个诗人，而且在散文作品中也将永远是诗人，这一点既会使它更加美丽，也会使它从内里发出光芒。您绝不能把诗情从散文作品中“掏出来”而把散文作品搞得干瘪无味而精确严谨，那它们就不再能生活着和呼吸着了。它们——我指的是散文作品。您是一位

抒情作家，您要永远这样，而这恰是您，作为作家，身上最好的东西。看来，今天的时代有利于出现抒情散文作品，抒情长篇小说。奥·别尔戈利茨的长篇小说是抒情长篇小说，弗·田德里亚科夫的《追随匆匆飞逝的日子》是一部没有止境的抒情忏悔录。这就极好！

我以为，您也可以写抒情长篇小说，叙述您的某些最重要的事，也许叙述您经历过的战争，或者关于别的什么。这会是关于自己、关于别的人们的长篇小说，也许甚至于只讲别人而完全很少讲自己，但这会是真正的抒情长篇小说，真正的抒情散文作品。

我认识一个可爱的人，诗人，他经历了整个战争，而且至今还断言这是他一生中最好时光。但是，他永远写不出抒情长篇小说，无论是关于这方面，或者关于别的什么方面，因为他的心太冷漠，理智太强，而比理智还要强有力的是对他自身的嘲讽和怀疑。而您，在我看来，能够写出关于严肃而重大事情（诸如战争、爱情）的卓越的散文作品。您应能奇妙无比地描写爱情，因为您具有纯粹俄罗斯的贞洁，这正是在俄罗斯古典文学中形成的，也即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描写爱情时所具有的那种贞洁。您身上（我指的是您的创作）总有许多光亮、温暖、深邃的心灵的健康，这就是我国人民生活中和我国的优秀艺术作品中的活生生的灵魂。我不准备把您捧上天，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伊奇，我只不过是谈谈您的“优点”，它们正是这样的。您身上有许多对于重大、严肃、主要事件的毫不做作的真诚和纯洁。这一点最使那些冒牌绅士万分恼火，因为他们自己恰恰缺乏这些，于是他们大肆攻击，例如，反对人热爱自己出生的乡村、干草垛、草原、小溪。他们以为，这一切只是一种姿态、臆想、“思想上的装模作样”，以及诸如此类，您对此要嗤之以鼻，亲爱的，“走自己的路，人们想怎么说就让他们怎么说吧。”（这是马克思喜爱的谚语）。就让我们苏联的文学市侩们喊破嗓子对您喋喋不休地叫嚷吧。

您喜欢描写善与恶，描写真理与苦难。您身上有许多善良的东西，它们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但从您描写您的奥列平村的人们，自己的乡亲时，可以让人感觉出来。很可能，《往事与思考》的叙事风格与您接近，而以作者讲述某些事物的形式自然推进讲述的内容，能使您无论在情节上还是在文字风格上都真挚可信而无人工斧凿的痕迹。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有过一篇精美绝伦的文章《作为思想家和艺术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是在1921年第4期《红色荒地》杂志上读到的，不知道在哪里还可以找到），其中论证了一种思想，即实质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长篇小说——其中任何一部——都是汹涌澎湃的河流，都是作者的抒情忏悔录的流淌；到处都是，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从别人口中说出的他的思考、苦难、争论；如果他的长篇小说，形式上并非完美无缺的，有待加工的，尚未完成的，如果它们不是全部都具有深邃的抒情性，任何时候也不可能如此强烈地打动读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伟大的抒情作家”。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在自己这篇具有极大价值的文章最后作出了这样的结论。您一定要读一读这篇文章，如果您以前没有读过的话。因此，我认为，您是能够写出精美绝伦的抒情长篇小说的，原上帝保佑这能够实现。

至于什么是您不该做的，——那么，也许有时略嫌细碎冗长。此外，列·列昂诺夫的作品如此艰深难懂，而他本是无比优秀的俄罗斯作家，而且，看来，和您对于他十分贴近一样，他对于您也是十分贴近的。不要难于把一句话说完，这只能使人们难于和您交往（尽管我必须承认，虽然是自相矛盾的，列昂诺夫在周年纪念庆祝会上发表的《关于托尔斯泰的话》，虽然有些句子十分冗长，我读时却贪婪得忘乎所以，有时甚至涕泪纵横）。我只是想——请正确理解我——，不要让人抓住您的弱点。您并没有固定风格，希望现

在也不要出现。

还有什么非说不可的呢？那就是，希望能有整个广袤的世界，整个大地，来更密切地同您的出生地奥列平村及整个弗拉基米尔边疆区相接触。或者通过别人的口，或者通过人物的命运，或者通过您自己的思想。但只要这样做了，那时就会产生重大的思想与主题，那时您的乡亲们就会对于我，如同对于您一样，令人关切，而您在一路上看到的伫立在小河上的白色小教堂也就不会那样简单地站着，而会说出许许多多东西。那时，人们读起来一切都会不同：砍草也好，捕鱼也好，“头上空气中没有一丝尘土的巨大清洁的天空”也好，以及所有的一切一切。当我得知，您步行去看苏兹达利，并为此放弃去新加坡或其他什么地方的旅游，那时我就准备亲吻您，并真正羡慕您和您的夜莺般的才能。

列夫·托尔斯泰在描绘彼埃尔·别祖霍夫（也许是安德烈）时写道：“于是在他的心灵上有某一种东西轻柔地弥漫开来”。在读过您的长篇小说后，我就有这样的感觉。有某一种东西弥漫开来，逐渐融化，慢慢消失，停下来不动了。某种干枯了的眼泪回暖和湿润起来，又流淌下来。天空中雪白无瑕的云彩放出了光芒，最普通的事物变得美好灿烂起来。

于是某种东西在心灵中变得坚实了。某种干枯了的叶子脱落飞去。某些话语不再使心灵感动，它们的淡漠轻率、冷酷无情、凭空虚构和故作姿态都暴露无遗。心灵从而向往真诚、健康、坦率的东西。于是，由于伟大的、不可企及的真理的力量，在我面前又站了起来一个个普通的人，睿智、纯洁、精神强壮有力，正是这样的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支撑着我们可爱的祖国。

那个飞向宇宙的人，在完成这件壮举后，并没有说一句色彩斑斓的话，也没有做一个不可一世的动作。但如果有几个特别具有知识分子腔的评论家不喜欢他（我可看到过这一类人，有年轻的，也

有年老的)，那就让他们去倒霉吧，也只能这么说了。

这就是你从我心灵里掏出来的话，亲爱的作家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请原谅，让您读了这么长时间。

尊敬您的 斯·阿利卢耶娃
斯维特兰娜·约瑟福夫娜·阿利卢耶娃
莫斯科，B-72区，绥拉菲莫维奇街2号179室

又及，不知道您是否向来信者写回信，如能回信，我会很高兴。我要再给您写我的保姆的事——这很有趣。要是不回信，我也不生气，我不是为此而写信的。

尊敬您的 斯·阿利卢耶娃

№03147

阿利卢耶娃致索洛乌欣的信

(1961年6月10日)

亲爱的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

您甚至不可能想象到，收到您的回信我有多么愉快。说真的，我已经完全认定不会有回信了，因为已经过去了许多时间，而且我认为这也符合常理。可是，突然——啪！获得这样的意外惊喜真好。

谢谢您的信。第一，使我感到愉快的是，我作为一名读者的思考和激动心情并没有为您的心所忽视。第二，我非常乐意地读到，您愿意和我谈谈您的新书；我将非常高兴地在秋天，当您回莫斯科时同您会面。第三，您的信令人感到某种温暖和心情激动，至少信中不存在淡漠冷静的礼貌，因而我愿意和您长时间地谈论各种话题（哪怕用书面形式），看来似乎也不会使您感到枯燥。还有第四，给您的信发出以后，我又坐下来看书，读了《多刺李》，当即我就想接着前一封信再给您写一封信，现在我更有了一切理由写信给您，回您的信。现在我正在愉快地给您写信，也是从您的《一滴露水》中知道了您乡村的地址。

好吧，为了按顺序回答问题，先就《多刺李》谈几句。这篇不大的中篇小说写出来了，而它又为前两篇做了个结尾，这很好。而三个中篇作为一个集子出版，这也很好——正是应这么来读它们。起先，在开始读《多刺李》时，我曾略感懊丧：“莫非他真要离开，要从这里到南方去，而我不得不阅读有关我如此熟悉的黑海地区的

事？多可惜！……”但是，接着读下去，随着您开始讲到皮聪大，讲到格鲁吉亚本身，这种懊丧心情一扫而空，为另一种感觉所取代：“是啊，是啊！一切正是如此。在这个童话般的地方可以玩耍作乐，尽情享受，但不要时间很长！”于是心灵轻松、甜蜜惬意地舒了一口气，感受到吉洪诺夫的奇妙诗句“因为在这里长住我不能。”

当您回到家里，回到自己飘散着蘑菇气息的秋天潮湿的森林里又看到自己心爱的充满荆棘的多刺李时，而我则终于合上了这本不同寻常的书时，我想到：“天啊！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候，真想大声向这个人全力大喊：‘是的！是的！是的！一千个是的！一切都是如此，一切都是真实的！’”

用一句话来说，合上书，我感到非常满足，因为写给您的信已经寄出，而读了《多刺李》以后重新涌现的激动心情已经封入信封，寄给了您。说实话，我真想让您更快地收到我的信，读到它，而终于读到您的回信的第一行：“您的信使我万分激动，”我感到极其幸福。

当一个人能够激动起来，这有多好。而所有这些漠不关心，平心静气、“什么都看透”的人们多么令人厌烦。

亲爱的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维奇！您的信中使我最愉快的，是您想和我谈一谈您的新书。我很想要您不等到秋天（您回来时）就写信给我稍微谈到这本书，如果这不太使您费神的话。我8月份以前，也许包括8月份，留在莫斯科，即使离开，也不会很久。我的地址仍是原先那个未变（我的儿子7月份和他父亲一起过，他正好放假，他们通常是这样安排的。8月份我同他去哪里，如何安排，目前还不清楚）。您的新书会是怎样的，仅从您的构思上说说也好，我十分、十分感兴趣。也许，您真的以抒情叙述的形式构想出一部长篇小说，——那正是我想从您那里得到的。不知道为什么

我十分想要的正是这样的书，也许是因为这些书中直接同读者说话，以及在叙述中和故事本身有更多的直率性，也许是因为在这种书中不必去臆想出情节和把主人公硬塞进去，一切都是自然发展，很少有杜撰的成分。

也许，从艺术学的观点来看，我把我所指的作品称作为“抒情长篇小说”、“抒情叙述”是不正确的。但是，您懂得我说的是什么。不论有多少人物和性格在书中出现，也不论他们进入何种相互间的情节纠葛，所有这一切，照我看来，仍然可以具有抒情叙述的性质。我想，这正是您的独特的风格，不要放弃它，而是相反，愿上帝保佑，您应当再进一步发展它。而且，依我看，总的说来，您还是写散文作品更好，而不是写诗；要是一个人不能写好散文作品（而这种情况常常是因为他没有什么可写，散文作品依靠凭空杜撰是写不出来的），那样他只能用诗来作为一种文学表达的方法。

请原谅我，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伊奇，我不准备给您作什么指示或向您提出什么要求，而只不过是说一说，我很想把什么样的书拿到手上来读，如果封面上署名“弗·索洛乌欣”的话。

这是我绝对主观的个人愿望，也可以说是一种读者的任性苛求。

既然您自己愿意和我谈您的新的构思，那我只会感到幸福。

请写信给我，我恳求您。当然，如果您愿意不等到秋天就谈出自己的想法。很想听听您的想法。

关于自己我已经向您唠叨得够多了。一般地说，我是不大喜欢向别人讲述自己的，不过事已如此，写信给您是顺乎自然的。

在协会里讨论弗·杜金采夫的长篇小说的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这部小说，我当时就认为，而且现在也认为，是作家的巨大而崇高的功绩，而书中的主人公——洛帕特金、德罗兹多夫、舒季科夫、娜佳，——都是天才地创造成功的，具有深刻典型意义的概

括。我清楚地记得康·帕乌斯托夫斯基在那次讨论中的精彩发言和那次晚会的整个气氛。这部小说我保存着杂志上刊登的最初版本，好像后来出版时作了过多的改动。不过，我仍然极其推崇弗·德·杜金采夫，并把他看作是维护真理和善良的骑士。

呀！看我又开始饶舌起来了。

祝您健康，亲爱的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伊奇，祝愿您过一个幸福的创作之夏。

再见。

尊敬您的 斯·阿利卢耶娃

№03144

安德罗波夫关于对斯维特兰娜采取措施 致苏共中央的信

(1969年11月5日)

绝密

致苏共中央

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掌握的消息，敌人把斯·阿利卢耶娃新书《仅仅一年》的出版作为有意安排在列宁诞生100周年之际大肆开展反苏宣传运动的措施之一。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在《纽约时报》和美国其他出版物上出现了论述《仅仅一年》一书出版的材料。其中贯串着一种思想，说责怪斯大林建立了“专政和警察制度”是不公正的。实际上，他的一切做法都是从列宁那里继承来的，“恰恰正是列宁应当对在苏联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斯大林并没有歪曲列宁。他是列宁的惟一可能的结果。”

鉴于以上情况，为了转移世界舆论对于敌人利用斯·阿利卢耶娃《仅仅一年》一书而掀起的诽谤性宣传运动的注意力，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根据约瑟夫·阿利卢耶夫和叶卡捷琳娜·日丹诺娃写信给政治局表示对他们母亲叛国行为的愤怒这一情况，我们认为可以起草一封给斯·阿利卢耶娃的子女的公开信，并寄给著名政治评论家、《纽约时报》副总编哈·索尔兹伯里在国外发布，因为后者曾多次采访过

斯·阿利卢耶娃，而且本人对她又多少持有不赞许之意。

为了加强这一措施的效果，还要把上述信件和对斯·阿利卢耶娃子女访问记在欧洲一家重要的杂志上刊登。

要向西方报刊灌输这样一种说法，即斯·阿利卢耶娃的新书是一大批人集体劳动的成果，其中有乔·凯南、费希尔、吉拉斯、弗洛罗夫斯基、别林科夫等这样一些声名远扬的苏联的狂热反对者和擅长捏造苏维埃国家历史的人。与此同时，在这些材料中还要加进一些克格勃掌握的能让上述这些人私人名誉扫地的内容。

由一批本人认识斯·阿利卢耶娃的苏联知识界著名代表人物（如作家索洛乌欣、电影剧作家卡普列尔、《苏联银幕》杂志主编皮萨列夫斯基、米亚斯尼科夫教授——斯·阿利卢耶娃进行学位答辩时的学术导师等）给她发一封信，有充分根据地抗议捏造苏维埃国家的历史事实和诽谤列宁。这封信可以通过克格勃的渠道转交给斯·阿利卢耶娃，并设法透露给国外的报刊。

在撰写供苏联报刊使用的揭露西方国家情报机构活动的文章时，应说明：这些情报机构是从那些私人生活方面和工作方面都有缺陷的人们那里获取“事实”材料的。其间还应说明，敌人企图动摇列宁的功绩和威望以及散布对我国制度不信任的努力是令人可笑的。同样可笑的是，他们为此竟利用堕落到赞扬克伦斯基并在自己书中引用托洛茨基的政治蛊惑言论的斯·阿利卢耶娃这样一些令人厌恶的人物。

责成苏共中央宣传部对《仅仅一年》一书进行分析，以求判明书中可能隐藏着敌人的新的态度和意图，以及他们在此基础上安排的在列宁诞生 100 周年之际的意识形态上的破坏性宣传活动。

请予审查。

№03145

索洛乌欣对《仅仅一年》的评论

(不早于1969年11月5日)

意在侵害我良知的这个企图未能得逞。如俗语所说，一切烟消云散。没有谁来要我在这样一封信上签字，我想也没有人去找卡普列尔。在我看来，那时人们都会拒绝在这样的信上签字。不管怎么说，至少我不记得发表过有什么人签名的这样的信件。即使有人找到我，我也是不会签名的。曾有人来过电话，要求我在《文学报》上对把亚·伊·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的事表示响应。简短的一声“不”就够了，不再有人打电话来。

不过，我不会在这样的信上签字还有许多原因。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是一个真挚诚恳的人。她的书中，除了向人们倾诉自己的感情和思想以外，没有任何政客气息和附带的动机。我第一次“亲眼目睹地”看到她和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在中央文学工作者之家橡木大厅的一次聚会上，当时讨论的是杜金采夫的长篇小说《不是为了面包》。对长篇小说的这次热烈激昂的讨论发展成了对前几十年的状况，也即是对她父亲的热烈激昂的讨论。她坐在侧厅里，我从侧面看到她。发言人情绪激烈，鼓掌声响如雷鸣，有人大喊大叫。她听着，两个小时中（或者更长一些），她脸上的肌肉一动也不动。她想些什么，如何经受这一切，不得而知。

后来我突然接到一封信，用一本小学生的方格簿从头写到尾。我回了信，谈了自己长篇小说（《继母》）的写作计划，又收到一封来信。理所当然，两封信我都珍藏着。读了这两封信的读者将会理

解，任何一种地面上的或者宇宙中的力量都不能迫使我在一封“谴责”、“揭发”，因而必然要伤害这样一位高尚，聪明，光彩照人的，然而总的说来又是命运悲惨的妇女的信上签名。

弗·索洛乌欣

【专题说明】

关于卡累利阿共和国的食品储备问题

(1962年5~6月)

卡累利阿位于俄罗斯同芬兰接界的北部地区，盛产木材。1962年在全国食品紧张的情况下，那里的食品供应尤其困难。卡累利阿造纸厂要来外国专家，又由于白海通航开通，外国的船只要到这个地方来，地方党的领导人不得不请求中央增加供应。这一情况从一个侧面说明在赫鲁晓夫执政后期苏联的农业状况。

(本专题文件由杨存堂编辑和校注，
乌传袞翻译)

№03352

先金关于增加卡累利阿州食品市场储备 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2年5月22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

今年5~6月间，有一批外国专家（安装负责人）将来到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造纸工业的一些企业，而自白海的航运开通以后，还将会有外国舰船来到共和国北方地区供应出口锯材的木材工厂。

在造纸工人镇和木材工厂工人村，肉食品和动物油的贸易极端不能令人满意。由于储量不足，这些产品常常脱销。关于供应问题抱怨很多，在企业召开工人大会时也有人提出过这类问题。

为了改善造纸企业和木材加工企业工人的畜产品供应，苏共卡累利阿州委请求苏共中央作为例外，指示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于1962年第二季度再拨给共和国500吨肉、300吨动物油、200吨人造奶油和供日常出售的优质面粉500吨。

苏共卡累利阿州委书记 И. 先金

№03353

斯特鲁耶夫关于无法增加卡累利阿食品市场储备 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2年6月18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部长会议研究了苏共卡累利阿州委关于增加食品市场储备的信，并报告如下：为了改善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林业工人的供应，1962年第二季度已补充调拨450吨肉、120吨动物油和120吨植物油、230吨人造奶油和200吨优质面粉。

此外，还准许在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从1962年下半年的计划中提前消费地方供应的150吨肉和100吨动物油。

1962年6月，作为增加肉食品资源，向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拨去100万只肉类罐头和200吨肉。

根据资源状况，再进一步增加食品储备就不可能了。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 斯特鲁耶夫

1962年6月18日

【专题说明】

新切尔卡斯克事件

(1962年6月至1988年3月)

新切尔卡斯克是罗斯托夫州的一个工业城市，1962年6月在那发生了一场悲惨的流血事件。在苏联时代，有关群众的反抗活动和政府的镇压行为一般都严密地封锁消息，外界很少知道。现在，人们才从档案中了解了某些事实。在赫鲁晓夫时期，工人的反抗实际上早有发生，例如，1959年8月初，卡拉干达冶金工厂工人因对糟糕的食品供应和缺乏基本的生活条件不满而反抗当局的事件。新切尔卡斯克事件是苏共二十二大通过了建设共产主义的新纲领以后不久发生的。这个纲领曾允诺将迅速大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早在1957年初，赫鲁晓夫就宣布：“要在今后三四年内，在肉类、牛奶和黄油按人口平均产量上赶上和超过美国”。为了实现这一口号，党和政府开动了一切宣传机器，采取了许多行政手段，但效果很差，粮食和畜产品不仅未能大幅度增加，而且有所下降，1961年底供应紧张。1962年5月31日，苏联部长会议决定提高肉类、肉类制品和食用油的价格。这既标志着赫鲁晓夫急功近利的农业改革的失败，也戳穿了苏共新纲领的虚假性，引起了许多地方群众的强烈不满。这就是新切尔卡斯克事件发生的直接背景。

从档案中反映的情况可以看到，苏共领导人当时精神极度紧张，

克格勃日夜搜集和汇报各地的反应。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制造厂的领导人在是年初重新核定了工作定额，使某些工人的工资因而下降了30%。部分工人本来就有不满情绪，6月1日在讨论肉类提价的决定时，部分工人就离开了车间，聚集起来要求和厂长对话，同时贴出了一些“肉，牛奶，提高工资”的标语。群众的要求没有得到答复，据说在一些“流氓、犯罪分子”的煽动下，在这个城市导致了一场动乱。事件震动了苏联的最高领导层，米高扬和科兹洛夫亲自出马到了该市。当局一开始就采取逮捕人的办法，终于动用军队镇压了这场动乱，当场打死23人、打伤37人，逮捕了49人。事件过后，苏联当局在新切尔卡斯克市审判了这次骚乱的14名组织者和参与者，其中7人被判处死刑，其余判处不同的徒刑。关于这一事件的官方档案文献比较多，大体可以了解事件的全过程。只是还缺少当事人的目击资料。

该事件引起苏联党和政府对国家安全部门重要作用的重视，并为此做出一系列决议，却没有在引出问题的根源——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认真思考，社会不满情绪和骚乱现象自然无法根除。

本专题还选编了切布里科夫1988年3月4日给戈尔巴乔夫的一份秘密报告，其中包括1957年以来的群众骚乱和1956~1987年期间按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70条和109条判罪人数统计资料。这对于了解斯大林以后时期苏联社会动荡的情况颇有益处。

(本专题文件由杨存堂编辑和校注，
徐锦栋、张好雨、徐莉、温耀平翻译)

№07037

伊瓦舒京关于居民对提高食品价格的反应 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2年6月1日)

特别文件

绝密

现将居民对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适当提高肉类、肉类制品和食油价格的决定^①的反应报告如下。

总的来说，全国居民对这一决定的认识是正确的。赞成苏联政府采取这一措施的人所发表的看法的主要意思是，市场价格将会下跌，商店里有肉制品和奶制品，对居民的保障程度将会提高。

6月1日下午，这种情绪在我国的许多城市（列宁格勒，新西伯利亚，喀山，第聂伯罗得罗夫斯克，基辅，明斯克，高尔基城及其他城市）开始占上风。

我国的农村居民尤其赞同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这一决定。

苏联公民还对通过告人民书坦率地解释必须提高价格的原因这一形式本身表示肯定。

例如，基辅国立大学的许多大学生说，苏共中央告人民书是一种好形式，许多地方的领导人正在仿效这种作法。

^① 该决定于1962年5月31日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告苏联人民书的形式公布。

与此同时也有不良的表现。

例如，新切尔卡斯克市电气机车制造厂铸钢车间的工人（将近200人）在上午10时停止了工作，并要求提高计件工资。尽管进行了解释，他们在11时午饭前休息的时候还是前往厂部提出那些要求。路上有五群人加入，厂部附近聚集了约1000名工人，工厂实际上停工。

中午12时，这一群人中一些流氓拆掉栅栏，拦住了一辆从萨拉托夫开往罗斯托夫的旅客火车。他们把拒绝发出警报信号的司机赶下火车，自己爬上车头拉响了汽笛，很快在这辆客车附近聚集了大约2000人。火车的车厢上出现了标语：“肉，油，提高工资”。16时以前这群人还几乎没有散去，他们设置的纠察哨使火车无法开动。将近16点的时候，火车才得以驶入离工厂3公里的机车制造厂车站。

由于党的积极分子和共产党员们进行了解释工作，16时以后一些人分成小批开始散去。但是，这座工厂上第二班的人也停止了工作，部分工人各自回家，另一些工人加入了罢工队伍。继续进行解释工作。但是流氓分子开始活动，他们毒打两名工人，号召大家进行大破坏。采取了整顿秩序的措施。

在一些城市出现了一些反苏传单和标语。

例如，莫斯科市高尔基街的一座楼房有犯罪分子张贴的一张传单，上面写：“今天提高价格。明天等待我们的是什么？”

在紫丁香街心花园张贴的一张传单号召工人们“为自己的权利和降低价格而斗争”。

在基辅铁路胜利车站的站台上，涂写有诽谤苏联政府和要求降低食品价格的标语。

在顿涅茨克市的一根电线杆上贴有一张传单，上面写着：“过去欺骗我们，现在还欺骗我们。我们将为正义而斗争”。

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矿井设备厂内也发现了类似内容的标语。

在莫斯科的巴甫洛沃镇和扎戈尔斯克市也有反苏的传单出现。在列宁格勒市列宁区出现了一张传单。

维堡市 20 号信箱企业的工人卡皮波夫，1935 年出生，无党派人士，于 8 时在自己的胸部挂了一幅标语，上面写着：“打倒新价格”。他企图挂着标语在市里行走，但当即被军人拘留。

还有一些反苏言论。

例如，在第比利斯市，一些人说什么通过这一决定证明经济政策失败了。

新西伯利亚市“西伯利亚机器铸造厂”女工麦什科娃，1937 年出生。她说：“应该鼓动工人起来抗议，反对新价格”。她受到了积极分子们的还击。

在列宁格勒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和格罗兹尼市，一些人讲了类似的话。

还有各式各样庸俗的见解，这些见解的主要意思是，或许应该保持价格不变，降低高收入者的工资，不要再帮助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找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其他途径。

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加强揭发敌对分子和防止危害社会现象的工作。

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 II. 伊瓦舒金^①

^① 在文件上签名表示阅读过的有以下一些人：苏斯洛夫、库西宁、勃列日涅夫、沃罗诺夫、基里连科、波利扬斯基、米高扬、伊利切夫、柯西金、什维尔尼克。

№07038

谢米恰斯内关于居民对提高食品价格的反应 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2年6月2日)

特别文件

绝密

作为对上次呈送的报告的补充，现将国家安全委员会收到的有关居民对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适当提高肉类、肉类制品和食油价格的决定的反应材料报告如下。

在新切尔卡斯克市电力机车制造厂仍然有不良的表现。6月2日，大约在夜间3点，在军队进行干预以后，在此之前聚集的将近4000~5000人的人群终于被挤出厂区，并逐渐散去。军人接管了工厂警卫，该市宣布宵禁，22名领头闹事的人被拘留，其中20名在审问后被释放，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两名领头闹事的人被关押在沙赫特市。平静的局面保持到7时30分。

将近8时，第一班的工人（3个车间的工人除外）开始上班。但是由于受到捣乱分子的影响停止了工作（一开始两个车间，然后除了工具车间、机修车间和电气车间外的其他车间，）。

9时许，厂部附近聚集了约5000人，厂区内有将近1000人，再度开始集会。与此同时，石油机器制造厂的将近400名工人停止了工作。他们离开了工厂，声称他们不能在枪口下工作。其中100人冲进第17号工厂厂区，在那里的某些工人中找到了支持者。

9时50分，所有怠工的人（将近5000人）离开了厂区，向新切尔卡斯克市区方向进发，越过了第一道坦克阻挡线。队伍的前面有人举着列宁像和鲜花。

在我国的其他地区局势平静。许多苏联人赞成党和政府的决定，说采取这种措施是应该的，很好。

库尔斯克车站机务段钳工托卡列克在宣读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告苏联人民书时强调指出：“这是很好的措施。我们主要是面包、糖、面粉、米和其他食品的价格便宜。至于说食油和肉类提价，这是临时的。国家的这些东西多了，价格马上就会下跌。”

库尔斯克市移动设备制造厂工长叶夫多基莫夫说：“我们的政府没有对人民隐瞒临时的困难，这很好。我们把工业搞上去了，但却忽视了农业发展的问題。早就应该采取这种措施了，那样的话就不会出现价格脱节现象。”

莫斯科地铁女工科斯特罗米茨卡娅强调说：“这样做牺牲不大。还可以作点牺牲，只是别发生战争。”

第1479号信箱企业的处长布拉奇科夫说：“这是应该办的事儿，因为必须提高农民的福利。”

清扫工济布罗娃（莫斯科）说：“政府的这种措施看来是形势所迫。要我说，这样做是应该的。往常我买一公斤香肠，以后就少买点，这饿不死人。”

车厢制造厂（托尔若克市）邮递员维诺格拉多娃说：“5月31日，当我听到食品要提高价格的消息时，必里非常不高兴。但是听了告人民书后我认识到这是必要的。所采取的措施最终有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同时，维诺格拉多娃还表示，她感到满意的是，党和政府“坦率地向人民号召并解释了目前的食品形势”。

加里宁车站工作人员兹维列夫、巴奇科娃、伊万诺娃和其他一些人在聊天中说，他们的生活将变得更困难，但是这没有什么，只

要不发生战争就好。

除此以外也出现一些有政治错误的、庸俗和敌视性质的说法。

帕维列茨克车站月台女值班员米哈伊洛娃说：“关于禁止近郊村镇和某些村庄有牲畜的决定是不正确的。如果允许工人和农民养牲畜，现在肉制品就足够了。”

全苏电工学院机械修理所队长佐诺夫说：“个人的牛被杀光了，小牛又没有长大，哪儿会有牛肉？这是一种失误。”

莫斯科碳酸厂科室人员阿佐夫斯基说：“我国政府到处送礼，养活了别人，如今自己没有吃的。现在只好依靠工人摆脱困境了。”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功勋演员扎斯拉夫斯基说：“我们不会由于采取这种措施而死去，但是没有脸见外人，最好是不要再说我们已经超过了美国。我们的广播成天说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听了让人讨厌，这一切都是自吹自擂。”

大学英文女教员别利洛夫斯卡娅说：“我不知道该向授课的小组成员们说些什么。以往我在同学们交谈中，总是依据我国宏伟的计划，说劳动人民的福利不断增长。现在我该说什么呢？我只好不再相信了。”

荣获列宁勋章的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建筑材料和建筑配件工业总局主任工程师梅斯捷奇金说：“把一切不好的东西都推到斯大林身上，说什么他的政策使农业崩溃。但是，在他死后的这段时间中难道还不能把农业搞上去吗？不，农业崩溃显然有不能讲的更深层的原因。”

伊万诺沃造纸联合企业女工扎沃龙科娃在同纺织女工交谈中煽动说：“别闲聊了，应该组织起来，让机器停下来。”

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冶炼厂设计人员西蒙诺夫和安德烈耶夫说，如果工人们象西方国家的工人那样罢工，马上就会取消提高价格。

“斯巴达克”毛纺厂（弗拉基米尔州）女工叶利谢耶娃号召工

人们造反，在场的工人予以应有的回击。

在坦波夫、车里雅宾斯克、顿涅茨克，发生了散发传单和涂刷号召反对苏联政府的标语的事。

在列宁格勒市十月区发现 9 幅反苏内容的宣传画。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弗·谢米恰斯内

№07039

谢米恰斯内关于对提高价格反应的补充材料 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2年6月2日)

特别文件

绝密

现将国家安全委员会收到的有关某些人对提高价格的反应的补充材料报告如下。

6月2日夜间，有人在车里雅宾斯克车站铁路沿线散发了9份传单，传单上写着：“打倒政府的可耻决定。从4日开始罢工”。

6月2日，在莫戈恰市（赤塔州）发现了5份传单，其内容系攻击党和政府的一位领导人。

在KB-1号仓库的墙上（莫斯科市）也有类似内容的标语。

除此以外，某些人有挑拨性的恶毒的反苏言论。

彼得罗夫斯克—外贝加尔冶金工厂（赤塔州）工人季莫费耶夫，在讨论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告人民书时，对约有100工人说：“应该用冲锋枪把他们都打死……”。

伏努科沃飞机场工作人员拉平说：“应该在红场上集会，要求取消提高食品价格的决定。”

下塔基尔车站副司机马祖尔在参加工人大聚会时说：“生活条件恶化，工资下降，而价格却上涨。对现政府没有什么好期望的，必须罢工，要求改善生活条件。”工人们给了马祖尔应有的回击。

哈巴罗夫斯克车站售货亭女工萨扎诺娃在同其他公民交谈时说：“你们是共产党员，干嘛不说话？政权是人民的，起来政变！”

军事建筑分队（格罗兹尼）的工人卡萨耶夫在谈到提高价格时说：“应该搞暴动”。

“全苏机器、仪器进出口联合公司”（莫斯科市）干部监察员罗曼诺娃说：“这是件令人气愤的事，是公债事件的继续，国家榨取老百姓的钱财。日用品价格上涨了还不够，还要提高食品的价格。我想，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大企业的工人一定会举行罢工。”

伏龙芝工厂（奔萨市）工程师古罗夫说：“美国有 200 万受饥饿的人，我们会有 2 亿人。养活了所有的朋友，而养不了自己人。”

阿尔汉格尔斯克州一家建筑单位的司机科列斯尼克说：“生活越来越差，要是肯尼迪向苏联扔一颗原子弹就好了。”

第 2429 信箱企业的主任技师（莫斯科市）布雷托夫说：“要是有人给我们作国际形势报告时说，苏联提高价格的传说是英国广播电台散布的敌意宣传，可事实上英国广播电台是对的。以后怎么能让人相信我们的官方宣传。”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谢米恰斯内

№07040

谢米恰斯内关于某些地区出现敌对行为

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2年6月3日)

特别文件

绝密

作为对以前呈送的报告的补充，现将国家安全委员会收到的由于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定提高肉类、肉类制品和食油价格在国家某些地区出现的敌对行为的材料报告如下。

6月1日在里加市。米济季斯，1922年出生，以前被追究过刑事责任，纠合了数十人，在列宁纪念碑附近发表了反苏演讲。米济季斯被逮捕。

在船舶制造厂（赫尔松市）的一个工人新村，6月2日发现了一块25×36厘米、厚5毫米的金属板，上面焊有大字：“公民们，不要在危机前购买肉制品”，金属板的背面也用这种方法写有恶毒攻击党和苏联国家一位领导人的字句。

6月1日，在基辅市发现两张反苏传单，号召举行群众集会，抗议提价决定。

6月2日早上，在伊兹梅尔市的一处围墙上发现一张传单，号召工人和职员罢工，反对提高价格。

6月2日晚，在丘索沃伊市（彼尔姆州）的一根电线杆上发现一张传单，上写：“喝锯末汤，啃煤块”。

在明斯克市的一处围墙上，6月2日发现有诽谤内容的标语。

6月3日，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市一座住宅楼的基脚部分，有人涂刷了反苏标语。

6月2日夜间，在拉斯卡佐沃市（坦波夫州）郊区的一条柏油路上发现了4处恶毒攻击党和政府一位领导人的反苏标语。

6月1日夜间，工人普洛特尼科夫在坦波夫机务段修理车间内用粉笔在一块固定在墙上呼吁遵守安全规则的金属板上写道：“我们要求增加工资”。

6月1日，莫斯科门捷列夫化工学院一年级学生普什贝什在一张纸上写道：“罢课！没有钱，没有吃的，我不上学。”他把这张纸贴在公共宿舍（波罗的海胡同）的墙上。普什贝什在同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谈话中说，他没有全面考虑就这样做事，现在感到后悔。

在列宁斯克—库兹涅茨基（克麦罗沃州）和赫麦利尼茨克市也发现了散发反苏传单的事。

6月1日，十月革命工厂（明斯克市）铸造车间钳工科莫茨基鼓动上班的工人停止工作。同时他说：“应该揍共产党员，提高食品价格就是他们造成的”。在场的工人们给予科莫茨基应有的回击。

5月31日，第69号企业（高尔基市）磨工丘尔金在工人雷利斯基说可能提价的话后（工人彼得罗夫在场）接着说：“我认为，果真如此的话，全体工人应该写标语牌，到州党委那里去”。彼得罗夫对丘尔金表示支持，说：“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去，因为工资要降低，而我们要活下去”。

“化工建筑”托拉斯一个建筑管理局的一个工人小组（克麦罗沃市）在讨论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告人民书时有人叫喊：“所有食品都给了其他国家，而自己的工人却挨饿。应该去找州委第一书记，对这一决定表示抗议。”

新维亚茨克房屋建筑联合企业（基洛夫州）钳工佩尼科夫对党和苏联政府一位领导人发出恐怖活动威胁。

敖德萨州国家安全局得到的情报说，伊里奇港的一些装卸工不想给外国轮船卸货。已采取了必要措施。

加里宁工厂（彼尔姆市）10号车间的某些人唆使工人们星期一不上班。这个车间的女工、市劳动者苏维埃代表博勃罗娃说：“什么地方都没有真理，当官的都不能相信”。

国家安全机关已采取措施搞清反苏传单和标语的作者，对敌对表现的事实进行取证，追究有这种行为的人的刑事责任，防止不良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再度发生。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弗·谢米恰斯内

№07041

科兹洛夫在新切尔卡斯克地方广播电台的讲话

(1962年6月3日)

亲爱的同志们

新切尔卡斯克市的公民们！

我们受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委托来到你们的城市，以便就地查明引起混乱和破坏城市正常生活的情形。

同志们，我们有信心查明导致如此严重局势的原因。但是现在就可以断言，一些流氓分子是骚乱的教唆者，他们的行为使形势复杂化，导致极其不良的后果，诚实的苏联人民不会充当在企业 and 机构搞大破坏、攻击苏维埃政权和社会组织的代表人物、在铁路上阻挡列车、鼓动和甚至强迫工人扔下自己的工作、破坏城市生活的急先锋。

这些行为旨在反对人民国家的利益，这难道不显而易见吗？他们粗暴破坏了苏联法律。只有那些不顾人民的福利、有个人目的的人，或者上了挑拨离间者的当的人才会这样做。

昨天，我们接见了你们派出的代表，同他们进行了交谈。他们提出了城市和企业的秩序问题，同意我们提出的务必立即恢复正常秩序的问题。他们请求我们在当地的广播电台发表讲话，表明我们对流氓分子制造混乱的态度。你们知道，米高扬同志昨天发表了广播讲话，表明了我们对制造混乱的态度，呼吁大家各自回家和上班，使城市的形势正常化。大部分居民对这一呼吁表示理解，街上的许多人收听了这次讲话。但是，挑拨离间分子为了干扰大家收听

广播，又是吹口哨又是大喊大叫，甚至试图割断广播电台的电线。米高扬同志讲完话后，街上的大部分公民回到家中。但是，流氓分子和挑拨离间分子继续破坏居民的正常生活。

参加座谈会的人员在同我们座谈后回到了街上，打算把同我们会面的情况向聚集在街上的人讲述，但是流氓分子不让他们讲。

我们接见的代表声称，布琼尼工厂的工人之所以停止工作和参加骚乱，是因为在规定劳动定额和商业网工作中存在缺点，以及因为提高肉类制品的零售价格。

当然，在规定劳动定额和组织食品贸易中可能存在缺点，但是难道这是破坏生产和城市生活的理由？

我们可以负责地宣布，我们将认真地就地查清这些企业在规定计划工资中存在的缺点，采取措施改进食品和日用品的商业工作。

至于提高肉类和肉制品的价格，我们应该指出，党中央和苏联政府的这一决定是完全必要的，并将始终不渝地贯彻。

现在已经人所共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高尔基市和斯维尔德洛夫市、顿巴斯和西伯利亚、中亚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工人阶级、我国的所有大小工业地区的工人阶级、所有的苏联人都理解和完全支持党和政府的上述措施。

我们满意地看到。新切尔卡斯克的大部分工人和职员、大学生和大学教师也能正确理解我们党和政府的政策。他们不支持搞破坏的人，不跟他们走。只有布琼尼工厂的一部分工人没有认清所实行措施的实质，上了不诚实分子的当。

昨天，莫斯科播发了尼·谢·赫鲁晓夫的广播讲话。他在讲话中以令人极其信服的语言和他天生的率直解释了党和政府为什么要通过关于提高肉类和肉制品价格的决定。

当然，如果签发降低价格的决定，那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那一定会得到夸奖和赞扬。而通过提高肉类和肉制品价格的决定却不

轻松和不愉快，也知道这样的决定不会受到城市居民的欢呼。

党中央和政府通过这一决定之前，不止一次进行深思熟虑和权衡了所有与提价有关的情形，考虑到了这一措施会使城市居民增加某些开支。一句话，我们心疼地通过了这一决定。但是党和政府仍然迈出这一步。为什么呢？因为党和政府的这些措施是确保国家的畜牧业振兴和农产品丰富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采取这一措施是出于对改善人民福利的关心。为了明天有足够的肉类、食油和牛奶，为了明天生活得更好，今天不得不过紧日子。

为了振兴畜牧业，为了大力发展农业，需要资金和不少东西，以便加强机械化，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农产品成本，使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工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提高物质利益。

在哪里取得这些资金呢？减少对我国工业和住房建设的投资？但是，工业和住房建设是我们整个国民经济和人民福利增长的基础的基础。难道可以毁掉这一基础？任何一个诚实的人都不希望这样做。只有苏联的敌人希望看到我们的国家衰弱，没有力量捍卫自己的荣誉、自由和独立。

同志们，你们知道，高度发达的工业是我们国家强大的国防、加强随时准备给任何侵略者以毁灭性回击的武装力量的基础。

我们不能忘记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法西斯侵略给我们造成的巨大牺牲。我们不能忘记帝国主义者正在重新以战争威胁苏联人民，新的战争可能带来不计其数的牺牲。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难道可以缩减对工业和我国国防的拨款吗？为了保障和平，为了使苏联人民能利用和平的机会为自己的幸福平静地劳动，我们决不能在发展工业和巩固国防上放松努力。

同志们，如果党和政府现在不采取措施加强农业生产，那么我们的困难将增大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必须采取与提高价

格有关的措施。但是，这些措施是暂时的，这一两年内就可以见效，使我们国家食品丰富，价格下跌，生活水平提高。

我们是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这需要每个工人和职员、每个集体农庄庄员、全体苏联人民的共同努力。

你们城市一些没有觉悟的工人受流氓分子的挑动，扔下工作，破坏了城市的正常生活，使国家蒙受损失。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想提醒你们，你们工作的企业是你们的企业，你们所居住的国家是你们的国家。你们以自己没有觉悟的行动使自己的国家蒙受损失，因此使自己受到了损失。能够容忍这种不成体统的事再继续下去吗，能够容忍一小撮流氓、酒鬼和挑拨离间者带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闹事吗？不，决不能容忍。

由于一些行为失控的人造成恣意妄为和无法无天的局势，当局不得不向你们城市派出军人，宣布宵禁，采取其他保护社会秩序的措施。

在我国真正的全民社会主义民主的条件下，在工人阶级的所有社会组织的作用如此强大的情况下，怎么能够通过大嚷大叫和无政府主义的行动来谈论重要的政治问题呢？

这样做的结果除了挑起不必要的情绪和有损苏联人尊严的违法行为以外，什么好结果都不可能达到。

苏联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于它的组织性、纪律性，在于它对共产主义建设事业的忠诚。我国的工人阶级有自己的社会组织，有自己的国家，有自己亲爱的党。党的所有活动旨在确保人民的幸福和利益。

昨天和今天我们去了一些企业，看到这些企业的工人工作认真负责，努力完成生产计划。在一些企业和街道，我们同工人、同新切尔卡斯克的居民交谈。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党和政府采取的措施表示理解，对破坏城市正常生活的人的行为表示谴责。

同志们，必须结束城市的混乱局面，赶快去自己的企业上班。应该坚决呼吁保护秩序，孤立并制服挑拨离间分子，完全恢复城市的正常生活以及所有企业和机构的工作。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相信，新切尔卡斯克的工人阶级、所有劳动者在这一严峻的时刻，一定能够认清形势，认清政府关于整顿城市秩序的指示和要求的必要性。

党中央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人、职员、妇女和青年、所有城市的居民恢复诚实的劳动，恢复秩序，加强组织性。

必须结束被破坏城市秩序的现象，不要使形势复杂化，大家回到家里和企业中去，明天开始上班。城市的正常秩序无论如何也要恢复。

着手工作吧，同志们！

№07042

伊万舒金关于新切尔卡斯克市群众性骚乱 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2年6月7日)

特别文件

绝密

兹报告，由于发表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告人民书，提高肉类、肉类制品和食油的收购和零售价格，从1962年6月1日到3日在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制造厂、以及后来在新切尔卡斯克市发生了群众性骚乱。

上述事件发生的过程如下：

1962年6月1日7时30分，这个工厂铸造车间一个由8~10人组成的造型工小组开始讨论政府关于提高肉类、肉类制品和食油的收购价和零售价的决定。

当时在车间的州党委工业处处长布扎耶夫同志给工人们讲解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告人民书，这时，其他一些工人离开了自己干活的地方，来到了这个小组，他们将近20~25人。

车间主任切尔内科夫同志走到工人跟前，劝他们不要在工作时间讨论，都去干活。但是工人们不听他的话，走出车间，来到了工厂的小公园里，继续争论。这个时候的争论已经具有挑衅性。

厂长库罗奇金同志来到这些不在车间里的工人跟前，劝工人们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

其他车间的工人知道了库罗奇金的讲话后，开始扔下工作，前往交谈的地点。

聚集在小公园里的工人向厂方提出了一系列有关车间劳动条件不正常、厂内缺乏安全技术保障、日常生活条件不好、工资低的意见。工人和厂长的交谈非常紧张，有些人耍流氓，大声喊叫，语言粗野。

应该指出，还在上述事件发生之前，这个工厂已经发生过车身组装车间的某些工人来到工厂后三天不干活、要求厂方改善劳动条件的事，由于安全保障条件不好，这个工厂的绕线绝缘车间发生过200名工人中毒的事故。

1962年初，该厂的行政机关重新审核了工作定额，结果使某些工人的工资下降了约30%。

由于重新审核工作定额是在不同的时间内（2~4月份）进行的，因此铸钢车间的工人在事件发生之前领到下降的工资很不高兴。在此期间没有进行必要的党的教育和解释工作。

关于电力机车制造厂形势不佳的情况（劳动条件和劳动工资情况），厂党委和苏共新切尔卡斯克市委是知道的。但是，正如后来查明的那样，苏共新切尔卡斯克市委对这个工厂已经形成的情况估计不足，没有把即将提高某些食品价格的情况及时向党和共青团的积极分子传达，因此该厂的积极分子不能马上对肇事者施加果断的影响并制止事态扩大。

现已查明，厂长库罗奇金同志不关心工人的需求，态度蛮横，官僚作风严重，促使了工厂形势加剧。

在事件发生期间，库罗奇金同志在工厂的小公园内没有同工人达成相互理解后，摆脱了人群，去了厂部。厂长走了以后，聚集在小公园里的工人中有人开始招呼大家去厂部。11时，在午饭前休息的时候，造型工乌多夫金跑进车间，用一张纸书写了挑拨性标

语。那里的共产党员们试图从他手里抢走标语，但是被乌多夫金撕掉烧毁。

此时厂区内已聚集起一个一百多人的群众，向厂部走去。出来休息的其他车间的工人开始加入这一群众。群众走近厂部的时候，锻压车间车工切尔内赫打出了挑衅标语：“肉，牛奶，提高工资”。

11时30分，一大群人走向厂部，穿过了厂部的大门，来到了工厂附近的广场上。

在此期间，在这个工厂的市委书记，厂党委书记和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员试图通过工厂的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人对不满的人开展工作，但是没有取得成功。

厂部附近的广场上已经聚集了300~500人。他们三五成群，情绪激动，议论某些食品的新价格和该厂产品的计件工资额问题。

人群中议论纷纷，散布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有人喊叫，吹口哨，挑拨离间，耍流氓。聚集在厂部前面的人让厂长出来，对他进行各种谩骂侮辱。在一根金属杆上挂出了一幅标语：“肉，牛奶，提高工资”。厂内气氛极度紧张。

12时以后，一列从萨拉托夫开往罗斯托夫的旅客列车被这群人阻挡，使这条路线上的火车运行在一段时间内停止。歹徒冲进司机室，开始鸣汽笛，使更多的工人从工厂和附近工人新村赶来声援。

在此之前，苏共州委书记马雅科夫同志、罗斯托夫州执行委员会主席扎麦京同志，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伊万诺夫同志带领以国家安全局副局长拉扎列夫同志为首的一个工作人员小组来到了工厂。

广场上聚集了4000多人，工厂的大部分车间停工。

13时，工人们继续在被挡住的列车附近讨论提价问题，群情激昂。一些表示应该停止混乱现象的共产党员和工人被粗暴地挤到一边。人群中开始出现流氓和酒鬼。在厂部大楼的正面，一些流氓

当着众人的面把肖像撕毁。

工厂总工程师约尔金同志试图爬进司机室关掉汽笛，但是被人从阶梯上拖下来殴打。

14~16时，人群的大部分人聚集在被阻挡列车附近路基上。

在有反苏情绪的人中，有人在火车头的煤水车上用粉笔涂写反动标语。

14时40分，由州国家安全局局长率领的一些契卡人员和一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纠察队员及身穿制服的民警共同采取措施，分割人群，使人群离开路基，让火车通行。

采取措施后，列车运行了一段距离，但是由于火车司机胆怯，流氓分子破坏紧急制动阀，使列车不能继续前行。人群在最狂妄的人的影响下重新占据铁道，使火车无法运行。

只是在16时的时候才把流氓分子赶下列车，清除了车厢顶部的人，让火车向相反的方向开到了机车制造厂车站。

在此之前，苏共州委第一书记巴索夫来到了工厂。

16时20分，流氓分子转移到了厂部前。他们更加凶恶地开始肆无忌惮地殴打积极分子和劝说他们不要制造混乱的人。

一些抵达工厂的州和市的党的领导工作人员一直呆在厂部的厂长办公室里，没有到工人中，没有采取任何维持秩序的果断措施。

流氓分子越来越猖狂。有人提出接管工厂的要求。人群又是喊叫又是吹口哨，涌入厂部的内院，通过朝着工厂方向的大门冲向党和苏维埃领导工作人员所在的厂长办公室。

人群中发出各种各样的叫喊声，要求他们到广场上给工人讲话。

16时30分，厂部大楼阳台上安上扩音器。苏共州委第一书记巴索夫同志、罗斯托夫州执行委员会主席扎麦京同志、苏共新切尔卡斯克市委第一书记洛吉诺夫同志和厂长库罗奇金同志走近了麦克

风。

人群安静了下来。聚集在那里的人等待他们讲话。但是，巴索夫同志在介绍苏共中央告人民书时刚讲了几句，人群中就有人叫嚷：“我们已经读过告人民书，我们自己识字。你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往后怎么生活，工资定额减少，物价却上升了。”

这时，扎麦京同志走近麦克风，人群不让他讲话。之后，库罗奇金同志刚要开始讲话，有人就向阳台上站的人扔石块、金属物，还有人扔玻璃瓶。

流氓分子爬上阳台，企图使用放在那里的麦克风，但是没有用成，因为导线被及时切断。一些流氓进入厂部搜寻领导人。

这时，混在人群中的国家安全工作人员发现了领头闹事的人，悄悄地给他们照了相。

此后将近两个小时中没有采取整顿秩序的任何果断措施。厂内肆无忌惮地殴打共产党员的现象继续存在。

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报告了这一紧急事态。18~19时，动用了警察力量维持工厂秩序。抵达工厂的一支200人的民警队伍被击溃逃离，3名民警被毒打。

在铁路上行驶的机车停了下来，流氓们开始拉响汽笛。

6月1日日终前，在20~21时，5辆满载士兵的汽车和3辆装甲运输车驶向厂部附近的广场。人群向汽车和装甲车迎面跑去，挡住了去路，车辆被迫停下。

由于军事指挥人员行动不坚决，上述分队的军官和士兵在前往工厂途中受到人群的进逼后惊慌失措，丧失了活动能力。

流氓分子开始想方设法嘲弄和侮辱军人。

一名犯罪分子畅通无阻地爬上一辆装甲运输车，号召人群继续制造混乱，有一名士兵竟同他们同流合污。此后，载有士兵的车辆在口哨声、叫嚷声和玩笑声中掉转车头返回。

人群开始在广场上聚会。发言的人建议继续磨洋工，不要解散，派出代表团去权力机关，要求降低肉类、肉类制品和食油价格和工资。

混乱仍在继续。派到工厂调查情况的一辆载有无线电台的军用车辆被人群推翻，一名士兵手臂骨折。

过了一会儿，一个加强的军事分队开赴集会地点，但被人群合围，然后在口哨声和流氓的叫喊声中返回。

聚会和工厂附近的胡作非为仍在继续。最猖狂制造混乱的人号召派代表团去城市的其他工厂，鼓动那里的工人停止工作。

当晚，一个由大约 150 名最恶毒的流氓组成的人群前往电极厂，破门而入，冲进厂区，强迫那里的工人停止生产。但是，电极厂的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人给他们以应有的还击。

当一些流氓进入搅拌冲压车间、企图搞乱这个车间的工作秩序时，共产党员工人维尤年科说：“马上给我滚出车间，我不允许在这里胡闹。如果你们不马上出去，我就和你们拼了，把车间炸掉，和你们同归于尽。”他这样说完后，流氓们马上跑出了车间。

在军队没有进入电力机车制造厂之前，人群一直聚集到深夜。

应该指出的是，在混乱的第一天，发生过一些共产党员、民警、苏军官兵被毒打的事。

流氓们袭击坦克，毁坏坦克上的仪表，向坦克扔石块，造成一些坦克兵受伤。

6月2日早晨7点钟前，工人们来到工厂，但是没有干活，而是聚集在车间附近，热烈议论头天发生的事。

电力车间开始工作，工具车间和其他车间被流氓分子封锁，他们用暴力把工人们赶出车间，迫使他们参加制造骚乱。

早上8时，铸钢车间的工人前往新的机器车间，然后前往厂部。车体制造车间和其他车间的一些工人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去。

人群拽下厂部大门，冲进广场。此时火车开动，一些流氓冲出人群，拦住火车，拉响了汽笛。

6月2日，铁路交通中断。人群在挑拨离间者和挑衅者的鼓动下，举着红旗和列宁肖像，在一些儿童和妇女的护卫下前往城里。

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部采取了措施，在图兹洛夫河桥上设置道路障碍。尽管桥上三个地方用坦克、汽车和士兵阻拦，愤怒的人群还是轻而易举地通过了大桥，继续朝市区前进。人群继续沿着莫斯科街前进，通了市中心，走向苏共市委所在地。

在向城市进行的途中，一大批好奇的人，其中主要是青年人加入了行进队伍。他们中有的是刑事犯罪分子，他们的挑衅活动使形势更加紧张。

民警机关明知这座城市内有大量有前科犯（截止6月1日有1586人）也没有及时采取措施防止他们参加骚乱。

人群走近市委大楼后，一些最穷凶极恶的流氓和领头闹事的人开始向大门和窗户扔石块和棍子，击溃了警卫人员的抵抗，冲进建筑物内部，砸窗户，损坏家具，扯下肖像烧毁，殴打室内的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几名流氓爬到阳台上，打出红旗，挂出列宁像，以示挑衅。一些疯狂参与胡作非为的人开始演讲，要求降低食品价格，提高工资。其中有的人演讲了两三次。在他们演讲的时候，人群中喊叫声此起彼伏，向共产党员发出威胁，侮辱士兵，向他们投掷石块，木棍，号召士兵和军官支持犯罪分子。与此同时，一大群人冲向国家安全局和市民警处大楼。

很快传来了一阵叫喊声和口哨声，石块飞向窗户和大门。人群中有人开始要求交出某些被逮捕的人。然后，怒气冲冲的流氓砸坏了民警机关的大门，冲进了第一层，另一些人则从屋顶和围墙进入院内。

在抵抗他们和防止密件和武器被抢中发生了白刃战。

一些流氓在袭击时手中持有刀子和木棍。一名冲进大楼的犯罪分子扑向一名士兵，夺走了他的冲锋枪并企图对他开枪。这个时候，向进攻的犯罪分子开了枪，部分冲进来的人被逮捕，其余的人逃出去。试图占据国家安全机关和民警机关的人群没有得逞以后开始撤退，再度前往市委会。在此之前，市委大楼内的流氓已被赶出，由军队的一个分队封锁。人群再一次企图夺取士兵手中的武器。

守卫市委大楼的军人因此使用了武器。

骚乱被平息以后，收集到 20 具尸体，其中两名妇女。尸体被埋葬在这个州的不同地方。将近 40 人受伤，其中 3 人死亡。

为了制止骚乱，向该市增派了部队，实行了宵禁。

稍后，电台播发了阿·伊·米高扬的讲话。这时一些以年轻人居多的流氓分子叫喊敌意的流氓口号，污辱军人，要求降低肉类和食用油价格。

在市委、国家安全机关和民警机关附近聚集的人群最多。但是在实行宵禁后骚乱的参加者被军队和民警驱散。

6月3日清晨，电力机车制造厂的一些修理工去厂里上班。不久，他们中的一些人三五成群走出了工厂。路上，一些步行或乘汽车前往市里的人群（10~15人）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快到8点钟的时候，市民警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大楼的对面以及市党委大楼的附近又聚集起一大群人。到9点钟的时候，民警机关附近有将近150人。这个时候一名妇女号啕叫嚷，说什么她的儿子被打死了，引起许多人围观，街上聚集的人达500名。人群群情激愤，步步逼近士兵组成的隔离带，要求释放被捕的人。

为了分散人群的注意力并对其施加影响，在“胜利”影剧院安装了扩音器，转播头天录音的阿·伊·米高扬同志的讲话和军区司令

关于实行宵禁的命令。

从12时起，共产党员、群众纠察队员和工人积极分子在市区展开积极的群众性鼓动宣传工作。

15时广播了弗·罗·科兹洛夫同志的讲话，人们十分认真收听他的讲话。人群的情绪出现了转机，开始慢慢散去。但是还能听到一些恶意的叫喊和威胁的声音。

17时前，市区的秩序恢复。

6月3日，弗·罗·科兹洛夫和阿·伊·米高扬前往合成材料制品厂，并召集电力机车制造厂的共产党员积极分子开会。

实行宵禁后，从6月3日夜间到4日有将近240人受到拘留和审查。

6月4日，电力机车制造厂开工。几乎所有工人都去上班，工厂正常运转。夜班完成了生产计划的150%。市区情况正常，生活步入正轨，大部分公民正确理解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告人民书。

工人和城市居民谴责骚乱参加者的挑衅犯罪行为，并开始采取措施帮助当局恢复秩序。

共产党员、舆论界、民警和群众纠察队的作用明显提高。

应该指出的是，在最紧张的时刻大部分企业的积极分子坚守岗位并顺利完成了生产计划。

许多工厂的工人对企图拉拢他们参加骚乱的挑拨离间分子和流氓分子予以应有的还击。例如，6月2日早晨，一些流氓分子从石油机器制造厂冲进了共产主义劳动集体的合成材料制品厂，并企图进入天然气分配站，以便使工厂停工，招引这个厂的工人前往市委闹事。

以先进生产者科什卡列夫和佐辛同志为首的这个站的工人们阻止了他们行动。蒸汽锅炉站和锅轮压缩站的工人也对一些流氓进行了反击。第21车间库兹涅佐夫同志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对挑拨离间

者进行了反击，对同志们产生了良好影响。第3车间的女工弗拉索娃在有人试图让她离开工作岗位时说：“你们去吧，去吃肉吧，我不想去，我不希望战争！”在车床制造厂、永久磁铁生产企业、尼科利斯基工厂、陶瓷管生产企业和农机制造厂都没有上挑拨者的当，尽管向这些单位派去了“代表团”。

苏共中央书记弗·罗·科兹洛夫在尼科利斯基工厂发表讲话时，工人们都很注意地听。他们斥责在新切尔卡斯克市制造骚乱的人。

随后几天（6月5、6、7日）中，采取了使城市生活和企业工作完全正常化的措施。取消了宵禁，从城里撤出军队，恢复了交通。各工厂、机关和学校根据市党员积极分子的倡议召开群众大会，谴责制造骚乱的流氓分子的犯罪行为。商业系统存在的一些缺点得到克服，居民的食品供应情况好转。

电力机车制造厂采取了某些组织措施，如任命阿布罗斯金同志为新厂长，受到工人们的欢迎。

骚乱期间拘留了146名可疑分子和被认出是参加骚乱的人。

被捕者中有：

鲍里索夫，1937年生，“南方煤气管道建设公司”钳工。1953年因偷盗被判两年劳动改造。鲍里索夫参加了胡作非为。6月3日，他在人群中说要对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一位领导人实施恐怖活动。他参加了一个企图在新切尔卡斯卡面见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的小组，谈过一些挑拨离间的话。在审讯中鲍里索夫对自己的恐怖活动意图和其他犯罪活动供认不讳。

舒瓦耶夫，1937年出生，新切尔卡斯克市第2寄宿学校厨师。6月2日，舒瓦耶夫在国家安全机关和市民警机关的大楼附近的人群中活动，恶毒地号召人群把共产党员吊死，鼓动士兵把枪口掉转过来对准军官。

库瓦尔金，1928年生，有前科，无固定职业。6月2日积极参

加进攻苏共市委。安全机关早就知道库瓦尔金有反苏情绪，他曾经试图同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联系，等等。

目前正在继续清查和逮捕骚乱的积极参加者。

对于新切尔卡斯克的骚乱的最积极参加者准备开庭审判。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 伊瓦舒金

1962年6月7日

№07043

谢米恰斯内关于新切尔卡斯克局势恢复正常 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2年6月12日)

特别文件

绝密

兹报告，新切尔卡斯克市的局势已完全正常，该市恢复正常生活。所有的企业，其中包括电力机车制造厂，均连续开工，正在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居民的食品供应得到改善。

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到电力机车制造厂和其他企业看望、新切尔卡斯克市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以及各企业和机关后来举行的声讨骚乱分子犯罪行为的大会对该市工人和其他居民的情绪有正面的影响。

任命深受工人尊敬的电力机车制造厂前厂长阿布罗斯金同志为该厂厂长的决定受到了工人们的欢迎。工人们感到满意的是，工厂新的行政机关采取有力措施消除劳动、日常生活和公共饮食的组织工作中存在的缺点。

6月9日，原来最先开始磨洋工的铸钢车间的工人及其他一些车间的工人向工厂的行政机关递交了书面申请，或以口头表示，请求允许他们在星期天（6月10日）工作，以弥补骚乱造成的损失。这一倡议受到了赞扬，同时向工人们解释说，星期天是法定的休息日，应该按规定办事。

一些骚乱的参加者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出面认罪。例如，6月9日，电机技术学校的学生瓦西里耶夫和多罗加夫采夫（两人都是共青团员）前往十月工人新村区民警科，检讨了自己的行为，并请求给他们赎罪的机会。

鉴于发生大规模骚乱，国家安全委员会向罗斯托夫、沙赫特和塔甘罗格等城市派去了以伊瓦舒金同志和扎哈罗夫同志为首的140名刑侦人员和领导人员。为了发现和防止无线电爱好者向国外播发不合适的消息，向新切尔卡斯克和沙赫特派去了5辆装有无线电接收机和测向技术设备的无线电反侦察勤务车。

截止6月12日，国家安全机关共发现150多名骚乱的最积极参加者。正在对他们的犯罪活动进行立案，以便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他们中有53人已经被捕。他们是：

В.П. 鲍里索夫，1937年生，“南方煤气管道建设企业”钳工，去年被追究过刑事责任，骚乱期间对苏共和苏联政府的一位领导人发出过恐怖威胁。

В.Г. 库瓦尔金，1928年生，无固定职业，有前科。积极参加袭击市党委。国家安全机关掌握有关于他的反苏情绪和企图同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建立联系的材料。

А.М. 奥特罗日科，1939年生，线路装配工。6月2~3日，他胡作非为，极为猖狂，企图唆使苏军士兵不服从指挥，要求撤走军队，挑动人群闹事。以前曾对他的熟人散布反苏谣言。

В.Г. 舒瓦耶夫，1937年生，寄宿学校食堂主管厨师。号召人们惩治党的积极分子和苏军军官，说过他要亲自参加暴力行动的话，逮捕他的时候没收了他的一把斧子。

В.И. 莫克罗乌索夫，1923年生，机床制造厂精整工。所谓的面见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代表团成员。在攻占市委大楼时在阳台上向骚乱分子发表挑衅性讲话。

最近几天仍有一些表现出敌对情绪的事件。

在一些公民的来往信件中发现了由“人民委员会”签署的题为“第一次最后通牒”的匿名文件。要求允许亲属探望受伤的人，告知死者尸体的埋葬地点，并威胁说，如果不执行他们这些要求就要告诉外国人。在电力机车制造厂的一个车间里还发现了一份反苏传单。经查明，书写传单的人叫 B.M. 博加特廖夫，1941 年生，上述车间的六角车车工。还是在这个车间，发现了威胁车间主任的字条；墙上还张贴有反苏标语。在新切尔卡斯克赫尔岑大街的拱形门上刷写有“罢工万岁！”的标语。

目前正在查寻匿名文件的作者和涂写标语的人。

在新切尔卡斯克，共有 22 人被打死和在医院因伤势过重死亡。有人因骚乱中受伤前往医院就诊，这些人中大部分是 18~25 岁青年人。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弗·谢米恰斯内

1962 年 6 月 12 日

№07044

谢米恰斯内关于在新切尔卡斯克骚乱中死人情况 给赫鲁晓夫的报告

(1962年6月14日)

特别文件

绝密

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兹报告新切尔卡斯克大规模骚乱期间被打死的人员情况。共打死23人，其中18人已查明身份，另5人身份尚未查明。被打死的人是：

Ф.Г. 利曼采夫，1917年生，电力机车制造厂装配车间计划分配室工人。他在市党委带头搞破坏，号召公民们去市民警分局解救被捕的人。

В.Ф. 费多尔科夫，1927年生，新切尔卡斯克市生活服务联合企业工人。手持自制的一面旗率领一大群人冲进市民警分局。

Ю.Ф. 季莫费耶夫，1940年生，电力机车制造厂组装车间钳工。

В.С. 德拉切夫，1941年生，电力机车制造厂工人，有前科。

П.Я. 维尔舍尼克，1944年生，电力机车制造厂新机器车间车工。

Е.И. 斯列普科夫，24岁，电力机车制造厂钳工。

В.Н. 格里增科，1941年生，电力机车制造厂钳工。

В.К. 卡尔边科，1944年生，电力机车制造厂铣工。

К.К. 克列普，1916年生，暂无工作。

В.П. 利尼克，1937年生。

В.В. 康斯坦丁诺夫，1940年生，第7技校学生。

В.И. 阿弗杰耶夫，1932年生，采矿机器制造厂车工。

В.И. 索洛维耶夫，1940年生，农业机械化学校学生。

А.Н. 季亚科诺夫，1915年生，采矿机器制造厂仓库主任。

А.Д. 格里博娃，1922年生，市生活服务联合企业女理发师。

А.М. 兹韦列夫，1941年生。

А.М. 希托夫。

М.С. 捷尔列茨基。

尸体埋葬在该州的5座公墓。

国家安全机关同检察机关和民警机关一道侦查和逮捕骚乱的最积极参加者，共逮捕了49人。他们是：

В.И. 莫克罗乌索夫，1923年生，车床制造厂精整工。1942年因临阵逃脱被判刑，后因从劳动营逃跑3次被判加刑。1955年因盗窃被判7年徒刑，但提前假释，系进攻市委大楼的积极组织者。是最先冲进大楼的一个人，在阳台上号召歹徒积极行动。是面见领导代表团成员，在同党和政府领导人交谈时态度傲慢无礼，恶意攻击并当面发出威胁。

В.П. 鲍里索夫，1937年生，“南方天然气管道建设公司”钳工。1953年因盗窃被判刑，是大规模骚乱的积极参加者。在骚乱中号召对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位成员进行恐怖活动，后来又同骚乱的其他参加者商量通过无线电向外界播发关于新切尔卡斯克发生动乱的消息。

В.Д. 科罗捷耶夫，1939年生，1958年因入室偷盗被判刑，1960年因耍小流氓被判刑，被捕前系电力机车制造厂铸钢车间美

工。6月1日，他同本厂的一名钳工切尔内赫一道写了一幅标语：“肉，油，提高工资”，并在厂部附近的骚乱人群中打出这幅标语。

A.Φ. 扎伊采夫，1927年生，国营农场巡查员，1952年因偷盗被判刑，1960年因流氓行为和酗酒被判刑，是大规模骚乱的积极参加者，带着旗子走在骚乱人群的最前面，号召推翻苏联政府，让大家躺在地上，阻止坦克前进。

Г.М. 谢尔班，1935年生，“石油机器制造厂”车工，号召该厂和第17工厂的工人制造动乱。在第17工厂他扯下旗子，随骚乱参加者一道前往市委，首先冲进市委大楼，在阳台上发表演讲。

Е.П. 列弗钦科，1935年生，СУ-31女警卫人员，1959年因偷盗被判刑。6月2日，她首先冲进苏共市委大楼，在阳台上煽动说什么被捕的人在民警机关受到毒打，带领人群冲击国家安全机关和民警机关，并唆使人群袭击。

М.А. 库兹涅佐夫，1930年生，电子工厂钳工，1950年因偷盗被判刑。6月2日，作为骚乱的参加者在苏共市委附近的广场上，站在坦克上发表演讲，号召人群制造动乱。

И.П. 斯卢任科，1932年生，精炼托拉斯装卸工。6月1日号召电力机车制造厂的工人继续骚乱，建议派代表团去其他工厂，同时散布谣言说，“罗斯托夫农机制造厂”的工人已经罢工，扬言要对上班工作的人下毒手，对苏共和苏联政府发出威胁性叫嚣。

A.Е. 杰夏特尼科夫，1939年生，电力机车制造厂车工徒工。6月1日与骚乱的其他参加人员撕毁了苏联政府领导人的肖像。

A.М. 奥特罗什科，1939年生，技术段安装工，在他周围的人中散布敌意宣传。在大规模骚乱时向军官们提出撤退军队的要求，污辱军人，号召士兵反对军官。

在大规模骚乱进行这一类反对苏军官兵活动的人还有：

В.Г. 舒瓦耶夫，1937年生，寄宿学校厨师。

В.Т. 津佐夫，1939年生，水力机械化段工人。

П.И. 布盖丘克，1937年生，电力机车创造厂钳工。

Г.Г. 卡特科夫，1926年生，电子工厂拖拉机手。

В.Д. 切列潘诺夫，1933年生，他不仅发出号召，而且参与殴打士兵。

被捕的人中还有：

Г.Г. 拉连科夫，1938年生，无固定职业。骚乱中同其他流氓分子一道冲进市民警分局，打碎那里的玻璃并进行其他破坏活动。

П.П. 西乌达，1937年生，电力机床制造厂装配车间钳工，厂部附近大规模骚乱的积极参加者。该厂总工程师叶尔金同志发表讲话时，西乌达手里拿着一根绳子，在叶尔金的头顶上晃来晃去。

А.П. 米罗诺夫，1933年生，电力机车制造厂车工。6月2日，他参与袭击苏共市委，并在市委大楼阳台上发表演说，要求取消政府关于提高肉类和食油的收购和零售价格的决定。骚乱平息后他逃往斯摩棱斯克，在那里被查出并逮捕。

截止6月11日，有85人因被怀疑积极参加大规模骚乱被捕，对其中一些人已办好逮捕证，他们是：

О.С. 多尔戈维亚佐夫，1944年生，“苏联采购部实验、技术、大型粮仓和制粉机器制造总局”下属一个工厂的装卸工人。6月2日，他积极参加大规模骚乱，在苏共市委大楼内胡作非为，从墙上撕下肖像并从阳台上把肖像扔向街上的人群。

Г.А. 贡恰罗夫，1940年生，电力机车制造厂制小车车间钳工。6月1日，他首先冲进入厂部大楼，并对车间工长纳索诺夫同志使用暴力。6月2日，伙同其他人带领一群人从工厂前往市内。

С.С. 索特尼科夫，1937年生，车工，苏共党员，人民纠察队参谋长。在石油机器制造厂和电子工厂搞串连，号召工人们支持骚乱，提议切断电力机车制造厂的煤气。在群众集会上演说，并号召

6月2日去市里“示威”。

同时我报告，苏共罗斯托夫州委提供的有关海托维奇同志的材料有误，罗斯托夫州委处长托尔斯托皮亚坚科同志报告说，海托维奇在阳台上发表演说，号召人群闹事。后来查明，Г.И. 海托维奇，1900年生，基什尼奥夫人，原是矿业中等技术学校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教师，退休金领取者，1919年入党。他确实在阳台上发表讲话，但他是进行爱国主义演说。原来，托尔斯托皮亚坚科同志在离阳台很远的地方，并没有听清他讲什么就作出不真实的推测。共青团市委指导员列麦什科同志指出，海托维奇说的是爱国的话，列麦什科劝他不要再讲了，因为人群中有人扬言要揍他。超期服役军人波列扎耶夫证明了这一情况。他强调说，海托维奇的出发点是爱国的，他呼吁用其他方法解决问题。

骚乱的积极参加者中，敌对分子由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流氓分子和其他制造动乱分子由民警机关在检察机关的监督下立案。对于骚乱的最积极和最恶毒的组织者和挑拨者，将在新切尔卡斯克对他们进行公开审判，依法严惩。

目前正在继续对骚乱的组织者参加者进行侦察。

6月12日，在电力机车制造厂的叉车车间和锻造车间召开了工人大会（将近700人参加），会上这两个车间的工人们对于骚乱进行了声讨。其他一些企业最近几天也召开了工人大会，声讨流氓分子和部分觉悟不高的工人的敌对行为。在这些会议上，工人们和职员们纷纷要求把刑事犯罪分子从城市里清除出去。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弗·谢米恰斯内

1962年6月14日

№04544

谢米恰斯内和鲁坚科关于对新切尔卡斯克案件
进行诉讼提交苏共中央的备忘录

(1962年7月13日)

绝密

特件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B.E. 谢米恰斯内和苏联总检察长 P.A. 鲁坚科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上就必须在新切尔卡斯克市进行公开诉讼一事的备忘录及公诉书草案

1962年7月13日

附件 1, 备忘录

特件

绝密

我们报告, 今年6月1~3日在新切尔卡斯克市发生了大规模的骚乱, 经揭发, 主动参与者116人, 现已被查办。

侦查证实, 今年6月1日在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制造厂一小撮流氓刑事犯和贪图私利者利用部分工人就某些问题——工人的生活组织和劳动组织问题、重新制订个别品种制成品的定额与计件工

资标准问题、以及个别厂领导对工人的需求有时采取不正确的，甚至是冷酷的态度——利用部分工人、管理人员提出的合理要求，挑起事端制造混乱。

参与这次有组织土匪行动中的人中，最猖狂的挑拨者和参加者：А.Ф. 扎伊采夫、Г.М. 谢尔班、В.И. 切尔内赫、В.Д. 切列帕诺夫、Е.Н. 莫克罗乌索夫、Г.Г. 卡特科夫、М.А. 库兹涅佐夫、А.А. 科尔齐、В.Г. 舒瓦耶夫、И.Л. 斯卢任科、Г.А. 贡恰罗夫、С.С. 索特尼科夫、Е.П. 列夫琴科夫和 Ю.В. 杰缅季耶夫。对他们的侦讯近期内即将结束，此案的起诉书草案附上。

拟定于今年8月初在新切尔卡斯克市对上述人犯进行公开审理。俄联邦最高法院巡回法庭接受委托审理此案。控方由俄联邦检察长出任，并由电力机车制造厂的部分工人出任社会控诉人。

拟邀新切尔卡斯克市各工厂工人，党的积极分子和各社会团体的代表出庭旁听。

审理工作拟在拥有600个座位的新切尔卡斯克市驻军军事俱乐部进行，因为无论是在工人住宅小区，还是在市区都没有其他适合诉讼的辅助性设施，并且它的规模能够容纳更多的工人出庭旁听。

整个审理过程可以通过市有线广播网定时转播，但地方报刊不发表与此有关的任何消息。

在此案审理期间，允许苏共新切尔卡斯克市委在各个工厂的个别车间召开工人大会，要求严惩组织大规模骚乱的犯罪分子；在此案审理完毕之后，允许召开工人大会以示赞同判决。

其余参与大规模骚乱、必须予以查办的9个人的案件已按司法管辖权办理移交，而另外93人的案子将在侦讯工作结束后，由罗斯托夫州法院审理。

同时我们报告，在对在押人员案件的侦查过程中，有证据表明，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制造厂的一些领导人，包括前任厂长库

罗奇金在内，在有关工人的劳动组织和生活组织问题上，以及在处理工人意见，解决群众需求等工作中有渎职行为。

据初步数据表明：由于工厂毫无根据地提高一些品种制成品的定额与降低计件工资标准，导致个别类别工人的工资下调；一些车间缺乏基本的卫生防疫条件；等等。

据此，拟在对骚乱主动参与者的公开审理结束后，委托苏联检察院对这些事实进行侦查，并根据其结果追究有罪者的责任。

苏共罗斯托夫州委（A.B. 巴索夫同志）同意此备忘录中所陈述的提议。

请审阅

B. 谢米恰斯内

P. 鲁坚科

附件 2，起诉书草案

公 诉 书^①

第 22 号案控诉：

扎伊采夫·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
库兹涅佐夫·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
切列帕诺夫·弗拉基米·德米特里耶维奇，
莫克罗乌索夫·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
科尔卡齐·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

^① 文件上有如下批注：“批准。苏联总检察长、国家特别司法参事 P. 鲁坚科”。

索特尼科夫·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
舒瓦耶夫·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吉耶维奇，
列夫琴科·叶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
触犯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77及79条；
切尔内赫·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维奇，
贡恰罗夫·根纳季·安德烈耶维奇，
斯卢任科·伊万·彼得罗维奇，
卡特科夫·格里戈里·格里戈里耶维奇，
谢尔班·格里戈里·米哈依洛维奇，
杰缅季耶夫·尤里·瓦西里耶维奇，
触犯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79条。

1962年6月1~3日，在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制造厂和罗斯托夫州新切尔卡斯克市一些流氓刑事犯罪分子挑起大规模骚乱，匪徒们冲击和破坏了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制造厂工厂管理处、苏共市委、市民警局和市局执委会等机关驻地，殴打部分民警、军人和其他负责维持秩序的人员。

这些犯罪行为破坏了电力机车制造厂、新切尔卡斯克市其他工业企业的一些车间以及铁路运输的正常工作秩序。

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所进行的初步侦查证明，1962年6月1日一小撮流氓刑事犯罪分子和贪图私利者利用一些工人就有关工人劳动组织和生活组织，重新制订个别品种生产制成员的定额与计件工资标准等问题对厂管理人员提出的合理要求，挑起事端，制造混乱。

此案被告 А.Ф. 扎伊采夫、М.А. 库兹涅佐夫、В.Д. 切列帕诺夫、Б.Н. 莫克罗乌索夫、А.А. 科尔卡齐、С.С. 索特尼科夫、В.Г. 舒瓦耶夫、И.П. 斯卢任科、Г.Г. 卡特科夫、Г.М. 谢尔班、Е.П. 列夫琴科、Г.А. 贡恰罗夫、В.И. 切尔内赫和 Ю.В.

杰缅季耶夫是发生在新切尔卡斯克市的大规模骚乱、土匪行为和破坏活动的最主动的参与者和组织者。

流氓团伙拉响警笛是直接造成电力机车制造厂内部骚乱的挑衅性行为之一，被告 В.И. 切尔内赫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

6月1日早晨，就在铸钢车间一部分工人离开工作岗位来到工厂管理处，希望就其所关注的问题得到答复的时候，一伙受人指使，意图挑起事端、组织大规模骚乱的流氓，在对厂气压机站工作人员使用暴力后，闯入站内并拉响警笛。

关于这一点被告切尔内赫在6月28日的审讯中供认：

“为了让所有的工人中断工作并集合在工厂管理处附近……我和一个15人左右的团伙一起来到气压机站。在那儿我们拉响了工厂的汽笛……是我把汽笛拉到了最大限度。当气压机站的工作人员试图关掉警笛时，我们一伙，也包括我在内，阻挠了他们。”

警笛拉响后，其他车间的工人以及附近各居住区的住户都开始通向工厂管理处，从而使得工厂管理处门前的广场上聚集了一大群人。

这时，人群中的流氓分子开始大声喧哗，吹口哨，高呼挑拨性口号，还拦截一列行驶在铁路上的从萨拉托夫开往罗斯托夫的客车，并在控制车头后开始拉响警报。因而城市周边地区的居民开始涌向骚乱发生地点，聚集的人数急剧增加，并开始有酗酒的人出现。

为了进一步扩大骚乱事态，被告 В.И. 切尔内赫伙同在另案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В.Д. 科罗捷耶夫制作了挑拨性标语并带入暴动的人群中。标语后来被挂在一个从四处均清晰可见的高大的金属柱上。

上述罪行有证人 В.Д. 科罗捷耶夫、Е.И. 马尔达里、А.С. 阿福宁、Н.Т. 叶法诺夫、П.И. 奥辛尼科夫和其他人的证言证

实，其他物证和化学鉴定结果也证实，被告 B.И. 切尔内赫对此都供认不讳。

大量刑事犯和流氓分子的聚集加剧了他们的犯罪活动。纠集在工厂管理处附近的这些人不仅殴打电力机车制造厂的总工程师约尔金、厂里的科长布拉金斯基、上尉警官奥克鲁格和其他力图整顿秩序的人员，同时还对工厂管理处进行了破坏。

此案被告 T.A. 贡恰罗夫主动参与了组织冲击工厂管理处的事件。T.A. 贡恰罗夫在强行打开由车间工长纳索诺夫顶着的大门后，拳击后者头部并第一个冲入大楼，其余流氓紧随其后。他们在破坏设施之余还企图迫害那里的负责人。

关于这一点证人 H.B. 纳索诺夫在 6 月 11 日的审问中认证：

“为了不让狂怒的流氓们进入工厂管理处，我们开始把门顶住。贡恰罗夫和另一个年青人……因为仇恨脸都变了样……开始拉门……还粗野地谩骂着……贡恰罗夫扒在门上要求放他和整个人群进入工厂管理处。

由于劲儿太大门没法儿顶住，还是被弄开了。这时贡恰罗夫用拳打我的……头部。打得很重。我被他们逼到了墙边”。

证人纳索诺夫还认证，另一个和贡恰罗夫一起行动的犯罪分子还谩骂着打了他的脸颊，并喊叫着“打死他！”闯入工厂管理处的其他人等还殴打工程师叶尔绍夫，破坏工厂管理处：损坏家俱、打碎玻璃、砸毁电话、撕扯画像。

证人 Д.П. 叶尔绍夫、И.Я. 克拉夫季耶夫、B.A. 拉夫罗夫认证，贡恰罗夫积极参与冲击工厂管理处的事件。就此拉夫罗夫还证明：就在当天，贡恰罗夫还企图找到纳索诺夫要和后者算账。

由于劝阻流氓中止暴行的工作没有收到效果，为了整顿电力机车制造厂内的秩序，叫来一队民警，随后是当地卫戍部队的一批军人。但是，包括被告贡恰罗夫在内的流氓们阻碍车辆运行，向干警

投掷石块，并殴打其中三人，还把士兵们不断地往车下拉。

上述罪行有证人 Н.В. 纳索诺夫、Д.П. 叶尔绍夫、И.Я. 克拉夫季耶夫、В.А. 拉夫罗夫的证言证实，被告贡恰罗夫亦供认不讳。

流氓分子们不仅进行匪徒活动、大搞破坏，还继续挑唆聚集起来的人们实施新的暴行。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被告 И.П. 斯卢任科爬上了工厂管理处旁的步行隧道的遮雨棚煽动人群在早晨以前不要散开，并提议向其他工厂和附近城市派代表。同时，他还蛊惑人们第二天在新切尔卡斯克市制造暴乱、组织罢工，并声称：“谁要是去上班，谁就是法西斯。”

现查明，并有证人 Ю.И. 奇尔斯基和 А.А. 杜布琴科认证，斯卢任科曾在暴徒行列中高声发表针对苏共领导人和苏维埃政府的敌意和桐吓的言论。

斯卢任科拒不承认奇尔斯基和杜布琴科的指证，但对其他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在 6 月 17 日的审讯中他供称：

“在晚 8 点左右，我来到了工厂管理处大楼前的广场上。和胡作非为的流氓们会合后，我爬到了铁路隧道的遮雨棚，呼吁集结在广场上的人群早晨前不要散开，不要去上班。我说，必须向电子工厂等其他工厂和邻近城市派代表联络那里的工人也罢工。我还提议第二天，也就是 1962 年 6 月 2 日，在市中心组织游行……”。

斯卢任科还供称：

“在人群中，我提议大家砸毁窗玻璃和电话……我当时说这些话都是带有挑拨性目的的，都是为了鼓动人们实施暴行。在广场上我大声喊叫，要人们中断交通，我还亲自拦截了一辆汽车……在挡住汽车的时候，我喊过：‘兄弟们，帮帮忙，正在抓工人阶级呢！当时我估计，暴徒们会听见我的话，并会去解救……’。”

И.П. 斯卢任科的上述罪行有证人 С.И. 马库什金、Ю.И. 奇尔斯基、А.С. 索特尼科夫、А.С. 卡莱坦、А.А. 杜布琴科和 В.Д. 伊万诺夫的证言证实。

此案被告 Ю.В. 杰缅季耶夫是大规模骚乱的另一个主动参与者，曾在步行隧道的遮雨棚上发表言论，挑动暴徒实施破坏活动、占领新切尔卡斯克的各行政机关及通讯设施（银行、电报大楼、邮局等），企图利用暴徒来扩大骚乱事态的规模。

此处，证人 С.В. 帕纳谢维奇和 А.Р. 兹洛宾认证，被告杰缅季耶夫挑动流氓对在场的电力机车制造厂管理处的负责人实行迫害。

上述罪行有证人 А.Я. 兹洛宾、С.В. 帕纳谢维奇、И.Я. 莫伊谢耶夫、П.И. 西罗京的证言证实，但杰缅季耶夫拒不认罪。

现查明，6月1日晚被告 С.С. 索特尼科夫在步行隧道的遮雨棚上也发表过言论，挑动人们实施破坏和匪徒行动。在6月19日的审讯中他供称：

“加入暴徒行列后，我爬上了隧道的遮雨棚。为了扩大骚乱事态我发表言论挑动集结在广场上的人们向电子厂和第十七厂派代表，想以此打乱那里的正常工作。此外，在发表的言论中我还提议去配气站，切断通向上述工业企业的气路，还提议在第二天，也就是1962年6月2日，在新切尔卡斯克市举行示威游行。”

经侦讯查明，在此之后索特尼科夫组织了一伙流氓并领头冲向配气站。在那里他们闯入操作室并以迫害相威胁让作业员费奥多罗夫停止向市内的各工业企业供气。当时索特尼科夫还亲自查验了一下，供气阀是否关闭。

在那次审讯中，关于这一点索特尼科夫供认如下：

“……当我和人群一起来到位于距机车制造厂300米左右的配气站后，我们开始叫门，而后来，当配气站作业员给我们打开门以

后，我和其他 6 个小伙子闯入操作室。在那儿我亲自命令值班作业人员停止向各工厂供气，他照办了。当时，我还用双手试了一下，停止供气的阀门是否被关闭……”

索特尼科夫的停止向各工业企业供气的犯罪念头一旦实现，就会导致这些企业生产中断，并会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

上述罪行有证人 B.C. 塔拉索夫、B.Д. 赫佩尔斯基、H.K. 卡尔梅科夫、H.Г. 费奥多罗夫和其他人的证言证实。C.C. 索特尼科夫不否认上述犯罪行为，但不承认其有罪。

暴徒们又从配气站赶往电子厂。

到达工厂之后，暴徒们砸破大门，跑到各车间强迫那里的工人放下手头工作，加入他们的行列。

正如证人 B.Я. 波里亚多奇科夫所认证的，这伙流氓闯入机械加工车间之后，在车间里上窜下跳，乱吹哨子，还狂呼乱喊着：“赶快收工”，其举动粗鲁无礼。他们还走到机床前要求中止工作，并自作主张关掉了电动机。

证人 C.B. 马特舍夫和其他人的证言表明，流氓们以迫害威胁，强迫工人关闭机床。流氓们还闯入电子厂的水力蓄电站，紧紧围住司机维尤年科，以迫害相威胁，要他支持这一伙人的暴行。只是当维尤年科警告说，如果擅自闯入者不离开水力蓄电站，他就要把人和站一起炸掉时，流氓们才四散而逃。

6 月 2 日早晨，曾在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制造厂出现过的暴徒们继续其犯罪活动。他们扰乱工厂各车间的正常工作，致使许多工人离厂回家。早晨 8 点钟，暴徒们砸坏工厂管理处前的大门，从厂区涌向广场，继而向市中心推进。

流氓分子们从人群中冲出来拦截住恰巧路过的一辆内燃机车。他们爬上驾驶舱后，开始拉响警报。一部分流氓又重新窜到电子厂、第十七厂和石油机械制造厂，扰乱这些企业的正常工作秩序。

此案被告 A.A. 科尔卡齐曾在电子厂工作过，以前曾因滥用职权被军事法庭定过罪。他伙同被告 Г.Г. 卡特科夫和其他人等响应这伙流氓的要求，积极参与扰乱企业正常工作的活动，并且组织搞破坏。

被告科尔卡齐是大规模骚乱和匪徒行动的组织者和主动参与者之一。他加入流氓团伙之后，在厂内各车间活动，挑动工人罢工、唆使加入暴徒团伙。当时，科尔卡齐和加入这一团伙的被告 Г.Г. 卡特科夫对劳动者的经济现状大肆诽谤，声称，他们的日子过得不好，经济拮据、等等。但事实上他们俩人的生活经济上都很有保证：科尔卡齐有一幢私房和一个地处城郊的果园，而卡特科夫则有一幢房子和一辆私人汽车。

当工人们要求停止暴行时，科尔卡齐、卡特科夫和其他流氓仍然继续挑起骚乱。他们穿过石墨化工车间、焊条加工车间、供热供水车间、防腐导热材料车间、化学仪器车间和机修车间，在各处企图怂恿工人们实施暴行。

在6月14日的审问中，证人 Ю.Т. 沙特拉温认证，科尔卡齐、卡特科夫和其他人曾经要求工人丢下工作、和其他暴徒一起进城。当时，一些流氓还威胁说，如果工人们不去，就要“用粗棍子赶他们去”。

看到工人们谴责这些犯罪行为，科尔卡齐、卡特科夫和其他人就威胁侮辱工人，并把他们称作叛徒、变节者等等。

证人 И.И. 萨宁、Ф.Ф. 托米林、В.И. 杜达列夫、Я.Л. 布鲁克和其他人的证言表明，当工人们力图制止流氓们肆无忌惮的犯罪行为时，科尔卡齐还宣称，他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科尔卡齐和卡特科夫置工厂工作人员要求停止暴行的多次警告于不顾，仍然冥顽不化地继续其犯罪活动。

在对 A.A. 科尔卡齐提起公诉而进行的审讯中，他虽然确认了

那些认定其有罪的事实，但他却不认为那些行为是违法犯罪的。

其罪行有证人 Ю.Т. 沙特拉温、И.И. 萨宁、В.И. 杜达列夫、Я.Л. 布鲁克、Я.А. 尤尔琴科、В.М. 涅拉连科、А.П. 科扎琴科、Ф.Ф. 托米林和其他人的证言证实。

被告 Т.Г. 卡特科夫对上述罪行供认不讳。其罪行有证人 И.И. 博伊科、А.П. 科扎琴科、Я.Л. 布鲁克、М.Н. 科诺瓦洛夫和其他的证言证实。

调查证实，被告卡特科夫在前夜，即 6 月 1 日深夜至 2 日凌晨，在自家房子附近还用心险恶地阻挠前往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制造厂执行保卫任务的军车通过，并多次组织人群阻留这些车辆，同时还故意以诽谤谣言惑众。

上述罪行有证人 Ф.Н. 夷列任科、А.И. 利霍戈丁和 А.В. 托尔斯托科热夫的确凿证言证实，但卡特科夫拒不认罪。

6 月 2 日早晨被告 Т.М. 谢尔班在石油机械制造厂进行了类似的犯罪活动，即组织大规模骚乱并引诱他人参与骚乱。

当谢尔班获悉发生在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制造厂的骚乱后，开始挑动石油机械制造厂的工人不去工作、加入暴徒行列。后来，他作为暴徒团伙的头目来到毗邻的第十七厂，并与其他人一起闯入该厂厂区，窜到各个车间，挑唆工人参与这场大规模骚乱。由于得不到第十七厂工人的支持，谢尔班就和其他流氓挤进从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制造厂向市中心行进的人群当中。途中他扯下一面插在一幢大楼上的旗子，扛着它走在人群前面，并不断地高声发表挑拨性言论。

人群在市内沿着莫斯科大街走向苏共新切尔卡斯克市委、市执委会大厦。在行进中其他流氓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和众多好奇的公民一起加入到了人群之中。

走进苏共市委、市执委会大厦后，人群中的匪徒和流氓威胁、

殴打、侮辱负责大楼护卫工作的军人。冲破了军人们组成的人墙之后，他们开始对办公场所进行抢劫，在那里大搞破坏：撬锁砸门、打窗破镜、毁坏办公用品和电话设备、砸家俱、撕画像、揪电线，等等。

此案被告 T.M. 谢尔班、A.Φ. 扎伊采夫、E.Π. 列夫琴科、和其他人等闯进市委驻地之后，发表煽动性言论、挑动和组织暴徒们继续其破坏活动。

证人 A.Π. 瓦西连科、H.M. 普济科夫、Π.Б. 列萨博夫和其他人指证，谢尔班是第一批闯入苏共市委、市执委会大厦的暴徒之一。他潜入阳台，用自身言行鼓动流氓们进一步实施暴行。

上述罪行有证人 M.φ. 格拉德科娃、A.Π. 瓦西连科、H.M. 普济科夫、M.B. 加尔多娜、M.Π. 西多罗夫、B.Π. 别萨拉博夫和其他人的证言证实。T.M. 谢尔班承认对他的公诉书中指控的罪行。

此案被告 A.Φ. 扎伊采夫因公务从伏尔加格勒州来到新切尔卡斯市。过去他曾两次因刑事犯罪而被判过刑。他主动参与了这场骚乱并积极组织搞土匪活动。他是在酗酒之后加入暴徒行列的。

正如证人 A.C. 博戈莫洛夫、T.C. 切梅里斯、H.A. 米赫耶夫和其他人所指证的，扎伊采夫曾在弗·伊·列宁纪念碑旁造谣中伤、侮辱污蔑苏维埃政府和苏维埃国家的奠基人。在苏共市委、市执委会旁的广场上，他在暴徒群中挑动匪徒和流氓迫害地方当局的领导人和军人、拦截过往车辆。要司机们罢工。冲进市委后，扎伊采夫潜入平台，挑动暴徒大搞土匪活动和破坏活动，让他们袭击军人，抢劫他们的武器。

当军人们包围了市党委、市执委大厦后，扎伊采夫对他们高声谩骂、秽言侮辱，并称他们是“法西斯分子。”他发表挑拨性言论，造谣说军人们正在屠杀残疾人、儿童和妇女，并要求交出指挥护楼

军队的将军，好让暴徒们进行迫害，当时还扬言“把这个将军交给我们，我们要把他撕成碎片”。

6月3~4日，扎伊采夫继续为非作歹，他威胁要迫害军人和干警，并阻挠军车运行。

被告 A.Φ. 扎伊采夫对其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但又声明，因为当时头脑不清，这些行为他现在已不记得了。

其罪行有证人 H.A. 米赫耶夫、A.C. 博戈莫洛夫、A.C. 苏希宁娜、Г.С. 切梅里斯、H.Φ. 谢缅琴科、B.Г. 列昂季耶夫和其他人的证言证实。

在新切尔卡斯克市委和市执委会大厦平台上发表挑唆性言论的还有此案被告 B.П. 列夫琴科。她过去曾因盗窃罪而被判过刑。列夫琴科冲到大厦阳台上大声喊叫说，6月1日她曾被拘留过，在市民警局似乎还遭受过毒打。但侦查证实，那天她既未被民警机关拘留过，也未被羁押过。

列夫琴科对暴徒们制造谣言，妄称在新切尔卡斯克市民警局关押着许多被捕的电力机车厂的工人，还说他们在那里身遭毒打，挑唆众人去把这些人营救出来。此后，列夫琴科率领一帮流氓土匪来到市民警大楼前，并在那里进行匪徒般的抢劫，大搞破坏。

E.П. 列夫琴科只承认对她的公诉书中的一部分罪行，并一口咬定，在苏共市委大厦平台上没有说过任何有关民警局殴打被捕者的话。但其罪行有证人 A.И. 弗拉索夫、H.H. 莫斯卡连科、И.М. 鲁班、T.M. 克列晓娃、T.Г. 拉连科夫和其他人的证言充分证实。

此案被告 B.Д. 切列帕诺夫曾主动参与了对市民警局的匪徒袭击。

在顶住了干警和军人们的抗击之后，切列帕诺夫和其他暴徒把外面那扇门从合页上拽了下来，并用撞锤打破了通往市民警民驻地

的另一扇门。闯进驻地后，匪徒们开始袭击在场官兵：向他们投掷石块、殴打军人、强抢武器、砸破窗子，还实施了其他暴行。同时还不断侮辱、威胁军人。

正如证人 С.У. 伊萨耶夫、В.И. 弗罗洛夫、А.А. 格拉布科夫、А.М. 库瓦尔金和其他人所指证的，被告切列帕诺夫和其他匪徒一再要求释放被拘留的人。当时，切列帕诺夫扑向一名战士，并打他，还企图强抢战士库瓦尔金的冲锋枪。

这次匪徒袭击事件的参与者们强抢了战士列普金的冲锋枪，还企图用它来对付保卫市局驻地的人们。在整个匪徒袭击事件中，匪徒们不止一次企图抢劫军火，想用它继续实施匪徒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军人们依照警卫内务职责条令，被迫使用武器反击匪徒、遏制他们杀害治安人员的企图。

在审讯中，В.Д. 切列帕诺夫对他的公诉书中所指控的罪行实质上只承认了其中的一部分。他供称，他的确参与了对市民警局袭击行动并殴打过军人，但他没有搞过破坏活动，也从来没有试图从战士库瓦尔金的手中抢夺冲锋枪。但证人 А.М. 库瓦尔金在 6 月 18 日与被告 В.Д. 切列帕诺夫对质时证实：

“……门被弄坏之后，第一批闯进市民警局的人中就有切列帕诺夫。我们，战士们，站成一排尽量抵住暴徒们的进攻……切列帕诺夫就在我面前，我还清楚地记得他那张狂怒的脸。他竭力想夺我的枪，但没能抢到手”。

切列帕诺夫匪徒般袭击市民警区、大搞破坏活动、殴打军人的罪行有证人 А.А. 格拉布科夫、О.И. 坎捷拉什维利、А.В. 谢尔巴科夫、Т.М. 克列晓娃、В.И. 阿法纳西耶夫、Н.В. 列普金和其他人的证言证实。

流氓们在市民警局旁的莫斯科大街上和苏共市委、市执委会旁的广场上继续实施暴行。为了整顿秩序叫来了几辆军车。

流氓和匪徒们从四面八方紧紧围住这些车辆，在威胁军人的同时，他们爬上军车毁坏器材，借口正在发生的种种事件进行敌意攻击，造谣污蔑，挑动人们进一步加剧匪徒般的袭击和破坏活动。

此案被告 M.A. 库兹涅佐夫积极参与了这些犯罪活动。他曾在 1950 年因侵占公共财物而被判过刑，在 1960 年因伙同他人入户盗窃而被追究过刑事责任。

经侦查证实，6 月 2 日早晨，库兹涅佐夫丢下工作，在喝得酩酊大醉之后与流氓、匪徒们凑在了一起。白天、晚上他一直都在苏共市委、市执委会大厦旁的人群中。他曾不止一次地爬上军车，挑动流氓们和匪徒们继续搞破坏活动、拷打官兵，同时还威胁、侮辱苏维埃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和军人，并造谣生事说，好像“救援部队”正在从其他城市赶来新切尔卡斯克。他的所有这些行为都夹杂着粗言秽语的谩骂。

正如被告库兹涅佐夫自己所承认的，他喊叫过“勇敢地前进！我们应该摧毁一切，打碎一切，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力量”之类的话。按他的解释，当时指的是“大大小小的领导们”。

6 月 2 日晚，库兹涅佐夫在回家途中多次企图向过往汽车的军人投掷石块，阻碍他们前进。他高声威胁军人，同时扬言“明天早晨 6 点钟，我们会给你们个厉害看看”。在车辆受阻滞留之际，他还曾抗击过军人。

上述罪行有证人 B.И. 奥西波夫、H.И. 卡普斯京、A.M. 科尔尼洛夫、T.Φ. 谢里科娃、T.A. 博恰洛娃、A.B. 切尔尼亚京和其他人的证言证实，M.A. 库兹涅佐夫对此亦供认不讳。

被告 B.Г. 舒瓦耶夫也是大规模骚乱、破坏活动的主动参与者之一。

在市民警局、国家银行大楼附近的暴徒人群中，舒瓦耶夫举止粗鲁、蛮横无礼。他公然威胁要迫害军人和共产党员。并恬不知耻

地宣称，“共产党员应该呆的地方是在柱子上”。他挑唆士兵掉转枪口去对付军官，还要求给他一支冲锋枪，好让他去迫害共产党员和军官们。他以自身行为教唆流氓匪徒们继续搞武装袭击和破坏活动。

当军车出现在莫斯科大街上以后，舒瓦耶夫口出秽言，大肆谩骂，不断向它们投掷石块。

证人 А.Ф. 科科列夫指证，舒瓦耶夫曾对士兵队伍和暴徒人群喊叫过“……和共产党员说话是没有好处的……共产党员应该呆的地方是在柱子上……”。

证人 Г.М. 西柳科夫、И.К. 乌马涅茨、А.Е. 乌什科夫、А.П. 阿努什克维奇和其他人的证言证明，舒瓦耶夫曾挑拨人们迫害共产党员和军官，并声称“应该把他们统统都枪毙掉。”

上述罪行有证人 А.Ф. 科科列夫、Г.М. 西柳科夫、И.А. 乌马涅茨、А.Е. 乌什科夫、А.П. 阿努什克维奇、В.В. 济延科和其他人的证言证实，被告 В.Г. 舒瓦耶夫亦供认不讳。

6月2日，当流氓匪徒们在新切尔卡斯克市党委、市执委会大厦附近实施暴行时，被告 Б.Н. 莫克罗乌索夫也加入了他们一伙。他以前曾被判过两次刑：1943年是因为严重伤害他人身体危及生命，1956年是因为侵占国家财物。他在人群中钻来钻去，四处进行挑拨，唆使流氓匪徒们继续搞武装袭击和破坏活动。

挤到苏共市委、市执委会大厦跟前，他发表言论，要求把正在制止流氓匪徒犯罪行为的军队从城里撤出去。

由莫克罗乌索夫倡议，成立了一个由九名暴徒组成的团伙，并美其名曰“代表团”，准备和军方指挥部进行所谓的“谈判”。

作为流氓匪徒们的代表，莫克罗乌索夫在和来到新切尔卡斯克市的苏共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谈话时，蛮横无礼，肆意挑衅。他厚颜无耻地要求把军队从城里撤出去，恶意诋毁劳动者的经济现状，

威胁恐吓、粗鲁侮辱党和政府领导人。

在1962年6月28日的审讯中，莫克罗乌索夫作为被告就由他成立并参与的所谓的“代表团”一事供称：

“……我挤到市党委、市执委会大厦跟前后……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派代表……以及暴徒们提出来的要求把军队从城里撤出去……在党和政府领导人接见我们“代表们”的时候，我举止粗鲁、蛮横无礼……现在我认识到，把军队从城里撤出去，只会使大规模骚乱继续发展、激化匪徒和刑事犯罪分子的情绪……事实上……我是流氓匪徒们的代表，因为我要军队从城里撤出去的要求反映了他们的利益”。

Б.Н. 莫克罗乌索夫的罪行有证人 Л.Е. 安得留先科、Л.Г. 什利亚科娃、В.И. 格里岑科、Н.Ф. 琴科、Г.М. 什梅廖夫、Л.С. 基尔萨诺娃和其他人的证言证实。

大规模骚乱和匪徒袭击及其他暴行，给北高加索铁路局、东南铁路局和顿涅茨克铁路局、电力机车制造厂、电子厂、石油机械制造厂以及新切尔卡斯克市的许多国家机关造成巨大损失。

这些犯罪活动造成的损失总计达100万卢布左右。

基于上述情况，确认下列人员有罪：

扎伊采夫·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1927年生，出生于萨拉托夫州巴拉科夫区的索菲诺克镇，俄罗斯族，苏联公民，无党派人士，6年级文化程度，1952年因侵吞社会财产罪被剥夺人身自由10年，1954年因恶性流氓罪被剥夺人身自由2年。拘捕前系伏尔加格勒州车尔尼雪夫斯基区苏共十二大国营农场奶牛队队长，住在单位。

他被指控：1962年6月2日白天，在加入袭击苏共新切尔卡斯克市委、市执委会驻地的犯罪团伙以后，潜入阳台呼吁暴徒们加剧大规模骚乱、加紧破坏活动，并煽动袭击军人、抢夺他们武器。

与此同时，他在苏共新切尔卡斯克市委旁的暴徒群里呼吁刑事犯、流氓分子们把大规模骚乱继续下去。他还拦截车辆，要司机罢工，并污蔑、攻击苏维埃政府、苏维埃国家的缔造者。威胁要从肉体上摧残苏联地方党政机关领导人，以及负责整顿秩序的苏维埃军队的军人。

6月3日他拦截军车，而6月4日则在市民警大楼旁粗鲁侮辱军人、干警，威胁要对他们进行肉体摧残。因而他触犯了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77和79条。

库兹涅佐夫·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1930年生，出生于克里木州的巴赫奇萨赖市，俄罗斯族，苏联公民，无党派人士，5年级文化程度，已婚，有一子女，1950年因侵占国家财产罪被剥夺人身自由8年，1959年因盗窃罪被查办。拘捕前系电子厂的钳工，住在新切尔卡斯克市柯罗连科大街30号楼。

他被指控：1962年6月2日丢下工作，并在获悉苏共新切尔卡斯克市委、市执委会和市民警局驻地遭到匪徒袭击，受到破坏之后，加入了肇事暴徒的行列。

在苏共市委、市执委会大厦旁的广场上，他不止一次地爬上军车，挑动流氓匪徒们继续搞破坏活动，还恶毒散播充满敌意的攻击性言辞，挑动流氓匪徒们袭击，迫害军人。

晚上在回家的路途中，他大声威胁军人、多次企图向他们投掷石块，并在车辆受阻滞留之际抗击军人。因而他触犯了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77和79条。

切列帕诺夫·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1933年生，出生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叶尼塞区的阿巴拉科沃村，俄罗斯族，苏联公民，无党派人士，中等文化程度，无前科，已婚，有一子女。拘捕前系新切尔卡斯克矿山机械厂装配作业段的钳工，住在罗斯托夫州新切尔卡斯克区的特鲁舍夫镇。

他被指控：1962年6月2日中午12点钟左右，伙同其他犯罪分子袭击了新切尔卡斯克市民警局。他把外面那扇门从合页上拽下来，并以其为撞锤打破了通往驻地的另一扇门，那里有军人和干警负责护卫。击退了他们的反抗以后，被告作为首批人员冲进了市局驻地，要求释放传闻羁押在那里的被拘留人员，并用拳头殴打军人，企图抢夺战士库瓦尔金的冲锋枪。

他以自身行为教唆众人搞破坏活动，还实施了其他许多暴行，并一直威胁恫吓军人。因而他触犯了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77和79条。

莫克罗乌索夫·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1923年生，出生于尼古拉耶夫市，他也是库津·鲍里斯·萨韦利耶维奇，1925年生，出生于高尔基市，俄罗斯族，苏联公民，无党派人士，6年级文化程度，已婚，无子女，1943年因严重伤害他人身体并危及生命罪被剥夺人身自由10年，1956年因侵占国家财产罪被剥夺人身自由7年，1959年获假释，观察期截止到1962年11月。拘捕前系新切尔卡斯克机床制造厂的浇铸清洁工，住在新切尔卡斯克市阿克萨伊斯基大街49号楼。

他被指控：1962年6月2日他获悉新切尔卡斯克市委、市执委会驻地遭到匪徒袭击后，加入了暴徒行列。他在人群中钻来钻去，对负责整顿秩序的军人发表挑拨性言论，并借此教唆流氓匪徒们继续搞破坏活动。在挤到苏共市委、市执委会大厦跟前后，他提议以暴徒们的名义派所谓“代表团”向军方指挥部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正在执行任务（即制止流氓匪徒们的犯罪活动）的军队从新切尔卡斯克市撤出去。

作为流氓匪徒们的代表，他在和来到新切尔卡斯克市的苏共及苏维埃政府领导人的谈话中，蛮横无礼、肆意挑衅，并公然要求把军队撤出市区，同时还威胁恫吓、粗鲁侮辱党和政府领导人。

科尔卡奇·安德列·安德烈耶维奇——1917年生，出生于基辅州佩列亚斯拉夫—赫梅利尼茨基区的杰尼萨村，乌克兰人，苏联公民，无党派人士，9年级文化程度，已婚，有两个成年子女，1947年因非法滥用职权罪被军事法庭判决剥夺人身自由3年。拘捕前系电子厂电子车间的电工，住在新切尔卡斯克市邵尔斯大街13号楼。

他被指控：他是1962年6月2日意图扰乱新切尔卡斯克电子厂工作秩序的犯罪团伙的组织者之一。他挑动工人丢下工作、加入曾在新切尔卡斯克市搞破坏的流氓匪徒团伙，并威胁要迫害那些采取措施恢复工厂秩序的，以及拒不支持流氓匪徒的人们。

与此同时，为了扰乱工厂的工作秩序，他率领一伙流氓袭击了供热供水车间，并使用暴力伤害、威胁这个车间的工人。因而他触犯了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77和79条。

索特尼科夫·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1937年生，出生于库尔斯克州捷尔本区的博尔卡村，俄罗斯族，苏联公民，拘捕前是苏共党员，因此案已被开除党籍，7年级文化程度，无前科，已婚，有两个子女，系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制造厂的车工，住在新切尔卡斯克市十月小区近卫军大街18号楼1室。

他被指控：1962年6月1日晚在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制造厂发生了大规模骚乱，工厂遭到破坏以后，他发表言论挑动暴徒扩大骚乱事态、扰乱毗邻的电子厂、第十七厂的工作秩序，并诱使这两个厂的工人参加大规模骚乱，同时还挑动流氓和破坏分子们袭击配气站。

此外，他还和其他犯罪分子一起阻挠车辆的正常运行，组织流氓匪徒团伙并领头袭击配气站。

闯入配气站以后，他强迫值班作业员停止向各工业企业供气，并威胁要对他进行人身迫害，他还亲自查验供气阀是否关闭。之后，他与其余暴徒一起赶往电子厂，想扰乱那里的正常工作。

他以自身的犯罪行为教唆流氓匪徒们继续搞破坏、加剧破坏活动。因而他触犯了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 77 和 79 条。

舒瓦耶夫·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吉耶维奇——1937 年生，出生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季霍列茨克区的法斯托韦茨镇，俄罗斯族，苏联公民，无党派人士，5 年级文化程度，已婚，有一子女，无前科。拘捕前系新切尔卡斯克第二寄宿中学的厨师，住在新切尔卡斯克市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大街 95 号。

他被指控 1962 年 6 月 2 日，在新切尔卡斯克市民警局大楼和国家银行大楼旁的暴徒人群中教唆流氓匪徒们把群众骚乱继续下去，对共产党员和军人进行迫害，并恬不知耻地宣称，“共产党员应呆的地方是在柱子上。”他挑动士兵掉转枪口去对军官，扬言准备亲自镇压共产党员和军人，并要求给他冲锋枪好让他实施这种迫害。他还多次向军车投掷石块。

他以自身行为教唆暴徒当中的流氓匪徒们继续搞袭击和破坏活动。因而他触犯了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 77 条和第 79 条。

列夫琴科·叶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1935 年生，出生于顿涅茨克州戈尔洛夫区的孔德拉季耶夫克煤矿，乌克兰人，苏联公民，无党派人士，未婚，无子女，3 年级文化程度，1959 年因盗窃罪被剥夺人身自由 2 年。拘捕前系第三十一建筑局的保安人员，住在新切尔卡斯克市。

她被指控：1962 年 6 月 2 日午时 12 点钟左右，在大规模骚乱发生时，挤到苏共新切尔卡斯克市委、市执委会大厦里面，在大厦阳台上向刑事犯和流氓分子们发表挑拨性言论，扬言她曾被民警局拘留过，并且似乎还身遭毒打，又说，民警局里好像还关押着许多工人，他们同样遭到毒打。

为了组织对市民警局的袭击，她挑动暴徒们营救被捕者。此后，她率领一帮流氓土匪来到市民警局大楼前，并对那里进行了匪

徒般的破坏。因而她触犯了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77和第79条。

切尔内赫·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维奇——1938年生，出生于罗斯托夫州的沙赫特城，俄罗斯族，苏联公民，无党派人士，9年级文化程度，已婚，无子女，无前科。拘捕前系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制造厂锻造车间的钳工，住在新切尔卡斯克市十月小区露天采矿场大街4号楼1宅。

他被指控：1962年6月1日中午11时许为了激化已经发生的骚乱、使其具有群众参与的性质，和一伙流氓闯入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制造厂的气压机站，继而拉响警笛，以此扰乱工厂工作秩序，将暴徒们纠集到工厂管理处附近，同时还和其他流氓一起阻挠气压机站的工作人员关闭警笛。

在此之后，他诱使熟人B.Д.科罗捷耶夫书写了一条带有教唆性质的标语，并亲自参与了有关标语内容的讨论、书写工作。标语后来被带到工厂管理处大楼前，悬挂在一个四周清晰可见的高大的金属柱上。

他以自身行为挑动暴徒们把骚乱继续下去。因而他触犯了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79条。

贡恰罗夫·根纳季·安德烈耶维奇——1940年生，出生于罗斯托夫州的无产者区，俄罗斯族，苏联公民，无党派人士，6年级文化程度，独身，无前科。拘捕前系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制造厂的钳工，住在新切尔卡斯克市十月小区东大街6号楼35宅。

他被指控：在暴徒袭击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制造厂工厂管理处的事件中是带领袭击分子率先闯入管理处大楼的暴徒之一，他用拳头殴打当时正和其他人一起护卫管理处大门的制小车车间工长纳索诺夫的头。因而他触犯了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79条。

斯卢任科·伊万·彼得罗维奇——1932年生，出生于罗斯托夫州无产者区的布焦恩诺夫斯基镇，俄罗斯族，苏联公民，无党派人士，

3 年级文化程度，已婚，有两子女，无前科，拘捕前系“净化”厂的装卸工，住在新切尔卡斯克市的阿柳米尼斯基广场 8 号楼 8 室。

他被指控：1962 年 6 月 1 日晚，他在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制造厂附近的广场上加入暴徒行列后，爬到地下隧道的遮雨棚，对在场众人发表挑拨性言论，呼吁在早晨前不要散开，不要去上班。

为了扩大骚乱事态，他提议向电子厂等其他工厂、邻近城市派代表，要求第二天，即 6 月 2 日，在新切尔卡斯克市举行所谓的“示威游行”，同时还大肆威胁苏共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

在参与群众骚乱的人群中，他挑动众人拦截车辆，以此鼓动他们进一步实施暴行。因而他触犯了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 79 条。

杰缅季耶夫·尤里·瓦西里耶维奇——1935 年生，出生于坦波夫州巴拉基列沃村，俄罗斯族，苏联公民，拘捕前系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新切尔卡斯克综合技术学院化工系三年级学生，无前科，已婚，有一子女。拘捕前住在罗斯托夫州十月小区卡梅诺洛姆尼亚住宅区窄巷 29 号楼。

他被指控：1962 年 6 月 1 日积极参与了大规模骚乱。为了扩大骚乱事态，他挑动暴徒搞破坏、占领各行政机关及通讯设施，并散播意在激化暴行的挑拨性言论。因而他触犯了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 79 条。

卡特科夫·格里戈里·格里戈里耶维奇——1926 年生，出生于罗斯托夫州新切尔卡斯克区的亚诺沃村，俄罗斯族，苏联公民，无党派人士，5 年级文化程度，已婚，有两子女，无前科。拘捕前系电子厂的拖拉机手，住在新切尔卡斯克市十月小区体育路 77 号楼。

他被指控是大规模骚乱的积极参与者之一。1962 年 6 月 1 日深夜 2 日凌晨，他阻挠前往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制造厂的执行保卫任务的军队通过，组织人群拦截军车，同时还诽谤诋毁苏维埃民主。

6 月 2 日早晨，他来到电子厂后丢下工作，加入了以被告科尔

卡齐为首的团伙，在各个车间窜来窜去挑动工人参与骚乱。因而他触犯了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79条。

谢尔班·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1935年生，出生于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德罗基耶夫地区的巴克桑镇，乌克兰人，苏联公民，无党派人士，无前科，5年级文化程度，已婚，有一子女。拘捕前系新切尔卡斯克石油机械制造厂机械装配一车间的车工，住在新切尔卡斯克市劳动巷13号楼。

他被指控：1962年6月2日来到石油机械制造厂后，没有投入工作，而是在机械装配一车间里大声吵嚷，发表挑拨性言论，煽动工人支持流氓分子的犯罪活动。

当天，他还和其他流氓一起来到第十七厂。要求那里停止生产，诱使工人加入暴徒人群。此后，当众扯下一面插在一幢大楼上的旗子，扛着它走在前往苏共新切尔卡斯克市委的人群前面。走在大街上的时候，他大声喊叫，教唆人群挑起骚乱。

他是首批冲入苏共新切尔卡斯克市委驻地的人员之一。他还潜上阳台挑动流氓分子进一步实施暴行。因而他触犯了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79条。

按照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207条的规定，本刑事案将报送苏联总检察长核定起诉书并提交审判。

起诉书于1962年7月____日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写就。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要案侦查长中校（谢别坚科）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侦查处副处长上校（马约罗夫）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

上将（伊瓦舒京）

№04557

加强与反苏分子做斗争提案起草委员会 给苏共中央的呈文

(不晚于1962年7月19日)

受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托，我们就加强同反苏分子及个别群众骚乱活动斗争的提案已准备就绪。我们的意见是，苏共中央委员会无需就此问题作进一步的决议，因为苏共中央委员会及赫鲁晓夫同志就此问题新做的指示已十分详尽。

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由行政机关制定一些补充措施是适宜的。为此，由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加强国家安全机关与反苏联分子敌对活动做斗争的具体措施》的命令草案，苏联总检察长制定了《关于加强检察机关对国家犯罪案件侦破及法庭审理》的命令草案。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命令草案就改善安全工作——配备、利用、扩大谍报机关，严密监视刑满释放人员、帝国主义情报机关的间谍及宗教分子的活动，以及如何提高国家安全机关战斗力做了规定。计划加强反间谍机构使之更有效的服务于大型及特别重要的工业设施。

苏联总检察长在命令草案中决定采取措施提高检察机关主动性，协调其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务部之间在同反苏活动、宗教主义及群众骚乱斗争过程中的关系。

俄罗斯联邦内务部决定在现有编制及内务部内卫军队的基础上建立后备部队，以供调遣在必要时期保卫办工场所、通讯枢纽、广

播电台、银行、监狱及其他最重要的设施，并提供专门的武器及通讯保障。有关命令草案由俄联邦内务部提交苏共中央委员会俄联邦局审议。

鉴于近年来俄联邦南部一些地区集中了大量刑事罪犯，而且这类判刑人员在这些地区的集中趋势将继续下去。因此，建议苏联部长会议做出决议在一些南方城市推行特殊户籍制度。（见附件1^①）

此外，受苏共中央委员会1961年8月16日的委托，由苏共中央委员会有关行政部门与国家计委、财政部、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同制定出改善苏联民警工作的提案，此项提案由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组成的委员会讨论后，提交苏共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苏共中央委员会及苏联部长会议就此问题的决议草案，旨在消除民警工作中严重缺陷，加强其干部队伍建设，提高民警机关交通、通讯、侦破技术的装备能力。

附上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及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和苏联总检察长的命令草案。^②

请求苏共中央委员会审议上述文件并批准公布。

① 见本专题文件№04558的附件1。

② 见本专题文件№04558的附件2、3。

№04558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加强同反苏分子 做斗争的会议纪要（摘录）

（1962年7月19日）

特殊文件

绝密

关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及检察院的议题

1. 同意委员会提交的就加强同反苏分子敌对活动做斗争的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命令草案及苏联总检察长命令草案。（附件）

2. 批准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克格勃本土部门反间谍分部现役军人编制扩大400名。

3. 要求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边疆区委、州委书记，加盟共和国及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州、区劳动人民代表会议执委阅读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命令。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1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

(1962年6月)^①

特殊文件

不得刊载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如下：

1. 对规定第40条中因犯罪受过监禁、流放人员不予登记户籍身份证的实行地区再增补下列城市：克拉斯诺达尔、顿河畔罗斯托夫、格罗兹尼、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叶先图基、热列兹诺沃茨克、基斯洛沃茨克、列尔蒙托夫斯基、矿水城、皮亚季戈尔斯克、罗斯托夫州的塔甘罗格、新切尔卡斯克、沙赫特市。

2. 受身份证条例限制的公民在本决议颁布前已经在上述城市登记户籍者允许继续居住，不在此列。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尼·赫鲁晓夫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室主任 Г. 斯捷潘诺夫

① 文件上未说明日期。

附件 2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命令
(1962 年)

特殊文件
绝密

加强国家安全机关同反苏分子敌对活动做斗争

根据党的二十大及二十二大会议精神，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进一步加强了与劳动人民的联系，加强了与社会各组织的联系，从而提高了机关谍报业务工作质量。预防犯罪的防范工作有效性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与此同时，克格勃大部分机构——共和国、边疆区、州的克格勃管理局在一定程度上对揭露和制止反苏分子敌对活动有所忽视。

众所周知，苏联政府及共产党的国内和国际政策和措施得到了我国工人阶级、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的共同支持。

但是不能不考虑到苏联社会内部还存在反社会分子。他们受国外敌对宣传的影响而走上了反苏道路，他们恶毒攻击苏维埃国家及共产党的政策，散布各种挑拨离间的流言，动摇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在一定条件下，他们试图利用共产主义建设进程中出现的暂时困难煽动立场不坚定的人制造群众骚乱，以达到自己的罪恶目的。尽管如此，国家安全机关不总是对那些进行各种反苏活动的人采取积极措施。

近年来在一些城市出现了群众骚乱，并伴有洗劫行政大楼，毁坏公共财物，攻击机关代表的行为及其他胡作非为。这些骚乱活动

的肇事者往往是些流氓刑事犯。但是，在骚乱过程中暴露出来并表现出极度狂热的是一些敌对分子，过去的德国讨伐队员及其帮凶，教士及宗教主义者，他们在一系列事件中竭尽全力地企图把这些自发事件引向反革命倾向。

这就要求国家安全机关在积极打击帝国主义间谍破坏活动的同时，加强揭露并制止国内反苏分子的敌对活动的侦讯工作。

同时在克格勃机构的一些领导人，侦讯人员中，当他们在评估所获取的准备进行敌对行为的情报时，表现得部分心慈手软，原则性差，反应迟钝，不总是能够及时果断地采取预防和制止措施。

许多克格勃机关领导不考虑各共和国边疆区、州、城市的当地条件，侦讯活动的具体环境差异，机械地处理问题。没有从保障国家安全的观点去关心机器制造、冶金、煤炭、化工、石油及其他工作部门中那些无严格保密制度的大型企业的具体情况。个别国家安全机关对这些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单位，虽然形式上派驻了安全人员，但事实上却没有进行任何安全工作，没有情报机构和可信人员，克格勃机关没有及时得到有侦讯价值的情报。

在众多高校、中等专业技术学校、科学、文化、艺术机关中情报侦讯工作的状况大体也是如此。

国家安全机关反间谍机构对那些本属于克格勃视野范围内的个别群众的监视工作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对许多刑满释放的敌方间谍，民族主义及境外反苏组织的积极参与者，罪行累累的讨伐队员及帮凶，反动教士及教派活动头面人物的行动和意图，克格勃机关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一无所知。这是因为并非所有的这些人物都列入考虑范围，对其中大部分人物未能按照克格勃命令要求立案监视，对其中已经立案的人物实际上没有进行监视。

国家安全机关在同反社会分子斗争中仍缺少同内务部机关的接触，不了解过着寄生生活的敌对分子秘密麋集场所，没有与内务部

机关协商面对突发事件的行动计划。这些情况是造成一系列群众骚乱未及时被制止而带来严重后果的原因之一。

通过分析在制止公开的敌对活动，特别是制止群众骚乱的国家安全人员所采取的行动，说明国家安全机关在采取行动时的动员准备工作还存在不足。通常在发生直接事件时，行动组与情报机构的联系几乎完全中断，结果使克格勃机关不仅无法通过情报机构恢复社会秩序，而且也无法从那里获得必要的情报。

我命令：

1. 国家安全机关所有领导和行动人员在不削弱打击资本主义国家间谍及其谍报部门破坏活动的情况下，采取坚决措施加强情报侦讯工作，揭露并制止国内反苏分子的敌对活动。

为实现上述目的，必须消除在部署及利用情报机关问题上的严重缺陷。部署谍报机关时应考虑到 1960 年克格勃 00430 号命令的要求，要考虑在当地采取行动的具体环境，并要考虑因受到克格勃机关注意对象的数额，特别是曾因犯罪判过刑的人、以前敌方间谍人员、民族主义团体组织的积极参加者、归国侨民、来自资本主义国家叛逃者、反动教士及教派活动的头面人物。

在揭露和制止反苏分子敌对活动中应积极利用侦讯技术设备及户外监视仪器装置。

2. 改善对情报人员及可信人员的政治教育，使他们保持高度警觉并能及时预报那些属于敌方间谍的嫌疑人和那些站在反苏立场上企图动摇人民对党和苏联政府所实行政策和措施信任的那些人物，预报有关犯罪分子实行突然袭击，反社会行动，引起群众骚乱的预谋。

3. 对凡是克格勃机构所获取的足以引起国家安全机关注意的人和事的情报要及时、敏锐地做出反应，并立即采取情报侦讯措施加以检验。

必须坚决制止一切反苏分子表露出的任何公开的敌对活动。特别是那些担当进行恐怖活动并有叛国意图，草拟反动传单、匿名文件、传播流言挑拨离间活动，对待那些在群众骚乱中煽风点火的各类人物要配合党组织使之完全孤立。

必须向行动机构全体人员说明，克格勃机构施行的防范政策不应取代和削弱苏联同现行敌人的斗争。

4. 第二总局，各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边疆区、州的克格勃管理局在改善从事特别重要的国防产品研制和生产单位的反间谍工作以外，还应在两个月内完成在工业生产部门的下述企业中组织好情报侦讯工作，这些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作用，而且那里值得国家安全机构注意的对象人物为数众多。这些单位的安全保卫工作的注意力重点应集中在保护国家机密，防止外国间谍的破坏活动上，集中在及时制止反苏分子煽动群众骚乱、进行公开的反苏活动上。

5. 在第二总局内以9、12、13、14分部为基础组建的管理局，它的功能是在大型和特别重要的工业企业中组织侦讯工作。国家安全委员会干部局会同二总局及各地区克格勃机关领导人在一个月之内做好筹备工作，并向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报告有关强化克格勃——克格勃分局的各个第二分部及加强大型工业城市中克格勃特派机构的建议。

6. 鉴于当前克格勃特派机构在城镇和地区内是按照分块的原则组织自己的工作，从而使得本应引起克格勃机构注意的一些重要问题却被特派机构忽视，因此，今后要根据本命令的要求，城市和地区克格勃特派机构的反间谍工作要按分块结合的原则进行。

本命令的实施将使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量日益剧增，故允许加盟共和国及自治共和国克格勃主席，边疆区、州克格勃管理局局长启用苏联军队和国家安全机关的预备役军官做为编外工作人员，以

便在特别时期在克格勃机关内从事侦讯工作。给予这些工作人员以一定的权力，使他们与单位里将受他们监视的工作人员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

7. 第二总局，共和国、边疆区、州克格勃——克格勃分局应加强在高校、中等专业技术学校中的情报机构的工作，特别是在那些有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留学生学习的学校。借助情报机构和可信赖人员了解发生在青年和知识分子之间的事情，及时、准确的确定其性质，进而与党和社会组织一道防止政治诱惑和有害的意识形态造成的错误转变为反苏活动。

8. 全力提高情报侦讯的工作水平，在制止教士、宗教主义者敌对活动方面要特别注意到怎样才能使非法团体组织尽快失去活动能力。对教堂、教派活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积极实行监视活动。安全机构应于近期内充分揭露其反苏活动的行径。对其中的恶毒分子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应加强解散教堂和教派活动的工作，揭露其成员进行的反社会活动。

9. 摩尔多瓦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下属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在杜布拉夫劳动改造营内因犯特别危险的罪行服刑的劳改犯中实施情报侦讯活动时，特别注意及时揭发、认真查明那些死心塌地分子精心策划在刑满释放后恢复反苏活动的图谋，注意揭露这些人的同谋和尚未缉捕的犯罪同案犯。

其他共和国，边疆区、州的克格勃——克格勃管理局在掌握刑事犯罪服刑人员进行反苏活动的材料时，要加强同负责管理集中营的内务部刑侦分队的联系。向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并及时侦查这些活动。

10. 在1963年1月1日前应结束受克格勃监视人员名单的清查及统计工作。

根据克格勃有关命令精神，监视案卷今后在罪犯服刑地应由国

家安全机关分部负责，当被监视人从服刑地释放后，监视案卷应转往被释放人员居住地的安全机构。

受克格勃监视人员迁至新居住地时，监视案卷应在一个月之内转迁至相应部门。严禁以被监视人的迁移为由将监视案卷存档，弃之不用。

11. 在同危害社会分子做斗争时各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边疆区、州克格勃管理局，城市和地区克格勃特派机构，应与内务部机关经常保持联系，同内务部系统地交流重大刑事犯罪分子及主要寄生者的情报，制定共同措施，加强对他们的监视，要特别注意的是应没收这些人的武器。克格勃机关应积极协助党组织依据苏联法律，坚定不移的同不劳而食的人作斗争。

12. 克格勃——克格勃管理局负责人，城市和地区克格勃特派员应保证向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边疆区委、州委、市委、区委提供一切所获有关正在酝酿和已发生的敌对活动的准确情报，及易引发群众骚乱的事件和现象，同时采取及时的具体措施防止类似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发生。其中这类最为重要的事件和信号应直接向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汇报。

13. 各共和国克格勃主席，边疆区和州克格勃管理局负责人在一个月之内必须亲自审查下属机关在侦讯行动方面的动员准备情况，每个机关均应制定的对付群众骚乱的计划。计划中要同州党委、边疆区党委及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坚决制止发生骚乱预定的具体措施协调一致，以动用克格勃、内务部机关内所有人力和财力，甚至预备役国家保安人员及人民纠察队。

苏联部长会议下属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提醒所有国家保安人员注意，加强同国内反苏分子敌对活动的斗争并不意味着改变苏联反间谍机关工作的原则方向，更不是改变苏联的惩罚政策。根据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指示，国家安全机关工作的中心今

后对外必须指向反对帝国主义的间谍及情报机关的破坏活动上。同时也必须提高克格勃机构制止各种国内反苏活动的的能力。克格勃机构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社会主义法律，运用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力使任何一个苏维埃国家的敌人逃脱不了应有的惩罚，使任何一位公民避免无端的伤害。

国家保安人员在同反苏分子和敌方间谍阴谋的斗争中应依靠苏联社会，这样才能使他们同检察机关和内务部机关同心协力，采取有效措施预防犯罪，防止反苏社会分子公开的突然袭击。

本命令向克格勃全体人员公布。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B. 谢米恰斯内

附件 3

苏联总检察长命令草案

(1962 年)

特殊文件

绝密

关于加强检察机关对国家犯罪案件的审理的监督

最近，在一些地区、城市发现反苏分子、宗教主义者和教士利用流氓及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从事的反苏活动越来越猖獗。

与此同时，一些事实表明与反苏活动的斗争还不够坚决有力。更有甚者，一些人犯了某种罪行，也不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而对

他们采取警告措施了事。部分检察长不能积极地同这些犯罪行为斗争，对其危险性估计不足，工作漫不经心。

苏共中央委员会在1956年12月19日给党组织《关于加强党组织在群众中的政治工作及制止反苏敌对分子的突然袭击》的信中强调：“就如何同敌人的追随者作斗争，我们应该保持一致的意见。……在检察机关、法院、国家安全机关工作的共产党员，应毫不动摇地维护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时刻警惕敌对分子的阴谋，依据苏维埃政权的法规及时制止他们的犯罪活动”。

苏共中央的上述要求应当严格地坚定不移地予以执行。

坚决揭露并制止敌对分子的活动。与此同时，要善于将反苏分子与政治上幼稚而受其影响的人区别开来。要完成这项任务，必须加强检察机关的监督工作，提高政治警惕性。

我命令：

1. 坚决加强同反苏及其他敌对活动的斗争，协调检察机关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务部、法院各机关的工作。

各共和国、边疆区、州检察长要亲自去国家安全委员会各机关及内务部熟悉有关材料，共同拟定措施加强同犯罪行为作斗争。

2. 检察长应积极参与案件审查，采取措施揭露罪犯，正确认定其犯罪行为，应严格依法进行侦讯和法庭审理案件。

3. 对极为重要的典型案件要与党的组织协商组织进公开审理。各共和国、边疆区、各州检察长及其副手在诉讼过程中支持起诉，依法严惩罪犯。

4. 本命令分发至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州检察长。

苏联总检察长、国家一级检察官 P. 鲁坚科

№05837

谢米恰斯内关于散发反苏匿名文件的 情况向苏共中央通报

(1962年7月25日)

特殊文件

绝密

我现在汇报最近期间猖獗一时的散发反苏匿名文件的敌对活动的情况。今年上半年在全国共发现 7705 份反苏传单和匿名信件，清查处 2522 名作案人，比 1961 年同期增长 1 倍。

绝大多数反苏文件是在乌克兰、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拉脱维亚、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罗斯托夫州、列宁格勒州和莫斯科发现的。

传单和匿名信中呼吁积极同现存苏维埃制度作斗争，恶意诽谤苏联个别领导人，煽动民族情绪，不信任在我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诽谤苏维埃民主。许多匿名文件表现出对苏共和共产党员的仇恨，对地方党和苏维埃积极分子进行恐吓。

吹捧反党集团成员的匿名文件在较长时间中断之后又死灰复燃。试图对政府和共产党领导人采取恐怖活动的信件大量增加。

自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公布提高畜产品的价格之后，匿名信件来如潮涌。仅今年 6 月份，登记的散发的反苏传单和标语事件就有 83 起。这段时间，由党和苏维埃机关、报社和杂志社向克格勃机构转交了 300 多封反苏匿名信件。信中流露出

对我国居民生活现状的不满，呼吁组织群众演说、罢工、游行、集会，要求降低食品价格、提高工资。这些信件主要散发在工业中心。

受境外“自由俄罗斯”和“自由”电台节目的影响，一些苏联公民以所谓的“人民劳动联盟”（人劳联）名义拟写反动匿名文件越来越多。这类活动发生在苏联欧洲部分的许多居民区。

现已察觉寄往国外反苏电台、资本主义出版机关的匿名信件数量不断增多。这些信件的作者蓄意捏造事实，诽谤苏联现实社会，并愿为从事敌对活动效劳。

国家安全机关采取措施在上半年清查出了1039名作者，他们散发了6726份反苏文件（5032份传单，1694封信）。散发匿名文件的人中有364名工人，192名职员，210名大学生和中学生，102人无固定职业，105名退休人员，60名集体农庄庄员。其中434名作者即45%以上受过中等、高等教育，47%以上被揭露的匿名者年龄超过30岁。

被查明写反苏匿名文件的作者，有89人是苏共党员及预备党员，116人是共青团员。

值得注意的是，起草散发反苏文件的人中有的还是党和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或是老党员。例如，匿名者A.И.弗洛罗夫，1923年出生。受过高等教育，是苏共伏尔加格勒州卡梅申斯基市委组织指导处副处长；П.А.安德烈耶夫，1924年出生，苏共党员，苏联红军预备役中校军官，苏联记者协会成员，乌克兰《列宁旗帜》报的编外记者，居住在基辅；И.С.茹可夫，1891年生，1919年的苏共党员，享受特定退休金，是莫斯科市住宅和民用建筑总局工作人员；A.K.卡尔宾科，1903年生，1928年入党，居住地是库尔斯克州。

在审查过程中发现一些作者曾因各种罪行，其中包括反苏罪，

受到过审判并服过刑。

通过分析材料说明，随着匿名文件传播数量的增加，企图进行有组织的反苏活动愈加频繁。由于采取情报侦察措施，仅1962年上半年就查出60个地方性反苏团体，成员215名，其中多系青年，而在1961年全年共清查出47个组织，共186人。

反动文件经常使用（印刷铅字，打字机，自制印版和印章）等印刷工具。

例如，在莫斯科市清理出由大学生和青年工人组织的反苏组织“理智自由联盟”。该组织成员撰写了反苏文章、传单，然后在军事出版社印刷厂印制400份散发。

扎波罗热州克格勃管理局在梅利托波尔制止了反苏小组的敌对活动。该组织共13人，他们在1960~1961年间7次散发自制印版印刷的反动传单。

在切尔卡瑟城清查出3人反苏小组，该组织今年2月至3月散发了900份以上传单。传单用自制版印刷，署名“人劳联”。

在克里木州清查出一个名为“自由塔夫里亚”的反苏组织，它由10名八、九年级学生组成，制造散发出100多份反苏传单。

在半年内查出38名作案人。他们发出匿名文件进行恐吓，矛头针对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这些作案人中有B.C. 霍多斯，1913年生，1940年加入共产党，苏军退役上校，库尔斯克市居民；Б.И. 洛斯库托夫，1917年生，1945年加入苏共，基辅维生素制造厂科长，是基辅州马卡罗夫区党委全体会议成员；И.Е. 马米，1921年生，1946年加入苏共，1952年毕业于内务部喀山军事政治学院，内勤上尉，是科米自治共和国内务部乌菲姆电动机厂米昆斯基营地队长等等，还有其他人。

1962年上半年国家安全机关对因制造、散发反苏匿名文件的105人判了刑（而1961年上半年为58人），对366人进行了检查，

对 568 人实施了预防措施。

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采取措施以期尽快查明，揭露这些罪犯。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谢米恰斯内

№05838

伊瓦舒京关于新切尔卡斯克案件审理经过 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2年8月16日)

绝密

兹报告：今年8月14日在罗斯托夫州新切尔卡斯克市，开始公开审理1962年6月1~3日群众骚乱的14名组织者及参与者。

案件由俄联邦最高苏维埃审理，由Л.Н. 斯米尔诺夫同志主持，共和国检察长А.А. 克鲁格洛夫同志进行国家公诉。

每日出席旁听的有近千名本市社会各界人士，主要是工业企业工人。诉讼程序有组织地进行，旁听者对此十分关注。

所有被告，仅一人除外，均承认自己有罪，并对所犯罪行表示悔过。被告谢尔班说：“我认为自己的行为构成了对祖国的犯罪，我对此表示悔过”；被告舒瓦耶夫说：“我谴责自己的犯罪行为，并向最高法院表示深深的悔过。现在我才明白，你们不是向无罪人开枪，而是向暴徒、流氓开枪，这样开枪做得对”。

被告科尔卡奇，扎伊采夫，列夫琴科，莫克罗乌索夫，试图减轻自己的罪行，但一些证人揭露他们是一群贪得无厌、道德败坏、臭名远扬的罪犯。

诉讼经过使市民受到很大的教育。许多到庭的工人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些罪犯根本用不着调查，可以直接枪毙。电气机车制造厂装配车间工人拉德琴科和希尼亚在审判结束后，回到车间向大家讲

述这些被告人物的真实面目。他们的讲述受到工人的欢迎，工人们指责罪犯：“一群坏蛋”，“一伙财主，他们还想干嘛！”该厂机器车间旋工费拉蓬托夫告诉同事说：“被审判的是些十足的坏蛋，这些人大多数犯有前科。其中两人是寄生虫，他们高喊要改善生活比谁都凶，而自己即有私人住宅，又有别墅，其中一人有汽车，另一个有摩托车，应该把这些混蛋从这个社会中隔离出去，应该对他们处以极刑。”在该厂绝缘绕线车间工作的涅斯捷罗娃对车间同事说：“我们的眼睛看到的，前面的全是一群土匪，这些人被判过3~4次刑，结过6~7次婚。”

第三十建筑局队长哈诺夫说：“我们段的工人为争得共产主义劳动队的称号而努力奋斗，可这些寄生虫们生活富裕，却想出来搞暴乱。我们控诉他们的行为，要求对罪犯采取最严厉的惩罚措施”。

永久磁铁工厂技师帕拉尼切夫向本厂工人讲述被告的情况时，谈到扎伊采夫：“早就该把这个土匪、醉鬼吊死，可还是和他周旋个没完”。电力机车制造厂装配车间技师格特曼斯基说：“确实抓到了一撮寄生虫，就应该让这些混蛋从地球上消失”。铸钢车间工人里亚扎宁、费多连科、塔塔里诺夫及其他人在出席旁听会后，回到工厂坦率地表达了自己对罪犯的憎恶，并称他们是一小撮罪大恶极的恶棍。

特别令旁听者愤慨的是在诉讼过程中揭露了被告在群众骚乱中试图切断市内各企业煤气供应并造成严重后果。

出庭做证的证人彻底揭露了被告的罪行，其证词不容置疑。

诉讼期间人们的警惕性得到了提高，所有设施和薄弱地区受到保护和控制。

城市局势稳定。

诉讼仍在进行。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 II. 伊瓦舒京

№05839

伊瓦舒京和鲁坚科关于新切尔卡斯克案件 诉讼情况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2年8月23日)

绝密

兹报告：对1962年6月1~3日群众骚乱的组织者及积极参与者案件的公诉已于今年8月20日在罗斯托夫州新切尔卡斯克审理结束。

诉讼期间到庭出席旁听的将近5000名社会各界代表，主要是新切尔卡斯克城工业企业的工人。诉讼程序是有组织的，引起到庭旁听的人和市民的极大关注。

除一人外，其余被告均承认自己的罪行，并表示悔过。

法庭讯问了70名证人。他们完全证实预审期间的口供材料，揭露了被告罪恶行径。

扎伊采夫，莫克罗乌索夫，库兹涅佐夫，切列帕诺夫，科尔卡奇，索特尼科夫，舒瓦耶夫等七名罪犯判处枪决，其余被告判处10~15年有期徒刑。

法院的判决赢得了整个大厅经久不息的掌声，得到了市劳动人民广泛的反响和赞扬。

在宣判对七名被告执行枪决后，电力机车制造厂铸钢车间熔铸工卡申说：“这狗杂种罪有应得”。铸钢车间浇铸工科佩洛夫称赞判决说：“简直不可思议，他们想干什么，他们都做了些什么。这是

他们应得的下场”。永久磁铁工厂工人科切托夫与同事谈论审讯结果时说：“审判正确，调查客观，判决公平合理”。第六建筑局工人克尼亚泽夫说：“应该好好惩罚这些恶棍，以儆效尤”。工人干部——铁路员工卡久卡洛听完判决之后说：“这些罪犯真卑鄙！竟敢反对自己父兄，他们就该枪毙”。尼科利斯基工厂工人瓦甘、布尔采夫、拉普科、安德烈耶夫得知判决后，对此大加称赞，安德烈耶夫说：“判得好，这种人应该枪毙”。

判决同样受到市机关工作人员、科研人员和学校教师的称赞。例如，工学院研究员扎布卢金在谈论被判决的罪犯时说：“这是社会的败类，他们犯了重罪，应该枪毙他们”。

公开审理对市民的影响和教育很深。

应电力机车制造厂装配车间工人们的请求就案件诉讼过程进行了讨论。粉刷工维利亚耶娃发言说：“安排公开审理是正确的，可以让人们知道，是谁在骚乱中上窜下跳，积极鼓噪。这些人丝毫不值得同情，他们是人类的垃圾”。

以前部分人不明事件真相，现在新切尔卡斯克城居民已搞清楚事件的本质，已明白骚乱由刑事犯流氓分子挑起。他们愤怒谴责这伙流氓匪徒的罪恶行径。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 П. 伊瓦舒京

苏联总检察长 П. 鲁坚科

№05840

斯捷帕科夫关于新切尔卡斯克案件 诉讼经过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2年8月24日)

绝密

今年8月20日俄联邦最高法院刑事案件委员会结束了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的公开诉讼，本诉讼案件指控库兹涅佐夫、切列帕诺夫、扎伊采夫、索特尼科夫、莫克罗乌索夫、科尔卡奇、舒瓦耶夫、列夫琴科、切尔内赫、冈察洛夫、斯卢任科、杰缅季耶夫、卡特科夫和谢尔班1962年6月1~3日的强盗行径。

在法庭上彻底揭露了被告——带头进行流氓刑事犯罪活动所扮演的卑劣角色，他们的全部罪行铁证如山。诉讼揭发了每个被告道德败坏的丑恶嘴脸，全面揭示其所犯罪行给社会造成的危害。

确凿的证据和大量证人的证言使被告的罪行得以完全的确认。所有罪犯除杰缅季耶夫外均认罪，并对自己所犯的严重罪行表示悔过。

这次匪徒行径的主要组织者和积极参与者切列帕诺夫、莫克罗乌索夫、库兹涅佐夫、索特尼科夫、扎伊采夫、科尔卡奇和舒瓦耶夫由于严重危害社会罪被判处极刑——执行枪决。其余被告判处有期徒刑，在劳改营服刑。

案件的公开审理起了重大的教育和防范作用。每次到庭出席旁听的有450~500人。到庭旁听的共有近4000名劳动者，其中有

450名是电力机车制造厂的工人。出席审判会的本市劳动人民积极支持案件审理工作。当法庭宣布判处罪犯以极刑时，旁听席不止一次地响起掌声。所有旁听者一致赞同对匪徒的公正判决。工人、职员、知识分子的大量发言证明所有该市诚实的劳动人民坚决拥护判决。只有个别人对被告表示同情，认为其行为是正确的。

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制造厂前领导受到尖锐的批评。厂长库罗奇金因对企业领导不力，对工人的需求漠不关心，对生产定额标准和劳动组织疏于管理，苏共罗斯托夫州委会于今年6月将其开除出党并撤销其厂长职务。厂党委书记别列鲁舍夫同志因玩忽职守，被撤职并给予严重警告处分，记入档案。

州党委追究新切尔卡斯克市委书记和市执委主席党内严重责任。市委第一书记T.C.洛吉诺夫同志因对基层党组织，特别是电力机车制造厂党组织领导不力，对干部要求不严，决定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并记入档案；第二书记B.B.扎哈罗夫同志和书记B.Φ.奥西片科同志给予警告处分并记入档案。

8月22日州党委开会研究下一步如何在新切尔卡斯克市及本州其他城市加强思想工作，确定在近期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劳动人民居住区的政治工作，加强对青年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等问题。州党委书记和委员们将前往这些地区基层党组织去帮助他们切实解决这些问题。

苏共中央宣传部长 B.斯捷帕科夫

№03285

切尔布里科夫给戈尔巴乔夫的秘密报告

(1988年3月4日)

特别案卷

秘密

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送上自1957年以来国内群众骚乱的资料，以及1956~1987年期间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第70和第190条判罪的人数统计资料。

附件：第5/5-166号，秘密，计6张；

第5/5-167号，秘密，计1张。

致以深深的敬意

切布里科夫^①

1988年3月4日

^① 切布里科夫，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法制委员会主席。

附 件

秘密

关于1957年以来国内群众骚乱的资料

编号	时间	地点	参加人数	事 由	是否镇压	后果		
						死亡	受伤	追究刑事责任
1.	1957 6.10 ~11	莫斯科州波多利斯克市	300	一批酒醉公民的流氓行动，他们散布挑拨性谣言，说什么民警局工作人员打死一名被扣司机。	-	-	-	7
2.	1961 1.15	克拉斯诺达尔市	1300	一批酒醉公民的流氓行动，他们散布挑拨性谣言，说什么一名军人因着装违反规定遭巡逻队拘留后被殴打。	是	1	-	24
3.	1961 6.21	阿尔泰边疆区比斯克市	500	在比斯克市中心市场一个公民在不清醒状态下反抗民警局工作人员。	是	1	1	15
4.	1961 6.30	弗拉基米尔州穆罗姆市	1500	对于民警机关将奥尔忠尼启则工厂一名不清醒的工长送往医疗醒酒所时的行动不满，该工长于第二天死去。	是	-	2	12
5.	1961 7.23	弗拉基米尔州亚历山德罗夫市	1200	一群流氓对于民警局工作人员在公共场所扣押2名不清醒的公民时的行动的不满。	是	4	11	20
6.	1961 9.15 ~16	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别斯兰市	700	对民警局工作人员在公共场所扣押一群不清醒人员(5人)时进行武装反抗。	是	1	-	7
7.	1963 6.16 ~18	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克里沃伊罗格市	600	一名军人在不清醒状态下被扣押时对民警局工作人员进行反抗，而一群酒醉流氓进行挑唆性行动。	是	4	15	41

新切尔卡斯克事件

续表

编号	时间	地点	参加人数	事由	是否镇压	后果		
						死亡	受伤	追究刑事责任
8.	1962 7.1~ 3	罗斯托夫州 新切尔卡斯 克市	4000	对于电力机车制造厂行政 部门解释提高肉类和食油 零售价格原因时的行为不 满。	是	23	70	132
9.	1963 11.7	阿塞拜疆共 和国劳姆盖 特市	800	对于民警局工作人员和民 众纠察队员从参加庆祝游 行的个别公民手中收走印 有斯大林像的明信片的行 动不满。	是	-	1	6
10.	1964 4.16	莫斯科州布 尼齐市	300	民警局工作人员在扣留和 尔后在拘留室关押一名酒 醉公民时采取非法行动， 两天后此人死去。	-	-	-	8
11.	1964 9.29 ~10.3	达格斯坦自 治共和国哈 萨维尤尔特 市	700	一名车臣族人强奸了一个 拉克族姑娘，而拉克族公 民对车臣居民擅自采取行 动。	-	-	-	9
12.	1966 8.23	莫斯科市基 辅区	500	一名酒醉公民在被扣押时 对民警局工作人员进行反 抗	-	-	-	6
13.	1967 6.13	哈萨克共和 国齐姆肯特 市	1000	一些反社会分子传播挑唆 性谣言，说什么民警局工 作人员杀死第1车场一名 司机。	是	7	50	43
14.	1967 5.17	吉尔吉斯共 和国伏龙芝 市	700	一群流氓因有人散布关于 民警局工作人员杀死一名 军人的流言而采取挑衅行 动	是	1	3	18
15.	1967 7.3	阿塞拜疆共 和国斯捷潘 纳克特市	2000	一名被杀男孩的亲属对法 院判决“宽容”不满而擅 自行动。在流氓分子的支持 下，他们袭击押运队，抢走 3名人犯，杀死后加以焚 烧。	是	1	9	22

续表

编号	时间	地点	参加人数	事由	是否镇压	后果		
						死亡	受伤	追究刑事责任
16.	1967 10.8	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	500	借口民警局工作人员杀死一名公民而散布挑拨性谣言,实际上此人死于进行性脑膜炎。	-	-	-	10
17.	1967 10.12	白俄罗斯共和国斯卢茨克市	1200	一群公民因不满人民法院对造成严重身体伤害和藏匿枪支的判决而进行的流氓行动。法院大楼被焚毁,导致2人死亡,3人被烧伤。	-	-	-	12
18.	1968 7.13	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纳尔奇克市	4000	刑事犯罪分子散布谣言说,该市市场民警派出所殴打一个少年,从而发动挑唆性行动。汇集的人群冲入派出所,杀死一名地段民警。	-	-	-	33 (其中 3人 死刑)
19.	1977 1.22	图拉州新莫斯科斯克市	500	拘留室个别工作人员的粗暴行为和殴打在押未成年人的事实。	-	-	-	6
20.	1981 10.24	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奥尔忠尼启则市	4500	反社会分子利用一名被打死的出租车司机治丧之际发动的挑唆性行动,意在煽动民族歇斯底里,结果自发出现群众性骚乱。	-	-	-	26
21.	1984 8.22 ~23	鞑靼自治共和国列宁诺戈尔斯克市	1000	一批流氓分子破坏社会秩序和不服从民警机关,发展为袭击市内务局。起因是一辆民警局汽车撞倒两个姑娘,其中一人死亡。	-	-	2	13
22.	1985 1.12	塔吉克共和国杜尚别市	700	一群塔吉克人和一个非当地人在“塔吉克斯坦”电影院门口打架。在民族主义口号喊声的挑动下,人群集体殴打影院附近的俄罗斯人。	-	-	-	5

新切尔卡斯克事件

续 表

编号	时间	地点	参加人数	事 由	是否镇压	后果		
						死亡	受伤	追究刑事责任
23.	1986 12.17 ~18	哈萨克共和国阿拉木图市①	5000	该市一些高校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大学生出于挑唆目的要求修改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全会审理组织问题的决议	-	-	2②	107
24.	1986 4.2	雅库特自治共和国雅库茨克市	600	俄罗斯族和雅库特族中的流氓分子多次发生集体斗殴事件	-	-	-	8
					11	43	166	590

1956~1987 年期间因反苏维埃宣传鼓动及
散布诽谤苏维埃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明显捏造的
流言而被判罪的人数统计资料

年 份	判 罪 依 据	
	俄联邦刑法典第 70 条	俄联邦刑法典第 190 条
1956	384	
1957	1964	
1958	1416	
1959	750	
1960	162	
小计	4676	

① 群众性骚乱中受到不同程度身体损伤的有 1215 人，其中 774 人为军人和民警局工作人。

② 在群众骚乱中受伤，在住院期间死亡。

续表

年 份	判 罪 依 据	
	俄联邦刑法典第 70 条	俄联邦刑法典第 190 条
1961	207	
1962	323	
1963	341	
1964	181	
1965	20	
小计	1072	
1966	48	
1967	38	65
1968	54	75
1969	72	123
1970	83	121
小计	295	384
1971	66	102
1972	68	115
1973	73	105
1974	47	131
1975	22	74
小计	276	527
1976	5	55
1977	6	54
1978	12	44
1979	4	65
1980	35	67
小计	62	285
1981	39	88
1982	26	69
1983	44	119
1984	25	57
1985	16	57
小计	150	390
1986	11	17
1987	1	6
总计	6543	1609

【专题说明】

赫鲁晓夫与苏联新宪法

(1962年6月至1964年6月)

苏共二十二大以后，赫鲁晓夫着手进行苏联新宪法的起草工作。当时现行的宪法是1936年通过的《斯大林宪法》，赫鲁晓夫认为这一宪法存在着许多缺陷，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必须根据苏共新纲领的精神重新加以制定。在1962年6月15日，成立了有97人参加的宪法委员会，下设9个分委员会。先由这些分委员会按不同的问题准备材料，提出建议，然后集中讨论，综合汇集。按赫鲁晓夫的意见，该宪法起草工作应在1963年底完成。

这里收集的是赫鲁晓夫在两次宪法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缺少各分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和根据这些建议综合的草案。不过，从俄国学者最近几年介绍的情况看，那次的许多建议在国家民主化、联盟共和国的主权、公民个人的权利等方面都有比较新的提法，比如，选举产生国家和地方领导人，联盟共和国是主权国家，国家的重大问题进行全民公决，等。当然，当时整个思想是在赫鲁晓夫建设共产主义的框架下，碰到的问题很多，像生活用房该不该划作公有财产都有争论。所以，这部宪法一直没有出台。在1964年，领导集团内开始谋划推翻赫鲁晓夫，这样的宪法更无必要。

赫鲁晓夫下台后，1977年在勃列日涅夫领导下制定的苏联宪法许多方面都从当年的讨论退了回去。

(本专题文件由杨存堂编辑和校注，
吕允连翻译)

№08541

赫鲁晓夫在宪法委员会第一次 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速记记录）

（1962年6月15日）

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志：同志们，请允许委员会开始工作。如果有愿意发言的人，我们想在今天交换交换意见，不过，我们主要是想现在开这么一个组织会议。我们认为，最好是把我们的委员会分成几个分委员会，给每个委员会定一个专题，让它围绕这个专题工作，并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大家按分委员会分工各干各的，不管宪法整体。

当然，这项工作以后要汇总，编成一份宪法草案式的完整文件。我们大家将一起工作，研究所有的原则，并且提出整个委员会的宪法草案。

现在有一种设想，或者说提出过一种想法：也许应当起草一封信，阐述制订新宪法的基本思想和方针。但是，后来我们交换过意见，认为这样作不合适，因为如果起草一封信，要是在信中对考虑起草新宪法的工作提出指示和思路，那么，我想这样作对委员会成员会有所束缚。干嘛把信中阐述的观点提示给他们，或者用粗俗的话说，就是硬塞给他们。所以我们拒绝了这一建议。

让我们走最民主的路子，交换意见，分委员会开会，讨论。让它们自己陈述它们的观点，看它们认为自己分委员会应当拿意见的那个问题或者那一章节该怎么搞。然后我们集中，把这些意见汇总成一个统一的文件，再分发给委员会的全体成员，那时，委员会的

每个成员就他负责的那一单独的条款拿出自己的意见，而对整个文件向委员会提出自己的看法。我想，这样作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最正确的。这要花更多的时间？我们干嘛着急？没有必要。在会上我们可以采纳在分委员会工作的每个委员会成员关于制订宪法的最新意见。

这就是我们想在我们委员会的工作中采取的方针。

现在还难说我们什么时候能结束工作，但是我脑子里有这样一个主意：不着急。也许今年年底我们能结束自己的工作，也许明年我们能拿出宪法草案。我想这也不晚。这事需要花好多时间，不应操之过急。以后我们将不只一次地回到我们的工作中来，审议我们准备的文件。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不着急，不规定委员会必须结束工作的硬性期限。同志们，同意吗？

众人：同意。

赫鲁晓夫：如果没有反对意见，那我们请伊利切夫同志宣布分组方案。我们预先搞了一个分委员会成员名单，把大家分到各分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按这个分工谈自己的意见。

伊利乔夫：建议设立9个分委员会。

赫鲁晓夫：关于设几个分委员会我们现在就不表决了。

伊利乔夫：有以下委员会：

1. 宪法一般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分委员会，
2. 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问题分委员会，
3. 国家管理、苏维埃和社会团体活动问题分委员会，
4. 经济问题和国民经济管理问题分委员会，
5. 民族政策和民族国家建设问题分委员会，
6. 科学、文化、国民教育和保健问题分委员会，
7. 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问题分委员会，
8. 人民监督和社会主义法制问题分委员会，

9. 编辑分委员会。

赫鲁晓夫：先说分委员会的划分。委员会的委员们是否满意？有没有其他的建议？没有。那就念委员会成员的分组名单。

伊利切夫：第一分委员会，一般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分委员会（主席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分委员会成员：勃列日涅夫、沃罗诺夫^①、基里连科^②、科兹洛夫^③、柯西金、库西宁^④、米高扬、波德戈尔内^⑤、波利扬斯基^⑥、苏斯洛夫、什维尔尼克^⑦。

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问题分委员会（主席弗·罗·科兹洛夫同志）。分委员会成员：阿布拉莫夫^⑧、鲍久尔^⑨、沃罗诺夫、杰米契夫、德佐采尼德泽^⑩、伊斯坎德罗夫^⑪、卡恩别尔津^⑫、科罗琴科^⑬、凯宾^⑭、奥韦佐夫^⑮、佩尔谢^⑯、谢尔比茨基^⑰。

国家管理、苏维埃和社会团体活动问题分委员会（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分委员会成员：拜拉莫夫^⑱、格奥尔加泽^⑲、叶皮谢夫^⑳、卡文^㉑、科季察^㉒、马祖罗夫^㉓、米里谢普^㉔、帕夫洛夫^㉕、波利扬斯基^㉖、拉苏洛夫^㉗、斯米尔诺夫^㉘、斯涅奇库斯^㉙、季托夫^㉚。

经济问题和国民经济管理问题分委员会（主席柯西金同志）。分委员会成员：沃尔科夫^㉛、沃洛夫琴科^㉜、加尔布佐夫^㉝、吉塔洛夫^㉞、格拉乔夫^㉟、格里申^㊱、格罗莫夫^㊲、基里连科、佩辛^㊳、斯捷潘诺夫^㊴、塔别耶夫^㊵、托尔斯季科夫^㊶。

民族政策和民族国家建设问题分委员会（主席米高扬同志）。分委员会成员：阿胡诺娃^㊷、扎罗比扬^㊸、瓦·伊·科兹洛夫^㊹、考涅楚克^㊺、库拉托夫^㊻、库纳耶夫^㊼、姆扎瓦纳泽^㊽、波德戈尔内、努里耶夫^㊾、奥尔加诺夫^㊿、佩韦^①、拉希多夫^②、斯韦特利奇内^③、斯皮里多诺夫^④。

科学、文化、教育和保健问题分委员会（主席苏斯洛夫同志）。成员：阿洪多夫^⑤、叶留金^⑥、克尔德什^⑦、库拉绍夫^⑧、拉夫连季

耶夫^⑨、纳斯里丁诺娃^⑩、奥利尚斯基^⑪、萨姆索诺夫^⑫、费定^⑬、肖洛霍夫。

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问题分委员会（主席库西宁同志）。成员：阿鲁沙尼扬^⑭、博伊科夫^⑮、葛罗米柯、马利宁娜^⑯、马利诺夫斯基、帕列茨基斯^⑰、波诺马廖夫^⑱、波波娃^⑲、沙里波夫^⑳。

人民监督和社会主义法制问题分委员会（主席什维尔尼克同志）。成员：加加诺娃^㉑、戈尔金^㉒、马迈^㉓、米罗诺夫^㉔、穆拉维约佳^㉕、拉赫马托夫^㉖、鲁坚科、谢米恰斯内、乌苏巴利耶夫^㉗、谢列平。

编辑分委员会（主席伊利切夫同志）。成员：阿朱别伊^㉘、阿尔祖马尼扬^㉙、杰尼索夫、罗马什金^㉚、萨秋科夫^㉛、斯捷潘诺夫^㉜、费多谢耶夫^㉝。

赫鲁晓夫：有意见没有？全部委员会成员都进入了分委员会，都参加了分委员会，每个委员会成员都参加了一个分委员会。

有什么意见或者调一调的要求？也许谁有在两个或三个分委员会干一干的愿望？这也是允许的。看来没有。同意这个分委员会组成吗？

众人：同意。通过。

赫鲁晓夫：好。我们还有什么事？给委员会成员发了些材料，大概收到了吧？

众人：有材料了。

赫鲁晓夫：看来我们就不给你们发其他材料了。别指望了。你们需要的材料自己去找。

有人问：不能拿点现成的材料吗？

赫鲁晓夫：我们就是不想给别人嚼过的东西。分委员会自己搞，而这是最好的材料。

我们不规定硬性期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开始工作，不

用确定委员会开始工作的日期。我想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请允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到此结束工作，祝你们在工作中，在提交材料方面顺利。

再见。委员会会议结束。

- ① 沃罗诺夫，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副局长。
- ② 基里连科，苏共斯维尔德洛夫州委第一书记。
- ③ 科兹洛夫，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
- ④ 库西宁，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
- ⑤ 波德戈尔内，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后来调任苏共中央书记。
- ⑥ 波利扬斯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
- ⑦ 什维尔尼克，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 ⑧ 阿布拉莫夫，苏共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
- ⑨ 鲍久尔，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 ⑩ Г.С. 德佐采尼德泽，格鲁吉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 ⑪ М.А. 伊斯坎德罗夫，阿塞拜疆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 ⑫ Я.Е. 卡恩别尔津，拉脱维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 ⑬ Д.С. 科罗琴科，乌克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 ⑭ Н.С. 凯宾，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 ⑮ 奥韦佐夫·巴里什，土库曼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 ⑯ А.Я. 佩尔谢，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 ⑰ В.В. 谢尔比茨基，乌克兰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 ⑱ Н. 拜拉莫夫，土库曼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
- ⑲ М.П. 格奥尔加泽，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
- ⑳ А.А. 叶皮谢夫，苏军和海军政治工作负责人。
- ㉑ 卡文 В.М.，文尼察州一个集体农庄主席。
- ㉒ 科季察 И.С.，摩尔达维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
- ㉓ 马祖罗夫 К.Т.，拜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 ㉔ 米里谢普 А.А.，爱沙尼亚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 ㉕ 帕夫洛夫 С.П.，苏联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
- ㉖ 波利扬斯基 Д.С.，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
- ㉗ 拉苏洛夫 Д.，塔吉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 ㉘ 斯米尔洛夫 В.С.，列宁格革的一名工人。
- ㉙ 斯涅奇库斯 Д.Ю.，立陶宛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 ㉚ 季托夫 В.Н.，苏共中央党的机关部的领导。
- ㉛ 沃尔科夫 А.П.，苏联部长会议劳动与工资国家委员会主席。

- ⑳ 沃洛夫琴科 А.П., 里比茨克州《彼得洛夫斯基》国营农场场长。
- ㉑ 加尔布佐夫 В.Ф., 苏联财政部长。
- ㉒ 吉塔洛夫 А.В., 基洛夫州一个集体农庄的拖拉机队队长。
- ㉓ 格拉乔夫 В.В., 库尔斯克州卡利诺夫卡村集体农庄主席。
- ㉔ 格里申 В.В.,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
- ㉕ 格罗莫夫 А.А., 国家第一轴承厂厂长。
- ㉖ 佩辛 К.Г., 苏联农业部第一副部长。
- ㉗ 斯捷潘洛夫 С.А., 斯维尔德洛夫州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 ㉘ 塔别耶夫 Ф.А., 苏共鞑靼州委第一书记。
- ㉙ 托尔斯委科夫 В.С., 苏共列宁格勒州委第二书记。
- ㉚ 阿胡诺娃 Т., 塔什干州基洛夫集体农庄机械化队队长。
- ㉛ 扎罗比扬 Я.Н., 职权尔明尼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 ㉜ 科兹洛夫 В.И., 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
- ㉝ 考涅楚克 А.Е., 作家。
- ㉞ 库拉托夫 Т., 吉尔吉斯最高苏维埃主席。
- ㉟ 库拉耶夫 Д.А., 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 ㊱ 穆扎瓦拉泽 В.П., 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 ㊲ 努里耶夫 З.Н., 苏共巴什吉尔州委第一书记。
- ㊳ 奥尔加诺夫 Н.Н.,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 ㊴ 佩韦 Я.В., 拉托维亚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 ㊵ 拉希多夫 Ш.Р., 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 ㊶ 斯韦特里奇内 М.П., 行政官员。
- ㊷ 斯皮里多诺夫 ., 苏共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
- ㊸ 阿洪多夫 В.Ю., 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 ㊹ 叶留金 В.П., 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长。
- ㊺ 凯尔德什 М.В., 苏联科学院主席。
- ㊻ 库拉绍夫 С.В., 苏联卫生保健部长。
- ㊼ 拉夫连季耶夫 М.А., 院士。
- ㊽ 拉斯里丁诺娃 Я.С., 乌兹别克最高苏维埃主席。
- ㊾ 奥尔斯基 М.А., 苏联农业部长。
- ㊿ 萨姆索诺夫 Б.И., 历史学家。
- ① 费定 К.А., 作家。
- ② 阿鲁沙尼扬 Ш.М., 阿尔明尼亚最高苏维埃主席。
- ③ 博伊科夫 В.А., 列宁格勒一个企业的党委书记。
- ④ 马利宁娜 П.А., 科斯特罗马州集体农庄主席。
- ⑤ 帕列茨基斯 Ю.И., 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
- ⑥ 波诺马廖夫 Б.Н., 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后任苏共中央书记。
- ⑦ 波波娃 Н.В., 苏联同外国社会友好和文化交流联盟主席团主席。
- ⑧ 沙里波夫 И., 哈萨克斯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 ⑨ 加加诺娃 В.И., 棉花综合工厂工作队长。

- ⑳ 戈尔金 A. B., 苏联最高法院院长。
- ㉑ 马迈 H. Я., 净化工作面队长。
- ㉒ 米罗诺夫 H. P., 苏共中央行政机部首长。
- ㉓ 穆拉维约娃 H. A., 俄罗斯联邦社会保障部部长。
- ㉔ 拉赫马托夫 M., 塔吉克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 ㉕ 乌苏巴利耶夫 T.,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 ㉖ 阿朱别伊 A. A., 《消息报》主编、赫鲁晓夫的女婿。
- ㉗ 阿尔祖马尼扬 A. И., 院士。
- ㉘ 罗马什金 П. С., 法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读院士。
- ㉙ 萨丘科夫 П. А., 《真理报》主编。
- ㉚ 斯捷潘诺夫 B. П., 《真理报》副主编。
- ㉛ 费多谢耶夫 П. П., 院士

№08542

赫鲁晓夫在宪法委员会第二次 全体会议开幕时的讲话

(1964年6月16日)

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志：同志们，我们的会议是不是开始？有些同志因病没有到会。我想我们还是开会。

我想就已经送来的材料简单地谈几点想法。如果你们同意，那么我们就对我们的工作规定如下程序：听取以下问题分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问题，
国家管理、苏维埃和社会团体活动问题，
经济问题和国民经济管理问题，
民族政策和民族国家建设问题，
科学、文化、国民教育和保健问题，
人民监督和社会主义法制问题，
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问题。

我们设立的7个分委员会，有人建议听取它们的报告。接下来我们决定，我们是就这些报告交换意见，还是到此为止，以后考虑分委员会的意见和收集来的材料。材料收集得很多，足以整理成一个宪法草案样本，以后我们再碰头，就更加具体的问题开会。

众人：对。

赫鲁晓夫：当然，进行辩论是有益的，不过这可是辩论。我认为，分委员会讨论过这些问题，因此，为了节省时间，可以接受这

样的会议议程，等材料更多的时候，再根据更加具体的材料进行辩论。有反对意见吗？

众人：没有。

赫鲁晓夫：宪法委员会今天的会议拟讨论各分委员会就起草苏联新宪法草案准备的材料。我们将听取分委员会主席的报告，然后，如果有必要就交换意见。我已经说过，分委员会的报告包括了很多材料。为了使用这些材料，看来我们必须委托各分委员会主席和编辑分委员会对所有的建议进行综合，并就新宪法草案提出自己的意见。

请允许我先谈几点意见。

宪法委员会不断收到劳动人民的大量来信，来信谈到的是关于未来基本法的性质和内容。有的人起草并寄来了宪法呈文。有代表性的劳动人民来信已经送给各分委员会。看来，以后还会有来信，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劳动人民的建议，最大限度地考虑到信中有益的东西。

在通过关于起草宪法草案决定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我已经讲过，在新的宪法中必须反映苏维埃社会和国家发展的现阶段，把社会主义民主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为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建立更加牢固的保障。新宪法将是一部史无前例的全民社会主义民主的宪法。

新宪法应当为严格遵守社会主义法制提供保障，为过渡到社会的共产主义自治准备条件。在起草宪法草案时，我们必须以我国政治建设和国家建设的具有国际意义的巨大经验为指南，以弗·伊·列宁的思想遗产，以他关于宪法建设问题的指示为指南，以在我们党的纲领中得到反映和进一步发展的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原则和活动原则为指南。

新宪法应当是一个具有国际意义的文件，是鼓舞各民族争取自

已光明未来的典范、榜样。

你们知道，现行的1936年宪法的基础是这样一条原则：只把苏联人民已经取得的成果在宪法中肯定下来。我想，我们应当遵循另一种原则，根据列宁的思想，不仅把已经取得的成果在新宪法中肯定下来，还要在新宪法中反映纲领性的原理，使新宪法大大有助于达到共产主义建设的目标。弗·伊·列宁在世时在他的领导下制定的头几部苏联宪法，都有关于目标和理想的内容，在宪法中规定就是要促进目标和理想的实现。

这是总的原则。现在我想讲几个具体的想法，但是，这些具体的想法也有原则性的意义。

第一，新宪法将在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完全彻底胜利的条件下通过，它将是一部全民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民主政治原则应当有明文规定，工人阶级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作用，个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应当得到反映。

因此，宪法不能局限于仅仅阐述国家建设的基础和国家机构。在社会主义社会，在管理社会事务方面，除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外，共产党和社会团体也起着重要作用。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社会团体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和经济建设的领导问题，在宪法中应当得到广泛的反映。总之，新宪法应当是国家和社会的基本法。

第二，我们在党纲中写进了一条重要的原则：“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这是一条基本的原则，这是马列主义的根本基础。看来，必须使这条共产主义的原则在新宪法的草案中得到充分反映。也许应当设专门一章：“社会、个人和国家”，在这一章中必须把苏联人民已经享有但是没有写进现行宪法的权利，以及我们第一次能够保障的权利肯定下来。

譬如，可以指出实际上已经存在的那些权利和民主自由：劳动保护权、健康保护权、享有文化财富权、科学和艺术创作权，等

等。

当然，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必须以重要的义务为前提。必须规定一些新的公民义务：关心集体的荣誉和尊严、关心同志相互关系的发展，与民族不睦和民族特殊化的表现作斗争。也许，关于劳动义务的准则中还应当指出：对逃避公益劳动的人采取社会教育措施。

第三，因为新宪法是全民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部宪法，它应当准确全面地反映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不是简单地换了个招牌，而是我们国家的性质以及国家机构的建设和国家机构的活动方法，都发生了而且还在发生真正本质性的变化。

首先应当好好地想一想整个苏维埃活动的活跃，苏维埃、苏维埃常设委员会以及苏维埃代表作用的提高。

关于苏维埃的名称。

把苏维埃叫作譬如人民苏维埃是不是更准确？有一位同志认为，这样的名称能更好地反映我们社会新的社会结构、我们社会的社会统一和思想政治的统一。另外一些同志认为，基于同样的考虑，把苏维埃叫作劳动人民苏维埃更准确。应当进行磋商。

我们有很多的社会和国家管理问题是在人民大会和企业、组织以及机关各集体代表会议上，采取全民讨论法令草案的途径，是通过人民对国家机关、经济组织、社会机构、文化机构、公职人员的生活和活动进行监督以及通过社会团体，由劳动人民直接决定的，我们已经习以为常。

看来，应当使劳动人民的广泛权利和劳动人民直接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得到宪法的肯定。

我们国家的全民性质在苏联公民的广泛权利中，在巩固社会主义法制，在劳动人民参与捍卫社会主义法制中得到了反映。如果这些因素有宪法作基础那就好了。

第四，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经济建设是最值得注意的政治。

经济问题在我们这里占了全部管理问题的大部分。经济问题在宪法草案中占有相应的位置才对。

大家知道，在现行的宪法中经济问题占的位置很小。也许应当在宪法中专门列一章，在说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形式和物质财富的分配原则外，还规定社会主义的经营、计划和管理国民经济的原则。

必须特别强调最高苏维埃和其他各级苏维埃在领导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重大作用。

第五，我们已经相当广泛地扩大了加盟共和国的权利，在新宪法草案中应当反映这一点。列宁的民族政策问题和民族国家建设问题必须认真关注。

在现行的宪法中，文化、科学和教育问题正如俗话所说不走运。这些问题几乎一点没讲。必须消除这一缺陷，把苏维埃国家和我们党在文化建设方面所进行的巨大活动在宪法中充分地肯定下来。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它在现行宪法中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

这指的是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问题。大家知道苏联对外政策的目的和原则的意义。像捍卫全面和平和国际安全、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联盟、加强与新的民族国家的友谊、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这样的原则，都应在新宪法中适当地表述出来。

同志们！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应当在新宪法中得到反映。我已经说过，分发给宪法委员会各位成员的分委员会的材料中，有许多宝贵的建议，各分委员会的主席今天将向我们报告这些建议。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们就开始听各分委员会主席作报告。

№08543

赫鲁晓夫在宪法委员会第二次

全体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1964年6月16日)

赫鲁晓夫：各分委员会的主席都讲完了。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各分委员会做了相当大量的工作，而且工作方向正确。

在前一部宪法中确实没有突出经济方面。我认为这绝非偶然。总的说来，在经济管理方面，斯大林官僚式地搞管理部门建设，不让别人干预，使它脱离了社会团体的影响。所以，你瞧，我们过去的情况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已经纠正了）：有全苏煤炭工业联合公司。全苏的！为什么不能让每个共和国对发展这一部门发挥自己的作用？况且它们离煤矿比较近。即使在革命的最初年代，在列宁在世时，还有顿涅茨克煤炭工业联合公司。当时还没有另外一个煤炭工业联合公司。煤炭工业联合公司设在阿尔乔莫夫斯克，后来迁到哈尔科夫。还有个南部地区钢铁工业托拉斯，这就是我们的冶金部。当时乌拉尔的地位还微不足道；但是这是我们主要的冶金企业。它在那个地方，党组织、工会组织和国家机关照样能施加影响。后来这一切都集中到中央，都散了摊。这样作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官僚主义的管理。

我们纠正了这种状况。我认为，每个人都看到这样作不是搞糟了而是改善了对经济和经营的领导。看来，今后我们应当考虑一下这个问题。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这项工作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和宪法结合起来，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必须

下工夫，找到正确的组织形式。在其他问题上也应这样作。

我认为，在我们的革命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现阶段，经济在今后将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虽然列宁早在革命的最初年代就预见到了这一点，但是斯大林没有强调这个问题。

后来，斯大林在世时制定的宪法和列宁在世时制定的宪法有了差别，我想这并不是偶然的。斯大林想离开列宁远一点，抹杀他的遗产。当然，症结就在这里。他不公开地讲，但实际上他对列宁不满。看来，他无法忘记他……

米高扬：连宪法也称斯大林宪法。

赫鲁晓夫：对。他没法忘记列宁留下的遗嘱。看来，他对列宁不满，尽管列宁是正确的，这影响到斯大林在世时的一切。

我想我们的会议今天到此可以结束了。

不要给报界详细的报道材料。我们把分委员会的工作说得越详细，就越会限制我们在表述宪法原则时的思路，否则，以后必须作补充说明。应当认为我们有原始材料，作了一定的综合，进行了磋商。可以笼统地讲：委员会开过会，研究了一些问题。不要谈实质的东西，不然的话会限制住我们，以后不得不作各种解释，这样作就不对了。

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者没有人要求就报告交换意见，——我想未必需要交换意见，我是说委员会的成员参加过分委员会的工作，——那么请允许会议到此结束。下一次会议等总的模型准备好时再召开。

会议到此结束。请主席团成员、主席团候补成员、中央委员会书记和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到举行全会会议的房间集合，商量事情。

【专题说明】

赫鲁晓夫下台

(1964年10月)

在斯大林之后，尼·谢·赫鲁晓夫较长时间中成为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1953年9月被选为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58年3月取代布尔加宁兼任了部长会议主席，集党政大权于一身。有人称他执政的时间为“那十年”，其实这是个不甚确切的说法，究竟从那一年算他执政开始，不好定论。不过，1964年10月14日他被解除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这个时间确定无疑。

赫鲁晓夫是以“非斯大林化”而著名史册，也对斯大林的经济体制、文化教育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还为苏联共产党制定了一个新纲领、为苏联提出了一个二十年建设共产主义的“宏伟计划”。赫鲁晓夫终究是斯大林时代提拔和培养出来的领导干部，在他身上深印着很深的历史烙印，他并没有摆脱斯大林的思想理论和体制框架。他对斯大林的批判仅局限于就“个人迷信”谈个人迷信，没有也不可能从社会与历史的深度上找到原因。他所进行的改革大都未经深思熟虑而是出于急功近利、投机取巧，并未抓住苏联问题的要害，在做法上依然依靠权力意志和一时的心血来潮，往往操之过急、朝令夕改，改革的实际效果不大。广大干部和群众却被折腾得无所适从，人民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所以，积怨越来越多，

人民的反抗频繁发生。

赫鲁晓夫最后是被他一手提拔的亲信、党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的成员经过密谋策划而赶下台的。关于主席团成员怎样背着赫鲁晓夫进行密谋和串连有一些报道，尚缺乏档案资料。这一专题收录了撤消赫鲁晓夫职务的1964年十月全会的主要文件。这些文件大体上说明了撤销赫鲁晓夫职务的原因以及基本过程。实际上这一决定是在先前的主席团会议上做出的。中央委员会只是举手通过而已。虽然这里仍存在着激烈的争夺权力的斗争，但总算是有了一定的民主程序，用简单的投票方式解决问题。

(本专题文件由杨存堂编辑和校注，
赵仲元翻译)

№04361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召开中央全会的决议

(1964年10月12日)

绝密

《关于对即将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和制定新时期 国民经济远景计划提出的有关问题的决议》^①

1. 苏共中央不断收到因对定于今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讨论的问题和制定新五年计划出现原则性的模糊认识而提出的质疑，因此认为迫切需要于最近期内召开有赫鲁晓夫同志参加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予以讨论。

委托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和波德戈尔内同志打电话同赫鲁晓夫同志联系，向他转达这一决定，以便中央主席团会议能于1964年10月13日举行。

2. 鉴于赫鲁晓夫同志1964年7月18日提出的下发各级党组织的《关于农业向集约化过渡的领导问题的意见书》，在各地引起

^① 1964年10月12日，利用赫鲁晓夫和米高扬休假不在莫斯科的机会，苏共中央主席团大多数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成员开会，讨论了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勃列日涅夫、沃罗诺夫、基里钦科、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波利扬斯基、柯西金、什维尔尼克、谢列平、格里申、叶夫列莫夫、安德罗波夫、杰米切夫、伊利切夫、波利亚科夫、波诺马廖夫、鲁达科夫、季托夫等。会议由勃列日涅夫主持。这个文件就是在这个会上通过的。

许多含混不清的理解，且其中有不少混乱主张，故决定将该意见书从各级党组织手中收回。

3. 鉴于所提问题和即将进行的讨论的重要性，认为有必要将苏共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以及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召集到莫斯科，以便向全会通告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对问题进行讨论的结果。

关于举行苏共中央全会的时间问题，将在赫鲁晓夫同志出席的情况下做出决定。

苏共中央主席团

№04362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恢复列宁主义 集体领导原则的决议

(1964年10月13日)

绝密

关于主席团内部发生的问题和在苏共中央活动中 恢复列宁主义集体领导原则的措施的决议

由于赫鲁晓夫同志破坏列宁主义集体领导原则所犯种种错误和不当行为，中央主席团内部最近一个时期出现了极不正常的情况，从而使得中央主席团委员们难于履行他们担负的领导党的和国家的重大职责。

赫鲁晓夫同志身居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集大权于一身，在某些情况下不受苏共中央的监督，不再考虑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共中央委员们的意见，未经应有的集体讨论就决定重大问题。

赫鲁晓夫同志对待主席团和中央同志们的态度偏激、粗暴、无视他们的意见，以至在实际贯彻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决议所确定的路线方面犯了一系列重大错误。

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由于赫鲁晓夫作为一名工作人员现有的个人品质上的缺点以及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已不可能改正他所犯

的错误和他那不符合党性原则的工作方法。同时，也考虑到赫鲁晓夫同志提出的声明书（赫鲁晓夫声明书^①由苏斯洛夫在中央全会上宣读），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

1. 满足赫鲁晓夫同志因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提出解除他的中央第一书记、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

2. 认为今后再由一人身兼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二职是不适当的。

3. 认为有必要于1964年10月14日召开苏共中央全会。^②

委托勃列日涅夫同志主持全会开幕式。

委托苏斯洛夫同志代表中央主席团和中央书记处做情况通报。

苏共中央主席团

① 参见本专题文件No04364。

② 10月13日，赫鲁晓夫和米高扬乘飞机回到莫斯科，参加了主席团的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了12日会议的参加者外，还有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扎瓦纳泽、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马祖罗夫、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布多夫、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

No 04363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的开幕词

(1964年10月14日)

绝密^①

主持人勃列日涅夫同志：同志们！鉴于苏共中央不断收到因定于今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讨论的问题和对制定我国新时期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有关问题产生原则性的模糊认识而提出的质疑，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有必要在今年10月12日会议上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在会议过程中，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们还相继提出了其他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特别是提出了中央主席团工作中存在不正常情况的问题。认为必须毫不迟疑地在今年10月13日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在赫鲁晓夫同志出席会议的情况下讨论所出现的种种问题。

中央主席团委托我同柯西金、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同志打电话与赫鲁晓夫同志联系，向他转达主席团业已形成的意见和关于请他回来出席今年10月13日中央主席团会议的决定。

今年10月13日举行的有全体委员（其中，正如大家所知，科兹洛夫同志因病缺席）出席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在赫鲁晓夫同志主持下，对于我国国内外政策、领导工作、党的政策的贯彻和赫

^① 勃列日涅夫所作开幕词的这一部分未列入会议速记记录。

鲁晓夫同志对党中央和政府工作的错误的恶劣的领导作风与方法等根本性问题展开了讨论。会上发言的所有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都一致认为，中央主席团缺乏良好的工作气氛，中央主席团内情况不正常，其过错首先要由赫鲁晓夫同志来承担，因为他走上了破坏党和国家生活的列宁主义集体领导原则、突出对他的个人迷信的道路。中央主席团得出一致结论认为，赫鲁晓夫同志种种过分匆忙草率定下的方针和欠缺考虑的唯意志论的做法，给我国国民经济的领导制造了巨大混乱，造成了严重失误，却用无穷无尽地搞所谓改革与改组来加以掩饰。

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现存的局面是令人不能容忍的，因此一致主张必须毫不迟疑地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将这一问题提交全会讨论并做出决定。

№04364

苏共中央十月全会速记记录

(1964年10月14日)

绝密

禁止复制

限期3个月内退苏共中央

1964年10月14日

主持人勃列日涅夫同志：同志们！中央委员169人，到会153人。中央候补委员149人，到会130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63人，到会46人。现在请允许我宣布全会开幕。

同志们！两天来，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了有关赫鲁晓夫同志所犯错误和行为不当的问题。我们大家在讨论中取得了一致意见。主席团委托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同志向你们报告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书记们的一致意见。现在请苏斯洛夫同志讲话。

苏斯洛夫：同志们！中央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们，都对赫鲁晓夫同志领导党和国家的不妥当的方法所造成的不正常情况表示非常不安。所以，中央主席团决定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并将当时正在南方休假的赫鲁晓夫同志召回参加会议。主席团开过两天会，极其审慎地讨论了这一问题，对于赫鲁晓夫的不妥当的工作方法进行了严厉批评。在这方面，所有主席团委员、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们的发言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所有人发言的一个基本点都认为，党的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决议和党的纲领所确定的党的列宁主义路线是正确的，不可违背的。这条路线无论在国内政策方面，还是在对外政策方面，对于我们来说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可动摇的。（长时间热烈鼓掌）

大家知道，近几年来，我们党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中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党的第二十次、二十一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在内外政策上制定了正确的列宁主义方针。在集体制定这条路线方面，赫鲁晓夫同志也做出了一定贡献。应当指出，他在揭露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奉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政策方面，在争取和平和与各国人民友好的斗争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贯彻列宁主义方针，为共产主义的胜利而忘我地劳动着。

然而，如果中央主席团内部是另一种情况，我们的成就会更大得多。赫鲁晓夫同志近些年来在中央主席团内造成的不正常情况，过去和现在不仅给中央主席团实际工作，也给整个中央的工作乃至我们全党的工作造成了严重损失。这种不正常情况表现在哪里呢？它首先表现在赫鲁晓夫同志开始粗暴地破坏党的领导人要服从领导人集体的意志，领导人之间要有正确分工，要自由地切实地讨论国内外政策中带根本性的原则问题。而这些要求都在很大程度上被赫鲁晓夫同志置诸脑后了。

赫鲁晓夫同志集党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二职于一身，远非总能正确地履行赋予给他的权责。他违背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原则，开始热衷于在决定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大问题上搞独断专行，无视党政领导人集体的意见，不再考虑同志们的主张和忠告。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甚至在重大问题上也由他一个人说了算，将他自己主观主义的、往往是完全不正确的观点强加于人。他自命

不凡，一贯正确，自认为拥有垄断真理的权利。凡所提主张或意见不合赫鲁晓夫同志心意的同志，他都会以盛气凌人的傲慢态度，给他们起各种轻蔑的污辱性的绰号，以贬低他们的人格。

赫鲁晓夫同志已患上某种自大狂，把党和人民的成就、列宁主义方针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胜利成果，全部记在他个人功劳簿上，而把实际工作中的一切缺点错误，则统统归咎于各加盟共和国的党和苏维埃机关、州委、区委或某些领导工作人员。

由于赫鲁晓夫同志的行为失当，中央主席团越来越不像是个集体创造性讨论和决定各种问题的机关了。实行集体领导实际上越来越不可能了。

此外，赫鲁晓夫同志还经常玩弄阴谋手法，千方百计挑拨主席团委员相互争吵。这也妨碍了中央主席团的正常工作。（喊声：可耻）

但是，搞阴谋诡计是不可能长久不受惩罚的。主席团所有委员终于都认清了赫鲁晓夫确实在玩弄不光彩的把戏。

赫鲁晓夫同志狂妄自大，自以为他可以为所欲为。在他的活动中，近来日益明显地暴露出他采取的方针是摆脱中央主席团和苏共中央对他的监督，把它们意见当成耳旁风。

例如，1964年举行的中央七月全会，原定只讨论组织问题，并未专门安排赫鲁晓夫同志在会上发表什么讲话。然而，出乎主席团委员和全会成员的预料，他突如其来地发表了一篇冗长且文不对题的讲话，其中含有许多粗暴的政治错误。只要向你们提到他威胁要解散一处科学院就够了。（场内喧嚷声，喊声：可耻！）

这一声称是根本违反我们党在科学领域的整个政策的。

季米里亚捷夫科学院大部分科学家，在农业耕作制度的一些问题上不同意赫鲁晓夫同志的观点，只是因为这件事，他竟在一年当中令人遗憾地执意设法要撤销该科学院。（喊声：可耻！）是的，这

确实可耻，是无知的结果。为了达到这个不光彩的目的，他什么方案都提过。只是由于遭到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为研究该方案而召集的许多委员会的一致抵制，才使季米里亚捷夫科学院幸免于难，未被撤掉。

赫鲁晓夫同志在授予苏联勋章的事情上有时随心所欲，令人不能容忍。中央主席团谈妥授予某某，而他则强行改变集体决定，使主席团面临既成事实。

近些年来，我们实际上并未举行过真正列宁主义意义上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体会议，以求实态度讨论各种现实问题，而是为了装璜门面空谈一通。这也证明了赫鲁晓夫同志总是力图摆脱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对他的监督。因为实际上并未举行中央全会，而是召开各种全苏性会议，每次会议参加者多达五、六千人，从会议讲坛上连篇累牍地发出对赫鲁晓夫同志的吹捧。赫鲁晓夫只召集全苏性会议，而不召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他这样做是有意的，其目的是为了回避中央委员们可能对他的批评。因为很自然，在一个大型的造声势的会议上，根本没有可能就各种紧迫问题充分地坦诚地发表意见。

主席团委员们实际上被剥夺了下到地方进行视察的可能性，这一点也给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的工作造成很大危害。我们当中每个人都想能经常下乡多接触些群众，但每当提出某某主席团委员要去某加盟共和国或某州的问题时，赫鲁晓夫同志总是刻薄地说：“如果无事可干，就下去吧！是想去旅游一番吗？”他千方百计地想做到：除他本人外，任何人都不得同地方上有任何联系，企图制造一种假象，似乎他是惟一联系各加盟共和国、各州、各边疆区的。

不用说，这些年来，赫鲁晓夫同志下去视察实际上仅仅是为了装点门面，接受人们手捧面包和盐对他的隆重欢迎，而他则动辄无休止地重弹他那老一套不得要领的说教。（喊声：对！）

况且，他每次下去视察都要做长篇大论的报告，通过报刊、广播电台大肆加以宣传。这些报告简直把赫鲁晓夫每打一个喷嚏转一个身子也都给记录了下来。这些大报告大概使我们所有人都感到厌烦了。（喊声：说得对！）

近些年来，赫鲁晓夫同志越来越丧失了作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人所必须具备的谦虚品德。甚至出国进行国事访问时，他也毫无道理地随身带上他的一大批家庭成员、晚辈、近亲、远亲、当然也少不了带上一批举手拍马之徒及其夫人们。这都是些花费巨大的国事访问。（喊声：可耻！）

赫鲁晓夫同志肆无忌惮地鼓动对他个人的吹捧。他逐渐地越来越强烈地期望能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和照片。于是，那些对他阿谀奉承之辈就全力以赴，直做到每天不是发表他的冗长的讲话，就是大量刊登有关他的新闻图片。当然，这种情况也不是一下子而是逐渐形成的。

赫鲁晓夫同志把他的女婿阿朱别伊——一个政治上不成熟的人变成了他的某种义务外交部长，派他赴美国、西德等一些国家进行会谈。这些出访的结果怎样？其结果大部分是有害的。而他的最后一次出访西德，是有可能损害我们同一些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因此，主席团不得不采取措施来消除这位巡回大使放肆的、不负责任的胡说八道所造成的危害。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解除了阿朱别伊担任的《消息报》总编辑的职务。（喊声：对！鼓掌）

就在几年以前，赫鲁晓夫同志的工作作风还不是这样。我们对于他当时的主动精神和充沛精力是给予应有评价的。我们同他一道进行了对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反党集团的斗争。赫鲁晓夫同志的这些功绩，我们也不会忘记。然而，近些年来，他猛然走向了反面，实际上丧失了列宁式领导人的品质。

现在越来越看清楚，赫鲁晓夫同志总是尽量抬高他个人，而无

视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赫鲁晓夫同志这些不当行为，只能说明他竭力在搞对他的个人迷信。正是因为赫鲁晓夫同志这些不当行为已经具有危险性，我们主席团委员们才认为有必要对他给予坚决回击。（热烈鼓掌，喊声：说得对！）

这样做并非易事。中央主席团不是突然决定走这一步的。我们曾长期耐心地寻求办法，探讨各种可能予以纠正的方法。因为赫鲁晓夫同志早就有过不少不良的品质和行为，早就不止一次地暴露出他那可怕的毛病。

我们曾经希望，他在工作中的失误和挫折能够得到纠正。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就是要帮助一个同志改正其失当行为，克服其性格上的毛病。但越来越清楚，列宁在他那封写给中央委员会的著名信中批评过斯大林的所有那些不良品质与性格在许多方面，也都在赫鲁晓夫同志身上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其实，他的特点不仅是极端粗暴、出尔反尔、放荡任性和心胸狭窄，而且他还热衷于发号施令，鲁莽行事，考虑问题先入为主，偏颇不公，易于狂怒，尤其最近动辄轻蔑指责他人，过份自夸而自信。

由于赫鲁晓夫同志采取的领导方法不正确，所以他犯了许多严重错误。又因为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他的这类错误开始增多。结果，在实际工作中，他已不可能履行委托给他的最高领导职务了。因此，近些年来，赫鲁晓夫同志在我国共产党人和劳动者当中的威信急剧下降。这一点，中央委员同志们，你们大家是很清楚的。

赫鲁晓夫同志在主席团中违背列宁主义党内生活准则和集体领导原则，不愿意考虑其他同志意见，不肯吸收党和人民的实际经验，采取措施草率从事，考虑欠周，结果在实际工作中犯若干严重错误，给国家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他在领导农业方面所犯的错误。大家知道，赫鲁晓夫同志是竭力要把农业的领导权独揽在他一个人的手

中。在中央，除了他，任何人都不能过问农业，因为赫鲁晓夫同志自认为他是惟一懂农业的行家里手。只要举出这样一件事就够了。有位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考虑到我们的粮食有困难，在同哈萨克斯坦党中央一位书记谈话时说：“要是你们共和国今年能够提供更多的小麦就好了。”赫鲁晓夫同志获悉这次谈话内容后，对这位委员说：“您怎么能就农业问题提出建议呢……农业是由我负责的。您不要多管闲事。”

实践证明，这种自吹自擂和高傲自大是毫无根据的。这些年来，赫鲁晓夫同志在他给农业工作者的诸多指示中，往往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热衷于种植玉米，竟然不顾一切，不考虑任何人意见，到处强迫播种玉米，甚至连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的北部各区也得种这种作物。直至尝到痛苦教训的苦果之后，他才允许个别地区例外。后来，他又发布指令，普遍禁止种草。也是在吞下了这一教训的苦果之后，他才罢休。他忽而声称不应扩大向日葵播种面积，忽而又下令增加其播种面积。他一会宣扬在畜牧业中推广所谓“Z型挤奶器”，一会又建议代之以“旋转型挤奶器”。

这哪里是什么领导，这才真像旋转型挤奶器变来变去呢。（笑声。鼓掌）

赫鲁晓夫同志不深入了解事情的实质，竟然毫无根据地吹捧梁赞州那件丑事。大家还记得，他是怎样宣扬骗子和冒险家拉里奥诺夫提出肉类采购三年计划一年完成的所谓经验的。这类冒险主义的试验结果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公有制畜牧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赫鲁晓夫同志总好喋喋不休地、上气不接下气地夸耀他的家乡卡利诺夫卡集体农庄的成就，已经到了令人厌恶的程度，虽然后经查明，为了扶持发展这个集体农庄花费了国家不少钱财。

应当在这个讲坛上坦率地说，我国农业状况与赫鲁晓夫不着边际地吹嘘相反，仍然不能令人满意。1959~1962年的4年中，农

业产量平均每年增长 1.7%，而计划要求每年增长 8%。1963 年的歉收更使情况恶化了。因此，我们在供应居民肉类、面包、杂粮以及其他产品方面遇到了一定的困难。

今年，农业工作者、地方各级党组织工作得很好，粮食、棉花、甜菜、葵花籽、土豆和蔬菜等都获得了好收成。但是，为了巩固这一成果，为了使农业真正有个大变化，我们党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尤其是我们畜牧业的发展还有巨大困难。对此，我们必须把真实情况如实地告诉给苏联人民。

当然，中央委员和政府要认真深入地研究进一步发展农业的种种问题，但其做法绝不是像赫鲁晓夫同志在他那份下发给各级党组织的意见书中所建议的那样。（长时间热烈鼓掌）

赫鲁晓夫同志的大量意见书以及伴随而来的频繁改组，简直把我们从上至下所有工作人员都折腾个够，瓦解了地方各级党组织，使它们丧失了信心。

特别是 1964 年 7 月 18 日赫鲁晓夫同志提出的最后一个意见书，更是含有特别严重的错误。赫鲁晓夫同志在这份意见书的初稿中曾经建议用政治部来取代生产管理局的党委，对党组织推行一种特殊的军事化。他在中央七中全会上的讲话就贯穿着这个精神，在讲话中他对地方各级党的机关进行了令人不能容忍的攻击。在遭到主席团委员们共同反击之后，赫鲁晓夫同志才颇为不满地撤回了他的荒谬提议。然而，事实上直至现在，他的意见书中仍然贯穿着将各级党组织排除在对农业的领导之外并竭力贬低各级党的机关的精神，中央主席团决定收回这份恶劣的意见书。（鼓掌）

近来，赫鲁晓夫同志又主张甚至连区域性生产管理局也予以撤销，提议由各州、各边疆区直接领导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这种做法会给农业造成极大危害。

很明显，这是同我们党的一贯传统与原则背道而驰的，也是与

党的政策不符的。不用说，同志们，没有党的组织，不加强党的组织，不提高党组织的作用，就不可能振兴农业。

在工业方面，毫无疑问，我们的情况好一些，在工业的发展、技术进步和科学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设有三个舱座的“上升”号宇宙飞船在世界上首次出色地升入太空，就是我们取得成就的近期证明之一。然而，赫鲁晓夫同志对于国民经济这一部门的外行干预，以及他无数次强制推行的工业管理的改组，在这方面采取的种种欠考虑的措施，其结果已使科学脱离生产，使技术进步停滞不前，这一切都阻碍了工业的发展。

例如，不在不久前，他还在给我国国民经济远景发展计划的问题制造了很大混乱。

大家知道，国家计委根据地方党的机关、苏维埃机关、企业、国民经济委员会、各个部门的国家委员会的提案，编制了1966～1970年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赫鲁晓夫同志未经认真讨论，实际上是个人独断专行，突然提出用七年计划或八年计划来取代五年计划草案。他在有各个部门国家委员会领导人、各加盟共和国、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等代表参加的大型会议上，信口胡诌了一通。听了他的讲话，编制计划的人员简直慌了手脚，不知道他们该编制什么样的计划。于是，计划编制工作走入了死胡同。赫鲁晓夫同志上述做法的目的，是想掩盖现行七年计划中某些重大项目未能完成的情况。

难道这是一个领导人所应当采取的态度吗？党一向是对人民讲真话的，而且相信：人民是理解党的，理解我们在共产主义建设过程中和国际局势仍在继续紧张的情况下必然遇到的各种困难。

赫鲁晓夫同志简直是患了热衷搞五花八门改组与改革之癖，迷信某种神奇的魔力。其实，这些改组与改革只能是瞎折腾人，使他们茫然不知所措而失去信心。

生活在前进，随着社会的发展，各项事业的领导管理机构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应当对其加以完善和改进。但完善和改进时，必须遵循列宁的指示，不得仓促、匆忙从事，切忌鲁莽而就。

弗·伊·列宁不止一次地对于这类改革提出过警告。

下面引述一段列宁的有关原话。他说：“我们有许多人喜欢任意改造一切，结果遭到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大灾难。”（笑声。鼓掌）这句话是切中要害！你们看到，列宁认为无数轻率地改革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并且指出：“关键不在于机构，不在于改组，不在于新的法令，而在于人和检查执行情况。”

我们怎样才能摆脱所有这些改组和改革的困扰呢？这只能按照列宁的告诫去做。他讲了下面的话：“应当及时醒悟过来……从我们已经搞起来的那些机构中挑出少数几个来……表明，我们在国家建设方面真正学到了一些东西……。”

伟大列宁所指引的这条道路当时正确，现在也是惟一正确的。（鼓掌）

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将不得不认真审查所有已经实行过的改组，并且纠正所犯的错误。应当强调指出，许许多多事情都是这样匆忙草率绕进去的。因此，请大家不必要求中央主席团也如此匆忙草率地从中绕过来。（笑声）对此，我们将深入研究问题的实质所在，同你们，同地方党和苏维埃机关以及国民经济工作人员商量之后，合理地加以解决。

尤其应当研究的，是在赫鲁晓夫同志强制下按生产原则对于州和边疆区党和苏维埃机关进行的所谓改组。该项措施被说成是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关于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建设原则，而实际上则是背离了列宁的指示和苏共纲领关于这个问题的要求。

分别设立工业的和农业的州党委以及工业的和农业的州苏维埃执委会两套班子，其结果如何呢？结果是造成党的、国家的、经济

的机关在职务、权利和责任方面的极度交叉和混同，使它们的工作相互重叠。结果是大大降低了苏维埃的作用。苏维埃是最具群众性的政权机关。它是全体人民的政权，而不是单独分别建立的工人政权和农民政权。苏维埃政权的权力不仅适用于经济，而且适用于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政治、社会、文化、卫生、教育等领域。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苏维埃全权之所在。列宁认为，建立统一的苏维埃是党的最伟大的成就。由于赫鲁晓夫同志坚持主张实行的各种改组，苏维埃被人为地分割开了。

中央委员会也将高度审慎地研究这一问题。（长时间鼓掌）

下面讲几点关于国际问题的意见。

中央主席团认为，党在国际问题上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中央委员会是在高举维护我国威望和争取世界和平的旗帜，并且帮助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各国与各国人民。我们认为，这是无可置疑的。既为我国各族人民，也为我们的朋友、为全世界，争取保障和平生活的条件而斗争，是我们最重要的事业，我们正在为此而付出许多精力。

然而，谈论赫鲁晓夫同志时，应当指出的是，他在解决某些国际性的问题上，有时则表现出草率从事和不够严肃。

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帝国主义者，尤其是美帝国主义者，越来越蛮横霸道，奉行加剧国际局势的方针。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较前越来越复杂。这其中也有中共领导人在搞反苏共的分裂主义活动。他们反列宁主义的立场是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宣言与声明制定的总路线背道而驰的。今后，我们要同他们的这一立场继续斗争下去。目前，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里，民族主义因素有所抬头。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实行非常耐心、坚定而又灵活的政策，以期加强我们同各国兄弟党领导人、同这些国家的人民的联系与友谊。

我们认为，我党在国际问题上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也不应闭眼不见赫鲁晓夫同志那种完全不合时宜的、摆出一付教师爷架势的表现。他很喜欢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教训兄弟国家的领导人。例如，他出国访问时教人家怎样种玉米，怎样取得农作物的高产等等。何苦要这样做呢？况且在他教训别人的那些地方，农作物的产量要比我国的高得多。这不是使那些同志难堪嘛。他几乎都是在公众场合这样不讲分寸的。例如，对待罗马尼亚同志就是如此。这不能不得罪一些兄弟党的领导人。因为他们都是富有经验的、受过考验的人，他们并不需要这类很不得体的忠告。

我们曾经同波兰人民共和国签订由波兰每年向苏联大批量供应安—2型飞机的协议。波兰有家近15000名工人的飞机工厂，专门为完成苏联订货而生产。波兰同志认真履行协议，按协议规定数量向我们供货。但在前不久同哥穆尔卡同志的一次会谈时，赫鲁晓夫同志却武断地向对方表示：由于波兰飞机价格高，苏联今后将不再购买这些飞机。后经核实，我们同种型号飞机的造价并不低于波兰生产的飞机的造价。即使假定我们的飞机造价低于波兰飞机造价，要解决涉及同兄弟共和国经济关系的问题难道能够如此失礼吗！很自然，波兰同志对于赫鲁晓夫同志的声明感到不安，多次向我们提出将此类飞机供货至少延长到1970年，以便在此期间能够改装工厂转产其他产品。这个问题久拖未决，只是到了现在，在没有赫鲁晓夫同志的参与下，问题才能得到圆满解决。（鼓掌）

在赫鲁晓夫同志主持中央主席团会议的过程中，他开始时总是不当地插话，实际上是否认对他的批评。我们尽量去纠正他。经过全体同志一致批评、反驳，尖锐而又坚决地谴责他的一切错误，赫鲁晓夫同志才承认了对他的批评是正确的。同时，他表示：在主席团会议上讨论他的活动问题，证明主席团是严格遵循苏共二十大的指示精神，真正在坚持列宁主义关于集体领导、关于党内民主的原

则。赫鲁晓夫同志承认，他的年龄和健康状况已使他不能履行托付该他的职务，因此请求解除他所担任的各项职务。

他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下述内容的声明书：

“苏共中央、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同志们！

由于年迈并考虑到我的健康状况，请求苏共中央满足我关于解除我所担任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

鉴于上述原因，我现已不能履行委托给我的职责。

谨向苏共中央委员会保证：我将以有生之年与精力贡献给为党、为苏联人民造福以及为建成共产主义所进行的事业。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同志承认了对他的批评是正确的。他请求允许他不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讲话。

中央主席团从赫鲁晓夫同志的声明书得出结论认为，赫鲁晓夫同志已不能保证对工作进行正确领导，无力扭转局面，因此必须解除他所担任的中央第一书记、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职务。（长时间热烈鼓掌）

苏共中央主席团已通过下述《关于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决议草案》，现提请你们审议：

“由于赫鲁晓夫同志违背列宁主义集体领导原则犯有错误和行为不当，造成最近一个时期中央主席团内情况不正常，使得中央主席团委员难以履行他们在领导党和国家方面肩负的重大职责。

赫鲁晓夫同志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之职，集大权于一身，在一系列情况下竟然不受苏共中央的监督，无视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们的意见，未经应有的集体讨论，擅自决定各种重大问题。

赫鲁晓夫同志对主席团和中央同志们的态度急躁粗暴，并蔑视他们的意见，在实际贯彻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决议所确定的路线方面，犯了一系列重大错误。

苏共中央全会认为，由于赫鲁晓夫同志作为一名工作人员近来表现出的个人品质方面的缺点、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他已不能改正他所犯的严重错误。

同时，考虑到赫鲁晓夫同志本人提交的声明书，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如下：

1. 满足赫鲁晓夫同志因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提出解除他的中央第一书记、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
2. 认为今后再由一个人身兼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二职是不适当的。”（长时间热烈鼓掌）

同志们！我们党是一个坚强而有力的党。它能够果断、勇敢地消除赫鲁晓夫同志在领导党和国家方面所犯的错误。我们现在和今后都坚定不移地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过去已经捍卫、今后仍将继续捍卫党的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的历史性决议，捍卫苏共纲领。

我们大家在一起通过了一项极其重大的决定。我们都应竭尽全力使我们列宁主义的党因此而成为更加强大、更加统一、更加坚如磐石而富有战斗力的党，能够胜利地解决在我国建成共产主义的伟大任务。（长时间热烈鼓掌。全体起立）

主持人勃列日涅夫同志：下一步怎么办？有何提议？

场内喊声：一切都清楚了。我们提议不必进行讨论。听了中央主席团的情况介绍，已经完全清楚。请对决议案进行表决吧！

主持人勃列日涅夫同志：同志们！你们的提议同主席团的意见是一致的。有没有人坚持进行讨论？

场内喊声：没有

主持人勃列日涅夫同志：有人反对对决议案进行表决吗？

喊声：没有。

主持人勃列日涅夫同志：那么，就请允许我将中央主席团提出的、由苏斯洛夫同志宣读过的决议案提请你们审议。有人提议原则通过决议案。有没有反对意见？

喊声喊声：没有。

主持人勃列日涅夫同志：那就原则通过了决议案。有没有什么补充或修改意见？

别戈夫：可以提点补充吗？赫鲁晓夫同志有许多不当行为。我只对关于中央主席团那一部分提点补充意见，因为他不单单是贬低了主席团的作用，而且贬低了中央的作用。

场内喊声：说得对！

主持人勃列日涅夫同志：我认为应该予以采纳，因为实际上就是如此。有反对意见吗？没有。

阿里斯托夫：我有一点补充意见。建议在决议中指出：赫鲁晓夫同志辜负了中央的信任。这样补充可以提高中央的威信，将来对于全党都会有重大教育意义。

主持人勃列日涅夫同志：有反对意见吗？没有。那好，在决议最后定稿时请将这个补充意见考虑进去。

对决议案还有什么意见吗？没有。请允许我提出把这个决议案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表决。

赞成这个决议的，请举手。请把手放下。有反对的吗？有弃权的吗？没有。这样，中央委员会委员一致通过决议。（长时间热烈鼓掌）

同志们！出席全会的还有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

员。你们是否也愿意参加对于这个决议的表决呢？（喊声：我们请求参加）那么，同志们，就请大家一起来表决吧！同意这个决议的，请举手。请把手放下。有反对的吗？没有。一致通过。（长时间热烈鼓掌，全体起立）中央主席团认为，在报刊上只公开发表决议的第1点。至于党内，我们将把全会情况传达到全党。究竟采取什么形式传达，请书记处考虑。

场内喊声：对！

主持人勃列日涅夫同志：好，这个问题就这样决定了。同志们！我们现在应该选举中央第一书记和审议关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问题。（鼓掌）

场内喊声：我们提议选举勃列日涅夫同志为我党中央第一书记。（长时间鼓掌）

主持人波德戈尔内同志：有人提议选举勃列日涅夫同志为中央第一书记。有没有其他提议？没有。进行表决。赞成选举勃列日涅夫同志为我党第一书记的，请中央委员们举手。请把手放下。有反对的吗？有弃权的吗？没有。提议获得一致通过。（鼓掌）

同志们！现在让我们同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一起表决吧！赞成选举勃列日涅夫同志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请举手。请把手放下。有反对的吗？有弃权的吗？没有。勃列日涅夫同志经一致同意当选。（长时间热烈鼓掌，全体起立）

主持人勃列日涅夫同志：我对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对你们大家，同志们，给予我的崇高信任和荣誉表示感谢。（长时间鼓掌）

下面，我们应当审议关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问题。（鼓掌）

场内喊声：我们提议推荐柯西金同志。

主持勃列日涅夫同志：这也同中央主席团的意见一致。同志

们，还没有其他提议？我现在请进行表决。同意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推荐任命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中央委员们，请举行。请把手放下。有反对的吗？没有。有弃权的吗？没有。（鼓掌）

让我们再来同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们一起表决吧！我现在请进行表决。赞成推荐柯西金同志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请举手。请把手放下。有反对的吗？有弃权的吗？没有。大家一致推荐他出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长时间热烈鼓掌。全体起立）

柯西金：同志们！我想对你们大家今天给予我的巨大信任表示感谢。我本人将尽自己的一切力量、知识和本领，不辜负你们的巨大而崇高的信任，我定将努力不负重托。

主持人勃列日涅夫同志：中央主席团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如需要批评某些同志，决定一些组织问题。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有必要向你们建议在今天的全会上就不审议这些问题了。还有其他什么意见吗？没有，那么，就请允许我宣布全会闭幕。（长时间鼓掌）

有人喊：我们强大的列宁主义的党及其中央委员会万岁！（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乌拉！”）

【专题说明】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 案件的复查和平反

(1988年12月)

本专题收入的档案是苏共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和苏共中央马列学院写的所谓“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的调查报告，以及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复查和平反的会议记录。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成立的、动员苏联犹太人为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暴力而斗争的社会组织。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是苏联的犹太人名流和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这个委员会在反对法西斯暴行的舆论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战后却对这个委员会进行了镇压。委员会于1948年底被解散。委员会的主席、苏联人民演员索·米·米霍埃尔斯在一次被制造的车祸中致死。包括委员会的书记所·阿·洛佐夫斯基在内的其他成员在1949年分别被判处极刑、长期劳改或流放。“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不仅是战后的又一冤假错案，而且还由此引发了一场在苏联国内的反犹运动。

斯大林去世后，这一案件得以平反。这两个文件提供了事件的基本真相。关于此案件的详细审理过程，可参见本书第25卷。

(本专题文件由杨存堂编辑和校注，
郝尔启、赵静男、赵英杰翻译)

№05235

关于所谓“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

(不晚于 1988 年 12 月 29 日^①)

1952 年 5~7 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审理了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活动有关的一批人的案件。本案有 15 人受到追究：

1. 洛佐夫斯基，所罗门·阿布拉莫维奇，1878 年生，1901 年入党，曾任苏联情报局副局长、局长，被捕前任联共（布）中央高级党校国际关系教研室主任；

2. 费费尔，伊萨克·所罗门诺维奇，1900 年生，1919 年入党，诗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书记；

3. 尤泽福维奇，约瑟夫·西吉兹蒙多维奇，1890 年生，1917 年入党，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初级研究员；

4. 希梅利奥维奇，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1892 年生，1920 年入党，中央鲍特金临床医院主任医生；

5. 克维特科，列伊巴·莫伊谢耶维奇，1890 年生，1941 年入党，诗人；

6. 马尔基什，佩列茨·达维多维奇，1895 年生，1942 年入党，诗人，苏联作家协会检查委员会书记；

7. 贝格尔森，达维德·拉斐洛维奇，1884 年生，诗人；

8. 霍夫斯坦，达维德·瑙莫维奇，1889 年生，1940 年入党，诗人；

^① 文件无日期，从内容判断应是为 1988 年 12 月 29 日政治局会议准备的。

9. 祖斯金，韦尼阿明·利沃维奇，1889年生，莫斯科国立犹太剧院艺术指导；

10. 塔尔米，列昂·雅科夫列维奇，1893年生，苏联情报局记者，翻译；

11. 瓦坚贝格，伊利亚·谢苗诺维奇，1887年生，国家文艺书籍外文出版社高级检查编辑；

12. 泰乌明，埃米利娅·伊萨利芙娜，1905年生，1927年入党，苏联情报局国际部编辑；

13.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柴卡·谢苗诺芙娜，1901年生，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翻译；

14. 什泰恩，莉娜·所罗门诺芙娜，1878年生，1938年入党，苏联科学院和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苏联医学科学院生理学研究所所长和莫斯科第二医学院生理学教研室主任；

15. 布雷格曼，所罗门·列昂季耶维奇，1895年生，1912年入党，俄罗斯联邦国家监察部副部长。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立于伟大卫国战争年代，其宗旨是动员苏联世界反对西斯暴行的舆论。该委员会的活动开始于1942年2~4月。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为苏联人民演员所·米·米霍埃尔斯，责任书记先后为爱泼斯坦和伊·所·费费尔。委员会有自己的机关刊物——《艾尼凯特报》，该报在苏联和国外发行。

1946年10月12日，苏联国家安全部向联共（布）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呈送了《关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某些工作人员的民族主义表现》的报告。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当即组织了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活动的审查工作。在写给联共（布）中央的审查总结报告中说，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置阶级立场于不顾，与国际资产阶级活动家和组织在民族主义基础上进行接触，在资产

阶级出版物上描述苏联犹太人的生活，夸大他们在苏联成就中的贡献，——这些行为均应看作是民族主义的表现。报告中强调指出，委员会未经官方许可即在国内开展活动，把自己作为处理犹太居民事务主要特派员和这些居民与党和苏维埃机关之间的调停人。报告最后得出结论，委员会的活动已超越其权限范围，开始具有其不应有的功能，故而在政治上是有害的、不可容忍的。因此，提议取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1946年11月26日，米·安·苏斯洛夫也向约·维·斯大林呈送了相似内容的报告。

事后查明，由于采取非法侦查手段，捏造并取得了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戈尔德斯坦（1947年12月19日被捕）和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格林贝格（1947年12月28日被捕）的供词，于是以此作为向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领导人提起刑事诉讼的直接借口。这两个人在口供中，说什么所·阿·洛佐夫斯基、伊·所·费费尔等该委员会成员进行反苏民族主义活动。1948年1月10日和3月1日，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曾分别将审讯戈尔德斯坦和格林贝格的笔录呈送联共（布）中央。

1948年3月26日，苏联国家安全部还向联共（布）中央和苏维埃呈送了一份《关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报告。报告中说，该委员会领导人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他们进行反苏民族主义活动，尤其突出表现在所·米·米霍埃尔斯和伊·所·费费尔美国之行以后，他们在美国与据说是和美国情报机关有联系的人曾发生接触。

1948年11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决议宣称：

“批准苏联部长会议常务局下述决定：

苏联部长会议常务局责成苏联国家安全部立即解散‘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因为事实表明，该委员会系反苏宣传中心，定期

向外国情报机关提供反苏情报。

鉴于以上情况，查封该委员会机关刊物，抄没委员会公文案卷。暂不捕人。”

现已查明，格·马·马林科夫对非法镇压因“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受追究者负有直接责任。他与预审和庭审有着直接关系。1949年1月13日，他曾召所·阿·洛佐夫斯基。在长时间谈话（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马·费·什基里亚托夫在场）过程中，他强使所·阿·洛佐夫斯基承认自己进行犯罪活动。为达此目的，格·马·马林科夫利用了5年前（1944年2月15日）有所·米·米霍埃尔斯、爱泼斯坦、伊·所·费费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签名，并由所·阿·洛佐夫斯基审订的寄给约·维·斯大林的一封信。该信提议在克里米亚地区成立犹太社会主义共和国。

谈话后，格·马·马林科夫和马·费·什基里亚托夫给约·维·斯大林写了一份报告，建议将所·阿·洛佐夫斯基开除出联共（布）中央，理由是：“有政治上不可靠的联系和与中央委员不符的行为。”

1949年1月18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以征询意见的方式），将所·阿·洛佐夫斯基开除出联共（布）中央并开除出党。1949年1月26日将其逮捕。1月份被捕的还有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鲍·阿·希梅利奥维奇、约·西·尤泽福维奇、列·莫·克维特科、佩·达·马尔基什、柴·谢·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埃·伊·泰乌明。早些时候，1948年，因此案受到追究的伊·所·费费尔、韦·利·祖斯金和达·璠·霍夫斯坦已被捕。

利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被解散这一事实，以及上述报告中的政治罪名和伪造的审讯材料，阿巴库莫夫及其亲信指控该委员会成员犯有国事罪和反革命罪。

现已查明，进行侦查时粗暴违反法律并采取违禁手段，以取得“认罪口供”。尽管如此，在最初几次审讯中，所·阿·洛佐夫斯基、

伊·所·费费尔等人否认自己曾进行敌对活动。后来，除鲍·阿·希梅利奥维奇外，所有人都被迫“承认”自己有罪，并招出了关于委员会成员进行间谍和反苏活动的供词。

被任命为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的伊格纳季耶夫在熟悉侦查材料时，于1951年8月24日在写给格·马·马林科夫和拉·帕·贝利亚的信中说：“几乎完全没有材料能证实被捕者关于他们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掩蔽下进行间谍和民族主义活动的供词。”信中还通报了打算就案件采取更广泛的措施的情况。

1952年4月3日，伊格纳季耶夫将起诉书呈送约·维·斯大林，将起诉书副本分别寄给格·马·马林科夫和拉·帕·贝利亚。在附函中提出建议：除莉·所·什泰恩外，将所有被告判处极刑——枪决。

1952年4月7日，案件被交付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从1952年5月8日至7月18日，军事审判厅由审判长切普佐夫主持，在没有国家公诉人和辩护人代表出庭的情况下，对案件进行审查。军事审判厅将所·阿·洛佐夫斯基、伊·所·费费尔等13人判处枪决，将莉·所·什泰恩判处剥夺自由3年半，然后流放5年。

现有几份切普佐夫关于作出这一判决时的情况的自白书。其实质可以归结为一点，即他对无罪的人提起诉讼和在不公正的判决书上签字，都是由高层领导预先决定的。

1957年8月15日，切普佐夫将自白书呈交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格·康·朱可夫，并将其副本呈交中央主席团其他委员——尼·谢·赫鲁晓夫、尼·亚·布尔加宁、米·安·苏斯洛夫、列·伊·勃列日涅夫、克·叶·伏罗希洛夫、尼·米·什维尔尼克^①和阿·伊·米高扬。他在自白书中说，在开庭审判之前，伊格纳季耶夫及其副手留明就通知他，根据他们的报告，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已经作出决定，

^① 什维尔尼克，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除莉·所·什泰恩外，枪决所有被告。

在这份以及随后写给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自白书中，切普佐夫谈到，法庭全体人员对案件调查的充分性和客观性产生了怀疑，因此本应退回案卷以进行补充调查，但是未曾这样做。

切普佐夫的自白书说，他向苏联总检察长萨福诺夫、苏联最高法院院长沃林、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米·什维尔尼克、联共（布）中央书记П.К.波诺马连科、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马·费·什基里亚托夫汇报说，必须进行补充调查。然而，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他们都建议向格·马·马林科夫请示这个问题。

切普佐夫接着说，格·马·马林科夫接见了，伊格纳季耶夫和留明也在场。他说了必须退回案卷以进行补充调查的想法。然而，格·马·马林科夫回答说：“这个案件中央政治局已经研究了三次，你执行政治局决议就是了。”

可以为切普佐夫的自白书找到旁证。例如，1953年7月24日，曾参加所·阿·洛佐夫斯基等人案件调查工作的留明，在作为被告受审时承认：“法庭打算把这份案卷退回以进行补充调查时，我坚持按案卷中现有的材料作出判决。”

曾担任留明的助手的格里沙耶夫，在因留明案件受审时招认：“从留明的话里我知道了，在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进行审查期间，切普佐夫同志找过上级机关。他对上级反映了案卷里的不足和违反法制的地方。但是，留明告诉我，切普佐夫同志批评这份案卷，并不是因为案卷材料根据不足置信，而是因为被捕者还没被彻底揭露，犯罪根源还没挖深。”

1948~1952年，受到所谓“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牵连，因被指控进行间谍活和反苏民族主义活动而遭到逮捕并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还有许多犹太人。其中包括党务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学者、作家、诗人、记者、演员、国家机关和工业企业的职工，共

计 110 人。在这些遭受迫害的人中，判处极刑 10 人，25 年劳改 20 人，20 年劳改 3 人，15 年劳改 11 人，10 年劳改 50 人，8 年劳改 2 人，7 年劳改 1 人，5 年劳改 2 人，10 年流放 1 人，侦查过程中死亡 5 人，被捕后终止诉讼 5 人。他们现已全部平反。

1955 年，对所·阿·洛佐夫斯基、伊·所·费费尔等人的刑事案件曾进行复核。在复核过程中，曾研究过党和国家档案馆中保存的文献材料，询问过许多当年曾与这些事件有关的人，研究了曾对本刑事案件进行调查并于 1952~1954 年因伪造侦查材料而被判罪的原侦查人员的刑事案卷。

复核结果证明，指控所·阿·洛佐夫斯基、伊·所·费费尔等人的案件纯属虚构，而被告在初审中的供词是通过非法途径获得的。

1955 年 11 月 22 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裁定，根据后来发现的情况，撤销 1952 年 7 月 18 日对因所谓“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而被判罪的所·阿·洛佐夫斯基、伊·所·费费尔等人的判决，因缺乏犯罪要素按刑事程序终止诉讼。

1955 年，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决议，为所·阿·洛佐夫斯基、伊·所·费费尔、约·西尤泽福维奇、列·莫·克维特科、佩·达·马尔基什、埃·伊·泰乌明、所·列·布雷格曼、莉·所·什泰恩恢复党籍。1988 年，为鲍·阿·希梅利奥维奇和达·瑙·霍夫斯坦恢复党籍。

苏共中央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参加所谓“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材料准备工作的有卡特科夫和瑙莫夫。

№05234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犹委会案件的会议记录

(1988年12月29日)

委员会出席人：А.Н. 雅科列夫、瓦·安·梅德韦杰夫、维·米·切布里科夫、阿·伊·卢基扬诺夫、Т.П. 拉祖莫夫斯基、В.И. 博尔金、Б.К. 普戈、В.А. 克留奇科夫

委员会秘书：尼·伊·萨温金

应邀人：苏联总检察长 А.Я. 苏哈列夫、苏联最高法院第一副院长 С.И. 古谢夫、苏共中央书记助理、В.А. 库兹涅佐夫

工作小组成员：В.И. 安德烈耶夫、И.П. 东科夫、Н.Ф. 卡特科夫、Ю.М. 科尔别涅夫、С.Д. 莫吉拉特、В.П. 皮罗日科夫、А.А. 索洛维约夫

1. 会议听取了苏联最高法院关于审议与按司法程序为所谓“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被判刑人平反有关材料的通报。

伟大卫国战争年代成立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在动员苏联和世界反对法西斯暴行的舆论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工作。

1948年底，委员会被解散，大批与委员会活动有关的人员被捕。诬告他们犯有国事罪和进行间谍活动，成为采取镇压措施的借口。

1952年7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就此案作出判决，判处所·阿·洛佐夫斯基、伊·所·费费尔、约·西·尤泽福维奇、鲍·阿·希梅利奥维奇、列·莫·克维特科、佩·达·马尔基什、达·拉·贝格尔

森、达·璠·霍夫斯坦、韦·利·祖斯金、列·雅·塔尔米、伊·谢·瓦坚贝格、埃·伊·泰乌明、柴·谢·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极刑，判处莉·所·什泰恩剥夺自由和流放。

1955年进行的审查表明，向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提出的指控是伪造的。1955年11月22日，苏联最高法院审议了苏联总检察长就所谓“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所作结论，撤销对所有被判罪人的判决，并因其行为缺乏犯罪要素而终止诉讼。

根据同样理由终止对所·列·布雷格曼的诉讼。后者曾被交付法庭，但因其身患重病对其暂停诉讼。以后，因其死亡，案件未加审理。

发言人：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切布里科夫、卢基扬诺夫、拉祖莫夫斯基、克留奇科夫、普戈、博尔金、苏哈列夫、古谢夫等同志

会议决定：将苏联最高法院关于审议本案并通过司法程序为被非法镇压者平反的总结的通报备案待查。

为委员会委员准备关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详细材料。

2. 会议听取了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对曾被追究刑事责任并已与本案其他被判刑人一起通过司法程序平反的鲍·阿·希梅利奥维奇和达·璠·霍夫斯坦的党籍问题审议结果的报告。

会议决定：将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为鲍·阿·希梅利奥维奇和达·璠·霍夫斯坦（2人已故）恢复党籍的决定备案待查。

早些时候，1955~1957年，已为所·阿·洛佐夫斯基、伊·所·费费尔、约·西·尤泽福维奇、列·莫·克维特科、佩·达·马尔基什、埃·伊·泰乌明、所·列·布雷格曼（以上7人均已故）恢复党籍。

1955年还为莉·所·什泰恩恢复了党籍。

3. 会议听取了供发表的关于政治局委员会例会报道文本草案。

发言人：梅德韦杰夫、雅科夫列夫、切布里科夫、卢基扬诺

夫、博尔金、拉祖莫夫斯基、克留奇科夫等同志。

会议决定：根据委员会委员的意见通过供发表报道文本草案。

委员会主席 雅科夫列夫

委员会书记 尼·萨温金